

浦洛基
著
梁永安
譯

俄羅斯的帝國雄心
500年史

再造 失去的 王國



俄羅斯正面臨最終抉擇。
要當純粹的民族國家，
還是重回帝國的光榮？

輔大歷史系周雪舫教授專文——導讀
中研院文哲所陳相因副研究員——推薦

- 頂尖東歐史權威、哈佛大學烏克蘭研究中心主任最新力作
- 出版一個月，即獲邀至美國智庫CSIS專題演講
- 「何謂俄羅斯民族」絕不僅是學術問題，關係到歐洲東部的戰爭與和平！

再造 失去的王國

俄羅斯的帝國雄心
500年史

浦洛基——著
梁永安——譯
Sethi Priokty



俄羅斯正面臨最終抉擇。
要當純粹的民族國家，
還是重回帝國的光榮？

輔大歷史系周雪舫教授專文——導讀
中研院文哲所陳相因副研究員——推薦

- 頂尖東歐史權威、哈佛大學烏克蘭研究中心主任最新力作
- 出版一個月，即獲邀至美國智庫CSIS專題演講
- 「何謂俄羅斯民族」絕不僅是學術問題，關係到歐洲東部的戰爭與和平！

貓頭鷹書房

有些書套著嚴肅的學術外衣，但內容平易近人，非常好讀；有些書討論近乎冷僻的主題，其實意蘊深遠，充滿閱讀的樂趣；還有些書大家時時掛在嘴邊，但我們卻從未看過.....

如果沒有人推薦、提醒、出版，這些散發著智慧光芒的傑作，就會在我們的生命中錯失——因此我們有了貓頭鷹書房，作為這些書安身立命的家，也作為我們智性活動的主題樂園。

貓頭鷹書房——智者在此垂釣

國際好評

浦洛基在本書表現出只見於大歷史家的身手：用活靈活現的方式把古今聯繫起來。他說明了俄羅斯歷經多個世紀打造的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是如何導致普丁入侵烏克蘭和兼併克里米亞的行動。本書詳細又豐富多彩地訴說了歷史和神話之火是如何從第一個沙皇、彼得大帝、布爾什維克、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直燃燒至蘇聯的崩潰。在天天都有俄羅斯新聞和人人都是俄羅斯專家的今日，本書是那些想透過報紙頭條之外了解俄羅斯的人不可不讀。

—卡斯普拉沃，著有《冬天正在來臨》

本書是對俄羅斯民族主義一個淵博的闡述。俄羅斯的歷史顯示，其民族主義充滿矛盾，既兼容又排他，既普世又強調認同，而且這些矛盾時而快速彼此轉換，時而同時並存。作為本領域的行家，浦洛基說明了俄羅斯想要變成一個對其人民和鄰國來說更好的國家所面臨的挑戰。

—韋斯托德，著有《冷戰》

博學、深入且符合時代需求，本書以引人入勝的筆觸縷述了俄羅斯民族走過多個動盪世紀所經歷的故事，從其出現的最早期一直談到現今的普丁政權。浦洛基是國際知名歷史學家，對自己專研領域的掌握少有人能出其右。有著成竹在胸的自信和一雙利眼，他把俄羅斯歷史中的反諷、偶然性和悲劇——道來。任何想要了解今日俄羅斯的人都應該一讀這本書。

—史密斯，著有《拉斯普丁》

浦洛基雄辯地回顧了俄羅斯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歷史起伏……這個透徹分析讓我們得以穩穩地從歷史脈絡理解普丁總統在二十一世紀的外交政策。

—《出版社週刊》「星級推薦」

一部出現得合時和無可挑剔的作品，說明了俄羅斯是如何在強大起源神話的驅策下，矢志奪回失去的領土……浦洛基再一次顯示，他是這個領域的大師。

—《科克斯書評》

導讀

民族的分裂與再打造—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合與分

周雪舫／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八日，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三日，烏克蘭國會取消俄羅斯語作為地區官方語言。二十七日，也就是在索契（Sochi）冬季奧運結束四天後，烏克蘭的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議會在一批俄羅斯武裝分子在場的情況下，選出親俄的新總理阿克蕭諾夫（Sergei Aksenov，一九七二～）；三月初，俄羅斯應邀派軍進駐半島。十六日，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與在該共和國境內的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直轄市舉行公投，以超過百分之九十的選票贊成加入俄羅斯。十八日，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一九五二～）與克里米亞代表共同簽署克里米亞加入俄羅斯的條約。¹烏克蘭、美國和歐盟不承認此次公投，至今四年餘，烏克蘭政府仍無法將國家權力延伸至克里米亞半島。

何以俄羅斯公然派軍干涉克里米亞的選舉與公投，在烏克蘭和西方國家看來是俄羅斯「兼併」（annexation）克里米亞，而非俄羅斯認定的「重新統一」（reunification, воссоединение）？普丁於三月十八日在克里姆林宮向俄羅斯國會議員代表說明克里米亞加入俄羅斯時，提及東正教的信仰使得俄羅斯、烏克蘭和白羅斯有著共同的文化和價值觀，而將基督教傳入「基輔羅斯」（Kyivan Rus'）的大公弗拉基米爾（Prince Vladimir，九七八至一〇一五）於九八八年正是在克里米亞的克森尼索（Chersonesus, Херсонес）受洗，²普丁強調：「克里米亞從前是，永遠也是俄羅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³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八日，在莫斯科紅場舉行克里米亞加入俄羅斯一週年的慶祝會上，普丁說：「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是一個民族，我始終抱持這種說法。」⁴所謂俄羅斯民族的認同是怎麼一回事？本書說明同是東斯拉夫人的大（Great）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小〔Little〕俄羅斯人）和白羅斯人的分合歷史，探討三個民族錯綜複雜的關係，他們是帝俄時期大（big）俄羅斯國家的核心民族，作者尤重烏克蘭與俄羅斯關係的探討。

從合到分：基輔羅斯到蒙古統治時期

時間回到八六二年，留里克（Rurik，八六二至八七九）率領一群來自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維京人，在俄羅斯平原建立第一個政府，被統治者是東斯拉夫人，首都位於諾夫哥羅德（Novgorod），八八二年遷都於基輔，故稱之為「基輔羅斯」，至一二四〇年十二月被蒙古人滅亡，基輔成為廢墟。基輔羅斯改由蒙古人建立的金帳汗國統治，實則僅統治昔日疆土的東北部，包含莫斯科公國在內的地區。至一四八〇年起莫斯科公國伊凡三世（Ivan III，一四六二至一五〇五）不再向汗國繳納貢賦。諾夫哥羅德共和國不受蒙古統治，但需繳納貢賦。基輔羅斯的西部和南部地區（含基輔）陸續被立陶宛大公國兼併，這就是後來稱之為白羅斯和烏克蘭的地區。

立陶宛大公國受到條頓騎士團（Teutonic Knights）的威脅，雅蓋洛大公（Jageillo，一三七七至一四三四）娶波蘭公主為妻，受洗為天主教徒後成為波蘭國王兼立陶宛大公，新組成的「波蘭立陶宛聯盟」（一三八六至一五六九）擁有強大實力抵擋騎士團。雙方更進一步的聯合是一五六九年的「盧布林聯合」（The Union of Lublin），稱為「波蘭－立陶宛共和國」（Rzeczpospolita），⁵此因立陶宛受到莫斯科公國的威脅，亟需波蘭的保護。原立陶宛統治的南部地區轉入波蘭轄下，形成今日的白羅斯地區繼續由立陶宛統治，烏克蘭地區轉為波蘭統治。

烏克蘭農民為了脫離農奴身分而逃往聶伯河（Dniepr River）中下游地區，那裡是地主貴族尚未到達之處。來到這裡的農民雖然獲得自由、平等和土地，卻面臨游牧民族韃靼人侵略的威脅，因此造就他們成為驍勇善戰的騎兵，這群人稱為「哥薩克」（Cossacks），⁶有自由民、輕騎兵、盜匪……等多種涵義。聶伯河下游的札波羅熱（Zaporozhia）塞契（Sich，意為要塞）是烏克蘭哥薩克的軍事與行政中心。初期，每一位哥薩克有權參與議會（Rada，或譯為「拉達」），選舉或被選為領袖「蓋特曼」（Hetman），他們自視為自治共同體，甚而行使外交權。

一五七二年，國王齊格蒙特二世（Sigismund II，一五四八至一五七二）正式僱用三百人編制的哥薩克軍，稱為「註冊哥薩克」（Registered Cossacks），由蓋特曼統治，他們獲得特權

如薪資、土地和農民為其耕種、免除納稅與免服勞役，仍享有獨立的軍事、外交、行政和司法權。

一五九六年的布列斯特（Brest）宗教會議達成妥協性的「聯合教會」（Uniate Church），烏克蘭人仍使用斯拉夫語和東正教禮儀做禮拜，但是接受天主教教義並奉羅馬教宗為最高權威。烏克蘭東正教會自此分裂為東正教會派和聯合教會派，前者勢力漸微，烏克蘭貴族逐漸轉向聯合教會派，一些農民為了追求宗教信仰的自由，往南遷徙成為一名哥薩克。

烏克蘭「哥薩克國」的建立

哥薩克會因宗教信仰領導烏克蘭農民揭竿起義，而註冊哥薩克的人數隨著國王的需求時增時減，失去此身分的哥薩克同時也失去許多特權，會在蓋特曼領導下以暴動的方式向國王爭取更多的註冊哥薩克人數。規模最大一次的暴動是由赫梅利尼茨基（Bohdan Khmel'nyts'kyi，一五九五至一六五七，一六四八起為蓋特曼）領導成功的「一六四八年暴動」，次年八月與國王簽訂「茲博羅夫條約」

（Treaty of Zboriv）⁷，建立起直接由蓋特曼統治的「蓋特曼政權」（Hetmanate, the Hetman State），或稱「哥薩克國」（the Cossack State），其有明確的轄區，如基輔、布拉茨拉夫（Bratslav）、切爾尼戈夫（Chernihiv）等地區，面積達三十一萬餘平方公里，⁸波蘭不得在此境內駐軍，稅賦改由蓋特曼全權處理，包含關稅和酒稅，另擁有獨立的司法權、外交權。此次暴動的成功使烏克蘭人有了政治實體與明確的疆域，追求自由與平等為其核心精神。

條約簽訂後，波蘭貴族認為他們失去太多，烏克蘭農民則不解何以戰勝卻須回原地主處繼續耕種，於是群起暴動。此後，哥薩克國持續六年的戰爭，加上饑荒、瘟疫，以及處於四大強權之中—波蘭、莫斯科公國、鄂圖曼帝國、克里米亞汗國⁹，欲維持自治權極為困難。赫梅利尼茨基決定選擇莫斯科以維護自治權，此因雙方在民族、文化、語言方面大致相同，尤其是有著共同的東正教信仰，此時的莫斯科國力強盛足以抵抗波蘭。一六五四年三月，雙方簽訂「佩列亞斯拉夫條約」（Treaty of Pereyaslav）¹⁰，哥薩克國享有自治權，有自己的領土、軍隊、行政、司法和外交權（波蘭和鄂圖曼帝國除外）。

從分到合（一）：東烏克蘭併入俄羅斯

莫斯科將邊界延伸至聶伯河左岸，恢復了昔日基輔羅斯部分疆土，故稱之為「羅斯的重新統一」（The Reunification of Rus'），沙皇阿列克謝（Aleksi，一六四五至一六七六）以「全羅斯君主；大羅斯和小羅斯」（The Sovereign of All Rus': the Great and the Little）的頭銜簽署條約，之前已恢復原屬於白羅斯的斯摩棱斯克（Smolensk），一六五四年六月又占領原屬於白羅斯的波洛茨克（Polotsk）¹¹，故改稱：「全羅斯君主；大羅斯、小羅斯和白羅斯」（The Sovereign of All Rus': the Great, the Little and the White）¹²。

佩列亞斯拉夫條約簽訂後，沙皇成立「外交廳」與蓋特曼聯繫，表示雙方是宗主國與附庸國的關係，至一六六三年由「小俄羅斯廳」

取代之，此意味著烏克蘭事務不再是俄羅斯的外交事務，而是國內事務。

俄羅斯與波蘭於一六六七年簽訂「安德魯索沃停戰條約」（Andrusovo Armistice），¹³將烏克蘭以聶伯河（Dnieper River）為界一分為二，左岸（河東）與右岸（河西）的基輔歸俄羅斯統治，其他地區由波蘭統治。至一六八六年雙方簽訂「永久性和平條約」參見 L. R. Lewitter, “The Russo-Polish Treaty of 1686 and Its Antecedents,” Polish Review, Vol. IX, No. 3(Summer 1964): 5-23, and Vol. IX, No. 4 (Autumn 1964): 21-37.，確認前次條約，並將札波羅熱改為隸屬俄羅斯。

沙皇視蓋特曼為其臣民，蓋特曼則認為與莫斯科僅是軍事結盟，在莫斯科保護之下享有自治權，是沙皇的封臣（vassal），雙方對條約的理解大相逕庭¹⁴。無論如何，此後哥薩克國的自治權逐漸減少，此在蓋特曼馬澤帕（Ivan Mazepa，一六三九至一七〇九，一六八七至一七〇八年為蓋特曼）時極為明顯。在俄羅斯與瑞典進行「大北方戰爭」（The Great Northern War，一七〇〇至一七二一）中的一七〇八年，馬澤帕密與瑞典國王查理十二（Charles XII，一六九七至一七一八）簽訂條約，後者允諾若俄軍入侵，雙方組聯軍共同抵抗，戰後烏克蘭得以獨立。彼得一世（Peter I, the Great，一六八二至一七二四）隨即獲知消息，急赴哥薩克國的首府巴圖林（Baturin），處死馬澤帕的支持者，宣判馬澤帕是「叛國者」（traitor），開除其教籍，派十個龍騎兵團（Dragoons light cavalry）駐紮烏克蘭。

一七〇九年的「波爾塔瓦戰役」（Battle of Poltava）俄羅斯大勝瑞典，馬澤帕退至摩爾達維亞（Moldavia）境內，三個月後去世。彼得一世下令烏克蘭哥薩克軍改由俄羅斯將領直接指揮，並賞賜烏克蘭土地和農民給予俄羅斯有功大臣，鼓勵俄羅斯人移入。一七二二年，亦即在大北方戰爭結束一年後，俄羅斯成立以六名俄羅斯軍官為主的「小俄羅斯委員會」（The Little Russian College）取代「小俄羅斯廳」¹⁵，他們常駐烏克蘭，掌管軍事、司法和財政權，並於一七二五年開始在烏克蘭直接徵稅，更加剝奪哥薩克國的自治權。

從分到合（二）：西烏克蘭併入俄羅斯

由拉達議會選出來的蓋特曼阿波斯托爾（Daniel Apostol，一七二七至一七三四年為蓋特曼）於一七三四年去世，其後蓋特曼一職空懸十六年，伊麗莎白女皇（Elizabeth，一七四一至一七六二）於一七五〇年恢復，到了一七六四年被凱薩琳二世（Catherine II, the Great，一七六四至一七九六）廢除，改派一名總督統治。一七八一年，哥薩克國被劃分為三個總督區—基輔、切爾尼戈夫（Chernihiv）、諾夫哥羅德—謝韋爾斯基（Novgorod-Siverskyi），總督區與俄羅斯其他省分地位相同，由俄羅斯政府直接統治。

十八世紀末，凱薩琳三次瓜分波蘭，將白羅斯（一七七二年）和聶伯河右岸的烏克蘭（一七九三年和一七九五年）納入版圖，如此昔日烏克蘭除了加利西亞（Galicia）之外幾乎全部回歸俄羅斯統治。右岸的烏克蘭隨即被劃分為三個行省—基輔、沃里尼亞（Volhynia）和波多利亞（Podolia）。

烏克蘭人居住在俄羅斯其他幾個較大地區，有「新俄羅斯」（New Russia），是凱薩琳發動兩次（一七六八至一七七四年、一七八七至一七九二年）對鄂圖曼帝國的戰爭勝利後獲得的新領土，同樣是建為行省，至一八〇二年亞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I，一八〇一至一八二五）劃分「新俄羅斯」為三個行省—卡捷琳諾斯拉夫（Katerinoslav）、陶里達（Taurida）、赫爾森（Kherson）。另一個是一七九六年建省的斯沃博達烏克蘭省（Sloboda Ukraine），一八三五年改為哈爾科夫省（Kharkov），莫斯科早在十七世紀初即鼓勵烏克蘭人移民至此，給予免稅與免服兵役的優惠，直至十八世紀末取消。

從外部的合到內部的合：烏克蘭社會融入俄羅斯社會

哥薩克軍以其善於騎馬被賦予守衛邊境之責，阻擋波蘭、克里米亞汗國和鄂圖曼帝國的入侵。在彼得一世進行軍事改革現代化後，新成立的龍騎兵團兼具步兵與騎兵的功能，每名騎兵配有短毛瑟槍和軍

刀（sabre），每團配備榴彈，加上新型的築城技術能有效抵擋火炮，使哥薩克軍以長刀為主的傳統相形見绌。凱薩琳於一七八三年將原有十個烏克蘭哥薩克軍團改編為隸屬俄羅斯軍隊的十個正規軍騎兵團，又改配新的卡賓槍，雖然保留舊名稱，但是哥薩克軍不再以蓋特曼為效忠的對象，轉變為效忠沙皇。一七八九年的徵兵法徵自包括烏克蘭農民在內的所有納稅人，此打破哥薩克軍僅來自哥薩克階層的舊俗，這一連串的改革使得哥薩克軍失去獨立性與特殊性。

凱薩琳於一七八五年頒布「貴族法案」¹⁶確認俄羅斯貴族的權利，烏克蘭貴族¹⁷亦享相同權利，此表示雙方的界線消除了，烏克蘭貴族被整合併入俄羅斯貴族階層，不再被視為特殊的貴族。至於烏克蘭小貴族，在凱薩琳進行改革後，他們攜家帶眷前往首都聖彼得堡定居，又提攜親朋好友進入中央政府機構服務，使用俄羅斯語，被整合至俄羅斯社會結構。

平民哥薩克在軍隊中為輔助兵的身分，俄羅斯政府視其為農民，為此爆發衝突事件，平定暴動後被移民至新邊界成為國家農民，國家農民沒有自由遷徙權。隨著帝俄的擴張，哥薩克國的疆域已非俄羅斯的邊疆，於是哥薩克多半被移至庫班（Kuban）加入「黑海哥薩克軍」，繼續扮演其傳統守衛邊境的角色。哥薩克貴族的土地可以賣給任何人，但是平民哥薩克的土地僅屬於他們及其後裔，隨著哥薩克人口漸增但擁有的土地未曾擴大，生活日益貧困，於是有的為貴族或擁有土地的哥薩克耕種，有的選擇移民至新俄羅斯、頓河流域、高加索山和克里米亞半島等地區。

烏克蘭教士來源不限於教士家庭，無論是貴族、哥薩克或農民出身都能夠成為教士，此與俄羅斯教士採世襲制度不同。凱薩琳時期規定烏克蘭教士必須接受神學院的培育，而神學院只接受教士之子就讀，神學院係以俄語教學，學生亦以俄語交談，以後又限制以俄語傳教。

烏克蘭農民位於社會最底層，在一六四八年暴動之後，赫梅利尼茨基解除其農奴身分，但並非所有的農民都獲得自由，在修道院以及為貴族耕種的農民不受政府統治，此占農民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受僱於一般地主的農民約占百分之五，農民負擔漸增加，實際上形同農奴。凱薩琳二世在一七八三年下令規定烏克蘭農民必須永久居住在前一年人口調查時的登記處，此表示農民失去了自由遷徙權，與俄羅斯農奴無異。¹⁸

烏克蘭的教會併入俄羅斯東正教會

俄羅斯東正教會於一五八九年提升為牧首區（Patriarchate），其地位與君士坦丁堡牧首區平等，互不相隸屬，獨立管理其轄區教會。東烏克蘭併入俄羅斯之後，君士坦丁堡牧首於一六八六年將烏克蘭東正教會轉由俄羅斯牧首管轄。凱薩琳在俄羅斯實行教產世俗化，同時亦在烏克蘭實行，教會的財政由中央政府控制，堂區、修道院與教士人數的多寡由政府決定。在一七九六年第三次瓜分波蘭獲得右岸烏克蘭，隨即廢除基輔聯合教會大主教一職，改由「俄羅斯東正教會」管轄。

基輔羅斯大公弗拉基米爾於九八八年迎娶拜占庭帝國皇妹安娜，接受了基督教，此後脫離多神信仰，基督教成為國教，俄羅斯的文化發展與基督教密不可分，專制政權的發展亦來自教會的支持，一五一〇年產生的「第三羅馬¹⁹」提升莫斯科作為拯救全人類的救世主，具有宗教和政治理論雙重性，統治者有責任保護教會，保護所有的東正教徒。

一六五四年阿列克謝接受赫梅利尼茨基的請求保護哥薩克國，沙皇願意與波蘭發動戰爭，保護波蘭統治下的白羅斯和烏克蘭的東正教徒為原因之一，正是宗教原因促使烏克蘭和俄羅斯「重新統一」。凱薩琳三次瓜分波蘭，官方再度宣稱「羅斯重新統一」，昔日基輔羅斯的領土幾乎恢復，更重要的任務是如何把聯合教會信徒轉化為東正教教徒，返回「父祖的信仰」（見本書第一二八、一三〇頁）。這個工

作到了一八三九年在波洛茨克召開的宗教會議而大致完成，由右岸烏克蘭人聯合教會主教謝馬什科（Iosif Semashko，一七九八至一八六八）執行。（見本書第一六四至一六八頁）然而畢竟未能將所有的聯合教會信徒改宗，波洛茨克主教納德森（Alexander Nadson，一九二六至二〇一五）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說道：「撲滅聯合教會不是宗教行動，而是政治行動……白羅斯長期保留聯合教會，俄羅斯化的政策注定是失敗。」²⁰而烏克蘭的聯合教會信徒在二〇一六年統計高達四百六十三萬人，占全世界聯合教會信徒百分之二十九%²¹。

無可逃脫的合：蘇聯時期中央集權

羅曼諾夫（Romanov）王朝於一九一七年二月結束，「臨時政府」短暫統治數月，十月革命後政權轉移至布爾什維克黨（Bolsheviks），烏克蘭得以脫離俄羅斯，其後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加入蘇聯，實則以俄羅斯聯邦為主的中央集權統治。此後直至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蘇聯解體期間，形式上可說是烏克蘭、白羅斯和其他十二個共和國與俄羅斯聯邦合為一個國家—蘇聯，俄羅斯語是蘇聯的官方語言。烏克蘭雖然長期受到俄羅斯化，然而哥薩克追求自由與平等的精神成為烏克蘭民族與歷史的重要因素。赫梅利尼茨基是烏克蘭的國父，馬捷帕被烏克蘭人視為僅次於赫梅利尼茨基的民族英雄，他們抵抗專制為自由而戰。

二戰初期，史達林（Joseph Stalin，一八七八至一九五三）藉由《德蘇互不侵犯條約》與納粹德國瓜分歐洲，當德軍於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入侵波蘭揭開二戰序幕，蘇聯軍隊隨後於十七日占領波蘭東部，該區百分之四十四為白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經由公民投票贊成加入蘇聯，十一月一日分別加入白羅斯和烏克蘭共和國，總面積達二十萬平方公里，人口為一千百萬²²。在二戰末期的一九四四年七月，蘇聯又占領波蘭一些領土劃歸這兩個共和國，住民以白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居多，在隔年二月的雅爾達會議中獲得承諾，史達林又力主有個不完全獨立的波蘭，是由蘇聯掌控的波蘭²³。

蘇聯十五個加盟共和國之中，烏克蘭的面積僅次於俄羅斯和哈薩克，人口僅次於俄羅斯，其重要性還在於與俄羅斯同為東斯拉夫人，有「共同」的歷史與文化傳統。實則烏克蘭想脫離蘇聯的想法在各共和國之中最為強烈，蘇聯時期移民加拿大和美國的烏克蘭人在大學裡成立烏克蘭研究中心，[24](#)出版期刊雜誌、書籍或報紙[25](#)，引起西方學術界的關注。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烏克蘭率先宣布獨立，白羅斯於隔日跟進；十二月一日，烏克蘭經由公民投票通過脫離蘇聯而獨立[26](#)。

會有再一次的合一「重新統一」嗎？

克里米亞半島自一七八三年納入俄羅斯版圖，黑海艦隊主要基地即位於半島的塞瓦斯托波爾港口。一九五四年，為慶祝俄羅斯與烏克蘭「重新統一」三百年，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一八九四至一九七一）將半島劃歸烏克蘭管轄，此舉在中央集權的蘇聯僅是形式上的改變，俄羅斯未感受到失去一塊領土。

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自顧不暇，但致力於恢復大國的地位。在普丁長期統治下，[27](#)俄羅斯逐漸強盛，對於蘇聯解體後散布在前蘇聯其他共和國境內的俄羅斯人或以俄羅斯語為母語的居民，此以烏克蘭東部尤其是高達百分之九十七居民說俄羅斯語的克里米亞半島，其又兼具戰略地位而最為顯著。[28](#)俄羅斯「重新統一」在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八日因克里米亞的加入達到一定的要求，速度之快令人稱嘖。[29](#)

克里米亞加入俄羅斯不到兩個月的五月十二日，烏克蘭東部的盧干斯克州（說俄羅斯語者占百分之八十九）和頓內茨克州（說俄羅斯語者占百分之九十三），經由公民投票以百分之九十六的選票贊成獨立，各自成立「盧干斯克人民共和國」和「頓內茨克人民共和國」，俄羅斯未接受其加入聯邦，但是烏克蘭政府也未能完全控管此二州。二〇一七年二月十八日，普丁下令承認這兩國的護照。[30](#)

早在克里米亞加入俄羅斯當日，普丁信誓旦旦說不想看到烏克蘭分裂，也不需要這麼做，至於克里米亞則被認為始終是俄羅斯的。是否真的會如「超級普丁³¹」（SUPERPUTIN）所說的，俄羅斯對於烏克蘭不再有領土的要求，不會發生「重新統一」之事？就在不久前一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六日，美、俄在赫爾辛基舉行的高峰會議上，普丁向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一九四六～）說道讓東烏克蘭（頓內茨克與盧干斯克）舉行決定其未來的公民投票³²。未來的發展會如何？只能靜觀無法預測，但可知烏克蘭曾經長期與俄羅斯分離，其與俄羅斯歷史的發展有所不同。

1 有關克里米亞脫離烏克蘭併入俄羅斯的過程，參見《烏克蘭變局真相》編寫組編，《烏克蘭變局真相》（北京：新華出版社，二〇一四年四月第一版）

2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ыступил в Кремле перед депутата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членами Совета Федерации,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ми регионов России 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20603>. (accessed 10 August 2018)；中文譯本參見弗拉基米爾·普京著，吳石磊譯，〈克里米亞加入俄羅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收入張國有主編，《俄羅斯的政治視角與文化視野》（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五年十二月第一版），附錄一，頁一八一至一九三。

3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ыступил в Кремле перед депутата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членами Совета Федерации,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ми регионов России 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20603>. (accessed 10 August 2018)

4 Путин: попытки усложнить России жизнь--бесполезное занятие,” ТВЦ 18 марта 2015 года, <http://www.tvc.ru/news/show/id/63891>. (accessed 10 August 2018)

5 Rzeczpospolita一詞源自波蘭語，意為「共和國」，一五六九年之後立陶宛仍保留大公國名稱，波蘭稱為王國，波蘭國王兼立陶宛大公，擁有共同的國會、貨幣與外交政策。

6 有關哥薩克的涵義與烏克蘭哥薩克人的形成，參見周雪舫著，《在夾縫中生存的烏克蘭哥薩克人：從自治到歸併於俄羅斯》（台北縣新莊市：輔仁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八月初版），第一章，〈夾縫裡的生命力—哥薩克人的形成〉，頁一三至四三。

7 茲博羅夫條約全文參見 Pierre Chevalier, A Discourse of the Original, Country, Manners, Government and Religion of the Cossacks, with another of the Precopian Tartar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wars of the Cossacks against Poland, trans. by Edward Brown (London: Hobart Kemp, 1672), 99-100.

8 Paul Robert Magocsi, *A History of Ukraine* (Toronto: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6), 231.

9 克里米亞汗國自一四七五年起臣屬於鄂圖曼帝國。

10 佩列亞斯拉夫條約全文參見 John Basarab, *Pereiaslav 1654: A Historiographical Study* (Edmonton, Alberta: The Canadian Institute of Ukrain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1982), Appendix I, 230-236.

11 波洛茨克於一六六〇年十月又被波蘭—立陶宛共和國奪回，此後至一七七三年第一次瓜分波蘭才回歸俄羅斯。

12 自阿列克謝沙皇於一六五五年使用「全羅斯君主：大羅斯、小羅斯和白羅斯」頭銜，直至彼得大帝於一七二一年才改稱「俄羅斯皇帝」。

13 「安德魯索沃停戰條約」原始文本已失傳，不完整的條約內容，參見 C. Bickford O'Brien, *Muscovy and the Ukraine: From the Pereiaslav Agreement to the Truce of Andrusovo, 1654-1667*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115-116.

14 由於赫梅利尼茨基一行人前往莫斯科簽訂條約時所攜帶的烏克蘭文原始條約版本失傳，以後依賴的是莫斯科譯為俄羅斯文的版本，依此譯為烏克蘭文交由使者送達哥薩克，部分文字內容與原始版本有異，史家對於是否該條約使得哥薩克國逐漸失去自治權有不同的看法。參見 Andriy Yakovliv, "Bohdan Khmel'nytsky's Treaty with the Tsar of Muscovy in 1654," *The Annals Ukraini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 IV, No. 3(13)(Winter-Spring 1955): 904-916.

15 此為彼得一世的行政改革，廢除自伊凡三世設立的「廳」，改以「委員會」取代，名稱改變但是維持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不變，且更強化中央的集權。

16 一七八五年「貴族法案」頒布的背景與影響，參見 Robert E. Jones,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Russian Nobility 1762-178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273-299；亦見周雪舫，〈從「貴族解放令」與「貴族法案」來看十八世紀俄國的貴族〉，收入王任光教授七秩嵩慶論文集編委會編著，《王任光教授七秩嵩慶論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初版），頁四〇九至四二五。

17 烏克蘭貴族泛指傳統的烏克蘭貴族和哥薩克貴族，後者源自註冊哥薩克，擔任哥薩克軍團的高階官員，「平民哥薩克」指擔任哥薩克軍團的低階官員。

18 俄羅斯農民因「一六四九年法典」（Ulozhenie）的頒布而失去自由遷徙權，農民世代義務為地主耕種，直至一八六一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一八五五至一八八一）才頒布法令解放農奴。

19 參見周雪舫，〈莫斯科—第三羅馬的理念〉，收入《慶祝校長羅總主教卓趙先生晉牧廿五年晉鐸五十年雙慶論文集》（台北縣新莊市：輔仁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五月初版），頁一七〇至一八四。

20 Fr Alexander Nadson, “The Belarusian Greek Catholic (Uniate) Church: short history,”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60619194726/http://www.belarusians.co.uk/catholic/history-church.html>. (accessed 10 August 2018)

21 Ronald G. Roberson, “The Eastern Catholic Churches 2016,” <http://www.cnewa.org/source-images/Roberson-eastcath-statistics/eastcatholic-stat16.pdf>. (accessed 10 August 2018)

22 烏克蘭新獲得的土地如利沃夫（加利西亞東部），白俄羅斯獲得如布列斯特（Brest）、斯洛尼姆（Slonim）和格羅德諾（Grodno）。

23 參見浦洛基（Serhii M. Plokhy）著，林添貴譯，《雅爾達：改變世界命運的八日》（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九月初版一刷），第十三章，〈烏克蘭人會怎麼說？〉，頁二四〇。

24 例如在哈佛大學有「哈佛烏克蘭研究中心」（Harvard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加拿大的亞伯達（Alberta）大學有「加拿大烏克蘭研究中心」（Canadian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25 學術期刊如 Journal of Ukrainian Studies, The Ukrainian Quarterly,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The Ukrainian Review, The Annals Ukraini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報紙如 The Ukrainian Weekly。

26 烏克蘭公投後正式脫離蘇聯而獨立，沒有烏克蘭的蘇聯難以想像，俄羅斯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一九三一至二〇〇七）見大勢已去，一星期後（十二月八日）與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領導人簽署協議建立「獨立國協」，並宣布蘇聯「作為一個國際法中實體以及一個地緣政治現實的蘇聯已經不存在」，蘇聯實際上不復存在。

27 普丁於二〇〇〇至二〇〇八年任總統、二〇〇八至二〇一二年任總理、二〇一二至今任總統。二〇〇八年起總統任期改為六年一任，可連任一次，故普丁的總統任期至二〇二四年結束。

28 烏克蘭境內俄羅斯居民或使用俄羅斯語為母語的人民主要分布在東部和南部，超過該地區半數居民以上的省分有：克里米亞（占百分之九十七）、哈爾科夫、盧干斯克（Luhansk）、頓內茨克（Donetsk）、札波羅熱、敖德薩（Odessa），參見 Emmet Tuohy, “Language law: liberal rhetoric, radical agenda,” Kyiv Post: Ukraines’s Global Voice, Published Aug. 22. 2102 at 8:30 pm, <https://www.kyivpost.com/article/opinion/op-ed/language-law-liberal-rhetoric-radical-agenda-311915.html>. (accessed 10 August 2018)；分布圖見 “Russian spreads like wildfire in dry Ukrainian forest,” <https://www.kyivpost.com/media/images/2012/08/22/p1757mh9mi6k01aim5ca54b16lh4/original.jpg>. (accessed 10 August 2018)

29 在德國居住近三十年的俄裔 Wladimir Kaminer 是這樣形容：「我的家鄉併吞了烏克蘭的一部分—克里米亞半島，併吞的速度之快，就像吃東西沒咀嚼就吞下肚一樣。」參見維米爾·卡米納（Wladimir Kaminer）著，王芷華譯，《俄羅斯，連冰箱都可以戰鬥》（台北：大是文化有限公司，二〇一八年二月初版），〈併吞克里米亞，烏克蘭你可好？〉，頁〇三〇。

30 根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繁體中文》說明：「由於自行宣布成立的頓內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干斯克人民共和國遭到基輔當局的封鎖，無法辦理烏克蘭的護照，也無法將護照延期。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總統完全是出於人道考慮才簽署的這種命令。」21:37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日，<http://sputniknews.cn/politics/201702201021912666/>. (accessed 10 August 2018)

31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六日至隔年的一月十五日在莫斯科UMAM博物館舉行一場主題為「超級普丁」的藝術展覽，三十件普丁的繪畫和雕刻把普丁描繪成「現代超級英雄」。參見陳正雄譯，〈中英對照讀新聞：一項藝術展將普廷描繪成超級英雄〉，《自由時報》，A12國際新聞版，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圖片參見 Reuters Staff, “‘SUPERPUTIN’ exhibition gives Russian leader a pop-art make over” ARTS December 7, 2017 / 8:13 PM 8 MONTHS AGO,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russia-putin-art/superputin-exhibition-gives-russian-leader-a-pop-art-make-over-idUSKBN1E11L5>. (accessed 10 August 2018)

32 Klya Arkhipov, “Putin Tells Diplomats He Made Trump a New Offer on Ukraine at Their Summit,” Bloomberg, POLITICS- Jul 19, 2018,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7-19/putin-said-to-have-made-trump-a-new-offer-on-ukraine-at-summit>. (accessed 10 August 2018)

大事紀

貓頭鷹編輯室

八六二年 維京人留里克在俄羅斯平原建立第一個政府，統治東斯拉夫人。

八八二年 遷都基輔，稱之「基輔羅斯」。統治範圍約等於今日俄羅斯、烏克蘭、白羅斯。

九八八年 弗拉基米爾引入基督宗教。

一二四〇年 蒙古滅基輔羅斯，建金帳汗國，統治範圍僅基輔羅斯東北部。

一三二六年 莫斯科公國興起，俄羅斯東正教大主教教座移至莫斯科。

一四七二年 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公主。

一四八〇年 莫斯科公國脫離金帳汗國，並逐步統一俄羅斯。但基輔羅斯西部（今白羅斯）和南部（今烏克蘭）被立陶宛大公國兼併。

一五一〇年 莫斯科為「第三羅馬」。

一五四七年 伊凡四世（恐怖伊凡）正式加冕為「沙皇」，其統治國稱「沙皇俄羅斯」（沙俄）。

一五六九年 波蘭—立陶宛共和國成立，形成今日白羅斯地區由立陶宛統治，烏克蘭地區由波蘭統治。

一五八九年 俄羅斯東正教會提升為牧首區，與君士坦丁堡牧首地位平等。

一五九六年 「聯合教會」成立，烏克蘭東正教會分裂成東正教會派和聯合教會派。前者式微。後者使用斯拉夫語和東正教禮儀做禮拜，但接受天主教教義並奉羅馬教宗為最高權威。

一六一三年 開啟羅曼諾夫王朝的統治。

一六四九年 哥薩克（上世紀烏克蘭農民移居聶伯河下游者）在蓋特曼（領袖）赫梅利尼茨基領導下，建立「哥薩克國」，享有自治權，宗主國是波蘭。

一六五四年 哥薩克國經由「佩列亞斯拉夫條約」接受莫斯科的保護，仍享有自治權。沙皇恢復了昔日基輔羅斯部分領土，故稱為「羅斯的重新統一」。

同年，莫斯科又占領白羅斯土地，沙皇改稱「全羅斯君主：大羅斯、小羅斯和白羅斯」。

一六六七年 俄羅斯與波蘭簽訂「安德魯索沃停戰條約」，以聶伯河為界，左岸（河東）和左岸（河西）的基輔歸俄羅斯統治，聶伯河下游的札波羅熱由俄、波共治，其餘歸波蘭統治。

一六八六年 札波羅熱歸俄羅斯統治。

烏克蘭東正教會轉由俄羅斯牧首管轄。

一七〇〇～一七二一年 俄羅斯與瑞典進行「大北方戰爭」。

一七〇八年 蓋特曼馬捷帕秘與瑞典結盟，彼得一世獲知後稱其為背叛者。

一七〇九年 俄國與瑞典進行「波爾塔瓦戰役」，俄勝。

一七二一年 彼得一世改稱俄羅斯皇帝，其統治國改稱「俄羅斯帝國」（帝俄）。

一七二五年 俄羅斯開始在烏克蘭徵稅，剝奪哥薩克國自治權。

一七七二、一七九三、一七九五年 三次瓜分波蘭。昔日烏克蘭除了加利西亞之外幾乎全部回歸俄羅斯統治。

一七八三年 克里米亞半島納入俄羅斯。

一八一二年 拿破崙進攻俄羅斯。

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 俄羅斯與鄂圖曼帝國爆發克里米亞戰爭，俄敗。

一八六一～一八八一年 亞歷山大二世推行大規模改革。

一九一四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一九一七年 三月，二月革命（俄曆為二月），羅曼諾夫王朝結束。

一九一七年 十一月，十月革命（俄曆為十月），由布爾什維克黨執政。

一九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日，蘇聯成立。

一九三九年 九月一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九月十七日蘇聯占領波蘭東部，其後劃入烏克蘭和白羅斯兩個共和國。

一九五四年 赫魯雪夫將原屬俄羅斯聯邦的克里米亞半島，轉為烏克蘭轄屬。

一九九一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蘇聯解體。

二〇〇〇年 普丁擔任俄羅斯聯邦總統。

二〇〇四年 普丁連任俄羅斯聯邦總統

二〇〇八年 普丁擔任俄羅斯聯邦總理。總統任期改為六年。

二〇一二年 普丁第三次擔任俄羅斯聯邦總統。

二〇一四年 三月十八日，克里米亞加入俄羅斯。爆發烏克蘭－俄羅斯危機。

二〇一八年 普丁第四次擔任俄羅斯聯邦總統。

地圖

1. 失去的王國：基輔羅斯（一〇五四年前後）。來源：Zenon E. Kohut, Bohdan Y. Nebesio, and Myroslav Yurkevich,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Ukraine* (Lanham, Maryland; Toronto; Oxford, 2005).
2. 中世紀羅斯各公國。來源：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Russia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Cambridge, 1994),
3. 莫斯科的崛起。來源同上。
4. 波蘭－立陶宛共和國。來源：Encyclopedia of Ukraine, ed. Volodymyr Kubijovyc and Danylo Husar Struk, vol. 4 (Toronto, 1993).
5. 瓜分波蘭（一七七二至一七九五年）。來源：Paul Robert Magocsi, *A History of Ukraine: The Land and Its People* (Toronto, 2010).
6.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東歐。來源：Timothy Snyder,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ew York, 2010).
7. 一九三三年前後的蘇聯。來源同上。
8. 一九三三年歐洲各國邊界。來源同上。
9. 一九四〇年蘇聯的新邊界。來源同上。
10. 一九四一年德蘇戰爭。來源同上。
11. 一九四五年前後蘇聯西境和東歐。來源同上。
12. 俄羅斯－烏克蘭戰爭（二〇一四至二〇一七年）。來源：Serhii Plokhy, *The Gates of Europe: A History of Ukraine* (New York, 2015).



1. 失去的王國：基輔羅斯（一〇五四年前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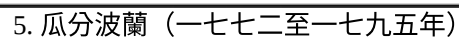
2. 中世紀羅斯各公國



3. 莫斯科的崛起



4. 波蘭—立陶宛共和國





6.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東歐



7. 一九三三年前後的蘇聯

譯注：S.S.R.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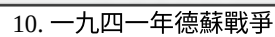
S.F.S.R. 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A.S.S.R. 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





9. 一九四〇年蘇聯的新邊界





11. 一九四五年前後蘇聯西境和東歐



12. 俄羅斯—烏克蘭戰爭 (二〇一四至二〇一七年)

導論

在莫斯科市的最中心地帶，克里姆林宮松林門斜對面的廣場上，矗立著俄羅斯首都最高的一座紀念碑。人物雕像高十八公尺，穿著中世紀服飾，一手抱十字架，一手持劍。今日的俄羅斯人稱他為弗拉基米爾大公，中世紀的編年史家則稱他為沃洛基米爾。從九八〇至一〇一五年，他以基輔³³為中心，統治著一片被稱為「基輔羅斯³⁴」的遼闊國土—西至喀爾巴阡山脈，東至伏爾加河。他影響最深遠的遺產是讓自己和他的子民皈依基督宗教。

傳說一一四七年建立莫斯科城的多爾戈魯基大公在市內亦有紀念雕像，但無論高度或坐落位置都不如弗拉基米爾巨像。許多莫斯科人相信，豎立這座巨像的真正目的不是尊榮大公本人，而是尊榮和他同一名字的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丁。這種猜想不無道理，因為競圖比賽舉行得很倉促，評選委員會主席正是大修道院院長吉洪，而盛傳他是普丁的告解師。另外，巨像的選址位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的歷史區內，有需要得到莫斯科市議會的特別批准，而要得到批准，又少不了普丁的眷顧。

但即使這種猜測正確，仍只能部分解釋弗拉基米爾為什麼會那麼被看重，乃至於要把他的巨像放在一個最顯眼的位置。更重要的理由是，它比任何事物都更能強調基輔羅斯是俄羅斯的歷史源頭，是當代俄羅斯人民族身分認同所不可或缺。否則你很難解釋為什麼要在俄羅斯首都那麼顯眼的位置紀念一位基輔人物，基輔可是鄰國烏克蘭的首都。巨像建成的時間進一步顯示出它是為了凸顯烏克蘭對俄羅斯歷史和政治的重要性。它的第一塊奠基石是二〇一五年俄羅斯剛兼併克里米亞之後放下，而且該石頭是在俄—烏戰爭方酣之際取自克里米亞的拜占庭古城克森尼索，即傳說中弗拉基米爾大公在九八八年的受洗地點。

弗拉基米爾紀念碑在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四日正式揭幕—當天是俄羅斯的法定假日「民族統一日」。揭幕儀式由普丁本人主持，他旁邊站著俄羅斯總理梅德維傑夫、俄羅斯東正教教會牧首基里爾和俄羅斯最著名民族作家索忍尼辛的遺孀。普丁在致詞時讚揚弗拉基米爾是「俄羅斯土地的開拓者和保護者³⁵，一位高瞻遠矚的政治家，為一個強大、統一和中央集權的國家奠定了基礎。因著他，一些平起平坐的民族、語言、文化和宗教得以統一在一起。」普丁又指出，拜這位大公選擇基督宗教作為國教之賜，「俄羅斯人民、白羅斯³⁶人民和烏克蘭人民得以擁有共同的精神源泉，為那些至今還界定著我們生活的道德觀與價值觀打下基礎」。

不管教科書或官方聲明怎樣說，俄羅斯都是一個相對年輕的國家，按歐洲標準衡量的話尤其如此。它正式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歷史未滿六百年，而這歷史是由第一個自稱沙皇的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在一四七〇年代挑戰蒙古可汗的宗主權中揭開序幕。這場鬥爭不僅攸關莫斯科公國的獨立，還攸關它能否控制其他羅斯土地，特別是諾夫哥羅德。在那之後，它是靠著一個強大的起源神話擺脫自己的蒙古背景和塑造自己作為拜占庭繼承人的形象。在這個起源神話裡，莫斯科公國的統治家族和教會被說成是源出基輔羅斯。

俄羅斯發起過的大多數征戰都是針對鄰近的東斯拉夫人³⁷，自稱這是在行使作為基輔羅斯和拜占庭合法繼承人的權利。就連蘇聯邊界在二戰期間向西擴張也常常是本著羅斯諸大公的名義。雖然俄羅斯有一部長遠的征服史，但由伊凡三世揭櫫的「收復羅斯全域」願景卻要到一九四五年方告實現，而且只維持到一九九一年，前後不到半個世紀。在其上升為超級大國的那些年間，莫斯科的統治鞭長及於基輔古國³⁸的最西陲：烏克蘭的加利西亞、布科維納和外喀爾巴阡。

近代伊始，俄羅斯菁英改而更多地從「民族文化」的角度而非從「王朝世系」和「宗教」的角度理解他們對基輔羅斯的繼承。隨著俄羅斯帝國在十八世紀接受了民族性（nationality）觀念，它創造出一個包含今日的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在內的「俄羅斯民族」

(Russian nationhood)，其中還包括一些不是斯拉夫裔但政治和文化上俄羅斯化的帝國菁英。俄國革命拆解了這個「俄羅斯民族」的過程：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被認定是各自不同的民族。不過，蘇聯的民族政策最缺乏的就是一貫性：在一九九一年承認國內民族各自不同的同時，莫斯科又把決策權一把抓、推動蘇聯全境使用俄羅斯語、積極在文化上把非俄羅斯人俄羅斯化，凡此都為後蘇聯時期的俄羅斯帝國主義創造出條件。把俄羅斯人的民族認同從這種新帝國主義解放出來成了這國家的主要挑戰。

今日，俄羅斯在協調俄羅斯人自我認同的心靈地圖和俄羅斯聯邦的政治地圖一事上遇到了巨大困難。換言之，它拙於回應現代民族主義的關鍵要求—用蓋爾納的著名定義來說，這個要求就是「政治單位和民族單位的符合一致」³⁹。俄羅斯今日的政治邊界和俄羅斯民族的邊界是否重疊？答案取決俄羅斯菁英和大眾是怎樣想像他們的民族。何謂俄羅斯民族和他們地理範圍何在的問題絕不僅是學術問題，因為它們關係著今日歐洲東部接壤地區的戰爭與和平，會影響到接下來的幾代人。

有必要重新定義自己的政治、文化和民族邊界的情況並非俄羅斯獨有。在上一個世紀，許多被迫把屬地割捨出去的帝國亦碰過類似情況。其中之一是幅員廣闊的哈布斯堡王朝，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被分割，縮小到只剩下奧地利和匈牙利兩個國家，讓許多日耳曼裔和匈牙利裔的公民成了異國人。當更大的鄂圖曼帝國崩潰後，其中很多操土耳其語或信奉伊斯蘭教的居民變成了生活在由非土耳其人和非穆斯林支配的土地。最後，還有二戰後以漸進方式解體的英國和法國帝國，在這個過程中，它們原有的殖民地一一獨立，而住在這些地方的拓墾者後代和殖民地官員則大舉離開，返回祖國。

但俄羅斯還面臨著從前大部分帝國，特別是海上帝國不用面對的一個重大問題：俄羅斯民族本身要如何定義。英國歷史學家霍斯金說過：「英國曾經擁有一個帝國，但俄羅斯卻曾經是個帝國—而且大概至今還是帝國。」⁴⁰傳統的觀點認為，俄羅斯人的身分認同難題源於

它還沒有成為一個民族之前便成為了一個帝國。這話十之八九也適用於許多帝國，包括英國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帝國，但俄羅斯人的獨特處境在於，其他帝國無一與它們的外國子民分享相同的歷史根源和起源神話，反觀俄羅斯在帝國時期的大部分歲月卻是如此。

如果以血統和文化作為判準，那麼所謂的俄羅斯民族是僅包括俄羅斯聯邦國內外的俄羅斯裔，抑或還有其他東斯拉夫人，即包括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這是俄羅斯菁英階層和大部分群眾在後蘇聯世界設法重塑自身時碰到的關鍵問題。這亦是本書所進行的研究的核心要素。在某種意義下，本書屬於一個常見的研究範疇：民族的「發明」。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和俄國都有這方面的研究著作。本書和它們不同之處在於其所要研究的那個民族是抽象的。這個「泛俄羅斯民族」不會在任何地圖上找到，也從未以政治實體的形式出現，但它卻存在於俄羅斯政治和文化菁英的頭腦裡，如果相信民調的話，它也存在於數以千萬計的俄羅斯人的腦袋裡。它的政治影響力超過很多可以輕易在世界政治地圖上找到的真實民族。

本書是一部俄羅斯民族主義史，特別著眼於俄羅斯民族主義和俄羅斯帝國主義交錯的部分。它從俄羅斯在十五世紀下半葉成為一個獨立國家談起，一路談到當前，範圍涵蓋俄羅斯和東歐的大片歷史和大片土地。本書的第一篇指出，在十八世紀，俄羅斯帝國的統治者和知識分子成功地把中世紀的「王朝世系」和「宗教」概念結合於新興的民族意識，建構出一種帝俄民族的觀念。不過，正如第二篇所示，這種建構很快就受到波蘭人歐洲現代民族主義的挑戰：波蘭人雖然在戰爭中被打敗，卻拒絕放棄對烏克蘭和白羅斯土地的權利主張，這些土地是在十八世紀末葉三強「瓜分波蘭」時被俄羅斯帝國兼併。

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帝國不得不調整它的民族認同模式，以抑制現代民族主義在東斯拉夫人中的興起。正如第三篇會詳細說明的，俄羅斯朝廷為容納不斷上升的烏克蘭民族主義，提倡三位一體的俄羅斯民族概念，即主張「俄羅斯人」是由大俄羅斯人（Great Russian）
41、小俄羅斯人（Little Russian，即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White

Russian，即白羅斯人）三支構成。朝廷也設法打壓非大俄羅斯文學語言和高級文化的發展，並取得成功。

一九〇五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本書第四篇的主題）摧毀了三位一體的民族觀念。自此，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被承認為各自不同的民族，也開始彼此對抗（俄羅斯和烏克蘭尤其如此）。本書第五篇分析蘇聯領導人的民族政策，顯示他們如何想盡辦法讓這三個作為蘇聯核心的民族保持聚合。他們的努力最終被證明無濟於事，而蘇聯亦於一九九一年解體。本書的最後將討論後蘇聯時期的俄羅斯如何企圖透過恢復一些帝俄遺產，打造一種新的民族認同，並因此導致了二〇一四至二〇一五年的俄羅斯—烏克蘭戰爭。

從莫斯科公國如何從蒙古帝國的廢墟中崛起，一直談到俄羅斯聯邦如何在蘇聯解體後重塑俄羅斯民族，本書勾勒出俄羅斯菁英階層努力讓「失去的王國」（lost kingdom）恢復領土統一—這裡「失去的王國」是指中世紀的基輔羅斯，它是所有東斯拉夫人的重要文化根源。在歐洲歷史上，追尋一個「失去42王國」的現象並非僅見於俄羅斯。中世紀的查理曼和近現代早期的哈布斯堡王朝都曾試圖重建羅馬帝國。不過，俄羅斯故事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對「失去的王國」的追尋持續至今，同樣持續至今的還有它對領土擴張和大國地位的追求。正是為了實現這種願景讓它找不到通向現代民族性的道路—在這個意義下，它本身已變成一個「失去的王國」。

33 基輔（Kyiv / Kiev），Kyiv 為烏克蘭語拼寫，Kiev 為俄語拼寫。本書以「/」符號作為區隔，「/」前為烏克蘭語拼寫，「/」後為英語拼寫。

34 東斯拉夫人在東歐建立的第一個政權稱為「羅斯」（Rus'），其地域大約相當於後來的俄羅斯、烏克蘭和白羅斯。因為該政權是以基輔為中心，後人又稱之為「基輔羅斯」（Kyivan Rus'）。

35 “Tseremoniia Otkrytiia pamiatnika kniaziu Vladimiru,” Prezident Rossii, November 4, 2016,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3211>.

36 以往習慣譯為白俄羅斯（Belarus），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六日白羅斯大使館發文要求改用「白羅斯」為正確國名，以此表明他們的國家非俄羅斯聯邦的一部分，蓋「Belarus」即 Bela

（白）、Rus（羅斯），故譯「白羅斯」。

37 Rus'（羅斯）係以希臘語音譯，Russia（俄羅斯）則以拉丁語音譯，二者義同。「俄羅斯」一詞是伊凡三世（一四六二至一五〇五年在位）與西方接觸後採用的稱呼。東斯拉夫人包含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

38 即基輔羅斯。詳見第一章。

39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d ed. (Ithaca, NY, 2009), 1.

40 Geoffrey Hosking, "The Freudian Frontier,"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March 10, 1995, 27.

41 大俄羅斯人即今日俄羅斯人，指蒙古統治原基輔羅斯的東北地區，該地區的羅斯人與北方的芬人混血，稱為大俄羅斯人。

42 這裡的「lost」作迷路解。

第一篇 創造俄羅斯

第一章 沙皇國誕生

一四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是個寒冷秋日，這一天，三十二歲的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索菲婭。初披婚紗的新娘二十三歲，父親是摩里亞君主托馬斯·帕拉奧洛戈斯⁴³。這是伊凡的第二次婚姻。婚禮在克里姆林宮一座木造教堂舉行，旁邊是尚未竣工的聖母升天大教堂。後來的俄羅斯編年史家對於婚禮是由都主教抑或一位普通的大司祭主持記載不一⁴⁴。雖然婚禮各方面都顯得低調，本身卻意義非凡，象徵著莫斯科的統治者成為拜占庭皇帝的親戚和延續者。索菲婭的伯父君士坦丁十一世在一四五三年五月鄂圖曼人進攻君士坦丁堡時被殺，拜占庭帝國隨他一道逝去，但莫斯科統治者的帝國野心並沒有因此消失。透過迎娶索菲婭，伊凡三世自認為繼承了拜占庭皇帝的衣鉢。

索菲婭和羅馬淵源甚深，而這八成就是伊凡三世何以會起用一批義大利建築師為克里姆林宮建築城牆之故—克里姆林宮是歷代大公的居所，在伊凡手中變為一座城堡。一四八五年抵達莫斯科的義大利建築師魯福為克里姆林宮建造了許多宮殿和教堂，又和另一位義大利建築師索拉里一道築造了多棱宮，是個美輪美奐的宴會場所。索拉里是一四八七年來到莫斯科，主要負責監督克里姆林宮塔樓的修建，其中包括救世主塔樓⁴⁵。救世主塔樓是莫斯科和俄羅斯的象徵標誌，落成銘文留存至今。內門銘文使用俄語，外門銘文使用拉丁語，前者寫道：「六九九九年〔一四九一年〕⁴⁶七月，在上帝的恩典下，此塔樓是由伊凡·瓦西里耶維奇下令建造。在其在位至今的十三年間，他是全羅斯⁴⁷（all Rus'）的最高主宰，也是弗拉基米爾、莫斯科、諾夫哥羅德、普斯科夫、特維爾、尤格拉、維亞特加、彼爾姆和保加爾等地的大公。主持造塔樓事宜的是米蘭的索拉里。」

伊凡的頭銜列舉出他的所有領土，其中有新有舊。雖然他的婚姻和雄心勃勃建設計畫是指向帝國的未來，但他的頭銜，「全羅斯」的統治者和某些其他土地的有權者，卻是根植於過去，更具體地說是根植於他的王朝和國家的中世紀源頭。學者指出，莫斯科大公的權力來

自雙重源頭，同時有著「可汗」（khan）和「巴西琉斯」（basileus，拜占庭人對皇帝的稱呼⁴⁸）的功能，即同時扮演著世俗君主和宗教領袖的角色。但這種把焦點放在雙重權力源頭的做法往往忽略了大公頭銜的重要性—這個頭銜對伊凡三世和他直到十六世紀中葉為止的繼承人一直具有核心意義。憑著這個頭銜，莫斯科大公得以和入土已久的基輔羅斯的統治者扯上關係，讓他們可以聲稱自己對南至黑海、北至波羅的海的羅斯全域擁有最高主權。

伊凡自稱是留里克王朝的後人，而這是他統治弗拉基米爾、莫斯科、諾夫哥羅德和普斯科夫諸城的合法基礎。留里克王朝有斯堪地那維亞血統，起源可溯自傳說中的維京人國王留里克。

留里克王朝建立的基輔羅斯是一個強大國家，國力在十一世紀和十二世紀初葉間臻於鼎盛。在歷代的基輔大公中，最大名鼎鼎的是九八〇至一〇一五年在位的弗拉基米爾，主要成就是把拜占庭基督宗教引入羅斯土地，後來也因此獲得東正教教會封聖。另一個重要人物是弗拉基米爾的兒子「智者」雅羅斯拉夫（一〇一九至一〇五四年在位），是他下令在基輔市中心興建聖索菲亞大教堂。根據傳說，雅羅斯拉夫還推出了第一部羅斯法典和獎勵修編年史。最後值得一提的還有另一位弗拉基米爾，在位期間（一一一三至一一二五年）的最大功績是讓基輔羅斯搖搖欲墜的統一性恢復完整。他因為是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的外孫而承襲了外公「莫諾馬赫」的外號⁴⁹。

留里克王朝對基輔羅斯的統治在十三世紀中葉戛然而止，當時，被羅斯人稱之為韃靼人的蒙古人在突厥草原部落的協助下，征服了羅斯各公國。一二三七年秋天，成吉思汗孫子拔都遣使到羅斯東北，要求弗拉基米爾城邦的尤里大公投降，為大公所拒。接下來幾個月，蒙古人圍攻摧毀了梁贊和若干其他羅斯城鎮。尤里大公在一二三八年三月戰死。一二三九年冬天，蒙古人洗劫了切爾尼戈夫和佩列亞斯拉夫等城鎮。次年，他們向基輔推進。因為基輔拒絕投降，蒙古人進行圍攻，使用巨大木樁破壞城牆。

編年史家記載：「拔都把一批攻城槌放在波蘭門附近，因為有一座茂密森林延伸到那裡⁵⁰。他下令日夜不停地用攻城槌撞擊城牆，最終把城牆撞破。」⁵¹十二月初，蒙古人越過冰封的護城河，湧入城市。隨著冬天短暫的白天結束，蒙古人占領了城牆和柵欄，在那裡待了一夜，等待天亮。對城中守軍來說，那一定是他們人生中最可怕的一晚。歷史學家相信，羅斯戰士和剩下的居民撤退到聖母升天教堂，這座基輔的第一座石造教堂遂成為不肯投降的拜占庭人的最後避難所。編年史家這樣描寫發生在一二四〇年十二月七日的最後抵抗：「不斷有人跑到教堂，帶著財物去到它的屋頂。教堂牆壁因為不堪重負，垮了下來，整座堡壘遂被韃靼戰士占領。」⁵²

基輔的居民和守軍很少能夠在城市陷落之後存活下來。拔都接著揮軍向西，征服其餘的羅斯土地，再入侵波蘭和匈牙利。蒙古人之所以能夠戰勝，部分是因為一度統一在基輔之下的羅斯土地不再團結，親王們各自為政，為爭奪權力和影響力而內鬥不休。在蒙古入侵時，大部分羅斯東北部，即今日俄羅斯中部的親王奉弗拉基米爾大公等為君主，而包括基輔在內的羅斯西南部由加利西亞-沃里尼亞親王統治，至於東北部的諾夫哥羅德共和國則完全獨立，與其他羅斯土地沒有統屬關係。如果說蒙古人的入侵對這種局面有帶來任何改變的話，那就是加劇了基輔羅斯的政治分裂。蒙古人對現今被稱為烏克蘭和白羅斯兩地的統治主要是間接性的，也僅僅維持了幾十年，它們最終落入立陶宛大公國和波蘭王國的控制。在更北和更東部，情況有所不同。蒙古人對東北羅斯進行嚴格控制，假以時日，它將成為「俄羅斯土地」的主要部分。

雖然在蒙古人入侵之時，羅斯的統一已是非常遙遠的往事，但全羅斯土地上的親王，從西南部的基輔和佩列亞斯拉夫到東北部的諾夫哥羅德和弗拉基米爾，仍然有著一種同源感。他們還繼承了基輔羅斯讓人動容的法律、宗教和文學遺產，也都是以羅斯人自居。這種和基輔羅斯的連續性在莫斯科公國扮演的角色比起任何其他地方都吃重。莫斯科公國是基輔羅斯東北部的其中一個公國，奉蒙古人為宗主國。

蒙古人對包括諾夫哥羅德的羅斯土地控制是透過擁有弗拉基米爾大公頭銜的羅斯附庸國執行。獲得此一頭銜的羅斯親王擁有聲望、權力和財富，其忠誠和工作能力使蒙古可汗（後來稱為欽察可汗）信服。但大公有責任向所屬人民收稅，獻給可汗。

用弗拉基米爾大公頭銜作為誘餌，蒙古可汗鼓勵羅斯親王彼此競爭，避免有任何一個親王獨大的局面。但時間證明這種政策無法行之永久。十四世紀期間，莫斯科崛起，成為蒙古羅斯土地上一個新的權力中心。蒙古人在一二三八年入侵東北羅斯的時候，莫斯科還只是個小小的公國，甚至沒有自己所屬的親王家族。它是在蒙古人統治的時期才得到大公頭銜。莫斯科親王屬於留里克王朝的幼系後裔，但拜他們的公國位於不同商路交錯之處和高明政治手腕所賜，他們最終成為東北羅斯最強大的親王家族。一三一七年，莫斯科親王迎娶金帳汗國可汗的妹妹為妻，因而獲得了弗拉基米爾大公的頭銜，擁有了作為可汗在羅斯代表的權力。

和莫斯科爭取該頭銜的主要競爭對手是特維爾，那是一個實力比莫斯科強大許多的公國，位於莫斯科和諾夫哥羅德共和國之間。但是，莫斯科公國的首都要更接近弗拉基米爾，即弗拉基米爾大公原來的根據地，也更接近蒙古人所控制的草原，所以最終有效地挫敗了競爭對手。讓莫斯科能夠出人意表地穩定崛起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全羅斯的都主教在世紀之交從基輔搬到弗拉基米爾，然後又遷至莫斯科，讓莫斯科成為他幅員廣闊的都主教教區的新首府。[53](#)這個都主教教區除了涵蓋蒙古人控制的所有羅斯土地，還涵蓋立陶宛人控制的羅斯土地。莫斯科大公和羅斯都主教都宣誓效忠金帳汗國，而兩者的結盟幫助了莫斯科上升成為東北羅斯的真正首府。

到了十五世紀中葉，作為金帳汗國在羅斯主要代理人的莫斯科大公開始威脅到主子在羅斯土地的霸權地位。隨著金帳汗國被內部鬥爭削弱和進入分崩離析階段，莫斯科大公開始推進自己在羅斯土地的霸權。第一個踏出這一步的大公是瓦西里二世，外號「瞎子」，因為他的政敵想要讓他失去繼位資格而把他的眼睛刺瞎。不過，莫斯科真正

取得獨立是在他兒子伊凡三世在位之時。伊凡是一位高瞻遠矚的統治者，一四六二年繼位，一五〇五年駕崩。

在伊凡的經營下，莫斯科公國控制了整個蒙古羅斯。為鞏固自己獨立於蒙古人的地位和對一些不聽話的羅斯土地的統治者，他除了訴諸武力，還訴諸有力的法律論證和歷史論證。「王朝世系」和「祖產」觀念—即主張莫斯科的統治者是基輔羅斯的繼承者，是其沙皇國的關鍵意識形態基礎。這種史觀和憧憬成為帝國的願景將會在十五和十六世紀互相強化，對於莫斯科人的國家認同和身分認同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四七一年，即伊凡三世迎娶索菲婭的前一年，莫斯科公國在建立霸權一事上取得重大勝利：伊凡的軍隊占領和征服了諾夫哥羅德共和國。該共和國是當時羅斯土地上最大且最富有的政權。

很多學者都認為諾夫哥羅德共和國是俄羅斯歷史上一個民主範式，與莫斯科大公國所代表的專制範式形成鮮明對比。從十二世紀開始，諾夫哥羅德領土西至波羅的海，北至白海和巴倫支海，東至烏拉山脈，是由民眾大會所選出的官員統治。諾夫哥羅德親王是軍隊指揮官，但必須看市民的臉色，更精確地說是看世家大族的臉色。共和國的財富不僅來自土地，還來自貿易；因為它是波羅的海地區一大商業強權，出口毛皮和其他森林產品，進口紡織品，有些自己消費，有些賣給其他羅斯地區。

一四七〇年，一群世家大族在前任市長遺孀也是現任市長的母親瑪爾花·鮑列茨卡亞主導下，諾夫哥羅德和波蘭國王暨立陶宛大公卡西米爾四世達成結盟協議（波蘭和立陶宛在一三八五年結為一體）。卡西米爾四世派遣基輔親王奧列爾科維奇協防諾夫哥羅德。但這是他提供的僅有幫助，而奧列爾科維奇也在翌年便離開諾夫哥羅德。一四七一年夏天，莫斯科的軍隊在一支為伊凡三世服務的韃靼騎兵助陣下進攻諾夫哥羅德。前進過程中抓到的每一名俘虜，都會切去其鼻子和嘴唇，再予以釋放，他們用這個方法嚇唬居民。

一四七一年七月，雙方在舍隆河河畔展開決戰，由兵力較少但紀律較好且戰鬥經驗豐富的莫斯科軍隊勝出。韃靼人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伏擊諾夫哥羅德的軍隊，協助追擊和殺死撤退的部隊。莫斯科和諾夫哥羅德的編年史對戰爭過程的細節有不同記載，但這場戰爭的結果和意義明確無疑：諾夫哥罗德維持自治的努力被粉碎。市長鮑列茨基在戰鬥中被俘，伊凡下令把他處決。據估計，有一萬兩千名諾夫哥罗德人死於戰場或是在撤退過程中被殺。諾夫哥罗德被迫繳納鉅額貢金（數目是莫斯科向金帳汗國繳納的兩倍以上），並放棄和立陶宛大公國的聯盟關係。自此，這個共和國只能任人宰割。

伊凡的強大軍力固然讓他能夠征服諾夫哥罗德和擊退龐大的大帳汗國，成為金帳汗國的繼承者，但莫斯科大公國的新地位和它繼續兼併新領土的行動需要正當理由。據莫斯科書吏的說法，他們在一四七二年弄出一部新的俄羅斯編年史，伊凡三世會占領和懲罰諾夫哥罗德，是因為它不尊重他的祖產繼承權，而這種權利可上溯至基輔羅斯的弗拉基米爾大公。據說，莫斯科派出的使者這樣告訴諾夫哥罗德人：「從古代起，你們諾夫哥罗德人便是我的祖產。這種權利可以上溯至我們的祖父和我們的祖先，再上溯至弗拉基米爾大公—他是留里克的曾孫，也是讓羅斯土地受洗的第一位大公。從留里克直至今日，你們一直只承認一個統治家族……我們是他們的後人，一直統治著你們，施恩於你們，保護著你們，所以當你們不按照古老的傳統承認我們的地位，我們也有權懲罰你們。」 54

這番話中提到的「古老傳統」是莫斯科政治文化一個相當新的元素。在伊凡三世征服諾夫哥罗德之前，編年史家幾乎不曾提過莫斯科統治家族的基輔血統。在此之前，莫斯科大公都是透過討好金帳汗國的可汗，以在與特維爾和其他強大親王的競爭中取得上風。可汗是蒙古帝國創始人成吉思汗的子孫，向他們提自己有著基輔羅斯和留里克王朝的血緣毫無用處。但這種情況隨著金帳汗國的持續解體發生了改變。在伊凡征服諾夫哥罗德的同一年，他也擊退了可汗阿合馬的韃靼人部隊。當時，阿合馬因為對莫斯科的日益強大感到不安，揮軍進入

莫斯科的邊界，但莫斯科人做出有效防禦，讓阿合馬的軍隊無法越過奧卡河。韃靼人只好撤兵，至此莫斯科不再對金帳汗國繳納貢金，從屬地位從此結束。隨著諾夫哥羅德戰敗和韃靼霸權地位的不再，莫斯科的霸權基礎就此奠定。

但是，諾夫哥羅德和蒙古人帶給伊凡的麻煩還沒有結束。五年後，一四七一至一四七二年的戲碼再次上演，三個主要角色再一次是莫斯科、諾夫哥羅德和金帳汗國。一四七七年十月，諾夫哥羅德人不滿伊凡三世強加給他們的條約和臣屬地位，決定毀約。大公兵臨城下，迫使其市民再次宣誓效忠。一四七八年一月，伊凡三世進入該城，諾夫哥羅德自此不再是一個共和國。諾夫哥羅德民主制度的象徵，那用來召喚市民參加民眾大會的大鐘被送往莫斯科。反抗運動的領導人瑪爾花·鮑列茨卡亞被帶到莫斯科後再被帶到下諾夫哥羅德，在那裡被迫許下誓願成為修女。諾夫哥羅德都主教、修道院和世家大族的土地全數被抄沒。反抗運動的各領導人全家遭流放，時值隆冬，很多人因而沒能活下來。他們的土地被賞給莫斯科大公的侍從之臣。

在伊凡三世於一四七八年征服諾夫哥羅德之後，金帳汗國再一次出兵莫斯科，要求恢復進貢。這一次，阿合馬可汗和卡西米爾四世結成聯盟—這位波蘭國王暨立陶宛大公會答應結盟，是因為對諾夫哥羅德的陷落和莫斯科在立陶宛邊界與日俱增的威脅感到憂心忡忡。立陶宛軍隊答應在韃靼人攻擊莫斯科時從旁協助。一四八〇年秋天，阿合馬進抵莫斯科公國邊界上的烏格拉河準備開戰，但立陶宛軍隊始終沒有出現。原來，立陶宛的南方，主要是烏克蘭人居住的土地，此時正受到金帳汗國另一個繼承人克里米亞汗國的攻擊。少了立陶宛人的支援，阿合馬不敢貿然越過烏格拉河，最後只好退兵。這撤退在俄羅斯歷史上非常著名，被認為是莫斯科擺脫「韃靼枷鎖」和確立主權長久努力的決定性事件。自此，莫斯科以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的身分展開自己的歷史。

到了一四八〇年，伊凡已經建立起他在蒙古羅斯的霸權，但他的頭銜「全羅斯的最高主宰和獨裁者」卻透露出他的野心不僅止於此，

如同十二年後，由義大利建築師建造的克里姆林宮塔樓內外門銘文所描述的一樣。一四七八年，即諾夫哥羅德完全臣服的一年，莫斯科的外交官開始談到莫斯科對一些立陶宛領土的權利，這些領土包括波洛茨克和斯摩棱斯克。到了一四九〇年，伊凡的大臣開始以莫斯科大公是基輔羅斯後裔作為理由，把他的主權要求延伸至基輔本身。在寫給哈布斯堡皇帝馬克西米連一世的信中，伊凡三世談到他打算在上帝的護佑下「奪回我們的祖產，即基輔大公國，它目前是由波蘭國王卡西米爾和他幾個兒子統治著」。一四九四年，立陶宛大公在無奈下承認了莫斯科統治者的新頭銜，包括他是「全羅斯」最高主宰這部分。在一五〇三至一五〇四年，俄羅斯使節向立陶宛提出收回基輔祖產的要求：「現在我們擁有的城鎮和土地不是我們祖產的全部。我們的祖產涵蓋全羅斯的土地，包括基輔和斯摩棱斯克和其他城鎮……出於上帝的恩典，這些土地從古代起便是我們的祖產，是我們祖先所留下。」

55

莫斯科膽敢把立陶宛大公國境內的羅斯土地說成是它的祖產，是十五世紀末葉和十六世紀初葉一連串戰爭勝利的直接結果。雙方在一四八〇年代開始發生邊界衝突。第一場實際的戰爭發生在一四九二至一四九四年，然後依次是一五〇〇至一五〇三年、一五〇七至一五〇八年、一五一二至一五二二年、一五三四至一五三七年—加起來歷時近半世紀。在這些戰爭中，莫斯科公國大多數是占上風的一方，直至十六世紀初葉才首嚐敗績。到了這時候，莫斯科公國的邊界已深入至立陶宛大公國的領土，包括取得了切爾尼戈夫和斯摩棱斯克。就像諾夫哥羅德人碰到的情況那樣，很多斯摩棱斯克的居民都被迫東徙，土地被莫斯科大公的臣民占去。

莫斯科人得以占上風，除了因為伊凡三世軍力強大，還因為他的對手卡西米爾四世不願意容納基輔大公的後人繼續掌管他們祖先統治的土地，包含現在的烏克蘭和白羅斯。隨著伊凡三世吞併了一個又一個公國和用他的基輔羅斯血緣合法化這種行為，卡西米爾決定廢除當時仍然存在於立陶宛大公國版圖內的唯一羅斯公國，即基輔公國。他

是在一四七〇年這樣做，而這個決定直接導致立陶宛在一年後「失去」諾夫哥羅德。前此，基輔公國一直是由奧列爾科維奇家族統治，而這個家族的血緣可以上溯至立陶宛最早統治者之一的阿爾基爾達斯，所以其地位即使不能與立陶宛大公相提並論，仍相當接近。一四七〇年曾到諾夫哥羅德協防的基輔親王便是這個家族的成員。他會在一四七一年離開諾夫哥羅德，部分是為了爭取繼承父親在基輔留下的爵位。但讓他嚇一跳的是，卡西米爾不但沒有讓他繼位，反而取消了基輔公國，改派屬下官員治理該地區。

基輔諸親王永遠不會原諒卡西米爾四世抹除了他們的公國，讓他們夢想破滅。一四八〇年，卡西米爾得到消息，幾位基輔親王陰謀行刺他，取代他的大公位階。事情敗露後，有些密謀者被捕，有些逃到了莫斯科。但這一插曲加上克里米亞韃靼人對立陶宛大公國的進攻，都讓卡西米爾無法調兵支援在烏格拉河和莫斯科人對壘的阿合馬可汗。卡西米爾早前是因為害怕莫斯科大公國的強大而沒有支持諾夫哥羅德，這一次則是幾位基輔親王的反叛而未能幫助金帳汗國對付莫斯科。

卡西米爾在一四九二年去世，隨後的政權真空讓伊凡三世獲得絕佳機會去推進他對「全羅斯」的權利要求，發起一場對立陶宛大公國的全面性戰爭。立陶宛邊區的親王只能自求多福，因為立陶宛軍隊不是無法馳援就是不夠強大，不足以保護這些附庸國。在這種情況下，邊區眾親王認為自己不必再承受忠於立陶宛大公的誓言束縛。其中一個「叛徒」沃羅滕斯基在寫給立陶宛新任大公亞歷山大的信上說：「閣下，您的父親曾在我面前親吻十字架，保證捍衛我的祖產，但閣下卻沒有對我行行好.....沒有站出來捍衛我的祖產。」⁵⁶亞歷山大⁵⁷同時運用軍事力量和外交手段阻止莫斯科的推進，但只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不得不承認伊凡的新頭銜，因而又失去一些重要領土，包括基輔附近的切爾尼戈夫。

亞歷山大的統治開啟了一個新紀元，此後的立陶宛大公和波蘭國王全都對莫斯科在東部的攻勢採取比卡西米爾更嚴肅以待的態度。亞

歷山大不得不放棄卡西米爾四世的中央集權化改革，與大公國內的王公氏族結成聯盟。他承認王公會議的權威性，承諾在任免重要官員時會先與王公會議的成員協商。他還與魯塞尼亞人（即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親王建立起密切關係。一五一四年，莫斯科軍隊在奧爾沙之役被一位魯塞尼亞人親王率領的立陶宛－魯塞尼亞聯軍打敗，前此幾乎從未間斷的向西擴張第一次受到抑制。這場戰爭暫時確定了「全羅斯」的邊界：包括斯摩棱斯克和切爾尼戈夫，但不包括基輔和波洛茨克（分別位於今日烏克蘭和白羅斯境內），後兩者仍然處於立陶宛大公國的控制之下。莫斯科在一五〇五年伊凡三世駕崩和繼承者瓦西里三世在一五三三年駕崩之後都發生內部傾軋，讓莫斯科向西擴張的勢頭暫緩下來，但他們對取回立陶宛大公國境內「祖產」的野心始終存在。

莫斯科與立陶宛的戰爭，一開始是由爭奪諾夫哥羅德所引發，然後是在要收回基輔羅斯祖產的名義下持續，這讓莫斯科成為東歐政治舞台的要角。它不再只是為獨立而戰，還一心想把邊界擴大至蒙古勢力的原有邊界之外。

一五二〇年代，莫斯科的知識分子炮製出一本新的宗譜，稱為《弗拉基米爾諸大公的故事》，用它把克里姆林宮的統治者、從前的弗拉基米爾諸大公和羅馬帝國的開創者奧古斯都連結在一起。這種連結是靠著一個傳說人物普魯斯作為中間環節達成。普魯斯據說是奧古斯都的弟弟，如此一來，羅馬帝國的創始人和莫斯科的統治者便有了共同祖先。但弗拉基米爾諸大公（和後來的莫斯科諸大公）又是怎樣和普魯斯扯上關係的？宗譜編撰者採取的解決方法非常簡單：用另一個傳說人物作為中間環節，而這個人就是基輔羅斯的奠基人留里克。根據羅斯編年史的記載，留里克是來自北方，而該地區據說又是奧古斯都分封給普魯斯的。

就像擔心這種血統關聯還不夠強有力似的，宗譜編撰者還用更有歷史根據的方式把莫斯科和羅馬扯上關係。這一次是以拜占庭為中介。它把弗拉基米爾諸大公和莫斯科諸大公都說成是十二世紀基輔羅

斯統治者弗拉基米爾·莫諾馬赫的後繼者，而因為他的外公是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君士坦丁九世又和奧古斯都有著血緣關係，如此，莫斯科便與羅馬帝國連結在一起。總之，莫斯科使出渾身解數把自己說成是羅馬的繼承人。根據《弗拉基米爾諸大公的故事》所述，君士坦丁九世把他的全套皇帝衣冠傳給了弗拉基米爾·莫諾馬赫，後來這套衣冠又為莫斯科大公所繼承，其中包括一頂「莫諾馬赫之冠」，其性質相當於東羅馬皇帝的皇冠。但這東西實際上是十四世紀之物，來自中亞，有可能是金帳汗國可汗所賜的一件禮物，意在象徵莫斯科大公的附庸地位。經過重新想像，這件蒙古人所送的禮物如今變成了皇權的象徵。

「莫諾馬赫之冠」和「奧古斯都—普魯斯—莫諾馬赫—莫斯科統治者」一脈相承的說法，將會在莫斯科的政治思想中占據極大的分量。兩者都被納入伊凡四世（又稱「恐怖伊凡」）的加冕典禮。他是第一個被稱為沙皇的莫斯科統治者—「沙皇」是斯拉夫語，衍生自拉丁語「凱撒」，意為「皇帝」或「萬王之王」。伊凡四世的加冕典禮舉行於一五四七年，「莫諾馬赫之冠」被用作加冕的王冠。設計這一套的是都主教馬卡里，他在加冕典禮上把神聖權力賦予了新沙皇，強調這個王朝的基輔源頭和更前面的羅馬源頭。接下來幾十年，奧古斯都傳說都是官方宗譜學的核心元素，被寫入莫斯科沙皇國第一部官修史書《皇室宗譜》。此書是恐怖伊凡一五六〇年下旨編修，在都主教的宮廷裡撰寫。奧古斯都神話也被畫入莫斯科的宮殿和大教堂的壁畫。曾在一五一九年出使莫斯科的哈布斯堡特使赫伯斯坦，在一五四九年發表的出使記中表示，他遇過的莫斯科人莫不相信留里克和當前的統治者帶有羅馬帝國皇帝血統。

多了這一層和羅馬的關係在國內和國外都有好處。在國內，它可以讓統治家族的地位高於其他王侯家族；在國外，它可以讓沙皇和西方國家的統治者平起平坐。恐怖伊凡的地緣政治目標顯然不同於他的父親和祖父，他把外交政策的重心從奪取更多羅斯土地改為奪取金帳汗國的土地。一五五二年，他擊敗和吞併了喀山汗國⁵⁸。該城市的居

民被趕走，由俄國沙皇的臣民取而代之——這種政策先前在諾夫哥羅德和斯摩棱斯克都曾使用過。一五五六年，伊凡的軍隊擊敗了金帳汗國另一繼承者阿斯特拉罕汗國⁵⁹，莫斯科自此控制了無比重要的伏爾加貿易路線。這也是一次意識形態上的重大勝利，因為在此之前，莫斯科編年史一直稱這兩個汗國的統治者為「沙皇」，併吞它們讓伊凡的沙皇國的權威更加擴大。在他的外交信函裡，他都會分別提到自己統治了莫斯科沙皇國、喀山沙皇國和阿斯特拉罕沙皇國多少年。

如果說伊凡自稱是奧古斯都後裔讓他可以和哈布斯堡王朝平起平坐，那麼，他對兩個伏爾加汗國的征服則大大改善了自己的地緣政治地位，給了他作為一個皇帝的實質基礎。一五五七年，即征服阿斯特拉罕汗國翌年，伊凡寫信給東正教最高領袖，君士坦丁堡牧首，要求對方在他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的基礎上承認他是沙皇。他在與西方國家的交往中引用同樣的論證。但對於伊凡要求別人承認他為沙皇或皇帝的要求，各方反應不一。君士坦丁堡牧首因為樂於看見有一個信仰東正教的新皇帝可以作為他的潛在保護者，在一五五八年向伊凡保證：「這位沙皇的名字會就像從前的拜占庭沙皇〔皇帝〕那樣，每個星期天在普世教會被提起。」⁶⁰但神聖羅馬帝國的統治者的態度卻是有所保留，因為莫斯科統治者的新頭銜會削弱他們權威的普遍有效性。因此，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連二世在一五七六年建議伊凡，不妨稱自己為東方的皇帝——這可能是一種拜占庭的傳統，或「全羅斯」的皇帝，一個和伊凡的祖先不同的頭銜。

一五五八年，伊凡因為看見他的沙皇頭銜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承認卻不被西方國家承認，憤而揮兵西進。這場利沃尼亞戰爭持續了四分之一個世紀，至一五八三年結束，一開始是攻擊衰落中的地方強權利沃尼亞騎士團，這是由條頓騎士團所建立的國度，領土涵蓋部分愛沙尼亞、部分拉脫維亞和小部分立陶宛土地。伊凡四世的軍事活動一開始很順利，但他對騎士團的摧毀卻讓四鄰國家感到威脅。立陶宛大公國自十五世紀末葉便對莫斯科的咄咄逼人有切膚之痛，所以出兵襄助騎士團，結果慘敗。一五六三年，恐怖伊凡拿下波蘭城市波洛茨克，

其位於今日白羅斯境內，莫斯科曾在一四七八年征服諾夫哥羅德後馬上聲稱對其擁有主權。一五六九年，在波蘭城市盧布林，形勢困窘的立陶宛大公國被迫重新和波蘭王國結合，形成兩個國家的永久聯盟，自此失去了獨立性。它也把烏克蘭拱手讓給波蘭，自己只剩下白羅斯。波蘭和立陶宛的結合，加上瑞典的相助，終於把莫斯科的侵略勢頭遏止住。

莫斯科沙皇發現自己落入下風。一五七一年，克里米亞韃靼利用莫斯科在西方用兵的機會，占領了莫斯科⁶¹，讓伊凡不得不結束他的恐怖統治，這恐怖統治體現在他用於清洗貴族的「特轄制⁶²」。但他在西方的戰爭繼續節節敗退。新任波蘭國王巴托雷在一五七九年率領波蘭—立陶宛聯軍重新奪回波洛茨克。兩年後，瑞典人把莫斯科軍隊趕出納爾瓦，納爾瓦是波羅的海的貿易重鎮，自一五五八年之後便是由莫斯科控制。一五八二年，伊凡為情勢所迫，簽下和平條約，收起他想獲得另一個波羅的海「沙皇國」的野心。這位沙皇被臣民視為全世界東正教的保護者，但在求和過程中卻不得不求助於教皇出面調停。這是讓自稱擁有羅馬帝國皇帝血統的伊凡最為丟臉的事情。

恐怖伊凡死於一五八四年，即他與瑞典締結和約結束利沃尼亞戰爭的一年後。其子費多爾·伊凡諾維奇繼承大統，而費多爾將會是坐在莫斯科御座上最後一個留里克「子孫」。他繼承的是一個經濟破敗和飽受戰爭及恐怖蹂躪但更中央集權化的國家。他也繼承了父親的沙皇頭銜和「莫諾馬赫之冠」（現在沙皇頭銜受到所有外國領導人的認可）。這頂王冠和依附在它上面的傳說體現著俄羅斯沙皇國及其菁英階層在十六世紀過程中發展出來的複雜身分認同。王冠上鑲有中亞的黃金和珠寶，還編織著三層看不見的歷史神話：第一層是基輔神話，然後是拜占庭神話，最後是羅馬神話。在設法把自己連結於羅馬時，莫斯科無論是取道波羅的海和普魯士或是取道黑海和君士坦丁堡，都無法繞過基輔，亦即第一批留里克王朝大公的根據地，沒有它，莫斯科能夠提出主權主張的土地便只剩下蒙古人的遺產。

在莫斯科從一個附庸國變成主權獨立國家再變成帝國的過程中，基輔神話變成了莫斯科意識形態的奠基石。它的統治者後來將會發現，他們想要擺脫這個起源神話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仍舊是難之又難。

43 托馬斯·帕拉奧洛戈斯為拜占庭帝國皇子，封地在摩里亞，位於希臘的伯羅奔尼撒半島。

44 都主教是當時全羅斯東正教會最高領袖，受君士坦丁堡牧首管轄。

45 救世主塔樓（Spasskaia Tower / Savior's Tower）為克里姆林宮東側城牆的主要塔樓，也是克里姆林宮的主要入口，在這裡可以俯瞰紅場。

46 俄羅斯早期以上帝創造天地的西元前五五〇八年為紀元之始，彼得一世改用儒略曆法（Julian Calendar），宣布自一六九九年（七二〇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直接跳到一七〇〇年的一月一日，此為新年之始，不再以九月一日為元旦。

47 即基輔羅斯全域。

48 這個字原是希臘人對國王的稱呼。

49 「莫諾馬赫」（Monomakh）是「單打獨鬥者」之意。

50 似乎是指那裡有大量木材可供製造攻城槌。

51 Ipat'evskaia letopis' (St. Petersburg, 1908), col. 785.

52 同上。

53 由於基輔成為廢墟，都主教於一二九九年移至弗拉基米爾，一三二六年在莫斯科大公力邀之下並建造一座大教堂，此後都主教永駐莫斯科。

54 Serhii Plokhy, *The Origins of the Slavic Nations: Premodern Identities in Russia, Ukraine, and Belarus* (Cambridge, 2006), 137.

55 V. T. Pashuto, B. N. Floria, and A. L. Khoroshkevich, *Drevnerusskoe nasledie i istoricheskie sud'by vostochnogo slavians'tva* (Moscow, 1982), 172.

56 Mikhail Krom, *Mezh Rus'iu i Litvoi: Pogranichnye zemli v sisteme russko-litovskikh otnoshenii kontsa XV-pervoi treti XVI veka* (Moscow, 2010), 100.

57 即使亞歷山大是伊凡三世的女婿，也未能消除伊凡爭奪祖產的企圖心。

58 喀山汗國（Khanate of Kazan）係金帳汗國可汗後裔於一四三六年建立，位於今喀山一帶。

59 阿斯特拉罕汗國 (Khanate of Astrakhan) 係金帳汗國可汗後裔於一四六六年建立，位於伏爾加河下游注入裡海處。

60 Mikhail Zazykin, *Tsarskaia vlast' v Rossii* (Moscow, 2004), 57.

61 克里米亞韃靼人雖然攻入莫斯科，但沒有攻破克里姆林宮，而且很快被趕走。

62 「特轄制」 (Oprichnina) 主要是恐怖伊凡使用祕密警察 (稱為「特轄軍」) 殘酷整肅貴族而做的一種設計。特轄制始於一五六五年，至一五七二年結束。

第二章 第三羅馬

一五八六年六月，莫斯科宮廷來了一位不尋常的貴賓：安提阿牧首約阿希姆五世。安提阿是東方基督宗教（即東正教）五個最古老和德隆望尊的牧首教區首府之一。這時，沙皇費多爾已繼承皇位兩年。他穿著全套皇帝衣冠，在幾十個御前大臣的陪同下接見約阿希姆。他從御座上站起來歡迎這位貴賓，向前足足走了兩公尺，以示他對牧首崇高地位的尊崇。接受過約阿希姆祝福後，費多爾又邀請他一同用膳，這是另一項罕見的殊榮。

莫斯科習慣接受東方各牧首的資金援助請求，但在一五八六年之前從沒有接待過一位牧首。莫斯科東正教教會的地位一向低於拜占庭的教會，從它的領袖是一位都主教而不是牧首可見一斑，尤有甚者，這位都主教甚至不被「四大牧首」—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卓、安提阿和耶路撒冷的牧首承認。雖然約阿希姆的來訪讓沙皇有機會提升自己在東正教世界的地位，但這個機會也包含著一個挑戰。他要怎麼證明莫斯科教會比東方的教會更勝一籌？沙皇把這個艱難任務留給他的都主教季奧尼西去傷腦筋。與約阿希姆用過餐後，費多爾建議他先去見見都主教，後者在克里姆林宮的聖母升天大教堂等候。當牧首進入大教堂，季奧尼西不顧東正教的慣例，搶先給了牧首祝福。約阿希姆大吃一驚，表示由他來祝福都主教才是合適的做法。但不管怎樣，季奧尼西已經搶得先機，贏得外交戰的第一回合勝利。其餘的事情便由沙皇和他的顧問處理。

他們要求約阿希姆把莫斯科都主教教區提升為牧首教區。聽到這個讓人嚇一跳的要求，他決定採取拖延戰術。他一方面亟需沙皇的布施，不願冒兩手空空離開莫斯科的風險；另一方面，創立牧首教區的權力是在大公會議⁶³，不是他能夠單方面作主。根據莫斯科人的文獻記載，約阿希姆回答說，他認為莫斯科有自己的牧首教區是好事，但他必須先和其他牧首商量，在大公會議上做出決定。他承諾一回到自

己教區就會去遊說其他牧首。費多爾對這個回答感到滿意，送給他豐厚禮物，又託他轉送禮物給君士坦丁堡和亞歷山卓的牧首。

莫斯科有志成為拜占庭繼承人和世上僅存的東正教帝國的憧憬形成於十六世紀初。但只要莫斯科一天沒有自己的牧首，這一憧憬就無法充分實現。所以。沙皇必須不斷向東方的各個牧首尋求精神支撐和合法性。這也是恐怖伊凡為什麼需要請求君士坦丁堡牧首承認他的沙皇稱號。一五八一年，他的兒子，也是繼承人伊凡死亡—同時代人聲稱他是被父親在一陣盛怒下殺死。恐怖伊凡派使者前往東方，要求各教會為兒子的靈魂得安息祈禱。

在在看來，約阿希姆的承諾都讓莫斯科成為一個真正東正教帝國的宿願即將實現。在十六世紀的西歐和中歐，最重大的事件是基督新教改革、天主教改革，以及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的宗教戰爭。對莫斯科而言，首要之務是讓它的教會在東正教世界取得更高地位。十七世紀的前半葉將測試莫斯科世俗和宗教的既有關係，以及測試莫斯科對自己和它周遭世界的看法。

莫斯科教會和東方各牧首的關係在十五世紀中葉破裂，當時，羅斯的都主教希臘人伊西多爾被關進莫斯科一座監獄，罪名是倡議東正教和羅馬教會的統一。

伊西多爾是一四三七年到莫斯科履新，後來前往佛羅倫斯參加大公會議。在大公會議上，他是主張教會統一最不遺餘力的人之一。天主教和東正教的分裂發生在十一世紀，當時，操拉丁語的西方—以羅馬教皇為代表，和操希臘語的東方—以拜占庭的皇帝和牧首為代表，中斷了交流。基督宗教這兩個分支是因為對聖靈（Holy Spirit）的神學見解有差異而發生衝突：東方基督徒相信，聖靈唯獨出自聖父（God the Father）；西方基督徒卻相信，聖靈以同等程度出自聖父和聖子（God the Son）。這個爭論和其他許多神學爭論的背後隱藏著一個問題：誰應該掌握教會的終極權威？是羅馬教會抑或君士坦丁堡教會？政治差異和文化差異也把這兩個曾經同屬羅馬帝國的地區推向不同方

向。在東方，教會服從於皇帝，皇帝同時擁有世俗和宗教最高權力；但在西方，教皇卻不得不與世俗統治者競爭，由此產生出一種比東方多元的政治文化。隨著時間的推移，西方將會讓它的東方對手黯然失色。

在一四三九年的佛羅倫斯大公會議上，由教皇授意，雙方討論並通過了東正教和天主教的統一。東正教的代表同意接受天主教的神學教義，但保留自己傳統的拜占庭禮拜儀式和容許教士結婚的制度—這種立場後來被稱為聯合教會⁶⁴。拜占庭的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會接受這個統一，是因為希望羅馬會出手幫助他抵抗鄂圖曼帝國的步步進逼，結果希望落空。伊西多爾在一四四一年返回莫斯科後，馬上被伊凡三世的父親「瞎子」瓦西里二世下令逮捕。他成功逃獄，瓦西里二世也沒有追捕他。因為如果抓到他，根據教會的規定，必須把這個叛教者「活活燒死或活埋」。

為什麼莫斯科在一四四一年會拒絕教會重新統一？一個解釋可以在瓦西里寫給拜占庭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信中找到：東方教會和西方教會之間的神學差異不可抹殺。但考慮到這些信件的署名人是大公而不是莫斯科教會，我們也許可以假定，他的決定至少部分是出於政治考量。莫斯科教會之所以在莫斯科崛起為一個獨立國家之際脫離君士坦丁堡教會獨立絕非偶然，因為君士坦丁堡幾十年來甚至幾百年來一直是金帳汗國的盟友。我們知道，瓦西里想要自己任命羅斯的都主教，甚至曾把欽點的人選送到君士坦丁堡尋求批准，卻遭到拒絕。後來這個職位落在了伊西多爾身上。後者被捕後，瓦西里再次要求君士坦丁堡准許他自行提名人選，但再次遭到拒絕。

佛羅倫斯會議的教會統一決議給了這位雄心勃勃的統治者一個與君士坦丁堡切斷關係的絕佳藉口，從此得以自行任命莫斯科都主教。一四四八年，東正教主教會議選出沙皇指定的候選人約拿為都主教，莫斯科自此和君士坦丁堡切斷所有關係。所以，早在拜占庭帝國首都於一四五三年秋季被攻陷前，莫斯科都主教教區便是獨立或自治。它這種孤立於東正教世界其他部分的狀態將會持續近一個半世紀之久。

但莫斯科大公繼續自稱是拜占庭遺產的繼承者，也繼續想辦法和羅馬建立有利的聯繫。伊凡三世和索菲婭的婚姻便是這種態度的一種表現。

在俄羅斯歷史上，一四四八年（即莫斯科教會與君士坦丁堡切斷關係的一年）和一四七二年（伊凡迎娶索菲婭的那年），屬於相當不同的階段。在前一階段，莫斯科備受內部紛爭困擾，想盡辦法擺脫金帳汗國獨立。但在後一階段，它已取得實質上的獨立，控制了原屬金帳汗國的所有羅斯土地。伊凡娶索菲婭有助於莫斯科打開通往外面基督宗教世界的出口，因為這樁婚事的月老不是別人，正是教皇本人。索菲婭婚後固然必須皈依東正教，莫斯科也沒有改變拒絕教會統一的立場。但莫斯科統治者在羅馬的協助下娶一位聯合教會女子為妻的做法，仍然標誌著他的地位受到西歐和中歐政治和宗教高層的承認。

一四九〇年代初期的俄羅斯宗教菁英抱持以下這些觀念：莫斯科沙皇是拜占庭皇帝的繼承人；莫斯科是第二個君士坦丁堡；莫斯科和羅斯土地是拜占庭帝國的延續。這些觀念在一四九二年由莫斯科都主教佐西馬首次清楚表達。那一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莫斯科的東正教信徒則是忙著為世界末日預作準備。根據東正教教曆，以上帝創造天地的那一年算起，一四九二年正是第七千年，也是世界終結的時候，所以莫斯科的東正教信徒認為一四九二年將是他們和其他人類生存在地球上的最後一年。他們感謝上帝讓他們擁有正信，得以在世界末日得救。

但讓莫斯科教會人士嚇一跳的是，世界並沒有在一四九二年結束。世界繼續存在讓羅斯教會碰到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怎樣計算變動不居的復活節的日期？都主教佐西馬接下了這個挑戰，制定出《復活節循環週期探論》一書。他和很多莫斯科人都相信，新的年曆和新的東正教時代是隨著世界權力結構的變化而肇始。在這個層級結構的最頂端，拜占庭的東正教帝國被莫斯科公國取代，拜占庭皇帝被莫斯科沙皇取代。根據佐西馬，上帝已經在新君士坦丁堡安立了伊凡三世作為「一位新的沙皇，一位新的君士坦丁，他是莫斯科和整個羅斯和

許多其他土地的最高主宰」⁶⁵。佐西馬除了把莫斯科稱為新君士坦丁堡，又把君士坦丁堡稱為新羅馬（在某些副本中，又稱之為新耶路撒冷）。

在十五和十六世紀，莫斯科同時被想像為一個新耶路撒冷和一個新羅馬，但最引起歷史學家注意的卻是莫斯科作為「第三羅馬」的觀念，因為這個比喻啟發了一種教會—皇帝關係的新模式。莫斯科被稱為「第三羅馬」首見於十六世紀初葉的一些信函，而寫信人被認為是普斯科夫一間修道院名叫菲洛費的僧人（此時的普斯科夫已被莫斯科兼併）。在一次上書瓦西里的時候，他提醒這位大公不可忽略甚至損害教會的利益。菲洛費指出，羅馬教會因為異端邪說的入侵而失陷，而第一羅馬衰亡後繼承帝國和屬靈（spiritual）權力的第二羅馬—君士坦丁堡，後來又被穆斯林接管。所以，莫斯科變成了第三羅馬，擔負著保存純真信仰（true faith）的責任。菲洛費在書信開頭即表達了這個觀念，書信末尾又再提一次：「所有的基督宗教王國如今都集結在您一人之下。前兩個羅馬已經陷落，第三羅馬將永世長存，不會有第四羅馬出現，您的基督宗教王國將不會被另一個所取代。」⁶⁶

莫斯科作為第三羅馬的觀念一度在恐怖伊凡統治期間幾乎被完全忘掉，但在他死後又熱烈復活，表現在莫斯科努力爭取自己的都主教教區升格為牧首教區。一五八八年夏天，即安提阿牧首約阿希姆五世離開莫斯科的兩年後，沙皇費多爾接獲消息，得知這位牧首的遊說已經起到預期的效果。這時，斯摩棱斯克官員又發來報告，說是從東方來了一位新貴賓：君士坦丁堡牧首耶利米二世。沙皇派出一名大臣去歡迎他，詢問他大公會議是否已經決定創立莫斯科牧首教區。讓莫斯科方面失望的是，耶利米表示他對莫斯科的升格要求一無所知，也沒有帶來任何決議。耶利米此行的唯一目的是前來募集布施，以改善過去稱為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坦堡東正教會的財務狀況和建造一座新的牧首教堂，因舊的教堂如今已由鄂圖曼土耳其接管。

雖然莫斯科當局為進入莫斯科的耶利米安排了肅穆的入城儀式，但都主教並沒有出現在歡迎會上，而沙皇也過了八天才接見耶利米。

他坐在一頭驢子背上進入皇宮，大概是象徵耶穌進入耶路撒冷，但沙皇迎接他時只踏出之前迎接安提阿的兩公尺距離的一半，原因要不是沙皇不確定耶利米是否為貨真價實的牧首，要麼由於不高興耶利米沒有帶來好消息。沙皇也沒有邀請耶利米共膳，卻改讓他與朝廷的顧問碰面。他們問他東正教在鄂圖曼帝國治下的處境。之後，耶利米就被送回住處等候消息。

這位東正教牧首接下來形同囚犯。根據他的一名隨行人員記載：「在他們軟禁耶利米的地方，任何本地人都不容許見他，他也不容許外出。只有隨行的僧侶有需要時可以在沙皇的人馬陪同下前往市場。這些僧侶全程都會被監視，直到回到自己的住處為止。」⁶⁷ 先前，牧首約阿希姆在莫斯科待了不到兩個月，但這一次耶利米卻待了將近一年：從一五八八年七月待到一五八九年五月。他最終完成了莫斯科的心願，給它創立了一個牧首教區並在成立典禮上主持祝聖。

祝聖儀式在一五八九年二月初舉行。不出意料之外，被選出的莫斯科新牧首是原來的都主教約伯。同年五月，沙皇費多爾給耶利米放行，又送給他一筆厚禮。但他獲釋是以同意創立一個牧首教區作為代價，此舉違反了所有的既有教會章程。不過，幾年後，東方各牧首因為愈來愈窮和愈來愈依賴沙皇的布施，追認了耶利米擅作主張的決定。

於是，莫斯科終於成為東正教一個牧首教區的首府。它的資歷當然是最淺，遠不及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卓、安提阿和耶路撒冷四個歷史悠久的牧首教區。不過，論實質，它卻是東正教世界最大、最富有且最有權勢的牧首教區。它的權勢來自於沙皇，它的真正主人也是沙皇。新的莫斯科牧首約伯不但沒有參與和耶利米的談判，甚至沒有在祝聖儀式之前和耶利米見過面。創建莫斯科牧首教區的牧首諭令明確提到莫斯科就是第三羅馬：「舊羅馬因為被亞波里拿留主義⁶⁸的邪說蠱惑而跌倒，第二羅馬—即君士坦丁堡—又已經被夏甲的後代⁶⁹占領，也就是被目中無神的土耳其人占領。虔誠的沙皇啊，您的偉大羅斯沙皇國，您的第三羅馬，已經在虔誠上超越了它們，而所有虔誠的信徒

都已被統一在您的沙皇國裡。在穹蒼之下，在全宇宙之內，唯有您一人被稱為基督徒沙皇。」 70

耶利米在其他文件中都沒有把莫斯科稱為第三羅馬。這強烈顯示，詔令是莫斯科方面擬稿，耶利米只是負責簽字。歷來第一次，這個形成於世紀之初的觀念被拿來促進莫斯科教會和國家的目標。當初，菲洛費提出這觀念是為了保護教會，讓它免於被世俗權力侵犯，但現在，它卻被改為用於加強新創建牧首教區及其實際控制者沙皇的地位。莫斯科已準備好為自己在東正教世界爭取首位。

創建莫斯科牧首教區的關鍵人物不是沙皇費多爾，而是他的妻舅兼智囊戈都諾夫。前面提到安提阿的約阿希姆和君士坦丁堡的耶利米，兩位東方牧首分別於一五八六年和一五八八至一五八九年到訪莫斯科，都是由他一手安排。莫斯科都主教約伯因為和戈都諾夫走得非常近，得以在一五八九年成為第一任莫斯科牧首。戈都諾夫出身外省小貴族之家，靠著在恐怖伊凡的祕密警察「特轄軍」建功而往上爬，最終成了這位沙皇最親密的助手之一。

沙皇費多爾在一五九八年一月駕崩，得年四十歲，沒有留下繼承人：他的異母弟德米特里早在七年前的一五九一年五月死亡，死因可疑。費多爾死後，權力落在妻子伊琳娜手裡，然後又落在她本來就權大勢大的哥哥戈都諾夫手裡。留里克王朝世系自此絕嗣，恐怖伊凡相信自己是留里克後人，這種信念或宣稱也是莫斯科能夠跟基輔、君士坦丁堡以及羅馬扯上關係的基礎。戈都諾夫的家族相傳是韃靼人，不是基輔公國的統治者。但由於他政治手腕高明，讓改朝換代的過程相當平順，獲國民大會⁷¹選為沙皇（國民大會是由莫斯科社會各階層代表組成的諮詢機構，最初是由恐怖伊凡召集）。

根據莫斯科公國的曆法，一五九八年九月一日是元旦（要到十八世紀初葉，彼得一世才把元旦改為一月一日）。這一天，莫斯科的顯要齊集克里姆林宮的聖母升天大教堂，出席新沙皇的加冕典禮。戈都諾夫在一隊侍臣的護衛下現身。一個侍臣端著「莫諾馬赫王冠」，一

個端著沙皇權杖，還有一個端著「金球」——一個鑲在十字架頂端的球體，被當時的莫斯科文獻稱為「蘋果」。戈都諾夫登上御座，由他忠心的牧首約伯授予他皇室徽章。就這樣，十六世紀隨著一支嶄新政治和宗教團隊的出現而結束。這種有序的權力轉移似乎預示著一個光明的未來：有一個新的沙皇和新的牧首坐鎮，這個東正教帝國的輝煌未來看來指日可待。

但十七世紀初莫斯科公國遭遇了無數的困難。一六〇五年四月，戈都諾夫在一片社會動盪中突然死亡，讓國家陷入了曠日廢時的血腥政治危機、內戰和國際衝突。被稱為「混亂時期」，這段時期歷時八年之久，換了幾位沙皇。頭一個是奧特列比耶夫，他本來只是個被解職的僧侶，卻公然冒充恐怖伊凡已死的最小兒子德米特里，並成功騙過大多數人。但他在位不到一年，一六〇五年六月至一六〇六年五月，就被真正有著留里克血統的新沙皇舒伊斯基的支持者所殺。舒伊斯基又在一六一〇年七月被瓦迪斯瓦夫四世的支持者趕走。瓦迪斯瓦夫四世是波蘭國王西吉斯蒙德三世之子，因為覬覦沙皇之位出兵占領莫斯科。混亂時期在一六一三年結束，波蘭人被趕走，米哈伊爾·羅曼諾夫被選立為沙皇，一個新王朝自此誕生⁷²。

混亂時期對形成於上一個半世紀，即蒙古統治結束之後的莫斯科歷史、政治和文化認同帶來了新的挑戰：一方面，這個危機開始於把沙皇與他統治的國家分離開來的過程，因此奠定了近代俄羅斯國家的基礎；另一方面，驅逐入侵者波蘭人的愛國熱情也讓效忠沙皇和效忠教會及祖國（fatherland）變得密不可分。在該時期的官方論述中，不忠於三者的其中之一被等同於同時對三者不忠。

在用來動員莫斯科驅逐入侵者的主要意識形態論據中，捍衛東正教變成是最重要的一項。在一個沒有統治王朝或合法世俗機構治理國家的狀態下，教會變得特別重要。於是，教會領袖從本來只是從屬於政治領袖的角色，在莫斯科公國的政治變得舉足輕重。這個角色由牧首赫爾莫根扮演，他是莫斯科第三任牧首。但他看起來不像是能擔此

大任的人，因為在一六〇六年七月，他已經七十五歲，按當時的標準非常高齡。

赫爾莫根的牧函反映出，莫斯科的宗教和世俗菁英，在回應混亂時期的挑戰時，世界觀有了改變。在牧函中，赫爾莫根拒絕承認那些背叛新沙皇舒伊斯基的人是真正的基督徒：

我現在轉向你們—不同學歷、年齡和職位的前東正教基督徒。但我甚至不知道該怎麼稱呼你們，因為你們已經對上帝轉過身，對真理懷有仇恨，遠離了普世和使徒的教會，離棄了沙皇瓦西里·伊凡諾維奇⁷³—他的花圈是上帝所賜，王位是經由聖油所膏立。你們已經忘記你們對東正教信仰的誓言，忘記了你們是在這信仰中出生、受洗和長大；你們已經放棄了你們對十字架的親吻和你們曾發誓會為捍衛至聖聖母的教會和莫斯科國家而死，改為效忠於你們那個冒稱沙皇的沙皇。⁷⁴

赫爾莫根堅持，一個愛國的莫斯科人和真正的基督徒也必須同時效忠沙皇，這種主張是十七世紀頭幾十年莫斯科文學的一個基調。

混亂時期結束於一六一三年，當時國民大會選出十六歲的米哈伊爾·羅曼諾夫為沙皇。羅曼諾夫家族的族長是新沙皇的父親費多爾，他曾在最後一位留里克王朝沙皇（也是叫費多爾）駕崩後競逐過沙皇寶座。費多爾落敗，戈都諾夫當選後把他放逐到北方一家修道院，強迫他為僧。戈都諾夫死後，費多爾獲得平反，回莫斯科之後被立為羅斯托夫的都主教，並改名菲拉雷特。他在一六一〇年被波蘭人逮捕，接下來八年被軟禁在波蘭—立陶宛共和國。

波蘭和莫斯科在一六一九年簽訂停戰協議後，菲拉雷特得以回到莫斯科。當時，他兒子已登上沙皇寶座六年。翌年，菲拉雷特當選牧首，因此形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地位本來在牧首之上的沙皇變成了是牧首的兒子。理論上，兩人各有不同的職司，但明顯的是，專橫的牧首支配著他溫順的兒子。拜占庭的模式，即牧首受皇帝支配的模式，就此被逆轉了。

這位新牧首對沙皇國之外的東正教世界毫無好感。菲拉雷特在波蘭當俘虜那段期間的所見所聞讓他深信，烏克蘭和白羅斯的東正教因為受到天主教君主統治和常常被迫和非東正教的教會打交道，靈性已經腐化。更嚴重的問題是共和國強迫部分的東正教會和天主教會統一。一五九六年布列斯特會議創立新的聯合教會，承認教皇擁有至高無上地位，並接受天主教教義，只保留傳統的拜占庭禮拜儀式。菲拉雷特指控聯合教會「腳踏兩條船」，又認為即使是波蘭一立陶宛共和國境內那些拒絕教會統一的東正教會，仍算不上貨真價實的東正教徒和基督徒。

從一六一九年當上牧首直至一六三三年去世為止，菲拉雷特都是莫斯科的實質統治者。在他的主導下，國家和教會融合為真正東正教的最後堡壘。不過，他雖然質疑莫斯科以外每一個基督徒的資格，卻熱中和非東正教的統治者締結政治聯盟，為的是打敗他恨之入骨的波蘭一立陶宛共和國和奪回在混亂時期被其奪去的土地。菲拉雷特在俄國與共和國發生另一場戰爭期間死去，這場戰爭又是以莫斯科戰敗收場。在霸氣的父親死後，米哈伊爾·羅曼諾夫成了莫斯科唯一的統治者。但把牧首視為最高主宰的傳統並沒有在一夜之間消失。而且，世俗權力和宗教權力之間的緊張也繼續存在。這種不利於沙皇的局面一直要到三十年後才獲得全面解決。

在歐洲天主教國家和基督新教國家大打出手的「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中，莫斯科巴不得和基督新教國家結盟，共同對付信奉天主教的波蘭人，但又處處受到東正教會掣肘，東正教會拒絕承認其他基督教會擁有完整統治權。這一限制在一六四四年以讓人尷尬的方式清楚地表現出來。當時，丹麥的瓦爾德馬王子前往俄羅斯迎娶沙皇米哈伊爾的女兒伊琳娜，受到莫斯科盛大歡迎。這場婚禮被認為可以落實莫斯科和丹麥之間醞釀已久的聯盟關係，瓦爾德馬和伊琳娜早在一六四〇年便已訂婚，但最後卻以破局收場。受到來自教會高層的壓力，沙皇堅持瓦爾德馬娶伊琳娜之前必須轉皈依東正教。但王子並不打算留在莫斯科或要求其王位，所以一口拒絕。沙皇

不讓他離開，結果，王子一直被軟禁到米哈伊爾在一六四五年駕崩、皇子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登基為止。

伊琳娜和阿列克謝非常親密，她的婚姻泡湯向新沙皇和他的顧問們表明，東正教教會已經成為一塊政治石頭。進一步證據，來自莫斯科的東正教神學家在和瓦爾德馬王子帶來的路德宗傳道人辯論基督宗教教義和婚姻問題時，沒有能守住陣線。但教會之內有一個改革運動正在壯大，致力於提高神職人員的教育程度和消滅腐敗。這個運動後來被稱為「虔誠狂熱派」，成員之一的修道院院長尼康在一六五二年成為莫斯科牧首。尼康在獲得沙皇的同意後，在沙皇的頭銜中加入「最高主宰」一詞。就職以後，尼康對教會發起了雄心勃勃的改革，以回應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改革所帶來的挑戰。他的改革路線基本上是追隨基輔都主教莫吉拉不久前在波蘭－立陶宛共和國所進行的改革。

莫吉拉是摩爾達維亞統治者之子，一六三三年成為基輔都主教後不遺餘力改革烏克蘭和白羅斯的東正教，以順應新時代的潮流。他一開始先是加強神職人員的教育。一六三二年，他把原有的兩所東正教學校合併成為基輔學院，其結構和課程是仿效耶穌會辦的學院，是烏克蘭第一家採取西方模式的教育機構。由羅馬教廷在特倫特大公會（一五四五至一五六三年）發起的天主教內部改革，成為莫吉拉改革波蘭－立陶宛境內東正教的靈感來源和楷模。

天主教的影響力明顯見於這位都主教的禮儀革新和他制定的信綱，在這之前，東正教並沒有自己的信綱。在莫吉拉的監督下，一批知識分子於一六四〇年代編訂了一部東正教自己的「教義問答」，經基輔的宗教會議通過後推行。一六四三年，這部教義問答得到東方四大牧首批准，從此成了整個東正教世界對教義和信條的官方解釋，唯一顯著例外是莫斯科。

基輔興起成為東正教世界學問中心的這段時間，莫斯科和其教會卻是把自己幾乎完全孤立起來，對其他東正教教會面對的挑戰渾然不

覺。但年輕沙皇阿列克謝改革教會的願望改變了莫斯科對基輔和其教義的態度。把這一點表現得最明顯的莫過於在出版領域。一六四九年，莫斯科出版商以莫吉拉的東正教信綱為底本，編輯和出版了《信條教導扼要全書》。就這樣，莫斯科東正教會與世界其他地方的東正教會重新發生連結，共同以基輔的神學教義為基礎。

這樣的發展不無諷刺。莫斯科一直努力修補因為他們的教會孤芳自賞所產生的問題，方法是回到東方教會父老75未被竄改的著作，以之作為信仰基礎。但這需要檢查希臘語原典的老舊莫斯科譯本是否有誤，必要時甚至得要重新翻譯。莫斯科方面沒有勝任的譯者，只能從基輔引進，但這樣做的同時卻也引進了基輔對希臘語原典和東正教教義的整體理解。假以時日，基輔教會改革的願景和莫斯科傳統主義者的觀點將會發生衝突，在莫斯科教會和社會引起深遠分裂。

就在莫斯科教會出現基輔轉向的同時，有一股新勢力在烏克蘭崛起，它不僅想要和莫斯科發生緊密的宗教連結，還想發生密切的政治連結。這股新勢力是哥薩克人和他們創建的哥薩克國。一六四八年春天，烏克蘭被一場新的哥薩克人起義所震撼—這是哥薩克人自十六世紀末葉以來第七次起義。哥薩克人一開始在十五世紀的時候只是些獵獸者和土匪，但到了這個時候卻上升成為一股重要戰鬥力量，不斷向波蘭—立陶宛共和國政府要求權利和特殊待遇。到了一六四八年，他們又進一步要求政治獨立。

一六四八年十二月，起義領導者亦是哥薩克老將的赫梅利尼茨基進入基輔。他受到基輔學院的教授和學生夾道歡迎—他們把他視為羅斯人的摩西，為他把他們從波蘭人的牛軛解放出來而歡呼喝彩。基輔的東正教都主教也在歡迎赫梅利尼茨基的行列。更重要的是，都主教身邊伴隨著一個重要的教會高層：耶路撒冷牧首帕納吉。牧首本來是要去莫斯科向沙皇尋求布施，路上卻遇到哥薩克叛軍，在赫梅利尼茨基的命令下被帶到基輔，讓他在哥薩克人攻克基輔之後參與歡迎赫梅利尼茨基進城的盛大儀式。

帕納吉並不介意自己的行程受阻。他把赫梅利尼茨基稱為傑出的王公，並賜給他祝福，稍後又建議他組織一個全世界東正教勢力的聯盟—由莫斯科和烏克蘭的聯盟打頭陣。赫梅利尼茨基需要一點點加油打氣。當他一六四八年六月第一次致函莫斯科沙皇時，他把哥薩克人起義說成是對「古代希臘信仰」壓迫的反抗，並說：「我們都希望自己的土地有一個像沙皇陛下一樣的獨裁君主，一個信奉東正教的基督徒沙皇。」⁷⁶赫梅利尼茨基希望莫斯科能夠出兵支持哥薩克人。他央請準備動身前往莫斯科的帕納吉為其說項。牧首樂見一個新的東正教聯盟的成立，答應幫忙。見到沙皇之後，帕納吉懇請沙皇基於同教情誼，提供軍事援助，「把哥薩克人納入他的長手臂之下」。

沙皇阿列克謝態度保留。他向牧首解釋，身為基督徒，他不能答應赫梅利尼茨基的請求，因為莫斯科和波蘭—立陶宛共和國在一六三四年簽訂了和平條約。所以，除非哥薩克人能夠保障自己的自由，他才能提供保護。不過，如果他們受到波蘭人迫害，基於哥薩克人的東正教信仰，他也會准許他們遷徙至莫斯科。沙皇看來陷入宗教的兩難處境，要麼違背他對另一個基督教徒的誓言，要麼保護同屬東正教的基督徒弟兄。接下來四年，他都置身於烏克蘭的衝突之外。莫斯科不準備攻打一個過去幾十年來不止一次打敗它甚至占領過它首都的國家。

及至一六五一年春天，眼看共和國無法有效鎮壓哥薩克人的起義，莫斯科才開始準備對它作戰。莫斯科的外交官開始為違反和平條約找理由，聲稱赫梅利尼茨基會揭竿而起，是為了對抗宗教迫害，是因為波蘭人逼哥薩克人「接受羅馬的信仰，關閉他們的教堂，把統一強加給東正教教會—總之是用盡各種方式壓迫他們。」⁷⁷國民會議在一六五三年六月至十月舉行了多次會議，最終同意開戰。與會代表認為，基於「東正教信仰和上帝神聖教會」的緣故，沙皇有權把哥薩克人和他們的土地納入他的「長手臂」（保護）之下。

一個使節團被派去通知赫梅利尼茨基，莫斯科準備好和他並肩作戰。在穿過烏克蘭土地的沿途，使節團到處看見有宗教遊行和舉行教

堂慶典慶祝兩群東正教人民重新統一。得到消息後，赫梅利尼茨基在基輔東南方的佩列亞斯拉夫舉行哥薩克軍官會議，向在座人士提出三個可能選擇的方案：一是回頭接受篤信天主教的波蘭國王統治；二是承認穆斯林蘇丹的宗主權，蘇丹統治著克里米亞汗國，也有興趣把勢力向北推進；三是接受信奉東正教的沙皇保護。他自己主張最後一個方案，理由是俄國沙皇「和我們有著一樣的信仰，用一樣的希臘儀式禮拜」⁷⁸。大家支持這位蓋特曼⁷⁹的主張，高呼他們想要投效「東方的東正教沙皇」。

東正教聯盟於焉誕生。發生在西歐和中歐的「三十年戰爭」已在一六四八年結束，但東正教和天主教在東歐的戰爭規模反而擴大。莫斯科人和哥薩克人在佩列亞斯拉夫舉行談判時，有一些重要問題談不攏，包括沙皇的義務和他的新子民的義務。後來，因為莫斯科的使節拒絕代表沙皇就談定的條件宣誓—哥薩克人習慣了波蘭官員代表國王宣誓，也引發了一場小危機，但因為赫梅利尼茨基不想因此危及聯盟關係，旋即讓步。這種地緣政治議程差異和政治文化差異最後用東正教兄弟情誼的修辭掩蓋起來。

「第三羅馬」的比喻，是在莫斯科都主教教區升格為牧首教區之時，進入莫斯科的官方論述。這個比喻相當有彈性，能夠適應莫斯科人在十七世紀前半葉對自己和對世界一些觀點的重大變化。「第三羅馬」的核心觀念是，俄國沙皇為拜占庭陷落後僅存的東正教沙皇。它既可以被用來強調莫斯科是一座被圍困的堡壘—菲洛費在十六世紀初葉就是這種用法，又可以用來強調莫斯科教會的特殊地位甚至是首要地位。一位博學的莫斯科僧人在一六五〇年寫給牧首帕納吉的信上說：「太陽底下唯一虔誠的沙皇從前是住在君士坦丁堡……但現在，取代那位沙皇的地位，我們在莫斯科有了一位虔誠的沙皇，他是太陽底下唯一的虔誠沙皇。」⁸⁰一六五三年的《領航書》（一部教會法和民法的彙編）向更大的聽眾群提醒莫斯科在東正教世界的特殊地位，其中包括，耶路撒冷牧首耶利米在創立莫斯科牧首教區時，曾把莫斯科稱為第三羅馬。

到了十七世紀中葉，莫斯科已經把混亂時期的震盪完全克服。它帶著新的自信回到國際舞台，深信自己在東正教世界肩負重要使命。重新認定烏克蘭和白羅斯的東正教徒是貨真價實的東正教徒，並願意為他們之故對波蘭－立陶宛共和國發起戰爭—這種態度標誌著莫斯科對外方針發生了重大改變。這種改變既和宗教戰爭的新時代同步，也和新教改及天主教改革所帶來的國際政治新局勢同步。至此，「第三羅馬」論述在莫斯科從一種防守策略轉變為進攻策略，接下來的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愈來愈甚。

63 聯合教會（Uniates）與天主教統一後的東正教因為保留東方的禮拜儀式，又稱為「東儀天主教會」。

64 聯合教會（Uniates）與天主教統一後的東正教因為保留東方的禮拜儀式，又稱為「東儀天主教會」。

65 Iakov Lur'e, *Ideologicheskaia bor'ba v russkoi piublitsistike* (Leningrad, 1960), 378.

66 Pavel Miliukov, *Ocherki po istorii russkoi kul'tury* (Moscow, 1995), 31.

67 Makarii (Metropolitan), *Istoriia russkoi tserkvi* (Moscow, 1996), vol. 6, 34.

68 亞波里拿留主義（Apollinarianism），西元四世紀創立，否認基督的人性。被正統派視為試圖產生「第三性」（耶穌既不是神也不是人）的異端。

69 舊約聖經《創世記》第十六章記載，夏甲（Hagar）是以色列人祖先亞伯拉罕的妾，所生的兒子為阿拉伯人的族祖。詔令中顯然把鄂圖曼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混為一談。

70 Donald Ostrowski, *Muscovy and the Mongols: Cross-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Steppe Frontier, 1304-1589* (Cambridge, 2002), 239.

71 這個國民大會（Assembly of the Land）有貴族、神職人員、市民、商人、農民、哥薩克的代表，由恐怖伊凡創立，一五五〇年首次召開大會，最後一次是在一六五三年。

72 這個「羅曼諾夫王朝」一直維持至二月革命推翻末代沙皇為止，米哈伊爾的姑婆是恐怖伊凡的第一位皇后。

73 即舒伊斯基，在位時間是一六〇六至一六一〇年。

74 Makarii (Metropolitan), *Istoriia russkoi tserkvi*, vol. 6, 98.

75 教會父老（church fathers）是指教會早期的著作家。

76 Serhii Plokhii, *The Cossacks and Religion in Early Modern Ukraine* (Oxford, 2001), 306.

77 同上，312.

78 同上，319.

79 蓋特曼（hetman）是烏克蘭哥薩克經由大會（rada, council）選出來的軍事領袖。

80 Makarii (Metropolitan), Istoriiia russkoi tserkvi, vol. 6, 357.

第三章 帝俄民族

一六五四年一月八日，烏克蘭蓋特曼赫梅利尼茨基和他的軍官在佩列亞斯拉夫當著沙皇特使布圖爾林面前宣誓效忠—此舉是向著帝國史家所謂的「羅斯的重新統一」或蘇聯史家所謂的「烏克蘭與俄羅斯的重新統一」邁出一大步。不過，這個日後所謂的「重新統一」，乃是透過簽署一份強調分歧而非統一的文件達成。此後，每逢赫梅利尼茨基寫信給沙皇，都不是按當時一般習慣稱沙皇為「全羅斯的最高主宰」，而是稱之為「大羅斯和小羅斯的最高主宰」。這種做法八成是事先和布圖爾林商量過，因為沙皇未幾也把自己官方頭銜上的「全羅斯」改為「大羅斯和小羅斯」。

這兩個名稱是出現在十四世紀初葉蒙古人入侵之後。當時，一個稱為「小羅斯」的都主教教區在烏克蘭小城加利奇成立，全羅斯都主教教區遂一分为二。⁸¹「大羅斯」與「小羅斯」的說法會在十六世紀末葉復活，是由那些取道波蘭—立陶宛共和國境內的羅斯土地前往莫斯科尋求沙皇布施的中東教會高層促成。在新的用法中，「小羅斯」指受到基輔管轄的東正教土地，「大羅斯」指莫斯科公國全境。在簽訂佩列亞斯拉夫協議時，這兩個宗教術語被賦予了政治意涵。

到了一六五五年，沙皇的頭銜又多了「白羅斯」幾個字。這些變化反映著新的軍事和政治形勢。這時候，原本用來稱呼基輔都主教區管轄的「小羅斯」一詞改為用來稱呼烏克蘭。換言之，是用來稱呼波蘭王國內的羅斯土地。這些土地要麼受到哥薩克人控制，要麼被哥薩克人聲稱擁有，全都享有沙皇答應過哥薩克蓋特曼的額外權利和特殊待遇。這些權利和待遇並不適用於白羅斯，因為白羅斯原是波蘭—立陶宛共和國境內立陶宛大公國的一部分，後來莫斯科是靠武力占領，沙皇並沒有授予其居民特權。信仰東正教的白羅斯人也沒有從自己的信仰得到好處：白羅斯的東正教教區直接受莫斯科司法管轄，而烏克蘭教區仍然是從屬於基輔。

就像沙皇的書吏堅持大羅斯、小羅斯和白羅斯有所不同，後兩地的知識分子也維持著自己的身分認同，不認為小羅斯人和白羅斯人是大羅斯人。這些知識分子都是在都主教莫吉拉轄下的基輔學院接受教育，考慮身分認同時不是以王朝和宗教的原則思考，而是根據新出現的民族觀念思考，所以認為自成一個羅斯民族。有一點會讓今日的我們感到奇怪的是，他們稱自己為「俄羅斯人」（Rossian⁸²，相當於今日英語中的 Russian），又不願意把大羅斯的居民納入「俄羅斯人」範疇。

一六五六年七月五日，基輔學院著名畢業生波洛茨克人西緬，率領學生歡迎一位顯赫貴賓蒞臨他們位於白羅斯北部的小城⁸³。這位貴賓就是莫斯科沙皇阿列克謝。然而，在西緬師生眼中，阿列克謝雖是不折不扣的東正教徒君主和羅斯土地的合法主人，卻不是他們民族的一員。一個學生在獻詩中說：「長久渴盼的民族安慰，如今賜予了被迫害的俄羅斯族。」⁸⁴這不啻是說，本來被波蘭—立陶宛共和國統治的羅斯人才是俄羅斯人。另一個學生也在獻詩裡說：「全俄羅斯、白羅斯和小俄羅斯，都要親吻陛下／感謝在陛下的信仰光輝之下所得到的啟蒙。」對西緬的學生來說，阿列克謝是一位東方的沙皇或說東正教的沙皇，是從一個稱為「北國」的地方來到他們的「俄羅斯」土地。

阿列克謝和扈從看來並不介意波洛茨克的市民沒有把他們看作同一民族的同胞。在當時，「民族」（ethnicity）觀念還不包括它後來在民族國家時代獲得的政治意涵。莫斯科人都是從一種君主國、祖產和愈來愈宗教性的角度思考，極少從民族的角度思考，即使會這樣思考，也不會把波蘭—立陶宛共和國境內的羅斯人口看成自己民族的一部分。相反地，魯塞尼亞人⁸⁵（即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的菁英分子卻習慣從民族的角度思考，只不過他們也不認為莫斯科人是自己民族的一員。

這兩群人都需要花一些時間調整自己的思考方式，以適應新的政治現實，進而認為彼此不僅受到同一個最高主宰統治，還構成同一個

民族。對這個過程最有促進作用的，莫過於莫斯科與波蘭—立陶宛共和國及鄂圖曼帝國就烏克蘭和白羅斯土地所進行的激烈爭奪。

莫斯科發現很難把在一六五四至一六五五年之間占領的烏克蘭和白羅斯土地維持完整。根據談判了三年才在一六六七年於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一個村莊簽訂的《安德魯索沃停戰協定》，莫斯科把白羅斯東部的土地割讓給波蘭—立陶宛共和國。雖然烏克蘭東北部的切爾尼戈夫繼續處於莫斯科控制之下，但這種控制只是間接的—因為它是哥薩克國的一部分，該國接受沙皇的宗主權。莫斯科一直建議哥薩克人把切爾尼戈夫交由其直接控制，但哥薩克人置若罔聞。當時，聶伯河左岸（東岸）的烏克蘭地區完全落入哥薩克人的控制下，其餘地區仍然是由波蘭—立陶宛共和國統治，包括大部分基輔地區、沃里尼亞、波多利亞和加利西亞，它們全都是基輔人傳統認定的小羅斯的一部分。

基輔，昔日羅斯親王的首府，也是波洛茨克人西緬和他的基輔教授及學生心中的俄羅斯中心，發現自己的處境危殆。這個城市位於聶伯河右岸，所以沙皇和他的顧問們準備好要放棄它，以確保與華沙的和平。根據《安德魯索沃停戰協定》，基輔會在協定簽署的兩年後移交波蘭人。但莫斯科後來沒有遵守承諾履行這個約定—哪怕要在河的另一邊保護基輔這個據點有多麼地困難重重。移交會被阻止，部分是基輔東正教教士的遊說功勞。他們不惜一切代價挽留沙皇的保護。

一六七四年，眼見基輔可能會受到鄂圖曼的攻擊，它的知識分子開始改弦易轍，鼓吹基輔應該留在沙皇的勢力範圍。這種觀點主要是體現在一本名叫《大綱》的歷史文獻彙編。《大綱》有一個很長的副書名：《一部歷史概要，涵蓋斯拉夫—俄羅斯民族的起源、天佑之城基輔第一批大公的史蹟、神聖而虔誠的基輔暨全俄羅斯大公，也是第一位獨裁君主弗拉基米爾，一直到我們顯赫而有德的最高主宰，即沙皇暨大公阿列克謝，他也是由大俄羅斯、小俄羅斯和白羅斯構成的全俄羅斯的獨裁君主》。

這本書由基輔的「山洞修道院」印行，一般認為是出自修道院院長吉澤利之手。《大綱》延續基輔羅斯的編年史寫作傳統，關注的是基輔的歷史、羅斯教會的起源和民族議題。該書在基輔和其他地方引起讀者極大興趣，一六七八年和一六八〇年都有新版本出版。不讓人意外，《大綱》的史觀高度以基輔為中心，核心思想是把莫斯科理解為第二基輔。基輔對於把莫斯科建構為第三羅馬一直具有關鍵重要性，但直到《大綱》出版前，它的鋒頭一直被君士坦丁堡蓋過。為了把這種局面扭轉過來，《大綱》的作者強調基輔對羅斯和莫斯科的歷史具有核心重要性。

在《大綱》一書中，基輔被說成俄羅斯王朝、國家和教會的發祥地。另一個不遑多讓的重要性是作為「俄羅斯」民族的發祥地。談基輔起源的一章題為〈論最負盛名的城市基輔—它是整個俄羅斯民族至高無上的首要城市〉。這個民族是什麼樣的民族？《大綱》作者把它算作斯拉夫民族之一，稱之為「斯拉夫—俄羅斯人」，其成員包括生活在中世紀基輔羅斯領土的所有人。這對傳統的烏克蘭編年史是重大偏離，因為後者都是按照波蘭人的史觀，把莫斯科人和羅斯人看成兩個不同的民族（narody / nations）。

後來，《大綱》在十八世紀成為了俄羅斯帝國第一部俄羅斯歷史教科書，到十九世紀初葉為止再刷十六次或出新版。由於版本和印數眾多，《大綱》促進了莫斯科人自視為一個民族。不過，這個民族並不單單是由莫斯科人所構成，因為根據《大綱》的描述，如果沒有基輔和當時被稱為小羅斯和白羅斯的土地，就不會有後來的莫斯科公國。《大綱》鼓勵讀者不要把沙皇的屬土只看成一個王朝國家或東正教國家，還應該把它看成一個民族。這是一個革命性觀念。

雖然《大綱》大力鼓吹俄羅斯民族的歷史以基輔為中心，又把沙皇治下的莫斯科公國人民和前不久還被波蘭—立陶宛共和國統治的羅斯人拉在一起，但這個新觀念會不會被接受完全無法保證。在莫斯科，這個觀念有一個強大競爭對手，那就是「舊禮儀派」信徒⁸⁶秉持

的另一種「俄羅斯」觀念—這些傳統主義者反對莫斯科東正教會推行的基輔路線創新，又陰謀推翻支持這種革新的在位沙皇。

陰謀集團的一位領袖是大司祭阿瓦庫姆，他一直呼籲沙皇維持和強化自己傳統羅斯人的身分認同和使用母語：「陛下您畢竟是俄羅斯人，不是希臘人。請說自己的母語，不要在教會、家裡或任何地方貶低它的地位。上帝愛我們的程度並不亞於愛希臘人。」⁸⁷阿瓦庫姆對基輔知識分子引入莫斯科的天主教元素反對得尤為激烈。這些知識分子的其中之一便是西緬，他在一六六四年定居莫斯科，成為阿瓦庫姆最重要的對手之一。阿瓦庫姆在一封公開信中寫道：「唉，可憐的羅斯人啊，為什麼你們要學習拉丁的風俗習尚而輕視你們的真正基督徒律法？」⁸⁸

如果說阿瓦庫姆的「俄羅斯」拒絕接受沙皇的至高無上地位，波洛茨克的「俄羅斯」卻是剛好相反。除了把宗教革新和民族意識引入莫斯科，基輔的知識分子還帶來了西方世俗文化的元素，體現在教育、文學、戲劇和視覺藝術。在彼得一世（這位沙皇在俄羅斯和西方歷史文獻中被稱為彼得大帝）之前，這些新元素從未受到沙皇這樣大力的支持。

一七〇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在烏克蘭哥薩克的波爾塔瓦附近的一片原野，兩萬四千名瑞典軍隊和五萬兩千名俄羅斯軍隊短兵相接，前者有六千名哥薩克和波蘭騎兵助陣，後者有兩萬多名哥薩克和卡爾梅克騎兵助陣。俄羅斯軍隊的主帥是精力旺盛的沙皇彼得·阿列克謝耶維奇，他是一六九六年開始成為莫斯科唯一的統治者，在那之前，他和異母兄伊凡五世共同執政。瑞典人的主帥是年輕但作戰經驗豐富的國王查理十二世。這場對戰將會決定「大北方戰爭」（一七〇〇至一七二一年）的最後勝負。在這場戰爭的過程中，瑞典和俄羅斯不斷變換盟友，使出渾身解數爭奪波羅的海地區的霸權。這一戰也會決定俄羅斯作為一個國家和一個帝國的未來。

一七〇〇年，即「大北方戰爭」的第一年，查理率領一支僅僅一萬出頭的部隊，在納爾瓦附近與一支近四萬人的莫斯科部隊對壘。他旗開得勝，損失不到一千人，俘虜了兩萬多名莫斯科戰俘，莫斯科方面則損失九千人。一七〇八年夏天，查理在中歐打敗其他敵人之後，再次揮軍西向。一開始，他打算取道薩克森直撲莫斯科，但隨著冬天快速逼近和補給品快速消耗，大軍轉而向南，朝烏克蘭推進，希望在那裡取得大量補給物資和過冬的住宿處。給他出這個主意的人是蓋特曼馬澤帕。馬澤帕原是沙皇的忠實盟友，直到一七〇八年十月才因為不滿彼得一世對待哥薩克烏克蘭的方式，倒戈改投查理陣營。其餘的哥薩克軍隊答應幾天或幾星期內與他會合。但彼得搶先一步，出兵烏克蘭，占領了哥薩克國的首都巴圖林，對居民進行一番屠殺後另立一個忠於莫斯科的蓋特曼。

在整個一七〇八年冬天和一七〇九年春天，查理、彼得和兩位烏克蘭蓋特曼—親瑞典的馬澤帕和親莫斯科的斯科羅帕斯基—都熱烈投入宣傳戰，爭取哥薩克軍隊和烏克蘭民眾的歸心。這場宣傳戰透露出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的價值觀和目標存在著重大分歧。沙皇彼得把馬澤帕的行徑詮釋為附庸國對宗主國的背叛。馬澤帕在回應中指出，他的效忠對象是家鄉土地而不是沙皇。根據他的詮釋，當前的政治衝突不是發生在宗主國與附庸國之間，而是發生在兩個民族之間。「莫斯科人，也就是說大俄羅斯民族，總是恨我們小俄羅斯民族。他們居心險惡，長久以來都是以把我們的民族推向滅亡為目的。」⁸⁹馬澤帕的另一個效忠對象是「小俄羅斯祖國」。彼得和他的書吏從不會從這個角度看待莫斯科。在在看來，只有小俄羅斯有一個民族和一個祖國，而沙皇和他的人民並沒有這兩種東西。但這種情況即將改變。

改變隨著俄羅斯一七〇九年六月在波爾塔瓦取得勝利而到來。這一次，俄軍不僅在兵力上占優勢。在決定與查理攤牌的幾年前，彼得便開始打造一支更專業的軍隊。這批新軍訓練有素而有朝氣，反觀瑞典軍隊卻是人困馬乏，他們在烏克蘭過冬時天氣冷得異乎尋常，而且常常受到親莫斯科的哥薩克人和農民偷襲。更不利的是，查理十二世

幾天前在一次偵察任務中受傷，無法親自上陣。由於領導混亂，瑞典人迷了路，最後也打了敗仗。戰爭結束後，查理和馬澤帕逃往鄂圖曼的附庸國摩爾達維亞尋求庇護。

彼得為這場勝利舉行了幾次慶祝大會，每次都包含精心策畫的儀式。第一個正式的祝捷大會在基輔舉行，時為一七〇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地點是古老的聖索菲亞大教堂。大會上，基輔學院校長普羅科波維奇發表了歡迎彼得的致詞，近五十年前，西緬曾對沙皇阿列克謝致詞，一七〇九年這一次換成另一位基輔學院的畢業生對阿列克謝的兒子彼得致詞。他在致詞中提到俄羅斯和俄羅斯民族，但對這些詞的理解要比西緬寬泛得多。在普羅科波維奇口中，「俄羅斯」是指沙皇統治的全境：「從我們的聶伯河開始南至黑海海岸，東邊從那裡直至裡海，甚至到達波斯王國的邊界，然後從那裡最遠到達中國……北至北冰洋海岸。」⁹⁰

在談到君主國、國家和民族時，普羅科波維奇一律以「俄羅斯」稱之。他又提到「全俄羅斯」（obshchenarodnoe / all-Russian）都因為波爾塔瓦大捷而歡騰。對普羅科波維奇而言，俄羅斯也是祖國，但這個祖國的範圍不再局限在馬澤帕的小俄羅斯祖國或彼得在波爾塔瓦大捷之前所理解者。更重要的是，普羅科波維奇稱彼得為這個新祖國的父親。早幾年前，普羅科波維奇也用同樣的詞來稱呼馬澤帕（稱之為「小俄羅斯人祖國的父親」）。在致詞中，普羅科波維奇稱彼得這位沙皇為「俄羅斯參孫⁹¹」，把俄羅斯祖國從滅頂之災中拯救出來，成就非凡，值得感念（他沒有像西緬那樣，把彼得看成是遠道而來的「東方沙皇」）。

彼得毫無疑問欣賞他聽到的這番致詞。幾年後，他邀請普羅科波維奇加入他的一項軍事行動。到了一七一七年，普羅科波維奇在聖彼得堡，已經成為俄國沙皇西化運動的主要理論家和推動者之一。他在朝廷上的影響力尤勝沙皇的另一位聯合教會顧問，波洛茨克人西緬。彼得是一個學得很快的學生，而且對普羅科波維奇的許多觀念和想法並非完全陌生。彼得的書信和詔書顯示出他對「祖國」（patria）一詞

的理解發生了轉變—在十八世紀的頭幾十年，祖國的意義從沙皇的個人祖產變成為一種所有莫斯科人共有的財產。

一七二一年，因著「大北方戰爭」的最後勝利，「參政院」和「宗教事務管理總局⁹²」—兩者都是彼得創立的諮詢機構—授予沙皇「全俄羅斯皇帝」的頭銜，以及「大帝」和「祖國的父親」兩項稱號。「全俄羅斯的沙皇」現在成為「全俄羅斯皇帝」。另外兩個稱號，「大帝」和「祖國的父親」（國父），和沙皇的成就相稱。由全體參政員簽署的奏摺表示：「陛下對我們祖國和全俄羅斯子民的造福世所共知。」彼得在回覆時提到了「民族」和「全體利益」的概念，宣稱：「我們必須努力爭取上帝擺在我們眼前的普遍福祉和繁榮，包括內部和外部的，那將可大大改善人民的命運。」²⁴

從強調「祖國」、「民族」和「公共利益」的觀念觀之，彼得和他的副手顯然精通國家論述的三昧。普羅科波維奇—他是第一個把這一類觀念引入朝廷的人—不僅出席了授予彼得新頭銜的典禮，還朗誦了和瑞典簽訂的《尼斯塔德和平條約》的內容，發表了一篇講道。隨後主持禮拜儀式的也是來自基輔的莫斯科代理牧首亞沃爾斯基。基輔人已經成功地把他們的西方觀念灌輸給彼得和他的朝廷。

彼得在一七二五年突然駕崩。他雖然在漫長的「大北方戰爭」取得勝利，卻來不及完成打造一個帝國型的新國家和具有民族意識的政治菁英階層。朝廷幾乎立刻廢除了他一些最大刀闊斧的改革。一七二八年，彼得大帝的孫子彼得二世在顧問團的建議下把首都從聖彼得堡遷回莫斯科；聖彼得堡是彼得大帝在一七一二年所建造，是他追求西化的雄心壯志的一大體現。大約同一時期，哥薩克蓋特曼的職位也在烏克蘭恢復過來。這些都是俄羅斯貴族想要回到前彼得大帝時代的指標。但潮流是無法逆轉的，在俄羅斯走向西化這件事情上尤其如此。彼得二世在一七三〇年去世，膝下無子，一眾朝臣把賭注押在彼得一世哥哥伊凡的女兒庫爾蘭公爵夫人安娜身上。她被「最高樞密院」—沙皇的諮詢機構，現在負責選擇新統治者的事務—邀請她登基，但前提是她要答應某些條件。

安娜對那些以為自己可以限制沙皇權力的人不以為然。沙皇乾綱獨斷的本質很快恢復過來，隨之恢復的是聖彼得堡作為帝國首都的地位，以及統治者對歐洲政治和文化模式的濃厚興趣。在俄羅斯人的歷史記憶裡，安娜在位的十年期間（一七三〇至一七四〇年），朝政是由一批外國顧問主導，最突出者是馮比倫，他在女沙皇還待在庫爾蘭的時期便是她的情人和寵臣。有關這個人及其家人有多麼無法無天的傳說在安娜統治結束很久之後繼續流傳。

安娜的統治讓朝廷的權力菁英普遍出現怨恨和反西方情緒。隨著安娜的駕崩和彼得一世的女兒伊麗莎白在一七四一年登上皇位，反西方的態度變成滔天巨浪。伊麗莎白為自己塑造出一個典型俄羅斯公主的形象，而把她推上權力高峰的則是「俄羅斯的忠實諸子」，即近衛軍的軍官。有一件簡單事實清楚標誌著這種風向的改變：伊麗莎白雖然就像安娜一樣終身未婚，但她最寵愛的情人並非「日耳曼人」，而是「俄羅斯人」。這人名叫羅祖姆，是烏克蘭的哥薩克人，按照當時的術語則是小俄羅斯人。他是靠著歌唱才華得以到聖彼得堡發展，在伊麗莎白登上皇位前便深受寵愛。她一登基便把羅祖姆封為伯爵，後來又封為元帥，他也把原來的哥薩克名字改為拉祖莫夫斯基。與馮比倫不同，拉祖莫夫斯基對朝政興趣缺缺，作風低調。朝廷中人稱他為「晚上的皇帝」。

伊麗莎白在位期間，任職朝廷的外國人數目大幅下降。率先起用外國人的沙皇是阿列克謝，到了他的繼承人彼得一世和安娜之時，朝廷的外國人更是多如過江之鯽。與政府不信任外國人態度相隨的是俄羅斯民族自信的空前升高。有關帝國歷史和文學語言的討論正是發生在伊麗莎白統治時期，而歷史和語言是近代歐洲早期所有國家「民族打造」工程的兩大要素。在彼得大帝的「全俄羅斯帝國」之外，將會出現一個「全俄羅斯民族」、一套「全俄羅斯歷史」和一種「全俄羅斯語」，這些過程都是發生在伊麗莎白一朝。

一七四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繆勒在聖彼得堡科學院發表題為〈俄羅斯人民和名稱的由來〉的演講。繆勒是日耳曼人，是在彼得一世所

創立帝國科學院的一七二五年應聘來到聖彼得堡。繆勒的演講並不順利，因為他指出，「羅斯」這個名稱和羅斯王朝都是源自斯堪地那維亞。這個結論應該會受到前幾個世紀許多莫斯科的統治者歡迎，包括恐怖伊凡，他認為自己的血緣可以透過留里克王朝上溯至羅馬皇帝奧古斯都，也認為自己是日耳曼人。但在一七四七年，繆勒的論證被認為不僅不愛國，還有損俄羅斯的威望。學院不讓他按照預定時間把演講講完，又任命了一個委員會調查他的研究。繆勒的演講掀起有關俄羅斯歷史的第一次學術辯論，辯論結果將會影響俄羅斯的發展長達數十年，甚至數百年。

聖彼得堡的愛國熱情在俄羅斯對瑞典的另一場戰爭（一七四一至一七四三年）之後更加高漲。但科學院對繆勒觀點的負面態度所反映的不僅是一次短命的愛國主義高漲。自伊麗莎白即位開始，帝國官員便非常關注科學院的愛國程度。一七四〇年代初期，學院大量裁員，被裁的大都是日耳曼人，他們去職後往往前往歐洲發表他們待在俄羅斯帝國期間所做的研究。這對科學院的威望是重大打擊，對俄羅斯學術研究品質的打擊尤甚。一七四四年，當局在科學院各大樓設置警衛，不讓外國人接近圖書館、檔案庫和研究資料。外國人不再受到信任。

兩年後，朝廷任命一位新院長干預學院事務。新院長基里爾·拉祖莫夫斯基是女沙皇最寵愛的情人的弟弟⁹³，才剛從哥廷根大學畢業，受任命時只有十八歲。在在看來，他年紀輕輕便被委以重任，是因為他和女沙皇關係親近，另外還因為他是科學院第一位「俄羅斯人」院長⁹⁴，在他之前的四任科學院院長都是外國人，而且科學院一直以來基本上都是由外國人主持、控制和管理。

於是，解決「歷史學危機」的責任便落在了基里爾和他的親密顧問捷普洛夫頭上，後者曾師從普羅科波維奇並在科學院兼職。他們任命了一個委員會調查和辯論繆勒的研究結果。在一七四九年秋天至一七五〇年春天之間，委員會開了二十九次會。這些會議上，反對繆勒最力的人是羅蒙諾索夫。他是俄羅斯北方漁民之子，主要成就是在化

學方面，但全民動員的新時代要求多才多藝，他於是從科學研究走向歷史研究和語言學研究，成為本土派一個業餘但大有影響力的支持者。羅蒙諾索夫指責繆勒只知歌頌「斯堪地那維亞人或說瑞典人」，而「對我們的歷史幾乎一無闡明」。在這個有關羅斯人起源的史學爭議上，基里爾站在羅蒙諾索夫一邊。繆勒已印好的論文被銷毀。

羅蒙諾索夫反對繆勒的論據主要來自一六七四年在基輔出版的《大綱》一書。這本書內容過時又常常有欠精確，但讓它之所以重要的卻是它的觀念而非它陳述的「史實」。這本論羅斯人民族起源的書最終不僅在俄羅斯找到出版者，還大受讀者歡迎。俄羅斯讀者欣賞它把焦點放在民族的起源，不像其他作品只著重國家和王朝的起源。羅蒙諾索夫建議科學院採納《大綱》作為標準歷史教科書。在接受它對羅斯人起源的歷史解釋以外，羅蒙諾索夫還熱烈欣賞它的歷史神話部分：大俄羅斯和小俄羅斯有著一體性，兩者都是中世紀基輔羅斯的繼承者，因此和西歐判然有別。

新的「全俄羅斯民族」不僅需要一部共同歷史，還需要一種共同語言。彼得一世實行的改革讓西方影響力長驅直入，一個明顯表徵就是大量吸收西方的語言（主要是德語）。另一項較不明顯的西方舶來品是以白話文創作文學的做法。在這之前，文學使用的基本上是「教會斯拉夫語」，它是中世紀向斯拉夫人傳教的基督宗教傳教士所創造，後來被用作東正教斯拉夫土地上的宗教儀式語言和純文學語言；所謂的東正教斯拉夫土地包括莫斯科公國和波蘭—立陶宛共和國境內的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地區。這種語言讓大俄羅斯、小俄羅斯和白羅斯連結在一起，但它是一種屬於過去而非未來的語言。彼得創立的官僚組織需要一種新的世俗化的語言來治理國家。原有的官僚系統使用的語言，同樣主要以教會斯拉夫語為基礎，無法符合這個要求。因此，彼得一世推出了一種簡化的（民用的）字體，又常常鼓勵下屬和西方作品的翻譯者行文盡可能淺白，避免教會斯拉夫語的高古風格。

但在女沙皇伊麗莎白時代湧出的愛國熱情卻挽救了教會斯拉夫語的衰落：一夜之間，它從一個頑固守舊的形象變成了民族身分的堡壘

和真正俄羅斯人本色的象徵。就像有關羅斯人起源的歷史爭議那樣，科學院也對俄羅斯語言的未來進行了辯論。辯論兩造的主要代表都是俄羅斯文學大家，一位是特列季亞科夫斯基，一位是蘇馬羅科夫，兩人都身兼詩人和劇作家身分。充當裁判的是院長基里爾。特列季亞科夫斯基本來贊成俄羅斯書面語的現代化和白話化，但在伊麗莎白統治期間卻改變了主意。他這樣質問：「既然我們擁有斯拉夫—俄羅斯語這麼豐富寬宏的語言，為什麼要自甘接受法語的貧乏和局限性？」⁹⁵蘇馬羅科夫則對俄羅斯文學中的教會斯拉夫語遺產—事實上等於基輔遺產—大肆撻伐。在談到普羅科波維奇的時候，他這樣寫道：「這位賢人，天生／有著斯拉夫人的美好品質／但論文采／卻沒寫出過任何像樣的詩。」⁹⁶

一七四八年秋天，蘇馬羅科夫把劇作《哈姆雷特》提交給科學院，接受出版前審查。身為科學院的教授，特列季亞科夫斯基指出這齣戲劇的風格瑕疵多多。他寫道：「風格的參差不齊明顯地貫穿全劇，那就是，有時表現出比斯拉夫語還高的戲劇性，有時則是降格為比悲劇還悲劇性的市井俚語。」⁹⁷這次的審查讓蘇馬羅科夫和特列季亞科夫斯基之間的衝突公開化，攸關的是兩人在新興的俄羅斯文壇的巔峰地位和未來的俄羅斯文學作品會用何種語言創作。特列季亞科夫斯基捍衛根植於教會斯拉夫語的高古風格，蘇馬羅科夫則想要一種盡可能貼近大俄羅斯白話的文學語言。

在這場爭論中，羅蒙諾索夫採取的是折衷態度。他先是主張繼續使用教會斯拉夫語作為發展俄羅斯文學的基礎。就像特列季亞科夫斯基那樣，他認為俄羅斯語的根本是在基輔羅斯的語言，稱讚它是一種豐富、美麗和有利的語言。另一方面，羅蒙諾索夫雖然捍衛斯拉夫語和與之相關的文學傳統，他同時也想方設法容納以白話創作的趨勢。透過發展出一套「三種文學風格」理論，他成功調和了兩種不同文學語言的方法：第一種風格稱為「高古風格」，用於寫史詩、頌詩和詩歌，應該用教會斯拉夫語和俄羅斯文學常用詞彙創作；「中間風

格」，用於戲劇作品，應該以白話創作，但要避免俗語；第三種風格是「較低風格」，用於喜劇，容許使用市井之徒和農民的語言。

羅蒙諾索夫在出版於一七五七年的斯拉夫語語法書的序言裡指出，俄羅斯語同時兼具「西班牙語的莊嚴，法語的活潑，德語的穩重，義大利語言的美，以及希臘語和拉丁語的豐富精準」⁹⁸。這種說法完全沒有新意，因為它幾乎是照抄卡魯在《論英語的卓越》（一六〇五）一書裡對英語的禮讚。然而，與卡魯不同的是，羅蒙諾索夫所稱讚的語言是一種正在掙扎著要迎接現代世界挑戰的語言，語法和語彙仍處於低度發展。然則，他對俄羅斯語未來的樂觀心態是從何而來？答案從他對日耳曼歷史的評論明顯可見：「只要拉丁語一天是日耳曼禮拜儀式的用語，德語就必然會繼續貧乏、簡陋和無力。後來，隨著日耳曼人開始讀德語聖經和用德語做禮拜，德語的豐富性便以倍數成長，也出現了一些技巧高明的作家。」根據這一點，我們也許可以推論，拜俄羅斯人語言和教會斯拉夫語緊密相關之賜，它用不著經歷德語經歷過的痛苦過程便可以脫胎換骨，因為教會斯拉夫語讓俄羅斯人從未臣屬於某種外國語言而且使它變得偉大。

十八世紀中葉有關語言的討論和一個問題直接相關：大俄羅斯語和小俄羅斯語—今天分別稱為俄羅斯語和烏克蘭語，何者應該在俄羅斯帝國的文化中占有主導地位？蘇馬羅科夫認為應該是前者，他因此指責特列季亞科夫斯基不應按小俄羅斯語的習慣把姓氏拼寫為 Tred'iakovskoi，而是應該拼寫為 Tred'iakovskii。他聲稱，特列季亞科夫斯基此舉是給「自己的世系名字一個小俄羅斯語的結尾」。另一個重要爭論是字母r的正確發音。教會斯拉夫語對這個字母的發音更接近烏克蘭語的 /h/，俄羅斯語的發音則接近 /g/。羅蒙諾索夫為此寫了一首詩，教導讀者哪些單字的r字母應該發 /g/ 音，哪些應該發 /h/ 音。

就像羅蒙諾索夫其他妥協的部分一樣，這項妥協的效果為時短暫。大俄羅斯的語法、詞彙和語音都發展緩慢，但它仍然讓小俄羅斯語在俄羅斯文學語言的接受度遠低於十八世紀初葉。當然，在朝廷服務的烏克蘭人例如薩莫伊諾維奇、波萊特卡和其他基輔學院的畢業

生，想要駕馭新的俄羅斯文學語言一點都不困難，但那樣做的話，他們便不得不放棄自己習慣的語言，從而動搖了兩個語言傳統一向以來和平共處的局面。

到了十八世紀中葉，基輔知識分子的心態已經和當初波洛茨克人西緬在其城市稱頌沙皇阿列克謝，並首次將他稱為一個解放「俄羅斯民族」的「東方沙皇」時相去甚遠。在這個世紀的進程中，他們成功地把西方元素，往往是民族論述或說準民族論述注入官方論述中，最終也注入了莫斯科權力階層的思維方式中。他們同時協助創造出一套「全俄羅斯」的歷史論述，並對一種「全俄羅斯」的帝國語言的形成有所建樹。他們正是在莫斯科公國把自己重塑為俄羅斯帝國之時做這件事。帝國和民族的混為一談，以及不同族群共用一把「俄羅斯民族」大傘的現象，將會持續幾個世紀。

81 「小羅斯都主教教區」於一三〇三年設立，加利奇是「加利奇和沃里尼亞公國（一一九九至一三四九年）」的首府，統治者尤里二世於一三三五年自稱小羅斯公爵，一三四七年廢除此封號。

82 這個詞衍生自「羅斯」（Rus'）。

83 指波洛茨克。這個小城很長時間是由立陶宛統治，一五六三年由恐怖伊凡取得，一五七九年被波蘭奪回，一六五四年三月被俄軍「解放」。

84 Simeon Polotskii, Virshi, eds. V. K. Bylinin and L. U. Zvonareva (Minsk, 1990), 27-33.

85 這個字詞是對波蘭王國境內「羅斯人」（Rus' people）的稱呼。

86 「舊禮儀派信徒」（Old Believers）指一六五〇年代拒絕尼康牧首進行含教義和儀式修改的宗教改革，堅持舊禮儀的信徒。

87 Pavel Miliukov, Ocherki po istorii russkoi kul'tury (Moscow, 1995), 53.

88 Vasilii Kliuchevskii, Russkaia istoriia (Moscow, 2013), 184.

89 Serhii Plokhy, The Origins of the Slavic Nations: Premodern Identities in Russia, Ukraine, and Belarus (Cambridge, 2006), 337.

90 同上，272.

91 參孫是聖經中的以色列大力士，曾經摧毀敵人，拯救了自己的民族。見《士師記》十六章。Elena Pogosian, Petr I—Arkhibektor rossiiskoi istorii (St. Petersburg, 2001), 226.

92 一七二一年，彼得大帝在時任莫斯科牧首阿德里安（Adrian）過世後取消了牧首一職，設置宗教事務管理總局（Synod）取代其職能。該機構由沙皇任命的多位主教和俗人官員組成。

93 以下為區分他和他哥哥，提到他的時候都稱為基里爾。

94 前面提過，嚴格來說他們家是烏克蘭的哥薩克人，或說小俄羅斯人。

95 Vasilli Trediakovskii, Izdrannye proizvedeniia (Moscow, 1963), 523.

96 A. P. Sumarokov, Izbrannye proizvedeniia (Moscow, 2015), 27.

97 Boris Uspenskii, Izbrannye trudy (Moscow, 1994), vol. 2, 294.

98 Mikhail Lomonosov, Ob obrazovanii i vospitanii (Moscow, 2014), 168.

第二篇 羅斯的重新統一

第四章 開明女皇

一七六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蘇菲亞·弗雷德里卡·奧古斯塔搖身一變，成為俄羅斯女皇凱薩琳二世。事情開始於當天一大早：當時她聽說某個陰謀推翻彼得三世和擁立她的軍官被捕。所以，她自己照理也會很快被逮捕，甚至有可能被處決。她和顧問團決定立即採取行動，發起計畫已久的政變。彼得三世不在聖彼得堡，所以凱薩琳立即離開位於聖彼得堡近郊的彼得霍夫行宮，馳往首都。她在聖彼得堡受到近衛軍的歡迎，因為他們的司令官都參與了推翻彼得三世的陰謀。軍隊站在她這一邊。幾天後，凱薩琳的不幸丈夫彼得三世被效忠皇后的軍隊包圍，別無選擇下只得遜位。他在不到十天後死亡，死因可疑。

雖然政變是經過充分準備而且取得成功，但仍然需要有站得住腳的理由。凱薩琳畢竟是個十五歲才嫁來俄羅斯的日耳曼公主，甚至說話仍然帶著德語口音，違反了每一條繼位的規定。所以，她必須證明自己可以比丈夫—彼得大帝的外孫—更加勝任當個沙皇。六月二十八日，一份代表凱薩琳說話的宣言聲稱，她發動政變是為讓俄羅斯不致陷入滅頂之災：「俄羅斯祖國的正直諸子都完全意識到，整個俄羅斯國家正面臨著一個深重危機。」⁹⁹宣言的執筆者主要是依靠宗教論據，聲稱凱薩琳乃是比彼得更為真誠的東正教基督徒。彼得三世被說成計畫把國教從東正教改為路德教派。「如果改變在俄羅斯歷史久遠的東正教，採納一種異端信仰，我們的希臘教會就會暴露在最大的危險之下。」

根據凱薩琳自己的說法，這篇宣言是臨時起草。但也有學者認為，它是早就準備好的。不管是哪種情況，它都反映出當時俄國人思維方式的一些重要成分：有鑑於俄羅斯國家和東正教教會關係緊密，對兩者任一的威脅都讓「祖國的諸子」有權推翻一個本來有著合法性的君主。想要避免重蹈丈夫的覆轍，凱薩琳二世有必要證明自己對俄

羅斯忠誠和有用。她以讓人佩服的方式做到這一點，並因此贏得海內外稱她為「大帝」。

凱薩琳統治俄國長達三十五年（一七六二至一七九六年）。彼得一世和伊麗莎白時代稍具雛形的帝俄民族，在這段期間有了新的動力和特徵。可以預見，凱薩琳既然是個外國出生的公主，她登上皇位後自然會更強調俄羅斯人身分認同中的公民成分而不是民族成分。民族、國家和祖國這些概念向親西方和留學外國的女皇顧問小圈子之外傳播。公民觀念也在凱薩琳統治期間進入俄羅斯的論述。在伊麗莎白時期形成的以民族為中心的俄羅斯人身分模式被轉化為公民對帝國的忠誠。啟蒙運動的觀念（凱薩琳是這個運動的學生和仰慕者）轉化了眾人對帝國的理解，不再視之為由世襲特權保障的一些領土的拼湊，而是視之為倚賴管理一致性來維繫的中央集權國家，哪怕它仍然以民族和宗教多樣性自豪。

凱薩琳在一七八五年發表的另一篇宣言裡道出她對帝國和民族的關係的觀點，確認了俄羅斯貴族有權不為國家服義務役。宣言稱：「在帝國的真正光榮和偉大中，嚐到了我們子民努力耕耘的果實滋味——他們是服從、勇敢、無畏、進取和強大的俄羅斯人民。」¹⁰⁰這篇宣言對誰才是俄羅斯祖國的真正「諸子」說得明明白白：「從它創建至今的八百年來，俄羅斯一直在自己的諸子中找到指揮官和領導者。不管過去、現在還是未來，在上帝的幫助下，俄羅斯貴族都表現傑出，讓自己有資格成為傑出的領導階層。」因此，貴族是俄羅斯民族的先鋒隊，而俄羅斯民族是帝國的主導力量。

在一七六二年幫助凱薩琳登上權力巔峰的真正的祖國諸子之一是帝國科學院院長基里爾·拉祖莫夫斯基，他現在也是聶伯河左岸哥薩克國的蓋特曼。沒有人不知道基里爾的政治忠誠對象，因為凱薩琳政變後的第一篇宣言就是由科學院印刷和發行。當新登基的女皇論功行賞時，他是第一批獲得封賞的人。我們不知道他有沒有代表科學院要求一些什麼，但知道他為自己的哥薩克國求了相當多恩典。在哥薩克

本地官員的支持下，他計畫加強哥薩克國的自治和機構。哥薩克國的很多居民都預期他們的自治政體會迎向光明的未來。

一七六二的秋天，即凱薩琳加冕幾個月後，哥薩克國書吏迪沃維奇在首府格盧霍夫寫了一首長詩，題為《大俄羅斯和小俄羅斯的談話》。其中一段如下：

大俄羅斯：

你知道你正在與誰說話嗎，抑或你已經忘記了？

我畢竟是俄羅斯，難道你可以不把我當一回事嗎？

小俄羅斯：

我知道你是俄羅斯，但那也是我的名字。

你為什麼要威嚇我？我一直設法擺出一張勇敢的臉。

我不是臣服於你而是臣服於你的最高主宰，

你是在其蔭底下由你的祖先所生。

不要以為你是我的主人：

你和我都是受同一個最高主宰統治。

這首詩表現的願景是：那個被稱為小俄羅斯的哥薩克國和巨大的俄羅斯帝國將會只是名義上統一在一起，而從彼得一世開始幾位沙皇加諸它的自治權壓縮會統統解除。這種願景沒有給一個共同的國家、共同的民族或共同的祖國留多少餘地。在哥薩克國的首府，人民對這種前景滿懷希望，而他們的這種希望最初看來也是有憑有據。凱薩琳統治初期對忠心耿耿的基里爾和小俄羅斯的菁英階層做出少許讓步，包括在一七六三年恢復傳統的宮廷制度。但哥薩克的官員會議要求更多，而基里爾還提出了額外要求：他希望蓋特曼職位改為世襲，永遠由自己的子孫繼承。

凱薩琳雖然感激基里爾的擁戴之功，但這種感激不是無限的。她對他的要求反應迅速。一七六四年，她把基里爾召到聖彼得堡，隨即解除他的蓋特曼職位，但稍後又給予他元帥稱號作為補償。她更重要的手段是完全廢除蓋特曼職位。這是對哥薩克首領職位的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清算，前兩次分別發生在彼得和安娜時期。凱薩琳將要再花上二十年才能消滅哥薩克國的所有機構，包括其軍管區系統，但這位女沙皇有的是時間和決心。對她來說，重中之重在於她能否打造出一個完全由中央發號施令和根據啟蒙運動原則統治的帝國。在漫長歷史過程中累積出來的各種慣例和特權將要屈服於井然有序和均質化的官僚規範。

雖然雄心勃勃，但凱薩琳知所謹慎，採取漸進步驟去落實她的新法。一七六四年二月，即取消蓋特曼職位的幾個月前，凱薩琳寫信給帝國立法、司法和行政機關參政院的院長和她的政治警察（祕密警察）頭子維亞澤姆斯基：「小俄羅斯、利沃尼亞和芬蘭都是享有特權的省分，不宜馬上廢除。但稱它們為外國土地和根據這個基礎與它們打交道則不僅大錯特錯，更是蠢不可及。對這些省分和斯摩棱斯克的俄羅斯化應該盡可能柔和，好讓它們不會像狼那樣望向森林……廢掉小俄羅斯的蓋特曼之後，應該盡一切努力去抹掉眾人對蓋特曼時期的記憶。另外找個人來當蓋特曼更是萬萬不可。」[101](#)

凱薩琳先是把哥薩克國改為小俄羅斯省，然後又把它分割為基輔、切爾尼戈夫和諾夫哥羅德－謝韋爾斯基三個總督轄區（vicegerency）。廢除哥薩克國和逐步取消它的各種機構意味著幾代烏克蘭知識分子的夢想—小俄羅斯和大俄羅斯平起平坐—壽終正寢。一旦併入帝國的行政體系，原來的哥薩克國在巨大的俄羅斯國家的映照下頓時成為侏儒。在十八世紀末葉，帝國一共有五十個總督轄區，其中只有三個原屬哥薩克國。隨著哥薩克政體特殊地位的喪失，它的官員階級也被整合到俄國貴族之中，被認為應該致力於為「全俄羅斯民族」的利益服務。小俄羅斯人繼續依戀自己的傳統家園，也繼續稱之

為「祖國」，但對他們大部分人來說，忠於自己的歷史祖國和忠於俄羅斯帝國不再構成一種矛盾。

因此，原哥薩克國繼續為帝國提供幹部。許多年輕的哥薩克官員受到凱薩琳重用，在聖彼得堡位居要津，別茲博羅德科和札瓦多夫斯基都是個中例子。別茲博羅德科擔任女皇的祕書，最終成為帝國外交政策的設計者之一；札瓦多夫斯基成為主管帝國教育系統的最高官員。女皇一樣少不了基輔學院的畢業生，這批人自彼得大帝時代以來就一直主張俄羅斯是一個歐洲國家。不過，被彼得一世召喚到首都的都是神職人員，凱薩琳青睞的卻是世俗菁英。因為基輔學院的畢業生精通拉丁語，所以被認為是接受醫生訓練的理想人選。凱薩琳時代的御醫有百分之六十是烏克蘭人。

在帝國的知識菁英之中，烏克蘭人占有顯著比例。科齊特斯基、魯班和圖曼斯基都是在哥薩克國土生土長，後來成為俄羅斯第一批期刊的出版者。科齊特斯基是凱薩琳的祕書之一，曾經代表女王創辦期刊《萬象》（一七六九至一七七〇年）；魯班創辦了《古與新》（一七七二至一七七三年）；圖曼斯基在更後來出版了俄羅斯帝國境內第一本歷史期刊《俄羅斯雜誌》（一七九二至一七九四年）。他們都是最早的「民族主義者」，有功於打造冒起中的俄羅斯民族認同，擁抱新的俄羅斯文學語言並讓民族與帝國的關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有些學者估計，在促進俄羅斯民族觀念的「俄羅斯人」當中，有多達一半是「小俄羅斯人」或說烏克蘭人。

一七七二年秋天，軍事學院校長切爾內紹夫率領俄羅斯陸軍越過波蘭／俄羅斯邊界，沿著聶伯河和道加瓦河占領了一些新的據點。其中，諸如波洛茨克、維捷布斯克、姆斯齊斯拉夫和莫吉廖夫之類的小城從十七世紀中葉之後就沒有見過俄羅斯部隊，但此時卻忽然地落入俄羅斯的統治之下。這個對白羅斯東部的占領，其實是一場更大軍事行動的一部分：該軍事行動史稱「第一次瓜分波蘭」，是由俄羅斯、奧地利和普魯士在那一年聯手炮製。

瓜分波蘭之舉在一七六二年便有苗頭。當時，波蘭—立陶宛共和國碩果僅存的東正教大主教科內斯基從莫吉廖夫去到莫斯科，參加慶祝凱薩琳加冕的活動。慶祝活動的最後一日（一七六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在致詞時為自己被迫害的教會請命，指出上帝會饒過凱薩琳一命，除了為了讓她可以捍衛俄羅斯的信仰和祖國，還為了讓她可以捍衛俄羅斯以外的東正教徒。他又這樣說：「陛下的子民都在慶祝您讓人歡欣的加冕，而白羅斯人同樣要透過我—您的一個子民—向您獻上最竭誠的祝福。」¹⁰²當時，俄羅斯帝國和波蘭—立陶宛共和國的東正教為一體的觀念在帝國的官方論述裡已經牢牢確定，但「白羅斯人民」也是女皇「真正或潛在子民」這種觀念卻是新東西，意義完全不同。這種觀念是十七世紀中葉才首次見於俄羅斯的論述：當時沙皇的頭銜裡加上了「白羅斯」三字。

科內斯基期盼「白羅斯民族」獲得保護，在俄羅斯軍隊一七七二年占領白羅斯東部之後獲得了實現。在莫吉廖夫，教堂鐘聲連續響了一天一夜，以代表對凱薩琳宣誓效忠。一七七三年三月，人在聖彼得堡的科內斯基向凱薩琳獻上感激之意：「我發現自己猶如那些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員，猶如那些獲釋回到錫安的巴比倫囚徒一員，猶如君士坦丁時代的基督徒一員。」¹⁰³凱薩琳不僅對波蘭控制下的「白羅斯民族」提供保護，還直接把他們置於她的統治之下，使科內斯基和他的同胞都成了俄羅斯子民。但他其實感謝錯人了，因為真正把他的人民從「埃及囚徒」狀態解放出來的不是俄羅斯的凱薩琳二世，而是普魯士的腓特烈二世。

自從波爾塔瓦戰爭（一七〇九年）之後，俄國就實質上控制了波蘭—立陶宛共和國的事務。所以，如果它有任何領土受到其他強權吞併，都不符合俄羅斯的利益。但是，瓜分波蘭—立陶宛卻斷然符合其他歐洲強權的利益。普魯士國王一直熱烈希望可以得到波蘭控制的西普魯士，以便把布蘭登堡和東普魯士連接起來，所以，他在十八世紀初葉首先建議瓜分波蘭。波蘭積弱不振，是接壤強權的眼中肥肉，而雖然俄羅斯帝國一直反對瓜分波蘭的主張，但最終形勢比人強。

轉折點出現在一七七一年。當時，奧地利驚見俄羅斯連連打敗鄂圖曼帝國，決定與後者結盟。為了避免和奧地利發生衝突，聖彼得堡決定屈服於普魯士的壓力，同意三分波蘭—立陶宛共和國。一七七二年二月十七日，普魯士和俄羅斯在聖彼得堡簽訂協議，相約瓜分波蘭部分領土。同年八月五日，奧地利也在俄羅斯首都簽署了三方協議。協議中，普魯士分得它最想要的西普魯士，奧地利分得加利西亞東部，奧地利將中心城市利沃夫改稱倫貝格，俄羅斯分得立陶宛和白羅斯部分土地。

一七九三年第二次瓜分波蘭時，俄羅斯仍然是個勉為其難的參與者。不過，殘餘的波蘭—立陶宛共和國的發展（一七八〇年代和一七九〇年代初期還在華沙控制下），對俄羅斯在該國的利益構成了明顯威脅。話說還是一七九〇年的時候，波蘭和普魯士簽署了一份把俄羅斯排除在外和對俄羅斯潛在不利的共同防禦協定。該協定終結俄羅斯作為波蘭王國保護人的地位。雪上加霜的是，成立四年的波蘭議會（一七八八年在華沙成立），推出了多項旨在現代化波蘭的國家改革，並在一七九一年五月三日通過一部憲法。這部憲法加強了國王的地位和權力，取消了議會必須採取全數決的規定，並確立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上的三權分立。這些消息對俄羅斯來說都不是好事，因為波蘭實行的改革不僅削弱了俄羅斯操縱波蘭政治的力量，還會促進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後一個威脅讓凱薩琳忘記了很多她在啟蒙時代的舉措，而變得對任何會危及其專制統治的事情都採取敵視態度。

第三次「瓜分波蘭」發生在一七九五年，離第二次僅僅兩年，動機是鎮壓由科斯丘什科率領的波蘭起義。科斯丘什科是波蘭軍事指揮官，在白羅斯土生土長。俄羅斯派出最好的軍事指揮官蘇沃洛夫鎮壓叛軍。普魯士人也派出部隊，科斯丘什科在這兩個強權的聯手下被打敗。戰後，俄國、普魯士和奧地利瓜分了波蘭剩下的領土。這一次，俄羅斯的戰利品再次明顯多過普魯士和奧地利—後二者分到的面積加起來不到五萬平方公里，俄羅斯分到的卻是十二萬平方公里。三次加起來，俄羅斯一共得到前波蘭百分之六十六以上的領土。它的新邊界

包括立陶宛的全部，這包含其首都維爾紐斯及其波羅的海海岸線、白羅斯的布列斯特，以及烏克蘭沃里尼亞小城盧茨克和弗拉基米爾。至此，幾乎所有的烏克蘭和白羅斯土地都落入聖彼得堡控制之下，唯一例外是烏克蘭的加利西亞，它仍然被維也納掌握在手心。

在俄羅斯帝國的官方史書裡，瓜分波蘭通常被稱為「羅斯的重新統一」一言下之意是，除立陶宛之外，所有在「瓜分波蘭」中被俄羅斯兼并的土地原都是由東斯拉夫人定居，而他們在許多世紀以前曾是基輔羅斯的子民。俄羅斯帝國會按族群標準選擇併吞這些土地完全不是出於偶然，而是反映著俄羅斯的「民族想像」在凱薩琳統治期間發生了變化。

即使凱薩琳是為情勢所逼才會參與瓜分波蘭，但她所選擇兼并的領土仍然可以反映出俄羅斯權力菁英階層這時的歷史、宗教和民族認同。

俄羅斯第一次瓜分波蘭時沒有任何歷史考量，純粹是為了得到一條清晰分明和容易防守的邊界。這條新邊界由聶伯河、道加瓦河和它們的支流構成，而取得它的構想是軍事學院校長切爾內紹夫在一七六〇年代早期所提出。但俄羅斯和普魯士在一七七二年一月簽訂的瓜分協議卻是引用歷史理由而非戰略理由要求得到這批土地。用俄羅斯語和普魯士語雙語寫成的協議有這麼一段話：「全俄羅斯的女皇陛下和普魯士的國王陛下承諾對彼此做出最正面的協助，以便利用當前的環境為他們在這些波蘭地區取得他們古老的權利。」¹⁰⁴

奧地利女皇瑪麗亞·德蕾莎一樣是用歷史理由作為領土要求的基礎：「女皇陛下命令她的軍團進入波蘭，指示他們占領那些可以恢復她原有權利的地區。」¹⁰⁵德蕾莎討厭「瓜分」這個字眼，認為它暗示整件事情沒有正當性，所以想辦法尋找歷史根據。然後她查到，中世紀的匈牙利諸王曾聲稱加利西亞—沃里尼亞（Galicia-Volhynia）公國為其世襲財產。由於奧地利的皇帝被認為是匈牙利諸王的繼承人，新獲得的領土遂被稱為加利西亞—洛多梅里亞（Galicia-Lodomeria）王

國。Lodomeria 是 Volodymeria 的拉丁化拼法，而 Volodymeria 是指沃里尼亞的首都沃洛基米爾。當時，沃洛基米爾仍然處於波蘭控制，還沒有被奪去。

夠奇怪的是，第二次和第三次的瓜分都沒有訴諸歷史權利。然而，俄羅斯在這兩次兼併到的土地恰恰是它最有資格訴諸歷史權利的部分。只要可能，這兩次的兼併也盡量以河為界，不過也加入了歷史、宗教和族群的考量。在第二次瓜分波蘭之後，凱薩琳下令打造紀念章誌慶。紀念章上有著帝國紋章的雙頭鷹，兩隻鷹爪各抓著一幅俄羅斯地圖，一幅包含一七七二年兼併的土地，另一幅包含一七九三年兼併的土地。頂部附有銘文：「朕恢復了那些被強奪去的部分。」言下之意是，凱薩琳只是要回了一些原屬俄羅斯但一度被人用武力奪去的土地。

凱薩琳會認為俄國擁有這些土地的主權，是基於她對俄羅斯歷史的研究。這一點清楚顯示在她為兩個孫子所寫的《俄羅斯歷史筆記》一書—這兩個孫子一個是亞歷山大（未來俄國沙皇），一個是康斯坦丁（未來的波蘭國王¹⁰⁶）。書中涵蓋了一大段基輔羅斯的歷史，又頗為詳細地交代了羅斯諸王公和波蘭人的關係，包括雙方之間的許多次戰爭。毫無疑問，凱薩琳希望獲得從前基輔羅斯的所有領土，包括加利西亞，雖然該地區已經在第一次瓜分波蘭時被奧地利分去。第二次瓜分波蘭沒多久之後，她對她的一位祕書表示：「假以時日，我們應該從皇帝那裡把加利西亞交換回來：加利西亞對他沒有用。」¹⁰⁷不過，她自始至終沒有得到加利西亞，但堅持在第三次瓜分中要得到沃洛基米爾。此舉等於不讓奧地利皇帝約瑟夫二世得到沃里尼亞，而奧地利人一直聲稱沃里尼亞是他們繼承自匈牙利諸王的遺產（加利西亞和洛多梅里亞）的一部分。最後，奧地利人只得到了包括克拉科夫和盧布林在內的「小波蘭」，但他們聲稱這些土地實際上就是「西加利西亞」。

看來，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瓜分波蘭期間，凱薩琳看事情的角度起了某些重要變化。在第一次瓜分，她不介意奧地利得到加利西亞。但

在第二次瓜分，她卻想要把加利西亞據為己有。對俄羅斯的歷史有更多認識斷然是她改變心思的原因之一（這位女沙皇是在一七八〇年代某個時間寫出《俄羅斯歷史筆記》）。不過，可能還有其他原因。現在，凱薩琳不僅從歷史和宗教角度看待新獲得的土地，還從民族的角度看待。一七九二年十二月，在同意第二次瓜分波蘭的提議之後，她寫信告訴駐華沙大使，她的目標是「解放曾經屬於俄羅斯的土地和城鎮，它們是由我們的親族和有著相同信仰的人所建立和居住，而他們一直受到腐敗和壓迫的威脅」¹⁰⁸。所以，她不僅主張奪回原屬於俄羅斯的土地，還要拯救有著相同宗教背景的同胞族人脫離迫害。

誠然，凱薩琳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方式變得眾所周知，也成為第二次瓜分波蘭的官方政策。俄軍收平科斯丘什科的叛亂之後，聖彼得堡舉行了大肆鋪張的慶祝，這一次除了有宗教儀式之外，還鳴放禮砲；第二次瓜分的慶祝儀式並不包含禮砲。凱薩琳二世相信波蘭—立陶宛共和國的東正教人口（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和俄羅斯人同出一源，但她對波蘭人卻沒有同胞感情。在一七九二年十二月寫給駐華沙大使的同一封信中，凱薩琳對於同宗的斯拉夫人的態度非常正面，但對波蘭人卻極盡痛罵之能事：「揆諸過去的經驗和當前見於波蘭的狀況和態度，亦即它所表現的輕浮和反覆，它對我們流露的敵意和仇恨，又特別是它對發生在法國的墮落和暴力事件¹⁰⁹的肯定態度，我們除非把它削弱至極度的軟弱無能，否則我們永遠不可能有一個愛好和平或者用不著擔心的鄰居。」¹¹⁰

在蘇沃洛夫一七九四年十一月占領華沙之後，這種視波蘭人為敵人和視烏克蘭人及白羅斯人為自己人的觀點在俄羅斯的論述裡變得具有主導性。一七九二年十二月，政府發布一個宣言，其執筆者雖然是女皇的首席外交政策顧問別茲博羅德科，卻反映（有時幾乎是一字不差地反映出）凱薩琳在上述信件表達的觀念。宣言說：「女皇陛下已經恢復了自古便屬於她的帝國的領土，它們是在混亂時期被波蘭人中一些奸惡之徒強奪去—今日一樣有這樣的波蘭人，意在讓俄羅斯不得安寧。這些土地的居民和我們有著相同血統和相同信仰，前此一直因

為他們的虔誠信仰備受壓迫。」¹¹¹對於波蘭人，別茲博羅德科這樣寫道：「波蘭人的陰險完全顯露在他們企圖消滅俄羅斯部隊，哪怕俄羅斯部隊只是根據聯盟的條約和平地駐紮在華沙。全體波蘭人，不分老少，在這凶惡的罪行中人人有份。」

御用詩人全都踴躍表態。第二次瓜分後曾經稱波蘭人為「俄羅斯密友」的詩人彼得羅夫此時改口，把他們稱為嗜血的怪物：

踐踏過神聖的權利之後，

他們又威脅要掠奪和夷平禮拜堂，

好用外國人的財產滿足他們

貪婪的手、貪婪的嘴和貪婪的胃。¹¹²

在凱薩琳統治的大部分時期，俄羅斯人都是用宗教標準定義波蘭—立陶宛共和國的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即把他們定義為東正教徒。不過，在俄羅斯人新獲得的波蘭土地上，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白羅斯民族」卻不是東正教徒。不僅波蘭或波蘭化貴族和猶太人是這樣—前者是天主教徒，後者完全不是基督徒，就連大部分東斯拉夫人都是聯合教會信徒。俄羅斯在第二次瓜分所得到的土地上，只有三十萬人信奉東正教，超過兩百萬人是聯合教會信徒。至於第三次瓜分得到的土地甚至幾乎沒有東正教徒。

一七九四年四月，凱薩琳為糾正這種局面，發起一場官方運動，要把聯合教會信徒轉化為東正教徒。她這個決定是由二十八個右岸烏克蘭¹¹³村莊代表聯名的陳情書所觸發—自一七六八年的起義之後，右岸烏克蘭就是東正教和聯合教會的戰場，他們表示想要放棄聯合教會信仰，改皈依東正教。凱薩琳不僅答允請求，還建議在其他聯合教會堂區比照辦理—必要時可以動用武力。一封應她的要求發出的牧函這樣說：「在俄羅斯的混亂時期，有一大批它的子民在波蘭人的牛軛下被強奪原有的希臘東正教信仰……是歷來對信仰自由的最大壓迫。」

114牧函又宣稱，凱薩琳已經撥亂反正，「把這些與俄羅斯人同屬一族的人民歸回到她的統治之下」。

在發給管轄新兼併土地總督的詔書上，凱薩琳把新政策的目的說得更白。她指出：「最適合消滅聯合教會信仰的方法」是斬草除根，而非僅以有少數堂區自願改教為滿足。凱薩琳預期清算聯合教會將會引起大規模騷亂和抗議活動，要求總督做好準備。在警力的協助下，總督必須做到「防止任何的混亂和麻煩發生，不讓任何一個地主或天主教及聯合教會神職人員膽敢製造最小事端。任何企圖反對和不服從我們意志的行為都應被視為刑事罪行，必須受審和沒收財產，直到法院做出判決為止」 115。

這位女皇曾經以宗教寬容的名義捍衛波蘭—立陶宛共和國境內的東正教，並因此得到伏爾泰讚美，但現在卻完全變了個人，對另一個宗教進行迫害。這該怎樣解釋呢？雖然上述牧函把聯合教會信徒說成俄羅斯人同族人這一點可以部分解釋凱薩琳的動機，但更直接的原因卻應該往別處尋找。凱薩琳認為波蘭的新憲法是對帝皇權力的一種法國式攻擊，及至一七九四年，為回應法國大革命和新憲法，她已拋棄許多原先相信的觀念。剷除聯合教會信仰的詔書是在科斯丘什科起義時期發出，而有鑑於當時有許多信仰聯合教會的農民支持起義，剷除聯合教會的政策也許可以被視為一種對付叛亂的措施。凱薩琳信得過前波蘭—立陶宛共和國的東正教教士，卻信不過那裡的聯合教會教士。

另外，凱薩琳也沒有丟掉昔日保護宗教寬容的那一套，改用另一套理由來支持不寬容。她現在聲稱，她所做的是為了糾正東正教徒一直受到的不公道對待。他們曾經被波蘭當局強行轉變為聯合教會信徒，她現在只是設法把他們帶回到他們祖先的信仰。這個在官方論述中被稱為返回「父祖的信仰」的運動在右岸烏克蘭取得高度成功：到了一七九六年，那裡幾乎不剩任何聯合教會的堂區。不過，愈往西部和西北部走，就有愈多的聯合教會教士和堂區拒絕改教，無論受到多大壓迫仍不為所動。白羅斯中部和沃里尼亞基本上仍然以聯合教會

信徒占多數。在第三次瓜分波蘭之後，俄羅斯的聯合教會信徒數目進一步增加。凱薩琳在一七九六年駕崩，宗教的「重新統一」運動隨之終止。當時，烏克蘭和白羅斯的聯合教會信徒仍有一百四十萬人之眾。

帝國與民族結合過程是開始於彼得大帝，至凱薩琳之時達到一個高峰。她利用啟蒙運動的理性政府構想去消除地區和民族的特殊性，從而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除了重塑國家的行政結構和機構，她的帝國打造工程還包括炮製出一套歷史神話、發展一種共同語言和重新思考東正教在一個多民族政體裡的地位。

在俄羅斯人的身分認同和自我意識方面，凱薩琳的統治也帶來了一種對帝俄民族的新理解。隨著愈來愈強的中央集權，區域的忠誠和自治飛地—例如哥薩克國紛紛被打破，隨之出現的是一種「全俄羅斯人」的民族認同。社會規範同樣發生了改變：俄羅斯人現在不僅是有責任乖乖為國家服務的「祖國諸子」，還是被賦予了權利的公民。俄羅斯帝國此時仍然像伊麗莎白時代那樣反對西方，但已經不那麼仇外。

凱薩琳以東正教保護者自居的態度促使俄羅斯比從前任何時期更喜歡干預天主教和東正教在波蘭—立陶宛共和國境內的衝突，但起初凱薩琳認為那裡的東正教徒只是教友，不是同宗的同胞。對她來說，俄羅斯民族的邊界和俄羅斯國家的邊界同一範圍，只是到了她的統治後期，因為瓜分波蘭而把幾百萬主要是非東正教徒的人口納入了俄羅斯版圖，俄羅斯的官方論述才開始重視這些人的族群歸屬問題。凱薩琳和她的顧問團從不接受把族群性作為定義她的新子民的主要範疇，但這些子民卻奠定了下一世紀一種對俄羅斯人身分認同的新理解。

瓜分波蘭挑戰了啟蒙時代俄羅斯帝國的身分認同模型。就像伊凡三世在十五世紀時的做法一樣，凱薩琳二世在十八世紀對新領土的所有權聲稱是訴諸她從基輔羅斯繼承的歷史權利。但要把這些土地整合到俄羅斯裡面來的時候，她面臨著比伊凡三世艱鉅得多的任務。三次

瓜分波蘭把幾百萬東斯拉夫人（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帶進了俄羅斯帝國，而凱薩琳在信件和詔書中不僅把他們視為教友，還視為同宗的同胞。不過，她後來發現，這些人原來大都是聯合教會信徒，而因為朝廷拒絕採納多元宗教構想，所以發起強迫聯合教會信徒改皈「父祖的信仰」的運動。

這個運動主要是由科斯丘什科率領的波蘭起義激發，為朝廷提供了一個處理邊區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的早期模型。這些人在接下來幾代會繼續挑戰帝國的穩定和統一。

-
- 99 Evgenii Gusliarov, *Ekaterina II v zhizni* (Moscow, 2004), 151.
- 100 Rossiiskoe zakonodatel'stvo X-XIX vekov (Moscow, 1987), vol. 5, 23.
- 101 Andreas Kappeler, *The Russian Empire: A Multi-Ethnic History* (Harlow, UK, 2001), 107.
- 102 Sergei Solov'ev, *Sochineniia v vosemnadtsati knigakh* (Moscow, 1994), vol. 13, 123.
- 103 V. Sheremetevskii, "Georgii," in *Rossiiskii biograficheskii slovar'* A. Polovtsova, vol. 4, s.cv.
- 104 "Peterburgskaia konventsiiia mezhdru Rossiiei i Prussiei," *Pod stiagom Rossii* (Moscow, 1992), 132.
- 105 同上。
- 106 實則為「總督」。一八二五年建立的波蘭王國係俄國的保護國。國王由沙皇兼任，另由沙皇指派一位皇族為總督，常駐在華沙。康斯坦丁先是擔任波蘭軍隊總司令，一八二六年擔任總督。
- 107 Vsevolod Solov'ev, *Istoriia padeniia Pol'shi* (Moscow, 2015), 219.
- 108 *Sbornik Russkogo istoricheskogo obshchestva* (St. Petersburg, 1885), vol. 47, 473.
- 109 指法國大革命。
- 110 同上。
- 111 K. V. Ratnikov, "Istoricheskie formy otrazheniia pravitel'svennoi politiki v bshchestvennom soznanii," *Al'manakh sovremennoi nauki i obrazovaniia* (Tambov, 2016), no. 6, 157.
- 112 Andrei Zorin, *Kormia dvuglavogo orla: Literatura i gosudarstvennaia ideologiia v Rossii v poslednei treti XVIII-pervoi treti XIX veka* (Moscow, 2001), 155.

113 「右岸烏克蘭」指聶伯河以西的烏克蘭地區，基輔包含在其內。聶伯河大體上把烏克蘭切分為東西兩部分。

114 Barbara Skinner, *The Western Front of the Eastern Church: Uniate and Orthodox Conflict in Eighteenth-Century Poland, Ukraine, Belarus, and Russia* (DeKalb, IL, 2009), 204.

115 同上，203-204.

第五章 波蘭的挑戰

伏爾泰打趣說過：「一個波蘭人恰恰好，兩個波蘭人吵不休，三個波蘭人—變成了燙手山芋。」¹¹⁶透過法國啟蒙思想家所熱烈支持的聯合瓜分行動，俄羅斯帝國獲得超過三個波蘭人，有如接到燙手山芋般，面臨愈來愈大的挑戰。凱薩琳二世不認為有必要給予這些新兼併的土地特殊待遇，所以拋棄了俄羅斯沙皇歷來的習慣：過去的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來，俄羅斯都是容許新獲得的土地，例如哥薩克國和波羅的海各省高度自治。但被兼併的波蘭土地卻沒有獲得特殊地位，這讓帝國中心和它的新領土之間關係緊張。

許多建立聖彼得堡帝國的菁英，包括被派去波蘭統治的那些菁英，同情波蘭的貴族，認為瓜分行動不公道且輕率，有違俄羅斯在歐洲的最佳利益。對一個被征服鄰國的這種內疚心理在帝國菁英是新鮮事物，也對統治者構成特殊威脅。波蘭一直是一個區域強權，對自己的帝國使命有著強烈意識，也擁有一批忠於國家和祖國的菁英。作為一個充分成長的民族國家，它並不準備放棄獨立國格（就像十七世紀哥薩克國的菁英階層那樣），波蘭貴族自認為比征服者優越，而他們的心懷怨懟也對俄羅斯帝國的傳統作業方式帶來了額外的難題。它的一貫策略是只和地方菁英打交道，不理會低下階層，以這種方式建立自己的霸權。俄羅斯對波蘭也是如法炮製，但這一次，地方菁英並沒有完全配合，偶爾還會完全不合作。

俄羅斯帝國面臨的波蘭問題從來不純粹是個理論問題，即不僅止於讓知識分子傷腦筋罷了。波蘭人不止一次武裝起義，而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不是為了可以談判，而是要把俄羅斯人完全趕走，恢復三次瓜分之前的波蘭—立陶宛共和國版圖。對俄羅斯人來說，波蘭人是危險的敵人。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推進，還有它對語言和民族身分的強調，都構成了俄羅斯想要整合這些新土地的另一層障礙。波蘭貴族不僅受到反獨裁主義的政治文化薰陶和信仰一種俄羅斯菁英極度不信任的宗教，而且作為西斯拉夫人，他們在種族上也不同於帝俄民族核心

的東斯拉夫人。另外，波蘭貴族也不斷以獨樹一幟的歷史、政治文化、語言、文學和宗教作為基礎，打造一種現代波蘭人的身分認同。

因為無法用傳統的權宜之計解決波蘭問題，因為同化不了被征服土地的菁英階層，俄羅斯帝國的菁英被迫重新審視自己的身分認同。他們想出來的解決辦法是把效忠獨裁君主和東正教會的傳統與新出現的民族性觀念結合起來。後來的史書稱這種三位一體結構為「官方民族性」。在十八世紀餘下的時光裡，它將會是俄羅斯的帝國民族打造工程的核心。

拿破崙在一八一二年入侵俄國的行動被法國官方稱為波蘭戰役—更精確的說法是第二次波蘭戰役。在第一次波蘭戰役（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拿破崙打敗俄羅斯、普魯士和奧地利之後，得到普魯士在瓜分波蘭時分到的華沙公國。根據官方說法，第二次波蘭戰役的目標是恢復波蘭王國，包括收復俄羅斯在三次瓜分中奪去的土地。但很多人相信，拿破崙的真正目的是要切斷俄羅斯帝國和英國的貿易，從而緊縮法國對英國的經濟封鎖。但經濟問題幾乎無法作為鼓舞法國軍隊或地區內潛在盟友的戰鬥口號，因為他們得到的命令或要求是直搗莫斯科。只有以還波蘭一個公道為藉口，才足以振奮戰鬥精神，讓大量波蘭人願意加入拿破崙的陣營，並賦予這場戰爭正當性。

雖然波蘭在第三次被瓜分之後已經從歐洲大陸的政治地圖消失，而參與瓜分的三位君主亦同意不把這個國家的名字用於自己的頭銜或用於被他們兼併的土地上，但波蘭仍然留在許多歐洲人的心靈地圖上，尤其是波蘭人自己。相傳，波蘭起義的領導者科希丘什科在一七九四年被俄羅斯人打敗之後，曾經絕望吶喊：「波蘭的末日到了！」但他後來否認說過這樣的話，而許多波蘭人也拒絕相信他們的國家已經完了。他們有些人加入拿破崙的革命軍，在西印度群島、義大利和埃及與這位未來的皇帝並肩作戰。他們所唱的進行曲後來成為被恢復過來的波蘭國歌，第一句歌詞是：「只要我們還活著，波蘭就不會死去。」

拿破崙永遠不會忘記波蘭軍團的忠誠和他們奮起戰鬥的最終目標。一八一二年六月，在入侵俄羅斯前夕，這位法國皇帝在華沙公國議會發表演講，讚揚了波蘭部隊的勇敢，又表示自己已準備好為他們的大業奮鬥。「我愛你們的民族。過去十六年來，你們的戰士在義大利和西班牙的戰場和我並肩戰鬥。我為你們的勇敢鼓掌。我贊成你們的目標，會盡我一切力量支持你們的意圖。如果你們的奮鬥目標是一致的，那麼你們就可望透過迫使敵人承認你們的權利，實現你們的願望。」 117

拿破崙所說的願望和權利，其內容反映在波蘭議會幾天前準備好的陳情書：

我們要恢復波蘭是基於我們與生俱來的權利，基於我們與我們祖先的聯繫，基於舉世公認的神聖權利，因為那是人類的洗禮盆。不是只有我們才能品嚐到波蘭復活的甜美滋味，住在不同土地和等著它解放的人一樣能品嚐到這種滋味.....儘管他們長時間與我們分隔開來，但是立陶宛、白羅斯、烏克蘭、波多利亞和沃里尼亞的居民都是我們的兄弟。他們就像我們一樣是波蘭人，也有權利稱自己為波蘭人。 118

拿破崙告訴波蘭議員，他不能違背他對奧地利做出的承諾，撤回與他締結的和平，因此，恢復波蘭被奧地利拿去的土地是不可能的；但要取回俄羅斯拿去的土地卻沒有問題。「但願立陶宛、薩莫吉希亞、維捷布斯克、波洛茨克、莫吉廖夫、沃里尼亞、烏克蘭和波多利亞表現出我在大波蘭所見到的精神，那樣的話，天意就會為你們的神聖大業和成功加冕。」 119

當月稍後，拿破崙的大軍越過俄羅斯邊境，在凱薩琳二世從波蘭吞併來的土地上行軍，劍指俄羅斯腹地。在華沙的波蘭人看來，這場戰爭是為了恢復他們的祖國，和讓他們可以與落入俄國統治的國人同胞重新統一。近十萬波蘭人投入拿破崙麾下—每六名征俄士兵中就有一名是波蘭人。不讓人意外，兩軍的第一次重要交鋒在一八一二年六月下旬，不是發生在法國和俄羅斯部隊之間，而是發生在波蘭和哥薩

克騎兵之間。雙方在他們熟悉的土地—前波蘭—立陶宛共和國東部省分—重演他們歷史悠久的廝殺。雖然哥薩克人獲勝，但沒有乘勝追擊，反而撤退。他們的整個操作只是為了爭取時間，讓俄軍主力部隊可以撤回內陸。俄軍的不斷撤退讓拿破崙最終可以去到莫斯科的大門。

莫斯科在一八一二年九月的波羅底諾戰役結束後投降。拿破崙的入侵和莫斯科的投降激起了俄羅斯人的愛國情緒，也激起俄羅斯社會的反法國和反波蘭情緒。掌管俄羅斯宣傳事務的是海軍上將希什科夫，他既是新任國務大臣，也是朝廷中「俄羅斯黨」的首領。希什科夫賣力尋找愛國的榜樣人物，並在混亂時期反抗波蘭入侵的人物中找到他們。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在詔書中呼籲「俄羅斯的忠實諸子」和「作為英勇斯拉夫人英勇後裔的俄羅斯人民」奮起抵抗侵略者。為詔書執筆的希什科夫這樣寫道：「在每個貴族中，讓他120遇到波札爾斯基；在每個神職人員中，讓他遇到帕里琴；在每個市民中，讓他遇到米寧。」121他提到的這些人物都是一六一二年對抗波蘭人入侵的反抗軍領袖。隨著一八一二年拿破崙拿下莫斯科，這是混亂時期之後兩百年來第一次有外國軍隊進入俄羅斯首都122，他會被拿來和一六一二年占領莫斯科的波蘭人相提並論自然是無可避免的事。

一八一二年九月看似俄羅斯的末日—莫斯科即將向法國軍隊投降，結果卻是拿破崙帝國末日的開端。他本來預期，俄羅斯人將會投降，雙方會進行談判，但這並未發生。俄羅斯人採取的是西徐亞人在五一二年用過的招數：面對來襲的波斯大流士，他們只是在龐塔斯草原上不斷撤退，從不正面交鋒。俄羅斯還把本來只用於村莊和小鎮的焦土政策擴大到莫斯科。俄羅斯間諜在城中縱火，迫使法國人不得不保護克里姆林宮，讓其免於受到大火波及。拿破崙大吃一驚，以為這是一種耍賴表現。但事實上，他已落入陷阱。

一大堆難題向他撲面而來：他找不到俄羅斯軍隊決戰，補給品短缺並最終用罄，首都聖彼得堡對疲憊和人數顯著減少的法軍來說遙不可及。冬天漸漸逼近，而法國軍隊的冬衣還在巴黎。十月中旬，拿破

崙下令部隊往俄羅斯邊界撤退。俄軍指揮官庫圖佐夫用他以逸待勞和補給充足的軍隊迫使拿破崙採取挺進莫斯科時的同一條路線撤退。沿線地區在當初拿破崙路經之時便已經被摧毀，完全無法提供法國軍隊任何補給。他們挨餓受凍，飽受哥薩克人和游擊隊的騷擾。十二月中旬，即占領莫斯科三個月後，當初入侵俄國的六十萬大軍只剩不到兩萬兩千人得以全身而退。其他人或是被殺，或是被俘擄，或是走散。征俄大軍不再是大軍。

一八一二年十二月，俄國沙皇亞歷山大在詔書中稱波蘭人為近乎兄弟的近親，又赦免了那些曾為拿破崙在俄國作戰的波蘭人。他說：「我們希望，這種愛子女和無私的寬恕可引起衷心的懺悔，並向這些地區的所有居民證明，他們從古代起就是和俄羅斯人有著共同語言與血緣的同族人民，也只有跟強大和寬宏大量的俄羅斯完全融為一體，他們才會最安全最開心。」¹²³俄羅斯人和波蘭人是兄弟這種泛斯拉夫人觀念最初是由俄羅斯宮廷詩人彼得羅夫在一七九三年第二次瓜分波蘭時首先提出，現在它被重申，並透過語言的親和性加強。

亞歷山大相信自己知道要如何重新籠絡波蘭人的心。他的解決方案是建立波蘭王國（用俄羅斯語來說是「波蘭沙皇國」），而這個倡議也在維也納會議（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獲得批准，該會議是劃定後拿破崙時代歐洲各國邊界的國際會議。新的波蘭王國是用普魯士兼併的波蘭土地創造，首都設在華沙。亞歷山大沒有放棄俄羅斯皇帝的頭銜，但給自己另外冠上波蘭沙皇的頭銜，由此創造出一種王朝聯合的印象，讓俄羅斯有正當理由可以繼續統治波蘭王國。這也是邁向波蘭人建立一個君主立憲國家舊夢的第一步：亞歷山大自知不可能在俄羅斯當立憲君主，但心想說不定可以在波蘭過過這種癮。他允許波蘭王國擁有一部相當自由的憲法、一個議會、一個獨立的政府和行政結構，甚至擁有一支軍隊。換言之，他摒棄了凱薩琳追求帝國同質化的政策，改為偏好特殊主義—這種特殊主義如今受到波蘭憲法的保護。亞歷山大希望，有朝一日，帝國其餘地區亦會有各自的憲法。事實證明，那得要再等九十年。

亞歷山大在華沙被譽為波蘭國家地位的恢復者。波蘭人保留了大部分拿破崙給予他們的領土。但他們對亞歷山大的愛戴為時短暫，因為事實證明，波蘭王國並不能控制自己的預算、軍隊和國際貿易。此外，沙皇派到波蘭的官員常常越權，而沙皇的弟弟康斯坦丁大公，他是波蘭軍隊總司令，也因為行為不檢點而名聲欠佳。最重要的是，華沙對於俄羅斯在瓜分波蘭時分到的土地毫無權力。年輕一代波蘭活動家開始建立祕密組織，目標包括恢復波蘭被瓜分前的版圖。俄羅斯當局用雷霆手段打擊這些陰謀，讓波蘭王國的普遍不滿情緒更加高漲。

亞歷山大的憲政實驗並不順利，無論是在波蘭王國還是帝國的其餘部分都是如此。俄羅斯社會的保守勢力壓根兒反對君主立憲的理念。進步人士則抱怨波蘭有一部憲法而俄羅斯卻沒有。一直有傳言說亞歷山大計畫把俄羅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波蘭所兼併的土地歸還波蘭王國，這同時引起了保守派和進步派的抗議。

一八一九年，這些擔憂由俄羅斯當時最著名的歷史學家卡拉姆津道出。在一封題為〈一個俄羅斯公民的意見〉的公開信中，卡拉姆津提醒沙皇要注意一個可稱之為「瓜分俄羅斯」的趨勢：「他們會說她（凱薩琳）瓜分波蘭是不合法的嗎？如果你想透過瓜分俄羅斯本身去消除她的不合法，那你的行為就更加不合法。」¹²⁴他接著指出，用歷史來論證事情有時會很弔詭。「政治裡沒有舊的堡壘，否則我們將有責任恢復喀山王國、阿斯特拉罕王國、諾夫哥羅德共和國、梁贊大公國等等。此外，即使是按照舊堡壘的標準衡量，白羅斯、沃里尼亞、波多利亞和加利西亞也一度是俄羅斯的財產。如果你還給他們，他們就會得寸進尺，要求交還基輔、切爾尼戈夫和斯摩棱斯克，因為這些地方畢竟也曾屬於我們敵對的立陶宛一段很長時間。」

卡拉姆津也是多卷本《俄羅斯國家的歷史》的作者（這本書在一八一六至一八二六年於聖彼得堡出版），在那封公開信中他並沒有僅從歷史立論。他還強調，同是統治著俄羅斯和波蘭的沙皇必須選擇站在「你的真正祖國」的一邊，即站在「美好強大的俄羅斯」一邊。談到被兼併土地上的波蘭菁英時，他寫道：「立陶宛和沃里尼亞希望看

見波蘭王國，但我們希望看見俄羅斯帝國。」把這些領土讓予波蘭王國將會對俄羅斯構成威脅：「那樣的話，波蘭人便會在法律上被承認為一群獨立和有主權的人民，這樣，他們將會比波蘭—俄羅斯人對我們更危險。」最後，卡拉姆津表示自己不想成為當時流行的泛斯拉夫論述的一部分：「陛下，波蘭人將永不會是我們的真正兄弟或信得過的盟友。現在他們衰弱和無足輕重：弱者不會愛強者，而強者會鄙視弱者。所以，如果你讓他們變強，他們就會想要獨立，而獨立的第一步是脫離俄羅斯—他們當然無法在陛下有生之年做到，卻會指望在那之後做到。陛下明鑑！」

歷史的發展證明卡拉姆津有先見之明：在亞歷山大有生之年，波蘭王國都沒有發生起義。但他在一八二五年駕崩，五年後，波蘭人執起了武器。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一群年輕的波蘭人軍校生企圖暗殺總司令康斯坦丁大公，由此點燃了一場日後被稱作「十一月起義」的革命。大公逃過一劫，假扮成女人逃出了府邸，但俄羅斯和波蘭的王朝聯合的門面自此倒塌。在革命分子的要脅下，波蘭議會不得不宣布波蘭王國脫離俄羅斯帝國獨立，並設法收復在三次瓜分時失去的波蘭領土。反抗軍派部隊增援立陶宛、白羅斯和烏克蘭，又派代表到聖彼得堡聲索這些領土。

尼古拉一世在一八二五年繼位，一登基就碰上由一批自由派俄羅斯軍官發起的「十二月黨人起義」。由於認為波蘭的起義威脅到自己的權威和權力，尼古拉一世拒絕談判，反而派軍隊進剿叛軍。但波蘭軍隊出乎意料地難對付。猛攻幾個月之後，俄軍仍然沒能攻克華沙。在立陶宛，俄軍也僅止於守住維爾紐斯，擊退了波蘭人的攻擊。在白羅斯，還有在烏克蘭的波多利亞和沃里尼亞地區，波蘭貴族發動游擊戰，騷擾俄羅斯分遣隊和破壞通信路線。

一八三一年六月，尼古拉改派帕斯克維奇·葉里溫斯基將軍為波蘭前線總司令。帕斯克維奇是哥薩克國的一個軍官之子（曾在一八二七年從鄂圖曼人手中奪得葉里溫，因此獲得榮譽勳章），後擔任駐高加索俄羅斯軍隊總司令。因為得到尼古拉一世的信任和獲得額外的軍

隊，帕斯克維奇成功扭轉戰局。一八三一年八月，他把華沙重重包圍起來。波蘭人表現出英勇氣概，拒絕投降。其中一個將軍在回覆俄羅斯人的投降要求時這樣說：「你們的砲彈曾經在波羅底諾炸掉我一條腿，現在我無法退後半步。」他指的當然是他曾在波羅底諾戰役和拿破崙並肩作戰。但帕斯克維奇攻破波蘭人一道又一道防線，最終在一八三一年九月八日攻入了華沙。他在寫給沙皇的奏摺上說：「華沙已經跪在陛下腳下。」¹²⁵一個月後，最後一個波蘭守軍的據點被擊破。現在問題變成是：下一步要怎樣做？如果說沙皇在「十一月起義」之前曾經想過要給波蘭人更大自治權和一部憲法，如今這種想法已不復存在。

攻陷華沙的消息在聖彼得堡引起一陣歡騰，多位著名詩人透過詩集《占領華沙》慶賀這一重大勝利。其中一首詩出自俄羅斯最德隆望尊的詩人茹科夫斯基，兩首出自他的晚輩普希金。後者比前者更有才華，但較不為朝廷所信任。詩集出版前，普希金的詩經過沙皇尼古拉御覽和批准。

茹科夫斯基把征服華沙視為俄羅斯帝國的又一次勝利。在他看來，奪得華沙類似帕斯克維奇將軍幾年前在高加索擊敗波斯人和鄂圖曼人。普希金的兩首詩—〈致俄羅斯的誹謗者〉和〈波羅底諾戰役紀念日〉則採取另一種的基調，更精確地說是各採取一種不同基調。前一首詩譴責法國和歐洲煽動仇恨俄羅斯的情緒，第二首詩專門談波蘭。在普希金看來，波蘭問題同時是俄羅斯問題。波蘭叛軍所要求的是俄羅斯不可分割的歷史和領土。這些領土包括基輔，它被認為是古代羅斯的首都和羅斯各城市的母城，也包括自哥薩克蓋特曼赫梅利尼茨基起義之後歸附於俄羅斯的烏克蘭人土地。普希金在詩中問了讀者一些問題：

沃里尼亞將會歸誰管轄？

波格丹的遺產¹²⁶該誰來繼承？

自認為有叛亂的權利，

立陶宛將會擺脫我們的統治嗎？

俄羅斯諸城的祖先—

殘破金頂的基輔

是否會拿陵墓中的所有聖物

去和輕率魯莽的華沙結成親戚？127

普希金把「十一月起義」和俄羅斯對它的鎮壓界定為「一場斯拉夫人內部的爭吵」。引起這場衝突的核心因素是俄羅斯計畫重新統一斯拉夫人諸部。「斯拉夫人的百川會匯入俄羅斯大海嗎？抑或它將會乾涸？」這就是普希金認為是「妄自尊大的波蘭人」和「忠誠可靠的俄羅斯人」之間待解決的問題。與茹科夫斯基不同，普希金的目標並不僅止於建立帝國，還包括捍衛泛俄羅斯民族，以及創造一個泛斯拉夫民族。對他來說，俄波鬥爭關乎的是斯拉夫國度的未來：所有斯拉夫人最終都必須在政治上成為俄羅斯人。就此而言，他呼應了彼得羅夫在第二次瓜分波蘭之後所寫的那首詩—從那首詩看來，彼得羅夫認為波蘭人只是最先匯入普希金所謂的「俄羅斯大海」的溪流。

波蘭在拿破崙時代的民族動員，以及隨後在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一年的波蘭起義，都促使俄羅斯為帝國的新身分認同尋找政治、文化和民族的根源。這個過程開始於拿破崙入侵俄國期間，在亞歷山大於波蘭王國推行憲政實驗期間加速，然後又因為被後來史家稱為「官方民族性理論」的出現獲得了新的推力。這個理論是新上任的俄羅斯教育部長烏瓦羅夫所提出。他聲稱，俄羅斯的教育乃至俄羅斯人的身分認同都應該是建基於三條主要原則：東正教、君主專制和民族性。其中，「民族性」（narodnost' / nationality）觀念是烏瓦羅夫的主要創新，最後也成為了三條三位一體原則的總稱。

烏瓦羅夫的三條政治意識形態原理第一次是出現在一八三二年三月呈給沙皇尼古拉的一份備忘錄，當時他還只是教育部副部長。在晉

升部長後的幾個月，即一八三三年的十一月，他呈上了他的最後定本。在備忘錄中，烏瓦羅夫聲稱他的目標是拯救俄羅斯，免其經歷歐洲所經歷過的社會和宗教機構崩潰，他將此崩潰歸咎於法國大革命及其後果。當務之急是恢復和保持俄羅斯的民族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在之前幾十年即便沒有實際被摧毀，也是被嚴重地邊緣化。不過，也有必要把這些價值觀調適於「當前的思想取向」。

烏瓦羅夫是從哪裡找到這套想法的靈感？在拿破崙戰爭爆發之前，他是駐巴黎的外交官，非常仰慕基佐；基佐是一八三〇年推翻法王查理十世並讓路易·菲利普一世掌權之「七月革命」的關鍵人物，也是後來法國自由派陣營中保守派的領導者之一。如果說凱薩琳二世是以伏爾泰和其他法國啟蒙思想家為師，是根據啟蒙運動的普遍主義原則轉化自己的帝國，那烏瓦羅夫就是靠著基佐的啟發，摸索出一個介於保守主義和革命這兩種極端立場的位置。他密切觀察基佐在法國建立國民教育系統的努力（兩人湊巧同一時期擔任教育部長），但又拒絕承認法國人宣稱的他們創造了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教育模式。

因為認為法國人對歐洲其他地方毫不了解和漠不關心，烏瓦羅夫把目光轉向德意志，尋求一個對法國普遍主義的替代選項。他在歷史學家、語文學家和詩人施勒格爾的作品裡發現了他想要的東西，因為這位詩人一向強調民族文化和傳統的重要性。施勒格爾是最早主張民族乃奠基於共同語言和共同習俗的作家之一。在這方面，他是受到赫德的影響，後者是浪漫主義民族觀念的創造者，認為一個國家的合法性奠基於民族精神，而每個民族都有權利創立自己的國家。施勒格爾預期，一個日耳曼民族國家將會以奧地利為中心建立起來，因為奧地利把中世紀的王朝制度、貴族制度和宗教保存得最好。烏瓦羅夫於一八〇七至一八〇九年駐維也納期間曾經和施勒格爾見過面，當時俄、奧兩國是親密盟友，共同對抗拿破崙。

既受到基佐創造法國國民教育體系的啟發，復受到施勒格爾的民族國家觀點的啟迪，烏瓦羅夫著手為俄羅斯的民族教育制定原則。他設法找出一個方法，讓俄羅斯可以從歐洲傳統的各種最佳元素受惠。

他在寫信給沙皇的奏摺上說：「該如何在這裡建立一種符合我們自己看世界的方式又是歐洲精神不陌生的大眾教育體系呢？在與歐洲啟蒙運動打交道的時候，我們應該遵守何種原則，才能讓我們在吸收不可或缺的那些歐洲觀念的同時，又不致被它們有害的成分威脅？」¹²⁸烏瓦羅夫向沙皇指出「在尋找俄羅斯人之所以為俄羅斯人的本質（每片土地及每個人都擁有這樣一尊帕拉斯神像¹²⁹）」時，他找到了這三大元素：東正教信仰、君主專制和民族性。

「就像一個人一樣，一個民族如果不愛自己祖先的信仰，就一定會滅亡。」烏瓦羅夫寫道。他認為這是一個再明顯不過和無可辯駁的真理，遂沒有加以申論。但在談到君主專制的必要性時，他的論證要比較縝密，這是因為君主專制原則不僅在國外受到攻擊，也在俄羅斯國內受到攻擊，後者又特別是受到沙皇亞歷山大的君主立憲思想啟發。他這樣說：「君主專制是俄羅斯在當前狀態下政治生存的基本條件。只有作白日夢的人才會騙自己說，他們找到什麼模糊的證據，可證明事物的秩序是符合他們的理論或偏見。這些人因為不認識俄羅斯，不了解它的狀況、需求和欲望，才會對自己的主張心安理得。」烏瓦羅夫聲稱，企圖限制沙皇的權力將會讓國家內部的種種關係變得不穩定，並且對俄羅斯的發展構成障礙。他深信，大部分俄羅斯人都像他一樣，認為削弱君主專制的原則充滿危險。

雖然烏瓦羅夫引入的民族性觀念在俄羅斯的官方信仰體系是一個新元素，但在他自己的思想體系裡卻只排行第三，分量遠不如前面兩個原則。他也不認為它等於近代的民族主義。在他的理解裡，「民族性」是一種根植於俄羅斯歷史發展的本土傳統，可以把教會和沙皇連結起來，確保兩者的穩定。

從現在的觀點看，有一件事情頗為諷刺：烏瓦羅夫的民族打造綱領是用法語寫成。但要知道，在當時，法語仍然是俄羅斯菁英階層的主流語言。烏瓦羅夫提到「民族性」時使用的是法語單字 *nationalité*，後來他的下屬將之翻譯為 *narodnost'*。把這個俄羅斯概念翻譯成英語的話，最接近的譯法是「民族生活方式」（*national way of life*）。就我

們所知，narodnost'一詞最早出現在俄羅斯詩人維亞澤姆斯基筆下，他在一八一九年所寫的一封信中這樣說：「為什麼不把 nationalité 翻譯為 narodnost' 呢？畢竟，波蘭人都是稱之為 narodowość。波蘭人不像我們那麼拘謹，如果一個單字不是他們的語言本來所有，他們就會抓住它的頭髮硬拖出來。」¹³⁰這封信是從華沙發出，當時維亞澤姆斯基在那裡推行亞歷山大一世的憲政工程。

narodnost'一詞很快就在俄羅斯被接受。一八二五年，普希金指出，這個詞語既流行又缺乏清楚定義：「我們使用 narodnost' 已經一段時間，既主張文學作品應該表現 narodnost'，又抱怨文學作品難得看見 narodnost'，可誰都沒有想過，他所謂的 narodnost' 該怎樣定義。我們其中一個評論家似乎認為所謂的 narodnost' 就是由我們可以在我們國家歷史裡隨便挑出來的東西所構成，另一個評論家則認為 narodnost' 表現在語言，也就是說，他們樂於用俄羅斯語表達自己，樂於使用俄羅斯的表達方式。」¹³¹

根據烏瓦羅夫，「民族性」就是俄羅斯人的傳統生活方式，它可以在一個受到歐洲新觀念塑造的時代確保另外兩個關鍵元素—即宗教和君主專制—的穩定。在歐洲，民族的觀念是和民眾代表制的原則緊密相連，因而會對君主專制構成威脅，但同樣情形卻被認為不會發生在俄羅斯，因為俄羅斯的民族觀念被認為是支持傳統的沙皇制度。烏瓦羅夫不想用君權神授思想來支持沙皇的專制統治，這種論證在當時司空見慣，也沒有企圖用教會作為沙皇權力的法理基礎。取而代之，他把君主專制和民族性拉在一起，主張「兩者同出一源，在俄羅斯人民的歷史的每一頁都是攜手同行」¹³²。不過，他沒有更進一步主張沙皇的獨裁權力來自俄羅斯民族。

烏瓦羅夫在把西方的民族性觀念引入俄羅斯的時候，顯然不是照單全收。他不理會施勒格爾對民族語言和民族文化的重視，只專門強調傳統制度的重要性。由於俄羅斯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帝國，民族特殊性的觀念會對它構成威脅，這一點是波蘭人一八三〇年反抗俄羅斯壓制所進行的民族動員證明過的。而且，西方民族觀念也可能會讓俄羅

斯民族主義者認為國家的利益不同於君主的利益。烏瓦羅夫致力於連結帝國和民族性，是希望後者可以強化前者。在備忘錄的結論裡，他提到自己覺得對「上帝、最高主宰和祖國」負有責任¹³³。「上帝、最高主宰和祖國」這個鐵三角也是拿破崙時代俄羅斯首席宣傳官希什科夫所強調者，表明了烏瓦羅夫的構想和已確立的帝國論述傳統息息相關。

不管烏瓦羅夫的動機有多保守，他把「民族性」一詞引入俄羅斯政治之舉還意味著歐洲的民族主義思想已經傳入俄羅斯帝國。彼得一世的首席意識形態理論家普羅科波維奇首先提出「祖國」的觀念，它現在已經蛻變成「民族」的觀念（這一點在一六七四年出版的《大綱》早已有所預示，因為其中的「民族」一詞也是傳統意義而非革命意義）。到底「民族性」觀念在實踐上會帶來什麼後果，當時還不清楚，無論是對烏瓦羅夫而言或對沙皇來說都是這樣。它的政治意涵需要幾代人才能完全挖掘出來。俄羅斯「民族性」的範圍為何？它是否單憑本身便足以讓一個帝國子民對沙皇和東正教產生效忠之心，抑或需要其他元素的配合？在波蘭起義還餘波盪漾之際，最需要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的地方，莫過於被兼併到俄羅斯帝國的前波蘭—立陶宛共和國的土地上。

¹¹⁶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Oxford, 2005), vol. 1, 386.

¹¹⁷ V. I. Picheta, "Pol'skaia konfederatsiia v 1812 godu," in *Otechestvennaia voina i russkoe obshchestvo* (St. Petersburg, 1812), vol. 3, 159.

¹¹⁸ 同上，157.

¹¹⁹ 同上，159.

¹²⁰ 指拿破崙。

¹²¹ *Otechestvennaia voina 1812 goda: Sbornik dokumentov i materialov*, eds. Evgenii Tarle and Anatolii Predtechenskii (Moscow, 2015), 30.

¹²² 當時首都其實是聖彼得堡。

¹²³ *Polnoe sobranie zakonov Rossiiskoi imperii* (St. Petersburg, 1830), vol. 32, 481-482.

- 124 Nikolai Karamz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Moscow, 1998), vol. 18, 11.
- 125 Boris Tarasov, *Nikolai I: Rytsar' samoderzhaviia* (Moscow, 2006), 355.
- 126 波格丹即哥薩克國第一任蓋特曼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波格丹的遺產」指左岸烏克蘭。
- 127 Serhii Plokhy, *The Gates of Europe: A History of Ukraine* (New York, 2015), 153.
- 128 *Reka vremen (kniga istorii i kul'tury)* (Moscow, 1995), vol. 1, 70.
- 129 帕拉斯（Palladium）為希臘神話中的智慧女神。此指每個民族都有其守護神。俄羅斯的守護神即下述三元素。
- 130 P. A. Viazemskii, *Estetika i literaturnaia kritika* (Moscow, 1984), 23.
- 131 Aleksandr Pushkin, *Sobranie sochinenii v desiati tomakh* (Moscow, 1959-1962), vol. 7, 267.
- 132 Aleksandr Andreev, *Istoriia gosudarstvennoi vlasti v Rossii* (Moscow, 1999), 160.
- 133 *Reka vremen*, vol. 1, 72.

第六章 為邊界戰鬥

一八三一年夏天，即「十一月起義」的高峰階段，尼古拉一世曾答應把一些在維斯瓦河另一邊的波蘭土地讓與奧地利和普魯士。但後來，隨著起義被粉碎，他改變了主意。他用來解決新波蘭問題的方法在一八三二年二月發布的《組織法》揭曉，其中勾勒出他對波蘭王國的未來規劃。《組織法》收回亞歷山大一世賦予波蘭的自由：波蘭沙皇的職位、波蘭議會和獨立的波蘭軍隊全部廢除。大元帥帕斯克維奇公爵被封為波蘭親王，負責統治波蘭，目標是把波蘭整合到俄羅斯帝國之中。

把波蘭王國整合到俄羅斯帝國的決定，大大影響到帝國在後來被稱為「西部省分」的地域的政策考量。「西部省分」是官方說法，指凱薩琳時代被兼併的烏克蘭人、白羅斯人和立陶宛人土地，它們介於波蘭王國和帝國的核心地區之間。在「十一月起義」之前，有很長一段時間，俄羅斯的統治者對於要怎樣對待這些地區一直搖擺不定。尼古拉也不例外。就像他的父親保羅和哥哥亞歷山大一樣，他不相信瓜分波蘭符合俄羅斯的利益，但又負擔不起把這些土地歸還波蘭的後果。他在一八二七年寫給弟弟康斯坦丁的信上說：「只要我活著一天，就絕不允許任何鼓勵波蘭兼併立陶宛的想法。」不過，他又相信這不妨礙他「在當一個好俄羅斯人的同時，也可以當一個好波蘭人」¹³⁴。這樣說的時候，他心裡想著的八成是怎樣才能夠同時把他作為俄羅斯皇帝和波蘭沙皇的責任盡好。當一八三〇年十一月波蘭起義爆發後，波蘭金融部長曾經打趣說：「波蘭沙皇尼古拉如今正在和俄羅斯皇帝尼古拉開戰。」¹³⁵「十一月起義」被敕平之後，是哪個尼古拉打贏了戰爭再無疑義。波蘭將要不回它從前的領土。

一八三一年九月十四日，即華沙陷落僅一週後，俄羅斯政府創立了一個後來被稱為「西部省分委員會」的專門機構。該委員會根據尼古拉的口諭祕密成立，負責「審視各種有關如何處理從波蘭重新取回省分的建議」。自從瓜分波蘭以來，這是俄羅斯政府第一次建立一個

系統性處理兼併波蘭土地的權責機關。其目標是迅速讓這批土地完全整合到帝國之中，比起整合波蘭王國的更快速完成。凱薩琳二世在一七六三年曾對斯摩棱斯克省和哥薩克國推行的俄羅斯化政策如今成了俄國對前波蘭土地的官方政策。它包括了行政、法律和社會三方面的措施，務使這些地區能夠和帝國的其他省分看齊。

過去，俄羅斯整合被占領土地的方式都是透過收編地方菁英階層，但這一招已經證明在兼併自波蘭的土地上不管用。波蘭人的起義以深刻的方式讓帝國的菁英階層明白到這個道理。他們別無選擇，只能改弦易轍。絕大多數的波蘭民眾都是東斯拉夫人，不過他們信仰的是天主教的聯合教會，不同於俄羅斯的東正教。正因為這樣，波蘭貴族在反抗俄羅斯朝廷的鬥爭中，常常因為宗教上的親和性而得到他們的烏克蘭和白羅斯子民的支持。有見於此，朝廷決定要在菁英階層和被統治者之間建立藩籬。為此，它使出各種可使用的手段，到最後包括祭出烏瓦羅夫伯爵制定的「官方民族性」觀念。

一八三二年十一月，西部省分委員會發出一封敕令，要求減少西部省分有權行使貴族權利者的人數，這些權利包括購買土地和農奴的權利，目的是動搖波蘭貴族的地位。在一八四〇年代，尼古拉又下令縮減農民對地主的義務，說此舉是為了愛護「俄羅斯人」農民。總之，在一個以貴族為基礎的帝國所容許的程度下，朝廷命官盡可能站在烏克蘭和白羅斯農民一邊以對付波蘭貴族。其他政策包括廢除城市自治和地方性法律條文，這些條文源自波蘭和立陶宛統治這地區的時代。凡是在曾經屬於波蘭—立陶宛共和國的地域，這些政策都一體適用。所以，連哥薩克國亦包含在其中，哪怕這時候它對朝廷的忠誠已經不容懷疑。

政府還推出促進前波蘭地區在文化上俄羅斯化的政策，其中包括創造出一套新的歷史敘事以此號稱新兼併土地原為俄羅斯所有、建立新的大學和學校、鼓勵白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皈依東正教或進入教會出任神職。在對波蘭土地所進行的努力上，就以這三組政策最為影響深遠，它們不僅改變了這些地區的面貌，還讓俄羅斯的菁英階層以不同

的方式看待自己，以及用不同方式看待自己國家的地理、社會和文化邊界。

早在亞歷山大推行自由化改革的時期，俄羅斯的菁英階層便已經開始思考帝國西部省分的未來，那裡的居民以東斯拉夫人為大宗。十二月黨人起義（一八二五年）的一個領導者佩泰爾對這個問題的複雜性有充分認識。在為起義寫一份宣言的時候，他不得不面對一個複雜的問題：他稱為「俄羅斯法」的未來俄羅斯國家憲法，其實是暗指中世紀基輔國的法典。他一方面想要保存和強化俄羅斯帝國，另一方面又相信任何有著民族性的人群都有權獨立建國。顯然，帝國裡有許多不同民族。在佩泰爾所開列的不完整清單中，這些民族家園除了俄羅斯和波蘭以外，還包括「芬蘭、愛沙尼亞、利夫蘭¹³⁶、庫爾蘭、白羅斯、小俄羅斯、新俄羅斯、比薩拉比亞、克里米亞、喬治亞、整個高加索、吉爾吉斯的土地和所有的西伯利亞人民」¹³⁷。佩泰爾用來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很簡單：較小的民族必須放棄獨立的權利，成為一個人數更多和更強大民族的一部分。他寫道：關於小型民族「他們如果能在精神和社會層面與一個更大的國家合而為一，且完全融入統治者的民族性，使自己僅僅成為其中的一部分，不要再徒勞地夢想不可能實現的事情，他們會發現這樣對其自身會更有好處」。

佩泰爾計畫讓波蘭王國獨立，但仍對凱薩琳瓜分波蘭時獲得的土地進行俄羅斯化。理由是，後者的居民都是俄羅斯人—在他的定義裡，俄羅斯人是一個斯拉夫部落，不過有著自成一格的語言、宗教和社會結構。他把俄羅斯民族分為五個亞群：住在帝國核心省分的大俄羅斯人、住在聶伯河左岸的小俄羅斯人、住在哈爾科夫四周稱為斯沃博達烏克蘭地區的烏克蘭人、住在聶伯河右岸以及沃里尼亞和波多利亞的盧森尼亞人、住在俄國在第一次瓜分波蘭時獲得的土地的白羅斯人（佩泰爾不認為格羅德諾省和明斯克省的居民是俄羅斯民族的一部分，而且極有可能是打算把這兩個省分讓給波蘭王國）。他主張，西部省分的俄羅斯人—相當今日的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只是因為特殊的行政區劃才顯得和俄羅斯核心省分的俄羅斯人有所不同。佩泰爾寫

道：「所以，應該建立這樣一條原則：把維捷布斯克、莫吉廖夫、切爾尼戈夫、波爾塔瓦、庫斯克、哈爾科夫和基輔、波多利亞和沃里尼亞各省的居民一律視為不折不扣的俄羅斯人（true Russians），不要再有任何特殊名稱把他們排除在俄羅斯人之外。」

把「不折不扣俄羅斯人」的不同分支統一起來的工作是在波蘭起義之後，落在了尼古拉一世的教育部長烏瓦羅夫肩上。在把西部省分的東斯拉夫人口視為俄羅斯人一事上，烏瓦羅夫和佩泰爾有志一同，但他不認為，他們和俄羅斯人的差異只是特殊的行政區劃造成。他相信西部省分的居民和俄羅斯人還有著較實質的差異，例如文化上的差異不是馬上可以克服，而是得再等上一代人。但光是等待並不足夠，還需要一個正確的教育計畫從旁協助。他在給沙皇的奏摺上寫道：「從羅馬人到拿破崙，所有想要把被征服民族統一於戰勝民族的顯赫統治者，莫不是把全部希望和努力成果寄託在後來世代而非當前一代。」[138](#)

烏瓦羅夫有很好的理由保持謹慎態度，只把希望寄託在未來。在西部省分，他面臨著一個巨大障礙：波蘭的語言、歷史和文化。在一八三〇年的起義失敗之後，與俄羅斯相較，波蘭有更多人懂得讀書寫字。就像在他之前的普希金和佩泰爾那樣，烏瓦羅夫不是把波蘭問題視為一場發生在帝國中心和外省之間的衝突，或是發生在一個多民族帝國和它其中一支民族之間的衝突，而是視之為兩個民族之間的衝突，最終只能透過教育解決。

為了把西部省分整合到帝國裡面，早在一八三一年，烏瓦羅夫便開始尋找一個可以提供相關歷史理據的寫手。他的這個念頭是因一名上書教育部的格羅德諾省官員所觸發。該官員主張，有一種「和俄羅斯人總體民族性非常接近的民族特性在西部省分復活、傳播和建立」。在他看來，解決該地區民族問題的方法是把它們的歷史融入帝國的歷史，透過開設教會斯拉夫語語言課程來促進語言同化，教會斯拉夫語在十八世紀大部分歲月裡都是東斯拉夫人的共同文學語言。

烏瓦羅夫把尋找一套新的歷史敘事的工作緊記在心。他對西部省分歷史的看法和佩泰爾並無不同。佩泰爾曾經主張，西部省分「從古代起便屬於俄羅斯，後來卻在不利的環境下被人奪去」¹³⁹。根據他的看法，當凱薩琳後來讓西部省分「和它們的身體重新統一，俄羅斯得以恢復古老的尊嚴。更可貴的是它自此可以向俄羅斯國家的搖籃致敬——這個搖籃在北部是諾夫哥羅德省和周邊省分，在南部則是基輔地區，包括了切爾尼戈夫、基輔、波爾塔瓦、波多利亞和沃里尼亞各省，它們是俄羅斯國最古老的核心地帶」。

這種思路和凱薩琳二世及別茲博羅德科親王在第二次瓜分波蘭之後建立的論述符合一致，卻在亞歷山大的開明統治期間受到質疑。在這段期間，對俄羅斯歷史的國家主義式詮釋——以卡拉姆津的大部頭著作《俄羅斯國家的歷史》為代表——受到了波蘭和俄羅斯歷史學家鼓吹的民族性原則挑戰。在一八二九至一八三三年，著名的歷史學家波列伏依的六冊俄羅斯人民史（也可稱俄羅斯民族史）相繼出版，其中表現的歷史觀和卡拉姆津天差地遠。這個對國家主義式詮釋的挑戰，湊巧發生在波蘭起義的同時，而這個巧合極大改變了俄羅斯的史觀，也讓重新發現西部省分的「俄羅斯歷史」的任務被排上了日程。

烏瓦羅夫最先選中的寫手是莫斯科大學歷史教授波戈金。波戈金熱情接受委託，又向教育部長保證，他會像帕斯克維奇將軍在一八三一年痛擊波蘭叛亂分子那樣，痛擊波蘭的歷史學家。他在一八三四年十一月動筆，一年後交稿，期間烏瓦羅夫不斷向沙皇報告寫作的進度。但事實證明，波戈金是一個很好的歷史學家，以致無法滿足教育部長的需要。在書中，他指出東北羅斯（或俄羅斯）的歷史不同於西南部羅斯（即烏克蘭和白羅斯），但這樣一來，烏瓦羅夫想要用歷史論述來無縫連結西部省分和俄羅斯的目的便告泡湯。烏瓦羅夫向沙皇解釋，會出現這個失敗是因為用單一敘事涵蓋俄羅斯、波蘭和立陶宛各省的做法太過於新穎，難以一下子達成。

但烏瓦羅夫沒有氣餒。他懸賞一萬盧布給可以把俄羅斯和西部省分的歷史共冶於一爐的作者，然後又情商另一位歷史學教授執筆。這

個人是聖彼得堡大學的烏斯迪亞洛夫，他在一八三六年十二月交出預定共四冊的俄羅斯史的第一冊。烏瓦羅夫在一個月後批准出版，他向全國各學區的下屬推薦使用這本歷史著作作為標準教科書。一八三九年，烏斯迪亞洛夫把他的四冊俄羅斯史濃縮為一冊，由烏瓦羅夫呈給沙皇御覽。翌年，烏瓦羅夫取消了寫作最佳俄國史教科書的競賽，把獎金頒給烏斯迪亞洛夫。

烏斯迪亞洛夫的大作《俄羅斯史》最吸引烏瓦羅夫之處，是它把收復基輔公國原有領土的任務說成是俄羅斯歷史的主旋律。烏斯迪亞洛夫寫道：「俄羅斯沙皇國的歷史主要是追求逐漸收復原是〔智者〕雅羅斯拉夫統治下的所有俄羅斯人土地……我們跟波蘭、利沃尼亞和瑞典的所有衝突……都是源自此一任務。」¹⁴⁰根據烏斯迪亞洛夫的詮釋，立陶宛國家和莫斯科的敵對是兩王朝間的敵對，不是兩民族間的敵對，主張立陶宛統治者和他們的「俄羅斯人」子民關係變壞，只是波蘭人在十四世紀占領立陶宛後才發生。烏斯迪亞洛夫的《俄羅斯史》共有三個不同版本，全部加起來印了二十六次。

在一八五七年的版本中，烏斯迪亞洛夫聲稱基輔羅斯的人口自成一個民族，因此完成了以民族性原則補充卡拉姆津的國家主義詮釋的過程，擴大了俄羅斯史的地理涵蓋範圍。至此，俄羅斯史已不僅是俄羅斯國家的歷史，還涵蓋歷史上屬於俄羅斯人但不屬於俄羅斯國家的土地。

除了歷史，俄羅斯的語言和文化也成為政府在邊區實施的新政策的主要工具。以俄羅斯語作為教學語言可以阻止波蘭年輕人產生獨立的民族意識。最終，新的教育體制和政策也被施行於帝國的西部省分。

國家需要一批新血推介這些政策。當朝廷一八〇二年第一次創立教育部的時候，被委以部長重任的是札瓦多夫斯基。札瓦多夫斯基是前哥薩克官員，更重要的是，他是基輔學院的畢業生，又曾經在白羅斯城鎮奧爾沙的耶穌會神學院念書，那年頭奧爾沙還是屬於波蘭一立

陶宛共和國。札瓦多夫斯基那些在帝國西境負責教育事務的下屬都是波蘭貴族。其中之一是恰爾托雷斯基，他曾任亞歷山大一世的顧問和當過外交部長一段時間，在一八〇三和一八一七年之間掌管維爾紐斯學區。這學區涵蓋從波蘭—立陶宛共和國兼併而來的立陶宛人、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土地。同一時期，環繞烏克蘭東部的哈爾科夫學區是由另一位波蘭貴族波托茨基掌管。波蘭人對於教育事務比俄羅斯人有經驗，而這是因為波蘭的教育制度發展得更早—早在一七七三年，被第一次瓜分過的波蘭—立陶宛共和國便成立「波蘭教育委員會」，致力於在國內包括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的省分建立公共教育體系。

但波蘭人掌管的大學和中學並非僅是普通的教育機構，它們還推廣波蘭文化和傳播反帝國主義思想—最明顯的一次是在一八三〇年，當時的維爾紐斯大學成了波蘭起義軍新進人員的重要來源。一八三二年五月，朝廷下令關閉這所大學（它要等到羅曼諾夫王朝倒下才會重新開張）和解散維爾紐斯學區。但單單關閉大學並不能讓帝國取得多大進展，關閉波蘭教育機構所留下的真空必須用帝國的教育機構來取代。一八三三年十一月，尼古拉一世批准烏瓦羅夫的建議，在基輔市創辦一所新的大學—幾年前，普希金曾擔心這樣的大學可能會落入波蘭人的控制。事實上，如果不把基輔的山洞修道院和一些東正教教堂算在內，這座城市業已受到波蘭文化所宰制。觀光客在大街上聽到波蘭語的機會要多於聽到俄羅斯語或烏克蘭語。在基輔省，波蘭貴族的人數是四萬三千，俄羅斯貴族的人數卻只有一千出頭。所以，基輔的公眾面貌是由波蘭人所主導。

在基輔興辦一所大學的建議在一八〇五年便有人提出過，當時札瓦多夫斯基試圖說服該市的都主教，協助他把基輔學院升格為大學。但這位教育部長沒有得到都主教很多支持。波蘭貴族也不表支持，而他們是唯一有錢資助成立大學的一群人。當時另有一位波蘭知名教育家克薩基賣力遊說貴族捐助成立一家高等教育機構。為避免有和基輔互別苗頭之嫌，他把自己想要成立的機構稱為文科中學而不是大學，並主張把它設在沃里尼亞小城克列梅涅茨。因為得到沃里尼亞地區學

監恰爾托雷斯基的支持和一批波蘭貴族的捐贈，克薩基如願在克列梅涅茨創辦他的學校，這學校又在一八一九年升格為學院。一八三〇年波蘭起義期間，它是孕育叛亂分子的溫床，所以起義失敗後迅速被當局關閉。這時輪到基輔時來運轉。克列梅涅茨學院近三萬五千冊的藏書，還有它的化學實驗室和植物園，全被打包運往基輔的新大學。有些教授也轉到那裡任教。

克列梅涅茨的波蘭人學院自此走入歷史，但基輔的俄羅斯人大學的故事才要開始。它以聖弗拉基米爾的名字命名，這位十世紀的大公一向被視為俄羅斯國家的奠基者及第一位東正教徒統治者。揭幕儀式在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五日的聖弗拉基米爾日舉行。新大學也象徵著俄羅斯帝國對原由弗拉基米爾統治的這座城市的收復。在創校詔書中，尼古拉一世形容基輔「對全俄羅斯都無比珍貴，是我們祖先神聖信仰的搖籃，也是他們的公民個體性的第一個見證」¹⁴¹。教育部長烏瓦羅夫伯爵稱這大學為「精神堡壘」。如果是堡壘，它要保護誰和對抗誰不問而知。教育部長指出新大學的目標是「盡可能抹平讓波蘭年輕人有別於俄羅斯人的尖銳棱角，特別是防止有獨立民族特色在他們之中產生，把他們愈來愈拉近於俄羅斯的觀念和習俗，灌注他們俄羅斯人民共有的精神」¹⁴²。

首任校長是前哥薩克國在地人馬克西莫維奇。他本是莫斯科大學植物學教授，但因為有多方面才能，在烏瓦羅夫的請託下在新大學承擔政治重要性多得多的教職：俄羅斯語語文學教授。馬克西莫維奇的任命反映出聖彼得堡選擇什麼策略，以在新兼併的領土對教育系統進行俄羅斯化。新政策下的步兵甚至有些戰地指揮官都是來自前哥薩克國的幹部。當局為什麼會採取這種用人政策，其理甚明：他們熟悉波蘭的語言、文化和環境，而且有著仇視波蘭的心態。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對前哥薩克國人民的重用將會變得尾大不掉。到了一八四〇年代晚期，這地區的居民將會發展出一種全新的民族目標，對帝國形成意料之外的威脅。不過，至少在基輔大學

創辦初期，來自前哥薩克國的烏克蘭人確實竭盡所能去剷除波蘭文化的影響力。

基輔和它的新大學從此成為打造俄羅斯人身分認同的施工現場。從十九世紀初葉開始，到基輔朝聖便在俄國知識分子和官員中間蔚為風氣，人人都想來這裡親炙俄羅斯歷史的源頭。不過，在一八二〇年代，基輔羅斯時代的遺物已經寥寥無幾，充其量只剩幾間古老教堂，所以，熱忱之士開始從事考古挖掘工作，想要發現這城市失落的遺產。一八三二至一八三三年之間，在地業餘考古學家洛赫維茨基對基輔的「黃金之門」進行了多次挖掘。黃金之門是基輔古城的入口，是智者雅羅斯拉夫大公在十一世紀上半葉所建，意在模仿君士坦丁堡的「黃金之門」。尼古拉一世曾參觀挖掘工作，給予洛赫維茨基賞賜，並答應提供經費供其進行更多的挖掘。

當時的基輔主要是波蘭人和猶太人居住的城市。對它的俄羅斯化工作名副其實是從被埋在地下的古代遺址做起，這些遺址統統被說成是基輔羅斯的遺物。所以，基輔大學的首任校長還要身兼導遊，先後帶領過數以十計顯赫貴賓參觀「古代俄羅斯」的世界。這些貴賓的頭兩位是果戈里和莫斯科大學俄羅斯史教授波戈金，最後兩位是未來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和他的老師茹科夫斯基—前普希金時代最著名的俄國詩人。

一八五三年，基輔當局舉行典禮，慶祝一件盛事：弗拉基米爾大公紀念碑¹⁴³的揭幕。這是一項進行了二十年工程的最高潮：豎立銅像的建議是基輔總督在一八三三年提交給沙皇。連接聶伯河左、右兩岸的鐵鏈大橋也是在同一天揭幕。到了當時，基輔已經有一個稱為「古文獻委員會」的特別機構，負責充實俄羅斯對擁有整個右岸烏克蘭的權力聲稱。該機構在總督的監督下成立於一八四三年，兩年後發行第一本古文獻彙編，內容被認為可以證明本地區原屬俄羅斯所有。不過，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它所發行的數以百計珍貴檔案彙編將會證明，本地居民的身分不同於俄羅斯人。

波蘭起義被粉碎後，帝國當局得再一次面對聯合教會的問題。這時它的聯合教會信徒已達一百五十萬人，主要居住在第三次瓜分波蘭後劃入俄羅斯帝國的土地。至於住在第二次瓜分波蘭時被納入的聯合教會教徒，則大部分已在凱薩琳二世時期改信東正教。

當帝國西部省分的波蘭貴族在一八三〇年和一八三一年呼籲起義時，他們獲得許多聯合教會教士的同情，有時甚至得到他們熱烈歡迎，來自修道院的支持尤其強烈。根據政府估計，在立陶宛人省分中，聯合教會所屬的聖巴西勒修會中，有近三分之二僧侶是羅馬天主教徒。完全支持起義的包括沃里尼亞的波恰耶夫修道院的聖巴西勒修會僧侶—這座修道院原本是東正教的一座要塞，但在十八世紀初葉被轉化為聯合教會。修道院印刷了一份傳單，呼籲烏克蘭居民加入起義。修道院不僅在一八三一年四月歡迎一支起義軍進入該修道院，甚至還有八名僧侶加入起義行列。他們穿著苦行僧長袍騎在馬背上，腰間配劍，在所過之處高聲呼籲群眾奮起為祖國作戰。該修道院前後共有四十五人投入起義陣營。有見於聯合教會農民是否忠誠變得事關要緊，政府馬上採取行動。一八三一年九月，應軍事和民事首長的要求，尼古拉一世簽署了一項法令，解散波恰耶夫修道院。它的建築被移交給東正教教會，後來變成一間東正教修道院。在一八三〇年之前，帝國境內共有九十五間聯合教會修道院，但在起義失敗後，大約有一半被關閉。

尼古拉一世另外也透過設計一個在制度上統一聯合教會和東正教的機制，他加快把全部聯合教會人口轉化為東正教徒的計畫。就像許多帝國菁英分子那樣，他相信信仰聯合教會的烏克蘭和白羅斯農民本質上都是俄羅斯人，當初只是出於波蘭人的壓力和詭計，才會拋棄原有的東正教信仰，並因此在民族認同上發生變化。在登基之前，尼古拉曾是西部省分的軍事指揮官，所以對於聯合教會教士和他們的教會有多麼貧窮印象深刻。因為得不到國家或天主教徒地主的支持，一些聯合教會神職人員甚至早在波蘭起義之前便尋求「回歸」東正教。尼古拉找到了一個完美人選去達成他的目的：二十九歲的謝馬什科。他

既是聯合教會教士，又是聖彼得堡聖靈學院的一員，該學院負責監督帝國境內天主教和聯合教會的活動。

謝馬什科是右岸烏克蘭人，出生於一七九八年，當時該地區剛被劃入俄羅斯版圖沒有幾年。他父親是聯合教會教士，因為拒絕改教而失去堂區。小時候的謝馬什科更多是到村莊的東正教教堂做禮拜，這是因為天主教堂距離較遠，而且鄰近地區剩下的聯合教會教堂寥寥無幾。自小聰慧的他首先是被送到波多利亞小城涅米里耶一所學校念書，然後又進入了維爾紐斯大學的「聯合教會—天主教神學院」學習，出於維爾紐斯學區主管恰爾托雷斯基的刻意栽培，這兩所學校都是波蘭教育和文化的中心。年輕的謝馬什科必須精通波蘭語，而正如他後來所憶述，波蘭貴族的子弟在涅米里耶的學校享有特權，維爾紐斯大學則是瀰漫著波蘭愛國主義和反俄情緒。在維爾紐斯大學，他和一個同學只因為讀俄羅斯雜誌，便被視為民族叛徒。

不過，直到謝馬什科被派去聖靈學院任職，他才決定把自己的未來和東正教連結在一起。帝國首都的金碧輝煌和聖彼得堡東正教教會的富裕讓他印象深刻，反觀羅馬天主教神職人員對聯合教會神職人員的傲慢態度則讓他震驚。被迫只能在波蘭人或俄羅斯人身分二擇其一的情況下，他看不出有其他選項，謝馬什科決定選擇當俄羅斯人，也因此必須歸附俄羅斯的教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必須把他的聯合教會俄羅斯化。換言之，是東正教化。

他日後回憶說：「廣大無邊的俄羅斯，它由單一信仰和單一語言結合在一起，追求的是一個蒙福的目標，變成了一片讓我深受吸引的祖國。我把為它服務和促進它的福祉視為己任。」¹⁴⁴一八二七年，他給政府遞交了一份備忘錄，其中勾勒出他逐步把聯合教會轉化為東正教的計畫。沙皇看過後大加讚賞。

謝馬什科的計畫許多方面都是延續亞歷山大一世時期對待聯合教會的官方政策。凱薩琳二世強迫聯合教會信徒改教的做法已不再時興。這不僅因為亞歷山大較為寬大為懷，還因為強迫改教的政策並未

收到預期效果。事實上，這種政策在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葉反而導致大約二十萬本來是聯合教會信徒的農民加入了羅馬天主教。一八〇五年，亞歷山大下令，在聖靈學院成立一個監督聯合教會的部門，先前這學院僅止於負責監督羅馬天主教徒的活動。聯合教會的都主教歡迎這種對其教會的官方承認，並且在政府的支持下，致力於消除聯合教會禮拜儀式中的天主教元素。

然而，謝馬什科想要的不僅是終止聯合教會信徒改信天主教的趨勢。作為聯合教會和東正教統一的準備，他建議建立一間聯合教會的聖靈學院，以及創辦一間以東正教精神培養聯合教會神職人員的神學院，為兩教的未來統一儲備幹部。有見於聯合教會的聖巴西勒修會是拉丁和波蘭影響力滲透右岸烏克蘭的主要管道，謝馬什科建議把它劃歸聯合教會主教管轄，以防止天主教僧侶加入該修會。一八二八年四月，尼古拉一世頒布了一道內容緊貼謝馬什科建言的敕令。翌年，謝馬什科被封為聯合教會主教，主持帝國內碩果僅存的兩個聯合教會教區之一。

波蘭起義讓聯合教會的問題第一次引起政府高度關注，也讓它成為了公眾注目和辯論的對象。因此，謝馬什科覺得有必要加快聯合教會和東正教統一的時程。一八三二年，尼古拉一世批准了謝馬什科的請求，讓已經獨立於天主教學院¹⁴⁵的聯合教會學院劃歸宗教事務管理總局管轄。但這個政策沒能落實。這是因為在輿論的支持下，東正教當局把轉化個別聯合教會堂區而不是整個聯合教會列為優先任務。心灰意冷之餘，謝馬什科請求允許他皈依東正教。東正教教會沒有批准，但承諾幫忙為轉化整個聯合教會鋪路。

自此，謝馬什科加倍努力，除推動聯合教會教區的「東正教化」以外，還推動它們在文化上俄羅斯化。他後來聲稱，他一直是以一種思想為指導原則：「把聯合教會轉化為重生後的俄羅斯東正教。」¹⁴⁶謝馬什科賣力說服聯合教會教士在教堂裡設置東正教風格的聖像壁（分隔內殿和聖所的一面屏幃或牆壁）、用俄羅斯祈禱書取代老舊的祈禱書，並鼓勵聯合教會教士蓄鬍——這是東正教教士的習俗。採用俄

羅斯祈禱書意味著把俄羅斯語引入聯合教會的教堂。這是一場艱苦戰鬥，因為聯合教會教士更加習慣使用波蘭語，他們也是用這種語言和謝馬什科通信。其實，謝馬什科雖然自認為比許多以俄羅斯語為母語的人更俄羅斯化，但他對俄羅斯語的掌握仍然有所不足，並為此感到羞愧。

謝馬什科另外還在手下教士中間發起一場反波蘭的宣傳活動，設法把他們的魯塞尼亞人（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身分認同轉換為俄羅斯人身分認同。他在一八三七年寫道：「為了能夠用俄羅斯精神溫暖聯合教會神職人員的心，應該利用每個可能的機會喚起他們對自己根源的記憶，讓他們回想起波蘭人對他們有過的壓迫，以及俄羅斯政府是多麼關懷他們的福祉。」他認為自己的努力已經取得一些成果：「先前，以俄羅斯姓名和遺產為榮是一種陌生的觀念，但如今，我相當比例的下屬已經知道要珍惜它們。」[147](#)

不過，總的來說，謝馬什科被自己碰到的種種困難壓得透不過氣。因為一方面，東正教當局懷疑他是反對直接改教和暗中有在壯大聯合教會；另一方面，羅馬天主教的教士又視他為寇讎。更重要的是，即使那些被他努力帶回他們「俄羅斯」根源的教士同情他，他一樣受到地主和農民的抵制：地主信仰的是天主教，又控制著村莊裡的資源，而農民生性保守，根本不想有任何改變。謝馬什科擁有的唯一權力只是指派贊成他政策的人去取代反對他政策的人，讓後者失去收入。他大肆運用這種權力，又結合民政當局和警察對付那些抵制他政策的聯合教會教士。他是一個狂熱分子，對自己所做的事毫不後悔或毫不懷疑，最終得到朝廷的全力支持。

到了一八三〇年代中期，尼古拉一世及其政府想要剷除聯合教會的態度更為明確。一八三五年，謝馬什科應邀加入一個負責兩教統一事宜的祕密政府委員會。兩年後，謝馬什科把聯合教會置於宗教事務管理總局管轄的老構想終於落實，這個構想曾在一八三二年獲得沙皇批准。兩位聯合教會重要人物的去世——一個是年邁的都主教布爾加

克，另一個是一直反對統一的主教，結果使得謝馬什科在教會內大權一把抓，鋪平了他實現俄羅斯民族宗教統一夙願的道路。

在東正教當局和帝國政府的支持下，謝馬什科召開了一個聯合教會會議，處理這個問題。按照謝馬什科的原定計畫，會議將會向沙皇呈遞他本人起草的一封訴願書，裡面指出：「立陶宛在混亂時期脫離俄羅斯，後來又被波蘭兼併，它的俄羅斯東正教居民受到迫害.....從此，這些民眾被分離於俄羅斯的廣大人民，不斷受到狂熱政策迫害，目的是讓他們與俄羅斯人成為陌生人.....有一百五十萬聯合教會信徒就語言和血緣上來說是俄羅斯人.....如果不想辦法，他們仍會多多少少和其親兄弟俄羅斯人形同陌路。」 148

宗教會議在一八三九年二月舉行，地點是白羅斯小城波洛茨克，此為十七世紀西化主義者西緬的家鄉。為這個會議做準備時，謝馬什科在當局的幫忙下，從聯合教會蒐集到一千三百零五份聲明書，表示他們已經準備好加入東正教會。儘管面對逮捕和放逐的壓力，仍然有五百九十三名教士拒絕簽署聲明。因為預期會有農民暴動發生，當局派出一支哥薩克軍團前往維捷布斯克省。一八三九年二月十二日，波洛茨克宗教會議採納「統一法案」，又向沙皇呈遞謝馬什科準備好的訴願書，要求他接納近一千六百個聯合教會堂區和近一百五十萬名信徒加入東正教會的請求。謝馬什科在波洛茨克的聖索菲亞大教堂主持過一場禮拜儀式後把訴願書帶到首都。聖彼得堡的宗教事務管理總局—東正教會的統治機構—欣然批准所請，不僅為聯合教會信徒的歸附高興，也為一部分俄羅斯部族能回歸同胞之中感到歡喜：「一個曾被打斷的古老統一重歸於一，重建了完美的合一.....過去曾經有幾百年時間，聯合教會信徒是因著血緣、祖國、語言、信仰、儀式和教會高層跟我們統一在一起。」 149

尼古拉一世效法凱薩琳二世，打造特別的紀念章以示嘉勉。紀念章銘文呼應凱薩琳二世在第二次瓜分波蘭之後打造的紀念章¹⁵⁰，這樣說：「因武力所逼而分開（一五九六年），因愛而復合（一八三九年）。」就像凱薩琳一樣，尼古拉此舉也是對一場波蘭起義的回應，

希望透過把烏克蘭和白羅斯農民轉化為東正教徒，讓他們不再想加入什麼起義。但是，尼古拉的政策還有一個重要的新元素。他不僅想拿回他相信歷史上是屬於羅曼諾夫王朝的東西，還努力想恢復俄羅斯民族破裂了的統一性。從此，君主專制、東正教和民族性將會成為三股相輔相成的元素，攜手為把西部省分融入帝國而服務。不過，一八三九年的既成事實也埋下了未來紛爭的種子。那些「因愛」而跟東正教和俄羅斯民族復合的省分，很快將會挑戰由波洛茨克宗教會議發起人所推動的民族模式。

-
- 134 Russkii biograficheskii slovar', vol. 11, part 1, 45.
 - 135 Dmitrii Oleinikov, Nikolai I (Moscow, 2012), 254.
 - 136 利夫蘭 (Livland) 即利沃尼亞 (Livonia)。
 - 137 Konstitutsionnye proekty Rossii: 1799-1825 (Munich, 2007), 139.
 - 138 Aleksei Miller, "Triada grafa Uvarova i natsionalizm," Istoricheskie zapiski, no. 11 (2008): 191.
 - 139 Konstitutsionnye proekty Rossii, 156.
 - 140 Stephen Velychenko, National History as a Cultural Process (Edmonton, 1992), 98.
 - 141 Kievskii universitet: Dokumenty i materialy, 1834-1984, eds. M. Belyi and V. Zamlinskii (Kyiv, 1984), 14.
 - 142 Sergei Uvarov, Gosudarstvennye osnovy (Moscow, 2014), 51.
 - 143 紀念碑高二十點四公尺，其中人物雕像高四點四公尺，基座高十六公尺，豎立在聖弗拉夫基米爾山山頂，面臨聶伯河。
 - 144 Aleksei Chaplin, "Russkoe imia i russkaia vera Ukrainy," in Moskva 10 (2016): 231.
 - 145 指原先的聖靈學院。
 - 146 Zapiski Iosifa mitropolita Litovskogo (St. Petersburg, 1883), vol. 2, 14-15.
 - 147 同上，18.
 - 148 同上，83-84.
 - 149 同上，91.

150 凱薩琳的紀念章銘文作：「朕恢復了那些被強奪去的部分。」

第三篇 三位一體民族

第七章 烏克蘭的出現

他們兩人原訂在一八四七年三月三十日星期天結婚，但婚禮的兩天前，警察卻突然出現在新郎的公寓，將他逮捕，讓婚期被推遲了二十八年之久。被捕者是二十九歲的基輔大學歷史教授科斯托馬羅夫。三月三十一日晚上，本該舉行婚禮的第二天，科斯托馬羅夫被押解到聖彼得堡。逮捕命令是由帝國的最高層發出。

命令的簽發者奧爾洛夫伯爵是御前辦公廳第三廳廳長，負責政治偵防事務。未來的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聽取了相關簡報，事情涉及一些基輔的知識分子、政府官員、教師和學生。其中一個涉案人是以烏克蘭語寫作而受歡迎的詩人舍甫琴科，他是在四月五日抵達基輔時被捕，接著也是被押解到聖彼得堡。接下來還有更多人被捕並押解到首都。而首都的自由派人士對於當局的行動還茫然不解。

基輔、波多利亞和沃里尼亞三省的總督比比科夫當時人在聖彼得堡，任務之一是報告在基輔一棟建築物牆壁上發現的這個呼籲：「兄弟父老們，一個偉大的時刻已經來臨！藉這個時刻，你們將可洗雪我們永恆敵人的髒手加諸我們祖先骨灰和我們故土的不名譽。你們中間又有誰會不願意為這偉大的事業出力？上帝和善良的人民與我們同在！你們永遠是烏克蘭的忠誠諸子，是卡斯塔皮人（『卡斯塔皮人』是對俄羅斯人的蔑稱）的死敵。」[151](#)

這呼籲的反俄色彩呼之欲出，卻不是用波蘭語而是用俄羅斯語書寫，而且說話對象也不是當時主宰著基輔社會的波蘭貴族，而是「烏克蘭的忠誠諸子」，他們在朝廷眼中是俄羅斯民族的一員。比比科夫回波蘭之後奉命接管基輔學區的學監之職。在一個和大學師生舉行的會議上，他警告他們不要「胡思亂想」，揚言：「我既然有辦法讓五百萬人屈膝，必要的話一樣有辦法讓你們屈膝：到時要不是你們死就是我亡！」他提到的五百萬人是指右岸烏克蘭的居民—他們是由比比科夫管轄，但波蘭的叛亂分子卻聲稱這些居民是叛亂的追隨者。

毫無疑問，不忠的發源地正是那些朝廷建立來確保地區內居民向沙皇和帝國效忠的教育機構。科斯托馬羅夫是基輔大學的教授，而舍甫琴科也是基輔大學新聘的繪畫講師，之前是在古文獻委員會服務。該委員會致力彙編可證明右岸烏克蘭原屬俄羅斯的檔案文件，但在在在來看，它的努力起了反效果：不但未能鞏固政府和西部省分的「俄羅斯」民眾的關係，反而促進了一個獨立民族的發展。這個民族將會在接下來幾十年主張，他們擁有與帝國核心地區的大俄羅斯人平起平坐的權利。一個新的烏克蘭民族正從小俄羅斯人身份脫繭而出，而帝國政府也將會盡一切努力打壓這種發展，把烏克蘭精靈收回小俄羅斯人的瓶子裡¹⁵²。

第三廳對科斯托馬羅夫和舍甫琴科等人的調查揭發了一個祕密組織的存在。該組織稱為「聖西里爾與聖美多德兄弟會」，目標是創立一個以烏克蘭為核心的斯拉夫民族聯邦。政府圈子裡面的人把這個兄弟會稱為「斯拉夫會社」，後又改稱為「烏克蘭人斯拉夫會社」。

當局起初認為這個祕密組織是一個更大思想運動的一部分，也有理由這樣認為。在一八四〇年代，政府官員給一群主要以莫斯科為基地的知識分子貼上「親斯拉夫派」的標籤。這群知識分子的特色是對民族性的議題非常認真，但他們對民族性的看法只有一部分和政府的觀點重疊，政府的版本就是烏瓦羅夫的版本，即主張俄羅斯民族性體現在東正教、君主專制和民族性這個鐵三角。親斯拉夫派對東正教極為敬重，但對政府卻沒有太多熱情。他們還相信，彼得一世西化政策已經讓俄羅斯幾乎完全失去原有的獨特性。

親斯拉夫派是在反對有些俄羅斯知識份子和政治菁英鼓吹西化的背景下浮現，反對西歐可以作為俄羅斯的發展楷模。他們的觀點首次充分表達在恰達耶夫的《哲學書簡》一書，書中指出俄羅斯因為東施效顰，以致落在西方之後。這本書寫成於十二月黨人起義之後的幾年間，一八三六年出版，出版後既招來政府的激烈反應，政府關閉了發表這些書信的雜誌社，又引起剛誕生的親斯拉夫運動強烈共鳴。親斯拉夫運動由著名神學家、哲學家和詩人霍米雅科夫率領：他和他的追

隨者深受德意志哲學家謝林影響，他是黑格爾的朋友和競爭對手，相信社會是一個有生命的有機體，所以著作裡強調俄羅斯的歷史傳統和教會的重要性，主張俄羅斯和西方的國情大相逕庭。

聖西里爾與聖美多德兄弟會一案的調查報告提到了一些親斯拉夫運動的關鍵人物，其中包括波戈金和舍維廖夫，兩人都是莫斯科大学教授。波戈金教歷史，他曾受烏瓦羅夫委託寫一部把西部省分整合到帝國的教科書，舍維廖夫教的是語文學和文學。兩人還共同主編《莫斯科人》雜誌，這本雜誌在一八四〇年代成了親斯拉夫運動的喉舌刊物。波戈金也是新興的泛斯拉夫運動的領軍人物，該運動認為不同的斯拉夫人是一個大家庭。因為強調俄羅斯民族的獨特性和自覺，親斯拉夫派中都有泛斯拉夫主義的傾向，啟迪了那些想要標榜自己民族獨特性的非俄羅斯的斯拉夫人，讓他們認為他們的民族也有權要求自治和獨立。

早期，烏克蘭在親斯拉夫派的想像裡占有特殊地位。波戈金和舍維廖夫尤其對烏克蘭的文化和歷史極感興趣，不過他們是把烏克蘭稱作小俄羅斯。一八三〇年代，當科斯托馬羅夫還是烏克蘭東部哈爾科夫大學的學生時，上過舍維廖夫的課，深受影響。舍維廖夫在課堂上提到小俄羅斯時稱之為大俄羅斯的姊妹，極為強調民族性，並鼓勵學生研究人民大眾的文化。但此中有一個問題：莫斯科和哈爾科夫對「民族性」一詞的理解並不相同¹⁵³。後來，當科斯托馬羅夫前往農村採集烏克蘭人的民俗時，他發現自己只能用烏克蘭語和農民溝通。到了一八三九年，他開始用烏克蘭語寫作。科斯托馬羅夫不是第一個崇拜民族性和從田野帶回材料的人，但他帶回來的東西是用一種莫斯科和聖彼得堡親斯拉夫派看不太懂的語文寫成。

用烏克蘭白話文寫成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出版於一七九八年。它出現在聖彼得堡，一家印刷廠印行了維吉爾的諷刺劇《埃涅阿斯紀》六部曲中的前三部，稱為《艾涅伊達》。原史詩中的希臘人角色全被改為操烏克蘭語的札波羅熱哥薩克人。作者科特利亞列夫斯基，父親是住在前哥薩克國的哥薩克官員。科特利亞列夫斯基當過老師和軍官，

一八一二至一八二一年擔任波爾塔瓦劇院藝術總監。期間，他寫出第一部以現代烏克蘭語創作的戲劇《來自波爾塔瓦的娜塔卡》。當時，第一部烏克蘭語語法書和第一本烏克蘭語民歌集都已經問世。

到了一八三〇年代，哈爾科夫成了烏克蘭浪漫主義運動的中心。這時期嘗試用烏克蘭語創作的作家包括俄羅斯語文學家斯列茲涅夫斯基和貴族子弟克維特卡·奧斯諾維亞年科。一八三三年，克維特卡·奧斯諾維亞年科寫出第一篇烏克蘭語短篇小說。五年後，科斯托馬羅夫創作出一部烏克蘭語戲劇，取材自哥薩克人的歷史，然後又出版了自己的烏克蘭語詩集。

但在一八三〇年代晚期，對烏克蘭文學貢獻最大的人是科斯托馬羅夫未來的同謀者舍甫琴科。就像科斯托馬羅夫那樣，舍甫琴科一出生便是農奴，但科斯托馬羅夫十五歲便擺脫農奴身分，這是因為他媽媽雖是農奴，父親卻曾經是貴族。舍甫琴科仍要等到二十四歲才得到自由身。說起來讓人難以置信，他能夠贖身，要歸功於俄羅斯藝術界的幫助和朝廷的慷慨大方。一八三〇年代早期，舍甫琴科的地主把他帶到聖彼得堡，而他的藝術天分很快就受到俄羅斯藝術界和知識界最知名人物的賞識。他們設法幫助這個年輕藝術家獲得自由，並最終成功。當時，優秀宮廷畫師布留洛夫為最著名的詩人也是太子的教師茹科夫斯基畫了一幅畫像。畫像在一八三八年的拍賣會上被一個皇室成員買去，而買主也知道，他付的這筆錢將會被用來購買一個二十四歲農奴的自由。

舍甫琴科的繪畫天分在當時是公認的。一八三八年，成為自由人之後，舍甫琴科進入「帝國美術學院」就讀，拜在他的恩人布留洛夫門下。但舍甫琴科的真正天分卻是在於詩歌和寫作。他用俄羅斯語寫散文，用烏克蘭語寫詩。正是詩歌使他成名但又惹上麻煩：他首先是引起俄羅斯文評家不悅，然後是引發朝廷不滿。他的烏克蘭語詩集首次出版於一八四〇年，書名作《吟遊詩人》，在俄羅斯的文學雜誌和報紙受到廣泛討論。雖然有些評論家樂於看見有烏克蘭語詩集出現，

但其他評論家卻質疑他的做法，認為一個天才詩人把聰明才智用在創作烏克蘭語詩歌是一種浪費。

一個評論家在暢銷雜誌《供閱讀的圖書館》這樣寫道：「在我們看來，小俄羅斯詩人對一個事實未予以充分關注，那就是他們常常用一種甚至不存在於俄羅斯的方言寫作；他們只是不客氣地把大俄羅斯語的單詞和短語按照小俄羅斯語的方式改造，創造出一種從不存在的語言，創造出一種任何俄羅斯人—不管是大、小、紅、白、黑俄羅斯人都不可能稱之為自己所有的語言。」¹⁵⁴另一位評論者在《北方小蜜蜂》雜誌指出：「我們要奉勸他，應該用俄羅斯語來表達他的精緻情感。那樣，他的小花朵，一如他這樣稱自己的詩句，會更繽紛、更馥郁和更能傳之久遠。」¹⁵⁵

舍甫琴科並不是唯一因為用烏克蘭語寫作而被攻擊的作家。當科特利亞列夫斯基的《艾涅伊達》在一八四二年出版後，也有同樣遭遇。一個評論家在《供閱讀的圖書館》表示：「對於未曾有機會在小俄羅斯及其周遭地區住過的俄羅斯讀者來說，科特利亞列夫斯基先生寫的詩是不可理解的，甚至手邊帶著字典也是一樣。」¹⁵⁶不是所有俄羅斯文評家都贊同這一看法，不過，抱持這樣看法的文評家也並非信口開河：烏克蘭語作品確實讓俄羅斯讀者難以看懂。即使是果戈里用烏、俄雙語對照寫成的作品，一樣需要附一張詞彙對照表。

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民族性差異不獨顯示在語言上。歷史是另一個爭論的焦點。繼當初幫教育部長烏瓦羅夫寫《俄羅斯人民史》的作者波列伏依批評朝廷史官班特什·卡緬斯基在《小俄羅斯史》中沒有考慮到烏克蘭人的特殊身分認同之後，烏克蘭人馬克維奇也著手寫一部新的烏克蘭人歷史。他的五卷本《小俄羅斯史》在一八四二和一八四三年之間陸續出版。可作為他的思想縮影的是他用匿名寫成的手稿《羅斯史》（約寫於一八一八年），其中把哥薩克人的歷史獨立開來處理。這部匿名作品在哈爾科夫得到斯列茲涅夫斯基的推廣，在科斯托馬羅夫的圈子裡廣為傳誦，更加堅定了他們認為烏克蘭史不是俄羅斯史的一部分的信念。

一八四六年，《羅斯史》一八一八年的手稿在莫斯科出版，出資者是莫斯科大學斯拉夫研究的教授博迪安斯基；他出生於烏克蘭，是親斯拉夫派的一分子，名字也出現在那份調查聖西里爾與聖美多德兄弟會的報告。另一個嫌犯波戈金則進一步認為，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的文化差異不僅止於語言和歷史兩方面。他在一八四五年寫道：「大俄羅斯人和小俄羅斯人毗鄰而居多年，而且一直被認為分享著同一信仰、同一命運和同一歷史。但他們有多少分別只有天曉得！」¹⁵⁷

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親斯拉夫派對於大、小俄羅斯一體性的信仰，還有他們把後者視為俄羅斯文化源頭的做法，都受到了小俄羅斯人對自身民族性研究的挑戰。受到莫斯科和聖彼得堡愛談民族性的人的鼓勵，烏克蘭人不僅把一種相當不同於俄羅斯語的語言帶到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沙龍，還把一套跟俄羅斯人民和國家的歷史相當不同的歷史帶到那裡。有一點很快便昭然若揭：烏克蘭的語言、歷史和文化不僅可以被用來構築有別於俄羅斯人的過去，還可被用於構築有別於俄羅斯人的未來。在這種新願景中，小俄羅斯將會變成烏克蘭——一個性質上既相當接近俄羅斯但又與之有著重大不同的實體。

聖西里爾與聖美多德兄弟會一案在一八四七年五月調查終結。御前辦公廳第三廳廳長奧爾洛夫伯爵在遞交沙皇的報告中寫道：「透過基輔大學學生彼得羅夫提供的線索，我們揭發了一個斯拉夫會社—更精確的說法是烏克蘭人斯拉夫會社。彼得羅夫是一個前警官的窮兒子，在兄弟會活動的同一座大樓租房居住。他無意中聽到他們的一些討論，又被邀請參加他們的一些會議。他在會議上聽來的話讓他向當局舉報他的鄰居。根據彼得羅夫所述，兄弟會計畫發動一場民眾起義，推翻統治當局，最終目標是團結所有斯拉夫民族，建立一個建基於大眾代表制度的政府。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們準備廢除皇室。」

¹⁵⁸

不過，奧爾洛夫認為，從對兄弟會成員的盤問和對他們綱領文件的分析顯示，最初的恐懼和擔憂有些誇大其詞。包括科斯托馬羅夫在內，兄弟會只有三個成員。他們的熟人，例如舍甫琴科只會偶爾參加

討論，而且幾個月後就退出了。兄弟會成員和他們的朋友沒有準備起義，而且聲稱他們只打算在俄國沙皇的主持下統一斯拉夫各部族。

「所以，幸運的是，這起政治罪惡並沒有發展到最初報告所暗示的程度。」 159

後來歷史學家認為，奧爾洛夫若非刻意就是因為無心之過低估了兄弟會構成的威脅，並歪曲或誤解了其綱領文件的性質。事實上，當局擔心的「政治罪惡」明明白白見於兄弟會的一些文件上，寫得最詳細的是《上帝的律法，又稱烏克蘭人民的創世記》。奧爾洛夫稱這東西只是波蘭詩人密茨凱維奇作品的翻炒，而科斯托馬羅夫在被盤問時亦聲稱它是一八三〇年代初期由波蘭人草擬。但事實上，科斯托馬羅夫正是它的主要作者。《烏克蘭人民的創世記》也包含很多兄弟會成員討論過的觀念。

這部作品揭櫫的政治目標確實就像當局在一開始所擔心的那樣，是要創立基於大眾代表制的斯拉夫聯邦，而這個聯邦沒有留位置給沙皇。它把皇室成員視為來自日耳曼的僭奪者，強把他們的專制統治加給熱愛自由的斯拉夫人。未來斯拉夫國家的社會秩序應該基於平等原則和基督宗教倫理。根據《烏克蘭人民的創世記》，新的聯邦裡沒有沙皇，而是由天國的統治者統治。科斯托馬羅夫只接受烏瓦羅夫所揭櫫的鐵三角其中兩個元素—宗教和民族性，拒絕接受君主專制。不過，他是用非獨裁的方式詮釋宗教，而且《烏克蘭人民的創世記》裡面歌頌的並非俄羅斯的民族性，而是烏克蘭人的民族性。

這份文件認定烏克蘭人既有別於俄羅斯人，亦有別於波蘭人，注定要在未來的斯拉夫聯邦占據領導地位。烏克蘭人之所以能夠扮演這個特殊角色，乃因為他們是斯拉夫人之中最有平等和民主精神的一群。俄國人是由一個獨裁的沙皇統治，波蘭人則飽受地主和貴族階級欺壓，反觀烏克蘭人卻是一個珍視自身哥薩克人民主傳統的農業民族。除了他們的平等主義社會結構之外，烏克蘭人還有哪些卓越特點呢？科斯托馬羅夫的朋友和同謀庫利什認為，烏克蘭人的卓越還表現在語言和風俗。另一個同謀安德魯什基則預期未來的烏克蘭國不僅涵

蓋俄羅斯帝國中的烏克蘭人土地，還涵蓋奧地利的加利西亞。在科斯托馬羅夫的設想裡，未來的烏克蘭國是一個共和國，與其他斯拉夫國家結為聯邦，聯邦中每個成員國都是平起平坐。《烏克蘭人民的創世記》用以下的話作結：「烏克蘭將成為斯拉夫聯邦中一個獨立共和國。屆時，世界所有人民將會指著地圖上的烏克蘭說：它是當初被建築者棄而不用的石頭，但它將會成為奠基石。」 160

奧爾洛夫建議用監禁和國內流放來懲處「親烏克蘭派」（Ukrainophiles）—這個詞是他自創，指兄弟會的核心成員和相關人等—例如舍甫琴科即被強迫從軍。當局不相信舍甫琴科是兄弟會的同夥，卻對他的詩感到困惑，因為這些詩不僅讚揚烏克蘭，還指責皇帝和皇后剝削他的鄉土。他對統治王朝的不知感恩讓他們惱火：舍甫琴科的贖身錢可是由一位皇室成員所支付。

奧爾洛夫還擔心舍甫琴科對哥薩克歷史的緬懷可能會對讀者有不良影響。「因為喜歡這些詩，大家可能會誤以為哥薩克國時代真的很美好，巧妙地把它恢復過來，以及誤以為烏克蘭有能力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161奧爾洛夫寫道。他認為庫利什的散文也有著相同的害處。安德魯什基想要恢復哥薩克國的夢想亦是當局的重大憂慮之一。有些學者認為，當局是把這種文化民族主義的新威脅誤當成舊有的哥薩克分離主義。

為避免對兄弟會的綱領起到宣傳作用，當局說服科斯托馬羅夫等人改變原來的供詞，去配合官方說法。根據該官方版本，兄弟會不過是想在沙皇的旗幟下統一所有斯拉夫人。但這不表示兄弟會的犯行可以免罰：政府公布了兄弟會存在的事實，對其成員一一做出懲處。奧爾洛夫建議一定程度公開這案件，好讓所有人知道，那些「膽敢違背政府的態度擅自搞什麼斯拉夫國的人會有什麼下場。此舉也可以讓其他親斯拉夫派分子不敢做同樣的事」 162。判刑並不算特別嚴厲。兄弟會主腦科斯托馬羅夫被判在聖彼得堡監禁一年，然後流放至伏爾加河畔小城薩拉托夫。其他人被判監一至三年不等，出獄後也是國內流放。大部分涉案者都只是被逐出烏克蘭或是被轉移到俄羅斯。

當局把兄弟會的活動視為波蘭貴族爭取右岸烏克蘭效忠的陰謀之一。看過調查報告之後，尼古拉一世表示：「顯然，那是以巴黎為基地所進行的宣傳工作的一部分。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不相信有這種工作在烏克蘭進行，但現在卻是再無疑問。」¹⁶³第三廳一個官員所寫的備忘錄也是這種調調，但他不贊成嚴懲涉案人：「嚴厲措施只會讓他們更珍視自己的犯禁思想，還有可能讓迄今順服的小俄羅斯人產生一種對政府神經兮兮的態度，就像波蘭人在起義失敗之後那樣。更適當的做法是不動聲色，不讓小俄羅斯人知道政府有任何理由懷疑有害觀念已經被散播到他們之中。」¹⁶⁴

不動聲色不代表可以對小俄羅斯人的蠢蠢欲動置之不理。一份第三廳官員撰寫的備忘錄建議採取措施遏制親烏克蘭派觀念的傳播：「大眾教育部長應該提醒所有教授、教師和審查官，他們在著作和講演中應該自覺地避免提起小俄羅斯、波蘭和其他俄羅斯國土等任何會潛在危及帝國完整與和平的課題。相反地，他們應該竭盡所能，透過所有學術和歷史著作讓所有這些部族向俄羅斯保持忠誠。」¹⁶⁵時序來到一八五四年，烏瓦羅夫提醒內政部長曾經有過這麼一道諭旨：「作家在處理小俄羅斯的民族和語言問題時，應採取最小心謹慎的態度，以免讓讀者對小俄羅斯的愛壓倒對祖國—即帝國—的感情。」¹⁶⁶

面對波蘭人在西部省分所構成的威脅，政府使用俄羅斯民族性的觀念作為維持對該地區控制的武器，但它這樣做的時候小心翼翼，避免讓民族性觀念動搖君主專制的原則和帝國的統一。這是一種極難達到的平衡狀態，但當局明白牽涉其中的複雜性。

雖然當局不允許公眾知道有這些和其他「破壞性觀念」存在，但八卦工廠自會把謠言傳開去。聖彼得堡一個文學作品審查官尼凱特恩科在日記中寫道：「政府在南方的基輔揭發了一個祕密會社，其目標是要效法美國，在歐洲建立一個所有斯拉夫人的民主制度邦聯……據說，整件事情是奧地利政府的代表交涉揭露。」¹⁶⁷

事態的發展讓俄羅斯的西化主義者大樂。他們一直不信任小俄羅斯方案，認為它暗藏鬼胎，是要把白羅斯拉離開西化的道路，拉回到彼得大帝之前的時期，所以不斷與親斯拉夫派論戰。他們一位領袖暨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對該政權表態聲援，寫道：「舍甫琴科被送往高加索地區當兵。我不可憐他，換作我是法官，一樣會這樣判。我對於他那樣的自由派一向反感。他們是任何成就的敵人。他們魯莽的白癡行為會激怒政府，讓它變得多疑，在沒有叛亂處看見叛亂，並對文學和教育採取致命性的嚴厲措施。」 168

談到庫利什主張烏克蘭應當從俄羅斯分離之說，別林斯基繼續砲聲隆隆：「那些烏瓜（對烏克蘭人的蔑稱）真是的！他們只是傻頭傻腦的綿羊，卻奉著豬脂肪餃子的名義追求解放！好吧，他們現在終於被禁止寫任何東西了，自己搞砸了一切。但在另一方面，你又怎能怪政府？什麼樣的政府會允許有人用文字煽動它的其中一省獨立？」 169

莫斯科的親斯拉夫派沒有被捲入兄弟會的案子。當局原先懷疑作家又是親斯拉夫派活躍分子的奇若夫是兄弟會成員，但沒有將他起訴。這除了因為查無實據，據奧爾洛夫說還因為他「原來只是個親斯拉夫派分子，是俄羅斯民族的捍衛者，對俄羅斯民族的理解一本莫斯科學者的精神」 170。根據第三廳一位密探所寫的報告，把親斯拉夫派團結在一起的只是「一種朦朧和神祕的預感。根據這種預感，東方在思想上終會勝過西方。他們心繫古代，愛莫斯科，也因此對聖彼得堡懷有某種惡意」。他繼續說：「沒有一個涉嫌人懷有政治目的。他們的渴望和期待只是俄羅斯拋棄外國元素，走上民族獨立發展的道路。」 171他說得沒錯。親斯拉夫派領軍人物之一的霍米雅科夫聽說了兄弟會的目標之後，這樣寫道：「小俄羅斯人最終受到了政治愚蠢的影響。聽見他們的胡說八道和走回頭路讓人傷心難過……我們今天必須思考的是這個：道德鬥爭。」 172

逮捕和判刑讓俄羅斯的親斯拉夫派疏遠他們的烏克蘭同道。就連莫斯科知識分子中的親烏克蘭派也是這種態度，一個例子是波戈金。根據政府一個線人的報告，自從逮捕事件之後，波戈金在談到他的親

斯拉夫觀念時，說法變得大為不同。這句話的意思可以從他對《羅斯史》的評論顯示出來。《羅斯史》是匿名作品¹⁷³，一八四六年在莫斯科出版，其中把烏克蘭哥薩克人當成一個獨立民族，把他們的歷史獨立開來處理，而這種思考方式對科斯托馬羅夫的圈子大有影響。一八四九年，波戈金在《莫斯科人》雜誌評論《羅斯史》時指出，這本書的弊病在於「把〔小俄羅斯人〕和強大的大俄羅斯人—俄羅斯國家的核心—統一所得到的好處統統略過不提」。不過，在他更早前讀作者託名大主教科內斯基的《羅斯史》時，態度卻大為不同。波戈金在一八四六年，即逮捕事件之前一年，寫道：「我讀了科內斯基的書，大感滿意。」¹⁷⁴又表示很贊成《羅斯史》作者在書中所描繪的：彼得一世和他的羽翼對烏克蘭很不仁。

一八五一年，波戈金以書信體寫成一篇文章，寄給傑出語文學家斯列茲涅夫斯基，前面說過，他曾是哈爾科夫浪漫主義運動健將。文中，他主張基輔羅斯的歷史是大俄羅斯歷史的一部分。這種觀點也和他原來的不同，因為他以前都主張基輔羅斯的歷史是小俄羅斯歷史的一部分。他現在的觀點標誌著一場漫長辯論的開端。不過，在波戈金自己看來，他的新觀點只是他從前有關斯拉夫民族和國家觀點的自然發展。他相信，歷史是民族活動的產物，而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歷史。只要俄羅斯人（大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小俄羅斯人）一天是不同的斯拉夫民族（諸如保加利亞人、塞爾維亞人和捷克人都是有獨立民族性的斯拉夫民族），基輔羅斯的歷史便只能屬於它們其中之一。現在，基於同樣理由，波戈金決定把這段歷史改判給大俄羅斯。

尚在一八三〇年代中期，波戈金已然無法滿足烏瓦羅夫關於把東北羅斯和西南羅斯的歷史結合在單一敘事裡的要求。到了一八四〇年代中期，波戈金進一步主張，早在基輔羅斯的時代，便有著語言上的差異，而這種差異對應於十九世紀的大俄羅斯語、小俄羅斯語和白羅斯語的差異。基輔、切爾尼戈夫和加利奇那種人都是操小俄羅斯語，明斯克和維捷布斯克都是操白羅斯語，弗拉基米爾和莫斯科都是操大俄羅斯語。他認為，包括俄羅斯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博戈柳布斯基在

內，基輔羅斯的諸位大公都是小俄羅斯人，要等到博戈柳布斯基的後裔定居東北後才「土著化」，成為大俄羅斯人。博戈柳布斯基和他父親—莫斯科的建城者多爾戈魯基—都是小俄羅斯人。

波戈金對基輔羅斯的這種歷史解釋等於砍去大俄羅斯歷史敘事中最被珍視的部分：基輔時代。但在寫給斯列茲涅夫斯基的那封信中，波戈金決定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他信誓旦旦表示，在讀早期基輔的編年史時，他完全看不見小俄羅斯語的痕跡，反倒是編年史所使用的語言顯示它們和大俄羅斯語有明顯相關性。又因為他把民族和語言視為一體兩面，所以主張在基輔全盛時期住在那裡和創造其歷史和史冊的，不是小俄羅斯人，而是大俄羅斯人。只有在入侵的蒙古人把大俄羅斯人趕到北方之後，小俄羅斯人才出現在基輔一帶。

這封信在五年後的一八五六年出版，馬上引起他的舊識基輔大學首任校長馬克西莫維奇的批評。馬克西莫維奇在一系列公開信中指出基輔編年史作者使用的是一種以南斯拉夫方言為基礎的教會斯拉夫語，因此，這種語言和基輔羅斯居民所用的語言無多大關係。他承認小俄羅斯語和大俄羅斯語在蒙古人入侵以前便存在差異，但認為兩者仍是緊密相關。他還認為，北方羅斯和南方羅斯的歷史在蒙古人入侵以前也是緊密相關。這樣說，他形同反駁波戈金把基輔羅斯的歷史歸給大俄羅斯的說法，而去主張基輔羅斯的歷史充滿小俄羅斯人（烏克蘭人）色彩。但馬克西莫維奇不是分離主義者：在他的認定裡，小俄羅斯人不是一個民族，而是二合一的全俄羅斯民族的一部分。他在寫信給波戈金的信上說：「我會比你更愛基輔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在培養一種對全俄羅斯人的愛和一種對小俄羅斯人更親密的愛的同時，我也因為基輔是我族人同胞的家園而愛它。」 [175](#)

在聖西里爾與聖美多德兄弟會的成員被國內流放或轉為低調之後，把大俄羅斯和小俄羅斯的歷史拆開來的推手變成是莫斯科而不是基輔。爭論的焦點也從哥薩克人的歷史（這是科斯托馬羅夫的焦點），變成基輔羅斯的往昔。波戈金沒有被馬克西莫維奇說服。他繼續否定自己的舊觀點，即基輔歷代大公是小俄羅斯人之說，改把基輔

羅斯的歷史乃至整部羅斯史都歸給大俄羅斯。出版於一八七一年的蒙古入侵時期的羅斯史中，波戈金寫道：「有一說認為，小俄羅斯人曾經隨著多爾戈魯基和博戈柳布斯基向北遷，到達蘇茲達爾¹⁷⁶。真是如此的話，他們理應會在當地的語言和習俗留下小俄羅斯人的印記。但我們卻完全沒有看見這樣的印記，當時的北方毫無改變。所以，去了北方的不是小俄羅斯人，而是另一支大俄羅斯人。」¹⁷⁷

在波戈金的其他作品和他遊歷過斯拉夫諸土地後寫給政府的報告中，他還是認為大俄羅斯人和小俄羅斯人有著不同的民族性（他寫道，後者擁有「所有獨立部族的識別標誌」），但屬於同一個俄羅斯人群體。他有時認為奧匈帝國治下的加利西亞居民與小俄羅斯人不同，有時認為他們是小俄羅斯人的一部分，但總是主張他們是更大的俄羅斯民族的一部分。在言行上，他支持發展他所謂的小俄羅斯方言，但反對把它提升到和俄羅斯語平起平坐的地位。一八五〇年代中期，在主張應該讓波蘭在帝國境內享有自治地位時，波戈金建議帝國疆域內只應該承認兩種語言：俄羅斯語和波蘭語。「語言一是兩群人之間的真正邊界。波蘭是說波蘭語的地方，俄羅斯是說俄羅斯語的地方。還有什麼原則能比這條原則更正確或更公道？」¹⁷⁸

波戈金和馬克西莫維奇的爭論引出了一個問題：要如何劃分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歷史敘事？它挑戰了在十九世紀上半葉主宰著俄羅斯菁英階級的思維模式。該模式認為，基輔羅斯屬於全俄羅斯人的過去。波戈金比他之前的任何人更明確地把這個「過去」拆為大俄羅斯人和小俄羅斯人兩部分。除了大俄羅斯人和小俄羅斯人之外，他也承認白羅斯人是一個獨立體，但馬克西莫維奇則堅持全俄羅斯民族只有大俄羅斯人（北俄羅斯人）和小俄羅斯人（南俄羅斯人）之分。雖然兩人在辯論中沒有觸及全俄羅斯民族性的這種分歧，但它將會在下一個十年，即混亂的一八六〇年代，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

波戈金的信是發表於一八五六年，這一年也是新皇帝亞歷山大二世統治的第一年。亞歷山大二世是茹科夫斯基的學生，以具有自由主義傾向著稱。他的統治一開始充滿新氣象，引入了一些重要的政治、

社會和文化改變，也為俄羅斯和烏克蘭知識分子的會遇創造出新的機會。兄弟會成員在幾年後獲准從流放地回歸故里，自此把活動基地從基輔轉移到聖彼得堡。舍甫琴科獲釋後也是去了聖彼得堡。一八五九年，科斯托馬羅夫當上聖彼得堡大學俄羅斯史教授。說來諷刺，這個教席一度是首倡「羅斯重新統一」範式的烏斯迪亞洛夫所據有。

如果說烏斯迪亞洛夫是最受朝廷喜愛的歷史學家，那科斯托馬羅夫就是聖彼得堡激進學生和自由主義民眾的寵兒。根據一個同時代人回憶，科斯托馬羅夫發表就職演講時「整個演講廳擠滿了人，所以有些聽眾只能坐在窗台，或是兩個人坐一張椅子」。演講結束後，他「被聽眾舉了起來，抬著往外走」¹⁷⁹。演講中，科斯托馬羅夫對有關民族性的爭論重新定調，把重點改而放在人民群眾身上，認為人民群眾才是歷史該研究的主要對象。他這樣說：「任何法律、任何制度本身對我們而言都不重要，它們唯獨應用在人民的生活上時才會是重要的。那些把國家擺第一的歷史學家眼裡視為不重要的事情，將會是我們的優先課題。」¹⁸⁰辯論顯然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¹⁵¹ A. V. Smirnov, "Stranitsy zhizni i tvorchestva istorika," in Nikolai Kostomarov, *Russkaia istoriia v opisaniie ee glavneishikh deiatelei* (Moscow, 2004), 18.

¹⁵² 這裡是把烏克蘭民族運動比作精靈，把小俄羅斯人身份認同比作阿拉丁神燈之類。

¹⁵³ 指「親斯拉夫派」認為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是同一個民族，烏克蘭人卻不這樣認為。

¹⁵⁴ Taras Shevchenko v krytytsi, ed. Hryhorii Hrabovych (Kyiv, 2012), vol. 1, 4.

¹⁵⁵ 同上，6.

¹⁵⁶ Olga Andriewsky, "The Russian-Ukrainian Discourse and the Failure of the 'Little Russian Solution,' 1782-1917," in *Culture, Nation and Identity: The krainian-Russian Encounter, 1600-1945*, eds. Andreas Kappeler, Zenon E. Kohut, Frank E. Sysyn, and Mark von Hagen (Edmonton, 2003), 191.

¹⁵⁷ 同上。

¹⁵⁸ Kyrylo-Mefodiivs'ke tovarystvo: U triokh tomakh, eds. H. I. Marakhov and V. H. Sarbei (Kyiv, 1990), vol. 1, 62.

¹⁵⁹ 同上，64.

- 160 同上，169.
- 161 同上，67.
- 162 同上，68.
- 163 Aleksei Miller, *Ukrainskii vopros v politike vlastei i russkom obshchestvennom mnenii* (vtoraia polovina XIX veka) (St. Petersburg, 2000), 56.
- 164 Kyrylo-Mefodiivs'ke tovarystvo, vol. 1, 308.
- 165 同上，293.
- 166 Miller, *Ukrainskii vopros*, 58.
- 167 Petr Zaionchkovskii, *Kirillo-mefodieevskoe obshchestvo* (Moscow, 1959), 138.
- 168 Vissarion Belinskii,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Moscow, 1956), vol. 12, 441.
- 169 同上。
- 170 Kyrylo-Mefodiivs'ke tovarystvo, vol. 1, 63.
- 171 同上，294.
- 172 Alexei Miller, *The Ukrainian Question: The Russian Empire and Nation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2003), 60.
- 173 前面指出過，這本書是烏克蘭人馬克維奇所撰。
- 174 Serhii Plokyh, *The Cossack Myth: History and Nationhood in the Age of Empires* (Cambridge, 2012), 318.
- 175 Mikhail Maksimovich, "Otvetye pis'ma M. P. Pogodinu," *Russkaia beseda* 2 (1857): 85.
- 176 位於基輔羅斯時代弗拉基米爾大公國之內。今莫斯科東北方。
- 177 Mikhail Pogodin, *Drevniia russkaia istoriia do mongol'skogo iga* (Moscow, 1871).
- 178 Mikhail Pogodin, *Izbrannye trudy* (Moscow, 2010), 341.
- 179 Memoir of E. F. Iunge, in *Kievskaiia starina* 28, no. 1 (1890): 23.
- 180 David Saunders, "Mykola Kostomarov (1817-1885)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Ukrainian Ethnic Identity," *Slavonica* 7, no. 1 (2001): 15.

第八章 大、小和白

一八五四年九月十一日是俄羅斯海軍大大丟臉的一日，不過後來又被改寫為俄羅斯的榮耀和犧牲的日子。當天，俄羅斯「黑海艦隊」的指揮官奉命鑿沉停在艦隊基地塞瓦斯托波爾港的五艘戰列艦和兩艘護衛艦。這只是個開始。一八五五年八月，剩餘的俄羅斯艦艇全部沉到港口海底。俄軍旋即離開塞瓦斯托波爾，這個撤軍行動標誌著帝國在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六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中敗局已定。

俄國人要弄沉軍艦，是因為它們根本阻止不了英國、法國和鄂圖曼的聯軍入侵克里米亞。風帆船隻完全不是蒸汽引擎推動的英法戰列艦的對手，而俄羅斯在黑海並沒有蒸汽動力戰列艦。聯軍登陸那一天，俄國軍艦更因為天不起風而動彈不得，唯一能做的只有用沉船來阻礙聯軍艦隊開進塞瓦斯托波爾港。讓帝國統治者難堪和讓未來歷史學家津津樂道的是，聯軍透過建築克里米亞的第一條鐵路，避開了這個難題。鐵路讓補給物資從巴拉克拉瓦港運至塞瓦斯托波爾。

一八五六年在巴黎簽署的和平條約被俄國視為奇恥大辱。俄羅斯人曾經在一八一四年征服巴黎，但他們四十年後重返這個城市卻是為了同意一項有損帝國領土完整的安排。聖彼得堡被迫放棄在高加索和多瑙河地區的領土，十一年後又因為囊中羞澀而把阿拉斯加賣給美國。它被容許保有克里米亞，但不得在黑海沿岸駐紮艦隊或修築要塞。更重要的是，這條約讓帝國的大國顏面完全丟光。

所以，有必要採取什麼行動來恢復俄羅斯的國際地位。政府把首要之務放在建造一支新艦隊和改革陸軍，但這兩項工作都需要大規模的社會改革來配合。新皇帝亞歷山大二世相信，他不需要釋出太多獨裁權力便可以把這件大工程做好。然而，他和他的顧問團都知道，實行某種程度的自由化在所難免。這一點在波蘭問題上表現得最明顯：看來只有放鬆箝制，帝國才有可能跟它最有動員力和獨立精神的治下民族搞好關係。

除了打敗仗和國際地位受損，俄羅斯還得面對一八六一年二月解放農奴政策所引起的國內動盪。這動盪又讓波蘭社會大膽要求還他們失去的自由。前波蘭王國境內和俄羅斯西部省分的波蘭貴族都滿懷希望地期盼，亞歷山大二世會恢復他叔叔亞歷山大一世的政策，讓波蘭恢復自由並擁有一部憲法。波蘭王國在一八三〇年的「十一月起義」之後失去主權，只剩下低度的自治權。但新政府卻沒有這樣的計畫，幻滅的波蘭人於是再一次叛變。

這場新的波蘭革命開始於一八六三年一月，史稱「一月起義」。大批波蘭青年攻擊波蘭王國各城市的俄羅斯軍事單位，旋即得到立陶宛人、白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省分的響應。俄羅斯軍隊花了一年多才把起義敕平。當局接著清算起義的領袖和參與者，推出一個俄羅斯化這些邊區的新運動。政府這時明白到，不對俄羅斯民族本身重新想像，波蘭問題永無解決的可能。正是在亞歷山大二世統治第一年的公開辯論中，俄羅斯首次有了一個三位一體民族的特徵，這「三位」是大俄羅斯人、小俄羅斯人和白羅斯人。

從波蘭危機一開始，波蘭王國之外的前波蘭領土的未來便是朝廷和一般大眾的主要關切。亞歷山大二世登基之初便已經向波蘭人的輿論讓步，取消了父親的一項規定：波蘭人官員都必須先在俄羅斯人省分服務，才可回到前波蘭的土地任職。亞歷山大二世也解除非東正教徒不可在前波蘭土地任官的限制。但「去波蘭化」的計畫並沒有從政府的工作日程表中消失。

自亞歷山大在一八五〇年代晚期實施改革開始，都主教謝馬什科的支持者便瞧出了一個來自波蘭的新威脅，他是在帝國的俄羅斯東正教傘翼下最後掌管聯合教會者，相信一個不可分割的俄羅斯民族可作為對抗波蘭的堡壘。當時，在右岸烏克蘭的年輕貴族之間，出現了一群自稱為「愛農民者」，他們的出現造成波蘭人陣營的分裂，對俄羅斯帝國的威脅尤甚。「愛農民者」拋棄他們自小相信的天主教，皈依農民信仰的東正教。如果這些「愛農民者」宣布自己是俄羅斯人，那麼他們改信東正教對帝國政府將會是一個好消息，問題是，他們選擇

的身分認同是南俄羅斯人，或說是烏克蘭人。他們其中一人把名字從 Włodzimierz Antonowicz 改為 Volodymyr Antonovych（安東諾維奇）。日後，他將會是知名烏克蘭歷史學家。

謝馬什科的支持者宣稱，親烏克蘭主義不過是波蘭人的一個陰謀。一八五九年，基輔大學教授又是「泛俄羅斯運動」領導人之一的戈戈茨基提出了一個他認為可以終結「烏克蘭人運動」出現的行動綱領：

（一）應立即採取措施，教育聶伯河兩岸的人；（二）從現在起，應該支持俄羅斯三部族為一體的觀念，沒有這個觀念，我們將會死得很快；（三）所有小學課本應該統一使用俄羅斯語。應該把信仰和語言用作維繫元素。但在我們簡單的語言裡加入一些東西不是壞事；（四）我們絕不可促進我們和大俄羅斯之間的不和。變革的渴望是可以透過別的方式表達。別忘了，我們的敵人是波蘭人和羅馬！

戈戈茨基口中的「俄羅斯三部族」是大俄羅斯人、小俄羅斯人和白羅斯人。他的三位一體民族模型歷史根源久遠，源頭可回溯至一六五六至一七二一年，當時的俄羅斯沙皇都是自稱為「大俄羅斯、小俄羅斯和白羅斯的最高主宰」。彼得一世在一七二一年把自己的頭銜改為「全俄羅斯的皇帝」，但是他能控制的只有大俄羅斯的全部和小俄羅斯的一部分，至於白羅斯則早在五十年前便根據《安德魯索沃停戰協定》割讓給波蘭了。俄羅斯在一七七二年第一次瓜分波蘭重新得到白羅斯東部，但不管是皇帝頭銜抑或官方論述都是一仍舊貫。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波蘭時，俄羅斯分到的新「俄羅斯」土地實在太多，包括右岸烏克蘭、沃里尼亞、波多利亞和白羅斯西部，不煩一一列在皇帝頭銜上。一八二三年，當十二月黨人運動領袖佩泰爾坐下來寫他的起義宣言時，他算在俄羅斯民族裡的部族不是三個，而是五個。

一八二〇年代開始發展至一九三〇年代，俄羅斯學者對帝國西境的民俗和語言產生了強烈興趣，但這種研究興趣還是沒能夠回答俄羅斯

到底包括多少族群的問題。被帝國學者認定是俄羅斯語的地方語言為數眾多，甚至在大俄羅斯人自己本身之內也是如此。沙哈羅夫，這位醫生是莫斯科大學校友，在其著作《俄羅斯人祖先家庭生活的諺語》（一八三六）一書中主張，大俄羅斯語有四大方言，每一種又分化為許多亞方言。小俄羅斯語則是包括三種亞方言。後來被記錄在案的白羅斯語亦非常多，例如，一八五〇年代，一批俄羅斯軍官在白羅斯發現，當地人除了使用白羅斯語，還使用一種黑俄羅斯語的方言¹⁸¹，而白羅斯南部有些群體是使用小俄羅斯語方言。這個民族學研究的參與者多半認為，所有這些方言都是俄羅斯語的變體，而使用它們的人都是俄羅斯民族的一員。不過，這種新發現的「俄羅斯部族」語言多樣性引起了一個問題：俄羅斯到底有多少種方言？又因為早期的民族學家相信，每種語言都對應於一種民族性，所以另一個問題便是：俄羅斯到底有多少種民族性和亞民族性？

率先主張俄羅斯民族由三個亞群組成的人也許是納傑日金，他對俄羅斯民族的多樣性和一體性同時深信不疑。一八四一年，納傑日金從流放地回歸故里之後，出版了恰達耶夫具有震撼性的《哲學書簡》（一八三六年）¹⁸²，而在他即將成為內政部刊物的主編之時，又發表了一篇書評，談論維也納斯拉夫主義者科皮塔爾的一部作品。文章中他勾勒出俄羅斯語方言的歷史演變狀況，又認定它們一共是三種：第一種是龐塔斯斯拉夫語，即小俄羅斯語；第二種是波羅的海斯拉夫語，即白羅斯語；第三種是大俄羅斯語。納傑日金相信，前兩種方言的歷史最古老，大俄羅斯語則是前兩者的混合，是在新殖民的地區發展出來，這些殖民地位於說前兩種方言地區的東面。

納傑日金的書評發表在德意志刊物，俄羅斯境內知悉的人不多，但同一種俄羅斯語言和人民的三分法很快就被介紹給俄羅斯讀者。一八四二年，四十七歲的斯洛伐克審查官沙發利克在布拉格出版了一本名為《斯拉夫民族誌》的書。沙發利克是當時最著名的斯拉夫主義者，在書中，他一絲不苟地追溯俄羅斯語言的演變，採取的架構非常類似納傑日金；事實上，我們從納傑日金一篇文章得知，沙發利克寫

書時請教過他。要知道，當時的人都認為「俄羅斯世界」渾然一體，所以沙發利克的三分說猶如拋出一枚震撼彈，最初是引發一場語言學地震，最終則會改變東歐的政治地圖。

沙發利克把俄羅斯語分為三種方言：大俄羅斯語，其中包括諾夫哥羅德亞方言；小俄羅斯語，使用這種語言的不僅止於俄羅斯統治的烏克蘭人，還包括奧地利所屬加利西亞和匈牙利所屬外喀爾巴阡的居民；白羅斯語，其使用範圍包括白羅斯的東部和西部。沙發利克相信語言和民族性緊密相關，所以他把俄羅斯語分為三種，等於是把俄羅斯民族分成了大俄羅斯人、小俄羅斯人和白羅斯人。雖然沙發利克沒有對「俄羅斯語」方言做過民族學或語言學研究，他對帝國境內的相關研究卻是十分注意，也和當時一些俄羅斯斯拉夫主義者有所接觸。例如，他一八三五年在布拉格和波戈金見過面，後來又獲得波戈金的金錢資助。

沙發利克的另一個俄羅斯相識是博迪安斯基。博迪安斯基在烏克蘭出生，是莫斯科大學的「斯拉夫研究」教授，曾出資出版《羅斯史》¹⁸³。他為沙發利克提供語言材料，在一八三七年寄給他一本用白羅斯語「改寫」的《艾涅伊達》，還送他一幅烏克蘭語和白羅斯語的方言地圖。一八四二年十一月，博迪安斯基寫信給斯列茲涅夫斯基，這樣說：「我一直認為，普里皮亞季河是白羅斯人和小俄羅斯人的天然邊界，這特別是因為，住在河兩岸的所謂黑俄羅斯人構成了一個從霍霍爾人（即烏克蘭人）到白羅斯人的過渡。如果說我指出的這條邊界不同於沙發利克所指出者，那是因為我根據的記載是出自更早前便波蘭化的白羅斯人。」¹⁸⁴在以莫斯科為基地的親斯拉夫派眼中，沙發利克是不容置疑的語言學權威，所以《斯拉夫民族誌》一出版，博迪安斯基馬上把它翻譯成俄羅斯語。

一年後的一八四三年，他的翻譯發表在波戈金主編的《莫斯科人》雜誌。沙發利克對俄羅斯語的三分法—連同對俄羅斯人的三分法，此後成為波戈金重新詮釋俄羅斯史的基礎。他在一八五〇年代與馬克西莫維奇論戰時即採取了大俄羅斯人、小俄羅斯人和白羅斯人的

三分法。不過儘管沙發利克的三位一體模型非常流行，但它會不會被俄羅斯帝國接受卻無法保證。因為它很容易就會被看作不利於俄羅斯民族和國家。不過，讓人大出意外的是，抵制這個模型的聲音不是發自大俄羅斯，而是發自小俄羅斯和白羅斯。

在哈爾科夫大學，當時帝國最德隆望尊的語言學權威斯列茲涅夫斯基提出了自己一套對「俄羅斯語」的劃分方法。廣泛遊歷過斯拉夫人諸土地的一年後—亦即《斯拉夫民族誌》俄譯本出版的同一年，他在一八四三年把俄羅斯語分為兩大群組：南方俄羅斯語（即小俄羅斯）和北方俄羅斯語（即大俄羅斯語）。在這一點上，他是追隨馬克西莫維奇的腳步：後者在一八三七年曾對俄羅斯民族做出類似區分。保加利亞語言和文化專家維涅林在差不多同一時期提出過類似看法。斯列茲涅夫斯基承認白羅斯方言的存在，但認為它只是大俄羅斯語的變體。

不過，說白羅斯語是大俄羅斯語的一個變體，就等於說白羅斯人是俄羅斯人的一個亞群，也因此不具有獨自的民族性。根據警察廳的檔案紀錄，有一些聖西里爾與聖美多德兄弟會的成員正是這樣認為。更重要的是，在波蘭起義前夕，一些兄弟會的前成員開始大談烏克蘭人（又稱為小俄羅斯人或南俄羅斯人）具有獨立民族性。

對帝國當局而言，「波蘭問題」的再起讓「烏克蘭問題」有了新的緊迫性。今日被尊為俄羅斯民粹主義和社會主義鼻祖的作家赫爾岑第一個指出，烏克蘭是俄羅斯和波蘭領土爭奪戰中的一個獨立變數。一八五九年一月，他在倫敦出版的俄文雜誌《鐘聲》中這樣寫道：

「儘管我們採取了萬全對策，但萬一烏克蘭人記起莫斯科人對他們有過的種種壓迫……又同時記得（波蘭—立陶宛）共和國的軍人、地主和朝廷官員是怎麼對待他們，以至於他們既不想當俄羅斯人又不想當波蘭人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在我看來，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非常簡單。那就是，承認烏克蘭是一個自由和獨立的國家。」¹⁸⁵精靈就此跑出了瓶子。這還是有人第一次公然談論烏克蘭獨立的可能性，赫爾岑等於說出了科斯托馬羅夫在《烏克蘭人民的創世記》裡不敢直說的

話—在該書中，他已經最先解決了此一問題；儘管如此，這份文件已經夠讓朝廷緊張，當時他們調查了聖西里爾與聖美多德兄弟會。不過，赫爾岑的建議只是修辭手段，是要在對俄／波邊境未來劃分法的熱烈爭論取得能見度，以及基本上肯定該地區的居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但在政治現實的層面，赫爾岑和科斯托馬羅夫都偏好用聯邦制度解決民族性的問題，而他在《鐘聲》雜誌內的文章也基本上是這種立場。

科斯托馬羅夫非常欣賞赫爾岑的立場，為此投書《鐘聲》，表示支持。他的文章題為〈烏克蘭〉，以匿名方式刊登在該雜誌的一八六〇年一月號。他先是對赫爾岑致上感激：「你對烏克蘭表達的意見，南俄羅斯的有識之士長久以來對此珍如拱璧。」¹⁸⁶他把自己的故里稱為烏克蘭，把自己的同胞稱作烏克蘭人或南俄羅斯民族，又表示對「小俄羅斯人」這個稱呼有所保留。文章在許多方面都是對他自己早期思想的進一步發揮。透過強調烏克蘭的哥薩克往昔的民主性質，他為烏克蘭人是一個獨立民族的觀點提出了歷史理據。

一八六一年，科斯托馬羅夫在〈兩種羅斯民族性〉一文再往前走了一步。在這篇登在聖彼得堡《根基》雜誌的文章中，科斯托馬羅夫把「全俄羅斯民族性」的繭給拆開來，宣稱其實有種相互獨立的羅斯民族性：「除了那種主宰著門面的羅斯民族性，另一種羅斯民族性正在浮現出來，並要求在語言和思想的領域享有平等公民權。」¹⁸⁷他主張，「羅斯」這個名稱原屬南俄羅斯人或說小俄羅斯人所有，是後來才被他們的北方鄰居偷走。又因為這兩個羅斯民族經歷過不同的歷史道路，他們也形成了相互不同的個性：「如果說南俄羅斯人看重的是個人自由、合議制和聯邦制原則，那麼北俄羅斯人看重的就是集體主義、國家和專制統治。」如果南俄羅斯人真有必要在歸附波蘭抑或歸附俄羅斯之間做出選擇的話，科斯托馬羅夫認為應該是選擇後者，因為他們從大俄羅斯人得到平等對待的機會大於從波蘭人。

這篇文章將成為接下來幾代「烏克蘭運動」的集結點。由於〈兩種羅斯民族性〉有署名和發表在帝國境內，文中沒有使用「烏克蘭」

和「烏克蘭人」的字眼，他一年前在《鐘聲》發表的匿名文章則有用這些字眼。這讓後來世代的烏克蘭活動家需要花工夫弄清楚他所謂的「兩種羅斯民族性」是何所指。但文章明確表明帝國境內有另一個有資格與大俄羅斯民族平起平坐的民族，這是歷來第一次有人在公共媒體這樣主張。科斯托馬羅夫這種措詞方式表面上只是追隨馬克西莫維奇在一八三〇年代建立的傳統。馬克西莫維奇把羅斯分為兩部分：北俄羅斯和南俄羅斯。科斯托馬羅夫採取的一樣是二分法，但與馬克西莫維奇不同，他並不認為它們是同一個實體的兩部分。在科斯托馬羅夫看來，兩者各自獨立。此外，他又主張，南俄羅斯人在某些方面接近波蘭人的程度要大於接近俄羅斯人：「如果說南俄羅斯人的語言在結構上遠離波蘭人而接近大俄羅斯人，那麼，他們的民族特徵和民族性格的本質卻更靠近波蘭人。」[188](#)

科斯托馬羅夫認為白羅斯人是俄羅斯人的一個分支，但這個論點讓很多身處帝國首都或白羅斯的讀者都感到不舒服。

沙皇的頭銜在十七世紀下半葉曾包含「白羅斯」幾個字，至十八世紀初葉刪除，但在一七七二年第一次瓜分波蘭之後重新回到官方詞彙，這是因為當時白羅斯東部的土地被兼併到俄羅斯帝國去。白羅斯的天主教大主教教區亦是在那時候創建。一七九七年凱薩琳去世後[189](#)，俄羅斯東正教會建立了自己的白羅斯大主教教區。直到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一年波蘭起義之前，「白羅斯」一直被認為是一個合理的稱謂。

一八二八年，這個名稱被用於這地區的聯合教會大主教教區，又在一八二九年被用於範圍涵蓋白羅斯東部和西部土地的學區。但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一年的波蘭起義改變了這名稱的政治內涵。波蘭的知識分子原先都把他們的祖居地稱為立陶宛，但起義之後卻採納了「白羅斯」的稱呼，一個例子是在布列斯特土生土長的詩人密茨凱維奇。波蘭語拼作 Białoruś，「白羅斯」在波蘭人心目中是指波蘭核心地區以東的土地，而這一帶被認為歷史上、文化上和語言上都是屬於波蘭。會有這種改稱，是因為研究常民語言和習俗的新興趣讓深具文化意識

的波蘭民族主義者不再願意把白羅斯稱作「立陶宛」：立陶宛居民使用的語言極不同於斯拉夫語。

這種民族學轉向充分體現在雷平斯基一八三九年於巴黎發表的民俗文化演講。雷平斯基是白羅斯維捷布斯克地區人，曾參與一八三〇年的起義，失敗後就像許多同胞一樣流亡巴黎。在演講中，他把白羅斯定義為一片波蘭人土地，範圍南至普里皮亞季河和平斯克沼澤，北至普斯科夫和大盧基。其居民的語言不同於俄羅斯、俄羅斯治下的烏克蘭部分和奧地利所屬的加利西亞所操的語言，而更接近波蘭語。雷平斯基認定，使用白羅斯語的人自古以來便和波蘭人有著血緣關係。這個演講得到其他流亡巴黎的波蘭人熱烈回響，雷平斯基翌年把演講稿擴充後加以出版。

一八四〇年，即雷平斯基的小冊子在巴黎出版的同一年，尼古拉一世禁止在政府文件裡使用「白羅斯的」和「立陶宛的」兩個詞語，但這項措施無法在政府圈子之外執行，因為它太瑣碎，也為時太晚。一八三五年，羅馬天主教為白羅斯農民製作了一本用波蘭語字母拼寫的白羅斯語教義問答。到了一八三〇年代晚期，一本用波蘭語字母拼寫的《艾涅伊達》白羅斯語譯本開始在當地貴族之間流傳。在一八四四至一八四六年之間，波洛茨克地區的白羅斯人巴斯斯卡澤斯基出版了四冊自己的文學作品集，都是以波蘭語字母拼寫的白羅斯語創作。一八五〇年代，杜寧·馬爾辛基維茲帶來了一場類似的小震撼，因為他發表了一些用白羅斯語創作的散文作品，又準備把密茨凱維奇的經典詩歌《潘塔德烏什》翻譯為白羅斯語。

俄羅斯東正教當局和一些政府官員愈來愈擔心這是一場「波蘭人的陰謀」，意在教壞當地的「俄羅斯人」農民。創作和傳播用波蘭語字母拼寫的白羅斯語文學作品的努力在一八五九年遭遇挫敗。有些奧地利人和波蘭人一直致力於在奧地利領土加利西亞出版用拉丁字母拼寫的白羅斯語出版品，之前這些一律用西里爾字母拼寫，對此，俄羅斯當局的反應是禁止這類出版品輸入。帝國內部出現的一些類似出版品一樣被查禁，但用西里爾字母拼寫的白羅斯語文學作品沒能填補由

此造成的真空。還是一八四六年的時候，俄羅斯科學院曾以學術品質低劣為理由，不批准民族學家什皮列夫斯基出版他的白羅斯語語法書。到了一八六二年，在一個在地貴族的支持下，第一部白羅斯語語法書終於出版，但一八六三年的波蘭起義引起帝國當局的警覺，完全禁止白羅斯語出版品在帝國境內流通。

一八六二年，維爾紐斯總督納濟莫夫曾經和下屬討論，是否要出版一本用當地白羅斯方言為語言的雜誌。有兩派不同意見，一派認為應該使用稍微遷就在地語法的俄羅斯語，一派認為應該使用白羅斯方言，總督支持後一派的意見。他向教育部長主張，應該用「在地的白羅斯語」對白羅斯天主教徒進行宗教教育，這些天主教徒都是從之前的「俄羅斯人」聯合教會改宗。他認為這種語言也算俄羅斯語，但「更精確的稱呼是白羅斯語。那是一種在地的魯塞尼亞人方言，雜誌印刷時會採用俄語字母」¹⁹⁰。總督會有這種建議，是因為急於壓制他的波蘭人對手：這些對手由卡利諾斯基領軍，出版的雜誌《農民真理》因為是使用波蘭語字母拼寫的在地白羅斯方言，對農民深具吸引力。

不過，不管是納濟莫夫抑或創辦《農民真理》的波蘭人都不認為白羅斯人有任何民族性或者自成一個族群。納濟莫夫把本地農民視為俄羅斯民族一分子，而卡利諾斯基則呼籲他們為波蘭人的大業戰鬥。兩個人都不認為白羅斯人有獨立的政治戲分，都想用在地的白羅斯方言擺布他們。雖然明知《農民真理》是一個威脅，聖彼得堡始終沒有批准納濟莫夫創辦一本使用西里爾字母拼寫的白羅斯方言的雜誌。即便如此，納濟莫夫的建議仍然反映出，政府再也不能對於白羅斯人產生的文化自覺視若無睹。

如何處理這種始料不及的文化自覺，始終是個極具爭議性的議題。在這個爭論中，沒有人的貢獻要比科雅洛維奇更大，他是白羅斯西部人，父親是曾經跟隨謝馬什科學習的聯合教會教士。當謝馬什科在一八三九年發動「重新統一」聯合教會的工程時，米哈伊爾只有十一歲。他在東正教學校受教育，後來成為聖彼得堡神學院歷史教授，

在一八六三年的波蘭起義之前和期間都積極參與有關白羅斯的辯論。他相信俄羅斯民族的統一性，但又體認到有一個操白羅斯「方言」的白羅斯「部族」（tribe）存在。不過，他不認為獨特的語言和族群性足以讓白羅斯人在俄羅斯民族中成為獨樹一幟的群體。在他看來，民族性是由社會組織形式和共同歷史經驗界定。所以，他把俄羅斯民族分為兩部分，但和科斯托馬羅夫的南、北二分法不同，他是把羅斯人分為東、西兩支。

今天，科雅洛維奇被認為是一種白羅斯政治思想趨勢的鼻祖，根據這種思想，白羅斯是所謂的「西羅斯」這個更大實體的一部分。這種觀念的根源歷史久遠，因為它是基於蒙古人入侵後幾十年乃至幾百年的羅斯土地劃分法。到了十四世紀，大部分烏克蘭和白羅斯土地都落入了立陶宛大公國，正是這些領土構成了科雅洛維奇所說的西羅斯。他是根據社會結構定義西羅斯的居民，不是根據族群歸屬或者宗教歸屬，這兩個標準為同時代其他國家的民族打造工程師所接受。科雅洛維奇是一個早期的民粹主義者，一心只想要把低下階層凝聚在一起，不在乎他們是斯拉夫人還是立陶宛人。

民粹主義是科雅洛維奇與科斯托馬羅夫的共同取向，但科斯托馬羅夫的民粹主義沒有逾越民族國家的邊界。兩人對民族性的定義彼此相左，曾在報章上展開論戰。科雅洛維奇一方面認為親烏克蘭派是西羅斯唯一貨真價實的公共活動家，因為他們準備好和人民合作，另一方面又認為他們眼界狹隘，為此感到失望。

科雅洛維奇指出，親烏克蘭派「長於數字、普及教育和精力……但讓人遺憾的是，我們很難指望他們能夠對全部的西羅斯人民有什麼重要貢獻。從各方面看來，他們（當然不是所有人都是這樣子）是嚴重自我主義者。事實上，因為小羅斯受到波蘭文化和耶穌會荼毒沒有那麼大，那裡的人都能夠自己站起來」¹⁹¹。反觀以民俗語言學方式思考的科斯托馬羅夫則堅決主張小俄羅斯人和白羅斯人是兩個不同的民族。他甚至論證白羅斯人是北俄羅斯或說大俄羅斯人的後裔，這種觀念在當局於一八四七年從聖西里爾與聖美多德兄弟會成員取得的口供

便已經可以看到。科雅洛維奇對這種說法勃然大怒，加以回擊，在談到基輔羅斯時代的克里維奇人—白羅斯人的前身¹⁹²—時這樣指出：「老克里維奇人的後代不可能是由北羅斯的後代所代表，後者在歷史上要較年輕。」¹⁹³

科斯托馬羅夫的親烏克蘭主義只是科雅洛維奇爭取西羅斯被承認的障礙之一。他的另一個對手是俄羅斯的親斯拉夫派。他指責他們想要把西羅斯或說西俄羅斯「俄羅斯化」是沒有大腦的主張，呼籲他所有大俄羅斯人同仁「在面對西俄羅斯人時約束自己愚蠢的大俄羅斯人激情，改而用行為來贏得西俄羅斯人的愛」¹⁹⁴。但他的對手不為所動，認為他只是在操作白羅斯分離主義，為此感到震驚。

俄羅斯的親斯拉夫派阿克薩科夫在寫給科雅洛維奇的信上說：「俄羅斯正在把白羅斯從滅頂之災中救出來：重點在於摧毀波蘭文化的影響力。不過，白羅斯就像自己已經安全了那樣，不大在乎是否已經擺脫波蘭人的牛軛，反而關心起自己有哪些特殊性的問題！不過，它的特殊性可是少之又少。」¹⁹⁵莫斯科大学前哲學教授卡季科夫在《莫斯科新聞報》把話說得更白：「他們從聖彼得堡寫信給我們，說是某種親白羅斯派正在誕生。聖彼得堡那邊的各種社會力量過剩，以致它想要不惜一切代價為我們所有的方言施肥和創造出盡可能多的俄羅斯民族和語言。」¹⁹⁶他預料波蘭的「民族主義者」對於這種「在心靈上把白羅斯人土地從俄羅斯分離出去的企圖」樂不可支。

總之，科雅洛維奇把俄羅斯民族分為東、西兩支的構想四面楚歌。科斯托馬羅夫堅持南、北二分法，而阿克薩科夫和其他親斯拉夫派成員則繼續是用三分法思考，把科雅洛維奇的白羅斯留在了俄羅斯民族的框框內。他對此非常不滿，但有沒有辦法可以讓自己的觀點轉而占上風。卡季科夫倡導的三位一體民族得到朝廷背書，因為它可以讓帝國最終把自己轉化為一個民族國家提供正當性。

在一八六三至一八六四年的波蘭起義之後，三位一體民族的觀念成為了俄羅斯民族工程的主導模式。從政治的角度來說，這是一種對

付波蘭民族主義和安撫烏克蘭民族運動愈來愈高漲文化要求的一種手段。從純粹的概念角度來說，它可以調和烏瓦羅夫在一八三二年揭櫫的民族性原則和一個愈來愈被人知覺到的事實：俄羅斯民族其實相當龐雜，容許以許多不同的方式想像。佩泰爾曾經認定俄羅斯共有五個分支，但俄羅斯人中的親斯拉夫派和帝國的民族主義者在一八六三年之後只承認有三個分支。這三個分支所使用的白話被稱為「方言」，所以，有必要打造一種號稱是由三個分支共同創造的俄羅斯語或說全俄羅斯語。這種語言統一被認為攸關生死：只有向正在民族國家化的歐洲國家看齊，俄羅斯帝國才可能繼續是一個可存活的政治單位。

從歷史的角度看，三位一體模型的根源可以回溯至十七世紀中葉，當時，莫斯科沙皇因為兼併了哥薩克烏克蘭和征服了白羅斯東部，在自己的頭銜上冠上大羅斯、小羅斯和白羅斯的字樣。這是一個分兩階段達成的過程。「大羅斯」和「小羅斯」是最早冠上的字樣，以表示莫斯科的版圖已擴張至波蘭—立陶宛共和國境內的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土地。然後，「小羅斯」又被分成兩部分：「小羅斯」和「白羅斯」，前者現在指烏克蘭人的土地，後者指白羅斯東部土地。這種命名法是要反映這兩個地區的不同地位：前者是莫斯科在一六五四年與哥薩克蓋特曼赫梅利尼茨基簽訂協議後被納入莫斯科的保護之下，後者是莫斯科用武力征服，所以不享有任何特殊待遇。總之，在十九世紀中葉，羅斯／俄羅斯的三分法再次得到認可，但這次的認可是以語言理由而不是以政治理由為基礎。不過，承認這種差異不代表朝廷打算建立一個聯邦政府，容許其他兩個部分獲得自治。其最終目的是把三個分支統一在大俄羅斯的皇權、宗教和文化之下。

181 黑俄羅斯指白俄羅斯南部。

182 前面提過，這部書反對西化，認為俄羅斯落後其他歐洲國家是東施效顰所害。

183 前面指出，《羅斯史》主張哥薩克人的歷史不是俄羅斯歷史的一部分。

184 Quotation supplied by Nathaniel Knight.

185 Aleksandr Gertsen, "Rosii i Pol'sha: Pis'mo vtoroe," Kolokol, 1859.

- 186 Mykola Kostomarov, Pys'mo do vydavtsia "Kolokola" (Lviv, 1902), 15.
- 187 Nikolai Kostomarov, "Dve russkie narodnosti," Osnova, no. 3 (1861): 34.
- 188 同上，78.
- 189 其實是一七九六年去世。
- 190 Mikhail Dolbilov, Russkii krai, chuzhaia vera: Ėtnokonfessional'naia politika imperii v Litve i Belorussii pri Aleksandre II (Moscow, 2010), 199.
- 191 同上，220.
- 192 早期斯拉夫人各部落沿河居住，定居在聶伯河流域的稱為波良人（Polyanian），定居在伏爾加河上游、德維納河（Dvina river）上游和聶伯河上游地區的稱為克里維奇人（Krivichian）。
- 193 同上，221.
- 194 同上，212.
- 195 同上，221.
- 196 同上，222.

第九章 消滅語言

一八六三年七月十八日，俄羅斯內政部長瓦盧耶夫發布了帝國對東斯拉夫諸語言的新政策。他寫在一份看似平常的文件裡——一封寫給書報審查官的信，卻是經過沙皇親自批准，所以意義絕不尋常。這信後來被稱為「瓦盧耶夫通報」，將會對俄羅斯民族的民族打造工程產生強烈影響。從由內政部長來負責語言政策這一點，顯示當局已經把各種非俄羅斯語言和文化的勃興視為對國家安全的一個威脅。

瓦盧耶夫的指令主要針對烏克蘭知識分子而發，因為他們努力把烏克蘭語言引入教堂和學校之舉被認為是波蘭人動搖帝國的陰謀的一部分。他在通報上說：「這個現象非常可歎且值得關注，因為從審查官收到的手稿和從大部分流傳於小俄羅斯的文章都是出自波蘭手筆的事實判斷，一切都是波蘭人在幕後搞鬼。」¹⁹⁷瓦盧耶夫聲稱，那些鼓吹「小俄羅斯民族性」的人是出於政治動機而把這一套灌輸給普羅大眾。這些人之中有許多正受到政府調查，將會以分離主義者的罪名起訴。

通報吩咐審查官特別注意烏克蘭語出版品，不管那是在知識分子小圈子裡流傳或是供大眾閱讀的東西。瓦盧耶夫站在那些主張有所謂「全俄羅斯語」的烏克蘭官員一邊：「他們從根本上證明了，從不曾有過一種獨立的小俄羅斯語。現在民眾所使用的地方方言，不過是一種受波蘭語污染的俄羅斯語。小俄羅斯人就像大俄羅斯人一樣，可以聽得懂全俄羅斯語¹⁹⁸，它甚至比現在某些小俄羅斯人設計的小俄羅斯語還好懂，特別是比波蘭人設計的所謂烏克蘭語好懂。」

「瓦盧耶夫通報」旨在防止烏克蘭語言文本在農民和普通民眾之間流傳。它禁止出版學校和教堂使用的烏克蘭語文本，只有純文學作品例外。雖然通報引入的只是臨時措施，它對烏克蘭文化和身分認同的影響卻是既深且鉅。在瓦盧耶夫簽署命令的一八六三當年，共有三十三件烏克蘭語出版品面世，但到了一八六八年他卸任內政部長時，

全年只有一件烏克蘭語作品出版。政府有效地在帝國西境打壓了一種替代性語言、文學和高級文化的發展，這種發展一直是當時烏克蘭頭號政治思想家科斯托馬羅夫所期望看見的。但在一八六三年之後，便不再有任何白羅斯語出版品出現。

「在我們的時代，是否可以或應該以南俄羅斯語—亦即烏克蘭語寫作，是由實踐本身來決定。」¹⁹⁹這番話出自《根基》雜誌的幾個發行人，該雜誌是親烏克蘭派的喉舌，一八六二年在聖彼得堡創刊。雖然他們接著又表示，他們對「用人民的語言來教學和宣教是否較有效」仍不確定，但這只是一種門面說法。事實上，把烏克蘭語引入教會和學校業已成為親烏克蘭運動的主要政治目標。俄國社會主義作家暨評論家車爾尼雪夫斯基肯定這種做法，並在《根基》創刊時為文表示歡迎：「在我看來，用小俄羅斯語來教育小俄羅斯人民和發展小俄羅斯語的大眾文學，在一開始對小俄羅斯人來說是最方便和有用的目標，值得追求。」²⁰⁰

親烏克蘭派早在創辦雜誌宣示他們的計畫之前，便已經忙著落實這計畫。一八六二年，共有六本烏克蘭語小學教科書在帝國境內販售，其中一本是舍甫琴科所編，一本是庫利什所編。科斯托馬羅夫在聖彼得堡向烏克蘭和俄羅斯民眾募捐，用募來的錢出版了更多供應普通民眾閱讀的烏克蘭語書本，還製作了一本烏克蘭語的聖經譯本，政府和教會在左右為難下通過了對譯本的審查。對於這種現象，政府有點不知所措，不知道應該對這些烏克蘭語出版品採取什麼態度。對聖西里爾與聖美多德兄弟會的活動限制已經解除，農奴已經獲得自由，但要用什麼方式教育這些民族的問題卻懸而未決。先前，在一八五九年，政府禁止以拉丁字母拼寫的斯拉夫語文本出版或進口，想以這種方法阻止波蘭人的文化擴張，但要怎樣處理包含白羅斯語的俄羅斯語「方言」的文本卻未有定論（第一本白羅斯語法書在一八六二年出版）。

一八六一年，當親烏克蘭派央請基輔都主教阿爾謝尼幫忙推廣舍甫琴科編寫的小學課本時，都主教向朝廷請示意見。審查委員會建議

他拒絕所請，理由是小俄羅斯語出版品可能會引起兩個斯拉夫民族之間的分裂，破壞國家穩定。但總的來說，在審查委員會諸公眼裡，親烏克蘭派的憧憬只是癡人說夢，即使不受阻撓一樣成不了氣候，所以無須對其設限或加以迫害，卻不應該以政府之力提供幫忙。後來，政府政策會發生變化，導致瓦盧耶夫發出他的通報，是御前辦公廳第三廳在一八六三年三月收到的一封信所引起。當時波蘭起義才剛爆發。寫信人沒有署名，但自言是代表一批不願具名的小俄羅斯東正教神職人員寫信，目的是請求禁止一部《四福音》的烏克蘭語譯本出版。該譯本當時正接受聖彼得堡宗教事務管理總局的審查。

這封信被轉交給基輔總督安年科夫，他看過之後表示支持寫信人的請求。他擔心的是，那部《四福音》譯本會把烏克蘭語從方言提升到獨立語言的地位，並因此產生政治後遺症。他在意見書裡面寫道：

「有關小俄羅斯方言是否只是俄羅斯語的一種特殊變體，抑或根本就是一種獨立語言，這個問題仍然處於爭論之中。如果讓一本小俄羅斯方言的聖經譯本出版，支持小俄羅斯語的一方就會振振有詞，認為這等於承認小俄羅斯語是獨立語言。他們當然不會以此為滿足，一定還會更進一步，以他們擁有獨立的語言為理由，要求給予小俄羅斯自治權。」 201

沙皇讀過安年科夫的意見後，指示第三廳負責人聯絡中央政府的相關官員處理這件事。這表示，他認為基輔總督的擔心有理，其建議值得考慮。這個任務落在內政部長瓦盧耶夫頭上，他又轉過身聯絡宗教事務管理總局。最後，那部由烏克蘭文化活躍分子莫拉切夫斯基翻譯的《四福音》被禁，一起被禁的還有供一般民眾閱讀的烏克蘭語出版品。新政策在瓦盧耶夫一八六三年七月十八日發出的通報中發布。在發出通報前的幾個月，瓦盧耶夫顯然經歷了一個演變：他本來極不情願執行沙皇的命令，最後卻變成禁制措施的強烈支持者。他拖了三個月才向第三廳回報，表示自己完全贊同基輔總督禁止新約譯本在烏克蘭出版的建議。然而，一旦做出決定，瓦盧耶夫便決心如鐵。

在一八六〇年代的俄羅斯政府裡，瓦盧耶夫屬於自由派，是一個謹慎的改革論者，一心想要引入一種初步的大眾代表制度來加強君主專制。瓦盧耶夫最後會對烏克蘭語出版品下重手是為情勢所逼，因為第三廳發起了一場媒體宣傳戰，鼓吹基輔總督所建議的嚴厲措施。負責這場宣傳戰的是學院轉報界的卡季科夫。卡季科夫和親斯拉夫運動的保守派領導人相處愉快，起初認為親烏克蘭派的目標注定失敗，所以對他們採取屈尊俯就甚至是縱容的態度。但他的立場因為波蘭起義的爆發而徹底改變。

一八六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即瓦盧耶夫簽署通報的大約一個月前，卡季科夫發表了一篇文章：〈親烏克蘭派和波蘭人的利益湊巧一致〉，其標題本身便非常有披露性。站在一個和謝馬什科追隨者完全一致的立場，卡季科夫指控親烏克蘭派不僅受到波蘭人陰謀的利用，還受到耶穌會的陰謀利用。他這樣說不啻是把烏克蘭語的問題政治化和罪行化，也讓瓦盧耶夫不得不在他的通報裡把親烏克蘭派和波蘭人說成是彼此掛鉤。但長遠來說更重要的是，它奠定了打壓烏克蘭文化和政治運動政策的思想基礎，這種政策將會是接下來幾十年的官方政策。卡季科夫這樣指出：「烏克蘭從未有過自己的歷史，從來不是一個獨立國家：烏克蘭人是道地的俄羅斯人，土生土長的俄羅斯人，是俄羅斯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少了他們，俄羅斯民族就很難維持原狀。」²⁰²雖然承認「俄羅斯民族」的這兩個分支有著語言和文化差異，他認為這種差異只屬次要。如果俄羅斯民族想要得到發展和興盛，地方方言就必須予以遏制。

他接著比較了俄羅斯帝國和法國、義大利、德意志的差異，指出「俄羅斯」各群體之間的方言差異比見於西歐國家者少得多。他說，在整個俄羅斯境內，不管旅行到哪裡，要理解當地的語言都無太大困難。不可分割的俄羅斯民族的統一性是奠基於它的文學語言的統一。他批評科斯托馬羅夫不應該把俄羅斯民族分成兩部分：「真是令人髮指和荒謬的詭辯！他把俄羅斯說成就像可以有兩個民族性和兩種語言，就像法國可以有兩種民族性和兩種語言！」²⁰³卡季科夫用最強烈

的措詞攻擊科斯托馬羅夫和親烏克蘭派：「他們無中生有地弄出一些英雄和半神，弄出一些崇拜的對象和民族性的象徵。新的『西里爾和聖美多德』，以最古怪的字母204做了他們的外觀，和一些不存在的小俄羅斯語，是要混淆上帝的創造。」

卡季科夫的論證將會成為帝國政府接下來幾十年處理烏克蘭問題的基礎。他是第一個把語言、族群和民族統一性說成是和俄羅斯國家戰略利益密切相關的公共知識分子。雖然他繼續把東斯拉夫人之間的差異歸咎於波蘭人和其他外國勢力的入侵，就像泛俄羅斯歷史敘事首創者烏斯迪亞洛夫那樣，他也把族群和語言元素帶進了討論。然而，他這樣做不是為了把大俄羅斯人有別於小俄羅斯人—波戈金在一八五〇年代和馬克西莫維奇論戰時則有這種意圖，而是為了強調俄羅斯國家在語言、民族和文化上都是一個單一實體。

查禁烏克蘭語出版品的俄羅斯書報審查官和卡季科夫之輩的評論家也根據國際大環境立論，指出德意志、法國和英國也面臨著非官方語言和地方方言的挑戰：在法國，這種挑戰來自奧克語；在英國，這種挑戰來自蘇格蘭塞爾特語和愛爾蘭語。不過，這種比較只凸顯出俄羅斯和西歐國家的政策有多麼大相逕庭。英國和法國因為可以靠完備的學校系統推廣官方語言，並沒有對「敵對」語言採取嚴厲措施，反觀俄國政府卻是採取打壓手段，「忘記」任何需要投入大量資源的積極行動，比如在帝國全境的小學裡發展俄羅斯語體制。當局寧願維持便宜但一邊倒的政策，最終導致自己在語言的戰場上敗北。

打壓烏克蘭語政策的第一次鬆動出現在一八七〇年代初期，即瓦盧耶夫通報出現的十年後。如果嚴格執行，他的指令將會讓俄羅斯境內的一切烏克蘭語出版品絕跡，例如一八六八年就發生過這樣的事，當年全年只有一部烏克蘭語的文本出版。但瓦盧耶夫在該年的去職讓烏克蘭語出版品得以東山再起。這個再起過程開始得很緩慢，但到了一八七四年，一年內即有三十二本出版品通過審查，只比一八六二年即通報出現的前一年少一本。隨著瓦盧耶夫走人，書報審查官有更大權力可以決定一本烏克蘭語著作是不是純文學作品，是純文學作品就

可以出版，是通俗讀物就不可以。學術著作因為不在這兩個範疇之內，所以一律可以過關。另外，有些書報審查官在受到遊說之後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如果單是遊說不管用，通常再送點錢就會奏效，基輔的審查官普濟列夫斯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一八七〇年代出版的所有烏克蘭語著作中，有一大部分就是由他審查。

親烏克蘭派於是變得愈來愈大膽，聲稱親烏克蘭運動的發展已經過了「幕間」休息時間。在新一輪的辯論中，親烏克蘭派一邊的關鍵人物是年輕而雄心勃勃的歷史學家德拉加曼諾夫。他是基輔大學的古代史教授，一八七〇年代初期曾到過歐洲研究自己的專業領域和歐陸的民族問題。看見有一些烏克蘭語讀物終於可以在帝國境內出版讓他歡欣鼓舞，認為這是好兆頭，表示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將會帶來進一步的自由化。不過，不久之後，他就成為了新一波對親烏克蘭派攻擊的靶子。

就像一八六三年那次一樣，這次的攻擊是受到卡季科夫的大力支持。一八七五年二月，他旗下的《俄羅斯先驅報》刊出「基輔斯拉夫慈善協會」負責人里格爾曼的一篇長文。里格爾曼把砲口對準德拉加曼諾夫最近在加利西亞發表的一篇文章，其標題為〈俄羅斯、大俄羅斯、烏克蘭和加利西亞文學〉。文中，德拉加曼諾夫主張，隨著普通俄羅斯文學語言和高級文化的發展，他們的大羅斯和小俄羅斯同行也應該得到發展，主要是為了提供對普通百姓的教育和文化之需要。從這種主張，里格爾曼就像貓嗅到鼠味一般，發現到了大做文章的機會。

里格爾曼指控德拉加曼諾夫放出的不過是煙霧彈，是為了讓小俄羅斯繼續發展出獨立的語言和文化：「各位親烏克蘭派先生們，你們好關心你們的人民，好害怕他們無知，想要啟蒙他們。為了達成這個目的，你們選擇了一條迂迴曲折的路線：把它的方言打造為文學語言，創造出一整批可以讓小俄羅斯人自外於六千萬俄羅斯人民的文學作品。也就是說，你們想要在俄羅斯世界裡面創建一種精神上的特殊

主義。」205里格爾曼這樣作結：「任何真正的俄羅斯人，還有任何對自身真正利益有任何理解的斯拉夫人，都應該拚盡全力對付你們。」

對付行動果真發生。一八七五年五月，即里格爾曼的文章發表的三個月之後，教育部副部長致信函給基輔學區的負責人，信中附有德拉加曼諾夫和里格爾曼兩人文章的副本，要求他交出親烏克蘭派教授的名單。德拉加曼諾夫因此失去大學教職。但反對小俄羅斯人身分認同的基輔人一領軍人物為教育官員尤澤福維奇—不以此為滿足，希望獲得更全面的勝利。尤澤福維奇直接寫信給第三廳廳長波塔波夫將軍。我們不知道這封信的內容，因為目前這封信還沒有被找到，但祕密警察首腦波塔波夫讀後想必印象深刻，否則他不會把尤澤福維奇的擔憂報告給沙皇。一八七五年八月，亞歷山大二世下令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調查親烏克蘭派的持續活動和烏克蘭文學的出版情況。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波塔波夫、宗教事務管理總局局長、內政部長和教育部長，以及，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尤澤福維奇本人。

特別委員會在一八七六年四月開始審議，認定親烏克蘭派的持續活動是對三位一體俄羅斯民族的一種攻擊。委員會的報告包括以下一段話：

親烏克蘭派是朝什麼最終目標努力非常明顯：他們正在試圖逐步把小俄羅斯分離出去，方法是把小俄羅斯的語言和文學分離出去。如果容許用烏克蘭方言創作的大眾文學存在，將會讓分離主義者深信，烏克蘭想要在未來脫離俄羅斯是有可能的，不管那一天有多麼遙遠。在目前，把烏克蘭語提升為文學語言的衝動還是微弱衝動，但如果政府聽之任之，那就沒有理由不允許白羅斯方言做出相同的分離，可是白羅斯人就像小俄羅斯人一樣，都是帝國的一個大族。烏克蘭人、小俄羅斯人和住在西俄羅斯的白羅斯人……所構成的大政治體乃是俄羅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該委員會的立場是本於卡季科夫在一八六三年最先提出的想法。這個立場包括把親烏克蘭運動同時說成是波蘭人的陰謀和對俄羅斯統一性的威脅，會給白羅斯人起不良示範作用。卡季科夫的思考方式再一次在帝國政府裡的自由派和實用主義者中間流行起來。因此，除了親斯拉夫派活動家如波戈金，和民族主義報紙人如卡季科夫以外，幾位關鍵性的部長也準備好挺身捍衛俄羅斯民族不可分割的統一性。

一八七六年五月十八日，正在德國埃姆斯溫泉區度假的亞歷山大二世簽署了特別委員會所起草的皇帝詔書，日後被稱為「埃姆斯敕令」（Edict of Ems）。皇帝詔書一開始即表示，朝廷決心「讓親烏克蘭派的活動劃下休止符，因為這些活動對國家非常不利」²⁰⁶。它除了把瓦盧耶夫通報中的禁令永久化，又加入了一些新的禁令，包括禁止把任何烏克蘭語出版品輸入帝國，以及禁止烏克蘭語的純文學作品出版，被禁止出版的還有烏克蘭語宗教讀物、語法書和大眾讀物。這項措施是要全方位封殺烏克蘭文學的發展。學校圖書館收藏的烏克蘭語出版品一律被清空。這次被禁的不僅止於書面文字，還包括烏克蘭語的戲劇表演、歌曲和詩歌朗誦，它們被認為「本質上都是親烏克蘭派立場的展現」。唯一例外是民族學的出版品，不過它們的烏克蘭語都是採取俄羅斯語拼字法。

亞歷山大二世又下令對親烏克蘭派進行鎮壓。德拉加曼諾夫和另一位親烏克蘭派領導人丘賓斯基被逐出烏克蘭，帝國地理學會的基輔分會—其為基輔思想和文化活動的中心也是親烏克蘭派的溫床，和《基輔電訊報》皆被查封。基輔、哈爾科夫和敖得薩學區的負責人奉命監視學區內的教師，一發現有難以信任的親烏克蘭派分子就向當局報告。新的教職一律只許大俄羅斯人擔任，小俄羅斯人只許在大俄羅斯的中學和大學教書。這是一種對親烏克蘭運動和其潛在支持者的一次全面性進攻。德拉加曼諾夫和丘賓斯基受到的處罰不若聖西里爾與聖美多德兄弟會的成員那般嚴厲，但當局這一次的措施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系統化，涵蓋範圍也更大。它們不像一八四七年那樣僅針對一

小撮知識分子，也不像一八六三年那樣只針對出版品，而是全面性禁止烏克蘭人的文化表達，書面語和口語的表達同在被禁之列。

「埃姆斯敕令」只有一個目的：阻止烏克蘭文化和政治運動的發展。它把打壓、禁止和限制共冶於一爐，但不包含一個推廣全俄羅斯語的積極計畫，因此也沒有任何俄羅斯語學校、出版品和社團獲得特別資助，唯一例外的是在奧匈帝國加利西亞省首府利沃夫發行的《文字報》。政府表示準備「支持《文字報》，它是在加利西亞出版，一向與親烏克蘭派針鋒相對。政府至少會固定提供它一筆小津貼—錢雖少，但沒有這筆津貼，它將無以為繼」²⁰⁷。皇帝詔書明白指出這項措施是為了反制波蘭人的宣傳攻勢：「親烏克蘭派在加利西亞的喉舌《真理報》完全與俄羅斯的利益為敵，其出版很大程度是得到波蘭人的協助。」

這筆相當於兩千荷蘭盾的津貼是出於尤澤福維奇的建議，經過沙皇批准後實行。這是歷來第一次，政府決定要資助帝國境外的親俄羅斯派對親烏克蘭派進行鬥爭。加利西亞，又稱為「紅羅斯」，其主要人口自稱為羅辛人（相當於今日英語的「魯塞尼亞人」），在親俄羅斯派眼中是俄羅斯人，更精確地說是小俄羅斯人。這種觀點是自沙發利克的《斯拉夫民族誌》俄語譯本於一八四三年出版後開始扎根。波戈金毫無疑問就是抱持這種觀點，他曾經到過加利西亞，和當地的親俄羅斯派建立密切聯繫，為他們的活動提供資金。由里格爾曼領導的斯拉夫慈善協會，特別是它的基輔分會，也做著相同的事，把一些主要來自私人的捐款挹注該地區。但在一八七六年的詔書以前，政府對這種事興趣缺缺。

直到那時，加利西亞的發展仍被認為歸帝國外交部負責，而俄羅斯的外交官一直建議上級不要牽涉入加利西亞的事務。一八六六年，即「埃姆斯敕令」發布前十年，當奧地利因為和普魯士的「七星期戰爭」而焦頭爛額時，俄羅斯駐維也納大使斯塔克爾伯格建議外交部長戈爾恰科夫親王不接受分割奧地利和兼併加利西亞省的主張。後來在普奧戰爭中敗北的哈布斯堡王朝被逼把他們的帝國改為雙君主制，與

匈牙利人分享權力，又讓波蘭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一起管理加利西亞省。從此加利西亞落入波蘭人的實質控制，引起魯塞尼亞人菁英的極大不滿。

這時候，斯塔克爾伯格再一次建議政府採取謹慎態度。他反對發起一場捍衛魯塞尼亞人的媒體戰，以免引起「奧地利對魯塞尼亞人的關注，如果像維也納內閣對波蘭主義的粗心容忍那樣，也許他們就會像成熟的果子那樣自動掉落到我們手裡」²⁰⁸。戈爾恰科夫親王同意大使的見解。雖然帝國境內的親斯拉夫派媒體站在魯塞尼亞人一邊反對波蘭人，但政府還是袖手旁觀。時間證明了斯塔克爾伯格的預言正確。隨著哈布斯堡帝國變成雙君主制，即奧地利人權力分享給匈牙利人，和一名波蘭人被任命為總督代表維也納統治加利西亞，魯塞尼亞人菁英認為自己被出賣了，讓他們改而心向俄國和認同於俄羅斯人的變化就幾乎無可避免。

那個後來被稱為親莫斯科派或親俄羅斯的運動於焉誕生。它的領導者之一是《文字報》主編季迪斯基，該雜誌也成了親俄羅斯運動的喉舌報。季迪斯基是維也納大學畢業生，在大學師從米克洛西奇學習斯拉夫語言和文化，也是另一位著名斯拉夫主義者科皮塔爾的親密同事（納傑日金在一八四一年評論科皮塔爾一部作品時提出三位一體俄羅斯民族的構想）。最初，季迪斯基讀過科特利亞列夫斯基的《艾涅伊達》之後大受烏克蘭文學的吸引—我們記得，《艾涅伊達》是用烏克蘭語撰寫的第一部重要文學作品，不過，他後來又對普希金和果戈里的作品著迷，決定用俄羅斯方案來解決魯塞尼亞人的身分認同問題，即把這些奧地利的《艾涅伊達》看作俄羅斯民族一員而非烏克蘭民族一員。

一八七一年，在哈布斯堡帝國憲法改革還餘波蕩漾之際，另一位親俄羅斯派成員多布里揚斯基為親俄羅斯運動草擬了一篇政治綱領，得到這運動的領導機構「羅斯理事會」的採納。在多布里揚斯基心目中，委員會所代表和自己為之代言的「羅斯民族」並非僅包含加利西亞的羅斯人，還涵蓋布科維納和外喀爾巴阡的魯塞尼亞人，以及在奧

地利巴爾幹領土的一些魯塞尼亞人定居點。多布里揚斯基堅決主張，奧匈帝國的魯塞尼亞人不僅自成一個民族，且是更大的俄羅斯民族的一部分：「三百萬在奧地利權杖下生活的魯塞尼亞人只是同一個俄羅斯民族—其中包含小俄羅斯人、白羅斯人 and 大俄羅斯人—的一部分。我們和他們分享著相同的歷史、相同的傳統、相同的文學和相同的風俗習慣，也因此有著所有的特徵和條件和他們完全統合在一起。換言之，它有權突出自己真正的民族歸屬。」[209](#)

多布里揚斯基口口聲聲說自己忠於哈布斯堡帝國，反駁波蘭人的指控：因被說是俄羅斯大國的成員，使魯塞尼亞人對忠於哈布斯堡王朝產生懷疑。不過，多布里揚斯基把他的大部分辯論熱情保留給魯塞尼亞人，特別是那些迷了路投向烏克蘭運動的人。在評論親烏克蘭運動的基礎時，他這樣說：「以當前形式呈現的烏克蘭問題是奠基於哥薩克烏克蘭從前的獨立性，更多的論據來自小俄羅斯語的歷史悠久和小俄羅斯文學最近的取得獨立。它的最終目標是烏克蘭的獨立建國。」[210](#)但多布里揚斯基認為，親烏克蘭派的歷史論證和語言論證都有缺陷，而他們的政治綱領—加入一個泛斯拉夫聯盟或完全獨立—則會威脅到國際秩序。

波蘭貴族一八六〇年代晚期在加利西亞的得勢，發生在哈布斯堡王朝打輸普奧戰爭並跟加利西亞的前主人波蘭達成協議之後，激起了親俄羅斯派和親烏克蘭派的不同反應。親俄羅斯派是把希望寄託在威力強大的俄羅斯沙皇，希望加入俄羅斯民族，反觀親烏克蘭派則是把注意力轉向發生在俄治烏克蘭的親烏克蘭運動。親烏克蘭派不像季迪斯基和多布里揚斯基那樣，自視為六千多萬俄羅斯人的一部分，而是自視為為數一千五百萬的烏克蘭人一部分。如果說親俄羅斯派服膺一個保守的社會方案，而且和教會密切結盟，那麼，被稱為民粹主義者的親烏克蘭派則是一些激進分子，追隨者包括世俗主義的知識分子。他們拒絕接受《文字報》所鼓吹的保守議程和它所使用的矯揉造作語言。他們希望魯塞尼亞人的文學語言盡可能貼近人民群眾的日常語言，又認為它和烏克蘭語同出一源。

一八六〇年代晚期和一八七〇年代初期是奧匈帝國境內親烏克蘭運動的制度化階段。先是，親烏克蘭派在一八六八年創辦了一個稱為「啟蒙」的文化學會，用它向農民傳播他們那套魯塞尼亞民族主義。然後，一八七三年，他們又成立了一個親烏克蘭派的文學會社（用舍甫琴科的名字命名）。創辦文學會社的動議和使它成為可能的資金都來自烏克蘭的聶伯河地區，其中一個金主是梅洛拉多維奇·斯多羅帕德斯卡，出身顯赫哥薩克世家，祖先出過很多上校和蓋特曼。俄治烏克蘭境內的親烏克蘭派不僅出錢，還主導了加利西亞親烏克蘭派的思想觀念。禁止在俄羅斯帝國境內出版烏克蘭語作品的敕令讓加利西亞成為親烏克蘭派作家和活動家的一個主要舞台。俄國的親烏克蘭派還幫助加利西亞的親烏克蘭派創辦新刊物。例如，一八六七年創辦的《真理報》就是庫利什出的力，他是聖西里爾與聖美多德兄弟會成員和烏克蘭文化復興運動的主要人物。被放逐到俄羅斯帝國境外的德拉加曼諾夫是為《真理報》撰文的親烏克蘭派活動家之一。

尤澤福維奇和「埃姆斯敕令」的草擬者都很有理由擔心《真理報》會影響加利西亞和烏克蘭的政治和社會意見。他們努力動搖這份報紙的影響力和親烏克蘭運動在帝國邊境兩側的發展，方法包括發布對烏克蘭語出版品的禁令和在加利西亞資助親俄羅斯的報章。但事實證明這種努力並不成功。新的禁令只有讓更多烏克蘭作家把作品投給加利西亞的報刊，從而強化親烏克蘭派在加利西亞的吸引力。

沙皇在詔書裡答應撥給《文字報》的津貼有多年時間都沒能到達親俄羅斯派手中，原因要不是官僚系統的無能就是因為貪汙腐敗。《文字報》主編在一八七九年告訴沙皇，他從未見過說好要給他的津貼。一八八〇年代，俄國政府恢復它對親俄羅斯派的支持，但為時已晚。在奧地利的親俄活動家發現來自政府的壓力與日俱增：維也納當局因為和俄羅斯的關係愈來愈緊繃，所以認為親俄羅斯派的威脅比親烏克蘭派更加嚴重。

俄羅斯當局歡迎來自奧匈帝國的親俄羅斯派難民（他們愈來愈成為維也納的眼中釘），寧可他們遠離右岸烏克蘭這片是非之地。所

以，他們大都落腳在西北省分和前波蘭王國的霍爾姆地區。這些地區原是帝國境內最後的聯合教會重鎮，曾經因為地處偏遠而躲過了謝馬什科及其支持者的東正教熱忱，直到一八七五年才和俄羅斯東正教「重新統一」。

來自加利西亞的親俄羅斯派教士和神學院學生從小便是聯合教會信徒，他們會改而皈依東正教，是因為渴望成為俄羅斯民族一員，而他們也有效地在那些被迫改教的農民中間推廣俄羅斯人身份認同。在一八八一年霍爾姆主教教區的兩百九十一位東正教教士中，有一百四十三位，即近半數來自加利西亞，本來是聯合教會信徒。他們從帝國政府拿到的工資大大高於他們在加利西亞的時候，而這是另一個吸引他們離開加利西亞戰場而加入「俄羅斯世界」一個波蘭人省分的誘因。

愈來愈多來自加利西亞的親俄羅斯派移民反映出一個簡單的事實：俄羅斯帝國在爭取這個奧地利省分歸心的戰爭中節節敗退。新冒出的贏家是加利西亞的親烏克蘭派，他們的力量因著俄羅斯當局打壓烏克蘭語和烏克蘭文化而加強。帝國政府也有些人看出了這些政策的缺點，其中包括新任的內政部長洛里斯·梅利科夫。他是個自由派，一八八〇年八月甫一上任就和其顧問們忙著準備完全廢除或大大修改「埃姆斯敕令」，以減輕烏克蘭文化活動和烏克蘭語出版品所受到的壓力。洛里斯·梅利科夫想要恢復烏克蘭人對政府的信任。只要皇帝詔書繼續生效，這個目的就不可能在烏克蘭人的土地實現，因為敕令甚至不把在舞台上唱烏克蘭語歌曲列為非法，這一點讓很多本來完全效忠帝國的小俄羅斯菁英分子一樣非常不滿。

有些歷史學家把這種調和烏克蘭民族主義和全俄羅斯統一性與日俱增緊張關係的努力稱為一種蘇格蘭模式。這是因為，英國曾經放任蘇格蘭發展出自己的身分和文化認同，但照樣鞏固了蘇格蘭貴族對政府的效忠。在俄羅斯帝國，一個相似的解決方案將會把烏克蘭人的身分認同和文化放入一個「三位一體俄羅斯民族」的架構中。其中的措施包括在小學裡教授烏克蘭語，容許小俄羅斯的文化和語言與「全俄

羅斯」（事實上是大俄羅斯）的文化和語言並行發展，在帝國境內的烏克蘭人省分建立一個雙語的教育系統和雙文化的公共領域。這種妥協性做法本來就是一些親烏克蘭派的領軍人物如科斯托馬羅夫建議過，也曾經在一八七〇年代和一八八〇年代早期獲得一些有改革精神的官員欣賞。

許多人都預期限制烏克蘭語的政策很快會改轅易轍。但隨著亞歷山大二世在一八八一年三月遇刺身亡，俄羅斯政局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去不返的不僅止於俄羅斯社會會朝憲政改革移動這個誇張的期望，還包括另一個較為不誇張的期望：取消對烏克蘭人語言和文化的打壓。政府官員確實對「埃姆斯敕令」做出了修改建議，也得到了新沙皇的批准，但修改微乎其微。一八八一年十月八日，亞歷山大三世簽署了一封皇帝詔書，批准在省長同意下上演烏克蘭語戲劇，但禁止設立單獨的烏克蘭語劇院，規定每齣烏克蘭語戲劇的演出都要伴隨著一齣俄羅斯語戲劇。

此後，「埃姆斯敕令」的效力又維持了二十四年。打壓政策的持續讓加利西亞對俄羅斯的親烏克蘭派更有吸引力，也讓加利西亞的親烏克蘭派完勝他們的親俄羅斯派對手，即便帝國當局在一八八〇年代後期對親俄羅斯派採取資助政策一樣於事無補。在帝國境內，全面打壓的政策讓親烏克蘭派和政府完全沒有可以對話餘地。接下來的幾十年，在親烏克蘭派的協助下，烏克蘭將會變成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溫床。至此，小俄羅斯人願意妥協的時代已經結束，隨之結束的是把小俄羅斯納入全俄羅斯文化和空間作為三位一體民族一員的希望。自此以後，小俄羅斯知識分子只剩下兩個選項：要麼成為「真正的俄羅斯人」，要麼擁抱一種獨立的烏克蘭人身份認同。

197 Aleksei Miller, *Ukrainskii vopros v politike vlastei i russkom obshchestvennom mnenii (vtoraia polovina XIX veka)* (St. Petersburg, 2000), 241.

198 這裡所謂的全俄羅斯語就是指大俄羅斯語。

199 同上，79.

200 同上，82-83.

201 同上，100.

202 Mikhail Katkov, *Imperskoe slovo* (Moscow, 2002), 146.

203 同上，144.

204 指「聖西里爾與聖美多德兄弟會」於一八四七年已被鎮壓，但現在又冒出多種類似該兄弟會的論調；古怪的字母指烏克蘭語字母。

205 [Nikolai Rigel'man,] "Sovremennoe ukrainofl'stvo," in *Ukrainskii vopros v russkoi patrioticheskoi mysli*, comp. A. Iu. Minakov (Moscow, 2016), 179, 184.

206 Miller, *Ukrainskii vopros*, 241.

207 同上，243.

208 同上，201.

209 *Proekt politicheskoi programy dlia Rusi avstriiskoi* (Lviv, 1871), 9-10.

210 同上，12-13.

第四篇 民族革命

第十章 人民之歌

那是一場大災難和一個極壞的預兆。慶祝二十八歲新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的活動最後演變成人踩人事件，造成近兩千名男女老幼死亡。

事情發生在一八九六年五月十八日。據估計，當天共有五十萬人聚集在莫斯科附近的霍登卡野地，慶祝新沙皇的登基。許多人是聽說有麵包、香腸和糖果可拿而被吸引。當官員開始分發禮物時，人群湧向商店，撞爛沿途一切，又踩在摔倒的人身上。會有那麼多人摔倒，是因為野地遍布溝渠，全部蓋上了木板，但木板承受不住壓力而折斷。年輕的新沙皇想要取消慶祝活動，但他的臣子堅稱萬萬不可。大多數聚集在霍登卡野地的人不僅被免費餐飲吸引，還想拿到有雙頭鷹圖案的紀念杯。這些杯子在慶典前夕被放在莫斯科的商店展示，因此眾人對慶典期望甚殷。等所有屍體被抬走後，群眾合唱〈天佑沙皇〉歡迎沙皇的駕臨，這首歌後來被稱為〈人民之歌〉。至於尼古拉二世，在這場意外中毫髮無傷。

但沙皇的威望卻沒能在八年半之後發生的另一次事件中全身而退。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星期天，近兩萬名聖彼得堡的工人和家屬聚集在城郊，向沙皇的冬宮（今為冬宮博物館）前進。他們唱著〈人民之歌〉，手上抬著東正教聖像和皇帝肖像。他們沒有要求免費食物。遊行隊伍的領袖是東正教神父加邦，他準備好一份請願書，上面寫著：「陛下，我們是聖彼得堡的工人，帶著我們無助的妻子、兒女和父母，要向您尋求正義和保護。」工廠工人希望得到公民權利、較高工資、八小時工作制和罷工的權利。他們還希望有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請您拆除您和人民之間的牆，讓他們和您一起治理國家。」²¹¹

政府以開火回應示威者的要求。就在這時候，遠東地區傳來了壞消息：強大的俄羅斯帝國軍隊被蕞爾小國日本打敗。俄軍已在一月二日撤出旅順港。這個消息讓革命分子變得更大膽，而發生在冬宮門前

的示威就是證明。當局決定不示弱，反而用武力驅散示威者，終止他們的「革命」。幾十人被殺，數百人受傷。這次事件—後來被稱為「血腥星期日」—粉碎了沙皇和他的人民之間被高度理想化的關係。加邦神父罵沙皇是畜牲，呼籲報復。俄國的第一場革命遂告爆發。

接下來幾天，聖彼得堡工人發起罷工，並得到全帝國工人的響應。農民起而效法，拒絕向國家和地主繳交地租。一九〇五年夏天發生在戰艦「波坦金號」的兵變把動亂引入陸軍和海軍。一九〇五年二月，尼古拉命令內政部長籌備「杜馬」（Duma）—第一個真正俄羅斯議會的前身，但這個杜馬的功能不在於立法，而僅是為沙皇提供意見。舉行杜馬選舉的消息在八月公布，但社會仍然不滿，動亂繼續蔓延。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在全國工人繼續罷工的壓力下，尼古拉發表了宣言，答應給予人民基本公民權利和男性投票權，賦予杜馬立法權，並保證不會推出未經杜馬同意的新法條。

俄羅斯帝國在工人罷工、農民起義和軍人兵變的壓力下進入了一個大眾政治的新時代。議會制的誕生讓沙皇的絕對權力受到挑戰。帝國政府這一次得以在革命的浪潮下存活下來，但不能不改轅易轍，追求新的合法性根據。要找到這個根據，最明顯的入手處莫過於民族政策的領域。在在看來，皇權都需要俄羅斯民族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後盾。

由工人罷工肇始的革命也喚醒了整個帝國的非俄羅斯人政治黨派領導人的意識。一如往常，領風氣之先的是波蘭人。在前波蘭王國地區，它在革命的前幾十年成為了帝國的一大工業中心，工人發動罷工，隨之而來的是帝國象徵符號的破壞。學生跟隨工人罷工而罷課，要求恢復用波蘭語教學。

保守的波蘭貴族想要得到平等，特別想要成立自治政府。這種平等早已存在於帝國其他部分，獨不見於波蘭人占大宗的地區，這是因為帝國政府信不過波蘭的上層社會階級。思想更激進的領導人要求讓前波蘭王國地區擁有更大的自主權。這是由德莫夫斯基領導的「波蘭

民族民主黨」的綱領。他的主要政治對手是波蘭的社會主義者，其領導人畢蘇斯基想要發動起義，取得完全獨立。

在一九〇四年二月，日俄戰爭的爆發曾帶給波蘭政治家推進他們目標的新機會。就在聖彼得堡與日本在為爭奪滿洲和朝鮮而廝殺的同時，帝國西境也變得愈來愈不安定。畢蘇斯基前往日本尋求支持，一九〇五年夏天，他的追隨者在波蘭的工業中心羅茲領導了一場工人起義。起義雖然被鎮壓了下來，但讓前波蘭王國地區自治的觀念卻獲得杜馬中自由派議員的支持，也將會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的革命期間和之後成為重新構思俄羅斯民族問題的一大因素。

如果讓波蘭自治，那應該把它的邊界劃在哪裡？這是很多俄羅斯政治家和知識分子關心的問題，又特別引起過去幾十年領導和支持俄羅斯化波蘭人土地者的關注。不過，這次的問題核心不是右岸烏克蘭或白羅斯西部，而是前波蘭王國的霍爾姆地區，它構成了盧布林和謝德爾采兩省的東部邊區。該地區原屬基輔羅斯所有，居民在十九世紀之後被視為小俄羅斯人或烏克蘭人。不過，因為曾被波蘭統治幾百年，它對俄羅斯來說形同一個民族、宗教和文化上的化外之地。

引發霍爾姆危機和讓它的名字接下來七年老是出現在報紙頭條的事件發生在一九〇五年四月十七日，即東正教復活節的第一天。當天，沙皇為安撫社會愈來愈大的不滿情緒，發布了一道諭旨，容許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它允許人民選擇脫離俄羅斯東正教，不會有政治懲罰，正是這一點引起了霍爾姆地區的宗教動盪；三十年前，當局在該地區強迫數以十萬計烏克蘭裔的聯合教會信徒皈依東正教。事態會如何發展是聖彼得堡政府官員意料中事。他們曾經預測，諭旨發出後，該地區會有十萬到十五萬名東正教徒，約為總數的三分之一，向聖彼得堡的東正教宗教事務管理總局說再見，改投羅馬教皇的懷抱。這個預測被證明正確無誤，因為根據近期的推算，當日的改教者正好介乎這兩個預測數字之間。

雖然中央政府相信，為了順應宗教寬容的時代潮流，付出這種代價乃是無可避免，但此舉卻讓那些畢生奉獻於推廣東正教和俄羅斯人身分認同的地區官員和東正教神職人員感到被出賣。有這種感覺的人包括霍爾姆的俄羅斯裔東正教主教葉甫洛吉（本姓 Georgievsky），他在一封寫給宗教事務管理總局局長波貝多諾斯采夫的信中表達了自己的挫折感：「我們這些教士的信用已經破產。三十年來，他們反覆告訴人民，霍爾姆—波德拉謝永遠會屬於東正教和俄羅斯人，但完完全全相反地，現在大家卻看到，這地方已被東正教徒和俄羅斯人的敵人恣意接管。」²¹²

信寄出之後不久，葉甫洛吉和其支持者便前往聖彼得堡會見波貝多諾斯采夫，商量如何處理俄羅斯利益在霍爾姆受到威脅的問題。他們想要重繪帝國省分的邊界，把霍爾姆從前波蘭王國地區分割開來。在他們的設想中，新成立的霍爾姆省將會以「俄羅斯人」為核心，即包含三十萬名烏克蘭人—這些人在一八九七年的普查中表示自己的母語是小俄羅斯語。內政部的官員為這個行政區劃的變革忙得雞飛狗跳。法案最終被送到杜馬，卻引發極大爭論，直至一九一二年才定案，期間動員了議會內外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勢力。

對霍爾姆的辯論把親烏克蘭派和主張俄羅斯不可分割的人拉在了一起，共同為反對波蘭人的勢力而戰。但他們的結盟是為情勢所逼，合作範圍只限於這單一事項。在幾乎其他所有事情上，親烏克蘭派和俄羅斯民族主義者都是在為他們雙方都認為是屬於自己的一片土地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語言問題一直是親烏克蘭派的核心關注議程。一九〇四年十二月，隨著對日戰爭的形勢轉壞和社會不滿情緒急劇上升，帝國政府同意重新檢討「埃姆斯敕令」。檢討會議的討論重點再一次放在那部《四福音》的譯本，但這一次氣氛截然不同。帝國科學院的院長康斯坦丁諾維奇大公贊成廢除禁令，讓烏克蘭語新約聖經出版。

一九〇五年三月，科學院的一個委員會又討論了是否應該解除對烏克蘭語出版品的禁令。這個討論是應政府的要求召開，也徵求了基

輔大學、哈爾科夫大學和敖得薩大學的意見。四家學術機構都建議解禁，其中科學院的措詞尤其強烈。科學院於一九〇五年四月發出一份由語文學家沙赫馬托夫和科爾什所研擬並得到許多自由派院士聯名簽署的備忘錄，不僅建議廢除禁令，還為承認烏克蘭語為一種獨立語言開了大門。

科學院備忘錄的兩位執筆者沒有明說烏克蘭語是一種獨立語言，但說理方式讓人一眼看出他們認為烏克蘭語和俄羅斯語是平起平坐。他們達到這種效果的方法是丟棄一種「全俄羅斯語言」的觀念。備忘錄聲稱，拜俄羅斯作家努力把他們的文學語言拉近白話之賜，「到了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葉，全俄羅斯文學語言已經充分地大俄羅斯語化，所以，我們的文學語言，包括受教育階層的語言和各式各樣的書面語在內，都應該被認為是一種充分發展的大俄羅斯語」。除使用歷史論證和語言學論證外，該備忘錄的執筆者還採取了政治論證。

「當一個國家不知道如何保障最基本的公民權利—即用母語說寫的權利，就不僅無法在公民心中喚起尊敬和愛的感覺，還會讓他們為自己的生存感到無以名之的恐懼。這種恐懼又會引生不滿情緒和革命願望。」²¹³這番話出現的時間點恰到好處：政府因為被幾個月前爆發的革命嚇呆，已經準備好聆聽人民的聲音。

這份一九〇五年四月發出的備忘錄印數有限（僅供政府內部參考），但隨即對帝國內部和邊界之外的政治爭論發生重大影響。禁止烏克蘭語出版品的禁令在一九〇五年二月開始解除，首先獲准出版的是烏克蘭語宗教典籍，這是康斯坦丁諾維奇大公推動的。然後，到了一九〇六年春天，隨著一套新的審查法規頒布，對烏克蘭語出版品的全部禁令一律解除。但這種解禁只是手續上的，因為對烏克蘭語報章的禁令業已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廢除，同一個月，沙皇頒布諭旨，授予人民基本公民權利，包括「言論自由」。到了該年年底，三份烏克蘭語報紙在帝國境內出版，在基輔一份，波爾塔瓦省兩份。

新政策的受益人是白羅斯的活動家。一九〇六年九月，第一份白羅斯語日報《咱們的命運》在維爾紐斯發行，但不久就因為太過左傾

被關閉。取而代之的是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創辦的《咱們的田》。這報紙立場較溫和，將會持續發行至一九一五年，期間造就了一批新的白羅斯語文學經典，有助於白羅斯語文學的普及。在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五年之間，白羅斯語書籍的出版數量從幾乎是零增加到八十本，印數累計二十二萬冊。

雖然這些數字顯示白羅斯語言和文學的發展有了突破，但與帝國境內其他語言出版品的情況相比，仍舊非常沒有看頭。例如，光是一九一一年當年，俄羅斯語書籍就有兩萬五千五百二十六本、波蘭語書籍一千六百六十四本、意第緒語和希伯來語書籍九百六十五本。烏克蘭語書籍以兩百四十二本位居第四位。白羅斯人因為從來沒有為他們語言受到的歧視發起過夠長期的鬥爭，所以只能在出版品數量上遠遠落後。

一間印行烏克蘭語和白羅斯語作品的印刷廠恰好和俄羅斯帝國第一個議會同時出現。在一九〇六年第一屆杜馬選舉中，帝國的烏克蘭人省分選出了六十二位代表，其中四十四人結成聯盟，相約在議會中以促進烏克蘭人的政治和文化利益為目標。白羅斯人議員企圖做一樣的事。對此，俄羅斯最受歡迎的報人和俄羅斯民族主義領導人之一的緬希科夫寫道：「這些白羅斯人受到愚蠢傳染，竟然想要仿效烏瓜，也在杜馬弄一個自己的『小圈子』。由此可見，一樣有白羅斯分離主義者存在。這種事足以讓一隻貓笑出來……」²¹⁴一票白羅斯人議員最終談不攏，無法組成黨團，各人按照自己的政治傾向行事：要麼支持其他黨派鼓吹的自由主義法案，要麼支持俄羅斯民族主義法案。

杜馬的烏克蘭議程大都是由格魯舍夫斯基推動，他是利沃夫大學歷史教授和加利西亞親烏克蘭運動的領軍人物之一。畢業於基輔大學的他密切關注俄治烏克蘭的政治和文化發展，但拒絕放棄俄羅斯公民身分。他在一九〇六年春天抵達聖彼得堡主編《烏克蘭先驅報》，作為烏克蘭黨團的喉舌。《烏克蘭先驅報》以俄文出版，不僅因為俄羅斯語是黨團大多數成員的日用語言，也因為有需要在俄羅斯人或講俄羅斯語的議員和公眾中把烏克蘭人的觀點和政治目標傳播出去。當杜

馬在一九〇六年五月開始審議法案時，格魯舍夫斯基制定的烏克蘭運動綱領已經不僅追求以烏克蘭語作為教學語言，還追求烏克蘭的領土自治。

烏克蘭獨立的想法早在十九世紀末葉已經在奧地利統治的加利西亞獲得支持，而到了一九〇〇年，這個觀念也被短命的「烏克蘭革命黨」引入烏克蘭。但格魯舍夫斯基和主流的烏克蘭領導人追求的並非獨立，而僅是自治。格魯舍夫斯基認為，烏克蘭的需要僅透過帝國的結構調整便能獲得滿足。他把烏克蘭領土自治問題放在「解放俄羅斯」這個更大的架構之內，致力於把俄羅斯帝國轉化為君主立憲國家。對格魯舍夫斯基來說，烏克蘭問題不是俄羅斯族群問題的一部分（他舉出的帝國科學院主張並不存在一種「全俄羅斯語」作為政治論證），而是帝國民族問題的一個面向，重要性不亞於波蘭問題和芬蘭問題—波蘭人和芬蘭人的領袖都要求更大自治權，因此該用同一種方法解決。

不令人意外，格魯舍夫斯基的主張得到杜馬其他非俄羅斯人地區代表的同情。因此，杜馬裡的烏克蘭人議員和這些人組成了「自治聯邦主義者聯盟」。那是一個大雜燴，成員既有俄羅斯哥薩克的自治主義者—他們要求不以民族為基礎的地方自治權，也有非俄羅斯人的聯邦主義者—他們想要在俄羅斯帝國的架構內建立一個諸民族的聯邦。波蘭人議員在自己的圈子裡組織起來為前波蘭王國地區恢復自治請命，格魯舍夫斯基準備跟進，起草了一個讓烏克蘭自治的提案，卻無法提出，因為帝國當局在一九〇六年七月八日解散第一屆杜馬—從其開議到被解散，壽命僅僅七十二天。

沙皇認為一票議員的觀念和行動非常有破壞性。他在解散杜馬的宣言中說：「這些國家的代表不思投入制定有益的法案，反而闖入他們能力所不及的領域，搞一些讓地方自治的法案，又對基本法215的不完備指指點點—要知道，這些法律只有皇帝的意志可以修改。」216烏克蘭人議員在短命的第二屆杜馬（一九〇七年二月至六月）成功組成四十七人的黨團，再次高呼烏克蘭自治的口號。但第二屆杜馬旋即被

解散—沙皇對這二屆杜馬的不喜歡尤甚於第一屆，接著選舉法受到更改。新的選舉法對大地主有利，讓親烏克蘭派的代表難以當選，因為他們的支持者往往是農民。

第三屆杜馬（一九〇七至一九一二年）和第四屆杜馬（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七年）都沒有烏克蘭黨團。這不僅讓烏克蘭自治的計畫胎死腹中，也讓把烏克蘭語引入公共領域這個溫和得多的企圖幻滅。一九〇八年，一個主張把烏克蘭語引入學校的提案受到大多數票否決，另一個主張在法庭上使用烏克蘭語的提案亦在一九〇九年被否決。親烏克蘭派的領導人別無他法，只好選擇和其他政黨合作，以保住他們在革命時期取得的成果為優先目標。他們把主要希望寄託在「立憲民主黨」²¹⁷，這是一個自由派政黨，代表的是俄羅斯人中的都市知識分子。

立憲民主黨獲得帝國西境的波蘭裔和猶太裔知識分子的大力支持，也是杜馬中唯一不否定少數民族自治願景的政黨。這個政黨在烏克蘭人各省大受歡迎，很多親烏克蘭人的活動家都加入其陣營，但該黨一九〇五年發表於基輔的黨綱，並沒有提及烏克蘭問題或烏克蘭人問題。立憲民主黨準備好要採納波蘭人和芬蘭人的自治憧憬，卻疏遠烏克蘭人和其他民族的類似憧憬。

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陸續發表的一批文章中，立憲民主黨領袖之一的司徒盧威表達了他對烏克蘭問題的立場（許多人相信，這也是其黨團的立場）。他的第一次表態是在一九一一年一月，目的是回應敖得薩人和猶太復國主義者亞博廷斯基的一個主張：後者在文章中質疑司徒盧威把俄羅斯帝國當成一個俄羅斯人的民族國家，認為有鑑於大俄羅斯人在全國人口中僅占百分之四十三，俄羅斯帝國只能算是個多民族的帝國。司徒盧威不同意此說，指出民族國家的關鍵不在於民族而在於文化，用這個標準來衡量的話，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也屬於大俄羅斯人陣營。在司徒盧威看來，俄羅斯就像美國和英國，是個還在打造中的國家。他心目中的俄羅斯民族不是由民族性統合起來而是由文化—俄羅斯文化。他堅稱，俄羅斯文化不是大俄羅斯文化，而

是全俄羅斯文化，因此除了大俄羅斯人以外，小俄羅斯人和白羅斯人亦是其核心成員。

烏克蘭人活動家曾經歡迎帝國科學院否定有一種全俄羅斯語存在的主張，但他們發現司徒盧威有一種全俄羅斯文化存在的主張，對他們打造自己民族的目標構成更難以克服的障礙。一九一一年五月，知名烏克蘭律師基斯佳科夫斯基在司徒盧威主編的雜誌《俄羅斯思想》為文反對司徒盧威的見解，論證烏克蘭的語言和文化皆獨樹一格。司徒盧威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以一篇長文回覆，內容很有揭露性。他寫道：「我深信，在全俄羅斯文化和語言面前，小俄羅斯或烏克蘭文化是一種地方或外省文化。『小俄羅斯』文化和『小俄羅斯』語的這種地位是由俄羅斯歷史發展的整個過程決定，不可能改變，除非由歷史形塑而成的俄羅斯國家和社會徹底瓦解。」他進一步認定，硬要改變這種局面後果堪虞：「如果知識分子相信的『烏克蘭人』觀念在普羅大眾頭腦裡生根，將會對俄羅斯民族構成威脅，導致聞所未聞的分裂。」[218](#)

雖然司徒盧威提出這種警告，但不認為那樣的情況有可能發生。在司徒盧威認定的理想境界中，帝國文化由兩個層次構成，較高層次是使用「全俄羅斯語」，較低層次則是由地方語言包括小俄羅斯語提供服務。他相信，在烏克蘭和白羅斯文化的兩種可能運作方式中，一種是以作為地方文化運作，一種是以作為充分發展的高級文化運作，第一個選項更實際。他堅稱，烏克蘭和白羅斯的高級文化還沒有發展起來。在這樣的情形下，它們的語言可用於作為提供群眾初步教育的手段，但他們想要得到高級文化的浸潤，便只有接受靠俄羅斯語作為媒介的高階教育。

這種主張等於倒退回到十年前的「埃姆斯敕令」，那時德拉加曼諾夫認為烏克蘭語在帝國教育系統的功能是作為俄羅斯語的輔助。司徒盧威也樂於把自己的一些論證表現為德拉加曼諾夫思路的推論。只不過，烏克蘭人活動家會願意讓他們的語言和文化處於從屬地位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埃姆斯敕令」已經不再生效，而司徒盧威的立場

也很快便為立憲民主黨製造出難題，因為這個政黨非常仰賴親烏克蘭派活動家的支持。所以，黨本部與司徒盧威的「全俄羅斯文化」概念劃清界線，聲稱該主張僅代表他的個人意見。

立憲民主黨對烏克蘭問題的黨版路線是由黨魁—著名歷史學家米留科夫—拍板定案。一九一二年，在為第四屆杜馬選舉做準備時，他前往基輔會見親烏克蘭人領袖，包括格魯舍夫斯基，討論雙方結盟的事宜。這次會面中，米留科夫保證立憲民主黨將會支持文化自治的原則：即支持各民族都有權利發展自己文化，用自己的語言和國家打交道。這意味著，立憲民主黨支持在教育和司法系統引入烏克蘭語。格魯舍夫斯基方面則是向米留科夫保證，烏克蘭運動並非以分離主義為目標：「我們不是以咄咄逼人的民族主義願景作為指導原則，不認為烏克蘭民族有朝一日會升格為主權。」²¹⁹不過，他沒有在領土自治和聯邦主義的議題上讓步，指出烏克蘭活動家的目標「是按照聯邦主義的基礎重構一切」。他告訴米留科夫，這是他們未來的目標。

就這樣，文化自治成為了雙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能夠共事的平台。它是格魯舍夫斯基及其支持者的近期目標，也是米留科夫對烏克蘭人民願景所能做出的最大讓步。作為雙方這種合作的象徵，米留科夫一九一四年二月在杜馬發表演講，抗議政府禁止基輔舉行慶祝舍甫琴科百歲冥誕的活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階段，立憲民主黨和烏克蘭活動家的主要政治對手是君主主義者和俄羅斯民族主義，這兩批人有力主宰了第三屆和第四屆的杜馬。在西部省分，俄羅斯民族主義者最初會被動員起來，是為了遏阻波蘭地主階級對當局的威脅。進入二十世紀之交，當局雖然在帝國西境大力推行政治和文化的俄羅斯化，但該地區的真正主人仍是波蘭地主。他們的影響力充分顯現在第一屆杜馬的選舉結果：他們當選議員的人數明顯比他們所有票數加起來所能夠支持的多，反觀俄羅斯民族主義者推出的候選人則在波蘭人和自由派的聯手下被封殺。

正是為防止波蘭貴族利用新的選舉制度在第二屆杜馬的選舉中得利，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發起了自己的競選攻勢。他們面對的難題除了波蘭菁英階層傳統的高投票率外—有些人會專程遠從巴黎回國投票，還有選舉法有利於大地主的現實。小地主—主要是烏克蘭農民—只有把選票聯合起來才可望突圍。所以，俄羅斯民族主義者想要壓倒波蘭地主，必須走入農民中間，把農民組織起來。他們很快就找到可資依賴的下層結構和組織基礎：一直和在地天主教競爭的東正教會，再來是地區內得到教會和政府支持的眾多民族主義組織。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期間應運而生的俄羅斯民族主義組織中，最熱門的一個是「俄羅斯人民聯盟」。該聯盟在莫斯科舉辦第一次集會時，吸引到近兩萬人參加。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尼古拉接見聯盟的代表團，對他們的活動給予祝福。打著現代民族主義的旗號和靠著當局的撐腰，俄羅斯人民聯盟在動員民眾支持君主制一事上起到了關鍵作用。根據聯盟的章程，祖國的安全有賴於「堅定地維持東正教、無限制的俄羅斯式專制和民族的生活方式」²²⁰。換言之，烏瓦羅夫在一八三〇年代制定的公式—君主專制、東正教和民族性的三位一體—復活了，而且這一次受其鼓動的除了帝國官僚，還有販夫走卒。

俄羅斯人民聯盟所代表的俄羅斯不僅限於大俄羅斯。它在章程中指出：「本聯盟對大俄羅斯人、白羅斯人和小俄羅斯人一視同仁。」事實上，西部省分特別是烏克蘭還成了聯盟的主要行動基地。其最大的分支位於烏克蘭人省分沃里尼亞，集中在波恰耶夫修道院。據一九〇七年的一份報告顯示，該聯盟在沃里尼亞有超過一千個支部，成員超過十萬人。如果這份由總督彙整的報告可信，就表示光是沃里尼亞一省，就涵蓋了該聯盟四分之一的成員。人數規模緊追在後的是其他右岸烏克蘭的省分，特別是基輔省。

西部省分這種盛況歸功於每個支部都是由東正教教士所組織和領導。在教士的鼓動下，堂區教民紛紛加入聯盟。一份警察廳的報告把沃里尼亞的情況描繪如下：「其成員都是當地東正教堂區教民，很多都是半文盲，甚至有完全不識字的，所以不可能是自動自發。聯盟地

方支部的主持人大都是從堂區教士選出，他們為了強化俄羅斯的基礎而把愛國情感灌輸給農民。」[221](#)

把宗教忠誠轉化為愛國忠誠和灌輸一種「全俄羅斯人」身分認同只是俄羅斯人民聯盟在西部省分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根植於農民日益強烈的社會和經濟需求。在沃里尼亞和波多利亞，每個農民擁有的土地平均只有三點六公頃，反觀南方各省的平均土地占有率卻是十六公頃。對土地的飢渴驅使很多農民離鄉背井，往帝國的東部另謀發展。但留下來的這些卻準備好被動員起來，為自己的經濟利益發聲，而俄羅斯人民聯盟提供他們一個現成框架。

東正教教士和聯盟的宣傳士把農民的苦惱歸咎於波蘭地主和作為農產品中盤商的猶太人。警察廳的調查報告指出，聯盟分子「在農民中間散播對所有非俄羅斯人和地主的敵意，讓農民覺得有必要參加聯盟，相信唯有它可以實現他們的各種美夢：包括強行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給他們，讓他們擺脫所有對政府的依賴，等等」。[222](#)

農民顯然把聯盟的支部看成真正可以代表他們利益的機構，因為他們曾多次拒絕服從政府官員的命令，表示只接受聯盟領導人的指揮。聯盟這種蛻變為土地革命工具的現象引起當局憂慮，因為對當局來說，維持邊界省分的秩序與穩定比動員群眾支持君主制更加重要。因此，各省的警察廳得到命令，必要時得關閉俄羅斯人民聯盟的支部。

俄羅斯人民聯盟象徵君主制和農民的結合，仰賴的黏合劑是仇外心理、反猶太主義和俄羅斯民族主義。但這個成立於一九〇五年革命期間的組織不到幾年便開始瓦解。癥結是土地問題。俄羅斯民族主義組織的領導人，往往是大地主，希望當局從地主購買土地，分配給農民，但政府卻苦於資金不足，無法照辦。於是，俄羅斯民族主義在土地問題上變得一籌莫展。在一個以農民為大宗的國家，這點對那些想要把忠君感情轉化為民族感情的人構成了重大障礙。多年以後，「俄羅斯社會民主黨」最極端一個分支（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列寧在回顧

時指出，俄羅斯民族主義組織的活動帶來了意料之外的好處：「黑色百人團²²³之類的政治組織讓自己和農民結合起來，而那些被鼓動起來的農民首先是按黑色百人團所要求的要求，繼而是要求得到地主的所有土地。」²²⁴

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在西部省分面對的敵人除了波蘭人和猶太人，還有烏克蘭運動的推手，他們的力量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獲得大增。一九〇七年，由語言學家弗羅倫斯基和布季洛維奇執筆，反對承認烏克蘭語為獨立語言的陣營人出版了一批小冊子，設法證明烏克蘭語不過是全俄羅斯語的一支。論戰在一九一一年隨著首相斯托雷平在基輔遇刺身亡而白熱化。當時第四屆杜馬選舉在即，而司徒盧威也是在這一年開始對烏克蘭問題發表意見。不過，立憲民主黨的主要領袖卻注意到，烏克蘭運動在烏克蘭人省分的都市知識分子中愈來愈受歡迎。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基輔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俱樂部召開會議，這是帝國內同類型俱樂部中最大的一個。討論應該怎樣看待小俄羅斯人的民間傳說、傳統和愛鄉情懷的問題。這個問題相當棘手，因為俄羅斯民族主義運動會在烏克蘭產生，正是為了反制一八四〇年代出現的烏克蘭／小俄羅斯文化覺醒。辯論表明，基輔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不準備放棄自身的政治、文化甚至語言傳統。俱樂部領導人之一的薩文科宣稱，他對烏克蘭的愛是他的小俄羅斯人身分認同的一部分。他寫道：「我是小俄羅斯人，有關小俄羅斯人的一切我都不陌生²²⁵。我熱愛我的鄉土，即熱愛烏克蘭，本質上是個舊意義下的親烏克蘭派。烏克蘭的個性，她的歷史、語言和日常生活是我所一往情深。」²²⁶他在論述的最後引用舍甫琴科的話作結。

既然基輔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繼續對烏克蘭款款情深，那他們對烏克蘭運動的領導人又是什麼看法？他們稱後者為「分離主義者」，又愈來愈稱之為「馬澤帕主義者」—馬澤帕是一七〇八年起而反抗彼得一世、投入瑞典國王查理十二世陣營的哥薩克蓋特曼。帝國當局曾在一九〇九年大肆慶祝波爾塔瓦大捷²²⁷兩百週年紀念，目的是讓大眾記取馬澤帕和十八世紀分離主義的下場。其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前的階段，烏克蘭政治領袖都認為他們要爭取的不是民族獨立，而是烏克蘭人在帝國內的自治。但俄羅斯民族主義的理論家看得更透徹。薩文科寫道：「馬澤帕主義者清楚意識到，倘若小俄羅斯人作為完全獨立民族的概念深入人心，那麼不可避免的歷史演化將會把餘下的工作給完成。」²²⁸在他看來，後果也許是一次俄羅斯民族的分裂和一場摧毀帝國的兄弟鬩牆戰爭。

雖然認定烏克蘭運動是對俄羅斯民族和國家的重大威脅，但俄羅斯民族主義領導人又認為它成不了氣候：爭取烏克蘭自治的想法只存在於學生和知識分子之間，受其感染的普羅大眾特別是農民不多。為扭轉這種局面，烏克蘭活動家從一九〇五年起走入農村，仿照加利西亞的模式創建了「啟蒙」之類的文化會社，對農民展開社會主義宣傳攻勢。他們還為農民創辦烏克蘭語報章。但隨著一九〇七年革命的活躍階段結束，烏克蘭活動家的影響力受到政府嚴重遏制，而俄羅斯民族主義也席捲鄉村，受歡迎程度是非俄羅斯人黨派可夢不可求。

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讓非俄羅斯人的活動家興起熱望，而他們大部分人都認為，社會解放和民族解放是不可分離的議題。在烏克蘭和白羅斯的情況中，激進的社會要求和民族願景齊頭並進，因為這兩個運動中較年輕的活動家都是秉持社會主義觀點。他們的對手利用這個事實來詆毀烏克蘭活動家，促使當局查封了第一份白羅斯語報紙。但革命的後續效應讓烏克蘭人能夠透過杜馬運作，利用議會選舉活動動員支持者，高舉自治和聯邦主義的旗幟，創辦雜誌和報紙，在西部省分的知識分子中間傳播自己的觀念。

但烏克蘭和白羅斯活動家，尤其是後者，從俄羅斯主流政黨得到的同情和支持並不多。就連屬於自由派的立憲民主黨，他們是最同情非俄羅斯人願景的俄羅斯人政黨，一樣在「俄羅斯問題」上產生分裂：一邊是司徒盧威一派，另一邊是實用主義取向的米留科夫一派。司徒盧威因為憧憬把俄羅斯帝國轉化為一個「正常」歐洲國家，必須把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留在文化意義上的「俄羅斯民族」裡。米留科夫則選擇了一個公民模式的俄羅斯民族，願意為非俄羅斯文化的發展

留出足夠空間。但即便是米留科夫一派，對於烏克蘭運動的主要戰略目標—把烏克蘭語引入教育系統，也頂多是給予象徵性支持。杜馬從未通過允許烏克蘭人各省使用烏克蘭語教學的法案。

及至一九一四年，君主制看似已安渡革命，能夠把自身調整得適應新的政治和經濟現實。向君主立憲制的過渡業已開始，一個議會業已成立，而朝廷也找到了一個只讓大體忠於它的人當選議員的方法。透過對非俄羅斯民族做出若干文化讓步，朝廷重新把這些民族置於掌控之中，而在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的奔走下，沙皇在大部分子民心目中也變得前所未有地德隆望尊。容許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用自己的語言出版書報的政策並沒有如過去所一直擔心的那樣，引起帝國東斯拉夫核心²²⁹的分裂。民眾贊同俄羅斯國家暨民族不可分割的態度熱烈如昔，甚至在傳統上麻煩多多的西部省分一樣有更多人是這種態度。

在在看來，如果說一九一四年八月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會為俄羅斯帝國帶來任何改變，那就是強化它虛擬的民族統一性，為它把國土擴張至原有邊界之外創造出條件。

²¹¹ Khrestomatiia po istorii SSSR, ed. Yurii Korablev (Moscow, 1988), 42.

²¹² Theodore Weeks, *Nation and State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Nationalism and Russification on the Western Frontier* (DeKalb, IL, 1996), 180.

²¹³ *Zaborona ukrains'koho slova v Rossii*, introduction by Mykhailo Hrushevs'kyi (Scranton, PA, 1916), 33, 43.

²¹⁴ D. Kotsiubinskii, *Russkii natsionalizm v nachale XX veka: Rozhdenie i gibel' ideologii Vserossiiskogo natsional'nogo soiuza* (Moscow, 2001), 310.

²¹⁵ 基本法是一九〇六年五月頒布的國家基本大法，類似憲法。

²¹⁶ *Primary Sources in Russian History 1801-1917*, ed. John Etty (Corby, UK, 2009), 77.

²¹⁷ 立憲民主黨（Constitutional Democrats）成立於一九〇五年十月，成員為中產階級，歷史學家米留科夫和思想家司徒盧威屬之。主張君主立憲、保障人民基本權利、土地轉讓給農民，由政府補償地主的損失。

²¹⁸ Petr Struve, "Obscherusskaia kul'tura i ukrainskii partikuliarizm: Otvet ukraintsu," *Russkaya mysl'*, no. 1 (1912): 66.

- 219 S. Breiar, “Partiia kadetov i ukrainskii vopros, 1905-1917,” in *Issledovaniia po istorii Ukrainy i Belorussii*, vyp. 1 (Moscow, 1995), 89-110.
- 220 Rossiia, 1900-1917: Dokumenty, materialy, kommentarii, ed. I. K. Kir’ianov (Perm, Russia, 1991), 130.
- 221 I. V. Omelianchuk, “Chislennost’ Soiuza russkogo naroda v 1907-1914 godakh v pravoberezhnykh ukrainskikh guberniiakh,” in *Belorussiia i Ukraina* (Moscow, 2006), 156.
- 222 同上，159.
- 223 黑色百人團（Black Hundred）是一個極端的俄羅斯民族主義組織。
- 224 Politburo TsK RKP(b)—VKP(b) i Kommintern, 1919-1943 (Moscow, 2004), 64.
- 225 此句話改自羅馬共和時期作家泰倫提烏斯說過：「我是人，有關人的一切我都不陌生。」
- 226 Kotsiubinskii, *Russkii natsionalizm*, 303-304.
- 227 一七〇九年的波爾塔瓦戰役是彼得一世擊敗查理十二世決定性的一戰。
- 228 同上，305.
- 229 指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這三支構成帝國核心的東斯拉夫人。

第十一章 君主制的垮台

一九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簽署一道詔書，把首都聖彼得堡更名為彼得格勒（原名稱是彼得大帝所取），讓這個城市的名字從紀念一位聖徒改為紀念它的創建者。更重要的是，用俄文的「格勒」（grad）取代德文的「堡」（burg）標誌著俄羅斯想要切斷它和中歐的密切連結。一個逐漸疏遠西方的過程於焉展開，它將會在一九二〇年代得到進一步加強，其時彼得格勒再次更名為列寧格勒，並在下一個十年史達林主政期間達於高峰。

這個更名之舉發生在俄國對德奧宣戰的幾天後，是受泉湧的愛國熱情所驅使。沙皇沒有和幾個主要部長商量太多便做出決定，更多是為了回應群眾而非內閣的期望。第一次世界大戰不是俄羅斯首次和一個西方強權發生軍事衝突。類似的事情在十八和十九世紀屢見不鮮，只不過那時候沒有人想過要給首都重新命名。時代正在發生變化。在不久前重劃的邊界線兩側，民族主義情緒都大為高漲，而最能滿足民族主義胃口的莫過於戰爭。俄國人相信這場戰爭必然是速戰速決，以勝利收場，給首都更名之舉並非臨時起意，卻也引起了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的熱烈歡騰。當時一份報紙這樣說：「一件偉大的歷史事件發生了：兩百多年來被稱為聖彼得堡的俄羅斯帝國首都因為一紙詔書而更名為彼得格勒。在這個對日耳曼主義鬥爭的偉大時代裡，最美好的親斯拉夫派夢想獲得了實現。」[230](#)

幾星期前的八月二日，數以萬計公民湧入冬宮前的廣場。九年前的一九〇五年革命就是在該廣場點燃，但這一次，群眾並不是前來抗議和要求什麼，而是為了表現愛國熱情和忠君心跡。世界知名的俄國歌劇演唱家夏里亞賓帶領群眾合唱〈天佑沙皇〉。當尼古拉二世出現在陽台時，群眾跪了下來。他把前一天向奧地利宣戰的詔書讀了一遍，解釋說政府此舉是為了回應奧地利對塞爾維亞的攻擊。宣戰詔書上稱：「忠於自己的歷史使命，俄羅斯從不曾棄同一信仰與血脈的其他斯拉夫人的命運而不顧。」[231](#)沙皇繼而解釋，隨著德國對俄國宣

戰，事情攸關的已經不僅止於斯拉夫人的團結一致。「我們（WE）堅定不移地相信，」他說，「我們所有的（all OUR）忠誠子民都會和諧和無私地起而為保衛俄羅斯土地而戰。讓我們在這個接受考驗的可怕時刻忘掉內部紛爭。願沙皇及其子民的團結比從前任何時候更加強固。」

他不是把戰爭說成歐洲兩個帝國之間的鬥爭，而是說成俄羅斯人和他們領導的斯拉夫世界對日耳曼民族的角力。冬宮殿前的群眾高舉著橫幅和沙皇畫像，位於最中央的兩面橫幅一面寫著「俄羅斯和整個斯拉夫國度勝利」，另一面寫著「解放喀爾巴阡羅斯」。雖然俄羅斯帝國打著泛斯拉夫的旗號對德奧宣戰，但俄羅斯問題從一開始便深深被捲入其中。戰爭最直接的目標之一是要把基輔羅斯最後尚未收復的祖產納入沙皇的長臂之下，也就是收復奧匈帝國統治下的加利西亞、布科維納和外喀爾巴阡²³²—在俄羅斯的官方術語裡，它們被統稱「喀爾巴阡羅斯」。收復這些土地將會完成「俄羅斯」全域重歸統一。

八月十七日，俄軍越過德俄邊界，進入東普魯士。官方宣傳集中在強調俄國有必要粉碎野心勃勃的條頓武力。次日，俄羅斯指揮官亦率領軍隊，越過奧地利邊境，號稱此舉是為了解放長期以來遭受哈布斯堡王朝壓迫的「俄羅斯人」。發生在戰線南區的戰爭被說成是為了一勞永逸地解決俄羅斯問題，讓所有俄羅斯人重歸沙皇懷抱。它也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契機，讓當局可以粉碎崛起中的烏克蘭和白羅斯民族運動，確保「俄羅斯民族」的完全統一。

俄羅斯民族主義情緒在戰爭頭幾個月空前高漲，讓俄羅斯民族主義組織的領導人對戰爭期望更殷。他們長久以來都力挺加利西亞的親俄羅斯派，又不遺餘力鬥爭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給他們貼上俄羅斯民族叛徒的標籤。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的日子終於到來。

一九一四年八月入侵加利西亞前夕，俄軍總司令尼古拉耶維奇大公在宣言中把這次行動說成是為解放長期受苦的一支俄羅斯人：「父老兄弟們，上帝的審判已經降臨到我們！抱著基督徒的謙卑心態，俄

羅斯人幾個世紀以來默默在外國枷鎖下承受折磨。但不管是甜言蜜語或迫害都沒能折斷他們對自由的盼望。就像一條等不及要與大海匯合而衝破沿途岩石的溪流，沒有力量能夠阻止俄羅斯人追求統一的決心。讓世界上再沒有『受宰制的羅斯』。」²³³這個宣言還用了更傳統和更歷史的論據合理化俄羅斯的入侵：「願聖弗拉基米爾的國度，願雅羅斯拉夫·奧斯莫梅斯爾、丹尼爾親王、羅曼親王的土地²³⁴，擺脫枷鎖，高舉偉大、單一和不可分割的俄羅斯的旗幟。」最後，宣言呼籲哈布斯堡王朝的烏克蘭子民，為俄羅斯帝國的光明未來，起而反抗他們的政府。「長期受苦的羅斯兄弟們，起而歡迎俄羅斯軍隊吧。被解放的俄羅斯兄弟們，你們將會在母親俄羅斯的胸脯上找到一個位置！」

「重新統一」是宣傳機關在戰爭初期主打的口號，被用來凝聚帝國境內的民心和鼓動國外的「俄羅斯人」反抗哈布斯堡王朝²³⁵。如果說奧地利官員當初不確定俄羅斯會不會在將臨的戰爭中打親俄羅斯牌，那麼現在他們再無疑議。尼古拉耶維奇大公的宣言讓他們有充分理由可以圍捕和拘留親俄羅斯派分子。

在戰爭的頭幾星期，數以千計被指為親俄羅斯派的人—包括知識分子、教士和村幹部，被送往施蒂里亞的露天拘留營塔勒爾霍夫。在它的兩萬囚犯中，有大約三千人將會死於營養不良和疾病。許多被送入塔勒爾霍夫或另一個奧地利拘留營泰雷津的人事實上不是親俄羅斯派，而是親烏克蘭派。這是因為，很多居心不良的人都利用戰爭引起的恐慌氣氛向當局誣陷他們的敵人。烏克蘭活動家相信他們是被波蘭人誣陷。有些個案確實如此，但他們有時也會是被自己人誣陷，又或者因為在不恰當的時候說了不恰當的話。典型的情況是，他們被人聽見他們說俄羅斯人的統治可讓地區內的生活條件改善。大部分加利西亞和布科維納的居民將很快知道此說是否屬實。而他們許多人都失望了。

戰爭頭幾個月帶給俄羅斯很高期望，但也帶來了一些最初的失望。壞消息從前線的北部地區傳來。俄軍在東普魯士取得最初的成功

之後，一九一四年八月下旬遭遇大敗。另一支軍隊亦被迫撤退。但在加利西亞，俄羅斯的軍事行動取得節節勝利。九月三日，俄軍列隊進入利沃夫，把它的名字從德文的 Lemberg 改為俄文的 Lvov。同一個月稍後，俄軍逼近普熱梅希爾，那是一個古老的羅斯中心，設有堅固碉堡，奧軍在此頑強抵抗了快半年。一九一五年三月，疲憊的奧地利駐軍彈藥用盡，被迫投降。至此，加利西亞和布科維納完全落入俄羅斯控制之下。俄方計畫取道匈牙利平原，直取布達佩斯和維也納，讓奧匈帝國無法再戰。當時很少人會懷疑，普熱梅希爾和加利西亞的其餘部分將永遠是屬於俄國。下一個目標將會是匈牙利統治下的奧匈帝國的一個地區外喀爾巴阡，在俄羅斯的官方用語中是「外喀爾巴阡羅斯」。只要取得外喀爾巴阡，「收復」基輔羅斯全域的大業便會全部完成—根據俄羅斯史書記載，這大業是由第一位自稱沙皇的俄羅斯統治者伊凡三世發端，時為十五世紀。

一九一四年秋天，新征服地區交由加利西亞總督博布林斯基伯爵管理。他是俄羅斯裔，把推行俄羅斯化看成自己的主要任務。他一上任便宣稱：「我將讓俄羅斯語言、法律和制度在這裡扎根。」²³⁶負責促進總督這目標的是他的祕密助手和侄子小博布林斯基。小博布林斯基是杜馬的成員和「溫和右派」的領袖之一，自一九〇七年起是「加利西亞慈善協會」會長，一向不遺餘力支持加利西亞和沃里尼亞兩地的親俄羅斯派，又遊說俄羅斯政府做同樣的事。他主張，政府只要在桑河²³⁷—奧治烏克蘭的重要水道，穩住親俄羅斯派的陣腳，就可以在聶伯河穩住陣腳，否則，如果加利西亞的親俄羅斯運動崩潰，小俄羅斯的親烏克蘭運動必然會聲勢大漲。現在，在他叔叔的力挺和杜馬一票盟友包括霍爾姆大主教葉甫洛吉的聯手下，小博布林斯基獲得實現自己想法的難得契機。

除了利沃夫的名稱被改為俄羅斯語，加利西亞和布科維納城鎮的街道和廣場也比照辦理，紛紛被冠以普希金和其他俄羅斯文化或政治名人的名字。俄羅斯語被引入教育系統，最終目標是取代烏克蘭語。當局為「俄羅斯裔」教師開設專門課程，讓他們更能掌握俄羅斯語。

烏克蘭語報紙遭查封，以「小俄羅斯方言」撰寫的書籍被禁止出版。即使以烏克蘭語寫的書信一樣會被取締。親烏克蘭派的組織被關閉，數以十計的親烏克蘭派分子被捕。都主教舍普季茨基，是希臘天主教聯合教會首腦，一九一四年九月遭拘留，接著流放至俄羅斯中部，戰爭期間的大部分歲月都是在一間東正教修道院度過。

反之，親俄羅斯派分子和組織卻獲得支持。小博布林斯基親自到新占領土地每一座監獄釋放被奧地利當局監禁的親俄羅斯派分子。自此，親俄羅斯派大力鼓吹支持「白沙皇」，號稱他的保護業已延伸至長期受苦的「紅羅斯」（加利西亞的中世紀名字）。早在戰前便活躍於地區內的俄羅斯慈善團體此時更是遷入加利西亞和布科維納，打著「全俄羅斯人」的旗號為農民提供援助。

但戰爭環境限制了小博布林斯基的俄羅斯化大業。一票軍方將領，特別是尼古拉耶維奇大公——他在軍中的受歡迎程度尤勝於沙皇，相信應該把加利西亞和布科維納立刻整合到帝國裡面，但政府卻希望等到和平條約簽訂再進行整合事宜。雙方最後達成妥協，同意把全面整合推遲至戰爭結束，但在這之前，朝廷會把軍方的需要放在優先位置。當局想要的是穩住占領區，避免進行會引起不滿和抵抗的大刀闊斧改革。因此，東正教教會的活動受到限制，規定大主教葉甫洛吉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方能接收希臘天主教的教區：一是該教區乏人主持（很多希臘天主教教士不是已經逃走就是被奧地利當局逮捕），二是有大多數教民同意（至少要有百分之七十五同意）。儘管有這些嚴格要求，改教的人仍然很多。據報章報導，光是占領的頭幾個星期，就有三萬名聯合教會的信徒轉而皈依東正教。

在加利西亞居民中間，因為占領政策而吃最多苦頭的是猶太人。在德軍手中吃過幾輪敗仗之後，俄羅斯軍隊和社會開始疑神疑鬼，把猶太人看成是最大的隱患，主張把加利西亞和布科維納的猶太人宣布為俄國子民，把他們移轉到其他地區。但由於政府拒絕立刻把加利西亞併入帝國，軍方便改而禁止猶太人在前線附近的地區從事任何活動。此舉有效杜絕猶太人的商業活動，破壞了猶太社群在該地區的經

濟基礎。補給欠佳的俄軍後來還強徵甚至搶奪猶太人的存糧，讓他們成為受害者名單的最大苦主。在俄軍來到前便逃走的猶太人被沒收家財，這政策對奧地利人和波蘭人一體適用。

俄羅斯為對付德、奧所打的民族牌充滿矛盾。在加利西亞的情況，它有兩套政策直接產生衝突：一是承諾實現波蘭人的民族願望，另一是把加利西亞視為俄羅斯的原有土地。當局向波蘭裔承諾，戰後將會把波蘭裔的聚居地重新統一，讓他們獨立建國，新的國家還會包括屬於奧地利的波蘭人土地。尼古拉耶維奇大公於入侵奧地利和東普魯士前夕在宣言中這樣告訴波蘭人：「讓那些把波蘭人民切割得四分五裂的邊界消滅吧。讓它在俄國沙皇的權杖下重新統一自己。在那權杖之下，波蘭將會獲得重生，能夠自由選擇信仰、用自己的語言和自己的自治政府。」²³⁸由於占領加利西亞的俄羅斯當局想要表現出說到做到的姿態，所以容許某些地方的法院系統繼續使用波蘭語。占領初期被關閉的波蘭語學校也重新開放，容許波蘭語與俄羅斯語一道被用作教學語言。

這讓加利西亞的親俄羅斯派有被出賣的感覺。他們不被允許在占領當局任職，而這些職位通常是由來自帝國和資格不夠的官員濫竽充數。最重要的是，原來叛逆的波蘭人被當局看成是盟友，而加利西亞的「俄羅斯人民」反而再次受到二等公民對待。

親俄羅斯派的擔憂被他們在俄羅斯民族主義陣營的盟友認真看待，後者也常常在杜馬為親俄羅斯派抱不平。這些議員反對任何和他們民族主義願景不符的占領政策，認為俄羅斯是奮鬥了好幾百年才達到目前快要重新統一的狀態，不應該對有敵意的西方—以德國人、奧地利人和波蘭人為代表—有所姑息。反觀以立憲民主黨為首的自由派卻歡迎政府以寬容態度對待加利西亞和布科維納的波蘭人。但就像戰前一樣，立憲民主黨人對烏克蘭問題的立場也是分裂為兩派。

司徒盧威認為，取締加利西亞的烏克蘭運動可以讓帝國境內的烏克蘭運動無疾而終。米留科夫不同意這位黨同志的意見，暗示自己對

加利西亞的烏克蘭運動研究有素，主張這種現象不可能通過軍事占領消滅。他對立憲民主黨的中委會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要求政府「結束在被占領地區進行俄羅斯化政策，重新開放封閉了的民族機構，並嚴格保護民眾的人身和財產權利」²³⁹。但他的提案沒有獲得通過。有些學者主張，米留科夫此舉只是要安撫他在親烏克蘭派中間的支持者和盟友：如果是這樣，他是白忙了。

不管怎樣，帝國境內的烏克蘭運動家對於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在加利西亞的侵略性行為都難有多少作為。他們自顧不暇：他們必須竭盡所能證明他們本身忠於帝國，因為他們在俄羅斯民族主義陣營的敵人質疑這一點，又把烏克蘭運動說成是一個德國人、波蘭人和猶太人一起弄出來的陰謀。俄羅斯民族主義者認定，加利西亞是烏克蘭運動的中心。早在戰爭爆發好一段日子之前，基輔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便提出警告，說烏克蘭有可能會脫離俄羅斯，加入奧匈帝國。戰爭爆發後，當局按照俄羅斯民族主義陣營的擔憂和疑心病採取行動，查封烏克蘭語出版品例如以基輔為基地的報紙《議會》，騷擾烏克蘭人的組織和活動家。他們被政府貼上「馬澤帕主義者」的標籤，能夠對大眾表達意見的機會少之又少。

格魯舍夫斯基是大戰期間烏克蘭運動在俄、奧兩國命運的縮影。他是加利西亞親烏克蘭派的領袖之一，自然也是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的眼中釘。戰爭初期，奧地利當局懷疑他有親俄情感（他從未放棄俄羅斯國籍），命令他離開前線地區，往西而去。他在維也納待了一些日子，期間受到警察監視。他離開奧地利幾天後，當局便對他發出逮捕令。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他抵達基輔，卻又被俄羅斯警察以親奧的罪名逮捕。警察在他的行李中搜出「罪證」，其中包括一本題為《沙皇如何欺騙人民》的烏克蘭語小冊子。但這只是表面理由，因為逮捕格魯舍夫斯基的命令早在俄國攻占利沃夫未幾便下達。當時，當局在利沃夫找到格魯舍夫斯基和一些烏克蘭活動家的合照，而根據線報，照片中的烏克蘭活動家是為奧地利政府工作，反對俄羅斯。

警方斷定格魯舍夫斯基是加利西亞馬澤帕主義者的領袖，計畫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亞，但因為一些俄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說情，這些知識分子背景分歧，既包括為科學院就烏克蘭語撰寫備忘錄的沙赫馬托夫，也包括立憲民主黨的司徒盧威，因而當局改變主意，把流放地改為辛比爾斯克。後來流傳一個笑話，說之所以會有這種改判，是因為格魯舍夫斯基的支持者動了手腳，在判決書上改了幾個字母，把Siberia（西伯利亞）改成Simbirsk（辛比爾斯克）。辛比爾斯克是伏爾加河河畔的一座小城，靠近莫斯科，但離烏克蘭仍然很遠。此舉有效讓格魯舍夫斯基和整個烏克蘭運動為之噤聲。自此，政府和支持它的那些「不折不扣俄羅斯人」[240](#)便可以放開手腳，在帝國邊界的內外按自己的民族打造工程綱領行事。

一九一五年三月，當格魯舍夫斯基在流放地辛比爾斯克安頓下來的時候，皇帝尼古拉二世計畫訪問新占領的加利西亞。三月九日，普熱梅希爾的陷落給了他一個沐浴在軍事榮耀中的機會。這不是他第一次造訪前線區域，卻是他第一次在戰爭期間走出帝國的邊界之外，因此讓他的近衛軍相當恐慌。同樣反對沙皇出巡的還有以尼古拉耶維奇大公為首的一票軍方大老，因為他們不確定自己守不守得住新占領的地區。他們也擔心，隨著沙皇踏上被報章稱為俄羅斯所固有的土地，他們在接下來勢必艱辛的一九一五年夏季戰役中，有可能會被迫把政治考量置於軍事考量之上。

但尼古拉堅持出巡，他的近衛軍和將領只好配合。這相當於一場媒體政變，因為他此舉的一大目的是扭轉自己在軍中受歡迎程度遠不及親族尼古拉耶維奇大公的現象。俄羅斯民族主義報章對出巡計畫歡呼喝彩，認為沙皇此行不僅標誌著俄羅斯的軍事勝利，還標誌著其民族理念的勝利。沙皇的行程包括造訪利沃夫、普熱梅希爾和布羅迪。當時是四月，正值復活節期間。按照傳統，沙皇為了表示親民，每年復活節會跟朝廷直屬的官員和士兵及水手交換復活節彩蛋（和親吻）。他會用陶瓷彩蛋—當然不是法貝之家所製造的那種保留給皇室成員的復活節彩蛋，但以當時標準而言也是極其奢侈的彩蛋—換取士

兵贈送的手繪水煮蛋。現在，這一套被帶到加利西亞的部隊，以象徵帝國的神聖空間向西延伸。

遠遊期間，尼古拉常常感覺自己就像還留在帝國境內。他在日記裡寫道：「我們走得愈遠，這個國家的景色就愈美麗。路上看到的聚落和居民會讓人強烈聯想起小俄羅斯。」²⁴¹造訪過利沃夫之後，他又寫道：「好漂亮的一座城市，會讓人微微想起華沙。好多花園和紀念碑，到處都是俄羅斯軍隊和俄羅斯百姓。」在利沃夫迎接他的除了加利西亞總督博布林斯基伯爵，還有地區內的最高宗教領袖大主教葉甫洛吉。

沙皇蒞臨前夕，葉甫洛吉接到尼古拉耶維奇大公的短柬，請求他不要在歡迎致詞中涉及「政治」。他不知所措，問送來短柬的首席隨軍牧師：「我是否不可以說『陛下您是以最高主宰身分踏入這片土地』之類的話？」得到的回答是：「對，不可以。戰爭還沒有結束，沒有人知道沙皇以後還會不會是這片土地的主人。」葉甫洛吉拒絕接受大公的忠告，在致詞中說：「皇帝陛下，您是第一個踏入這片古老羅斯土地的沙皇。它是羅曼親王和丹尼爾親王傳下來的祖產，之前從未有俄羅斯君主踏足過。許多年來，這片受宰制的羅斯土地長期受苦，唉聲歎氣了好多年，現在終於可以向您發出一個勝利的歡呼。」

²⁴²

尼古拉龍心大悅。當地親俄羅斯派的熱情接待也讓他印象深刻。當晚，在總督府舉行晚宴時，突然來了一群葉甫洛吉教區的東正教教民。他們舉著聖像和教會的橫幅，突破外圍的安全戒護，出現在總督府的前廣場，高聲合唱〈人民之歌〉，即〈天佑沙皇〉歌。尼古拉走出陽台對人群講話，情形讓人回想到一九一四年八月他在聖彼得堡參政院廣場上的一幕。他感謝群眾的熱情接待，並用讓葉甫洛吉和其他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大為受用的措詞結束簡短講話：「讓我們擁有一個強大和不可分割的羅斯！」²⁴³沙皇的妹妹奧爾加日後回憶往事時表示：「這是最後一次感受到，有一條神祕紐帶把我們的家族和人民連結在一起。」²⁴⁴

尼古拉在一九一五年復活節的加利西亞之行被一支俄羅斯攝影隊攝入鏡頭，而他在當地慶祝復活節的場面後來也成了油畫和明信片偏愛的主題。這是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的夢想的象徵性高點：長年以來，他們都夢想著把基輔羅斯曾經有過的土地收復回來，建立一個帝俄民族，由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構成，讓君主、宗教和民族為國家服務。任何曾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九日目睹過利沃夫總督府廣場上那一幕的人都很難不去相信，俄羅斯帝國在經過長期轉化後，終於成功蛻變為民族國家。因為它不但沒有被興起中的民族主義撕扯得四分五裂，反而成功地把疆土擴張到原有邊界之外，把所有俄羅斯人納入懷中。

俄羅斯「統一主義者」的熱望和夢想是被俄軍快速擊敗奧軍所燃起，但它們破滅的速度比燃起的速度更快。一九一五年五月，即沙皇以勝利者之姿進入利沃夫後不到一個月，德國的師團便開抵奧地利前線，對加利西亞的俄羅斯守軍發起攻擊，一舉奪回普熱梅希爾並迫使俄軍撤出利沃夫。九月底，俄軍失去了大部分加利西亞、沃里尼亞一大部分、所有的波蘭、白羅斯西部和大部分波羅的海省分。

一九一五年八月，憤怒的尼古拉自任作戰總指揮。此舉固然有助於提高士氣，但他也等於把戰爭勝敗的責任攬在自己身上。戰況持續走壞，耗盡俄羅斯的經濟資源和人力資源。一九一五年夏天，在春季和夏季戰役敗北不久之後，杜馬中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聯合米留科夫的立憲民主黨和「十月十七日聯盟」中的君主主義者組成一個「進步集團」，要求朝廷成立一個對人民負責的政府，言下之意要讓他們來組成政府。沙皇拒絕所請。在一九一五年的餘下日子和一九一六年一整年，俄軍在對德奧的陣地戰中消耗日益加劇，但朝廷與杜馬始終處於對立。

一九一七年二月，首都嚴重缺糧，麵包店外面大排長龍，到處出現群眾示威，軍隊也因為拒絕鎮壓示威而發生譁變。社會主義者創建的「蘇維埃」（議會）成為彼得格勒的真正力量，讓沙皇政府變得無足輕重。杜馬的領導階層也成立了一個自己的政府，但未能安撫人心。

和控制住局面。最終，他們決定，拯救國家的唯一途徑是逼沙皇退位。他們得到軍方支持，因為一票將領就像許多大臣和議員那樣，相信沙皇已經與現實脫節，只是德裔妻子亞歷山德拉的傀儡。盛傳，皇后希望俄國撇下盟友英國和法國，單方面和德國簽署和約。

以參謀長阿列克謝耶夫為首的軍方反對締結獨立和約，認為此舉不僅違反俄羅斯對盟友的義務，也會導致帝國解體，因為它在戰時落入德國的領土勢必會繼續被占領。他們還擔心這樣的和約會動搖軍隊士氣，引起前線部隊叛變。現在，看見彼得格勒的街頭叛亂和士兵兵變，他們知道尼古拉非下台不可。杜馬的領導階層表示同意。一九一七年三月二日，杜馬派出兩位代表，執行一個吃力不討好的任務：告訴沙皇已經沒有人歡迎他留在皇位上。被委以此重任的兩人一個是知名議員舒利金，一個是新政府的海陸軍部長古契科夫。

身在白羅斯莫吉廖夫陸軍大本營的尼古拉得知彼得格勒發生革命之後，急著取道普斯科夫返回首都。他也知道了杜馬派代表見他的事。他有些隨從相信，舒利金的出面對沙皇和君主制的未來都是好兆頭。

因為眾所周知，舒利金不僅是知名的俄羅斯民族主義理論家，也是忠誠的君主主義者，而這時候的君主制用得著它能找到的所有支持。舒利金畢業於基輔大學法學院，父親是全俄羅斯人派在烏克蘭的喉舌報《基輔人》報的創辦人維塔利·舒利金，但自幼喪父，由《基輔人》報下一位主編尤澤福維奇養大。舒利金後來接替主編職位，又在一九〇六年秋天的杜馬選舉中初試啼聲，當選議員。任職杜馬期間，他成了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和右翼主義者的領袖之一。他同時是一九一〇年年初創建的群眾組織「全俄羅斯民族主義聯盟」的領導者。

一九一七年三月，舒利金自告奮勇，扛下謁見沙皇的使命。他認為，若能說服尼古拉遜位，將可保住君主制度。他的同行者古契科夫也是抱持一樣觀點。就像包括新任外交部長米留科夫在內的許多政府成員那樣，古契科夫相信，沙皇主動遜位會有利於十二歲的兒子阿列

克謝接班。此舉可安撫人民的怒氣，讓杜馬和臨時政府從彼得格勒蘇維埃手中奪回主導權。以變成立憲君主制為代價，俄羅斯君主制可望安渡危機。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日黃昏，舒利金和古契科夫抵達沙皇的駐蹕地普斯科夫，下火車後先求見北方面軍司令官魯斯基。先前，總參謀長阿列克謝耶夫已經取得各個方面軍司令官的同意，採取一項形同政變的行動。他對控制著普斯科夫的魯斯基下達命令，要他利用一切勸說手段說服沙皇遜位。魯斯基和杜馬的領導階層一直保持密切接觸，並像其他高級將領一樣希望看見沙皇下台。他以令人欽佩的效率完成使命。舒利金和古契科夫沒有見到魯斯基，而是直接被帶到沙皇的火車廂。魯斯基稍後出現，低聲告訴舒利金，遜位的問題已經搞定。

尼古拉用他一貫的冷靜態度告訴舒利金和古契科夫，他同意退位，但不打算讓兒子阿列克謝繼位：阿列克謝的嚴重健康問題²⁴⁵讓他必須留在父母身邊。取而代之，尼古拉想要傳位給弟弟米哈伊爾。猶豫了一下之後，兩位客人同意了沙皇的建議。舒利金甚至認為，這是一個更好的解決方案，因為未成年的阿列克謝不能合法地宣誓效忠憲法—憲法在舒利金的俄羅斯君主制願景中是一個重要元素，而米哈伊爾卻是成年人，有資格這樣做。舒利金請求沙皇在遜位詔書上補充一點，表明米哈伊爾將會對「全體人民」²⁴⁶發誓，保證會密切配合代表他們的機構，意即杜馬。尼古拉表示同意，但把「對全體人民發誓」改為「發出不可違反的誓言」。顯然，他仍然努力想要讓君主不為人民所縛。

但是，部分人民—至少是那些在彼得格勒街頭起義的人民—更清楚知道他們對君主制是什麼感想。舒利金和古契科夫回到首都之後才發現，那裡的人既不要尼古拉，也不要君主制。由杜馬領導階層組成的政府別無選擇，只能接受人民的意願。「當然繼承人」米哈伊爾也是如此，他在尼古拉退位第二天便簽署一項聲明，表示除非制憲會議向他要求，他才會接受皇位，制憲會議是預定要用來決定俄羅斯政府政體的組織，其代表由人民選出。米哈伊爾的聲明起到了預期效

果。在「彼得格勒蘇維埃²⁴⁷」的同意下，杜馬政府組織了一個俄羅斯「臨時政府」，負責籌備制憲會議的選舉事宜。新政府頒布了一項法令，宣布結束政治迫害，引入民主自由，並承諾取消「所有土地、宗教和民族上的限制」。這表示所有俄國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至此，君主制空有其名。

舒利金、他的杜馬同仁和一票將領都感到失望，但不得不接受現實。不過，讓他們放下心頭大石的是臨時政府並未宣布打算和德國簽署和約。很明顯的，臨時政府準備要把仗繼續打下去，以恢復帝國領土的完整性。在這一點上，它獲得了政治菁英和軍事菁英的充分支持，因為他們都把俄羅斯的統一和不可分割看得比什麼都重要。不過，他們很快就會發現，對帝國統一性的威脅更多不是來自德、奧軍隊，而是來自帝國內部的革命力量。

君主制的垮台和彼得格勒的權力真空狀態導致自由派的臨時政府和社會主義者的彼得格勒蘇維埃發生激烈競爭，這又讓各民族運動的領導者有了可乘之機，民族主義運動在大戰爆發後一度退潮。首先對這種革命新形勢加以利用的是那些在十九世紀經歷過某種形式自治的民族。其中之一是芬蘭人，芬蘭在一八〇九至一八九九年之間曾享有自治權，他們立刻要求讓他們原有的憲法恢復過來。臨時政府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日—即尼古拉遜位不到三週—予以同意。九天後，波蘭人得到承諾，他們將會獲准獨立建國，條件是建國後與俄羅斯締結軍事同盟。這一切會等到制憲會議召開後正式拍板定案。不過，在波蘭的情況，臨時政府的承認徒具形式。在那段日子裡，彼得格勒的市民喜歡打趣說：「承認波蘭獨立就等於是允許月亮獨立。」²⁴⁸這是因為，波蘭在一九一五年夏天便不再由俄國控制，目前是處於德國占領狀態。

對帝國的西部省分來說，波蘭問題從來不是存在於真空狀態。每一次的波蘭起義都會鼓勵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提出自己的要求，從而把「單一俄羅斯民族」的想像體砍去一些。在一九一七年春天，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並未要求獨立，但急於爭取文化和領土的自治，還有

爭取俄羅斯轉型為聯邦制國家。現在，根據臨時政府的宣布，構成這個國家的不是帝國子民，而是俄羅斯公民。

但臨時政府不願意讓帝俄民族兩個較小分支圓夢。這不僅是因為它希望把一切有關政體和國家結構的問題拖到召開制憲會議再解決，也因為立憲民主黨人力阻—在一九一七年春天，立憲民主黨是政府內最有影響力的政黨。像司徒盧威之輩的立憲民主黨人仍然反對分裂帝俄民族，主張民族是由語言與文化界定，不是由血統界定，而像米留科夫之輩的立憲民主黨人則只準備給予非俄羅斯人個人自主權，即只允許他們發展語言和文化，不是允許他們擁有自治領土或政府。

但後者正是烏克蘭領導人和一些白羅斯領導人向彼得格勒政府要求的。在接下來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動盪中，史稱俄國革命，他們將會把聲音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邁出他們原來不敢想像的大步。

230 Petereburgskii listok, August 19, 1914.

231 Viacheslav Shatsillo, Pervaia mirovaia voina, 1914-1918: Fakty, dokumenty (Moscow, 2003), 89.

232 外喀爾巴阡是今日烏克蘭最西一州。

233 M. K. Lemke, 250 dnei v tsarskoi stavke, ed. L. M. Suris (Moscow, 2015), vol. 1, 31.

234 雅羅斯拉夫·奧斯莫梅斯爾是「加利奇公國」的親王，其領土後來成為「加利西亞—沃里尼亞公國」，而丹尼爾和羅曼為後者的親王。

235 事實上是烏克蘭人。

236 P. S. Romanov, Rus' (Moscow, 2015), vol. 2, 314.

237 比喻奧地利控制的烏克蘭地區。

238 Lemke, 250 dnei v tsarskoi stavke, 30.

239 S. Breiar, "Partiia kadetov i ukrainskii vopros, 1905-1917," in Issledovaniia po istorii Ukrainy i Belorussii, vyp. 1 (Moscow, 1995), 89-110.

240 這裡應該是指烏克蘭人中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

241 Perepiska Nikolaia i Aleksandry Romanovykh, 1914-1915 gg. (Moscow, 1923), 164.

- 242 Put' moei zhizni: Vospominaniia mitropolita Evlogiia (Georgievskogo) (Moscow, 1994), 248.
- 243 Sergei Sergeev-Tsenski, Preobrazhenie Rossii (Moscow, 1956), 282.
- 244 Ol'ga Aleksandrovna: Memuary (Moscow, 2003), 159.
- 245 皇太子阿列克謝遺傳自外曾祖母英國維多利亞女王而患有血友病，不良於行。
- 246 Pavel Miliukov, Istoriia vtoroi russkoi revoliutsii (Moscow, 2014), 49.
- 247 「彼得格勒蘇維埃」，指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六日（新曆）與「臨時政府」同時成立的議會（蘇維埃，意為議會），由四天前成立的「工人代表蘇維埃」擴大為「工人及士兵代表蘇維埃」，其與臨時政府並存，形成「雙元政權」。
- 248 E. Ketola, "Revoliutsiia 1917 goda i obretnenie Finliandiei nezavisimosti: Dva vzgliada na problemu," Otechestvennaia istoriia 6 (1993): 29.

第十二章 俄國革命

要理解俄國史，八成沒有一個概念比「俄國革命」更重要。但這個概念又是錯綜複雜，常常會引起混淆。問題首先在於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七年之間，俄羅斯共發生過三次革命，其中兩次都發生在一九一七年：先是二月推翻沙皇政府的一次，再來是讓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在十月得以接管國家權力的一次。讓問題更複雜的是，這兩次革命發生的月份通常都是照俄羅斯帝國使用的「儒略曆」計算，所以被分別稱作「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不過，如果根據從一九一八年開始採用的公曆計算，它們分別是發生在三月和十一月。再者，還有這場革命持續了多久的問題。學者一般把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之間發生在俄羅斯境內的內戰和國際衝突—死者數以百萬計—歸入「俄國革命」這把大傘之下，但也有些學者把一九二〇年代很大一部分時間算入其中，甚至還有些學者把整個蘇聯時期算在內。

「俄國革命」一語最容易讓人混淆的一點，在於它發生在多民族俄羅斯帝國的事實。正因為這樣，過去幾十年來的歷史學家才會老是把烏克蘭人或其他非俄羅斯人的革命說成俄國革命的一部分，或是把它們說成湊巧同時。但不管我們怎樣界定「俄國革命」，被它根本改變了的不僅止於羅曼諾夫王朝前子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還改變了原帝國境內各民族的關係—被改變得最激烈的莫過於三位一體帝俄民族的三個分支，即大俄羅斯人、小俄羅斯人和白羅斯人。所以，「俄國革命」在某個意義上其實是「俄羅斯人」的革命。

臨時政府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上台後盡力維持一個「全俄羅斯民族」的門面，卻有一個政治黨派完全願意承認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是獨立民族，不反對給予他們自治權甚至獨立權。這個黨派就是列寧的布爾什維克²⁴⁹，它原是俄羅斯社會民主黨的一個小分支，但迅速壯大。就像當時的大部分馬克思主義者那樣，布爾什維克譴責資本主義，反對私有財產，相信未來屬於無產階級—產業工人階級，矢志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鋒。但與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同，在一九〇三年確

立為一股獨立政治力量的布爾什維克相信，無產階級想要上升到權力巔峰，靠的不是歷史演化，而是發動革命。他們需要奪取國家政權以確立無產階級專政和帶領全世界走向社會主義。但布爾什維克又認定，在以農民為大宗的俄羅斯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注定失敗，除非是先在東歐和西歐點燃世界革命之火，這些地區的無產階級有發達組織，被認為準備好迎接社會主義的來臨。

列寧和一群同道在組成和遠景上都是國際主義者。他們厭惡帝俄民族主義，宣稱準備好承認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是獨立民族。雖然只是少數派，但列寧和其他布爾什維克分子對民族問題和俄羅斯問題的想法卻出人意料地變得無比重要。這是因為，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儒略曆十月二十五日）晚上，他們透過一場基本上不流血的政變，廢黜了臨時政府，自立為俄羅斯共和國的新政府。至於該共和國的邊界何在則尚有待界定。

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一向堅持社會階級才是首要政治問題，民族問題僅屬次要，所以有一段長時間幾乎對民族問題完全置之不理。要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隨著民族運動在俄羅斯帝國和奧匈帝國風起雲湧，列寧和同道才被迫在民族問題上表態。一九一二年，列寧委託喬治亞人史達林制定黨對民族問題的立場，當時除高加索人以外基本上沒有人知道有史達林其人。這個立場是透過反駁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表達出來，但只懂俄羅斯語和喬治亞語的史達林無法閱讀原著。他是靠著列寧的幫忙和指導，才把自己領袖的觀點充分表達在一篇長文裡。文章在一九一三年發表，後來又獨立成小冊子出版，題為《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

小冊子裡的觀念在列寧自己寫於一次大戰頭幾個月的文章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他主張，俄羅斯帝國的所有民族都有自決權，包括有獨立權。但其中有一個蹊蹺，那就是，「自決」是否意味獨立要由每個民族的工人階級來決定—說得白一點，就是由布爾什維克黨來決定。如果獨立符合一民族無產階級的利益，該民族就有權脫離帝國。反之，它就應該留在帝國內，以確保工人階級可以打敗敵人。

這些寫在紙上的原則簡單明瞭，但它們是否有實際可行性？第一個考驗緊接布爾什維克在彼得格勒奪權成功後來到。作為對政變的反響，基輔的一票政治人物宣布烏克蘭獨立建國，而且聲稱國土範圍除了涵蓋烏克蘭中部各省，還涵蓋其他烏克蘭人傳統聚居區，如哈爾科夫、敖得薩和東烏克蘭的北頓內茨河盆地，而彼得格勒很多人都認為它是俄羅斯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烏克蘭人拒絕與彼得格勒新政府合作。列寧和布爾什維克認為，這種種表現都是反革命的證據。

一九一七年三月四日，烏克蘭各路人馬的活動家組成了一個中央議會，烏克蘭語稱為「中央拉達」（Central Rada）。它的使命是協調所有烏克蘭人組織，不管是政治還是非政治組織的活動。在成員的政治背景上，拉達的色彩與彼得格勒的臨時政府相似，即主要是由與「立憲民主黨」走得近的活動家和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者構成，後者的影響力愈來愈大。它最初的要求相當溫和，而且可以和立憲民主黨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並存不悖。拉達的最終目標只不過是烏克蘭活動家已經要求了幾十年的事情：把烏克蘭語引入教育系統。但當流放俄羅斯多年的格魯舍夫斯基在三月中旬回到基輔並當選拉達的新領袖後，他有了更高的願景：烏克蘭的領土自治。

一九一七年三月下旬，格魯舍夫斯基寫了一篇題為〈不容走回頭路〉的綱領性文字，在其中威脅說，如果臨時政府不答應給予烏克蘭領土自治，就必須準備好目睹烏克蘭完全獨立的後果。他寫道：

給予烏克蘭廣泛自治和主權在烏克蘭人民—這是我們目前時刻的綱領，不容走回頭路。俄羅斯國家領導人或俄羅斯社會的統治圈子對這個目標的任何障礙和延宕，都會改變天秤的平衡，使之往烏克蘭獨立主義的方向傾斜.....在當下，對那些支持獨立，或更精確地說是自足的人，烏克蘭同意擁有廣泛民族與領土自治和聯邦擔保其擁有主權的情況下，繼續留在一個共同平台上。獨立烏克蘭的旗幟仍然摺起。但如果在聯邦制、民主制俄羅斯共和國內有全俄羅斯集權主義者想要扯下烏克蘭自治旗幟的話，那上述的旗幟會不會被抖開來呢？難說。

格魯舍夫斯基的這個綱領很快便成為中央拉達的綱領，受到很多農民代表大會和士兵代表大會的支持，在二月革命之後幾個月，這些大會是合法性和權力的真正基礎。在帝國的俄羅斯各省，農民是為反對地方貴族而造反；在高加索和中亞，革命表現為土生土長的人口驅趕俄羅斯人殖民者。但在烏克蘭，農民會願意接受活動家的動員卻是為了支持領土自治。在尼古拉二世遜位一事上扮演過一角的舒利金這時已回到基輔，據他指出，烏克蘭活動家蠱惑農民的方法是告訴他們，如果他們接受烏克蘭人身份認同和支持烏克蘭領土自治，就可以擁有自己的土地和防止外國人特別是俄羅斯農民染指烏克蘭的農地。士兵也支持拉達，視之為唯一能結束戰爭的機構，相信它在重新分配土地之日將會讓他們解甲歸田。

受到這些人民支持的鼓舞，格魯舍夫斯基和拉達在一九一七年六月片面宣布烏克蘭領土自治。臨時政府為了把聯邦主義和民族分裂的精靈收回瓶子，派出幾位部長前往基輔，勸拉達改變主意。面對拉達的拒絕，而這拒絕受到包括猶太裔和波蘭裔社會主義者在內的少數民族所支持，幾位部長再退一步，雙方終於達成協議：臨時政府承認拉達和被稱為「總祕書處」（General Secretariat）的政府為臨時政府在烏克蘭的代表。就這樣，烏克蘭自治以截頭去尾的形式，在它與彼得格勒中央政府的第一回交手中存活了下來。

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對協議勃然大怒，認為臨時政府幾位社會主義者部長的作為是在斷送俄羅斯民族的利益。舒利金率先發難。他早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初就在《基輔人》報發表過一篇文章，指出如果說舊政權迫害過非俄羅斯人，那新政權將會對付俄羅斯人，把國家變成一座囚禁俄羅斯人的監獄。舒利金準備好容忍拉達的統治，他稱之為「一幫有組織土匪的專制統治」，但前提是它的領導人必須支持戰爭的努力。然而，拉達卻選擇了和平。它也想獲得自治，這在舒利金的眼中形同背叛，是在給忙著對抗德、奧的俄羅斯背後捅一刀。他聲稱，一個獨立的烏克蘭輕易就會成為德國的俎上肉。

但舒利金的著眼點是在大俄羅斯民族的統一性。他認為臨時政府認可烏克蘭的有限自治是一種背叛俄羅斯民族的行為，因為烏克蘭（小俄羅斯）和它的居民是俄羅斯民族的基本組成部分。他堅稱，俄羅斯人在烏克蘭占了大多數，他會有此一說，是因為他是根據書面語而非口語來界定何謂「俄羅斯人」，而基輔報紙的讀者又以俄羅斯人為大多數。在舒利金看來，最要不得的還不是廢除君主制，而是把小俄羅斯人「重新歸類」為烏克蘭人。

與舒利金不同，列寧從不在乎俄羅斯民族會分裂。一九一七年六月，他特別去了烏克蘭一趟，以示對拉達的支持，期間不僅承認烏克蘭人是獨立民族，還贊成給予烏克蘭人自治甚至獨立的權利。他這樣說：「立憲民主黨人的臨時政府是一個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政府，它沒有履行最起碼的民主主義義務，即沒有表示贊成烏克蘭自治，也沒有表示烏克蘭完全有自由獨立。」[251](#)

列寧把拉達視為可以和他聯手攻擊臨時政府的潛在盟友，而雙方也真的曾經一度合作，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把臨時政府的支持者趕出基輔。但事情在布爾什維克奪權成功之後發生了激烈轉變。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烏克蘭蘇維埃大會在基輔召開，會上，基輔的布爾什維克設法取得大多數支持，以便重演在彼得格勒發生過的事件：打著蘇維埃的旗號在烏克蘭奪權。但他們發現自己是少數派。至此，拉達從布爾什維克的盟友變成了敵人。基輔的布爾什維克分子轉移到哈爾科夫，一個接近俄羅斯邊境的工業中心，宣布成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自稱擁有的國土範圍和「烏克蘭人民共和國」重疊，後者是拉達在布爾什維克政變失敗後宣布成立。

作為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拉達拒絕承認同路人布爾什維克，也拒絕支持列寧對反布爾什維克勢力的鬥爭。這超過了列寧和他的黨內同志可忍受的程度。在他們看來，拉達已經濫用了烏克蘭人民的自決權利。在黨內第二號人物托洛茨基和民族事務人民委員史達林的協助下，列寧草擬了〈告烏克蘭人民書和給中央拉達的最後通牒〉。但這份文件在說法上自相矛盾，因為它一方面承認烏克蘭人民有自決

權，另一方面又基於革命的名義否定他們有這種權利。他們一開始表示承認烏克蘭人民共和國，肯定它「有權完全脫離俄羅斯或是選擇與俄羅斯建立聯邦性質或其他類似的相互關係」²⁵²。但接著又撤回承認，理由是烏克蘭政府採取了一項「立場模稜兩可的政策，這使得我們無法承認拉達是烏克蘭共和國工人和被剝削群眾的全權代表」。

根本問題在於，中央拉達在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政府和前俄羅斯帝國軍隊將領之間的衝突中保持中立。當時，前帝國將領已在南俄羅斯的頓河地區建立起基地，並繼續效忠臨時政府。列寧希望拉達停止解除烏克蘭布爾什維克組織的武裝，阻止反布爾什維克勢力進入頓河地區，進而和他的政府聯手對抗烏克蘭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反對者。這是列寧所能容許的「自決」程度，當時他已經不再是臨時政府的反對派，而是掌權者。拉達拒絕了。由於烏克蘭本身沒有多少軍力，列寧於是派當過臨時政府保安隊長的彼得格勒衛戍部隊司令穆拉維約夫中校，率領俄羅斯部隊出兵基輔。

一九一八年一月，穆拉維約夫的部隊開始向基輔推進。二月初，在發射了一萬五千枚砲彈後，他占領了這個烏克蘭首府。砲兵瞄準的其中一個目標是格魯舍夫斯基的房舍。房子起火燃燒，格魯舍夫斯基年邁的母親被燒死。他和中央拉達全體成員撤離基輔，臨走前不忘宣布烏克蘭完全脫離布爾什維克俄羅斯而獨立。名義上，穆拉維約夫代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於基輔成立的烏克蘭蘇維埃政府執行行動，所以是受該政府軍事委員科楚賓斯基——他是烏克蘭傑出的現代主義作家馬赫洛·科楚賓斯基之子——的節制。但科楚賓斯基根本管不住穆拉維約夫的人馬：他們只要在基輔街上聽到誰用烏克蘭語交談就會對誰開槍，認為那是一種民族主義和反革命的表現。一九一八年二月，當過列寧私人祕書的烏克蘭蘇維埃政府教育部長札通斯基一樣因為在街上說烏克蘭語，被穆拉維約夫的部下逮捕。所幸士兵在他口袋裡找到一份列寧簽署的文件，他才逃過一死。

有好幾個星期，基輔的全部移民都籠罩在隨時可能被逮捕和處決的陰影中，人人自危。這種「紅色恐怖」為日後布爾什維克的殘暴行

徑開了先河。穆拉維約夫進入基輔之後要求五百萬盧布作為軍隊的給養，又下令部隊「無情地摧毀基輔的所有官員、幹部、軍職人員（烏克蘭軍事編隊的成員）、君主主義者和革命的敵人」²⁵³。根據一些估計，有近五千人因為涉嫌效忠舊政權或中央拉達而被穆拉維約夫的暴徒殺害，其中包括基輔都主教弗拉基米爾。一九一八年二月初，穆拉維約夫在發給列寧的報告中得意地表示：「基輔的秩序已重新恢復，包括人民祕書處和工農代表蘇維埃在內的革命當局已從哈爾科夫抵達。『軍事革命委員會』正在精力充沛地運作中。」²⁵⁴

基輔的新布爾什維克主子逮捕了舒利金—他在一九一七年春天回到故鄉，被捕的理由僅因為他從前的政治活動。舒利金僥倖渡過災劫存活了下來。當局原定要把他押解到莫斯科，但局勢的改變讓這個行動變得不可能：德國和奧地利的部隊已經開進了烏克蘭。有一天，調查單位的負責人把他叫去，通知他他將會獲釋，條件是下次一傳喚他，便要馬上回監獄報到。他答應照辦後獲釋。這項奇怪要求的理由很簡單：布爾什維克必須趕在德國軍隊打到之前撤離，但又不確定要怎樣處理囚犯。最終，布爾什維克政權將學會把帶不走的囚犯一律處決，但那是後話。所以，舒利金不但活了下來，還得到了自由。隨著他獲釋，「全俄羅斯民族」方案有了一線生機。

舒利金認為一九一七年十月發生在彼得格勒的布爾什維克政變是一場民族災難。得知消息之後，他在《基輔人》報為文主張十月革命是一場親德國的政變。在他看來，到了現階段，外國敵人已經不僅在帝國邊緣推進，甚至已經奪取了首都。舒利金建議，如果一個德國政府在彼得格勒成立，那麼就必須在他處建立一個俄羅斯政府。舒利金在該年年底前離開基輔，前往俄羅斯南部的頓河地區，在那裡，前帝國陸軍參謀長阿列克謝耶夫和將軍科爾尼洛夫正在集結部隊，準備反擊布爾什維克和繼續對德作戰。

白軍是指前帝國將領在頓河流域建立的軍隊，有此稱呼是因為他們反對布爾什維克的紅軍。白軍運動源於科爾尼洛夫在一九一七年八月發動的一場政變。當時，他眼見彼得格勒蘇維埃愈來愈強大，便計

畫先推翻臨時政府，再解散彼得格勒蘇維埃。政變以失敗告終，卻在無意中幫了布爾什維克一把，讓他們可以同時控制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兩地的蘇維埃，然後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上演了自己的政變「十月革命」。

支持科爾尼洛夫的軍官在政變失敗後被臨時政府監禁在白羅斯小城貝霍夫。被囚期間，他們詳細討論了未來的戰略和戰術。他們的總體目標是防止俄羅斯解體，認為事態緊迫，因為臨時政府隨時都有可能和德國單獨媾和。後來，利用十月革命和臨時政府倒台引起的混亂，這批軍官逃出了貝霍夫，去到頓河地區，跟反對布爾什維克的頓河和庫班的哥薩克人結成聯盟。一個致力恢復俄羅斯統一的新權力中心於焉形成。但要達成這目標還言之過早。

如果一九一七年是以布爾什維克的勝利告終，那麼一九一八年就是以德國和奧地利的入侵展開。他們占領了前俄羅斯帝國的西部省分，占領的法理基礎是一九一八年二月和三月簽訂的兩份條約，一份是和中央拉達簽訂，一份是和布爾什維克簽訂，地點都是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²⁵⁵。第一份條約容許德奧聯軍占領名義上獨立的烏克蘭國的領土，又規定拉達必須提供大量農產品作為占領軍的給養。德奧聯軍隨後向東推進。布爾什維克的軍隊因為自知抵抗不了德國的強大戰爭機器，在三月一日撤出基輔，兩天後，布爾什維克和德奧媾和，同意讓出俄羅斯帝國歐洲屬地一半領土，北至波羅的海，南至烏克蘭，以及向柏林和維也納賠款六十億盧布。此一條約讓德國的勢力一路延伸至南俄羅斯的塔甘羅格，控制了整個烏克蘭和克里米亞。

德國戰爭策略和東方政策的總設計師魯登道夫認為，支持民族主義運動和在德／俄邊境創立一批附庸國可以確保德國新占領的土地，把未來的俄國擋在門外，不管是不是布爾什維克主政。在德國的授意下，芬蘭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宣布脫離俄羅斯獨立，並與德國建立密切聯繫。十個月後，一位德國親王被選為芬蘭國王。同樣的事也發生在立陶宛：它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宣布獨立，八個月後也是一位德國親王當選立陶宛國王。另外，一個獨立的「波羅的海聯合公國」在愛

沙尼亞和立陶宛的領土上被創建，而它也是和德國保持緊密聯盟關係。

一九一八年二月和三月，由德國人支持的下一場民族打造工程在烏克蘭上場。對烏克蘭有自己打算的奧匈帝國加入了這場工程，派遣皇室成員威廉大公主持其事。威廉對成為未來烏克蘭國國王有志已久，曾經學習烏克蘭語和指揮奧地利軍隊中的烏克蘭人部隊。去到烏克蘭之後，他在那裡被稱為紅王子，他爭取到在地菁英的友誼，又盡力保護烏克蘭農民，不讓德、奧占領軍對他們太過分。德國人想要他走人，擔心會發生一場有利於奧地利的政變，但威廉（當地人稱他為瓦西里親王）堅持留下來。

德軍統帥部最初對中央拉達被社會主義者把持的現象抱持容忍態度，但拉達遲遲無法履行對德國軍隊供應農產品的承諾最終讓德國人失去耐性，在一九一八年四月策畫了一場政變，把社會主義者統統趕下台，讓保守分子取而代之。新政府的領導人是有著烏克蘭血統的俄羅斯貴族斯科羅帕德斯基。還是一九一七年六月的時候，舒利金曾經把斯科羅帕德斯基列入小俄羅斯出身的俄羅斯人，但不是烏克蘭人的名單中。但現在，斯科羅帕德斯基因為急於從德軍手中接過權力，態度丕變，讓舒利金對俄羅斯人的定義，即光是由語言界定，吃了一記悶棍。

事實上，斯科羅帕德斯基不是唯一做出這種政治選擇的人，反而代表著一種在講俄羅斯語的烏克蘭人中間愈來愈流行的態度：在文化上認同俄羅斯但在國家和民族上忠於烏克蘭。一上台，他便自封為烏克蘭國家的「蓋特曼」，宣布每個住在烏克蘭的人都是烏克蘭公民。這種包容政策受到了舒利金和兩個與他志同道合的夥伴之抗議。

但並非所有支持俄羅斯人統一性者都是舒利金那樣的死硬派。斯科羅帕德斯基治下的烏克蘭成了前帝國政府官員、政治人物和軍官等任何試圖逃離布爾什維克政權（它已在俄羅斯中部建立起來）者的避風港。許多立憲民主黨人都支持新蓋特曼的政權，甚至加入其政府。

由於俄羅斯已經被布爾什維克接管，立憲民主黨人把一個由前俄羅斯貴族領導的烏克蘭國家看成是復興傳統俄羅斯的基地。獨立的烏克蘭被認為應該拯救俄羅斯，然後用獨立交換與俄羅斯成為聯邦關係的形式。一九一八年十月，斯科羅帕德斯基政府中的社會民主黨人發表了如下聲明：「如果烏克蘭在對布爾什維克的鬥爭中繼續置身事外，將永遠不會被它的鄰居原諒。另一方面，如果它幫助俄羅斯擊敗布爾什維克，它就能確保自己在與俄羅斯的聯盟中得到自由發展。」[256](#)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隨著世界大戰的結束和德軍的撤出迫在眉睫，斯科羅帕德斯基果然選擇了和一個反布爾什維克的未來俄羅斯結盟。他宣布撤銷烏克蘭獨立，在宣言中說：「全俄羅斯國家從前的活力和力量必須是在聯邦原則的基礎上得到恢復。烏克蘭有資格在聯邦中扮演一個主導角色，因為它的法治是全國的楷模，而前俄羅斯那些被羞辱和壓迫的公民也是第一次在它的邊界內找到庇蔭。」[257](#)烏克蘭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起初對他的意向還有所懷疑，但繼而紛紛加入他的軍隊。他們其中一個是舒利金自己的兒子瓦西里科，後者將會在基輔近郊為捍衛斯科羅帕德斯基垂危的政權時，被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軍隊殺死。

德國在東歐的民族改造工程不限於支持烏克蘭脫離俄羅斯，而是還對白羅斯人的民族改造工程起過重大作用。白羅斯民眾的茁壯也讓「單一俄羅斯民族」的想像體更加千瘡百孔。

帝國政府在一九一五年的春季和夏季戰役之後失去白羅斯西部。德國占領當局起初不知道白羅斯人是一個獨立民族和有著各種民族組織存在。要過了幾個月，當他們想到找一些本土幹部來限制波蘭菁英的影響力時，才發現這是兩回事。在一份研議德國對白羅斯民族政策稱為《東部領地》的報告中，撰文者指責波蘭人阻礙了白羅斯人的民族發展，指他們「像寄生蟲那樣寄生在這些失去方向感的人身上，從他們中間吸收自己民族的成員」。報告最後指出：「德國人在這片土地的未來依賴於白魯塞尼亞人的復興和對抗波蘭人。」[258](#)

白羅斯民族的復興後來確實發生過。該地區的德國指揮官魯登道夫將軍下令創建白羅斯語學校來取代俄羅斯語學校。截至一九一七年年底，在白羅斯西部，用白羅斯語教學的小學老師共一千七百人，學生七萬三千人。一九一六年二月，得到德國的支持和經濟資助（指提供紙張），白羅斯語報紙《迴聲》創刊，銷路是三千份，在當時和當地來說，非俄羅斯語和非波蘭語的出版品能有這種銷路相當驚人。魯登道夫認為白羅斯人是一個正在形成中的民族，所以還幫助他們創建了一家白羅斯語劇院—根據一份德國報紙以大家長式紆尊降貴的姿態形容，這劇院的戲碼體現出「戲劇感性的最早階段」259。

不管德國報紙是什麼態度，魯登道夫所見無誤。不過，要在白羅斯西部形成一個現代的白羅斯民族仍然因為一件事情受到重大障礙：大批大批的白羅斯人因為不願生活在德國占領之下出逃。他們會這樣做，往往是受積極參與俄羅斯民族主義組織的東正教教士所唆使。這些教士告訴他們，德國人是野蠻的條頓民族，一心只想要殺死和折磨信奉東正教的斯拉夫人。有近一百五十萬白羅斯人離開白羅斯西部，讓民族改造工程無法在基層擴大，因為鄉村的政治、知識和經濟權力主要掌握在波蘭貴族手裡，而城市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是猶太人。這種情況讓白羅斯活動家不願意把建立一個白羅斯人國家訂為政治目標。他們選擇讓白羅斯和立陶宛聯合起來的構想。

在俄羅斯帝國境內的白羅斯人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線的民族動員是到了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之後才轉趨殷切，而且是從帝國政府在戰爭期間推廣的全俄羅斯民族主義運動的繭中蛻變出來。在彼得格勒爆發的布爾什維克政變迫使白羅斯活動家和反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社會主義者（大都是俄羅斯裔）支持白羅斯人的民族動員，希望藉此創建一個白羅斯人的國家。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他們召開了「第一屆全白羅斯代表大會」。大會承認蘇維埃對俄羅斯的統治，但不承認其對白羅斯的統治。由大會選出的「大白羅斯拉達」自稱是白羅斯（指非德國控制的白羅斯部分）唯一合法政權權威，又宣布計畫創建白羅斯軍隊。但要達成這目標還言之過早。

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掌權的布爾什維克，他們受到俄德前線的白羅斯部門各個士兵委員會的強力支持，聞訊後馬上解散了代表大會。他們看不出來不受莫斯科控制的白羅斯人政府有什麼用。他們根本沒有看到白羅斯政府的需要。他們在涵蓋白羅斯和前帝國的波羅的海各省的「西部地區」創立「委員會蘇維埃」取而代之。然而，就像在基輔的情形一樣，布爾什維克在明斯克的勝利是短暫的。不久之後，他們便被迫與德國人簽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德國人隨之占領了包括明斯克在內的白羅斯中部。

至此，整個烏克蘭和大部分白羅斯（唯一例外是其東部）都落入德國和奧地利控制之下。但德國對待這兩個民族的方式有所不同：「同盟國」願意和烏克蘭拉達在布列斯特單獨媾和，卻不願意把白羅斯拉達邀請到談判桌。換言之，烏克蘭有著一個為柏林和維也納承認的政府，但白羅斯被德國部隊當成無主之地占領—這是因為《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明文禁止德國承認任何出現在前俄羅斯帝國領土的新國家。這情形有點像是十七世紀中葉戲碼的重演：當時烏克蘭是在俄羅斯和哥薩克人經過談判之後成為沙皇領土，但白羅斯卻是直接被莫斯科部隊占領，所以沒有得到任何優待。

在德國於一九一八年二月下旬拿下明斯克之後，兩群白羅斯活動家聚在一起，一群是一開始就與德國合作；另一群是前一年在俄羅斯境內創立，經過激烈辯論後決定不要創立「立陶宛—白羅斯聯邦」，而是成立獨立於俄國的白羅斯國家。他們在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五日發表的聲明中說：「我們，即白羅斯民族共和國的拉達，今日掙脫了俄羅斯沙皇制加諸這片自由而獨立的土地的最後枷鎖。」²⁶⁰在這個新的白羅斯拉達中，支持發表白羅斯獨立宣言的票數只是一個微弱多數，象徵意義要大於實質意義。它想要道出的是：白羅斯人已經不再僅僅想要得到自治或平起平坐的聯邦一員地位，還想要完完全全獨立。

德國占領當局批准拉達的聲明，但柏林的德皇政府既拒絕承認白羅斯是一個國家，也拒絕承認拉達為其代表。這讓白羅斯拉達陷於兩

頭不到岸狀態。就像當初在烏克蘭把保守派的斯科羅帕德斯基拱上台一樣，這一次德國人也把一個保守派地主斯基爾蒙特拱為白羅斯拉達的掌舵人。德國人沒有把重要權力下放給拉達，只把它作為占領當局和在地居民的中間人，負責為德國軍事指揮官提供建議和管理最地方層次的事務。白羅斯拉達既不是民選又沒有德國占領當局的力挺，權力基礎薄弱，不過它的存在本身還是有助於促進白羅斯為一獨立國家的觀念。

正是在這一段時期，白羅斯弄出了自己國家的象徵物：一面白、紅、白橫條紋的國旗和一個以持劍騎士為主體的盾形紋章，這紋章的構圖可追溯到立陶宛大公國的時代。白羅斯拉達在維爾紐斯、基輔、柏林和其他歐洲國家首都設有外交代表機構，發行郵票，支持文化和出版項目。白羅斯運動領導者之一的拉斯圖斯基寫出《每個白羅斯人必須知道的事情》一書，指出白羅斯人民族「信仰」的基礎何在。這本書大肆攻擊宗教，試圖讓白羅斯農民用來思考身分認同問題的範疇從宗教改為民族。

拉斯圖斯基這樣寫道：「第一個必須回答的重要問題是這個：我們是誰？如果我們問我們的同胞：『你是什麼信仰？』那麼天主教堂區的教民會回答：『我是波蘭人。』而東正教堂區的教民會回答：『我是俄羅斯人。』」「但真的是這樣嗎？」²⁶¹拉斯圖斯基繼續寫道。他的回答是「否」。「所有上天主教教堂的人不是波蘭人，不是法國人，不是義大利人，而是天主教徒。凡是上〔東正教〕教堂的人不是屬於俄羅斯信仰，而是屬於東正教信仰……當有人問你們：你們是屬於什麼信仰，你們是什麼民族？你們應該如此回答：我們是白羅斯人！—因為我們是講白羅斯語。」拉斯圖斯基主張，除了語言，白羅斯人身分的另一個指標是血統、共同祖先和住在同一片祖居地。在血統這件事情上，拉斯圖斯基的同道中人和第一本白羅斯語地理學著作的作者斯莫利奇主張，他的國人同胞是血統最為純正的斯拉夫人，因為俄羅斯人的血液已經受到蒙古人和芬蘭人汙染，烏克蘭人的血統則受到了韃靼人的汙染。

從一九一七年三月至一九一八年三月短短的一年間，白羅斯民族運動就像烏克蘭民族運動一樣，做出了一個巨大跳躍：從僅要求文化自治改而要求完全地獨立。儘管強度不同，烏克蘭民族運動要強很多且更成熟，兩個民族運動都是受惠於德國的占領政策。俄羅斯民族主義領袖和自由派政治人物都沒有把它們當一回事，認為那只是德國人的陰謀。這兩群人在一九一七年年底和一九一八年初離開基輔，在南俄羅斯的頓河地區找到下一個避風港，得到了最後一次恢復俄羅斯國家統一性的機會。他們將對新形勢做出充分利用。

一九一九年一月，義勇軍—即由前帝國將領一九一七年晚期在頓河地區組成的白軍，開始在烏克蘭和俄羅斯中部推進。率領大軍的是將軍鄧尼金，他是在科爾尼洛夫和阿列克謝耶夫於一九一八年相繼去世後取得白軍的軍事和政治控制權。

雖然有著一半波蘭人血統，鄧尼金卻是俄羅斯不可分割論的堅定支持者。他有各種理由痛恨布爾什維克，其中包括布爾什維克與德國簽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放棄了一些歷史上原屬俄羅斯的領土。他也反對他的前同袍斯科羅帕德斯基，指他不該與德國結盟。在鄧尼金看來，烏克蘭運動是一種威脅，不管那是發生在烏克蘭還是在他自家後院，即俄羅斯南部的庫班地區：那裡的烏克蘭哥薩克人正在夢想與烏克蘭統一。一九一八年夏天，為防庫班先一步為布爾什維克或斯科羅帕德斯基政權所得，鄧尼金派兵進入庫班。一九一八年秋天，他解散庫班哥薩克人的拉達，處決親烏克蘭的領導層，從而解決了自身內部的烏克蘭問題。

就理論上而言，白軍的領導人和任何特定黨派都沒有牽扯，對於俄羅斯未來的政府形式也沒有既定立場。但實際上，這些領導人和前杜馬中的進步集團成員關係密切，也仰賴他們政治和思想上的支持。進步集團除了包括立憲民主黨人，還包括舒利金之輩的君主主義者。舒利金在一九一八年秋天回到頓河地區，成為鄧尼金將軍重要政治顧問，不僅幫忙制定白軍的烏克蘭政策，還負責執行。

隨著鄧尼金在一九一九年八月攻占基輔，舒利金有機會把他對烏克蘭問題的解決方案用於烏克蘭其他地區。他是鄧尼金進入基輔前夕發表的綱領聲明〈告小俄羅斯居民書〉的主要起草人。聲明中提到，俄羅斯語會被定為國家機關和教育系統的用語，但這並不表示「小俄羅斯語」會被視為非法。「小俄羅斯語」會被允許在小學中使用，以幫助學生掌握俄羅斯語。此外，私立中學和法院系統也被允許使用「小俄羅斯語」。這種路線和立憲民主黨在一戰前倡議者非常相似，又特別是與司徒盧威的思路相似，因為司徒盧威雖然反對禁止烏克蘭的語言和文化，但認為它們只適合用來服務社會的下層階級，較高的文化領域應該單獨保留給俄羅斯語。

這種由舒利金制定和獲得鄧尼金批准的官方政策對烏克蘭人的文化是一大打擊，在中央拉達或斯科羅帕德斯基積極扶植本土文化的政策的對照下尤顯貧乏。事實上，白軍的領導人根本不願意履行鄧尼金在聲明中的承諾—給予烏克蘭大眾使用烏克蘭語的最低自由。在基輔和其他為白軍所控制的城市，義勇軍查封烏克蘭語報紙、學校和事業單位。舒利金的長期盟友薩文科被委任為宣傳機構負責人。在他的雷厲風行下，烏克蘭語店招牌匾一律被俄語店招牌匾取代，凡是堅決這樣做的樓宇業主都會被罰款。

烏克蘭人把白軍對烏克蘭文化的侵犯一狀告到法國和英國的首都。這兩個西方強權支持鄧尼金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努力，但仍然設法約束義勇軍軍官反烏克蘭語的狂熱。他們的最優先目標是讓烏克蘭和白軍形成聯合陣線，一起對付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白軍因為攻打莫斯科失敗而撤退之後，因而這個反布爾什維克聯合陣線的目標更加必要。面對布爾什維克的步步進逼，白軍最終在克里米亞和南烏克蘭的接壤地區找到棲身之所。一九二〇年三月，將軍弗蘭格爾接替鄧尼金的總司令職位：他指責他的前任太狂妄，犯了同時對布爾什維克和烏克蘭人作戰的錯誤。雖然白軍形勢日挫，但弗蘭格爾只願意比照對待頓河哥薩克人的方式，給予他的潛在盟友烏克蘭人領土自治權。一九二〇年秋天，在弗蘭格爾政府的控制土地縮小到只比克

里米亞半島多一點之後，它願意做出的最大讓步仍然只是答應把烏克蘭問題交由未來的烏克蘭制憲會議解決。就政治和軍事兩方面來說，這個讓步意義不大。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布爾什維克軍隊進入克里米亞，迫使弗蘭格爾帶著他十五萬人的部隊投奔伊斯坦堡。決定留下來的志願軍近五萬名士兵悉數被布爾什維克屠殺。隨白軍消失的是俄羅斯不可分割的觀念，而杜馬的進步集團在一九一七年三月推出的政治、意識形態和民族方案亦淪為一紙空文。現在，俄羅斯問題輪到由戰勝的布爾什維克來解決，他們控制下的是一個領土縮小但幅員仍然非常遼闊的多民族國家。

249 「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工黨」於一八九八年成立，至一九〇三年分裂為由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意為多數），和馬爾托夫領導的「孟什維克」（意為少數）。

250 Mykhailo Hrushevskyi, *Na porozi novoi Ukrainy: Statti i dzherel'ni materialy* (New York, 1992), 146.

251 Vladimir Lenin, *Polnoe sovrание sochinenii* (Moscow, 1969), vol. 32, 350.

252 同上，vol. 35, 144.

253 Nikolai Azovtsev, *Direktivy komandovaniia frontov Krasnoi armii, 1917-1922* (Moscow, 1971), 45.

254 Viktor Savchenko, *Avantiuristy Grazhdanskoi voyny* (Moscow, 2000), 53.

255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是蘇俄與同盟國簽訂的和約，蘇俄在簽訂和約後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

256 Anna Procyk, *Russian Nationalism an Ukraine: The Nationality Policy of the Volunteer Army During the Civil War* (Edmonton, 1995), 73.

257 同上，74.

258 Anders Rudl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Belarusian Nationalism, 1906-1931* (Pittsburgh, 2015), 73.

259 同上，74.

260 Nicholas P. Vakar, *Beloruss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A Case Study* (Cambridge, MA, 1956), 103.

261 Rudl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Belarusian Nationalism*, 90.

第五篇 牢不可破的聯盟

第十三章 列寧的勝利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是寒冷冬日，兩千多名來自全國各地的男女聚集在莫斯科大劇院的正廳。同年稍早，在經過漫長討論後，列寧的布爾什維克政府決定不關閉莫斯科大劇院。這倒不是因為他們用得著它來表演芭蕾舞和歌劇（這些東西當時被定性為資產階級文化的頹廢產物），而是黨和蘇維埃的會議得使用這些大型場地。一九二二年最後幾天在它裡面舉行的代表大會是歷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它身負一個劃時代的任務：創建新國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²⁶²。

大多數與會者都是二十來歲，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最近的革命洗禮，其中近百分之九十五是共產黨員，即「全俄羅斯社會主義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的成員或候選成員。他們分別代表四個名義上獨立的蘇維埃共和國，其中三個共和國（俄羅斯、烏克蘭和白羅斯）屬於前革命時代的帝俄民族。俄羅斯人代表共一千七百二十七人，占總數二千二百一十五人全體代表中的絕對多數。所以，這個會議雖然被稱為「全聯盟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實際上卻是一個俄羅斯人的大會，其他的非俄羅斯人代表只是用來妝點。這個大會也形同橡皮圖章，作用是為黨中央已經做出的決定背書：宣布成立一個領土涵蓋大部分俄羅斯帝國的聯邦制國家。全部代表按照吩咐投票，十二月三十日遂成了蘇聯的誕生日。

大會選出列寧為名譽主席，發言的代表也紛紛向他致上敬意，但列寧本人卻不在現場。這位五十二歲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幾個月來為創建蘇聯殫精竭慮，此時正待在克里姆林宮。從他的住處到莫斯科大劇院沒幾步路，但他就是到不了。八天前的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嚴重中風，雙腿和右手癱瘓。兩天後，以史達林為首的黨幹部委員會嚴格限制他的活動範圍，有效地把他孤立起來。這些限制除了是防止列寧健康進一步惡化，也是別有政治用心。

史達林（列寧對這位身兼黨總書記和民族事務人民委員〔即部長〕的同志愈來愈不客氣）在大會上做了兩個主要報告，一個是關於蘇聯的創立，一個是關於各共和國的締盟條約。報告遵循列寧的方針，但列寧依然不信任他，擔心他會因為捨不得俄羅斯「大國沙文主義」而暗中動手腳。史達林原本希望烏克蘭、白羅斯和外高加索聯邦（包括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和喬治亞）仿效巴什科爾托和克里米亞這些自治共和國的例子，加入俄羅斯聯邦。這樣，它們的地位將會在莫斯科的俄羅斯政府之下。但因為遭到這些共和國的抗議和列寧的施壓，他不得不放棄計畫。列寧堅持要創建一個包括俄羅斯在內、各共和國平起平坐的聯盟。

因為無法出席大會又擔心史達林不貫徹他的路線，身體部分癱瘓的列寧決定把自己有關民族問題的想法口授下來，交給黨的領導層過目。十二月三十日，也就是代表大會通過創建蘇聯的同一天，列寧開始口授他對民族問題看法的最後文章，至第二天完成。題為〈關於民族或「自治化」的問題〉，文章以書信體的形式抨擊史達林的民族政策，批評聯盟的締盟條約賦予各共和國的權利不足以阻止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興起。在列寧看來，俄羅斯帝國民族主義構成了對蘇聯和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威脅。他想建立的是一個脫下帝國形式的政府結構，至於要不要保留帝國實質則是另一回事。

列寧對蘇聯的構想源於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提出的「宰制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觀念，而這些觀念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回應打著俄羅斯人民聯盟或其他民族主義組織旗號進行的俄羅斯帝國主義動員。他從不相信有「全俄羅斯民族」存在，所以已經準備好把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視為各自不同的民族。在他看來，大俄羅斯人一直處於宰制地位，而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雖然被認為是「單一俄羅斯民族」的成員，卻一直處於被壓迫地位。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前，列寧的民族政策和聲明都是著眼於爭取非俄羅斯民族的支持以推翻現有政權，不是為了管理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秋天接管的那個多民族國家。不過，想要在野的布爾什維克

承認非俄羅斯人擁有自決權很容易，但想要他們在奪權成功之後保持一貫立場卻大不易。

列寧對待中央拉達的立場和政策反映出他對民族性問題的思考在一九一七年經歷了哪些轉變。一九一七年夏天，當時布爾什維克仍然在野，列寧發聲支持中央拉達，認為臨時政府對烏克蘭的態度是一種大國沙文主義。但在十二月布爾什維克奪權成功之後，他卻一改態度，否定中央拉達有自決權或有權脫離俄羅斯，又指控它推行資產階級的政策，拒絕承認其為勞動群眾的合法代表。

列寧和他的同志花了好一陣子才摸索出他們應該採取哪種民族政策。對一個領導階層以非俄羅斯人居多的政黨來說，這件事情極不容易。托洛茨基出生在烏克蘭的猶太家庭，史達林則是喬治亞人而且以自己的母語開始其文學寫作生涯，他們都是最傑出的非俄羅斯裔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起初就投身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事業，而非選擇投身本土反帝國主義運動所提供的民族主義事業。但黨高層還有其他人，對這些人而言，要他們恢復國際主義信仰極為困難。身為訓練有素的戰術家，列寧為黨及其支持者制定了新的路線。

列寧最後為布爾什維克制定的民族政策，是為了回應烏克蘭在一九一九年之局勢的一條新路線。那年夏天，在白軍將領鄧尼金和烏克蘭「執政內閣」—中央拉達的繼承者—的軍隊聯手下，布爾什維克軍隊被逐出烏克蘭。布爾什維克中的烏克蘭人把這次軍事和政治失敗稱為「一九一九年的慘痛教訓」，歸咎於黨的民族政策闕如。有鑑於此，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九年年底奪回烏克蘭之後，覺得必須改弦易轍，才能長治久安。於是，一個充門面的獨立「蘇維埃烏克蘭」被恢復過來，但上次的「慘痛的教訓」讓他們知道還必須做更多事方可安撫難駕馭的烏克蘭農村地區，以獲得其信任。在大城市，布爾什維克獲得俄羅斯裔或俄羅斯化的無產階級支持，但操烏克蘭語的村莊一貫以來都對無產階級革命抱有敵意。

烏克蘭農民在革命的頭幾年經歷了快速的民族動員。中央拉達和後來的執政內閣（兩者都是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政府）成功地把他們原有的小俄羅斯人身分認同轉換為烏克蘭人身分認同。這種轉換讓農民的政治態度丕變：一戰前，他們在杜馬選舉時會把票投給俄羅斯民族主義者，但現在卻樂於讓子弟加入烏克蘭軍隊，對抗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想要把農民爭取過來。他們發現，農民關心烏克蘭，喜歡別人用烏克蘭語對他們說話，但很少布爾什維克政委懂得說這種語言。烏克蘭的布爾什維克分子主要是俄羅斯裔或猶太裔，還有四分之一是高度俄羅斯化的烏克蘭人。正如列寧看出的，黨想要得到烏克蘭人的支持，就必須吸納更多烏克蘭幹部和重視他們的語言及文化。

現在，布爾什維克必須也會說烏克蘭語。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上旬，列寧在中委會討論如何統治烏克蘭時，敲定了一個特別決議。他提醒他的同志，烏克蘭人在沙皇統治下備受迫害和歧視，呼籲他們想辦法讓農民在政府各級機關都可以用烏克蘭語洽公。絕不可讓歧視繼續存在。他寫道：「應該馬上採取措施，確保所有的蘇維埃機關都有足夠數量會說烏克蘭語的工作人員，並確保未來所有工作人員都能夠用烏克蘭語達意。」 263

當然，有鑑於布爾什維克的成員構成樣態，這件事說易行難。雪上加霜的是，同一個決議又禁止政府機關任用屬於城市中產階級的烏克蘭人—這是因為黨中央不信任這些人對黨的忠誠度，但十之八九也是因為不想讓烏克蘭的社會主義者能夠控制當地的政府機關。不過，在鄉村，列寧歡迎新的政府機關納入貧苦農民（傳統上他們是黨的有力支持者，以及納入擁有中等面積土地的地主），這樣的地主占農村人口的大多數。他寫道：「必須讓蘇維埃機關和烏克蘭土著農民保持緊密的聯繫，為此規定：革命委員會和蘇維埃即使在剛成立、剛開始工作的時候，也應當保證勞動農民的代表在這些機關裡占多數，並且要保證貧苦農民代表能起決定作用。」 264

列寧固然形式上承認蘇維埃烏克蘭為一獨立共和國、鼓吹當地機關起用烏克蘭農民為幹部，並在語言和文化的問題上讓步，但這並不

意味他準備在關鍵議題上讓步，也就是說，他不準備讓烏克蘭獨立。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下旬起草和一九二〇年一月發表在布爾什維克喉舌報《真理報》的〈為戰勝鄧尼金告烏克蘭工農書〉中，列寧沒有隱瞞他不樂於看到烏克蘭獨立，明白表示他偏好的選項是「各族人民的自願聯合」。不過，在當時，他不想和他在烏克蘭的新盟友「鬥爭派」就這個問題爭吵。鬥爭派是「烏克蘭社會主義革命黨」的一個分支，之前曾與布爾什維克聯手對付鄧尼金。列寧寫道：「在布爾什維克中間，有人主張烏克蘭完全獨立，有人主張建立較為密切的聯邦關係，也有人主張烏克蘭和俄羅斯完全合併。為這些問題而發生分歧是不能容許的。這些問題將由全烏克蘭蘇維埃代表大會來解決。」²⁶⁵

列寧願意讓烏克蘭獨立的議題保持開放性，是為了避免烏克蘭的反鄧尼金陣線發生內部矛盾。不過，一旦局勢變得較為穩定之後，他便利用得到的第一個機會粉碎他一些盟友所支持的烏克蘭獨立運動。一九二〇年二月上旬，列寧起草了一個黨中央決議，下令蘇維埃烏克蘭的政府（稱為「革命委員會」）準備好肅清鬥爭派，它現在已被定性為民族主義政治組織。決議指出必須把鬥爭派視為「一個以鼓吹分散兵力和支持盜匪活動來破壞共產主義基本原則的黨派，它的所作所為正符合白軍和國際帝國主義的利益。他們反對『與俄羅斯聯邦結成緊密或最緊密聯盟』的口號，這同樣是有違無產階級的利益。我們必須系統性和毫不動搖地致力的目標，是在不久的將來肅清『鬥爭派』」²⁶⁶。

肅清命令在翌月即一九二〇年三月下達，鬥爭派隨即被解散，它的其中四千名成員，約為原有人數的四分之一，加入了烏克蘭布爾什維克，但不是以團體的方式加入，而是以個人的方式，因此完全是聽命於莫斯科。在獨立的烏克蘭共和國和聯邦結構的俄烏關係的門面背後，是高度極權的布爾什維克，其成員也完全聽命於莫斯科。雖然烏克蘭共產黨也有自己的中央委員會，但他們對黨政策的發言權沒有比俄羅斯外省的地方機關多多少。列寧願意保持烏克蘭國家的外觀，並給予當地居民尤其是農民語言和文化權利，以便把他們融入布爾什維

克機構。如果布爾什維克的「土著化」是把真正土著納入布爾什維克的必要代價，列寧願意付這個代價，但土著幹部不被容許對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整合性指手畫腳。這些列寧在一九一九年年底和一九二〇年年初制定的原則將成為布爾什維克民族政策的基石，也界定了列寧和史達林兩人對蘇聯結構的構想。

蘇聯的形成之路開始於一九二二年四月，地點是拉帕洛，那裡是義大利一處度假勝地，離熱那亞半小時車程。拉帕洛是蘇聯代表團到熱那亞參加國際會議的落腳處。在會議上，三十四個國家一致同意，它們的銀行回歸金本位制，試圖以這個方法遏制戰後的通貨膨脹和振興各國備受戰爭蹂躪的經濟。會議開始於四月十日。六天後的四月十六日晚上，德國代表團住宿處的電話響起。來電者是一名蘇聯外交官，他建議德國和蘇聯簽署條約，同意放棄對彼此求償的權利，以此重啟貿易和經濟合作之路。德國代表通宵達旦討論這個建議，第二天去到蘇聯代表團在拉帕洛的住宿處，簽署協議。這對布爾什維克政府來說是一大突破，因為這是第一次有國家承認它是俄羅斯帝國尚餘領土的合法繼承人。英國和法國相繼在一九二四年承認布爾什維克政府，但美國會遲至一九三三年才跟進。

《拉帕洛協議》是蘇聯外交委員奇切林的一人之功。他不但需要克服國際的阻力，還得克服國內的阻力。因為他除了代表俄羅斯簽字，還企圖為其他名義上獨立的共和國簽字。這個企圖引發後續反應，導致在哈爾科夫的烏克蘭政府和在莫斯科的俄羅斯政府發生衝突。根據雙方的軍事同盟協定，在未得到烏克蘭政府同意下，俄羅斯當局無權對烏克蘭機構發號施令。但俄羅斯當局老是這樣做，不僅插手烏克蘭的國防、經濟、運輸和金融這些核心領域，還插手貿易、農業、司法和擺在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國際事務。

烏克蘭共產黨領導人提出抗議。莫斯科為此成立一個委員會，進行調查，在發現投訴成立後做成決議，譴責奇切林的人民委員部。作為一項特殊安排的一部分，烏克蘭和白羅斯這兩個名義上獨立的共和國，連同喬治亞、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在內的外高加索聯邦，在一九

二二年十一月加入了《拉帕洛條約》。正式獨立的共和國有權管理自己的外交事務，卻管不了國內的經濟和金融事務，這一次的情況讓蘇聯國內外的人都看得糊裡糊塗。蘇聯軍事指揮官伏龍芝（他也是負責調查烏克蘭對奇切林投訴的人）在回顧時認為，這事件就是最終促成創建蘇聯的起點。

布爾什維克在內戰中取得勝利後，烏克蘭問題取代波蘭問題，成為了中央政府在民族政策上最關鍵的議題。在莫斯科控制的地區烏克蘭人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是繼俄羅斯人之後最大的族群，構成了聯盟中近一半的非俄羅斯裔人口。第三大民族是白羅斯人，占整個蘇聯人口略低於百分之三。烏克蘭人也表現出獨立的強烈願望，而且就連在莫斯科領導層，也有主張讓烏克蘭獨立的烏克蘭人存在。

不過，在一九二二年夏天，不滿意俄羅斯把其他共和國看成下屬的不僅止於烏克蘭人。喬治亞的共產黨人一樣主張，他們應該擁有如同獨立共和國一樣的權利。正是這個衝突導致的談判促成了蘇聯的形成。喬治亞人抗議把他們納入外高加索聯邦的做法，這是列寧所倡議，為的是把巴庫的石油生產與喬治亞的運輸系統連結起來。一九二〇年八月，史達林和他在高加索的左右手奧爾忠尼基澤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研議俄羅斯和其他共和國一套相互對待的新模式，呈交給中央委員會定奪。身兼黨總書記和民族事務人民委員的史達林主持該委員會。正如可預期那般，史達林因為對俄羅斯政府和其他共和國政府的關係有欠清晰而感到沮喪，且被深深捲入兩者的衝突中，他竭盡所能創造出一個不僅可以消除模糊還可以強化中央的構想。

史達林的這個構想稱為「共和國的自治化」，內容直截了當。所有名義上獨立的共和國都將會被整合到俄羅斯聯邦，擁有如同克里米亞和巴什基爾²⁶⁷等自治共和國的自治權。俄羅斯聯邦的政府將成為蘇聯的中央政府，直接對各共和國發號施令。但有幾個共和國不買帳。喬治亞人是率先反對史達林構想的急先鋒，稱統一的時機尚未成熟，而烏克蘭人也表示寧願維持現狀。白羅斯人則說，他們願意接受烏克蘭願意接受的任何關係模式。

史達林拒絕讓步，想要強推他的自治化計畫，後來受到列寧制止才作罷。儘管有這樣的衝突，兩人對民族問題的態度基本上大同小異。兩人都不懷疑布爾什維克黨中央應該高度集權，不管採取任何官方政策都是主要管治機構。雙方也一致認為，對非俄羅斯民族的民族主義必須讓步，俾使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布爾什維克的隊伍中合流。兩人的不同更多是在戰術而非戰略方面。史達林堅持各共和國在俄羅斯裡面自治，這和白軍弗蘭格爾將軍的政府給予烏克蘭人、頓河哥薩克人，以及其他地區的自治無太大差別。反觀列寧則願意再往前走一步，為各民族提供一個聯邦制國家，俄羅斯作為其中的一個自治共和國，而這多多少少就是格魯舍夫斯基和烏克蘭中央拉達在一九一七年主張的路線。

當共產黨官員在一九二二年夏天爭論應該給予各共和國何種權利時，列寧決定站在喬治亞人和烏克蘭人一邊。在他看來，把各共和國納入俄羅斯聯邦，特別是在違反他們領導人意願的情況下，會讓俄羅斯人顯得是個帝國主義主子，有違「各族人民自願聯合」的理念。列寧對共和國未來的想法深受他想要團結全世界各民族工人階級的願望影響。他深信，蘇維埃的生存有賴世界革命的成功，而世界革命的成功又有賴德國、法國和英國工人階級的崛起，以及有賴民族主義運動在中國、印度和亞洲西方殖民地的崛起。所以，想要取得全球範圍的革命成功，必須滿足各共和國的自治願望。

所以，列寧不打算擴大俄羅斯聯邦，而是建議歐洲和亞洲的各蘇維埃共和國締建一個聯盟。其成員理論上是平起平坐，由一個全聯盟的政府負責治理。史達林固然也承認，像這樣擴大的俄羅斯聯邦會讓人印象不佳，但仍主張直接把俄羅斯政府升格為全聯盟（all-Union）的政府。在他看來，沒有必要讓多一層的官僚機構存在。但列寧不肯讓步，因為對他來說，成立聯盟是原則問題，不是一種權謀。必須用某種辦法去安撫上升中的非俄羅斯民族主義，但史達林的構想卻是走昔日民族不平等的老路，而俄羅斯帝國就是因此被推翻，因而蘇維埃國家一樣也有可能因此被推翻。

一九二二年九月，有見於史達林與各共和國之間的衝突日益嚴重，列寧把包括史達林和喬治亞共產黨領導人姆迪瓦尼在內的一批官員找來，討論關係正常化的計畫。他成功說服史達林接受他的聯盟方案。在寫給布爾什維克領袖之一卡米涅夫的信中，列寧說出他的動機：「重要的是，我們不去助長『獨立分子』，也不去摧毀他們的獨立性，而是再建一層新樓—權利平等的共和國聯邦。」²⁶⁸一九二二年十月上旬，他給卡米涅夫寫了另一封短信：「卡米涅夫同志，我宣布我要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一決死戰.....絕對要堅持，全聯盟中央執委會的主席要由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喬治亞人等輪流擔任。」²⁶⁹史達林、卡米涅夫和其他人同意以列寧的觀念為基礎，創建一個聯盟。此議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獲得全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正式通過。

雖然這是列寧願景的重大勝利，他並沒有什麼好慶祝的。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只能躺在床上的他狂熱地口授他對民族問題的觀點，又對於蘇聯是否可以把各共和國團結在一起表示懷疑。原因很簡單：雖然史達林表面上順著他的願望，列寧卻意識到這位黨總書記的作為不僅威脅著聯盟的基本原則，還威脅著他本人的權力。

史達林用來對付不聽話喬治亞共產黨人的武器不僅止於黨的決議，還加上拳頭。他在高加索的打手奧爾忠尼基澤曾揍了一個反對史達林的喬治亞領導人一頓。喬治亞人一狀告到黨中央之後，史達林任命親信捷爾任斯基調查此事。捷爾任斯基是祕密警察首腦，調查後主張錯不在奧爾忠尼基澤。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列寧和捷爾任斯基一席長談後因為心情憤慨，突然中風，導致幾天後身體部分癱瘓。他現在躺在床上，試圖向黨的領導層說明史達林的政策有何不妥，以及他們該怎樣改革蘇聯才能抵消史達林的壞影響。

這就是他在十二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對祕書口授的主題。在他看來，他的國家面臨的最大威脅不是各共和國的民族主義，而是大俄羅斯的民族主義。他稱其為大國沙文主義，認為俄羅斯化的非俄羅斯人比俄羅斯人更熱中推廣大國沙文主義，一個例子是史達林的走狗奧爾忠尼基澤：「這個喬治亞人對事情的這一方面掉以輕心，滿不在乎地

隨便給人安上『社會民族主義』的罪名（其實他自己不僅是不折不扣的『社會民族主義者』，還是粗暴的大俄羅斯惡棍），不知道自己的作為實質上破壞了無產階級團結的利益。」²⁷⁰列寧在乎的不是奧爾忠尼基澤和史達林冒犯他們自己喬治亞人的民族感情和限制喬治亞人的民族權利。重點是，這兩個人人都代表著中央，因此有可能害中央背上俄羅斯沙文主義的罪名。

列寧有見於俄羅斯人在黨和國家機器占有主宰地位，可能會用權力來欺壓非俄羅斯民族，才會把俄羅斯沙文主義看成對國家統一的主要威脅。他在口授的文章中呼籲善待非俄羅斯人的共和國：「對施壓迫的民族或說『大』民族²⁷¹（其實他們只在『大施暴者』的意義下為大）來說，國際主義不應只表現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還應該自甘處於一種不平等狀態²⁷²，以抵消現實中一定會形成的不平等。」

列寧攻擊的主要是由史達林控制的政府機器，聲稱它主要是繼承自舊政權，到處滲透著俄羅斯人的大國沙文主義。想要讓它不能為所欲為，方法是挪去它部分權力，轉移給各加盟共和國。列寧建議取消已通過成立的蘇聯，用一個結構較鬆散的聯盟取而代之，在其中，中央政府的權力只能及於各共和國的國防和國際關係事務。加盟共和國雖然擁有「退出蘇聯權」，這是在締盟條約中明訂的，但列寧感覺這項權利也許不足以反制俄羅斯民族主義，所以建議在下一次全聯盟的代表大會上進行改革，讓中央政府只剩下上述兩項權力。根據原通過的決定，蘇聯中央除了可以主管加盟共和國的軍事和國際事務，還可以主管它們的經濟、金融和通訊。

事實證明，〈關於民族或「自治化」的問題〉不僅是列寧談民族問題的最後作品，也是他寫給黨領導層的最後一封信。這封「信」直到一九二三年三月才被公開。史達林不遺餘力地把列寧隔離於黨的其他領導人，為此不惜與列寧的妻子克魯普斯卡婭撕破臉，指責她不應該把政治消息傳遞給丈夫，因為此舉會威脅列寧的心靈平靜，有礙其健康。史達林一度對她這樣說：「我們要看看妳是列寧的哪種太

太。」言下之意是，如果她是個好太太，列寧就不會曾經有婚外情。列寧聽說克魯普斯卡婭受辱後勃然大怒，要求史達林道歉。史達林回信說他已經道過歉，但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因為他只不過是在盡力保護領袖，讓其不會產生不必要的焦慮。列寧的焦慮指數在得知史達林把大批人馬安插在民族院²⁷³之後明顯升高。盛怒的他試圖把托洛茨基拉過來幫他一起鬥爭史達林，但未獲對方回應。一九二三年三月六日，列寧口授了他寫給喬治亞共產黨人的打氣信。這是他人生中最後一份文件，因為翌日他第三次中風，落入完全癱瘓狀態。

在列寧的施壓和各共和國的反抗下，史達林放棄了他的自治化方案，接受了聯盟選項。但他堅決拒絕邦聯制²⁷⁴。在一九二三年四月的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上，他和他的人馬成功粉碎以喬治亞和烏克蘭為首的發難者。烏克蘭政府領導人拉科夫斯基發言時引用列寧在〈關於民族或「自治化」的問題〉裡的話，抨擊黨和政府機器已淪為大國沙文主義的代理人，建議把中央政府九成權力轉移給各共和國。

拉科夫斯基聲稱民族問題攸關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敗：「這會影響到能否讓有革命精神的俄羅斯無產階級和六千萬非俄羅斯人農民團結在一起。」²⁷⁵史達林不為所動，這樣回應：「把偉大的俄羅斯無產階級放在一個比從前被壓迫民族低下的位置是荒謬的……如果我們不惜犧牲無產階級地區而向邊區的農民區太過傾斜，那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也就會出現一道裂痕。」²⁷⁶贏得這一仗的是史達林和他人馬。直言不諱的烏克蘭領導人很快就會被拉下馬，下放到倫敦當大使，過上體面的流放生活。

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通過了支持各共和國本土文化的政策，想用這種小甜頭安撫各加盟共和國政府因為權力被剝奪和聯邦主義原則被侵犯而產生的不滿情緒。制定這種政策的季諾維也夫把黨的用心說得很清楚：「在烏克蘭和類似的地方，我們不能採取中立的立場，即不能說：那裡有兩種文化正在發生衝突，我們會靜觀其變。特別是在我們的黨掌權的現在，這不是我們的立場。我們應該在這一過程中扮演積極角色。我們想要做到的是這樣：例如，當亞塞拜然農民看到一間

以母語教學的學校在他們的土地出現時，會想要感謝的是共產黨人，特別是俄羅斯共產黨。」 277

在第十二次黨代會大會，史達林也接受了俄羅斯沙文主義是國家統一性主要威脅的列寧觀點，但拒絕讓非俄羅斯民族主義坐大。在總結發言時，他強調：「我們的建設工作只有在一種情況下可望成功，那就是進行一種兩方面的鬥爭，一是鬥爭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它是建設工作的根本威脅，二是鬥爭地方沙文主義。因為沒有這種兩方面的鬥爭，就不可能指望把俄羅斯和其他民族的工農團結起來。否則就有可能會助長地方沙文主義，而獎勵地方沙文主義是一種我們不能容許的政策。」 278

列寧沒有出席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他從一九二三年三月中風後從未出現康復跡象，並於翌年一月去世。列寧逝世五天後的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全聯盟第二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但大會沒有像列寧當初所期望那樣能限制中央政府的權力。他們只是直接通過原訂的新憲法和聆聽史達林對列寧和列寧主義的宣誓效忠。他這樣發誓：「和我們永別時，列寧同志囑咐我們要強化和擴大這個共和國的聯盟279。列寧同志，我們向你發誓，我們一定會光榮地實現你的遺命！」 280列寧認定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是國內政治的主要威脅，而這一點將會是接下來十年史達林民族政策的主要方針。所以，他確實有忠於列寧的思想，只不過不是全部。

史達林採納列寧的聯盟構想，但把它按照自己的需要捏塑。他的共和國「自治化」政策現在穿戴成一個聯盟的樣子。即使是全聯盟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由其宣布蘇聯的創建），事實上也是一個俄羅斯的蘇維埃大會，其他共和國的代表只是花瓶。蘇聯議會的民族院有三分之二的成員是俄羅斯人。更重要的是，在史達林布局下表面上是改變了，但是蘇聯權力結構的真正統治是布爾什維克黨。它繼續是稱為「全俄羅斯」共產黨和由莫斯科控制。反觀其他共和國的黨組織並沒有比俄羅斯的地方黨組織有更多權力。烏克蘭共產黨人擁有的自治權就像他們在克里米亞或巴什基爾的同僚一樣多，或說一樣少。

在邦聯制的議題上，列寧並沒有如願，我們無法確定他對邦聯制的鍾情是真心實意還是藉它來跟史達林針鋒相對。但他還是在聯盟結構的問題上取得了勝利—這個勝利最終對俄羅斯民族的影響將會大於對其他共和國的非俄羅斯人。列寧的勝利在聯盟內為俄羅斯人創造出一個獨立的共和國，讓他們有了自己的領土、機構、人口和一種不同於聯盟整體的身分認同。在史達林所設想的國家裡，俄羅斯人會繼續分享帝國時代的許多特徵，唯一不同的是這個帝國更名為聯盟；但在列寧設想的國家裡，他們別無選擇，只能開始尋找一種不同於帝俄時代的身分認同。幾乎是預設的那樣，列寧成為了現代俄羅斯民族之父，而蘇聯成為了這民族的搖籃。列寧的勝利在敲碎革命前的「單一俄羅斯民族」觀念起了重要作用。其結果是，不管是俄羅斯人看待自己還是別人看待他們的方式，都將發生重大轉變。

262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簡稱「蘇聯」（USSR，或者 Soviet Union）。

263 Vladimir Lenin, *Polnoe sovrание sochinenii* (Moscow, 1969), vol. 39, 335.

264 同上。

265 同上，vol. 40, 45.

266 同上，vol. 39, 251.

267 即今日俄羅斯的巴什科爾托斯坦共和國。

268 同上，vol. 45, 212.

269 同上，vol. 45, 214.

270 同上，vol. 45, 360.

271 這裡的「大」民族原指「偉大」民族。

272 指俄羅斯聯邦應該讓別的共和國占一些好處才算真正的平等。

273 相當於美國的參議院，其依照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自治共和國、自治州、民族區選出一定比例的代表。

274 指他堅拒列寧在〈關於民族或「自治化」的問題〉中所建議的，把蘇聯改為一個「結構較鬆散的聯盟」。

275 Dvenadtsatyi s'ezd Rossiisko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Moscow, 1923), 529.

276 同上，596.

277 同上，604.

278 同上，598.

279 指蘇聯。

280 Propagandist, no. 21 (1939): 22.

第十四章 民族共產主義

碰面地點是近蘇聯邊境一個波蘭小鎮的火車站餐廳。一個中年男子向一個年紀更大和蓄灰色鬍子的男子出示作為信物的火柴盒。蓄鬍男子是出生於基輔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舒利金，他曾在讓尼古拉二世遜位一事上出過力，後來又當過白軍將領鄧尼金的顧問。前幾星期他都待在如今是波蘭一部分的沃里尼亞，為祕密進入蘇聯做準備。另一個男人是負責把他偷渡過邊界的人蛇頭子。

舒利金此行是要跟一個祕密君主主義者組織的領導層會面，該組織和歐洲俄羅斯流亡人士圈子已經建立起聯繫。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深夜，舒利金越過波／蘇邊境，先後去了基輔、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見到了俄羅斯君主主義者的領袖。他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離境，事後把所見所聞寫成《三個首都》一書，在流亡西方的俄國人圈子引起轟動和詆毀。舒利金偷偷進入蘇聯不僅為了評估這國家的政治氣候，還想要了解它新採行的稱為「本土化政策」的民族政策帶來何種結果。書中，他批判了蘇維埃政權，但認為布爾什維克思想正在退潮：列寧在內戰以後重新引入一些帶有市場經濟成分的「新經濟政策」，讓國家恢復健康，使人對俄羅斯能重新偉大起來懷抱希望。舒利金力主：「俄羅斯沒有死去。它不僅仍然活著，還豐沛多汁。」[281](#)

舒利金有所不知的是，他在基輔、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整個行程都是由蘇聯祕密警察GPU「國家政治管理局」所安排，一舉一動都受到監視。不管是幫助他偷渡邊界的人或是與他會面的君主主義組織的領袖，全是GPU的特工。整個騙局原是為了把白軍運動最後一位領導人弗蘭格爾誘至蘇聯，予以逮捕。看見弗蘭格爾沒有一道來，GPU決定利用舒利金來影響那些反共產主義流亡者的看法，讓他只看見布爾什維克實驗中最光明燦爛的一面。舒利金果然中計，離開時深信俄羅斯正在復興，認定布爾什維克在無意中促成了偉大俄羅斯國家的重生。事實上，他的書在出版以前甚至經過GPU「校對」。不過，雖然

受到GPU愚弄，但舒利金在評估「本土化運動」的強項和弱項時卻是卓有見地。

本土化政策的總設計師和推動者是史達林，他先是民族事務人民委員，後又當上黨總書記。儘管史達林和列寧對於蘇聯應該採取何種結構持不同看法，但這兩個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一致認為，民族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愈早讓民族主義蓬勃發展，一個社會便愈能迅速通過該階段，邁向國際主義社會的更高境界。

本土化政策由兩大部分構成，一是政治和社會部分，另一是文化和語言部分。該政策是在一九二三年四月的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通過，當時列寧雖已離開政治舞台，但該政策是根植於他談烏克蘭問題的著作，特別是發表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的那一批，當時紅軍剛從鄧尼金的軍隊和彼得留拉領導的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手中收復烏克蘭。在這些文章中，列寧主張把本土幹部納入蘇聯的機關中。本土化政策追隨這個方針，採取積極行動把非俄羅斯人吸納到加盟共和國的黨部和政府，要以此創造出一批忠於莫斯科的地方菁英。本土化政策的文化部分要求促進在地的語言和文化，一開始是支持在教育、出版和戲劇表演上使用在地語言，最終是黨和政府機關的在地語言化，先是在地方的層次推行，漸次及於大城市和首都。這些措施的目的是要讓新的蘇維埃政權深入到以非俄羅斯人占大多數的前帝國周邊地區。

史達林會擁護本土化政策，不僅因為他就像列寧一樣，認為民族主義是人類發展的必經階段。從政治的角度看，吸收本土幹部明顯可以克服非俄羅斯人對布爾什維克的敵意—這種敵意在內戰期間非常明顯，以及減低布爾什維克黨結構的中央集權色彩。根據締盟的條款，烏克蘭和喬治亞等名義上獨立的共和國必須交出關鍵的自主權，包括國防和外交的自主權。作為補償，它們被容許提高本國黨部的本土幹部人數，以及在行政、教育和公共生活的其他領域促進本土語言。此外，史達林用得著各共和國幹部來支持他在莫斯科的權力鬥爭。作為掌管非俄羅斯人民族事務的黨領導人，他有絕佳條件可以把親信安插

到各加盟共和國的黨高層，讓他們幫助他對抗政治局中的眾多對手，例如托洛茨基、卡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

在史達林的政治算計中，沒有哪個加盟共和國比烏克蘭更重要。烏克蘭共產黨構成了蘇聯第二大的「自治」黨組織，規模僅次於俄羅斯人「擁有」的「全聯盟共產黨」——一九二五年前稱為「俄羅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

直到一九二三年為止，烏克蘭的政府首腦都是托洛茨基的盟友拉科夫斯基，而他也不遺餘力利用烏克蘭自治主義者的願景挑戰史達林在權力中心的地位。但他在一九二三年春天的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受到排擠，不久以後又被下放至倫敦當大使，此後，史達林使出渾身解數以確保烏克蘭布爾什維克的忠誠。一九二五年四月，他把親信猶太裔烏克蘭人卡岡諾維奇任命為烏克蘭黨部的最高負責人。

烏克蘭在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之後經歷了一個被稱為「奉旨烏克蘭化」的階段，因為這期間當局發布一道又一道命令，要求快速在教育、文化和政府機關各方面推行烏克蘭化。如果說在媒體和出版兩方面把俄羅斯語轉換為烏克蘭語的進展迅速順利，那麼在行政管理上改用烏克蘭語的進展卻是牛步蹣跚。當局把完成任務的最後期限一延再延後仍然無法達標。抵抗烏克蘭化的阻力來自黨高層：在一九二四年，其成員有百分之四十五是俄羅斯人、百分之三十三是烏克蘭人，百分之十四是猶太人。

烏克蘭中委會第二書記列別德提出了「兩種文化的鬥爭」理論。他認為俄羅斯語言和文化代表城市屬性，也因此代表工人階級屬性，反之烏克蘭語言和文化卻是代表農村屬性。他主張，在這兩種文化的衝突中，共產黨人必須站在無產階級一邊而不是站在小資產階級和農民一邊。儘管他在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通過本土化策略之前便被迫停止公開宣傳他的理論，但黨領導層很多人都同意此說。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造訪基輔時，舒利金獲得了用親眼所見評估「奉旨烏克蘭化」成果的機會。新政策的跡象隨處可見。革命前，基

輔火車站前的大道是以在一八三七至一八五二年之間任基輔總督的比比科夫的名字命名；現在卻被稱為舍甫琴科大道，以尊榮這位於一八四七年在基輔被捕的詩人，當時的總督正是比比科夫。另外，原本屹立在大道上的博布林斯基紀念碑（他是俄羅斯伯爵，基輔地區糖業的奠基者），亦已換成一座紀念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金字塔形紀念碑。政府機關匾額和商店招牌現在都是以烏克蘭語書寫。

另一件事情同樣讓舒利金不自在：一九一七年烏克蘭革命的領導者格魯舍夫斯基是他的宿敵，在流亡中歐多年後已經回到基輔。舒利金在基輔必須用愛德華·施密特的化名隱瞞身分，反觀格魯舍夫斯基卻是堂而皇之住在基輔。他受到布爾什維克當局歡迎，也是烏克蘭科學院的院士。舒利金參觀了格魯舍夫斯基舊居的遺址，原先蓋在上面的房子一九一八年一月被布爾什維克的砲火夷為平地。舒利金在旅行日誌中寫道：「不過，那個時候同樣已經過去了。那麼，格魯舍夫斯基先生本人呢？他欣欣向榮。他還活著，是條打不死的老狗.....除了失去了共和國的首都，格魯舍夫基本人失去的不多。他的家固然被毀了，但那真的只是一場『誤會』。」[282](#)何以見得是「誤會」？因為他已經和蘇聯和解，回到了基輔，用黑巫術的語言對蘇聯歌功頌德。顯而易見，歌頌建立「烏克蘭共和國」。

不過，舒利金在基輔也遇到了強烈反對本土化政策的人。在從基輔到莫斯科的火車上，他聽到有人批評烏克蘭化。「我的幾個小女兒應該學一種對她們有點用的語言。你說說看，烏克蘭語能有什麼用！」[283](#)一個猶太人女子說，她生於烏克蘭，但現在住在莫斯科。舒利金很高興能在基輔的街頭聽到有人說俄羅斯語，認為這不單反映著烏克蘭化方案的失敗，還反映著布爾什維克統治的失敗。事實上，不管布爾什維克政府有多賣力把城市名字和商店招牌改為烏克蘭語，或有多麼賣力把烏克蘭語引入教育系統，但眾人用來交談的主要還是俄羅斯語。

語言烏克蘭化缺乏進展的情形在俄羅斯裔和高度俄羅斯化的工人階級中間尤其嚴重，讓舒姆斯基耿耿於懷，他原是烏克蘭社會革命黨

中鬥爭派的成員，後來加入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二〇年代初期成為烏克蘭的教育委員²⁸⁴。一九二五年，在史達林讓卡岡諾維奇掌管烏克蘭黨部幾個月後，舒姆斯基上書籲請史達林對工人階級進行烏克蘭化，並把黨部負責人換成丘巴爾；丘巴爾是烏克蘭裔，也是當時烏克蘭政府的領導人。舒姆斯基一直對烏克蘭化的進度緩慢感到不快，多次要求卡岡諾維奇把烏克蘭化政策從黨部和政府延伸至工人階級，皆未獲搭理。那個讓舒利金感到愉快的現象卻讓舒姆斯基感到震驚：雖然基輔的商店招牌和許多報紙都是使用烏克蘭語，但民眾主要還是用俄羅斯語交談。

卡岡諾維奇這邊也向史達林投訴舒姆斯基。一九二六年四月，史達林寫了一封信給烏克蘭政治局，表明自己支持卡岡諾維奇的立場。信中，他指出舒姆斯基犯下兩大錯誤。第一個錯誤是不懂黨部和政府的情況不同於工人階級。有鑑於這種不同，烏克蘭化在黨部和政府必須按原定計畫繼續進行，但在工人階級中間必須停止。「我們絕不可強迫俄羅斯工人集體放棄俄羅斯的語言和文化。」史達林寫道²⁸⁵。舒姆斯基所犯的第二個所謂錯誤在於拒絕承認，因為烏克蘭黨部的本土幹部太少，烏克蘭化政策現在都是由知識分子主持，所以很可能會讓烏克蘭化變成「一場讓烏克蘭文化和社會疏離於全聯盟文化和社會的戰爭，一場反對俄羅斯文化戰及其最高成就—即列寧主義—的戰爭」。

史達林的信不是要攻擊烏克蘭化政策本身，而是堅持不能在工人階級強推這種政策，造成他們離心。同樣重要的是，烏克蘭化的推行必須小心翼翼，避免引起烏克蘭公眾對俄羅斯的不滿。為保證這些任務的完成，史達林命令卡岡諾維奇加快文化上烏克蘭化的步伐。一九二六年五月，烏克蘭中委會批准了一批相關的新法令，並由卡岡諾維奇本人親自監督法令的落實。一九二七年，犯上的舒姆斯基被撤去教育委員之職，由老布爾什維克戰士斯凱里波尼克接替。斯凱里波尼克將用他全部的布爾什維克熱忱和信念推動烏克蘭化政策。

正如黨的法令，烏克蘭化應該在兩個方面進行：一是大量，對地方幹部的招聘，另一是讓既有的機關在語言上烏克蘭化。第一個趨勢

反映在烏克蘭裔黨幹部的大舉增加。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間，烏克蘭裔在黨幹部中間變成了多數，占比從百分之三十七增至百分之五十二。與此同時，俄羅斯裔幹部掉至百分之三十，而猶太人—烏克蘭第二大少數民族—的百分比基本上保持不變，從百分之二十下降至百分之十八。這個對黨的烏克蘭化行動由卡岡諾維奇親自領導，他以烏克蘭語向一九二七年的中委會報告此事。

烏克蘭語報紙的比例也是大幅增長，從一九二五年的百分之四十增至一九二七年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這期間，烏克蘭語書籍的占比也從百分之四十上升為百分之五十四。黨和政府官員學習烏克蘭語的壓力愈來愈大，因為卡岡諾維奇發出威脅說，要是誰沒有學好烏克蘭語就要開除誰。超過二百五十人因此丟了工作。文化烏克蘭化在教育領域的表現最為搶眼：到了一九二〇年代晚期，有近百分之九十八的烏克蘭裔小學生在課堂上是用烏克蘭語學習。烏克蘭化的驅力也影響了大學的教學，如科學和高級文化的領域，烏克蘭語課程的占比在一九二七年是百分之三十三，至一九二九年提高為百分之五十八。

不過，在基輔的街頭，烏克蘭化政策殊少效用。因為烏克蘭化對工人階級的影響甚少，所以大眾交談時十之八九還是用俄羅斯語。這又導致了那些離開村莊到城市打工的烏克蘭農民逐漸被俄羅斯化。阻力還來自那些已經俄羅斯化的烏克蘭人，尤其是少數民族，他們是烏克蘭人口中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舒利金有機會在一九二八年再訪基輔，八成會發現街頭的情況差別不大——一九二八年是卡岡諾維奇離開烏克蘭的一年，也是黨中央全力推動烏克蘭化的最後一年。

本土化政策在不同的共和國意味著不同的事情，這是因為各地的文化發展參差不齊，文化菁英和公眾能夠被動員起來支持本土化政策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在烏克蘭和喬治亞，黨中央必須調整政策以適應眾人爭取文化與政治自治愈來愈高的呼聲。但在其他地方，文化政策是由上向下強加，是一種硬性規定。這時期，莫斯科忙於創造新的民族實體，大力推廣用書面語尚未創造出來的當地語言教育在地菁英，發展尚未存在的在地文學。尤其是在北方民族，以及在北高加索和中

亞一些民族。在前帝國的西部邊區，受益於莫斯科民族打造政策最多的是白羅斯人—在帝國時期，它是三位一體俄羅斯民族的基本一環。

布爾什維克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宣布白羅斯共產黨和白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當時德軍剛撤出。根據由俄羅斯代表白羅斯簽署的《里加條約》（一九二一年），這個共和國把一半以上的領土讓給了波蘭。雖然只剩下以明斯克為中心的一片狹長土地，白羅斯對莫斯科來說仍然是不可少，因為靠著它，可以遏制由畢蘇斯基領導的新波蘭國家在烏克蘭和白羅斯創建保護國的野心。為了不讓波蘭人有可乘之機，蘇聯必須承認白羅斯人為一獨立的民族。這是蘇聯領導層特別是史達林已經準備好踏出的一步，哪怕此舉會受到它負責控制該地區的幹部的抗議，他們都相信「單一俄羅斯民族」觀念。

在第十次黨代表大會上，閉幕於《里加條約》簽訂的幾天前，史達林竭盡所能讓那些不相信白羅斯人是獨立民族的黨官員閉嘴。他訴諸的是烏克蘭人的例子和歷史的必然軌跡。他告訴與會代表：「我聽到有人說，白羅斯民族這回事是我們共產黨人杜撰出來。這不是事實，因為白羅斯人有自己的語言，而這種語言和俄羅斯語不同。因此，白羅斯文化只能靠自己的語言得到提升。大約五年前也有人就烏克蘭民族說過一樣的話。直到不久之前，仍然有人說烏克蘭共和國和烏克蘭民族是德國人弄出來的把戲。然而，現已清楚的是，烏克蘭是一個民族，而幫助它發展自己的文化是共產黨人的責任。我們不能和歷史軌跡背道而馳。」[286](#)

當局對白羅斯民族的界定是根據人類學家和語言學家的研究，特別是根據卡爾斯基於一九一七年出版的民族學地圖。根據該地圖，蘇聯境內的白羅斯人不單存在於屬於白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明斯克一帶，還存在於莫吉廖夫、維捷布斯克、戈梅利和斯摩棱斯克一帶，而這些都是俄羅斯聯邦的土地。卡爾斯基地圖是蘇聯的民族工程師之所本，因為他們相信，如果讓波蘭人對白羅斯不敢小覷，就必須擴大其疆域。因此，莫吉廖夫和維捷布斯克在一九二四年被劃入白羅斯共和國，讓其人口一下子增加一倍，從一百五十萬人突增為三百五十萬

人。戈梅利在一九二六年被劃入白羅斯。不過，斯摩棱斯克始終留在俄羅斯，因為這地區自一六五四年便一直是莫斯科沙皇國的一部分。

很多時候，這種領土轉移不僅沒事先諮詢當地居民，甚而有違他們的意願。因為有些操白羅斯語的居民是認同於俄羅斯。和史達林是親密盟友兼親戚的葉努基澤談到這些情況時指出：「這對當地人口是一個打擊，而我能夠理解白羅斯人的恐懼。他們的孩子對俄羅斯語的掌握勝過白羅斯語，而且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我們是在犧牲這些人的利益.....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是受政治考量的指導：我們必須擴大白羅斯，讓外國不敢小看它。」²⁸⁷

不過，在莫斯科的外交政策考量中，擴大白羅斯領土的計畫不純粹是防衛性質。有鑑於《里加條約》讓白羅斯失去許多土地，這個計畫還帶有強烈的進攻成分。正如烏克蘭的情況一樣，布爾什維克希望把白羅斯粉飾成為民族復興的燈塔，讓波蘭境內的白羅斯人受其吸引。白羅斯化政策是在一九二一年初，就在簽訂《里加條約》的幾個月前首次成為黨的方針。該年一月，三十二名白羅斯共產黨人發表了一項聲明，呼籲把白羅斯分散開來的領土統一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並在共和國的教育和文化生活上推行全面的白羅斯化。當時，白羅斯語、俄羅斯語、波蘭語和意第緒語同屬共和國的官方語言。而作為共和國最大的民族，白羅斯語被賦予首要地位，並合法化蘇維埃白羅斯的創建和存在。

一九二三年四月的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把本土化政策定為官方政策，讓白羅斯化的推力大大增強。在白羅斯，本土化的舵手是伊赫納圖斯基，此君原是白羅斯社會革命黨成員，一九一九年加入布爾什維克，一九二〇年成為白羅斯的教育人民委員，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之間掌管白羅斯中央委員會的宣傳部，一九二八年後擔任白羅斯科學院院長。伊赫納圖斯基的前布爾什維克生涯和他的烏克蘭同僚舒姆斯基並無不同，因為後者也屬於社會革命黨的左翼，是領頭的民族共產主義者。

由伊赫納圖斯基及其在白羅斯民族共產黨人中的盟友所推廣的白羅斯化，類似於在鄰國進行的烏克蘭化，而結果也類似：在把本土幹部吸收進新政權各機關一事上表現甚佳，在文化層面去「轉變」城市民眾這一點乏善可陳。在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七年之間，白羅斯共產黨的白羅斯裔幹部增加了兩倍多。自白羅斯布爾什維克的主要報紙在一九二七年改為以白羅斯語發行之後，以白羅斯語作為官方宣傳主要用語的進展取得顯著進步。即便如此，白羅斯的語言和文化仍然沒能做到獨霸印刷媒體的程度：在當時發行於共和國境內的九份報紙中，有四份是用俄羅斯語，三份用白羅斯語，用波蘭語和意第緒語的各一份。

白羅斯語推廣者不僅在工人階級和黨機關遇到阻力，也在教育系統中遭遇到。問題的根源是白羅斯人，特別是操白羅斯語者在城市占比偏低。一九二二年，猶太人占了白羅斯大學學生總數的百分之六十，而白羅斯人只占百分之三十一。黨官員決心改變這種局面，方法是把學不會白羅斯語的學生開除，又設法把白羅斯裔大學生的比例拉高至近百分之六十。這種對白羅斯人的厚待意味著對猶太人的歧視，他們占白羅斯城市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六十，而在大學的占比也會相當。強制推廣白羅斯語的措施，還有強勢扶持多半來自農村的白羅斯人學生的做法，常常引起城市居民的負面觀感，他們很多人從一開始就對白羅斯化政策心存疑慮。

就像革命時期一樣，一九二〇年代中央政府在前帝國西境的民族政策主要是受波蘭問題的形塑。但此中仍然有一個重大區別：在一九一七年之前，在地人口是被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旗幟動員起來，目的是對抗波蘭人的威脅，但這一次的動員力量卻是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的民族主義。到了一九二〇年代晚期和一九三〇年代初期，中央政府的戰略將發生進一步的演變：其時，地方民族主義會被擱到一邊，部分被傳統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一種變體所取代。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舒利金在和一個蘇聯人談話時，聽到了一個反對本土化政策的論證。這論證既政治正確又有效：「在我看來，弄

出許多小小的民族就是在通向國際主義的道路上設下障礙。同一種語言涵蓋的人數愈多和地域愈大，要過渡到國際主義就愈容易。雖然黨暫時同意設立獨立的共和國，讓它們說各自的語言。不過，每一個道地的共產黨人員都應該設法恢復俄羅斯語在日常生活的支配地位，讓它成為蘇聯全境的主要語言。」 288

很多反對本土化政策的黨官員不同程度上也是這種思路。民族議題在黨內鬥爭是一件熱門利器，例如，所謂「左派反對派」的領導人季諾維也夫就攻擊史達林把烏克蘭化搞得太過火。但史達林不為所動，繼續允許烏克蘭化大步前進。這種政策在一九二五和一九二六年維持不變，官方也沒有重新評估大國沙文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威脅孰輕孰重—前者繼續被視為主要威脅。但不出幾年後，蘇聯的民族政策開始改變，變得更靠近季諾維也夫對本土化的批評而不是史達林對它的辯護。諷刺的是，這個轉變是從史達林解決掉季諾維也夫這個政治對手之後開始。一九二七年秋，季諾維也夫被開除黨籍，罪名是從事反黨活動。一起被開除黨籍的還有托洛茨基、卡米涅夫和他們的支持者。一九二八年，卡岡諾維奇被召回莫斯科。烏克蘭化的戲就此唱完。

戰勝「政治局」內的對手意味著史達林較用不著加盟共和國的支持，無須再用民族問題上的讓步去討好它們的領導人。GPU奉命去準備對有舊時代背景的知識分子進行第一次大審。這次被抓的人被誣為一個所謂「改變地標」運動的成員，往往是些有著民族意識的老幹部，善於利用本土化政策來推進自己民族的利益。史達林和他派到各共和國的新領導人使出渾身解數營造一種印象：在民族政策上，他們不打算追隨新近被他們打敗的反對派的腳步。但實際上，他們已經準備好給本土化踩煞車和開闢一條鬥爭地方民族主義的新戰線。

黨領導層的權力變化只是民族政策發生改變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要到蘇聯的邊界之外尋找。列寧當初制定的民族政策是著眼於世界革命，是考慮到這可以讓未來出現在歐洲和亞洲的共產國家會願意加入蘇聯大家庭。但一九二〇年代晚期的史達林卻沒有這種幻想。就

像當時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那樣，史達林相信，蘇聯想要在資產階級敵國的環伺下求生存，唯一能靠的只有自己。

一九二六年，蘇聯西面邊界以外發生了兩起保守派政變：第一次政變讓布爾什維克的宿敵畢蘇斯基得以在波蘭當權，第二次政變則讓斯梅托納得以在立陶宛建立獨裁政府。史達林和其他黨領導人在公開談話時開始談到，蘇聯和西方和平共存的日子也許即將結束。這引起了戰爭恐慌，人人紛紛囤積糧食和消費品。史達林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宣稱，蘇聯政權面臨的主要威脅是發生一場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翌月，英國情報部門突擊搜查了蘇聯設在倫敦的貿易公司「全俄合作協會」，找出證據證明，蘇聯以該貿易公司作為掩護，搜集有關英國的情報。英國政府宣布中斷它和蘇聯建立不到三年的外交關係。

戰爭看似一觸即發，但紅軍將領一致表示國家的備戰工作尚未完成。祕密警察發現邊區的農民對政府愈來愈不滿，盼著白軍、波蘭人或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到來。這種局面讓很多人擔心，即將在一九二七年秋天上場的蘇聯十週年國慶也許會是它的最後一次國慶。戰爭恐慌後來雖然過去，卻對蘇聯的政策產生重大影響。許多學者認為，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之間的戰爭恐慌歸咎於史達林的專制（最終成了獨裁統治）、蘇聯經濟現代化的開啟，以及工業化和集體化改變了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國的關係。各加盟共和國繼續保有自己的共產黨結構和新生的議會，稱為「最高蘇維埃」並支持當地文化，但重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決策權愈來愈出自莫斯科。這些決定將會蠶食各共和國統治階層的自主權，最終將被整合成一個巨大的金字塔管理中心，並從全聯盟中心發出。

大約同一時間，莫斯科政府在民族政策上變得更小心謹慎，儘量不推行可能會讓大多數俄羅斯人離心的政策。它也不再認為，非俄羅斯人的文化和政治動員是它可藉以動搖接壤國家和在中歐及西歐引發世界革命的工具，反而愈來愈擔心這些動員會被外國拿來充當侵略蘇聯的據點。這種威脅，不管是真實也好，是幻想出來也好，成為推動黨中央重新檢討西部邊區民族政策的主要因素。非俄羅斯民族主義得

到的支持因此被削減，以防它們會被西方特別是波蘭所利用而對中央不利。

把民族政策和國際形勢的連動性表現得最明顯的莫過於「蘇維埃白羅斯」。這個國家的民族政策更多是為了回應國際壓力而非國內需要。隨著一件和白羅斯直接有關的事件，戰爭恐慌在一九二七年六月達到高峰：蘇聯駐華沙大使伏伊科夫遇刺身亡。刺客卡韋達是個十九歲的大學生，隸屬一個親波蘭的白羅斯人組織。就這樣，波蘭境內的烏克蘭和白羅斯民族主義一瞬間在蘇聯眼中從一個機會變成一個威脅。許多黨官員開始懷疑，英國正在策動與蘇聯接壤的國家反對蘇聯，而這些國家又利用反共產主義的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白羅斯人和波蘭人組織動搖蘇聯國家。

一九二八年，莫斯科派烏克蘭領導層的札通斯基前往白羅斯，視察民族政策的執行情況。作為一個善觀風向的「公司人馬」，札通斯基交出的是一份充滿殺傷力的報告。他聲稱，黨隊伍中的白羅斯文化復興運動領袖都是把目光放在農村的狹隘世界，而且很多都和非共產黨人的知識分子過從甚密，其中很多是最近才從波蘭流亡而來。札通斯基對白羅斯民族政策的批判導致了對白羅斯黨機關、政府機關和科學院的整肅，目的是把民族主義根除。一九二九年年底，教育委員巴利茨基和黨新聞部負責人阿達莫維奇以進行民族主義的罪名被革職。加起來有近百分之十的黨幹部被撤職。其中許多人將會在開始於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的另一次整肅中被捕和被判處長期監禁。一個受害者是白羅斯化政策的設計者之一，也是科學院院長的伊赫納圖斯基。他在一九三〇年去職，一九三一年自殺，預示著一些烏克蘭本土化運動領袖的命運—他們在幾年後將會落入與他一樣的處境。

烏克蘭化在莫斯科的眼中沒有好多少，札通斯基批評白羅斯時認為它是對烏克蘭有樣學樣。一九二九年秋天，在白羅斯本土化政策的領軍人物紛紛被拉下馬的同時，GPU對許多有舊時代背景的知名烏克蘭學者和教育工作者開刀，指控他們是民族主義者，進行了一場廣為宣傳的大審。共有四百七十四人被指稱為子虛烏有的「烏克蘭解放聯

盟」的成員，串通好畢蘇斯基和流亡西方的烏克蘭人要在烏克蘭發動一場起義，使其從蘇聯分離出來。包括烏克蘭科學院副院長葉夫列莫夫在內，四十五位被告罪名成立，被判關進勞改營，刑期從兩年至十年不等。格魯舍夫斯基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和流放。他將會在一九三四年死於俄羅斯，死因可疑。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在討論一批政策時（這批政策將會在幾星期後導致「烏克蘭大饑荒」，讓近四百萬人餓死），史達林攻擊在一九二七年取代舒姆斯基成為烏克蘭教育委員的斯凱里波尼克，指他大力推行烏克蘭化是一種反黨行為。史達林指出，農民會反抗農業集體化和一九三二年的穀物收購政策，都是畢蘇斯基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間諜在背後煽動。接下來幾年，史達林和他的宣傳機器將會宣稱，烏克蘭化政策一直受到外國特務和民族主義者的劫持，利用它來不利於黨，以之離間廣大農民和莫斯科的關係。

政治局下令停止對烏克蘭境外進行烏克蘭化，所謂的「烏克蘭境外」主要是指俄羅斯聯邦的庫班和遠東地區，都擁有可觀的烏克蘭裔人口。這一決定導致報紙、學校和教師培訓機構被關閉，最終又導致幾十萬烏克蘭裔被俄羅斯化。在烏克蘭，史達林把黨和祕密警察的負責人換成自己人馬。除了對俄羅斯化無產階級的措施喊停，他也終止了對隸屬蘇聯部會的機構和企業的人員的俄羅斯化。烏克蘭大饑荒就發生在史達林動手對付烏克蘭政治菁英和烏克蘭語言及文化之時—這種「湊巧」讓今日很多人認為大饑荒是一個種族滅絕陰謀，除了是要剷除農民，還要剷除整個烏克蘭民族。

烏克蘭化政策的終止和對黨官員及知識分子的整肅導致了一波逮捕潮，期間有多位知名的烏克蘭政治和文化人物自戕。斯凱里波尼克由於擔心被捕，一九三三年七月自殺身亡。兩個月之前，作家暨詩人赫維廖維飲彈自盡：早在一九二六年，史達林便抨擊他煽動烏克蘭作家背離莫斯科、心向西歐。舒姆斯基在一九三三年被捕，罪名是包庇赫維廖維，他將在一九四六年由史達林下令謀殺：祕密警察在半夜進入他的火車廂，用可以讓他看似死於心臟病的毒藥將他毒殺。

在烏克蘭和白羅斯，本土化政策的喊停帶來了本土語言和文化發展的停滯，而這個時候又正值愈來愈多農民因為農業集體化政策而被迫離開農村，遷入城市。這些為數幾百萬操烏克蘭語或白羅斯語農民受迫於大環境的壓力，被轉化成講俄羅斯語的工人或知識分子。烏克蘭和白羅斯農民在一九三〇年代的俄羅斯化速度是帝國時代的民族工程師連想也不敢想。

但語言和文化上的俄羅斯化並未讓幾百萬烏克蘭和白羅斯的城市新住民成為俄羅斯人。在官方的認定裡，他們仍然是非俄羅斯人，受到的也是非俄羅斯人的對待。他們的語言和文化將繼續存在，雖然明顯是處於一種從屬地位。本土幹部繼續會被吸納到黨部，也繼續有可能晉升到高位。扶持本土幹部的政策一直維持到一九三〇年代。這一類政策鼓勵了一些不諳或不大懂烏克蘭語或白羅斯語的俄羅斯裔在報戶口時把自己說成是所寄居國家的主體民族的成員。他們其中一個是布里茲涅夫，他出生於烏克蘭小城卡緬斯科耶，雙親都是俄羅斯人，但他選擇當烏克蘭人。當他在一九六四年成為共產黨頭頭和最有勢力的蘇聯領袖之後，官方文件將會改說他是俄羅斯人。本土化政策的矛盾遺產將會持續回響幾十年。

281 Vasilii Shulgin, *Tri stolitsy: Puteshestvie v krasnuiu Rossiiu* (Moscow, 1991), 417.

282 同上，100.

283 同上，204.

284 即教育部長。

285 Terry Martin,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 (Ithaca, NY, 2001), 214, 216.

286 *Desiatyi s'ezd Rossiisko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Moscow, 1921), 213.

287 Anders Rudl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Belarusian Nationalism, 1906-1931* (Pittsburgh, 2015), 140.

288 Shulgin, *Tri stolitsy*, 207.

第十五章 俄羅斯的復返

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日，蘇聯第一大報《真理報》頭版登出一幅史達林的照片，它後來成為了最為人熟悉的史達林肖像之一。照片中，這位獨裁者面帶微笑，抱著一個剛獻給他一大把鮮花的快樂小女孩。這張照片被廣為轉載，出現在蘇聯的眾多報紙、雜誌和海報上。同一幕還被塑成五公尺高的雕像，擺設在莫斯科地鐵站，上書：「為我們快樂的童年謝謝您，史達林同志。」《真理報》的照片除了把史達林呈現為蘇聯幸福大家庭的慈愛家長，還把他提升為蘇聯各族人民的父親。

照片中的小女孩是布里亞特人，是西伯利亞原住民的最大一支。照片發表的三天前，即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史達林、他的主要副手暨內閣總理莫洛托夫²⁸⁹和其他蘇聯領導人在克里姆林宮接待布里亞特—蒙古自治共和國的代表團。歡迎儀式隆重莊嚴，其中一環是向該地區的工人和農民贈送禮物。儀式進行到一半時，布里亞特共和國農業委員的六歲女兒吉莉亞·馬爾基佐娃因為聽膩了集體農場農人的冗長發言，突然站起來，提著媽媽準備的兩籃鮮花，向前面走去。別人問她要去哪裡，她回答說：「找史達林。」看見她走過來，史達林把她抱起來，讓吉莉亞雙手鉤住他的脖子。一個蘇聯攝影師用相機捕捉住這一刻。

高規格接待布里亞特—蒙古代表團有著特別用意。雖然這個位於貝加爾湖附近的自治共和國人口不到五十萬—蘇聯的總人口是一億五千萬，卻對莫斯科有著重大戰略意義。該共和國和滿洲國接壤，而滿洲國是日本控制的傀儡。蘇、日發生過許多邊境事件，關係一向不睦，隨著日本和納粹德國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簽署了針對蘇聯的《反共產國際協定》，蘇日關係更是降至新低點。克里姆林宮把布里亞特人的領導層找到莫斯科，是為了顯示它重視該地區，以此確保其民眾對史達林政權的忠誠。

上述的《真理報》照片是搭配一篇題為〈各族人民組成一家人〉的文章。文章把布里亞特人的民族解放歸功於「十月革命」，把他們的經濟發展歸功於農業集體化，並強調俄羅斯人在這兩件事情上扮演的角色。未署名的文章作者這樣說：「靠著俄羅斯無產階級的積極協助，布里亞特—蒙古走上了進步的道路，取得了進一步發展和民族文化壯大的各種的可能性。」²⁹⁰布里亞特—蒙古共和國有約一半人口是俄羅斯裔或東斯拉夫裔，三分之一是布里亞特人，他們定居在蒙古、蘇聯和滿洲國三者邊界的蒙古裔社群的一部分。為加強該地區的安全，必須同時確保布里亞特—蒙古共和國內俄羅斯人和布里亞特人的忠誠，《真理報》就是為了協助達到這個目的而寫。

除了為俄羅斯與該共和國的關係背書，文章又稱讚俄羅斯人是蘇聯的領頭羊民族，猛烈抨擊那些質疑俄羅斯人這個角色的人。「這個民族曾把羅蒙諾索夫、羅巴切夫斯基、波波夫、普希金、車爾尼雪夫斯基和門捷列夫這些天才人物帶給世界，也曾帶來過列寧和史達林之輩的人類巨人。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下，這民族曾籌備和執行十月的社會主義革命—只有那些說話不負責任的人才會稱這樣一個民族為『奧勃洛莫夫之流民族』。」²⁹¹奧勃洛莫夫是十九世紀一本小說的角色，人格特徵是懶惰和優柔寡斷。把奧勃洛莫夫和俄羅斯民族扯上關係是列寧起的頭，因為他把俄羅斯人的歷史和民族性格的負面特徵形容為深具奧勃洛莫夫色彩。

雖然《真理報》的攻擊不是直接針對列寧而發，仍然標誌著布爾什維克對待俄羅斯人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轉變。這是高度權威的《真理報》歷來第一次不是把俄羅斯人，特別是在革命前的俄羅斯人，當成帝國主義民族和剝削者，而是呈現為一個文學和文化名人的民族。除了帶來十月革命，俄羅斯民族也帶給了世界列寧和史達林這樣的巨人（事實上史達林並不是俄羅斯人而是喬治亞人）。因此，俄羅斯民族在蘇聯的所有民族中鶴立雞群，身負帶領其他民族走向共產主義光明未來的使命。任何不同意此說者都將會被斥為「不精通列寧主義而只愛天花亂墜的人」。

《真理報》會稱讚俄羅斯人是蘇聯各族人民的領頭羊，既是受到蘇聯與德、日愈來愈緊張的關係所促使，也是史達林與黨內對手鬥爭的白熱化使然。不過，這位蘇聯領導人會重新評估俄羅斯民族在帝國歷史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扮演的角色，卻是醞釀已久。

從一九三〇年審判所謂的「烏克蘭解放聯盟」成員開始，黨中央不遺餘力打壓烏克蘭和白羅斯的民族主義，終結了把大國沙文主義看成對政權主要威脅的官方政策。類似的審判也在俄羅斯本身上演，被稱為「學院案件」：一九三〇年，學院人士普拉東諾夫和其他老派俄羅斯歷史學家被指控為君主主義者和俄羅斯民族主義者。但與有超過四百人涉案的烏克蘭案件不同，「學院案件」只有近一百人被捕。另外，一般大眾只能在新聞片中看見審判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的經過，換言之，審判不公開。但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審判卻是開放給民眾旁聽，而且事前大肆宣傳。透過這種對比，蘇聯宣傳機器用響亮而清晰的聲音向社會發出一個信號：非俄羅斯人的民族主義才是蘇聯政權的主要威脅。

一九三〇年，史達林和他在政治局的人馬開始採取步驟，不再把革命前俄羅斯的一切都說成負面的一貫作風。當年十二月，史達林為首的書記處做成決議，譴責蘇聯著名諷刺作家「窮人傑米揚」²⁹²——他曾經把俄國農民抵制集體化的現象歸咎於傳統俄羅斯人的懶惰和落後。決議指出：「他所犯的錯誤在於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律詆毀『俄羅斯』和『俄羅斯事物』」²⁹³，認為他事實上不僅攻擊不肯集體化的農民，還攻擊了「最積極和最具有革命精神的全球工人階級的分遣隊」，即俄羅斯工人。而試圖給他們戴上「懶骨頭」的帽子注定只能是一種粗糙的謬誤。在寫給傑米揚的親筆信中，史達林指責他「誹謗我們的人民，詆毀蘇聯，詆毀蘇聯的無產階級，詆毀俄羅斯的無產階級」²⁹⁴。

把非俄羅斯人民族主義視作蘇聯主要威脅的政策在一九三四年一月的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中完全定案。史達林斷言：「這種偏差會在眾人停止鬥爭它和允許它發展到威脅國家的程度時構成主要危險。」

295他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直到很近期，在烏克蘭出現的烏克蘭民族主義偏差仍然沒有構成主要危險。不過，當眾人停止鬥爭它，允許它發展到與干涉主義者緊密相關時，這偏差便會危及國家。」他沒有提俄羅斯沙文主義。史達林和黨在大會後幾個月所做的決定表明，黨準備要為帝俄時代俄羅斯民族主義的一些元素做出平反。

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委會決定籌備普希金逝世一百週年紀念活動，這位詩人前十年備受官方冷落。換言之，有賴反對帝國和沙皇而奪權和有賴攻擊帝俄歷史而建立聲譽的布爾什維克，如今開始自視為沙皇的文化打造和國家打造傳統的延續者。一九三四年六月，在中委會一紙命令下，自一九二〇年代被廢除的歷史課程在學校裡重新開張。幾個月前，在政治局一個討論歷史教科書的特別會議中，史達林決定增加「蘇聯歷史」這門新課程，又要求這門課要特別強調俄羅斯的歷史使命：「在過去，俄羅斯人聚集了其他人民。現在，它又開始了一個類似的聚集。」296帝俄時代的歷史重新獲得青睞，與之一起重新受到重視的是「祖國」（motherland）概念，因為這對打造俄羅斯民族主義至關重要。

《真理報》在題為〈支持祖國〉的文章中報導了恢復歷史課程的決定。它宣稱，愛祖國是蘇聯公民的主要美德之一。與這個被平反概念配對的是另一個關鍵的史達林概念：叛國。「誰舉起手反對祖國誰就是背叛，凡背叛者必須被消滅。」297負責高舉黨旗的《真理報》這樣砲聲隆隆地說。但這樣的說法卻違背了共產主義祖師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態度，因為他們曾在共產主義的奠基文件《共產黨宣言》（一八四八年）宣稱：「工人無祖國。」為了自圓其說，《真理報》指出，馬克思主義兩位創始人的著作是寫於俄國革命以前，而俄國革命大大改變了工人的處境，也賦予了他們一個祖國（fatherland）。這種論證方式是由史達林首開先河，因為他曾在一九三一年公開表示：「在過去，我們沒有也不可能有一個祖國。但現在，既然資本主義已經被推翻，權力已經屬於人民，我們便有了一個祖國，也將會捍衛它的獨立性。」

史達林還直接批評恩格斯的思想。在〈俄羅斯沙皇國的對外政策〉（一八九〇）一文，恩格斯曾宣稱俄羅斯帝國「同時是歐洲反動勢力的中流砥柱、最後堡壘陣地和後備大軍」。史達林認為此文有很多可議之處。他在寫信給中央政治局成員的信上說：「沙皇統治的俄羅斯是全歐洲（乃至亞洲）反動勢力的強大堡壘之說不容懷疑，但它是不是這些勢力的最後堡壘也許有再商榷餘地。」²⁹⁸史達林把文章的這些可議處稱為「缺點」，又把整篇文章形容為「片面」—這還是蘇聯有人批評恩格斯的頭一遭。但史達林拒絕把他的信登在黨的主要理論刊物《布爾什維克》，以防它會被看成官方路線。史達林的拒絕在當時被接受了，文章沒有發表。

史達林的修正主義措施反映著希特勒在德國的崛起是如何影響著他對民族和民族主義問題的想法。德國對布爾什維克而言是個無比重要的國家。在一九三三年的大部分日子裡，儘管希特勒的反共產主義言論極為惡毒，史達林仍然設法維持蘇聯和德國在前十年所建立的密切經濟聯繫，甚至想要維持政治聯繫。但他到一九三三年年底終於明白，希特勒沒興趣和他合作。他也看出，德國除了是蘇聯一個心腹大患，也是一個值得效仿的對象。希特勒用發狂似的民族主義把全德國團結在他四周這一點讓共產黨的領導層印象深刻。隨之而來是蘇聯對內和對外政策的一系列變化。

希特勒振奮、團結和動員了德意志民族。但又有哪個民族是史達林可動員的？是俄羅斯人？蘇聯人？無產階級？如果說答案是「以上皆是」，那麼，這三種成分又應該是什麼關係？有一段時間，這個問題不得其解，然後，隨著時光流轉，史達林和原是他老盟友的死對頭布哈林發生了意見分歧。布哈林在一九二九年便被逐出黨的領導層，但一九三四年初被任命為蘇聯第二大報《消息報》的總編輯，得以重返公眾舞台。雖然堅定信仰國際主義和反對一切民族主義，包括俄羅斯民族主義，布哈林在一九三四年七月談到黨中央恢復歷史課程的決定時，卻是謹守黨的路線，讚揚了「蘇聯祖國」和「蘇聯愛國主義」

的概念。不過，他對後者的定義又是充滿國際主義色彩：「愛工作、愛文化和愛人類的歷史前途，也愛這時代的所有最崇高觀念。」 299

布哈林是「蘇維埃人」（Soviet people）概念的主要推手之一，而他心目中的蘇維埃人並無任何民族色彩。所以，他喜歡攻擊那些他認為是俄羅斯人或蘇維埃其他民族的負面特徵。史達林對此感到不快。一九二九年，史達林寫了一篇重要文章，反對那些認為一個國家各民族有可能在世界革命成功前便融為一體的主張。史達林力主，民族是形成於「十月革命」之前，也繼續存在於革命勝利之後；蘇維埃人是一個由各族人民構成的大家庭，而負責團結和領導他們的是俄羅斯民族。他不止一次公開把俄羅斯人和蘇維埃人當成同義詞使用，然後隨著時光流轉，他又開始把俄羅斯人看成蘇維埃人的精粹部分。一九三三年七月，在一個作家會議上舉杯祝酒時，他說：「敬蘇維埃人，敬最蘇維埃的民族，敬那個比任何其他民族更早帶來革命的民族。」接著又補充說：「有一次我告訴列寧，俄羅斯人民是最優秀的人民，是最蘇維埃的民族。」 300

對史達林而言，攻擊蘇聯的俄羅斯人乃至攻擊歷史上的俄羅斯人，都等同於攻擊全部的蘇維埃人。他第一次對布哈林和負面對待帝俄的布爾什維克傳統開砲，是在《真理報》那篇報導克里姆林宮接待布里亞特人代表團的文章³⁰¹。導火線是布哈林在《消息報》紀念列寧百歲冥誕時，藉著列寧說過帝俄時代的俄羅斯人流露出奧勃洛莫夫的一些人格特徵，把俄羅斯人稱作一個「奧勃洛莫夫之流民族」。史達林在《真理報》的回應讓人再無懷疑，黨的政策已經有所改變。在一九二〇年代會得到列寧本人或布哈林認可的事情，至而今的一九三〇年初變成了是對列寧主義的顛覆。

激動的布哈林直接寫信給史達林，認為自己會被攻擊其實毫無道理。他說：「我很明白您（ty）〔布哈林用的是親暱的詞『您／ty』，而非拘謹的詞『你／vy』〕是在一個很高的位置上進行決策，是要為這個國家在戰爭中取得勝利進行準備，所以才會把包括偉大民族傳統在內的一切最有用的東西兼納進來。這就是為什麼『奧勃洛莫

夫之流民族』的說法會特別讓您受傷。但我別無居心，只是想要特別強調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工人階級在民族解放中扮演的角色。」³⁰²布哈林是明白史達林轉向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動機，卻沒認識到，黨在引入任何新路線時都需要找出一些「敵人」來修理，藉此大肆宣傳。史達林紆尊降貴，在布哈林的信上寫了「大寶貝」（big baby）三個字。幾個月後，布哈林被指控從事反黨活動。他在一九三七年二月被捕，一九三八年三月旋即遭槍決，罪名是受僱於外國勢力，陰謀推翻黨國，準備分裂國家。

布哈林不是史達林在一九三六年初發起的「捍衛俄羅斯史」運動的唯一靶子。下一個受害者是傑米揚，這位諷刺作家先前已經在一九三〇年因為批判俄羅斯民族傳統而被責備過。一九三六年秋天，蘇聯政府首腦又是史達林親密盟友的莫洛托夫觀賞了傑米揚編的歌劇《英雄們》。該劇拿帝俄歷史敘事的重要人物弗拉基米爾大公開玩笑，又取笑基輔羅斯的受洗。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政治局決議禁止《英雄們》繼續演出。傑米揚的劇本被認為是「企圖否定基輔羅斯是一股正面的革命力量」。它除了中傷受歡迎的俄羅斯英雄，還用「不符歷史事實和嘲弄的方式描寫羅斯的受洗。實際上，這事件在俄羅斯人民的歷史上是正面的里程碑，促進斯拉夫人和其他文化更高的人民更靠近」³⁰³。

這個決議標誌著黨的許多早期政策出現大轉彎，因為它不僅認可帝俄的象徵符號，還讚揚基督宗教，它在一九二〇年代晚期和一九三〇年代初期是黨中央發起的激烈反宗教運動的主要靶子，否定前蘇聯時代的俄羅斯人形同土匪的舊觀念。根據祕密警察的報告，禁止《英雄們》演出的決定得到藝術界普遍贊同。許多俄羅斯藝術家樂見俄羅斯的歷史和俄羅斯民族得到平反。一個演員說：「偉大俄羅斯人民的歷史不容被扭曲。」³⁰⁴據說，著名的蘇維埃劇作家特列涅夫亦表示：「該決議讓我極為開心。我以身為俄羅斯人自豪。不容許任何人往我們的臉上吐口水。」另一位劇作家韋什涅夫則說：「這是歷史給出的一個教訓：別碰我們的人民。歷史將會被證明是有用的，而且那一

天將很快來到。歌劇《米寧與波札爾斯基：把人民從干預主義者手中救出》正在籌備中。」

這裡提到的歌劇是謳歌帝俄時代的兩大英雄：波札爾斯基親王和「市民」米寧，他們是一六一二年把波蘭占領軍驅逐出莫斯科的「救世主」。十九世紀初期，帝國政府曾把兩人的雕像豎立在紅場，供人瞻仰。不過，在一九二〇年代，他們曾受到許多布爾什維克作者嘲笑，例如傑米揚便曾指控波札爾斯基親王貪汙受賄。但潮流再次逆轉：深受史達林喜愛的俄羅斯作家布爾加科夫在一九三六年夏天為這兩個舊英雄寫出了新劇本《米寧與波札爾斯基》。但這齣戲後來並未上演，因為布爾加科夫被指控把波蘭人寫得太正面，也沒有對俄羅斯人流露出足夠的愛。真正的俄羅斯愛國主義反而是在舊歌劇《為沙皇獻身》找到，其作者為帝俄時代的格林卡。它在一九三九年二月上演，大獲好評，但換上一個政治正確的劇名：《伊凡·蘇薩寧》。伊凡·蘇薩寧是劇中的主角，是一名俄羅斯農民，據稱曾為了救沙皇米哈伊爾·羅曼諾夫，而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

重獲青睞的不僅止於俄羅斯歷史和它的眾英雄，還包括前此備受布爾什維克宣傳臭罵的沙皇。他們不但出現在書籍和文章，還出現在當時蘇聯最有效的宣傳工具電影當中。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史達林在接待他的國防委員時表示：「俄羅斯沙皇.....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把一直延伸至堪察加半島的偌大一個國家搞得亂糟糟。我們繼承了這個國家。是我們布爾什維克首先把它黏合和強化為一個不可分割國家的人，我們這樣做不是為了地主和資本家的利益，而是為了造福工人，造福構成這個國家的各族人民。」³⁰⁵同年，電影《彼得一世》上映，劇本是改編自白俄流亡者³⁰⁶托爾斯泰³⁰⁷的一部小說。拍攝這電影的計畫得到史達林親自批准。

翌年，又有另一部謳歌往日俄羅斯統治者英雄事蹟的重磅電影推出。由優異的蘇聯導演愛森斯坦執導，這齣《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主要角色是被俄羅斯東正教教會封聖的涅夫斯基親王。電影把十三世紀對抗瑞典人和條頓騎士國的戰爭呈現為保護俄羅斯土地的英勇戰

爭。劇中的涅夫斯基在談到他的西方敵人時這樣說：「凡對我們動刀的，必死在刀下。」這句話後來常見於蘇聯的宣傳品，不是真的出自涅夫斯基本人，而是取材自《馬太福音》記載的耶穌之言：「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史達林不以《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為滿足，要求助手再為視西方為寇讎的沙皇恐怖伊凡拍一齣電影。俄羅斯帝國的榮耀會得到恢復，純粹是因史達林和他的圈子想要動員俄羅斯民族主義，以為一場他們認為不可避免的戰爭，對資本主義西方的大戰做準備。

一九三九年，特列季亞科夫畫廊邀請莫斯科市民和遊客參觀它龐大收藏品中的帝俄藝術精品。大眾的反應非常熱烈，因為能夠與祖國的帝國歷史重新連結起來而倍感幸福。這種感覺對老一輩參觀者而言並不陌生，卻讓自小在布爾什維克國際主義耳濡目染下的年輕一輩感到困擾，因為他們完全沒有任何俄羅斯歷史認同。十幾歲的女學生妮娜·科斯捷里納在日記裡寫道：「昨天晚上，我參觀完展覽之後走過市中心，沿著紅場步行回家。我走過克里姆林宮，走過過去處決人犯的地方，走過聖巴索大教堂，然後我突然再一次感到，我與在展覽看到的油畫有一種深深的血緣相連性，感到我是個俄羅斯人。這種想法起初讓我覺得害怕，擔心沙文主義情感是否在我心裡蠢動。但不是，那不是沙文主義情緒，我僅僅是覺得自己是俄羅斯人。當我望向安托科利斯基雕刻的彼得大帝和恐怖伊凡的宏美人像時，我因為想到自己就像他們一樣是俄羅斯人而自豪，為之潸然落淚。」 308

史達林政權對帝俄政治和文化某些方面的肯定有助於動員俄羅斯民族主義來為蘇聯服務，也有助於鞏固俄羅斯人作為蘇聯主導民族的地位。

一九三六年五月，《真理報》在社論中讚揚蘇聯各族人民的愛國心和他們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貢獻，但又特別強調俄羅斯人的作用：「在平起平坐各族人民中居先者是俄羅斯人，是俄羅斯工人和勞動者，其在整個偉大無產階級革命的作用已經非常大，從第一場勝利到今天的輝煌發展時期，他們都居功厥偉。」 309 這種論調得到曾任蘇聯

書報審查官的沃林進一步發展。一九三八年秋天，時任《歷史月刊》總編輯的他在《布爾什維克》（史達林曾經阻止恩格斯相關文章在這裡出版）發表了一篇題為〈偉大的俄羅斯人民〉的文章。他在文中寫道：「偉大的俄羅斯人民領導蘇聯各族人民為爭取人類的幸福和實現共產主義而鬥爭。蘇聯各族人民對居先民族的友誼和愛日甚一日。」
310從此之後，俄羅斯人將不僅會被稱為「平起平坐各族中的居先者」，還會被稱為「偉大的俄羅斯人民」。

蘇聯宣傳用來界定蘇維埃國家關係的官方公式是各族「人民的友誼」。但是，在官方心目中，某些族的人民卻來得比其他族的人民可靠。隨著俄羅斯人重新獲得信任，其他民族變得不被信任。黨中央準備打一場世界革命戰爭的日子已然遠去。在二戰爆發的前幾年，史達林忙著為可能的入侵備戰和清理未來前線區內的潛在叛徒—他們被稱為「第五縱隊」。這時，民族成分取代階級，成為當局區分誰是愛國者誰是叛徒的判準。

因為俄羅斯人被認為是可靠公民，那些有傳統祖居地或在蘇聯境外有大量僑民的非俄羅斯民族便被當局視為潛在的叛徒，在一波波鎮壓行動中，最高峰是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之間的「大恐怖時期」成為被鎖定的對象。史達林對黨和國家機關的整肅導致數以百萬計的人在半夜被捕，接受由一位黨官員、一位祕密警察和一位檢察官組成的「三人小組」審訊。大部分被捕者都是被送進「古拉格」集中營網絡監禁，或是送到其他偏遠地區採金、採鐵礦砂和伐木，刑期從十年到二十五年不等，沒有假釋的可能。但被送到「古拉格」還算是幸運的，因為至少有六十萬人是草草審訊後便逕行處決。整個社會人人自危，深受創傷。那些有家人被槍斃或下獄的人被貼上「人民公敵的家人」的標籤，只能過著二等公民的生活。雙親被捕的小孩會被送到領養家庭接受「再教育」。

清洗名單的第一批人是德裔、波蘭裔、日本裔或遠東裔的蘇聯公民，因為當局相信，他們可能會因為蘇聯和他們的母國發生衝突而起異心。在一九三七年的八、九兩個月，有超過五萬五千名德裔被史達

林的祕密警察逮捕和判刑。他們被指控為德國間諜。其中近四萬二千人被祕密警察的行刑隊槍決。接下來輪到波蘭人。一九三七年秋天，近十四萬波蘭裔蘇聯公民被控進行反蘇間諜活動，其中超過十一萬人被槍殺。同樣被鎖定的還有羅馬尼亞裔、保加利亞裔、拉脫維亞裔、芬蘭裔、希臘裔和其他民族的成員。加起來，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之間，蘇聯政權判處超過三十三萬五千人在所謂的「民族行動」中被逮捕，其中近二十五萬人被處死，占比百分之七十五。

大清洗的受害者包括布里亞特—蒙古自治共和國的農業委員馬爾基佐夫，也就是一九三六年一月獻花給史達林那個小女孩吉莉亞的父親。馬爾基佐夫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被逮捕，一九三八年六月被槍斃，罪名是加入一個子虛烏有的泛蒙古人組織，試圖煽動布里亞特—蒙古共和國脫離蘇聯。吉莉亞作為一個小明星的生涯在八歲那年戛然而止，此前她不斷被邀請到各學校亮相，而蘇聯各地都有小女孩模仿她的髮型。如今刻畫她和史達林抱在一起的海報和雕像繼續留著，但這個小女孩身分被宣傳機關說成是馬姆拉卡特，一個因為在集體農場表現傑出而獲頒列寧勳章的塔吉克女孩。吉莉亞寫信給史達林為父親喊冤，結果卻是害母親也被抓走。母女兩人一起被流放到哈薩克。兩年後，吉莉亞的母親去世，得年三十二歲。根據一個說法，她是死於自殺；但另一個說法卻是她被祕密警察暗殺，以防她進一步讓當局難堪。流放哈薩克期間，母女兩人仍然收藏著史達林所送的禮物和他與吉莉亞的合照。

俄羅斯在一九三〇年代的重返優越地位是以犧牲蘇聯很多其他民族作為代價。這是一個零和遊戲，開始於一九二七年可能是波蘭爆發戰爭引起的恐慌所致，並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二戰爆發前那幾個月達到高峰。這段時期很多對外政策的轉換都是由兩件事情引起：一是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初的上台，二是德日在一九三六年秋天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當時，史達林已經放棄一九二〇年代有關赤化世界的共產主義夢想，開始準備打一場兩個方向的戰爭：在西邊迎戰德國，在

東邊迎戰日本。至此，蘇聯境內的非俄羅斯民族，他們原先被視為未來世界革命的急先鋒，在史達林政權眼中變成了潛在的背叛者。確保蘇聯最大民族俄羅斯人的忠誠成了備戰工作的重中之重。

俄羅斯人會從待罪的帝國民族搖身變為蘇聯的領頭羊民族，是受到史達林在一九二〇年代晚期打敗所有政敵和在一九三〇年代大權獨攬所助長。因此，「祖國」和「愛國主義」等傳統觀念的復興，離不開史達林政權把俄羅斯國家形容為重中之重的強調。而這些立場又伴隨著恢復俄羅斯沙皇等強者崇拜，其中最明顯的是彼得一世和恐怖伊凡。儘管俄羅斯民族主義經常是穿著帝俄的外衣回到政治舞台，但一般人在一九三〇年代後期對俄羅斯人的理解卻不同於一九一七年之前：這一次，小俄羅斯人或白羅斯人並沒有被包含在「俄羅斯人」觀念中。他們現在被官方承認為獨立的烏克蘭民族和白羅斯民族。這使得二戰前階段的俄羅斯民族和一戰前階段的大俄羅斯人在族裔和領土上重疊起來。大戰的震撼將會測試俄羅斯民族的這個新定義，並測試其成員對創造它的國家有多忠誠。

289 蘇聯內閣總理的正式職稱是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蘇聯人民委員會」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後改稱「蘇聯部長會議」。「部長會議主席」類似西方國家的「總理」。

290 “Edinaia sem’ia narodov,” Pravda, January 30, 1936.

291 同上。

292 「窮人傑米揚」（Demian Bedny，一八八三至一九四五）是作家普里德沃羅夫（Yefim Pridvorov）的筆名。

293 Soviet Culture and Power: A History in Documents, 1917-1953, eds. Katerina Clark, Evgeny Dobrenko, Andrei Artizov, and Oleg V. Naumov (New Haven, CT, 2007), 69.

294 Benedikt Sarnov, Stalin i pisateli (Moscow, 2008), 495.

295 Iosif Stalin, Stat’i i rechi ob Ukraine (Moscow, 1936), 223.

296 David Brandenberger, National Bolshevism: Stalinist Mass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1931-1956 (Cambridge, MA, 2002), 34.

297 “Za rodinu,” Pravda, June 9, 1934.

- 298 Iosif Stalin, “O stat’e Ėngelsa ‘Vneshniaia politika russkogo tsarizma,’ ” Bol’shevik, no. 9 (May 1931): 1-5.
- 299 Aleksandr Vdovin, Russkie v XX veke: Fakty, sobytiia, liudi (Moscow, 2004), 78.
- 300 同上，103.
- 301 文中提到「只有那些說話不負責任的人才會稱」俄羅斯人為「奧勃洛莫夫之流民族」。
- 302 同上，89.
- 303 Viktor Danilov, Vlast’ i formirovanie istoricheskogo soznaniia sovetskogo obshchestva (Moscow, 2005), 116.
- 304 Vlast’ i khudozhestvennaia intelligentsia, eds. Oleg Naumov, Andrei Artizov (Moscow, 1999), 337.
- 305 Vdovin, Russkie v XX veke, 407.
- 306 「白俄流亡者」指一九二〇年代爆發革命及內戰後遷居國外的俄羅斯人，大多數是白軍的支持者。
- 307 阿列克謝·托爾斯泰（一八八三至一九四五年），歷史、科幻小說家，於十月革命後不久，離開俄國，僑居巴黎、柏林，一九二三年回國。
- 308 Brandenberger, National Bolshevism, 106.
- 309 同上，43.
- 310 Boris Volin, “Velikii russkii narod,” Bol’shevik 9 (1938): 34.

第十六章 偉大愛國戰爭

要怎樣找到適當的旗幟讓人傷透腦筋。蘇聯不缺紅旗或紅色布料，但在一九三九年的莫斯科，要找到一面中間有白色圓圈和卐字符號的紅旗卻大不易。希特勒上台後廢除威瑪共和國的黑、紅、黃三色旗，而以黑、白、紅三色國旗取而代之。一九三五年，他再次把國旗改為紅底，中間是一個白色圓圈圍住的卐字符號。從那之後便沒有德國高官造訪過蘇聯，所以，當納粹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臨時決定要到莫斯科一趟時，不管是外交人民委員部或是克里姆林宮的禮賓局都沒有現成的德國國旗可用。最後，他們好不容易在莫斯科一家電影公司找到一批符合需要的旗幟，而它們原本是用來拍攝反法西斯宣傳影片的道具。

里賓特洛甫的飛機降落在莫斯科機場之後，迎接他的除了卐字旗和儀仗隊，還有表情友善的蘇聯官員。八月二十四日凌晨，里賓特洛甫和他的蘇聯同僚莫洛托夫簽下互不侵犯條約。在記錄這一刻的照片中，史達林一臉幸福的表情，肖像畫裡的列寧和藹可親。《蘇德互不侵犯條約》[311](#)的簽訂標誌著國際政治形勢重大改變，意味著蘇聯把英國和法國甩到一邊。

希特勒和史達林在條約中約定如何瓜分波蘭和東歐其餘地區。瓜分行動隨著德國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攻擊波蘭揭開序幕，第二次世界大戰亦隨即爆發。史達林相信，透過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他將可促使希特勒把矛頭對準西方，推遲蘇德對決的時間。他還相信，透過把摩爾達維亞、波蘭東部和波羅的海大部分地區納入勢力範圍（有必要的話還會加以占領），他已經把蘇聯的最前防線推往更西，讓自己國家的地緣戰略形勢獲得大大改善。

與納粹德國的協議不僅導致蘇聯外交詞令的改變，也大大改變了它的國內政治宣傳路線。一向以希特勒和德國為攻擊對象的宣傳品固然一夜間消失了，但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大

大影響了史達林政權的民族政策，因為它現在不僅有必要向國內外證明自己和希特勒結盟是有正當性，還得證明自己即將進行的兼併行為是有正當性。一九三〇年代，在蘇聯國境外大量非俄羅斯民族的蘇聯同胞都被視為一種負債，但隨著政府的外交政策從防禦改為進攻，這些民族突然變成了資產，因為它們可以被用來破壞鄰國的穩定和合理化蘇聯即將進行的侵略行為。這有點類似回歸到一九二〇年代的政策，那時黨高層預期將會有一場向西進軍的革命遠征，用得著非俄羅斯民族扮演重要的輔助角色。蘇聯這種外交政策轉變的直接受益者是烏克蘭和白羅斯這兩個蘇維埃共和國。

當蘇聯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準備要兼併波蘭境內的烏克蘭裔和白羅斯裔聚居區時，所持的理由是自己有責任解放被壓迫的同胞，與他們重新統一。自此而下，史達林必須在俄羅斯民族的利益和少數民族的需求和期望之間找出平衡點，又特別是駕馭好作為蘇聯核心的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的關係。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紅軍越過波／蘇邊境，向業已落入德國控制的波蘭中部推進。莫洛托夫透過收音機向國人和世人解釋，蘇聯為什麼要跟反民主和反共的納粹政權攜手合作，出兵波蘭。他有必要解釋，因為在許多國人眼中，更不用說其他國家的人，蘇聯此舉是一次赤裸裸的侵略行為。他的解釋出奇地簡單：紅軍越過邊界是為保護東斯拉夫人同胞，即保護住在波蘭東部省分的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他聲稱：「蘇聯政府不可能對血親的命運坐視不管。波蘭的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一直毫無權利可言，現在更是完全孤立無助，只能任由變幻莫測的命運擺布。蘇聯政府認定，對住在波蘭的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手足伸出援手是它的神聖義務。」[312](#)

這種說詞是史達林和德國駐莫斯科大使薛倫堡經過漏夜商議敲定。後者是在九月十七日凌晨被召到克里姆林宮。一星期前，莫洛托夫告訴薛倫堡，蘇聯政府準備「宣布波蘭正在分崩離析，蘇聯有必要前往那裡幫助『備受德國威脅』的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又指出這種說詞「是為了讓蘇聯的干預能夠被大眾接受，同時也是為了讓蘇聯

不致顯得是個侵略者」³¹³。薛倫堡表示抗議，但莫洛托夫拒絕讓步。據說他這樣告訴薛倫堡：「很遺憾，蘇聯政府看不出有其他方法可以解釋自己的出兵動機。因為迄今為止，蘇聯並未關心過波蘭少數民族的困境，所以必須用某種方式說明它這一次出兵干預的理據。」

後來，史達林自己決定取消「備受德國威脅」字眼，但保留蘇聯出兵是要拯救波蘭境內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的說法。但這張拯救清單並不完整，因為它漏掉的不僅止於猶太人—在即將被「重新統一」的省分裡住著不少猶太人，還漏掉了波蘭人：因為根據一九三九年八月簽訂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蘇聯分到的除了烏克蘭裔和白羅斯裔占大宗的波蘭領土，還包括部分的華沙省和盧布林省（它們被劃歸蘇聯這一邊），而這兩個省的居民都是以波蘭人為主。史達林不提他要拯救猶太人顯然是不想惹惱希特勒，而他不提波蘭人則是因為「從波蘭人手中拯救波蘭人」這種說法不通。史達林只想得到某些民族，不想要另一些民族，對他而言，波蘭人的挑戰，不單是合法性問題。

蘇聯因為想要促進全世界的共產革命，老早就放棄了爭取波蘭和其他鄰國國內烏克蘭裔和白羅斯裔的忠誠。到德國成為一股威脅之後，它又不再把蘇聯境內的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看作未來進攻西方時的盟友，反而視之為蘇聯的潛在威脅。這種威脅最近期出現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德國摧毀捷克斯洛伐克之後。當時，捷克斯洛伐克東部的喀爾巴阡烏克蘭³¹⁴宣布獨立，讓莫斯科大為緊張，唯恐希特勒會用重新統一烏克蘭人領土的名義對蘇聯宣戰。希特勒最後決定不打烏克蘭人牌，把喀爾巴阡烏克蘭賞了給匈牙利人，讓他們去粉碎該地的獨立運動。但史達林學到了教訓。從此，他不願意再看到有任何烏克蘭人或白羅斯人地區存在於蘇聯之外，也不想和他的新盟友「分享」任何族群，特別是波蘭人。

九月中旬，史達林決定重啟談判，改變德蘇原議定的東歐勢力範圍劃分方式。他要求里賓特洛甫再到莫斯科一趟。一支蘇聯攝影隊拍下了這位納粹外交部長九月二十七日抵達莫斯科的畫面：他穿著皮革長外套，對迎接他的幾位蘇聯指揮官行了一個納粹敬禮。第二天，里

賓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在地圖上重新劃界，然後他和史達林分別用紅色筆和藍色筆在新協議上簽字。在新的安排下，史達林把華沙和盧布林四周的波蘭裔地區給了德國，換來波羅的海的立陶宛。這意味著，蘇聯將會占領的波蘭地區僅限於那些以烏克蘭裔和白羅斯裔占大宗的土地。大部分東斯拉夫人地區，包括曾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之間被沙皇軍隊短暫占領的城市利沃夫，都將落入史達林的控制。帝俄時期一代代民族工程師始終無法實現的夢想至此美夢成真。

從東方而來的新占領者打著蘇維埃烏克蘭共和國的旗幟開入利沃夫—這個改變反映在參與行動的紅軍現在被稱為「烏克蘭方面軍」。類似的情況，在白羅斯的紅軍現在也是被稱為「白羅斯方面軍」。為合理化蘇聯加入二戰和兼併波蘭部分領土之舉，史達林回歸一九二〇年代的修辭策略，即部分回歸民族共產主義，對烏克蘭和白羅斯民族主義的文化面向讓步。一九三九年秋天，波蘭幾個東部省分被分為兩部分，一部分被劃入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另一部分被劃入白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此舉被稱為蘇聯民族政策的勝利和「蘇聯諸人民友誼」的體現。為了在西烏克蘭和西白羅斯打民族牌，莫斯科恢復它在一九二〇年代實行過的政策：即扶植兩地的民族文化建設。

但時代畢竟已經不同。俄羅斯民族主義如今已是蘇聯新身分認同的核心，所以其他東斯拉夫民族主義動員都必須受這個新現實制約。那些把前波蘭領土整合到烏克蘭和白羅斯的法律把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稱為「偉大民族」，在這之前，蘇聯境內只有俄羅斯人具有「偉大民族」地位。儘管如此，有些「偉大民族」仍然顯得更偉大，而且表現出要把其他「偉大民族」吞滅的趨勢。有鑑於此，一九二〇年代當過明斯克大學校長的皮切塔如今決定，他還是只當個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者比較安全，過去他曾經同時支持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和白羅斯民族主義，而因此在一九三〇年被捕坐牢。蘇聯兼併波蘭東部之後，他在一本大量流傳的小冊子中對此舉表示歡迎，認為那是俄羅斯固有領土的重新統一。

史達林手下祕密警察所寫的報告（如果可信的話）顯示，蘇聯的參戰受到很多蘇聯人的熱情支持。年輕一代自小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洗腦和暴露在反法西斯宣傳之下，誤以為那是一場蘇德戰爭的開始，是他們期盼已久的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大決戰。很多俄羅斯知識分子會樂見蘇聯參戰，則是因為認為當局可以藉這個機會收復「古代的俄羅斯土地」—俄羅斯知識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也是被同樣的夢想沖昏頭。最後，許多蘇聯的烏克蘭和白羅斯知識分子會歡迎戰爭，則是因為認為這是一個可以讓他們的民族重新統一的機會。史達林主義的教條、新稱霸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再興的烏克蘭和白羅斯民族主義，這三種力量在日後的彼此抗衡將會讓蘇聯的官方民族政策出現許多次糾結和轉折。

一如既往，新一套民族論述遇到的最大挑戰來自烏克蘭人。烏克蘭的傳統歷史敘事特徵是對哥薩克國引以為傲，在二戰前幾年開始獲得平反，此舉主要是要為戰爭做準備，但不讓人意外地也是為了給俄羅斯的帝國敘事平反。所以，只有那些符合革命前帝國敘事的烏克蘭人描述才會被收納進來。

對俄羅斯和烏克蘭歷史敘事的新態度縮影在十七世紀哥薩克蓋特曼赫梅利尼茨基所受到的對待。在一九三〇年代中期的蘇聯文學，赫梅利尼茨基一貫受到譴責，被指為「烏克蘭農民的叛徒和殷切敵人」，說是他一手策畫了「烏克蘭和俄羅斯封建領主結合」。基輔市中心有一座赫梅利尼茨基紀念碑，每逢共產主義者舉行示威和考慮把它拉倒，當局就會用木板把它圍起來。但赫梅利尼茨基同樣是俄羅斯帝國史上的大英雄，因為正是他帶來「羅斯的重新統一」。這成了他得以在蘇聯歷史論述中獲得平反的關鍵因素。不讓人意外地，赫梅利尼茨基的平反在莫斯科開始，而不是在基輔，而且是得到最高層的授意。

一九三七年八月，蘇聯報章登出了一份官方聲明，批評歷史教科書對於上述哥薩克蓋特曼的評價落伍過時：「作者們沒有看到赫梅利尼茨基的行動在十七世紀有著積極作用，他是要把烏克蘭從波蘭領主

和土耳其蘇丹的占領下解放出去。」315這項聲明的執筆者不是別人，正是史達林本人。他接著說，與被其他外國強權併吞相比，烏克蘭和喬治亞被併入俄羅斯是「較小的惡」。認定烏克蘭和喬治亞的傳統敘事，可以榮耀與俄羅斯的重新統一，如今受到青睞。

隨著莫斯科的政策發生變化，烏克蘭作家開始放膽擁抱至少一部分的烏克蘭文化遺產。年輕烏克蘭劇作家考納丘克迅速寫就《赫梅利尼茨基》一劇，為這位哥薩克蓋特曼當年反抗波蘭的壯舉歡呼喝彩。仍然相信階級史觀的人對考納丘克展開攻擊，但莫斯科的領導層支持這位有著敏銳政治嗅覺的作者。一九三九年，《赫梅利尼茨基》在莫斯科的瑪麗劇院上演，接著風風光光到蘇聯各地巡迴演出。電影版的《赫梅利尼茨基》在一九四一年推出，獲得了最高文藝獎項史達林獎。與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米寧和波札爾斯基一道，赫梅利尼茨成為了蘇聯英雄祠的一員。

在蘇聯兼併利沃夫和西烏克蘭之後，《赫梅利尼茨基》被帶到那裡演出。考納丘克成了蘇聯烏克蘭文化在新占領土地的全權代表，在把當地文化烏克蘭化一事上扮演重要角色，前此波蘭文化不僅占支配地位，還占壟斷地位。一九三九年秋天，波蘭語戲劇和歌劇迅速被烏克蘭語和俄羅斯語作品代替。當局接著推動報紙與教育系統的烏克蘭化。行政、文化和教育機關的波蘭裔受到清洗。波蘭裔政治家、警察和退伍軍人集體被捕，很多人被監禁起來或流放到蘇聯偏遠地區。

雖然有些在地的烏克蘭裔知識分子被吸納到行政、教育和文化機關，協助推動去波蘭化和烏克蘭化，但重要職位都保留給來自東方316的幹部。例如，利沃夫大學的新校長馬爾琴科就是空降部隊，原任職於基輔的烏克蘭歷史研究所，是該所裡封建主義史組的組長，正在撰寫一篇談十七世紀下半葉烏克蘭—波蘭戰爭的論文。在馬爾琴科的整頓下，波蘭裔教授被免去行政職務，大學裡引入烏克蘭文課程，烏克蘭裔學生人數大大增加，校名也更名為弗蘭科民族大學—弗蘭科是一戰前的重量級烏克蘭作家和政治活動家。前此，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九年之間，大學的正式名字一直是卡西米爾大學。

馬爾琴科受到波蘭裔教授痛恨，因為他讓他們很多人不單丟掉行政職務，還丟掉教職。但馬爾琴科自己很快就受到當局懷疑。他在一九四〇年春天被摘去校長職位，回到基輔之後受到警方監視，最終在一九四一年六月被捕，罪名是暗通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在馬爾琴科領導下利沃夫大學的興衰，即是在新兼併領土上的烏克蘭化興衰的縮影。一九三九年秋季和一九四〇年春季之間，莫斯科雖然一直盡全力在西烏克蘭推動烏克蘭化，支持晉用烏克蘭裔幹部，取代波蘭裔幹部，但這種政策到夏天發生了變化。此後，波蘭人繼續受到迫害，但當局也採取了一些容納他們的措施，反觀烏克蘭裔雖然受到文化政策青睞，卻很容易會被抨擊是政治上的民族主義者。在莫斯科看來，黨內那些賣力推行烏克蘭化的幹部離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只有一步之遙，所以必須要加以監視，以防他們偏離黨中央的路線。

民族政策的改變和鎮壓規模的擴大，是戰爭軌跡的變化和史達林的外交政策盤算有以致之。巴黎在一九四〇年五月的陷落讓史達林大吃一驚，因為他原以為西線的衝突會曠日持久。現在的情勢變化讓希特勒可以把矛頭轉向東方，隨時對蘇聯發起進攻。史達林相信，蘇聯如果把邊界更往西邊推會更安全。於是，他馬上按照一九三九年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去領取他應得的戰利品。他迅速占領波羅的海三國，向羅馬尼亞索要摩爾達維亞和其他烏克蘭裔聚居區。他還對芬蘭開戰，但芬蘭拒絕步波羅的海三國後塵，做出強烈抵抗，讓紅軍傷亡慘重，占得的領土減少到最低程度。但占領領土只是工作的開始，史達林的微積分作業是：想辦法在德國人入侵時保住它們。

如果希特勒向西烏克蘭和西白羅斯推進的話，誰是他可以信得過的？—這是史達林和他的安全團隊在巴黎陷落後那個月苦苦推敲的問題。波蘭裔固然仍舊不忠順，但他們不會是親德國派，因為德國在波蘭中部和西部處決了數以千計波蘭政治、文化和知識領袖一事，在波蘭人圈子裡幾乎不是祕密。但烏克蘭裔卻是不同的態度：他們之中很多人都殷切期盼德國人的到來。在老一輩之中，這種心情是出於緬懷奧地利統治的時代，該政權為烏克蘭人的自主創造了許多機會。很多

年輕的西烏克蘭人則不僅討厭波蘭人統治，也討厭蘇聯的統治，所以紛紛加入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他們對納粹寄與厚望，認為納粹會幫助他們獨立建國。因此，蘇聯占領當局除了不信任西烏克蘭的前共產黨成員（他們被懷疑是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或不忠於史達林），也把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當成蘇聯占領當局的主要靶子。

民族主義領導人對德國人的同情和配合，例如一九四一年初，他們在德國軍事情報機關的羽翼下，偷偷組成了兩個團的特種部隊，這本身就讓蘇聯有理由對付他們。尤有甚者，他們提倡的那種民族主義強調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完全不同，這讓本來就因為史達林重新拉抬俄羅斯民族主義所引起的民族緊張關係更加加劇。幾組遭遞解出境者的數據更能說明蘇聯對西烏克蘭和西白羅斯的民族政策。一九四〇年二月，在第一波大規模遞解行動中，有近十四萬波蘭裔被流放至西伯利亞和中亞。他們包括前波蘭政府的官員、警察、退伍軍人和家眷。後來又有更多的遞解行動，對象是波蘭人、猶太人，最後是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一九四一年五月，有超過一萬一千名前波蘭領土內的烏克蘭裔被送往蘇聯。

「祖國」（rodina / motherland, otechestvo / fatherland）的概念要晚至一九三四年才在蘇聯獲得完全平反。而到了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之後，即希特勒因為無法入侵英國改而把矛頭轉向他的前盟友蘇聯之後，共產黨領導層更是把「祖國」用作團結全民的口號。

得知德軍入侵那一天，史達林因為震驚得幾乎無法言語，便找左右手莫洛托夫代他讀出經他過目和修改的告國民書。他因為一時間不知道要到哪裡找到鼓舞民心士氣的說詞，便往歷史中尋找。由莫洛托夫讀出的告國民書這樣說：「這一次不是我們國家第一次被迫迎戰狂妄敵人的攻擊。當年，拿破崙入侵俄羅斯之時，我們的人民用一場愛國戰爭予以回應，將其打敗，使其垮台。對我國發起新侵略的狂妄希特勒必然也會是這種下場。為祖國計，為榮譽計，為自由計，紅軍和全國人民將再次發起一場必勝的愛國戰爭。」³¹⁷日後，這場德蘇衝突將會被蘇聯稱為「蘇維埃人的偉大愛國戰爭」³¹⁸。

莫洛托夫發表講話幾天後，作曲家亞歷山德羅夫和詩人列別傑夫·庫馬奇合寫了後來形同「愛國戰爭」精神象徵的〈神聖戰爭〉。從一九四一年秋天直到戰爭結束為止，蘇聯電台每天開台時都會播這首歌曲，其頭兩句作：「起來，巨大的國家，起來戰鬥，至死方休。」這首歌中提到祖國，卻沒提共產黨。一個臆測認為，歌詞的真正作者不是庫馬奇，而是一個外省小學老師伯德寫於一九一六年一戰期間。庫馬奇涉嫌改換了原歌詞的幾個字眼，包括把「條頓」改為「法西斯」，把「我們的俄羅斯祖國」改為「我們的偉大聯盟」。歌詞在主題和意象上都是返回十月革命前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它可以不理會黨，卻必須考慮到蘇聯的多民族構成樣態，致力凝聚的不僅是俄羅斯人的愛國心還有其他民族的愛國心。

這也是史達林第一次就戰爭發表講話時的主旋律，時為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在解釋過自己為什麼有必要與希特勒簽署互不侵犯條約之後，他把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稱為「鬼魅和食人魔」。史達林把聽眾稱呼為「兄弟姊妹們」，試圖營造出蘇聯各族人民是一家人甚至有著宗教弟兄情誼的感覺。史達林指出，德國入侵的目的是「重新建立地主的統治，重建沙皇制度，摧毀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白羅斯人、立陶宛人、拉脫維亞人、愛沙尼亞人、烏茲別克人、韃靼人、摩爾達維亞人、喬治亞人、亞美尼亞人、亞塞拜然人和蘇聯境內其他自由人民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國家，把他們日耳曼化，讓他們淪為德國王公貴族的奴隸」³¹⁹。

這種呼籲沒多少直接效果。德國師團強力向東推進，粉碎了紅軍的抵抗。紅軍會快速潰敗，部分原因在於作為軍隊骨幹的農民飽受農業集體化的摧殘，對蘇聯政權殊少忠愛之心。西境的非俄羅斯裔居民都是被納入蘇聯不久，毫無向心力，也傾向於把德國人視為解放者（他們將很快知道自己搞錯了）。到了秋天，紅軍撤出波羅的海和白羅斯，又在基輔附近因為受到包圍而失去六十萬將士。至此，西境所有非俄羅斯人省分幾乎完全丟失，紅軍只能退到俄羅斯人地區進行最後的生死戰。

這一定就是史達林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在紅場對開赴前線部隊講話時絕口不提非俄羅斯人的原因之一，當時的「前線」離莫斯科只剩幾十公里。對他來說，這場戰爭已經變為一件俄羅斯人自家的事。

「你們將要進行的是一場解放戰爭，一場正義之戰。讓我們的偉大先輩—涅夫斯基、頓斯科伊、米寧、波札爾斯基、蘇沃洛夫、庫圖佐夫的英勇形象在戰爭中鼓舞你們！讓偉大列寧的勝利旗幟保護你們！」

320此中提到的英雄無一是非俄羅斯人，有些甚至是早些年常常被蘇聯宣傳品嘲笑的帝國時代人物。即使提到列寧時也是帶有宗教色彩，因為俄羅斯動詞 *oseniat*（保護）往往也可解作「祝福」或「畫十字架」。隨著政權面臨背城一戰，史達林只能祭出曾被丟棄和褻瀆的符號與半神。

在在看來，強調俄羅斯的帝國傳統而犧牲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是有效的做法。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從遠東調來的師團幫助史達林守住了莫斯科，把德軍擊退。一九四三年一月，在史達林格勒激戰方酣之際，史達林重新引入帝國時代的軍事肩章。較少意識形態的外交政策也讓蘇聯可以和英美這兩個老敵人重修舊好。用英國首相邱吉爾的話來說，三者結成了一個對抗德國的「大聯盟」。

西方盟國，尤其是美國，通過租借計畫提供大量武器裝備給蘇聯，讓其得到喘息。但史達林想要得到更多：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為獲得西方公眾的支持，他不得不脫下發了瘋似想要赤化世界的無神論共產主義者形象。一九四三年，在準備前往德黑蘭與西方國家領袖會面時，他解散了「共產國際」，在西方大眾眼中，共產國際是致力推翻全世界民主社會的主要組織。除此以外，史達林還對俄羅斯東正教教會做出重大讓步，允許它選出自一九二〇年代布爾什維克進行反宗教運動之後便懸缺的俄羅斯牧首。隨著俄羅斯東正教獲得了新生命，俄羅斯帝國歷史和身分認同的一個重要元素開始回到了公眾意識。

對帝國價值觀的意識形態回歸和文化回歸在廢除〈國際歌〉之時達到高峰—〈國際歌〉是十九世紀晚期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最著名的歌

曲，也是蘇聯的國歌。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政治局批准了亞歷山德羅夫作曲填詞的新國歌。新國家的旋律非常近似亞歷山德羅夫的另一首熱門歌曲〈布爾什維克〉，但後者無一處提到俄羅斯，反觀新國歌卻無一處提到黨。歌詞頭兩句作：「偉大俄羅斯，永久的聯盟，獨立共和國，自由結合成。」歌詞是經過史達林親自修改和批准。現在，為了抗擊外國侵略者，聯盟中的非俄羅斯人共和國必須集結在俄羅斯人四周。

在戰爭最艱難的頭幾年，當莫斯科領導人忙著煽起俄羅斯民族主義的火焰時，加盟共和國（特別是德國占領的那些）被允許甚至被鼓勵把自家的民族主義最大化，以鼓舞前線後方的反德力量和紅軍中的本民族弟兄。

莫洛托夫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發表過告國民書後不久，烏克蘭作家就發現，烏克蘭歷史上有過的「愛國戰爭」一樣可以鼓舞人心。他們顯然不認為對抗拿破崙的是他們的戰爭，拿破崙的軍隊從未進入烏克蘭。在寫給史達林的一封信中，烏克蘭文化界的代表表示，在近代早期，烏克蘭哥薩克人一樣發起過對抗波蘭人和德國人的愛國戰爭。烏克蘭的歷史學家和宣傳人員也在十三世紀的加利奇的達尼洛親王³²¹身上找到了烏克蘭版的涅夫斯基。諷刺的是，涅夫斯基是與西方的勢力戰鬥³²²，反觀達尼洛親王卻是在西方盟友的幫助下擊退蒙古人，甚至還是由教皇加冕。不過，為了效法俄羅斯老大哥和為戰爭宣傳出力，沒有人會把這些歷史細節當一回事。

在白羅斯，最知名的民族詩人庫帕拉也往歷史尋找鼓舞人心的元素。他把自己的民族稱為「我勇武的白羅斯人民」，說他們在史達林的領導下表現出凜凜雄風。他呼籲對侵略者發起一場農民起義：「游擊隊員，游擊隊員，白羅斯的諸子們！為了打破枷鎖，為了解除桎梏，殺盡邪惡的希特勒族，讓他們永得不超生！」³²³位於莫斯科的白羅斯游擊隊總部把任何現成的白羅斯民族主義象徵符號統統拿過來用。例如，他們把一支游擊隊取名「卡利諾斯基」—雖然卡利諾斯基原是一八六三年反俄羅斯人起義的領袖，而且還是波蘭人，但單是強

調他是為白羅斯人民而戰的戰士這一點並不難。上述的游擊隊是活躍於白羅斯境內最知名的游擊隊之一，核心成員是一九四三年的春天空投到西白羅斯的祕密警察。

雖然非俄羅斯裔英雄能夠鼓舞本民族的人心，他們在全蘇聯的層次卻沒有什麼能見度。一九四二年年中，史達林批准創立授與紅軍軍官的新軍事勳章。新勳章有三種：涅夫斯基勳章、蘇沃洛夫勳章和庫圖佐夫勳章。蘇沃洛夫和庫圖佐夫都是帝俄時代將領，前者在十八世紀後期粉碎科斯丘什科率領的波蘭人起義，後者在一八一二年把拿破崙大軍逐出俄國。換言之，三種勳章都是以俄羅斯英雄命名。非俄羅斯英雄完全沒有這種待遇，就連赫梅利尼茨基也沒有。拜大戰前夕一部電影之賜，他在紅軍中的受崇拜程度不亞於涅夫斯基。烏克蘭文化界人士為之氣結。

這種情況要直到一九四三年秋天紅軍在烏克蘭和白羅斯開始發動攻勢才有所改變。先前，在夏季尾聲，烏克蘭最知名的電影製作人多夫任科呼籲烏克蘭的黨老大赫魯雪夫設立一個以赫梅利尼茨基命名的高級軍事勳章。赫魯雪夫徵詢史達林的意見，主張此舉有助於提高紅軍內外的烏克蘭人的士氣。他在信中說，赫梅利尼茨基因為曾經為烏克蘭的解放而戰與促成俄羅斯和烏克蘭人民的聯盟，在烏克蘭非常受歡迎。史達林同意了。一九四三年十月，莫斯科宣布創設一個由烏克蘭藝術家設計的勳章，上面的「赫梅利尼茨基」字樣將會採取烏克蘭語而非俄羅斯語的拼寫方式。《真理報》報導這消息的同時，在社論強調赫梅利尼茨基是偉大的政治家，深明烏克蘭人民只有和兄弟民族俄羅斯人聯合在一起方可生存的道理。

這還只是轉變的開始。幾天後，史達林下令把在烏克蘭戰鬥的四個集團軍更名為烏克蘭方面軍。在一九四四年春天，在白羅斯戰鬥的三個集團軍也獲得了「白俄羅方面軍」的番號。到了這時候，烏克蘭、白羅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國亦已有了自己的國防委員和外交委員。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在德黑蘭跟羅斯福和邱吉爾會面時，史達林得到了一個他期盼已久的承諾：盟軍將會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他同時聽

說英美準備籌組那個後來被稱為聯合國的組織。為了在未來的聯合國爭取更多席位，史達林啟動憲法修改，弄出更多名義上獨立的共和國。雖然這些共和國不是真正獨立的國家，甚至並不擁有內政、軍事和外交上的自治權，但史達林還是成功說服同意讓烏克蘭和白羅斯與蘇聯（被理解為俄羅斯）一道進入聯合國大會。就這樣，「單一俄羅斯民族」重返國際舞台，而且這一次是有三張嘴巴而非一張。

同時動員俄羅斯和非俄羅斯民族主義對抗德國，讓莫斯科得面對一個挑戰：想辦法不讓非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光芒蓋過俄羅斯民族主義。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黨中委會宣傳部門的負責人亞歷山德羅夫出言批評烏克蘭作家一封恭賀基輔從納粹占領下解放出來的信。亞歷山德羅夫認為，這封信暗示著「蘇聯有兩個領頭羊民族，即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指出這個主張違背了一個「普遍被接受的事實：俄羅斯人在蘇聯大家庭中是老大哥」³²⁴。

亞歷山德羅夫是贊成不把史達林獎頒給《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史》的黨官員之一，理由是該書對俄羅斯帝國多所詆毀。他寫道：「這本書是反俄羅斯人的，因為它的幾位作者是站在那些起義反抗沙皇主義的人一邊，並沒有努力為俄羅斯開脫。」³²⁵《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史》由著名蘇聯歷史學家潘克拉托娃領頭的一組莫斯科人和哈薩克人執筆，於一九四三年出版。而潘克拉托娃和她的同仁最終沒有獲頒史達林獎。

但在當時的環境，要在階級原則和民族原則之間或在俄羅斯民族主義和非俄羅斯民族主義之間找到平衡點，絕非易事。只要戰爭持續一天，則蘇聯境內任何民族的民族主義都有利用價值。所以，雖然亞歷山德羅夫和其他與他志同道合的黨官員努力讓天秤向俄羅斯傾斜，但其他民族的知識分子被容許把傾斜的天秤推回。烏克蘭作家和歷史學家抗議俄羅斯人企圖把達尼洛親王說成是俄羅斯親王或是把西烏克蘭說成是古代羅斯或俄羅斯固有領土。潘克拉托娃向更高層級的黨官員上訴，指出黨絕對不能為沙皇的殖民政策平反，因為如果革命之前的年代不存在壓迫，就根本不會有革命的出現。

為了解決這個紛爭，政治局資深成員馬林科夫和日丹諾夫找來一批歷史學家討論《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史》，想要平息紛爭。會議沒有明確結論，而黨也把它決定拖到戰爭結束後才宣布。一九四五年八月，哈薩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布譴責哈薩克一九四三年歷史的決議，下令哈薩克歷史學家進行修改。如果沒有得到莫斯科的明確授意，哈薩克斯坦當局會通過這樣的決議乃是難以想像。

蘇聯在二戰中的勝利標誌著它那套源於一九三九年《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民族政策走向終結。非俄羅斯民族的地位從此急劇下降，俄羅斯人的主導地位獲得重新確認。這種政策是由史達林自己放出風聲。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史達林在克里姆林宮向一眾蘇聯軍事指揮官祝酒時這樣說：

身為蘇聯政府的代表，我要舉杯敬祝蘇維埃人民健康，首先是敬祝俄羅斯人民健康。我首先敬俄羅斯人，是因為他們是最傑出的民族。我舉杯祝俄羅斯人民健康，因為他們在這次戰爭中被公認為蘇聯各族人民的領導力量。我舉杯祝俄羅斯人健康，不僅因為它是領頭羊民族，還因為它有著清晰頭腦、良好政治判斷力和堅忍不拔的性格。

這番祝酒詞經小幅修改後翌日刊登在蘇聯各大報。未來幾年，它將會被一再轉載，標誌著黨中央民族政策的新轉向。因為劇本《赫梅利尼茨基》而獲得史達林獎的考納丘克早在這番祝酒詞發表前便意識到風向的改變，因為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初，他的得獎劇本在一個親蘇聯的波蘭代表團訪問過烏克蘭之後被取消演出。當時仍是史達林最喜愛劇作家的考納丘克嚇壞了。他抱怨說，《伊凡·蘇薩寧》的內容要比《赫梅利尼茨基》反波蘭得多，但沒有人反對讓它在莫斯科上演。但他投訴無門。他的戲劇受到批判，無處可演，反觀改編自帝俄時代的《為沙皇獻身》之《伊凡·蘇薩寧》卻繼續留在舞台上。

為了改善蘇聯與波蘭人的關係，莫斯科已準備好遏制烏克蘭民族主義，但沒打算遏制勢力更強大的俄羅斯民族主義。隨著愛國戰爭結束，各種品牌的愛國主義不再一律受歡迎。

311 這條約的正式名稱是《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本書也是採用這個稱呼，為了減少累贅，譯文改用俗稱。

312 Serhii Plokyh, “The Call of Blood: Government Propaganda and Public Response to the Soviet Entry into World War II,” *Cahiers du monde russe* 52, nos. 2-3 (2011): 303-304.

313 同上，295.

314 即前面提過的外喀爾巴阡，原屬奧匈帝國統治，經過一些演變後成為捷克斯洛伐克一省，德國勢力進入後更名「外喀爾巴阡烏克蘭」。其居民以烏克蘭裔為大宗。

315 Serhy Yekelchuk, *Stalin’s Empire of Memory: Russian-Ukrainian Relations in the Soviet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oronto, 2004), 15-26.

316 指原即為蘇聯一部分的東烏克蘭。

317 “Vystuplenie po radio V. M. Molotva 22 i iunia 1941 g.,” *Khrestomatiia po istorii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yny*, comp. V. E. Lebedinskaia (Moscow, 2015), 37.

318 「愛國戰爭」一譯「衛國戰爭」。

319 “to reestablish the rule”: Iosif Stalin, *O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Sovetskogo naroda* (Moscow, 1948), 13.

320 同上，40.

321 就是前面提過的加利奇公國丹尼爾親王，達尼洛（Danylo）係以烏克蘭語拼寫。

322 指十三世紀時對抗瑞典和條頓騎士團的入侵。

323 Ianka Kupala, *Izbrannye proizvedeniia* (Moscow, 1953), vol. 2, 222.

324 David Brandenberger, *National Bolshevism: Stalinist Mass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1931-1956* (Cambridge, MA, 2002), 158.

325 同上，125.

第十七章 蘇維埃人

史達林歿於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四天後，作為告別死者儀式的一部分，他的遺體被放置在紅場陵墓中列寧棺槨旁。他不僅以政府首腦的身分，還以全世界勞動人民領袖的身分受到哀悼。

東歐、中國、北韓共黨政府的領袖，還有西歐國家義大利、法國、西班牙和英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都應邀出席在陵墓舉行的悼念儀式。發表悼詞的包括史達林親近的成員和蘇聯知識分子的代表，特別是作曲家蕭斯塔高維奇和作家暨戰爭詩人西蒙諾夫。現場卻看不見各加盟共和國領導人的身影—他們在蘇聯層級系統的地位太微不足道。對史達林的接班人來說，最重要的議題是如何把共產主義輸出到全球，不是國內的民族問題。根據官方說法，蘇聯的民族問題已經被史達林親自解決。

新領導人馬林科夫在致詞時指出：「社會發展史上最複雜的問題之一，即民族問題，其解決方案和史達林同志的名字相連在一起。有史以來第一次，最了不起的民族問題理論家，即史達林同志，在一個多民族和巨大國家的層次讓年深日久的民族爭議有了終結的可能。」馬林科夫接著解釋蘇聯民族問題是怎樣被解決：「在史達林同志的領導下，本黨成功克服了原先受壓迫人民的經濟和文化落後狀態，把蘇聯各民族統一為形同手足的大家庭，鍛鑄出各族人民之間的友誼。」

326

引人注目的是，馬林科夫讚揚史達林在民族問題上的成就時，並沒有突出俄羅斯的地位。事實上，蘇聯民族政策的俄羅斯中心主義正是史達林對列寧民族政策主要的修正。顯然可見，史達林的一群接班人還不確定他們該怎樣對待他的這部分遺產。

官方說法和蘇聯各族人民不盡融洽的事實之間的落差很快就被貝利亞的行動反映出來。他是新政府安全事務的主管，大權一把抓，是

史達林各個接班人中最有實權的一位。在葬禮上講話時，他不僅談到蘇維埃人，還談到蘇聯各族人民。不久之後，他發起動議，主張終止反猶太主義運動，停止把猶太人看成外人和西方間諜。被他從監獄釋放的猶太人包括當朝排名第二的人物莫洛托夫的妻子熱姆丘日娜，她是史達林親自下令逮捕，繫獄已經四年，這段期間她丈夫繼續保有官職，誠惶誠恐為大老闆辦事。

一九五三年六月，經黨中央的批准，貝利亞推出了一批以終止非俄羅斯加盟共和國俄羅斯化為目的的政策，包括規定各加盟共和國的黨委第一書記必須是當地主體民族的成員，召回所有不會說在地語言的幹部，所有公務信函都改用地語言書寫。這聽起來像是蘇聯民族政策的一次重大變革，是要從史達林時代的俄羅斯中心主義回歸一九二〇年代的本土化政策。

我們無法得知貝利亞原準備在修訂民族政策一事走多遠，因為他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底便因為主要對手赫魯雪夫設計而被捕，並在年底槍斃，罪名是為英國工作的莫須有罪名。他還被控企圖在各共和國內恢復資產階級色彩的民族主義元素，藉此破壞蘇聯各族人民和「偉大俄羅斯人民」之間的友誼。在在看來，史達林的俄羅斯中心主義又再次占上風。但事情沒有這般簡單。因為貝利亞雖然被處決，但他抑制在加盟共和國進行俄羅斯化的計畫並未被推翻。這些措施中有一些會到了蘇聯最後的日子還繼續有效。

儘管史達林幾個繼承人陷入激烈權力鬥爭，但這位獨裁者的死總的來說還是讓國內的政治肅殺氣氛緩和不少。二戰結束後，史達林重新收緊黨對意識形態和文化的控制，並恢復俄羅斯和俄羅斯人在蘇聯民族層級系統中的優位性。在這段「日丹諾夫時期」（得名自史達林的首席理論家日丹諾夫），官方對自由主義或一切偏離黨中央路線的表現毫不留情。凡是有親西方之嫌的事物或不符官方認可文學模式的作品—即不符古典俄羅斯文學模式的作品，都會受到猛烈批判。被波及的不僅止於作家和藝術家，還包括二戰期間權大勢大的宣傳機關首腦亞歷山德羅夫：他所著的《西方哲學史》被指為對觀念論譴責不

足。著名電影導演愛森斯坦也受到批評，指他不應該在《恐怖伊凡》的下集讓這位沙皇顯得軟弱和頭腦混亂，而電影的上集曾受到史達林推崇。

當「冷戰」在一九四八年揭開序幕之後，日丹諾夫規劃的意識形態運動有了新的動力，目的是維護俄羅斯中心主義。新一波國際衝突，由史達林在東歐扶植一批共產政權之舉和土耳其及伊朗的地緣政治角逐引起，蘇聯和它的前盟友英美翻臉成仇。隨著新創建的猶太人國家以色列成了雙方爭奪全球霸權的戰場之一，克里姆林宮開始不信任國內的猶太人，懷疑他們心向西方。新一輪意識形態運動的重點之一是攻擊「無根的世界主義」—當局用這個詞語來掩蓋它對猶太人的迫害和鼓勵眾人用一種仇外及反西方心態詮釋俄羅斯的文化傳統。

回歸俄羅斯中心主義意味著在加盟共和國回歸反民族主義的政策。自一九四六年起，黨中央通過一個又一個決議，致力打擊加盟共和國表現的所謂民族主義偏差。在烏克蘭和白羅斯，文學史成為了主要箭靶。有一部烏克蘭文學史被指控為把蘇聯白羅斯文學的源頭說成是「波蘭鄉紳」和「舊日的西化主義者和自由派」，忽略了白羅斯和俄羅斯在民主文學和文化兩方面的歷史淵源。在烏克蘭，黨的意識形態家也開始在文學史上揭發「謬誤」，譴責《赫梅利尼茨基》之類的歌劇未能把俄羅斯人民表現為一股進步力量。烏克蘭最知名的電影製作人多夫任科也受到攻擊，被規定只能待在莫斯科，不得前往烏克蘭。一九五一年，當局對優秀烏克蘭詩人索休拉在一九四四年發表的〈愛烏克蘭〉一詩發起批判。這首詩在二戰期間備受推崇，但此時卻被譴責是烏克蘭民族主義的一種表現。

在赫魯雪夫掌管烏克蘭期間（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為止），他參與了對烏克蘭文化界名人的攻擊。但一等史達林在一九五三年歸西，他便持續偏離這位獨裁者的政策。在這方面，他和他的主要對手貝利亞是同道，不是對頭。在後史達林的領導班子裡，赫魯雪夫和貝利亞是大位的兩大角逐者，但正如前面提到，赫魯雪夫未幾便智取貝利亞，在一九五三年年底之前將其槍斃。政治局其他成員願意支持剷

除貝利亞，是因為見他權力愈來愈大，擔心他會用手下的祕密警察對他們不利。赫魯雪夫以集體領導制作為回報。接下來，他花了快十年才除去他在政治局的其他潛在對手，包括蘇聯政府首腦馬林科夫、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和國防部長又是「愛國戰爭」大英雄的朱可夫。

赫魯雪夫當權的歲月以一批雄心勃勃的改革知名。這些政策包括把經濟決策權下放給地方、試圖透過支薪給農民讓蘇聯農業復甦，以及大量興建都市住房。但他的倡議很少有比他的「去史達林」化運動更加引起矚目。他譴責史達林反黨和反國家（但不包括反人民），釋放古拉格集中營大部分政治犯，發起有關經濟、社會和文化政策的公共辯論。一九五〇年代晚期這種對意識形態箝制的放鬆後來被稱作「赫魯雪夫解凍」。

尋找一種新的民族政策也是赫魯雪夫改革路線的一部分，也密切關聯於他去史達林化的更大目標。他起初在民族政策上頗為猶豫。他對這問題的早期思維方式和思想局限清楚顯示在他對蘇聯國歌所做的更動上。在一九五五年的修訂版國歌裡，提到史達林的部分被刪除，史達林參與編寫的原歌詞沒提到黨而現在被提到，藉此顯示國家大政將會出自黨的集體領導和智慧，不是一個大權獨攬的領導人。不過，歌詞的其餘部分，包括一開始提到的蘇聯各族人民是團結於大羅斯人之下則原封不動。

一九五四年一月，赫魯雪夫推出了他任內第一個大型公共活動：以鋪張方式慶祝赫梅利尼茨基接受俄羅斯為宗主國的三百週年紀念。配合這個活動，當局推出了一本名為《論烏克蘭和俄羅斯的重新統一》的小冊子，從其中，我們可以看出要在馬克思主義修辭和蘇聯式「人民友誼」的旗幟下把俄羅斯的帝國敘事和非俄羅斯的民族敘事相結合會碰到哪些困難。顧名思義，《論烏克蘭和俄羅斯的重新統一》是把一六五四年的佩列亞斯拉夫會議，即烏克蘭哥薩克人作成投靠莫斯科沙皇決議的會議，看成讓烏克蘭和俄羅斯重新統一的關鍵。

「重新統一」的說法源自帝國時代的「羅斯重新統一」史觀。這種史觀在帝國時代講得通，因為俄羅斯人一貫相信，基輔羅斯是由同一個民族構成，後來這個民族被蒙古人、立陶宛人和波蘭人切割開來，要到了十六和十七世紀始才在莫斯科沙皇的努力下重歸統一。問題是，蘇聯歷史學家一直聲稱，俄羅斯和烏克蘭是相互獨立的民族，不是同一個民族的兩個分支。兩者怎麼能夠「重新統一」是一個蘇共宣傳人員從未試圖解釋或解決的弔詭。但不管怎樣，當局會採取「重新統一」的說法，在在顯示出「單一俄羅斯民族」的觀念重新受到青睞。

黨中央在批准《論烏克蘭和俄羅斯的重新統一》出版時這樣說：「透過把他們的命運永遠連結於兄弟民族俄羅斯人，烏克蘭人民將得以掙脫外國的征服，確保自身的民族發展。另一方面，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團聚大大有助於強化俄羅斯國家，提高其國際威望。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勞動人民的友誼在聯合鬥爭共同敵人的過程中愈發牢固和強大。這些敵人包括沙皇國、擁有農奴的地主，資本家和外國侵略者。」[327](#)

就這樣，一件事在一九二〇年代因為強大的沙皇統治而被蘇聯歷史學家譴責為「絕對的惡」，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在俄羅斯統治下卻被改而說成「較小的惡」的事件[328](#)，如今變成了完全是好事一樁。因為沙皇的領土野心固然可惡，卻在無意中促成了俄羅斯和非俄羅斯勞動群眾的結合。蘇聯的宣傳人員變了個漂亮的戲法，讓俄羅斯帝國主義終於找到方法用階級論述來合理化自己在蘇聯的復出。

三百週年慶的重頭戲是由莫斯科領導層代表一個兄弟民族，把一件超級大禮送給另一個兄弟民族：把俄羅斯聯邦對克里米亞半島的管轄權轉移給烏克蘭共和國。此舉固然是為了表現兩個民族間的互信，但也是為了表達，莫斯科當局願意把行政管理和經濟的考量置於其他考量之上：由於戰爭的蹂躪和史達林在一九四四年放逐克里米亞韃靼人的政策，克里米亞的經濟遲遲沒有起色，現在，透過與它依賴甚深的烏克蘭整合，克里米亞將可望受益。

慶祝俄羅斯和烏克蘭統一的官方活動也帶有斯拉夫人聯合起來對付非斯拉夫人的味道。因為莫斯科始終拒絕讓克里米亞韃靼人返回家園，所以烏克蘭接收克里米亞等於是參與了俄羅斯對一個少數民族的非法放逐和歧視。尤有甚者，莫斯科宣布，這個慶祝活動不僅對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是一件大事，也是蘇聯其他民族的一件大事。事實上，直到蘇聯解體為止，《論烏克蘭和俄羅斯的重新統一》所勾勒的俄、烏歷史關係都被套用到俄羅斯和蘇聯其他民族的關係。

現在，烏克蘭的非官方地位被提升為第二重要的蘇聯共和國。事實上，掌管烏克蘭超過十年的赫魯雪夫非常仰賴他在烏克蘭的親信來強化他作為蘇聯唯一領導人的地位。在一九五七年夏天確定打敗黨內對手之後，他開始把他在烏克蘭的人馬調到莫斯科，給他們加官晉爵。烏克蘭中委會第一書記庫里申科成為莫斯科中委會有實無名的第二書記。他在基輔的繼任者皮得戈爾尼在他下台後被提拔為中委會的祕書。當過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政委書記的布里茲涅夫也被提拔為蘇聯議會主席。及至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烏克蘭派系已經成了蘇聯帝國領導班子的資深成員。雖然加盟共和國第一書記必須由在地主體民族擔任的政策繼續有效，但莫斯科會派出自己的人，一律是俄羅斯人或烏克蘭人，盯住這個當第一書記的當地人。

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魯雪夫在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發表的非公開講話中，宣布他要發起一個大型運動，推翻史達林在公共生活各方面的遺產。他指控史達林創造和促進個人崇拜，迫害黨和紅軍的忠實幹部。雖然他沒有提及或公開承認史達林對國內其他民族的暴行，但私底下採取措施，為二戰中受到史達林「懲罰」的個人甚至整個民族平反。一九五七年，赫魯雪夫在俄羅斯聯邦內重新恢復卡巴爾達—巴爾卡爾、卡爾梅克和車臣—印古什三個自治共和國，容許這些當初被史達林指為勾結德國而予以放逐的少數民族返回祖居地。但平反政策不是全面性：德國人、朝鮮人和克里米亞韃靼人都沒有獲准返鄉。儘管如此，他們在流放地所受到的監視還是明顯放鬆。

赫魯雪夫和他的人馬設法在史達林主義的遺產和他們所謂的列寧主義準則—即一九二〇年代的民族政策—之間取得平衡。赫魯雪夫其中一個源出列寧主義準則的舉措是在一九五〇年代晚期發起反宗教運動。二戰期間，史達林一方面停止迫害宗教信徒，另一方面又把宗教組織嚴格置於政府監管之下。這種變化的主要受益者是俄羅斯東正教教會，它後來也成了國家對西部邊區進行俄羅斯化和蘇維埃化的代理人。一九四六年，史達林著手清算加利西亞和白羅斯的烏克蘭天主教會（原稱聯合教會），用的是帝國時代的模式，即讓它和俄羅斯東正教教會「重新統一」。就像十九世紀那樣，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被統一在俄羅斯東正教教會裡。不過，在官方說詞裡，此舉是為了讓烏克蘭民族在地域和文化上重新統一—大多數烏克蘭人傳統上都是東正教徒。

赫魯雪夫也像史達林一樣，把俄羅斯東正教教會用作國際政策的工具。他允許東正教會代表參加世界基督教協進會，甚至允許他們作為觀察員出席一九六二年的「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但在國內，他沒有多少用得著他們的地方。此外，他也無法容忍既有的宗教信仰挑戰他建立的新信仰：共產主義天堂。他在一九六一年一次黨代表大會上，宣布黨在接下來二十年的主要目標是要為共產主義社會打下基礎，又承諾將來會透過電視讓大家看看，蘇聯最後一個信教的人長什麼樣子，這充分反映出赫魯雪夫深信科技進步可以粉碎對超自然的信仰。在反宗教狂熱的驅使下，政府關閉了全國一半東正教堂區。原有的四十七間東正教修道院中，只有十六間被允許繼續運作。對於基督新教團體，如浸信會和五旬節派，因為拒絕屈服於政府的壓力和繼續從事地下活動，受到更嚴厲的對待。

赫魯雪夫的反宗教運動無意中打擊了俄羅斯人傳統身分認同中的宗教元素。它另一個始料未及的後果是增加了烏克蘭神職人員在東正教教會的重要性。因為政府雖然在俄羅斯、烏克蘭和白羅斯的傳統東正教地區大量關閉東正教教堂，卻不敢對西烏克蘭下太重手，唯恐信徒會被迫拋棄受政府控制的東正教信仰，加入有「民族主義」傾向的

烏克蘭天主教。在反宗教運動中倖存下來的東正教堂區大概八千個，大多數坐落在烏克蘭，又絕大部分是位於從前的聯合教會地區。

俄羅斯東正教最有聯合教會色彩和烏克蘭裔信徒最多的時代莫過於赫魯雪夫當權的時代。烏克蘭人曾經在十八世紀的俄羅斯東正教全體主教中居多數，而這一次卻變成是烏克蘭人在全體教徒中占絕對多數。看來沒有人擔心這種新發展對民族政策的可能影響。畢竟，政府裡沒有幾個人相信，在赫魯雪夫力推的共產主義新社會裡，宗教或民族性還有未來可言。

一九六一年標誌著赫魯雪夫政治生涯的最高點，他位於蘇聯金字塔頂端的位子看似不可動搖。如果不是大權在握，他不會敢於下令把史達林的遺體移出紅場陵墓並把史達林格勒更名為伏爾加格勒。當年四月，蘇聯把世界上第一個太空人送上太空。蘇聯除了在太空競賽中領先美國，擁有的飛彈亦足以威脅美國。蘇聯固然還面臨一些問題，包括經濟計畫未能完全落實和乾旱對農業的威脅等，但其整體經濟仍然以穩健的步伐增長，每年至少百分之五，長遠來看前途光明。

赫魯雪夫利用十月召開的第二十二次黨代表大會，宣布一項改造蘇聯社會的雄心勃勃大計。他和一票助手致力於此已經多年。他在致詞的最後做出了一個讓人震驚的承諾：「黨在此要雄赳赳地宣布，目前一代的蘇聯人將會生活在共產主義中！」³²⁹他向國人和世人保證，蘇聯政府在二十年內將會把共產主義的經濟和技術基礎建造完成，奠定共產主義社會的基礎。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教條，民族差異會在共產主義制度底下消失。還是一九二九年的時候，史達林曾拒絕即時合併蘇聯各民族的要求，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民族差異的存在乃屬理所當然。但現在，隨著社會主義走完它的歷史道路和共產主義近在眼前，沒有理由繼續維持蘇聯各民族的區別，反而應該加速它們的匯流。

新的黨綱雖然保證讓各民族自由，但仍充分反映出赫魯雪夫的新思路。他在黨代表大會的講台上宣稱：「一個有著共同特徵和由各族

人民構成的新的歷史共同體已經在蘇聯形成，它就是蘇維埃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社會主義祖國—蘇聯；有一個共同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經濟；有一個共同的社會階層結構；有一個共同的世界觀—馬克思—列寧主義；有一共同目標—建造共產主義。不管在精神面貌或在心理上，這個民族都有許多共同特徵。」³³⁰「蘇維埃人」的概念並不新鮮，布哈林曾在一九三〇年代提倡過，史達林本人也經常使用這詞語，但這一次它被寄與厚望和委以重任：在二十年內消弭所有的民族差異。

赫魯雪夫疏遠史達林對民族的看法，即不認為民族主要是由共同的語言、文化和領土界定。國家、經濟、階級和意識形態是新的蘇聯政治國家的主要標誌。雖然新黨綱承諾捍衛和發展蘇聯各族人民的語言，但事實上當局在打造新的蘇維埃人一事別無選擇，只能以俄羅斯的語言和文化為其基礎。可反映出這一點的是它提到了一個業已存在的現實：「非俄羅斯民族自願在母語以外也學習俄羅斯語，是正在發生的現象，而這現象有正面意義，因為它可以促進經驗的交流，讓所有大、小民族吸收蘇聯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就和世界文化。俄羅斯語事實上已經成為蘇聯各民族交流和合作的共同語言。」³³¹

赫魯雪夫會熱情擁抱「蘇維埃人」的觀念，不單純是因為相信共產主義境界指日可待和意識形態狂熱作祟。一些學者把他的民族政策分為兩個時期，分界線是一九五七年。在這一年之前，他在莫斯科的權力尚未鞏固，所以他盡力討好各共和國的領導層，給予他們比史達林時代更多的行政和經濟自主權。透過在各共和國設立一些主管經濟事務的部會和創立一些地區性的經濟會議，他削減了中央對經濟決策權的控制。拜這個政策之賜，烏克蘭的工業產值從百分之三十四增加至百分之九十七。該共和國也獲得了更大的文化政策自主權。這一套讓各共和國的領導層在莫斯科的權力鬥爭中支持赫魯雪夫。除了他在烏克蘭的班底，其他共和國的領導人也把他看成是自己人。

第二個時期的政策截然不同。一九五七年之後，赫魯雪夫在黨中央的地位已屹立不搖。這時，他開始整肅中亞、高加索和波羅的海各

共和國的領導班子，又推出了一些致力於邊區俄羅斯化的新舉措。烏克蘭和白羅斯的領導層逃過了整肅，但沒逃過俄羅斯化政策的衝擊。一九五八年，蘇聯議會通過一項法律，解除非俄羅斯人的小孩必須用母語學習的規定，改為容許家長自行決定兒女以何種語言接受教育。由於大部分大學都是用俄羅斯語教學，而高薪的工作又只會請會說俄羅斯語的人，蘇聯教育系統的快速俄羅斯化變得勢不可免。

受新法規打擊最重的是斯拉夫人的共和國，因為在地語言和俄羅斯語之間的語言障礙很容易跨越。白羅斯語的情況特別岌岌可危。烏克蘭在一九五三年便有了一個土生土長的領導人，白羅斯卻要等到一九五六年才開始有第一個操白羅斯語的黨領袖：馬祖羅夫。但馬祖羅夫一口流利的白羅斯語對他並無好處。在一九五九年年初，馬祖羅夫在白羅斯建國四十週年慶祝活動時以白羅斯語發表講話，引起在場的赫魯雪夫不悅。赫魯雪夫在烏克蘭待過很多年，當然不會聽不懂另一種東斯拉夫語，所以重點不在這裡。在參觀白羅斯國立大學時，他表示：「我們愈早全用俄羅斯語說話，共產主義便能愈早建成。」³³²幾十年後，當時蘇聯仍然存在，當這所大學想要聘一個能用白羅斯語講授白羅斯史的教授時，竟然找不到勝任人選。

沒有一個烏克蘭領導人曾經因為用烏克蘭語發表講話而受到訓斥——他們直到一九七〇年代還是這樣做，但馬祖羅夫的事情已足以讓他們學到教訓。在一九五八年，烏克蘭出版的所有書籍中有百分之六十是用烏克蘭語寫作，但這個數字在一九五九年降至百分之五十三。之後繼續下降：一九六〇年是百分之四十九，一九六五年是百分之四十一。與烏克蘭語出版品銳減齊頭並進的是俄羅斯語出版品的激增。在白羅斯，母語出版品的減少甚至更加快速：從一九五〇年的百分之八十五下滑至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三十一。

俄羅斯語出版品的激增反映著教育系統的俄羅斯化。一九五一到一九五六年之間，在烏克蘭語學校學生在全體學生的占比從百分之八十一降至百分之六十五。同一時期，俄羅斯語學校的學生從百分之十八提高至百分之三十一。大都市的情況尤其令人擔憂。在一九五九

年，基輔只有百分之二十三學生是用烏克蘭語學習，卻有百分之七十三是用俄羅斯語學習。隨著對教育系統俄羅斯化的步伐加快，愈來愈多俄羅斯語學校甚至拒絕開白羅斯語或烏克蘭語課程。在一九六〇年代末的明斯克，百分之九十的學生從來沒有上過白羅斯語的課。

烏克蘭俄羅斯化的速度之所以與白羅斯的情形不同，其中一個因素是兼併自波蘭領土後的文化政策所發揮的作用有關，這兼併以一九三九年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為基礎，後來又在一九四五年的雅爾達會議得到英、美的追認。西烏克蘭的烏克蘭人擁有發達的民族意識，其中以加利西亞和沃里尼亞為最，布科維納和外喀爾巴阡略遜一籌，這使得俄羅斯化的西烏克蘭和共和國其他地區的步伐被拖慢。為了把西烏克蘭整合到蘇聯，莫斯科有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敢對它下手太重。

西白羅斯的情況卻相反。它的城市居民比東白羅斯的城市居民更不眷戀本民族的語言、文化和歷史。這是因為東部地區畢竟在一九二〇年代經歷過短暫的白羅斯化，反觀被波蘭統治的西部地區卻沒有任何類似經驗。在一九五九年，住在西白羅斯城市的白羅斯人有百分之二十三自認俄羅斯語為母語，而居住在西烏克蘭城市的烏克蘭人只有百分之四這樣認為。到了一九七〇年，前一個數字增至百分之二十六，後一個數字卻降至百分之三。這是因為有大量烏克蘭農民遷入城市，而他們又拒絕放棄母語。

意識形態的一個重大轉向隨著赫魯雪夫被以布里茲涅夫為首的一群前親信趕下台之後發生。這場發生在一九六四年十月的宮廷政變是由黨和國家領導層的保守派分子發起，他們相信赫魯雪夫的改革政策已經威脅到俄共政權的穩定。新的統治者拋棄了赫魯雪夫的一些政策，包括不再下放權力給各共和國，也不再對共產主義癡迷。布里茲涅夫宣布，蘇聯社會是一個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也必須暫時以此為滿足。他沒有宣布共產主義社會何時會到來。新的領導層刪除黨綱中「目前一代的蘇維埃人將會生活在共產主義中」的說法，但沒有拋棄原有的黨綱或它的單一蘇維埃民族概念。

及至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布里茲涅夫已經把蘇維埃民族的觀念安置到他的民族政策核心。官方發起宣傳運動提倡蘇維埃的生活方式，又在新版的《蘇聯大百科全書》中給了「蘇維埃人」一個新定義。新定義去掉共產主義是蘇維埃人共同目標，但保留他們共同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共同使用俄羅斯語的部分。新定義另外引入了公民的觀念：「在蘇聯之下蘇維埃人處於同一批國家權力與國家管治的最高機構之下，每個人都擁有公民權。」³³³《蘇聯大百科全書》這麼敘述：「在蘇聯國與國之間溝通的共同語言是俄羅斯語。」

在文化上俄羅斯化自此成了官方政策。把非俄羅斯語邊緣化和排除在教育系統之外的行動始於一九七〇年的一紙命令：它規定所有學生的畢業論文都必須用俄羅斯語撰寫並得到莫斯科的通過。一九七九年，有關部門在塔什干舉行了一場全蘇聯的會議，就如何提高俄羅斯語教學的品質進行討論。從一九八三年開始，當局給予在以非俄羅斯語教學學校的俄羅斯語老師額外津貼。文化上俄羅斯化的步伐開始加快，因為它被認為攸關蘇聯民族打造工程的成敗。

在打造單一蘇維埃民族一事上，布里茲涅夫從赫魯雪夫那裡繼承而來的是一筆自相矛盾的遺產。赫魯雪夫的去史達林運動，導致政治、意識形態和文化上的「解凍」，讓一批不相信共產主義可能達成的政治活躍分子可以走到前台。他們認為，與其建造共產主義，不如改革社會主義，讓它的政治和文化變得多元化。他們又因此得到應該讓各民族文化自由發展的結論。正是在這個解凍時期，索忍尼辛的著作開始為讀者所熟悉—他日後將成為俄羅斯反對派的精神領袖。

保存歷史古蹟包括宗教古蹟的議題和生態關懷開始出現在一些俄羅斯作家的作品中。又因為常常把焦點放在飽受農業集體化摧殘的俄羅斯農村，他們後來被認為是一種叫「鄉村散文」的新文類的代表。類似的關切也見於包含烏克蘭和白羅斯在內的其他共和國作家的作品。驅使他們這樣做的不是對蘇聯土地或民族的感情，而是對自己共和國的民族和認同。黨中央是在俄羅斯語言和文化的基礎上打造單一

蘇維埃民族，各共和國的作家卻是在民族語言的基礎上各自組織起來，用民族文化術語來定義他們的關注點。

在俄羅斯，「赫魯雪夫解凍」帶來的文化復興讓作家和藝術家分裂為兩個政治和文化上對立的陣營。第一個陣營以文學刊物《青年近衛軍》為中心，鼓吹一種以保守主義和反自由主義為特徵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其成員既為俄羅斯農村和文化的命運鳴不平，又支持追求國家強大的理念和提倡沒多少掩飾的反猶太主義。另一個陣營是俄羅斯自由派，他們也有自己的刊物，最知名的一本是《新世界》。《新世界》也刊登很多「鄉村散文」，卻是持反民族主義立場。兩派人馬的衝突在一九六〇年代晚期白熱化。當時，俄羅斯保守分子在他們的刊物指控對手一心想要把俄羅斯文化美國化。自由派反過來指控對手表現出俄羅斯民族主義，渴望保存帝俄的傳統，企圖把俄羅斯文化孤立於全世界。

一九六九年，《新世界》一系列攻擊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文章迫使當局插手干預。兩本雜誌的總編輯都在一九七〇年被撤職。雖然《青年近衛軍》總編的去職標誌著黨宣傳機關見習領導人雅科夫列夫的勝利，但這勝利為時短暫。一九七二年，他因為發表文章攻擊俄羅斯民族主義在文學和文化生活的表現，丟了在中央委員會的職位，被外放到加拿大當大使。十年後的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他將會被蘇聯政治的明日之星戈巴契夫發現並帶回莫斯科，成為戈巴契夫改革計畫的設計師之一。

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黨中央當初會選擇犧牲雅科夫列夫，是為了安撫在俄羅斯知識分子中愈來愈得勢的民族主義勢頭，更重要的是為了吸收一些內奸，讓該趨勢處於黨的控制之下。不肯就範的人會被趕出國，例如俄羅斯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的非正式領袖索忍尼辛在一九七四年被攆走。其他人—例如《青年近衛軍》的新總編和「鄉村散文」健將伊凡諾夫，則必須調整他們的文化綱領去配合黨領導層強加給他們的指導方針。

黨將會繼續支持對蘇聯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俄羅斯化、贊助出版伊凡諾夫和其他俄羅斯民族主義作家的作品（前後有幾千萬冊），和接受他們的一些文化倡議。根據其中一個倡議，當局在一九八〇年舉辦了紀念庫里科沃戰役六百週年的活動。雖然在該戰役中被打敗的是來自東方的侵略者蒙古人，但蘇聯媒體卻把它反過來用，藉它來激發俄羅斯社會的反西方情緒。貫穿整個一九七〇和一九八〇年代，在邊區省分進行的俄羅斯化和反西方主義都是讓蘇聯忠貞黨員和俄羅斯民族主義作家可以攜手合作的兩大意識形態元素。

莫斯科願意和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溫和派講和，卻絕不容忍各共和國特別是烏克蘭的非俄羅斯民族主義。「民族共產主義」的觀念一度在一九六〇年代的烏克蘭復興，而根據這種觀念，打著國際主義幌子推行俄羅斯化乃是一種對列寧政策的背叛。民族共產主義在一九二〇年代的幾個領軍人物陸續於一九五〇年代晚期和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獲得平反，其中一位是斯凱里波尼克，他在一九三三年被指控犯了民族偏差錯誤之後自殺。早期支持民族共產主義的重要文化界人物，包括詩人圖奇納和電影製作人多夫任科，此時又活躍起來，幫稱為「六〇年代的一代」的作家和藝術家，提供靈感、支持和政治掩護。一九六〇年代的那些人鼓吹蘇聯各族人民自由發展，反對合流，代表人物有德拉奇、麗娜·柯斯登科和斯特斯，斯特斯後來被捕送往古拉格，死在那裡。一些烏克蘭學者也開始把他們對歷史趨勢和當前文化局勢的分析寫成備忘錄，呈交給黨官員過目。這些備忘錄在某種程度上相當於政策建議書，挑戰了俄羅斯中心主義史觀—以一九五四年的《論烏克蘭與俄羅斯的重新統一》為代表，對烏克蘭教育、文化和政治的俄羅斯化做法表示抗議，指出那是對列寧民族政策的偏離。

一九七二年五月，隨著烏克蘭共產黨第一書記舍列斯特遭免職，烏克蘭民族復興運動戛然而止。舍列斯特是個意志力強大的第一書記，掌管烏克蘭近十年，期間不僅容忍還支持烏克蘭文化的發展和烏克蘭人的身分認同。布里茲涅夫在莫斯科政治局與許多對手鬥爭那段期間，舍列斯特予以大力支持。作為回報，布里茲涅夫不大過問烏克

蘭的經濟和文化事務。不過，一等布里茲涅夫邊緣化自己在政治局的主要對手前KGB首腦舍列平，舍列斯特的日子便屈指可數。

就像史達林在消滅政治對手之後使用不著一九二〇年代的烏克蘭的黨領袖，舍列斯特也成為了消耗品。在這兩個情況中，緊接著烏克蘭黨領導人去職而來的是烏克蘭文化復興運動遭到攻擊。舍列斯特被調到莫斯科，起初擔任政治地位微不足道的部長會議副主席，不多久就被指控美化烏克蘭哥薩克國和犯了其他民族偏差錯誤。與此同時，KGB動手逮捕有民族意識的知識分子，對烏克蘭機關進行清洗。在布里茲涅夫的忠僕謝爾比茨基的整頓下，烏克蘭成了各共和國的模範生。既然異議分子都被送到了古拉格，再沒有什麼可以阻止蘇維埃民族打造工程的大步前進，而在烏克蘭，這工程意味著打著社會主義幌子復活「單一俄羅斯民族」。

如果說有哪個共和國領導人用不著莫斯科的指示便知道哪種民族政策適合布里茲涅夫統治下的蘇聯，那麼這個人非馬舍羅夫莫屬。從一九六五年開始直到他一九八〇年因為車禍去世為止，他掌管白羅斯共和國長達十五年。據說馬舍羅夫受到蘇聯總理柯錫金的支持，但和布里茲涅夫及其人馬不睦。與舍列斯特不同，馬舍羅夫在意外身亡之前始終保有官位。雖然捍衛本共和國的經濟利益，他從來不做復興白羅斯語言和文化的事。馬舍羅夫與舍列斯特的另一個不同處是公開講話時從不使用母語。他也沒有對本國在前現代的歷史表現出任何興趣。二戰期間，他是游擊隊戰士，一九四四年時年二十六歲獲得了最高榮譽的「蘇聯英雄勳章」。唯一讓他感興趣的是「偉大愛國戰爭」的歷史。

馬舍羅夫為二戰的英雄和受害者建造紀念碑，把游擊隊抵抗納粹的歷史轉化為白羅斯蘇維埃國的建國神話。與總是以哥薩克國和基輔羅斯為榮的烏克蘭人不同，白羅斯人沒有自己的建國神話，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接受「偉大愛國戰爭」這個全蘇聯神話。馬舍羅夫與包括貝科夫在內的本國知識分子相處融洽。貝科夫才華極高，但大部分精力都是花在描寫二戰經驗。那也是馬舍羅夫的主要興趣所在，是他用來

創造白羅斯人和蘇維埃人緊密關係的憑藉。俄羅斯和烏克蘭都產生出一大群又一大群的民族主義異議分子，但白羅斯人卻始終對莫斯科保持忠誠和感激。

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初期，赫魯雪夫曾經承諾會在這個時候出現的共產主義黎明仍無處可尋。不過，它的其中一個元素，一個稱為「蘇維埃人」的單一政治民族已經取得真正進展。把這一點表現得最清楚的莫過於該民族的通用語（即俄羅斯語）涵蓋幅員的大肆擴張。在一九七〇年，蘇聯人口中有百分之七十六自稱俄羅斯語流利。在一九七〇到一九八九年之間，聲稱對俄羅斯語有良好掌握的非俄羅斯人從四千二百萬人增加至六千九百萬。這是一個重大的成功，主要是在東斯拉夫人的共和國裡取得。

操俄羅斯語者的人口增加是以不平均的方式分布。在二億九千萬蘇聯公民中，有近七千五百萬不認為自己俄羅斯語流利，而他們大部分是住在東斯拉夫人構成的核心區之外。中亞和高加索地區的情況讓中央政府特別擔心：這些地方的居民俄羅斯語欠佳，讓從它們徵來的新兵很難有效地被整合到正在阿富汗作戰的蘇聯軍隊。這些地區的非俄羅斯人繼續聚族而居，族外通婚都是例外情況而非通則。只有東斯拉夫人和高度都市化的猶太人會自由通婚。大多數在普查員面前自稱俄羅斯語流利的非俄羅斯人都是烏克蘭人、白羅斯人和猶太人。在一九八九年的普查中，六千五百萬自稱俄羅斯語流利的蘇聯公民中有五千五百萬是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

在一九七〇年代和一九八〇年代的過程中，俄羅斯化在東斯拉夫人的共和國中加速進行。這不僅導致了在職場和學校使用俄羅斯語的情況激增（西烏克蘭是一個顯著例外），還大大降低了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的民族意識，這是透過受訪者是否認同母語來判定。認俄羅斯語為母語的烏克蘭人在一九五九年是百分之六，在一九七九年是百分之十，到了一九八九年是百分之十六。白羅斯人的民族意識衰退得更嚴重，前述三個年份的數字分別為百分之七、百分之十六和百分之二

十。每五個白羅斯人就有一個自認為是俄羅斯人，哪怕他們的護照不是這樣說。

所以，要把斯拉夫人和非斯拉夫人熔鑄為一個單一蘇維埃民族雖然明顯困難重重，但從東斯拉夫人打造出一個大俄羅斯民族的工程卻明顯上了軌道。在在看來，要實現帝俄時代民族工程師的舊夢—建立一個「全俄羅斯」民族，並不存在障礙。作為這些工程師的接班人，蘇聯領導層唯一需要的是時間，只可惜，到了一九八〇年代晚期，他們的時間已然耗盡。

326 “Rech’ tovarishcha G. V. Malenkova,” *Kommunist*, no. 3 (1953): 12.

327 “Theses on the Tree-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the Reunion of Ukraine and Russia,” in *Towards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Ukraine*, eds. Ralph Lindheim and George S. N. Luckyj (Toronto, 1996), 303-304.

328 前面提過，史達林說過：與被其他外國強權併吞相比，烏克蘭和喬治亞被併入俄羅斯是「較小的惡」。

329 Progra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Moscow, 1962).

330 XXII s’ezd KPSS—Steniografcheskii orchet (Moscow, 1962), vol. 1, 153.

331 Progra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332 Mamasharif Nishanov, *Obnovlenie dukhovnoi zhizni natsii* (Tashkent, 1992), 30.

333 S. T. Kaltakhchian, “Sovetskii narod,” in *Bol’shaia sovetskaia èntsiklopediia* (Moscow, 1970), s.v.

第六篇 新俄羅斯

第十八章 紅旗倒下

三位蘇聯最高領導人在短短幾年內相繼過世。統治國家十八年的布里茲涅夫歿於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他的接班人是前KGB首腦安德羅波夫，也在一九八四年二月病逝；下一位接班人契爾年科亦步亦趨，卒於一九八五年三月。老態龍鍾的蘇聯早已耗盡新觀念，而到了此時，它耗盡所有堅決維護舊意識形態、經濟和社會模式的領導人。

新一代的領導人中，五十四歲的戈巴契夫是熱中嘗試新事物的一位。擺在他面前最主要的挑戰，是彷彿自由落體的蘇聯經濟。一九三〇年代蘇聯的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約百分之十四，一九五〇年代慢了下來降至約百分之十，到了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更是掉至近百分之五。這還只是官方數字。據中情局（CIA）估計，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五年之間蘇聯的收入增長率僅接近百分之二，而「後蘇聯」時代算出來的數字還要更低。與此同時，蘇聯的人口卻以快得多的速度增長，在一九五〇年代突破一億八千萬人，至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更是達到兩億八千萬人。到了戈巴契夫一九八五年三月上台時，出現短缺的不僅是消費品，還包括糧食。振衰起敝，刻不容緩。

這位新領導人面對的另一個難題是黨和黨高層權力正當性、合法性的流失。共產黨靠的不僅是高壓統治和手段，也靠著許人民以一個光明燦爛的未來。這個未來被稱為共產主義的完成，而在民眾心目中，共產主義的完成意味著豐衣足食。赫魯雪夫曾經承諾，共產主義天堂會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實現。但這種天堂境界遲遲沒有出現，反而是經濟不斷衰落，讓人民對將臨天堂及其先知的信仰跌落谷底。當局對比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成就，聲稱社會主義的經濟表現注定會勝過資本主義。但這個預言從未實現。此說如果在一九五〇和一九六〇年代還多少可信，當時蘇聯的國民生產毛額增加超過兩倍，美國只增加一倍，但到了一九七〇年代，蘇聯的經濟已不再有競爭性。一九七〇年蘇聯的經濟規模體約為美國的百分之六十，此後規率地下滑，到一九八九年更是剩下不到美國的一半。

一九七〇年代晚期和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兩大超級強權的冷戰進入白熱化。當時，蘇聯在阿富汗泥足深陷，它在一九七九年出兵阿富汗支持一場社會革命，藉此阻止西方的推進，反觀美國卻開始從越戰的心理震撼和一九七〇年代的能源危機恢復過來，在詞令和對外行動上都變得更加咄咄逼人。在雷根總統的帶領下（他一九八一年一月入主白宮，當了兩任總統），美國不僅在阿富汗也在波蘭挑戰蘇聯。波蘭的工人示威催生出「團結工聯」，而這個組織不但反對波蘭共產黨的統治，也反對蘇聯的政治控制。雷根恢復軍備競賽，用「戰略防衛倡議」（後來被稱為「星戰計畫」）威脅蘇聯，擺出要武裝化外太空的態勢。計畫中的反飛彈系統因為據信可以解除蘇聯飛彈對美國的威脅，具有改變原有的權力平衡局面的潛力。雖然科技難題最後讓這個計畫淪為紙上談兵，但雷根當初卻深信其為可行。蘇聯人也是一樣，只不過他們缺乏資源，無法在下一輪軍備競賽追趕美國。

所以，戈巴契夫必須趕快採取行動，應付國內的經濟危機和權力正當性危機，以及應付來自國外的經濟、意識形態和軍事競爭。在國際舞台，他企圖透過談判，與美國簽署一批裁減軍備協議，以緩和緊張關係。此舉既可讓蘇聯省下軍費從事民主改革，也可確保西方願意出手相助，挽救蘇聯搖搖欲墜的經濟。戈巴契夫同時設法透過從阿富汗撤軍，減輕蘇聯的經濟負擔和改善蘇聯的國際形象。他在一九八八年落實撤軍行動，又容許東歐的蘇聯衛星國自行決定採取何種政體。這個決定導致它們的共產政權在一九八九年夏天和秋天被一連串大體和平的革命推翻，有效結束中歐和東歐地區的冷戰敵對情勢。

但最大的改變是發生在蘇聯本身，引起這種改變的是戈巴契夫推動的「重建」政策，或說是蘇聯社會的激進重建。他從兩個方面對舊體制發起攻勢，一是把私有財產和市場元素引入蘇聯的經濟空間，另一是打開政治辯論的空間。因為看見黨內老人抗拒經濟改革，戈巴契夫利用政治改革軟化或者粉碎對手。改革開放政策的關鍵觀念是「開放」（glasnost），即透過一系列措施鬆開對政治辯論的束縛，讓黨官員不得不落入媒體和公民的監督。

一九八九年，蘇聯舉行了自一九一七年革命以來第一次相對自由的選舉，蘇聯的政府體制開始產生變化。那年春天，蘇聯公民把他們的代表選入一個新的立法機關：「人民代表大會」。翌年，戈巴契夫利用大會修憲，終結共產黨對權力的壟斷和創立總統職位，蘇聯總統成為國家最高領袖，高於黨總書記之上。大會把戈巴契夫選為第一任總統，但他維持黨總書記的職位，用這個職位來瓦解共產黨的勢力。黨官員只有在地區議會或蘇聯議會當選方能保有權力。這一招不僅終結共產黨一黨專政，還動搖了中央政府的權力。地方官員自此更依賴選民的擁護而不是莫斯科上級的賞識。

民選出來的政治人物一旦開始傾向選民心聲，蘇聯就開始瓦解。在每個加盟共和國，從愛沙尼亞到俄羅斯到烏茲別克，和它們內部的每個自治共和國，選民都希望能夠當家作主。剎那間，所有共和國的國民都覺得自己的國家一直受到莫斯科欺負。歷史、語言、文化和民族主義都成了政治動員的有力工具，把不同的共和國推向不同的文化、經濟和政治軌跡。引入自由選舉轉化了蘇聯社會，讓多民族國家蘇聯的結構乃至整合性都受到了質疑。這種變化遠比戈巴契夫所預期的激烈，乃至不到數年間，崩潰的便不僅止於共產黨政權，還包括整個蘇聯。

在瓦解蘇聯一事上，很少共和國比俄羅斯聯邦扮演更重要角色，日後也很少有一個蘇聯民族比俄羅斯人更感覺到自己被蘇聯政體的崩潰出賣。史達林在一九三〇年代喜歡稱俄羅斯人為「最蘇維埃的民族」，而在二戰後的幾十年裡，他們也肯定占有這種地位。事實上，他們還變成了黨想要打造的「蘇維埃人」的核心。他們也準備好把其他人整合到這個核心裡。及至一九七〇年代，俄羅斯人只有極少數，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八，堅持同族通婚。當然，大部分對民調人員表示願意嫁娶族外人的俄羅斯人，都是抱著他們將會把配偶俄羅斯化的預期心理，而不是反過來。至此，布里茲涅夫致力推廣「蘇維埃人」和俄羅斯語的政策終於開花結果（晚至一九九八年，即蘇聯解體的七

年後，仍有百分之五十二俄羅斯公民表示他們擁護「蘇維埃人」的觀念）。

但是，一九七〇年代也是各個非俄羅斯人共和國抗拒布里茲涅夫政策的時代。一九七八年，當莫斯科試圖修改喬治亞憲法，刪除喬治亞語為該共和國官方語言的條文時，學生走上首都第比利斯街頭表示抗議。莫斯科最終讓步。既然喬治亞人被容許在自己的憲法中把母語明定為官方語言，其他加盟共和國當然不甘居於人後，要為自己的母語爭取同樣地位。這些共和國內的俄羅斯裔和操俄羅斯語者如果拒絕學習在地語言，會開始發現自己受到歧視。

這種情況讓人回想起一九二〇年代，當時莫斯科推行本土化政策以作為對非俄羅斯人的讓步。然而，一九二〇年代那時候，俄羅斯人在蘇聯的首要性不會受到質疑。現在的情形卻是截然不同。現在他們是落入守勢，被迫要麼用蘇維埃人的概念來減少自己的俄羅斯人色彩，要麼把非俄羅斯人看成是平起平坐而非低一等。這讓俄羅斯民族主義者有一種在自己國家中被圍困的感覺，開始表達不滿。隨著當局把俄羅斯人說成是「最蘇維埃的民族」，他們被迫放棄他們革命前傳統身分認同的很多元素，包括君主主義和宗教。革命前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認為這些元素是以鄉村為基礎，也是受到鄉村的維持。現在，在索忍尼辛和一批「鄉村散文」作者帶領下（他們的出版品我們上兩章討論過），出現了一個致力恢復和保存傳統俄羅斯人身分認同的運動。

那個起而對抗共產政權蘇維埃化政策和邊區文化自信興起的「俄羅斯民族」，是根植於革命前的時代。新一代俄羅斯民族主義思想家常常以帝俄思考模式定義俄羅斯人，即認為俄羅斯人不僅涵蓋俄羅斯裔，還包含烏克蘭裔和白羅斯裔。有鑑於俄羅斯語在烏克蘭和白羅斯非常流行，上述思考方式相當類似帝國時代的「單一俄羅斯民族」理念。這種想法同時得到俄羅斯文化建制和異議分子的支持。

在官方批准出版的書籍文章裡，基輔羅斯的人民常常被稱為俄羅斯人或老俄羅斯人，而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的土地則常常被稱為南俄羅斯和西俄羅斯。這種回歸帝俄論述的現象之所以可能，一大原因是俄羅斯語缺乏區分俄羅斯人和羅斯人—或魯塞尼亞人的字眼。很多地下刊物也是持一樣態度。例如，奧西波夫主編的雜誌《市民會議》（Veche，這個詞是指中世紀市民議會），一九七〇年代初期開始發行，印數五十至一百份，便公然主張三支東斯拉夫人本質上統一，又統稱他們為俄羅斯人。

但不管是蘇聯版本或是帝國時代舊版本的泛俄羅斯民族觀念，都在第二大東斯拉夫民族的知識菁英中間踢到鐵板。在俄羅斯，一九七〇年代的異議運動分子為自由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兩派：前者以沙哈洛夫為代表，他是蘇聯的氫彈之父；後者以索忍尼辛為代表。不過，在烏克蘭，異議分子卻是結合在一起，無分自由主義者還是民族主義都是致力於同一目標。

這種趨勢界定了「烏克蘭赫爾辛基小組」的意識形態綱領和文化綱領。該組織是受一九七五年《赫爾辛基協定》啟發而建立的人權瞭望組織，致力於責成蘇聯在人權問題上遵守國際規範。它是在一九七六年秋天不理會當局反對的情況下成立，而不久之後，莫斯科也有了一個類似的組織。雖然其成員沒有把烏克蘭獨立列為直接的政治目標，卻強調烏克蘭和俄羅斯在文化和政治上應該是平起平坐。對烏克蘭赫爾辛基小組成員而言，莫斯科不僅是蘇聯的首都，還是俄羅斯的體現，所以反對蘇聯就是反對俄羅斯的宰制。他們在一九七七年二月通過的綱領性文件中把這一點說得很清楚：「我們高度尊重俄羅斯人的文化、宗教和理念，但莫斯科為什麼應該在國際論壇（像在赫爾辛基和貝爾格勒舉行的那些）處處為我們做出決定和承諾？為什麼烏克蘭的文化、創意、科技、農業和國際事務應該由一個鄰國（甚至是盟國）的首都來定義和計畫呢？」³³⁴

俄羅斯民族主義者意識到，烏克蘭對他們來說構成一道難題。在當時最重要的地下文學（未經官方授權自行出版和祕密分發）文本

《古拉格群島》中，索忍尼辛既哀歎歷來多次融合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的企圖未能成功，又不放棄兩者終將合流的希望。他寫道：「我們在基輔羅斯時期構成了一個民族，但那之後便被硬生生分開，自此生活方式、習慣和語言都各走各路……」³³⁵他譴責共產政權，特別是一九三〇年代和一九四〇年代的政權是引起烏克蘭有出走念頭的罪魁禍首。但不管俄、烏之間有多大的差異，父親是俄羅斯人、母親是烏克蘭人的索忍尼辛還是希望它們會待在一起：

烏克蘭的情況將會讓人異常痛苦。但我們必須注意到他們當前的普遍態度有多麼執著。既然這個問題歷經幾百年都沒有獲得解決，我們現在就必須表現出審慎態度。我們有責任讓他們自行決議—不管在他們中間最後勝出的是聯邦主義者還是分離主義者。不肯讓步是愚蠢和殘忍之舉。我們現在表現得愈是溫和、克制和睿智，那麼我們在未來恢復統一的希望就愈大。先讓他們自己試試看自己的辦法。然後他們很快就會看出，分離解決不了所有問題。³³⁶

索忍尼辛在一九六〇年代預想到的可能在一九八〇年代晚期隨著戈巴契夫推出開放改革政策而突然變成了現實。他能夠預測未來，是因為他了解烏克蘭政治活動家的態度，他和他們其中一些人曾經是古拉格的獄友。到了一九八〇年代晚期，包括烏克蘭赫爾辛基小組成員的所有政治犯都被釋放了。他們可以自由從事政治活動，對政治覺醒的民眾提出經濟、政治和民族問題方面的建言。雖然第一個宣布主權獨立的（主權獨立意味著本國法律凌駕蘇聯的法律）是愛沙尼亞，但在蘇聯的東斯拉夫核心中，第一個這麼做的卻不是烏克蘭或白羅斯，反而是俄羅斯這個「最蘇維埃」的國家。為什麼會有這種事？

答案首先是，把俄羅斯人和蘇維埃人劃上等號的一貫做法出現了裂痕，因為俄羅斯知識菁英拒絕繼續為蘇維埃共產主義的失敗政策「背黑鍋」，拒絕為它過去、現在和未來負責。蘇聯的經濟凋敝和黨的失去正當性讓非俄羅斯民族起而反抗莫斯科，連帶反抗俄羅斯人，因為俄羅斯人即使不是蘇聯帝國的擁有者，至少也是管理者。但俄羅斯人拒絕為蘇聯體制的弊端而被要求負責。「鄉村散文」派的俄羅斯

作家早就認為，共產主義政權的主要受害者是他們的共和國，而不是其他共和國的非俄羅斯人。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樣，他們現在公開反對蘇聯政權，不甘後人地和他們的指控者爭奪「最大苦主」頭銜。

「鄉村散文」作家別列夫在一九八九年競選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席位時這樣說：「三〇年代思慮不周的農業集體化不僅害苦了農民，還害苦了整個俄羅斯人民。根據我得到的資訊，俄羅斯人不到這個國家〔人口〕的半數。」³³⁷在一九八九年，總數二億八千六百萬的蘇聯公民中，俄羅斯裔的人口是一億四千五百萬。俄羅斯人在蘇聯人口的占比確實往下掉，而這是因為一個快速現代化的民族，其生育率不可能競爭得過信奉伊斯蘭教的中亞共和國。例如，在一九七〇和一九八九年之間，塔吉克的人口幾乎增加一倍，達到四百二十萬。俄羅斯的低生育率被認為不是現代的特徵和城市化的結果，而是一個可怕的警告，乃至乎是一齣悲劇。

當莫斯科的俄羅斯知識分子正在想辦法回應搖搖欲墜的帝國所帶來的挑戰時，帝國外省的俄羅斯人和他們操俄羅斯語的盟友³³⁸也開始動員民眾。如果說別列夫之輩的莫斯科知識分子是代表一個形成中的主權民族，那他們在非俄羅斯人共和國行動的同儕則是為了捍衛蘇維埃帝國。後者的支持力量不是來自俄羅斯的政治領袖，而是蘇聯的領導層，這個領導層試圖在邊區動員俄羅斯民族主義，好讓蘇聯可以存活。

一九八九年期間，在宣布自己的共和國是主權獨立國家之後，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人民集體走上街頭，抗議莫斯科計畫修改蘇聯憲法。這些修改將會讓蘇聯的法律凌駕於共和國的法律之上，有權片面決定一個共和國可否脫離蘇聯。為了引起觸目，波羅的海民族運動（「民族陣線」）在一九八九年八月進行了一場名為「波羅的海之路」活動，以人鍊³³⁹把三國的首都—塔林、里加和維爾紐斯連結在一起。活動當天是《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五十週年：蘇聯正是以這個條約為口實在二戰期間占領波羅的海三國。

在已經失去一切的波羅的海三國黨部的支持下，莫斯科進行反擊，動員俄羅斯裔和操俄羅斯語者支持蘇聯。這些地區內的操俄羅斯語人口因為本土語言和文化的復興而倍感威脅，普遍支持拉脫維亞的「國際陣線」和愛沙尼亞的「國際運動」，兩者都是莫斯科支持的政治組織，致力於透過有名無實的民族主義反制主體民族創造的人民陣線。

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比立陶宛更禁受不起來自中央的壓力。人口兩百六十萬的拉脫維亞處境最是危險：拉脫維亞人只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二，其次是俄羅斯人占百分之三十六，然後是烏克蘭人占百分之四點五和白羅斯人占百分之三點五。在愛沙尼亞，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羅斯人一同構成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波羅的海三國的俄羅斯裔和東斯拉夫裔居民大都是二戰之後才遷入，在莫斯科建立和營運的工業企業工作。每當民族陣線朝主權獨立甚至政治獨立的目標往前推出多遠，國際陣線就會往回推多遠。

在俄羅斯，第一波政治動員始自一九八九年春天蘇聯超級議會的半自由選舉，一路延續至一九九〇年的俄羅斯議會選舉。就像上一個十年的異議運動那樣，這一次的異議運動也是分裂為兩派：自由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後者在經濟和社會議程上持保守心態，強調共產主義政權對俄羅斯人有很多不是，但與此同時又對共產主義表示忠誠和支持波羅的海國際陣線之類的運動。

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在俄羅斯的匯流表現在「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創立，戈巴契夫一直反對和阻擾這事情，唯恐一個獨立的俄羅斯聯邦共產黨會導致蘇聯共產黨的瓦解，最終導致蘇聯本身的瓦解。從列寧開始，維持一個蘇聯共產黨的門面就是一貫政策，列寧固然希望有一個共和國的聯盟，但也相當樂見俄羅斯人主宰全聯盟。但是，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人現在卻要求一個自己的黨，以便可以跟烏克蘭、白羅斯和其他共和國的共產黨平起平坐。他們終於在一九九〇年夏天如願³⁴⁰。自此，俄羅斯保守分子走上了一條和全聯盟發生衝突的道路。

另一方向的俄羅斯人動員不是為了反對非俄羅斯人，而是要與他們結盟。在追求民主的願景上，俄羅斯自由派知識分子和波羅的海、烏克蘭及一些其他加盟共和國的民族陣線和民族運動有志一同。一九八九年夏天，他們把力量結合起來，在以半民主方式選出的蘇聯超級議會即人民代表大會內組成「跨區域議員團」。該黨團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和俄羅斯及蘇聯其他大型工業城市都找到支持者。它那些有民主意識的議員全都反對共產黨的壟斷地位，只不過，他們能夠主導議程的力量有限，因為跨區域議員團中的非俄羅斯共和國議員總是把民族議題放在第一優先。戈巴契夫則得到來自非俄羅斯人共和國特別是中亞的保守派議員支持。

「民主俄羅斯」是由「跨區域議員團」中的自由派議員組成，在一九九〇年三月的俄羅斯議會選舉中贏得了一百九十個席位，即贏得約五分之一的席位。這使得俄羅斯自由派能夠把主要活動的舞台從蘇聯議會轉移至俄羅斯議會。一九八九年五月，他們成功地讓自己的領袖葉爾欽當選無比重要的議會主席職位。五十八歲的葉爾欽原是黨的大老，後來因為不滿戈巴契夫的改革步伐太慢而另起爐灶。為人特立獨行又霸道，葉爾欽熱烈支持民主改革的計畫。於是，俄羅斯改革派決定運用他們在議會的力量，加快民主和市場改革。一九九〇年六月，在三分之二議員的贊成下，俄羅斯聯邦宣布主權獨立，但名稱上仍維持「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這個構想對自由派和保守派同具吸引力。葉爾欽告訴議會代表：「對於今日的俄羅斯，中央同時是個殘忍剝削者和吝於施恩者，不太關心俄羅斯的未來。我們必須終止這種不公道的關係。」³⁴¹他的這番話是在為興起中的自由派俄羅斯民族主義運動發聲。這運動的忠誠對象不是由族裔界定奠基在俄羅斯民族的「小」（small）民族或帝國時代的「大」（big）俄羅斯民族，而是一個將會由俄羅斯聯邦居民構成的民族。雖然俄羅斯聯邦以俄羅斯人占壓倒性多數（百分之八十二），但也包含了許多自治共和國和因為各種理由未能成為加盟共和國的地區民族成員。除東普魯士（它現在是俄羅斯的加里寧格勒地

區），俄羅斯聯邦的領土從波羅的海邊上的列寧格勒（即將更名為聖彼得堡）一直延伸至太平洋邊上的海參崴，中間毫無間斷。這是形成一個民族的良好條件。只不過，在一九九〇年時，這個條件仍面臨著許多挑戰。

一九九一年六月，葉爾欽競選新創立的俄羅斯聯邦總統職位並獲勝，打敗了由一度是他恩人後來又成了仇人的戈巴契夫所支持的其他候選人。與一九九〇年春天靠著蘇聯議會選為蘇聯總統的戈巴契夫不同，葉爾欽是靠著俄羅斯選民獲選俄羅斯總統。所以，一上任他就向俄羅斯聯邦的公民宣誓效忠，承諾保衛共和國及其人民的利益。

葉爾欽和他的自由派支持者把俄羅斯聯邦視為改革整個蘇聯政治和經濟的發動機。但投票給他的民族主義者當初卻希望藉俄羅斯聯邦來加強俄羅斯人的身分認同、為俄羅斯文化提供支持，並削減對加盟共和國的經濟資助，他們一直認為這是俄羅斯經濟不振的原因。但沒有人主張瓦解蘇聯。一九九一年夏天，透過與其他共和國的領導人結盟，葉爾欽迫使四面楚歌的戈巴契夫同意對蘇聯進行改革。一九九一年七月，戈巴契夫、葉爾欽和哈薩克領導人納札爾巴耶夫議定新的締盟條約。該條約把大量經濟和政治權力交給各共和國的領導人，特別是俄羅斯的領導人。

這協議原定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日生效。但就在生效前一天，戈巴契夫的一些助手包括KGB、警察和軍隊的負責人，因為知道他們將會在重新改組後失勢，悍然發動了一場政變，以維護蘇聯的原有體制。戈巴契夫因為拒絕附從，被政變策畫人軟禁在克里米亞的度假別墅。政變發生時，葉爾欽和幾個顧問剛訪問哈薩克回國，在莫斯科郊區的別墅享受悠閒時光，所以完全措手不及。他們決定反擊，動員莫斯科市民支持。他太太奈娜勸丈夫不要冒險犯難：「外面有坦克，你出去有什麼意義？他們不會讓你通過的。」³⁴²葉爾欽不予理會，他日後回憶說：「我必須出面。所以我用我想得出來的最好方法安慰她：

『我們車上插著一面小小的俄羅斯國旗。看到國旗，他們一定會讓我們通行。』」葉爾欽毫髮無傷去到位於市中心的俄羅斯議會大廈「白

宮」[343](#)，但KGB的特種部隊沒對他怎樣不是因為那面國旗，而是因為沒接到要逮捕葉爾欽的命令。但他的支持者仍然認為國旗的作用舉足輕重。

到達莫斯科幾小時後，葉爾欽在「白宮」前面一輛坦克上面發表講話。這時，他的助手把一面俄羅斯旗幟高舉在他身後。陰謀策畫者用的是蘇聯的紅旗，反對政變的人則是以一九一七年俄羅斯共和國的白、藍、紅三色國旗與之互別苗頭，以象徵俄羅斯要對抗共產帝國。政變在幾天後失敗，舊三色旗成了俄羅斯民主制度和俄羅斯聯邦的官方旗幟。葉爾欽的勝利把俄羅斯推向了一條新的軌道，而事態日後的發展顯示，那是一條和其他共和國非常不同的軌道。

一九九一年八月的未遂政變企圖推翻葉爾欽及其支持者取得的所有成就，但他們成功反擊，高舉俄羅斯旗幟反對蘇聯旗幟。葉爾欽的勝利從根本上改變了一切，但這勝利一開始一度幾乎讓「新俄羅斯民族」方案胎死腹中。隨著戈巴契夫被助手出賣和驚魂未定，葉爾欽認為自己掌握了莫斯科的實權。他開始接管蘇聯中央：把自己的人任命為蘇聯政府總理，又迫使戈巴契夫撤回軍隊、警察和安全部門新負責人的人事命令，用自己的人馬取而代之。至此，葉爾欽不再需要俄羅斯聯邦及其機關作為促進自由化改革的載具—從一開始，這種改革就會被設定為全蘇聯的規模。

後來為俄羅斯經濟改革掌舵的蓋達爾在當時力勸葉爾欽挽救蘇聯。他後來寫道：「當時，在我看來，只有一個可能挽救蘇聯。那就是戈巴契夫馬上辭職，把權力轉移給蘇聯最大一個共和國的總統。這樣，葉爾欽就可以合法地把聯盟置於他的掌管之下，並動用全體俄羅斯人民領袖的無上權力，把兩個權力中心統合在一起，這兩個權力中心的鬥爭是帶來崩潰的根本原因之一。」[344](#)

但為時已晚。其他共和國，尤其是烏克蘭，已經決定自行其是，因為對他們來說，由俄羅斯來接管蘇聯中央甚至比當初的政變更讓他們心驚。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蘇聯第二大共和國烏克蘭宣布脫

離蘇聯獨立，在當時的環境，這等同宣布脫離俄羅斯獨立。到了一週結束，幾乎每個還未宣布獨立的共和國都追隨烏克蘭的榜樣。葉爾欽慌了，對烏克蘭和哈薩克發出威脅，說它們若是堅持獨立，就必須把一些領土歸還俄羅斯。他還派出高規格代表團到烏克蘭，動之以情，說之以理。代表團沒能達成任務。當代表團成員也是葉爾欽盟友的索布恰克試圖大談俄羅斯和烏克蘭的統一性時，他被基輔街頭的示威者噓下台。烏克蘭人不想留在俄羅斯。他們不想要什麼聯盟，只想走人。

隨著讓俄羅斯接管聯盟的計畫失敗，蓋達爾不想再拯救蘇聯。他的任務變成是要透過快速經濟改革，讓俄羅斯從全蘇聯的政治和經濟崩潰中拯救出來。於是，俄羅斯聯邦再次成為俄羅斯自由派改革者的焦點。不等其他共和國跟上，葉爾欽和蓋達爾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開始實施激進經濟改革，而此舉有效地打破原先整合在一起的蘇聯經濟空間。俄羅斯雖然在經濟上走自己的路，但還是希望和其他共和國維持某種形式的經濟聯盟。葉爾欽和他的顧問們不理會住在波羅的海三國的俄羅斯裔和操俄羅斯語者的願望而承認這三國獨立。至於前蘇聯的其他部分，他們希望把它們建構成一個聯邦：在他們的如意算盤中，俄羅斯將會在新聯邦中扮演關鍵角色又不用為其他共和國買單。事實證明，這是癡心妄想。戈巴契夫不可能滿足於在一個實際由葉爾欽掌控的聯盟當虛位元首，而以烏克蘭為首的其他共和國又早已選擇了獨立。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一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烏克蘭人以選票支持他們的共和國獨立。葉爾欽只好向不可改變的事實低頭。一個星期後，在白羅斯／波蘭邊境的別洛韋日，葉爾欽會見了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和白羅斯議會議長舒什克維奇。三人達成協議，解散戈巴契夫領導的蘇聯，以一個葉爾欽相信將會由其領導的「獨立國協」³⁴⁵取而代之。就這樣，蘇聯不見了，被一度構成一個「大」俄羅斯民族的三個共和國的領袖所瓦解。

幾個月前沒有人可能料到這種結果。雖然沒有宣布獨立—甚至沒有想過要獨立，俄羅斯卻在事實上獨立了。當聯盟的「音樂」停止播放，葉爾欽和俄羅斯自由主義者驚訝地發現俄羅斯聯邦只剩下一具空殼子，其經濟、制度和意識形態內容都猶待填上。再來還有新成立的獨立國協帶來的問題，很多俄羅斯人都把它視為蘇聯的延續。夾在俄羅斯聯邦和獨立國協中間，俄羅斯的政治和知識菁英必須想辦法摸索出俄羅斯人的政治身分認同。

在一九九〇年代，葉爾欽多次要求他的顧問想出一個俄羅斯民族的新定義。這任務相當不容易。在一九九一年六月的第一次俄羅斯聯邦總統就職典禮上，葉爾欽承諾捍衛人民的權利。這也是戈巴契夫在上一年的就職演說中使用的公式，葉爾欽只是把該演說提到的「蘇聯」一詞換成「俄羅斯聯邦」。他的簡短演說中沒提俄羅斯人民或民族。在一九九六年的第二次總統就職典禮，葉爾欽固然承諾他會忠實為「人民」服務，卻沒有具體說明「人民」是指什麼人。不單是葉爾欽，其他俄羅斯官員也一樣不願意從民族的角度定義俄羅斯的國民。在官方聲明中，俄羅斯聯邦的居民極少被稱為俄羅斯民族。

很少有人比季什科夫對「民族」這個詞被廢棄更加感到失望。他是蘇聯科學院（後稱俄羅斯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所長，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曾率先提倡「俄羅斯公民民族」，主張無分族裔和文化背景，俄羅斯聯邦所有公民構成同一個民族。他把該民族稱為 *rossiiskaia*（俄羅斯國民），不稱之為 *russkaia*（俄羅斯民族）。前者是帝俄時期的形容詞，後者是一個充滿族裔色彩的字眼，較為狹隘地指大俄羅斯人（Great Russian）或三支東斯拉夫人構成的俄羅斯民族。

季什科夫是在一九八九年開始發展他的這個想法，當時正值第一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和自由派以跨區域議員團的形式組成反對黨。他把 *rossiiskaia* 視為一個跨族裔和跨文化的民族，共通處在於服膺同一套價值觀和制度。這個民族的象徵符號應該是出自自由派的革命而不是帝國的歷史往昔。季什科夫反對「多民族俄羅斯人」的說

法，認為它不僅自相矛盾，還帶有政治上的危險性，因為它否認「俄羅斯公民民族」的政治正當性，讓不同的族群有權以身為獨立民族為由建國，這種事在蘇聯解體時就發生過。他的一些觀點，如反對以民族為基礎的聯邦制和偏好領土自治，都可以回溯至立憲民主黨人在一九一七年的思想。

俄羅斯獨立後的頭兩年，當局積極推廣公民模式的俄羅斯人身份認同。季什科夫被任命為民族部長，而他的觀念也成了一九九一年十一月通過的公民權法令的基礎。這些法令把俄羅斯公民稱作 *rossiane* 而不是 *russkie*，規定公民資格不以申請者的族裔或語言為考量。但季什科夫提出的身份認同新模式很快就碰到嚴重困難。一九九三年秋天，葉爾欽動用武力鎮壓反對他的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勢力：在他的一聲令下，坦克砲轟反對派的大本營「白宮」，兩年前葉爾欽和他的支持者就是在「白宮」對抗政變，而季什科夫也建議把它列為新俄羅斯的象徵之一。擊敗對手後，葉爾欽修改憲法，把權力從議會搬到總統府。此舉不僅讓新俄羅斯的象徵受到損害，還讓民主的理念蒙受重大打擊，此後不曾完全復甦。

再來還有發生在莫斯科之外的問題。俄羅斯聯邦中那些以族裔為基礎的自治單位並不樂於被納入一個由 *rossiiskaia* 組成的公民民族。車臣人想要完全獨立，而其他自治共和國如韃靼共和國則要求更多權利。一九九四年十二月，葉爾欽下令俄軍進入車臣，結束其實質獨立。車臣人發動反擊，迫使俄軍在一九九六年八月求和。俄羅斯將會在二〇〇一年才回頭解決車臣地位的問題³⁴⁶。另一方面，固然有些俄羅斯聯邦境內的飛地不願成為聯邦的一部分，可也有些位於其境外的飛地想要加入。這包括在摩爾多瓦片面宣布獨立的「聶斯特河沿岸共和國」，以及在喬治亞片面宣布獨立的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

俄羅斯人碰到的是其他帝國主義民族熟悉的問題：帝國的內爆讓一批公民失去了公民權，他們要麼認為自己是前支配民族的成員，要麼認為自己曾充分配合前支配民族，以致生活在獨立後的前殖民地有一種不安全感。俄羅斯的公民權法令容許這些人移民俄羅斯或是擁有

雙重國籍，而此舉固然強化了俄羅斯人身分中的文化和法律成分，卻也弱化了其中的地域成分。據一些人估計，有近三千萬認同俄羅斯的俄羅斯裔和操俄羅斯語者是住在俄羅斯聯邦境外。他們有許多人，特別是住在波羅的海三國和克里米亞的那些人，都渴望取得俄羅斯公民權，但這種渴望又與所在國的公民權法令衝突，這些法令不歡迎甚至會禁止擁有雙重國籍。法律衝突把後蘇聯空間變成了一個隨時會爆炸的火藥桶。

-
- 334 Osyp Zinkevych, *Ukrains'kyi pravozakhysnyi rukh* (Toronto, 1978), 22.
- 335 Aleksandr Solzhenitsyn, *Arkhipelag Gulag* (Moscow, 2000), books 5-7, 47.
- 336 同上，49.
- 337 Roman Szporluk, *Russia,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 2001), 194
- 338 指在其他共和國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
- 339 指由波羅的海三國人民手牽手構成的一條「長鍊」。
- 340 實際上「俄羅斯聯邦共產黨」成立於一九九三年二月十四日，第一任黨主席是久加諾夫（Gennadii Zyuganov），至今仍是擔任主席，是俄羅斯最大在野黨。
- 341 Serhii Plokhyy, *The Last Empire: The Final Day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2014), 37.
- 342 同上，95.
- 343 俄羅斯聯邦國會大廈，因為外表為白色，故被稱為白宮。
- 344 Iegor Gaidar, *Dni porazhenii—i pobed* (Moscow, 1996), 81.
- 345 概念類似大英國協。
- 346 普丁在一九九八年出兵車臣，粉碎其獨立地位。

第十九章 俄羅斯世界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疾病纏身的葉爾欽利用新年講話的機會，宣布了一個讓人意外的消息。他要辭去俄羅斯聯邦總統之職。他的講話和隨後的廣播明明白白道出，他屬意的接班人是四十八歲的總理普丁。後者緊接在葉爾欽之後發表了講話。

直到他第一次向全國發表談話當時，普丁還是個諱莫如深的人，沒多少人知道他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他是幾個月前的一九九九年夏天才進入政治高層，被葉爾欽任命為總理，跌破許多人眼鏡。總理的任務只是管理經濟和日常行政事務，和國家大政無多少關係。普丁早期是個情報官，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之間主管「聯邦安全委員會」，是後蘇聯時期俄羅斯的祕密警察，而他會被葉爾欽相中，是因為葉爾欽的親近圈子認為他有能力反制那些準備好在下一次選舉把葉爾欽趕下台的政敵。大位的一個角逐者是莫斯科市長盧日科夫：他大打俄羅斯民族主義牌，多次高調訪問塞瓦斯托波爾，那是俄羅斯艦隊在烏克蘭的基地，把自己打扮成國外俄羅斯人的捍衛者。他還資助一批社會和文化方案，為莫斯科大学開了一間分校。

另一個競逐者是普里馬科夫。此君是俄羅斯一九九八年金融危機發生後葉爾欽的總理，一向主張重新整合後蘇聯空間，讓其處於俄羅斯控制之下。在一九九六至一九九八年擔任俄羅斯對外情報局負責人和外交部長任內，普里馬科夫改變俄羅斯原有的親西方政策，認定增加俄羅斯在「近鄰」的地位是恢復俄羅斯強權地位的先決條件。「近鄰」是莫斯科用來指稱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用語。普丁的總統之路受到一群與葉爾欽過從甚密的財閥支持，其中一位是億萬富翁別列佐夫斯基。就像普丁的其他支持者一樣，別列佐夫斯基認為普里馬科夫的整合計畫成本太高，有違俄羅斯的經濟利益。

葉爾欽曾協助創建俄羅斯國家，但這個國家尚未完工，有待他的後繼者去定義它的性格和確定它的邊界。在二〇〇〇年除夕那次令人驚

訝的講話中，葉爾欽稱呼聽眾為「俄羅斯國民」（rossiiane）³⁴⁷。他屬意的接班人普丁則除了把聽眾稱呼為「俄羅斯國民」，還稱作同胞。到底他心目中的「同胞」只是指俄羅斯聯邦的公民，抑或還包括國外的俄羅斯人和操俄羅斯語者，不是那麼清楚。

還是一九九三年秋天的時候，保護波羅的海地區和獨立國協其他共和國內的俄羅斯人和操俄羅斯語者是俄羅斯政壇的熱門話題，也是讓反葉爾欽的民族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集結起來的口號。作為反擊，葉爾欽下令軍隊進攻被反對派領袖占領的議會大廈，把這些人統統關起來。然後，他利用一九九四年新年講話的機會，表示政府並未遺棄在「近鄰」的俄羅斯人。他稱他們為「同胞」，即分享同一個祖國的人。但要怎樣照顧他們卻不清楚。葉爾欽政府最初想要讓這些「同胞」享有雙重國籍，但受到烏克蘭在內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抵制，因為它們不承認雙重國籍。

然後葉爾欽的顧問團想出了獨立國協公民權的構想—類似的想法在一九九一年便提出來過，但被烏克蘭否決。這一次，除白羅斯表示有意願配合以外，其他前蘇聯加盟共和還是不買單。一九九七年，葉爾欽和白羅斯的新領導人盧卡申科簽署一份兩國締結聯盟的憲章，是以普遍的俄羅斯—白羅斯公民權為發想。在當時，白羅斯已經恢復一種蘇維埃風格的國旗，也已經重新把俄羅斯語定為官方語言之一。即便沒有完全終止原有的民族化計畫，但比例縮小。白羅斯和俄羅斯的聯盟提出了一個更加挑戰俄羅斯國籍的公民主義典範。

俄白聯盟始終沒有落實，不曾出現過共通的政府機關和共通的公民權。為締結聯盟所進行的談判主要為滿足為數不少俄羅斯人對蘇聯的緬懷心理。他們很多人還未能從失去一個更大國家和身分認同的震撼中恢復過來。俄羅斯領導層不願按照「東斯拉夫人統一體」的觀念創建一個單一的「俄羅斯人」國家。因為就像一九九一年戈巴契夫的蘇聯那樣，少了烏克蘭，這個國家將不會完整。而烏克蘭的動向恰恰和明斯克的新政府相反。當葉爾欽和盧卡申科在一九九七年簽署聯盟憲章時，烏克蘭和俄羅斯正在談判正式離婚的條件。雙方最後議定，

烏克蘭把塞瓦斯托波爾海軍基地租借給俄羅斯，以換取俄羅斯承認烏克蘭的版圖和答應不再支持克里米亞的親俄分離主義分子。這讓東斯拉夫人聯盟的破局成為定局。

至此，俄羅斯領導層只能在俄羅斯聯邦的政治基礎上建構一個新的俄羅斯民族。這是一個即便不是不可能也仍舊困難重重的任務。一九九七年一項民調顯示，百分之八十五的俄羅斯聯邦公民仍然鍾情於族裔意義的俄羅斯民族觀念，百分之七十一青睞公民意義的民族觀念，百分之五十四的人強烈眷戀蘇維埃人的觀念。一九九六年，葉爾欽籲請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幫忙找出一個新的俄羅斯民族定義。大多數的回應都是建議以國家為基礎打造新俄羅斯人的身分認同。³⁴⁸但也有人抱持其他想法。重新抬頭的俄羅斯共產黨，它的受歡迎程度對政府是主要的威脅，它設法維持俄羅斯人的全聯盟身分認同，又強調東斯拉夫人的統一性和東正教元素。激進民族主義者鼓吹一種排除非俄羅斯裔公民的純淨俄羅斯民族。較溫和的民族主義者推動一種以文化為基礎的東斯拉夫人身分認同，把俄羅斯聯邦境外俄羅斯裔和操俄羅斯語者納入。

一九九六年，歷史人口統計學家卡布珊出版了他對俄國境外俄羅斯裔和操俄羅斯語者分布狀態的研究結果。他把俄羅斯人視為一個族裔和文化實體，所以在他的俄羅斯人分布圖裡的俄羅斯人地區還包括東烏克蘭、南烏克蘭、北哈薩克、部分愛沙尼亞和部分拉脫維亞。卡布珊希望這些地區要麼回到俄羅斯，要麼在各自的所在國形成自治的單位，擁有語言和文化的特權。他還建議把非俄羅斯人為主的地區分離出去。他的主張不僅有利於車臣的分離主義者，還有利於那些主張建立一個俄羅斯民族國家的人。這種以文化為基礎的俄羅斯民族觀讓很多政府的反對者浮想連翩，不過他們沒幾個人準備要放棄俄羅斯聯邦的任何一片領土。他們希望擴張—即使不是擴張領土也是擴張治外法權，好讓那些被他們認為是自己民族成員的人得到保護。

普丁在二〇〇〇年三月贏得總統選舉，該年五月就任。他會得勝，一大原因是原定六月舉行的選舉因為葉爾欽的突然辭職而提前，讓他

的對手猝不及防。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一件事情透露出普丁雖是葉爾欽屬意的接班人，卻未必是其理念的繼承人：普丁批准讓原蘇聯國歌的音樂和部分歌詞成為俄羅斯聯邦的國歌。葉爾欽任內曾通過採取十九世紀作曲家格林卡的一首愛國歌曲作為國歌的曲子，但在歌詞上一直無法確定：俄羅斯的政治和文化菁英始終無法就歌詞內容達成共識，而這反映的顯然是俄羅斯對自己的身分定位還在摸索之中。有違葉爾欽公開表達過的意願，普丁透過回歸蘇聯國歌解決了這個難題。

八十六歲的詩人米哈爾科夫被請來修改歌詞，他曾在一九四三年參與寫作國歌歌詞。這是他第三次做這種事—前兩次分別是在一九五六年受赫魯雪夫委託和在一九七七年受布里茲涅夫委託。經修改後，原歌詞中提到列寧、史達林、黨和共產主義的部分皆被「上帝」一詞取代。歌詞一開頭提及俄羅斯所編造的「牢不可破的聯盟」一語，被改成「俄羅斯，我們神聖的國家」。所有版本的國歌歌詞米哈爾科夫都保留讚頌祖國的部分，未作修改。一九四三年原始版本歌詞：「光榮屬於你，我們的自由祖國。」二〇〇〇年被重新填寫回去。緊接著提及的「各族人民友誼的堅固堡壘」被改為「兄弟民族的古老聯盟」。換言之，聯盟和構成聯盟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誼再度受到青睞。至於這裡的聯盟，是指前蘇聯的各族人民抑或俄羅斯聯邦裡的各族人民，則隨人猜想。

在後蘇聯空間的政策上，普丁繼承了普里馬科夫的願景：俄羅斯應該是一個強權，而這一點有賴於把後蘇聯空間整合起來。普丁相信俄羅斯有權主宰後蘇聯空間，把它納入勢力範圍，但又希望這是透過政治和經濟手段達成，無須訴諸族裔、語言和文化等觀念。一九九九年，議會討論了許多僑民法的版本，最終採納了其中一個，但它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微乎其微。普丁對烏克蘭和白羅斯的政策鋪陳在一份題為《俄羅斯戰略：二〇〇〇年總統議程》的文件中，負責起草的是「俄羅斯外交和國防政策會議」。

它的幾位撰文者包括葉爾欽時代的西化主義者和普里馬科夫類型的現實主義者，聲稱與「近鄰」的關係應該顧及俄羅斯的經濟利益。

對後蘇聯空間的政治和經濟整合應該從下而上，即讓俄羅斯企業利用前加盟共和國因購買俄羅斯天然氣而債台高築的窘境，收購它們的天然氣管線和企業的部分所有權，達到控制這些國家的目的。這種策略可以在各種層次實施：國與國之間、次區域之間，這可以挑少數幾個國家進行或挑大部分國家進行。關鍵是要贏得新政府和在地菁英的信任。不管是把俄羅斯人說成是一個被分裂的民族，還是動員國外俄羅斯裔或操俄羅斯語者去達成整合目標，效果只會適得其反。

這種新取向在二十一世紀頭幾年被稱為「俄羅斯自由帝國」方案 349。它的意識形態濃縮在二〇〇三年一篇由丘拜斯執筆的文章。丘拜斯是葉爾欽的私有化改革的設計師之一，後來擔任俄羅斯的寡頭電力公司負責人。他在文章中力主，俄羅斯在新世紀的使命包括建設一個強大的民主國家，以為資本主義經濟奠定基礎。但事情還有下文。他接著說：「我深信，在可預見的整個歷史未來，俄羅斯的意識形態都應該是自由帝國主義，而俄羅斯的使命是建構一個自由帝國。」 350事實上，截至二〇〇三年，他一直忙於自下而上打造一個這樣的帝國。幾個月前，他的公司已經控制了亞美尼亞一家核子發電廠的股權，目前眼光放在烏克蘭的資產，準備提供融資協助在那裡建兩座核子反應爐。

丘拜斯是一票財閥的代言人。這票財閥是利用蘇聯解體引起的經濟和政治混亂冒起，方法是比競爭對手更創新和更加不擇手段。他們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弊端重重的私有化階段控制了俄羅斯經濟油水最多的部分，包括石油和天然氣工業。作為回報，他們運用自己的經濟資源和媒體資源在一九九六年幫助葉爾欽連任成功。一票財閥在普丁二〇〇〇年競選總統期間也是出錢出力，所以要求普丁聽話，但普丁抵死不從。在其第一任總統任內，他有好一大部分精力是花在獨攬大權和擺脫財閥的掣肘。在他的嚴打下，財閥別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逃到西方避難，霍多爾科夫斯基被捕。其他財閥不再敢挑戰普丁的統治。

二〇〇四年三月，普丁競選連任成功，囊括百分之七十一的選票。各個方面看來他都是春風得意。拜有限度經濟改革和高油價之賜，俄羅斯經濟表現亮眼，每年以百分之七的速度成長。後蘇聯空間的整合也已經上路。這個整合由二〇〇〇年創立的「歐亞經濟共同體」打響第一砲，參加的有白羅斯、哈薩克和好幾個中亞國家。烏克蘭拒絕加入，但在二〇〇三年與俄羅斯、白羅斯和哈薩克簽訂協議，成立一個「單一經濟空間」。該協議在二〇〇四年獲得烏克蘭議會批准。

「自由帝國」方案想要成功，關鍵是地區內要能保持政治穩定，參與國的政策能保持一貫。基於這種考慮，獨裁政權會更受青睞，因為它們在愈來愈依賴俄羅斯的情況下，政策應該會保持不變。反觀民主國家卻麻煩得多，因為選舉結果總是難以預料。有鑑於波羅的海三國已加入北約和歐盟、白羅斯已有了盧卡申科這個獨裁者，而哈薩克和其他中亞共和國，烏克蘭和喬治亞民主政治的不可預測性便構成了俄羅斯外交政策的主要挑戰。烏克蘭的地位特別重要，因為它是任何後蘇聯空間整合方案所不可或缺。就像一九九一年的烏克蘭那樣，二〇〇四年的烏克蘭仍是繼俄羅斯之後的最大後蘇聯國家。

二〇〇四年秋天，烏克蘭總統選舉登場。選舉結果除了攸關後蘇聯空間整合的未來，還攸關俄羅斯是否控制得了把俄羅斯和土庫曼天然氣田連接於東歐和中歐市場的最大管線網絡。即將卸任的烏克蘭總統庫奇馬據說答應過把該國天然氣管線的大比例股份賣給俄羅斯，以償還烏克蘭欠下俄羅斯寡頭天然氣公司 Gazprom 的龐大債務。他屬意的接班人總理亞努科維奇將會延續這種政策。二〇〇四年秋天，普丁前往基輔，希望可以拉抬亞努科維奇的聲勢，幫助他打敗支持改革和親西方的對手尤申科。選舉前數週，尤申科遭人下毒，毒藥是一種烏克蘭沒能力生產但俄羅斯有能力生產的戴奧辛物質。他活了下來，但健康情況不容他繼續從事競選活動。

因為受夠了庫奇馬的腐敗政權，烏克蘭選民完全無意把他和普丁的親信送上總統寶座。出口民調顯示，尤申科贏得了選舉。卻不是由政府控制的選委會公布的結果：其負責人告訴震驚的烏克蘭人民，勝

選的是亞努科維奇。「橘色革命」隨即爆發—橘色是尤申科競選活動的代表色，打先鋒的是學生組成的年輕人抗議團體：「是時候了！」。

成千上萬的人民走上基輔街頭，直到政府同意重啟選舉才願意散去。新的選舉受到大部分來自西方的國際觀察員嚴格監督。一如預期，尤申科獲勝。普丁向他道賀，但鮮少有人看不出來，他把橘色革命的發生視為自己的一大挫敗。他把發生在烏克蘭的事歸咎於西方國家和它們在後蘇聯空間進行的民主化運動。他覺得受到威脅，而這不僅因為一個親西方的候選人在最大一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當上總統，還因為烏克蘭民主運動給在俄羅斯反對普丁獨裁的人做了壞榜樣。流亡國外的財閥別列佐夫斯基毫不遮掩自己支持「橘色革命」的立場。

所以，有必要同時讓國內和國外的俄羅斯菁英重新集結。在國內，普丁模仿「橘色革命」領導人的策略，建立了很多年輕人組織來支持政府。最臭名昭著的一個是由前官員亞坎曼科成立於二〇〇五年的組織「我們的」。此後，「我們的」用盡各種方法騷擾那些被他們認為是與政府為敵的人。在國外，普丁用盡各種能運用的力量，阻止西方蠶食他的後蘇聯空間地盤。特別讓克里姆林宮擔心的是喬治亞，因為二〇〇三年「玫瑰革命」把親西方的薩卡什維利送上了總統寶座。烏克蘭對莫斯科當然也沒有好臉色，因為尤申科太清楚它對他的國家是打什麼主意。所以他採取親西方政策，想方設法讓烏克蘭可以加入歐盟和北約。

普丁繼續反對烏克蘭加入北約，但宣稱不反對它加入歐盟。儘管如此，他還是以天然氣供應作為武器—很多歐盟成員國都仰賴俄羅斯的天然氣，讓烏克蘭處於其經濟控制之下和阻礙烏克蘭與西方發展關係。此前，俄羅斯才迫使土庫曼（後蘇聯空間中的第二大天然氣產國），答應只能透過俄羅斯出售天然氣，又用其他欠下俄羅斯大筆天然氣債款的前加盟共和國對烏克蘭施壓。

二〇〇五年三月，尤申科宣誓就職後不久，俄羅斯提高對烏克蘭出售天然氣的價格。二〇〇六年一月一日，它聲稱烏克蘭偷取俄羅斯透過烏克蘭輸往歐洲的天然氣，切斷對烏克蘭的所有天然氣供應。供應在四天後恢復，但新的危機在二〇〇九年一月爆發，天然氣供應再次被切斷。這一次烏克蘭被斷氣二十天，歐洲客戶被斷氣十三天，讓處於深冬的東南歐叫苦不迭。把烏克蘭說成同時是俄羅斯和歐盟的不可靠夥伴，俄羅斯最終讓烏克蘭負擔的天然氣價格還要高於德國。

歐盟成員國資格不是烏克蘭的囊中物。因為歐盟除了不願被切斷天然氣供應，還得應付二〇〇四年大規模增加成員國所帶來的種種問題。不過，因為有美國的背書，加入北約卻是烏克蘭一個可能實現的夢想。二〇〇八年四月，普丁前往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北約高峰會，進行一場反對北約接納烏克蘭和喬治亞的宣傳戰。他得到德國和法國的支持，高峰會宣布把是否接受烏克蘭和喬治亞為成員一事推遲至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再做決定。普丁決定不再等待。從北約高峰會回國後，他宣布跟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建立官方關係，這兩個地區是在一九九一年宣布脫離喬治亞，自此一直受到俄羅斯的支持。

二〇〇八年八月，俄軍入侵喬治亞，首先占領了南奧塞梯的分離主義飛地，然後朝喬治亞首都進發。拜西方外交干預之賜，戰鬥停止，俄羅斯軍隊從喬治亞撤出。但兩個持分離主義的地區繼續受到俄羅斯控制，而且被俄羅斯正式承認為獨立國家。這是俄羅斯在後蘇聯時代第一次出兵修理一個不聽話的鄰國。自由帝國已去，軍事帝國將興。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北約拒絕為喬治亞和烏克蘭加入北約的計畫排程。美國總統歐巴馬在二〇〇九年一月就職重啟美俄關係。所以，普丁雖然在票匱（ballots）的角逐上輸給了烏克蘭和喬治亞的親民主派勢力，卻贏得了子彈（bullets）的戰爭，阻止了兩個不聽話的前加盟共和國琵琶別抱。他從「橘色革命」學到的教訓之一是，光是搞定前加盟共和國的政府是不夠的，還必須搞定街頭上的人。就此而言，普丁對手老是主張「俄羅斯人是一個被分裂的民族」，這觀念顯得非常方

便好用，而這個被分裂民族的國外部分很快就會成為普丁新外交政策的棋子。

普丁有一次這樣問出生烏克蘭的《共青團真理報》記者卡夫坦：「你讀過鄧尼金的日記嗎？」這裡的「日記」是指內戰期間白軍將領鄧尼金的回憶錄。「沒有。」卡夫坦回答說，但答應回家之後會去讀。「記得要讀。」普丁叮囑他，然後補充說：「鄧尼金討論了大俄羅斯和小俄羅斯。小俄羅斯就是烏克蘭。他指出，沒有人被容許在我們的關係之間攪和，那總是俄羅斯的家務事。」³⁵¹卡夫坦在讀過鄧尼金回憶錄之後寫了一篇文章，其中多處引用回憶錄的話。以下這段應該就是普丁指的那段：「沒有哪個俄羅斯—不管是反動還是民主的俄羅斯，不管是共和還是獨裁的俄羅斯—會容許烏克蘭被扯去。『莫斯科羅斯』和『基輔羅斯』之間的爭吵總是被外人愚蠢和毫無根據地誇大。那些爭吵是內部爭吵，不關別人的事，只能由我們自己決定。」

³⁵²

普丁和卡夫坦的談話發生在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地點是莫斯科的頓斯科伊修道院。時任總理的普丁去那裡是要給一些人的墳墓獻花。得到獻花的除了前一年死去的索忍尼辛，還有一些人是一九一七年之後流亡和死在國外的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鄧尼金將軍是其中之一。陪同普丁獻花的東正教修道院院長吉洪，告訴在場的記者，鄧尼金夫婦的墳墓是普丁自掏腰包修建。另外有兩位流亡國外知識分子的墳墓也是普丁出錢修建，他們一個是哲學家伊雷林，一個是作家什梅廖夫。俄羅斯已經把它失散已久的孩子接回家，並與他們的思想重新發生連結。

伊雷林的作品特別讓普丁印象深刻。他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白軍運動的主要理論家之一，冷戰開始後寫過一篇題為〈被肢解的俄羅斯向世人提出的保證〉的文章，指控西方陰謀肢解蘇聯。他在文中警告西方各個政府說：「俄羅斯不會因為被肢解而滅亡，反而會把它在歷史上走過的道路重走一遍：她會像個巨大的『有機體』那樣，再次把她的『各部分』一一收回，會收回她的所有河流、海洋、山脈、煤

礦、穀場、油田和鈾礦。」³⁵³普丁是在二〇〇六年對俄羅斯議會宣布他的軍隊改革計畫時第一次引用伊雷林的話。

普丁會對俄羅斯民族主義思想家和將軍感興趣，是因為他經過重新省思，認定俄羅斯的歷史和文化是確保和增強俄羅斯在後蘇聯空間影響力的重要元素。二〇〇七年六月，他創立了一個特別基金會，稱為「俄羅斯世界」。共同創始人是外交部長和教育部長。普丁讓莫洛托夫的外孫尼科諾夫擔任基金會的執行董事，他是歷史學家，也是和克里姆林宮關係親密的政治顧問。基金會自稱其任務是在海外促進俄羅斯的語言和文化。

根據可考的紀錄，普丁第一次談到「俄羅斯世界」觀念是在二〇〇一的「海外同胞第一次代表大會」。當時他說，「俄羅斯世界」是超越俄羅斯國家和族裔的邊界。五年後，他的說法更加具體，強調了這個願景中的語言和文化方面。當時是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他的聽眾是聖彼得堡的藝術家、作家和知識分子代表。他說：「『俄羅斯世界』能夠也應該團結所有珍視俄羅斯語言和文化的人，不管他們是住在哪裡，不管他們是住在俄羅斯的邊界之內或之外。」³⁵⁴他又呼籲聽眾盡可能多提「俄羅斯世界」這個概念。一場長期的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戰役由此揭開序幕，它將會成為俄羅斯在國外發揮影響力的關鍵手段。

「俄羅斯世界」一語源自十九世紀中葉，可以在庫利什的作品裡找到。庫利什是聖西里爾與聖美多德兄弟會的成員和親烏克蘭運動的創始人之一。他用「俄羅斯世界」來定義基輔羅斯留下來的入口。因為當時的烏克蘭更多的是一項思想工程而不是政治現實，這詞語並沒有威脅到親烏克蘭運動的基礎本身。但情形改變了。俄羅斯人中的親斯拉夫派將它挪為己用，用它來指俄羅斯帝國境內的族裔和文化共同體。直到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讓它變得完全落伍過時。

然後，這個詞語在一九九〇年代晚期被俄羅斯政治顧問謝德羅維斯基重新發現，他當時負責為處於蘇聯解體動盪中的俄羅斯政府制定

對「近鄰」的政策。從二〇〇七年開始，政府把該年定為「俄羅斯語國際年」，「俄羅斯世界」觀念成為俄羅斯外交政策的基本構成部分。據此，俄羅斯的「公民」不僅包括住在後蘇聯空間的人，還包括在一九九一年之後移民西方國家的人。新概念的推廣者用來界定俄羅斯人的認同，除了族裔和公民身分，還包括文化歸屬，並抬出普希金、托爾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這些文化名人的名字，來動員大眾支持俄羅斯政府的政策。

這個觀念很快就吸引到俄羅斯聯邦前民族事務部長季什科夫的支持，他是蘇聯解體後負責定義俄羅斯民族的關鍵人物³⁵⁵。在一篇著作中，他把「俄羅斯世界」界定為一種「跨國家和跨大洲的連結，因心繫特定國家和忠於它的文化而合為一體」³⁵⁶。他如今的立場不無諷刺，因為他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原是鼓吹公民意義的俄羅斯人觀念。在蘇聯解體後不久，他曾經認定大多數俄羅斯聯邦以外的俄羅斯裔和操俄羅斯語人士將不會離開他們的寄居地或同化於在地文化，而是一定會繼續保存原有的語言和文化特徵。日後回顧自己這個說法時，他指出：「我當初只是要發聲支持一種意見：那些花了幾百年時間在烏克蘭東部、克里米亞和哈薩克北部定居下來的俄羅斯人，不是為了今日透過所謂的遣返來縮小『俄羅斯世界』而那樣做。」³⁵⁷

二〇〇七年，因為接收到克里姆林宮發出的新訊號，季什科夫策畫了一批考察俄羅斯語在後蘇聯空間中地位的學術研究。翌年，他發表了俄羅斯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初步研究成果。季什科夫認為語言是「俄羅斯世界」成員國的關鍵標誌。他指出俄羅斯語言正在「近鄰」失去它於蘇聯時代的優越地位，俄羅斯必須採取措施加以保護。季什科夫希望「近鄰」國家給予俄羅斯語官方語言地位，讓其可以與在地語言平起平坐（俄羅斯語在白羅斯已經取得這種地位，因此可以維持它對在地語言的優勢）。

季什科夫建議政府在哈薩克、烏克蘭、拉脫維亞、摩爾多瓦和吉爾吉斯為俄羅斯語爭取這種地位。他的另一個構想是為這些國家中他稱之為「同胞」的操俄羅斯語者爭取「個人自治」，即讓個人享有決

定使用何種語言的權利。季什科夫同時把「俄羅斯世界」看作可達成俄羅斯外交政策目標的手段之一。他主張：「『俄羅斯世界』比今日的俄羅斯要大。它以前就是這樣大，也應該是如此。專家的任務是幫助擁抱俄羅斯文化和語言的人為自己和子孫保存他們的精神源頭，強化俄羅斯的影響力和權威性。」 358

二〇〇七年，俄羅斯政府透過創立「俄羅斯世界基金會」，用自己的資源力挺「俄羅斯世界」的觀念。基金會的第一個大動作是用俄羅斯政府提供的十億盧布在海外廣設「俄羅斯世界」中心。及至二〇一三年，全世界共有九十個「俄羅斯世界」中心，分布於四十一個國家，致力推廣俄羅斯的語言和文化。基金會的受益者之一是娜塔莉婭·娜羅奇尼茨卡亞的「歷史觀點基金」，這是一個在海外提倡俄羅斯民族主義史觀的組織。俄羅斯世界基金會的其中一個合作夥伴是「國際俄羅斯同胞議會」。這個議會創建於二〇〇二年，在五十三個國家設有共一百四十個機構，會長是科列什尼琴科。科列什尼琴科是烏克蘭議會的資深議員，由城市塞瓦斯托波爾選出，曾向議會提交近二十個旨在維護俄羅斯語在烏克蘭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支配地位的提案。

二〇〇九年，作為整合主義方案的「俄羅斯世界」觀念獲得了一個新的熱心推廣者：六十三歲的俄羅斯東正教新牧首基里爾。他是同年舉行的俄羅斯世界基金會第三次代表大會的主要發言人。前二十年他都是莫斯科牧首區國際部門的負責人，致力於阻止教會結構在整個前蘇聯地區瓦解，維持其統一性。

對教會統一性的主要威脅來自烏克蘭。在戈巴契夫時代之前，莫斯科牧首區有近百分之六十堂區是設在那裡。但當烏克蘭天主教會復興後，西烏克蘭有數以千計堂區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〇年之間消失。天主教會在二戰期間受到史達林鎮壓，但繼續維持地下活動，它的重生長久以來都妨礙著莫斯科和梵蒂岡之間的對話，也把原本具反西方色彩的俄羅斯東正教教會轉化成一座抵抗外在世界的堡壘。

民族觀念在後蘇聯的東正教神職人員和信徒之間崛起，對莫斯科牧首區的支配地位構成了另一個挑戰，也讓俄羅斯東正教教會確立為「全俄羅斯人」統一性的看門狗。俄羅斯東正教教會從未更改它的正式名稱或它對俄羅斯民族的定義，就像帝國時代一樣，它認為俄羅斯民族是由三支東斯拉夫人構成。在保持全羅斯統一性一事上，烏克蘭再次成為關鍵變數。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基里爾運用他作為教會國際部門負責人的權力，成功地讓想要用烏克蘭全部堂區建立一個獨立烏克蘭東正教教會的基輔都主教菲拉雷特死心。

夾在莫斯科和基輔之間的烏克蘭東正教徒分裂為二，其中三分之二承認莫斯科的管轄權，其餘的自行其是。再加上有數以千計的堂區被復興的烏克蘭天主教會強行搶走，莫斯科益發焦慮它分到的蘇聯遺產會不保。不過，基里爾成功穩住大部分烏克蘭東正教徒的心。莫斯科在波羅的海地區失去為數可觀的堂區，但控制住白羅斯的堂區。

在二十一世紀之交，俄羅斯、烏克蘭和白羅斯仍是莫斯科牧首區的核心且受其控制，情形和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前無異。基里爾作為「俄羅斯世界」推動者的新角色有助於把東斯拉夫人是統一體的觀念放入牧首區的意識形態中心。東正教教會對「俄羅斯世界」概念的貢獻是帶給它一個押韻的口號：「俄羅斯、烏克蘭和白羅斯／在它們裡面可以找到神聖的羅斯。」口號作者據說是二戰期間一個在被德國占領的切爾尼戈夫復興東正教的神職人員，德國對宗教的容忍程度比蘇聯大很多。基里爾有一次造訪基輔時念了這個口號。雖然他的「俄羅斯世界」願景涵蓋哈薩克和摩爾多瓦，但烏克蘭始終是他關注的中心。身為牧首，他經常到烏克蘭主持東正教節日和週年紀念日慶典。

二〇一三年七月，普丁陪同基里爾牧首一道前往基輔，慶祝羅斯受洗一千零二十五週年紀念。此行，普丁第一次公開擁護一個前此都是由教會闡述的觀念：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是同一族人民。「我們明白今日的現實：我們有烏克蘭人民、白羅斯人民和其他人民。我們尊重這整個遺產，但毫無疑問的是，它的基礎是我們的精神價值觀，而這共同精神價值觀讓我們成為同一族人民。」 359

不到兩年，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是同一族人民的見解將會讓這位俄羅斯總統和他的軍隊越過烏克蘭邊界，先是進入克里米亞，然後是進入烏克蘭東部，讓俄—烏關係乃是國際局勢都陷入空前危機。

347 上一章提到的 *rossiiskaia* 是形容詞形式，這裡的 *rossiane* 是名詞形式。

348 葉爾欽要求俄羅斯科學院學者在一年內研究確定，此外，又提撥一千萬盧布（兩千美元）向民眾徵求「我們是誰？」和「我們住在何處？」的解答。

349 「俄羅斯自由帝國」（Russia's liberal empire）方案，這裡的自由是指用軟性手段建立「帝國」。

350 Anatolii Chubais, "Missiia Rossii v XXI veke," *Nezavisimaia gazeta*, October 1, 2003.

351 Larisa Kaftan, "Pochemu Putin liubit Denikina," *Komsomol'skaia pravda*, June 25, 2009.

352 Anton Denikin, *Kto spas Sovetskuiu vlast' ot gibeli?* (Moscow, 1991), 10.

353 Ivan Il'in, *Chto sulit miru raschlenenie Rossii?* (Moscow, 1992), 15.

354 Marlene Laruelle, *The "Russian World": Russia's Soft Power and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Washington, DC, 2015), 13.

355 季什科夫就是上一章提過那個率先提出「俄羅斯公民民族」觀念的學者。

356 V. A. Tishkov, "Russkii iazyk i ruskoiazychnoe naselenie v stranakh SNG i Baltiki," in *Vestnik Rossiiskoi Akademii nauk* 77, no. 5 (2008): 416.

357 同上。

358 同上。

359 "Pravoslavno-slavianskie tsenoosti—osnova tsivilizatsionnogo vybora Ukrainy," *Prezident Rossii*, July 27, 2013,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8961>.

第二十章 俄羅斯戰爭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俄羅斯大肆慶祝「祖國保衛者節」（原稱「紅軍節」），同一天，世界各地都有電視觀眾收看索契冬季奧運的閉幕儀式。索契素有俄羅斯亞熱帶首府之稱，俄羅斯藉著這場冬季奧運出盡鋒頭。它不僅把活動辦得有聲有色，還取得自我超越：在四年前的溫哥華冬季奧運，它的得獎牌數僅僅居第十一名，這一次卻一躍而為第一名，成績還領先第二名的挪威和第三名的加拿大不少。

閉幕儀式讓俄羅斯首屈一指的合唱團、管弦樂團和藝術家向世人展示這個國家的歡騰與自豪，一開始是由一個兒童合唱團高歌俄羅斯國歌。那些不會說俄羅斯語但觀賞過一九八〇年莫斯科夏季奧運的電視觀眾（二〇一四年的表演充滿了對一九八〇年奧運會象徵的暗示），不會聽得出來一九八〇年的蘇聯國歌和二〇一四年俄羅斯國歌有什麼分別。但這無關要緊。反正普丁殷切想傳達給國人和世人的只是這個訊息：俄羅斯已經恢復大國地位。

這個訊息的代價高昂。俄羅斯花在主辦冬奧的錢讓人瞠目結舌，一共是五百二十億美元—是原始預算的四倍和溫哥華冬奧支出的七倍。據一些人估計，這筆錢有一半是給政府官員和與他們勾結的商人汙走。很多建築項目直至奧運舉行之時尚未竣工。但親自監督建築和籌備工作的普丁不以為意，對取得的成果倍感滿意。他已經證明了，二〇一四年的俄羅斯就像一九八〇年的蘇聯那樣，有財力和能力舉辦世界級賽事。

為了向世人表達善意，這位俄羅斯總統在冬季奧運開幕前幾個月把一批知名囚犯從前古拉格集中營釋放出來。其中之一是被關了超過十年的商業巨頭霍多爾科夫斯基。被釋放的還有女權主義龐克搖滾樂團「暴動小貓」的成員，他們是上一年企圖在莫斯科的救世主基督大教堂演出而被捕。霍多爾科夫斯基被指控逃稅，「暴動小貓」的罪名

是耍流氓和煽動宗教仇恨，但很少有人懷疑，他們會被抓，真正的理由是挑戰普丁的獨裁專制。

許多人都預期普丁會在冬季奧運結束後繼續保持善意，至少是擺出一個自由化的門面。但這些樂觀派失望了。逮捕反對派的行動重新恢復，其中一個被捕者是反貪腐鬥士納瓦爾尼，他聲稱有一半的冬奧經費被中飽私囊。索契冬季奧運是經過精心布置，是要顯示俄羅斯已經強大到足以重返國際舞台，而且並非以西方合作夥伴的身分重返，而是以桀驁不馴的方式重返。這一點在冬季奧運結束四天後隨著俄羅斯展開兼併克里米亞的軍事行動而變得明顯，克里米亞半島是俄羅斯在一九五四年轉移給烏克蘭，而俄羅斯和國際社會也在一九九一年之後承認它是烏克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普丁後來承認，「拿回克里米亞」的決定是他在索契奧運的最後一天二月二十三日凌晨親自做出。

為兼併克里米亞，俄羅斯對烏克蘭東南部發動了一場不宣而戰的戰爭，引起冷戰結束後東西方關係最嚴重的一次危機。兼併行動違反了國際規範和包括《布達佩斯備忘錄》在內的條約。《布達佩斯備忘錄》是一九九四年在美國和英國的見證下簽訂，在其中，俄羅斯保證烏克蘭的領土完整，以換取烏克蘭返還蘇聯時代的核子武器（當時世界上的第三大核武庫存）。這場危機源於俄羅斯人身分認同和俄烏關係的糾結，普丁曾反覆聲稱，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是同一族人民。

究竟在普丁入侵烏克蘭的幾個月或幾年前發生了什麼事，乃至於會導致這場危機？

普丁對於俄羅斯的地緣戰略願景及其在後蘇聯的作用極大地促成了戰爭的根源和行動。這位俄羅斯總統一直希望烏克蘭加入「歐亞聯盟」，一個以俄羅斯為首的政治、經濟和軍事集團。創建歐亞聯盟是普丁在二〇一一年年底想要達成的主要目標之一，當時他正準備回鍋當第三次總統。這一次烏克蘭大有希望會點頭。這不僅因為普丁的老門客亞努科維奇已經在二〇一〇年當選總統，還因為俄羅斯在二〇〇九年一月中斷供應烏克蘭天然氣之後，總理尤利婭·季莫申科被迫簽下了

一項對烏克蘭不利的貿易協議，導致烏克蘭對俄羅斯的天然氣債務飆升。烏克蘭政府不想步上白羅斯的後塵：白羅斯政府在二〇〇七年被俄羅斯切斷天然氣供應之後，同意把供氣管線的百分之五十股權賣給了俄羅斯（明斯克後來在二〇一一年失去了全部管道的控制權）。亞努科維奇政府卻是另一種做法：同意把塞瓦斯托波爾海軍基地租借給俄羅斯的時間延長二十五年，以獲得新天然氣的價格折扣。

這位俄羅斯總統想要的更多：他的目標是烏克蘭加入歐亞聯盟。雖然歐亞聯盟的地緣戰略目標是繼承自普里馬科夫，他當初建議利用獨立國協確保俄羅斯在「近鄰」的支配地位，但它的思想基礎卻是一九二〇年代和一九三〇年代一些俄羅斯流亡者主張的「歐亞主義」。在後蘇聯的俄羅斯，政治哲學家杜金吸收「歐亞主義」，形成一套新歐亞主義的俄羅斯民族主義。杜金的思想有著強烈右傾乃至法西斯主義色彩，讓一九九〇年代的政治菁英避之唯恐不及，但他卻獲得普丁的顧問們青睞，從此在新的千年裡常常有機會在媒體亮相。杜金想要在全新的基礎上打造一個歐亞帝國，反觀普丁是設法要把舊的帝國重新整合起來。意識形態對杜金來說是關鍵，在普丁來說是次要。雖然他們彼此有很多差異，但兩人卻在一件事情上志趣相同：都想利用西方社會的分裂，包括它們的自由派與極左／極右派的分裂，來凸顯俄羅斯是世界上保守價值觀的燈塔，是一個捍衛傳統歐洲價值觀的國家和文明，使之不受後現代的頹廢自由主義所扭曲。俄羅斯這個世界新角色的願景在東正教知識分子提出的「俄羅斯世界」的理念中找到了一個親密的盟友。

在烏克蘭，亞努科維奇雖然已公開宣布放棄加入北約或歐盟的願望，但烏克蘭政府繼續準備與歐盟簽署一項夥伴協定。普丁在二〇一三年七月造訪基輔，而他為「單一俄羅斯民族」的背書³⁶⁰正是他阻止烏克蘭和歐盟走近的策略之一。第二個月，他在意識形態武器之外又祭出經濟武器：宣布對某些烏克蘭產品進行貿易戰。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下旬，迫於普丁的壓力，亞努科維奇拒絕簽署他早先答應過人民要簽署的歐盟－烏克蘭夥伴協議。這種突然變卦讓

基輔街頭出現大規模抗議活動，情形類似十年前發生的「橘色革命」。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日，數十名示威者被警方射殺，議會隨即廢除總統使用武力的權力。隨著防暴警察撤出基輔，亞努科維奇和他的顧問出逃到克里米亞，在塞瓦斯托波爾軍港登上俄羅斯軍艦，前往俄國。他們隨身帶著一大筆不義之財—幾星期前普丁匯到烏克蘭作為不簽署歐盟協議賄款的三十億美元。

看見自己人馬在基輔失勢和烏克蘭新政府宣稱推動烏克蘭融入歐洲經濟結構，普丁和他的顧問團決定分裂該國。這計畫在冬季奧運最後一天獲得俄羅斯總統批准，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克里米亞首府辛菲洛普付諸行動。一批軍服上沒有軍徽的武裝分子旋即占領了議會，自治共和國被擁立的新總理是親俄派政客，從前競選克里米亞議會議員時只獲得百分之四的選票。在俄羅斯軍事單位和僱傭兵的支持下，克里米亞新政府策畫了一次禁止烏克蘭和西方觀察員監督的全民公投。

公投在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六日舉行，開票結果讓人聯想到前蘇聯時代的選舉：百分之九十二選票贊成克里米亞加入俄羅斯。在塞瓦斯托波爾，贊成票數更是一次對民主和常識的侮辱：百分之一百二十三。俄羅斯裔固然是克里米亞人口的大宗，操俄羅斯語的人口更多，但從僅僅一個月前的另一次投票結果判斷，大部分克里米亞人其實寧願留在烏克蘭。但不管怎樣，克里米亞新政府還是在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七日即公投第二天宣布脫離烏克蘭而獨立。同一天，普丁簽署了兩份文件，一份表示承認克里米亞獨立，另一份草擬俄羅斯聯邦和獨立的克里米亞國家之間的兼併條約。其實，至少在二〇〇八年布達佩斯的北約高峰會議之後，俄羅斯便備有兼併克里米亞和動搖烏克蘭其他地區的腹案，當時普丁曾告訴美國總統布希，烏克蘭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而只是一些地區的集合體，又說如果北約接納烏克蘭，將會引起烏東和烏南地區的反抗。

不過，引發二〇一四年兼併行動的並不是北約或歐盟的擴張，而是烏克蘭堅持要與歐盟簽署夥伴協定。普丁這一次敢放膽大幹，明顯

是受到他在二〇〇八年取得的成功鼓勵：當時他入侵喬治亞，實質上兼併了其部分領土，卻全身而退。烏克蘭和歐盟簽署夥伴協定並不保證其會成為歐盟或北約的成員國，卻會對普丁的歐亞聯盟計畫大受威脅，因為少了烏克蘭，他的歐亞聯盟將會變得殘缺。為此，普丁不惜採取激烈措施要阻止烏克蘭漂向西方。許多人相信，他的行動產生了反效果，促使烏克蘭以本來在克里米亞被兼併之前不能想像的程度更往西方靠過去。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八日的莫斯科寒冷陰沉，但大克里姆林宮中，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十九世紀中葉所建的聖喬治廳，卻被巨大的水晶吊燈照映得金碧輝煌。講台上已經布置好兩面旗幟，一面是俄羅斯聯邦的三色國旗，一面是繡有雙頭鷹和「屠龍者」聖喬治的總統旗。在場的有俄羅斯聯邦會議（上議院）議員、國家杜馬（下議院）議員、各部部長和政府控制的民間組織的代表。客人是最近被俄羅斯軍隊占領之克里米亞新政府的幾位領導人。

俄羅斯政治菁英的成員和他們的客人正在等待普丁現身，現在是普丁執政期間的第三個任期，也是他待在這個國家的權力結構尖端的第十五年—先是當了兩屆總統，再當了兩屆總理，現在再次為總統。他走進來時，大家都站起來迎接他。普丁請他們坐下，開始致詞。從西方的觀點看，擺在他前頭的一提供接管克里米亞的理由—是一項艱難的任務，因為這是自二戰結束以來，第一次有一個主權國家的領土被一個歐洲強權兼併。但普丁看來並不覺得這任務有什麼難的。他大部分的論據都無關法理，而是有關歷史與文化。

他宣稱，自從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人便在違背自己意願的情況下被分裂開來。他把蘇聯的垮塌視為一段俄羅斯人民受到極不公不義對待的時期：「偌大一個國家消失了。不過，要等到克里米亞成為別的國家的一部分，俄羅斯人才驚覺他們不僅遇到了搶劫，還遇到了洗劫。」他接著說：

我聽克里米亞的居民說，在一九九一年，他們就像一袋馬鈴薯那樣被送給了別人。你很難不同意此說。對這件事，俄羅斯國家是什麼態度，俄羅斯人是什麼態度？是低聲下氣地接受現實。當時這個國家處於極度艱困之中，所以現實上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利益。但人民卻始終無法對歷史這種荒唐的不公不義釋懷。經過多年之後，公民們和許多公眾人物重新提起這個問題，他們說，克里米亞歷史上是俄羅斯土地，塞瓦斯托波爾歷史上是俄羅斯城市。[361](#)

俄羅斯的評論家開始把普丁比作希特勒，指出他就像希特勒在一九三八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和兼併奧地利那樣，是拿民族問題當藉口。普丁自己並不忌諱歷史類比。事實上，他也是把自己的行動類比於德國人，只不過不是類比於希特勒兼併奧地利，而是類比於一九八九年的東西德統一：指出這兩件事情都讓一個被分裂的民族重歸團圓。然而，他關於需要保護俄羅斯族人對抗潛在威脅的論點可以追溯到一九三八年，而不是一九八九年。

這位俄羅斯總統聲稱烏克蘭的俄羅斯裔備受威脅，卻提不出他們受歧視的任何證據。他還聲稱他是要保護烏克蘭的俄羅斯裔，對抗西方的擴張。普丁說：「在烏克蘭，我們的西方夥伴已經越過界線，扮演起熊的角色，以不負責任和不專業的方式行動。他們完全清楚還有數以百萬計俄羅斯裔生活在烏克蘭和克里米亞的事實，所以，如果他們發現他們遇到了意料之外的後果，只能歸咎於他們缺乏政治本能和常識。俄羅斯發現自己已到了退無可退的地步。」因此，俄羅斯必須起而保護其邊界內外的俄羅斯人，對抗各種現實和可能的威脅，而只要她認定俄羅斯人受到威脅，她就有理由使用武力和兼併領土。但有需要俄羅斯人保護的還不僅止於俄羅斯裔的烏克蘭人，還包括那些住在「近鄰」的操俄羅斯語人口。「有數以百萬計的俄羅斯人和操俄羅斯語人口住在烏克蘭，也會繼續住下去，而俄羅斯總是會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去捍衛他們的利益。」

在俄羅斯兼併克里米亞前的幾個月裡，普丁多次主張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是同一族人民。例如，普丁在二〇一三年九月接受電視訪談

時說道：

我們是同一族人民。不管我們雙方有多少民族主義者會受到這種說法冒犯，它都是一個鐵一般的事實。我們是同一族人民，是因為我們都是在聶伯河受洗，是因為我們有著共同歷史根源和共同命運，是因為我們有著共同宗教。我們也有著非常相似的文化、語言、傳統和心靈樣態……。當然，我們也有自身的獨特性和族裔色彩。順道一說，烏克蘭人的文化，包括他們的語言、舞蹈和音樂都非常美妙，總是讓人覺得賞心悅目—我就是其中一個。[362](#)

普丁既主張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是同一族人民，又給不如此認同的人貼上民族主義者標籤。但這樣一種主張卻有違那個行之有年的蘇聯和後蘇聯傳統觀點：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在歷史和文化上關係密切，卻是不同的民族，各自獨立。因此，普丁的說法不僅挑戰了烏克蘭人的民族認同，還挑戰了現代俄羅斯人的身分認同。認定俄羅斯人構成一個獨立民族乃是俄羅斯得以在一九九一年起而反抗垂死蘇聯的正當性基礎，也是在那之後的俄羅斯聯邦的正當性基礎。

普丁有關俄—烏一體的思維方式，可回溯至俄羅斯自由派的社會民主黨人司徒盧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思路。司徒盧威在一九一二年寫道：「我開始相信有一種『全俄羅斯文化』和作為其喉舌的『全俄羅斯語』存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說：「『俄羅斯』一詞不是三個（前綴『大』、『小』和『白』）『語詞』的某種抽象『平均值』，而是一股充滿文化活力、巨大、發展茁壯中的民族力量。」[363](#)司徒盧威不反對發展烏克蘭語或民俗文化，但認為應該讓這種發展局限在地方和鄉村的層次，不應讓其影響到高級文化、教育和城市生活。二〇一四年，普丁等於是讓司徒盧威這些觀念在最高的政治層次輪迴轉世。

兼併克里米亞之後，普丁的民意支持到達高峰，從他在二〇一一年十二月準備回鍋總統時的百分之六十六陡增至二〇一五年六月的百分之八十九。政府控制主要媒體，以及騷擾和鎮壓反對派，都是這次

支持度陡增的原因。不過，普丁在克里米亞的行動幾乎毫無疑問得到俄羅斯大眾的支持。在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八日發表的講話中，普丁引用在正式吞併克里米亞前夕得到的俄羅斯民調數據指出：「我們的公民中，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認為俄羅斯應該保護俄羅斯裔和其他生活在克里米亞的族裔的利益。超過百分之八十三的公民認為，即使俄羅斯此舉會破壞我們和某些其他國家的關係，照樣應該為之。總計有百分之八十六的公民仍然將克里米亞視為俄羅斯人的土地和我國領土的一部分。」 364

普丁在講話中不僅用歷史理據和民族文化理據合理化其侵略克里米亞的行為，還向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世人保證：克里米亞是一個特例，俄羅斯聯邦將不會對烏克蘭其他地區提出領土要求。他對那個領土剛被他占去一些的國家的公民這樣說：「我希望你們能聽到我說話，親愛的朋友們。不要相信那些想讓你們害怕俄羅斯的人，不要相信他們所謂其他地區將會步克里米亞後塵的叫囂。我們不想要分裂烏克蘭，我們沒必要那樣做。」 365

這番話說於二〇一四年三月，普丁相信，他不需要進一步蠶食烏克蘭領土便足以達到把烏克蘭留在俄羅斯勢力範圍的目標。失去克里米亞的震撼被認為足以讓烏克蘭的菁英階層回心轉意歸回莫斯科，因為通過這個例子已經讓該國其他地區明白，不聽話可能會有什麼後果。本著這種心理，普丁的外交部長拉夫羅夫要求烏克蘭進行聯邦化，賦予烏國某些地區否決中央政府外交政策的權力。看見基輔拒絕，俄羅斯情報部門從二〇一四年四月開始在烏東和烏南的俄羅斯語區煽風點火。反基輔的宣傳運動是在保護俄羅斯語和反對烏克蘭民族主義的旗號下進行的，最終目的是建立一個稱為「新俄羅斯」的緩衝國，新俄羅斯一度是俄羅斯帝國在該地區的一省。除了訴諸俄羅斯帝國的往昔，宣傳運動還訴諸可回溯至「偉大愛國戰爭」時期的修辭——在俄羅斯，該戰爭已成了普丁政權的建國神話：凡是支持烏克蘭政府的人不僅會被說成民族主義者和頹廢西方的代理人，還會被說成法西斯主義者。

雖然有俄羅斯的帝國神話和蘇聯詞令的加持，俄羅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運動並未能風靡設想中的整個新俄羅斯地區，而僅能在烏東的頓巴斯地區大有斬獲—該地區是前蘇聯的一部分，與俄羅斯聯邦接壤，是除克里米亞以外烏克蘭俄羅斯裔人口最多的地方。俄羅斯情報部門和俄羅斯民族主義者聯手在這地區煽風點火—這種聯手具體體現在化名斯特列爾科夫的吉爾金一人身上，因為他既是俄羅斯情報部門的退休官員，又是俄羅斯民族主義媒體的活躍撰稿者。吉爾金後來聲稱，正是通過他的努力，頓巴斯地區的衝突才會白熱化，演變成全面性的軍事對抗。事實上，就是他和他來自克里米亞的人馬率先用自動步槍開火，打死了一名烏克蘭安全部門的官員，引發烏克蘭做出第一次軍事回應。

吉爾金和他的響應者在二〇一四年春夏兩季大舉湧入頓巴斯地區，鼓吹的是一種帝俄品牌的民族主義，即主張無分族裔，只要是操俄羅斯語者就一律是俄羅斯人。他們這種觀念的最佳陳述者是俄羅斯民族主義報紙《明日報》的主編普羅哈諾夫，吉爾金也是該報的作者之一。普羅哈諾夫認為，烏東和烏南的操俄羅斯語的烏克蘭公民業已受到種族滅絕的威脅，因此有權起而反抗，而俄羅斯政府也有責任保護他們。他不認為俄羅斯裔在一個統一的烏克蘭裡有未來可言，因為那樣的烏克蘭必然是反俄羅斯人而親西方的。他堅持，唯一的解決之道是分裂烏克蘭。

這一類觀念在二〇一四年的幾年前便被帶進烏克蘭，讓許多人受到感染。他們後來成了「俄羅斯之春」的活動家，俄羅斯之春是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對頓巴斯地區起義的稱呼，受到莫斯科的指導和資助。他們其中一人是三十歲的古巴廖夫。他原是歷史學者，後來改行經商，成了小企業家；年輕時參加過一個稱為「俄羅斯民族統一黨」的極端民族主義組織，也有論者稱之為法西斯組織。二〇一四年四月，在一個有兩百名活動家參加的聚會上，古巴廖夫當選頓巴斯地區主要城市頓內茨克的「人民市長」。無論是古巴廖夫抑或吉爾金都不認為頓巴斯未來應該獨立建國：他們的願景是讓它成為新俄羅斯的一部

分，未來的新俄羅斯當然又會是俄羅斯聯邦的一部分。古巴廖夫把頓巴斯地區的衝突看成反對烏克蘭財閥的革命的一部分，這些財閥就像俄羅斯的財閥一樣，控制了烏克蘭經濟最有油水的部分，引起廣大貧窮人民的嫉妒和恨意。在古巴廖夫看來，該革命也是「俄羅斯世界」與腐敗的西方進行更大鬥爭的一部分。在二〇一四年六月的軍事衝突高峰時期，古巴廖夫這樣告訴頓巴斯地區的民兵：「我們所發動的戰爭得到俄羅斯教會祝福。它是為『俄羅斯世界』而戰，是為『新俄羅斯』而戰。」[366](#)

二〇一四年春天，經常批評普丁優柔寡斷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改而全力支持普丁和他的政策。普丁也樂於有他們效勞，並利用這個機會把他們中間最危險的極端分子送出國，讓他們死在烏克蘭的採礦小城或荒郊野外。但到了二〇一四年夏天，隨著建立新俄羅斯的願景遲遲未能實現，當初俄國政府和激進派民族主義者藉著「俄羅斯世界」觀念建立起來的聯盟關係開始動搖，這時頓巴斯地區兩個自行宣布獨立建國的共和國[367](#)，已處於崩潰的邊緣，一個以城市頓內茨克為中心，另一個以城市盧干斯克為中心。

為了扭轉這種局面，俄羅斯政府把更多的雇傭兵、志願軍、武器和彈藥運過烏克蘭邊境。被送入烏克蘭的武器還包括地對空飛彈。這些據說是由俄羅斯人員發射的「山毛櫸」飛彈，其中一枚擊落了從阿姆斯特丹飛往吉隆坡的馬航客機MH17，包括八十名兒童和十五名機組員在內，機上二百八十三名乘客全數罹難。由澳洲、比利時、馬來西亞、荷蘭和烏克蘭組成的聯合空難調查團查出了飛彈的發射地點、飛彈型號和飛彈發射器從烏克蘭撤回俄羅斯的路徑。

雖然有克里姆林宮暗中支持，叛軍仍不足以承受烏克蘭軍隊的壓力。就像克里米亞的情形一樣，如果「俄羅斯之春」想要成功，則俄羅斯必須出兵。經過若干猶豫後，俄國政府在二〇一四年八月和九月兩次派出部隊參戰，讓面臨戰敗關頭的叛軍轉危為安。二〇一五年頭幾個月，休假離開單位的俄國士兵被重新派往戰場，在頓內茨克和盧干斯克的關鍵區域、具有戰略重要性的鐵路樞紐德巴爾切夫擊退烏克

蘭部隊。兩個叛軍成立的共和國固然得救了，但要怎樣處理它們卻是個難題。它們的存在不僅會繼續對俄羅斯的經濟和國際聲望不利，還會危及「俄羅斯世界」方案的未來以及俄羅斯在「近鄰」的政策。

頓內茨克和盧干斯克兩個共和國一樣對「俄羅斯世界」感到幻滅，因為它們發現自己處於經濟崩潰的邊緣，而且不管是加入俄羅斯或靠獨力存活都希望渺茫。事實上，克里姆林宮有鑑於新俄羅斯方案成本過高，私底下已放棄該計畫。「俄羅斯世界」在頓巴斯地區的死心塌地信徒諸如古巴廖夫之流被解除實權，兩個分離主義共和國的權力被從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和其支持者那裡轉移到一些沒有明確意識形態綱領但完全忠於莫斯科的人手上。當古巴廖夫膽敢挑戰一個莫斯科指派的共和國領導人時，他遭到行刺，但幸運逃過一劫。

單是二〇一五年一年，就有三個在前一年協助過俄羅斯在頓巴斯地區鬧事的著名地方軍閥遭到暗殺，原因是不願意配合克里姆林宮的新政策。考慮到維持頓巴斯地區的經濟負擔過重，克里姆林宮已經決定把它推回給烏克蘭，但會另想辦法讓它成為一個對外交政策擁有否決權的聯邦單位。古巴廖夫還是不甘心，聲稱頓巴斯—現在他稱之為新俄羅斯，是一支火炬，可引領烏克蘭的其餘部分回到「俄羅斯世界」。這可是比登天還難的願景。

兼併克里米亞和頓巴斯戰爭結束於二〇一六年年底，導致近一萬人被殺，至少近兩萬人受傷，數萬人無家可歸，也讓留在戰區的幾百萬成為難民。這場災難讓「俄羅斯世界」方案在烏克蘭和其鄰國白羅斯失去所有吸引力。本來親俄的白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在二〇一五年一月表示：「如果現在這裡還有任何人會認為說白羅斯土地是『俄羅斯世界』的一部分乃至近乎是俄羅斯本身一部分的話，忘掉這種說法吧。……以前沒有〔獨立的白羅斯〕這回事，但現在有了，這是必須記住的。我們不會把我們任何一片領土讓與任何人。」[368](#)

現在，「俄羅斯世界」一詞不僅會讓人聯想到普希金和俄羅斯語，還會聯想到那場讓幾萬人傷亡和數百萬人生活陷入混亂的土地爭

奪戰。

兼併克里米亞和把頓巴斯地區搞得天翻地覆之後，普丁發言時繼續稱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是同一族人民。然而，這種說法不僅在國外受到駁斥，在俄羅斯國內也愈來愈不討喜。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和二〇一五年三月的兩次民意調查顯示，俄羅斯公民相信兩個民族是同一族人民的比例從百分之八十一掉到百分之五十二。雖然兩個民族在歷史上有過互有好感的階段，但到了二〇一四年三月，由於俄羅斯媒體大幅報導發生在烏克蘭的事件，大多數俄羅斯人都對烏克蘭人產生了負面態度。

類似的結果也出現在烏克蘭：到了二〇一四年秋天，由於俄羅斯在克里米亞和頓巴斯地區的作為，烏克蘭人對俄羅斯人普遍持負面態度。頓巴斯衝突也減低了一般俄國人對出兵國外的興趣。二〇一四年三月，在克里米亞順利被兼併的興奮高峰期，百分之五十八的俄羅斯人贊成使用武力保護當地的俄裔，但這個數字在一年後掉至百分之三十四。一九九八至二〇一五年之間，贊成透過兼併領土擴大本國版圖的俄羅斯人更是從百分之七十五陡降為百分之十八。

入侵烏克蘭讓俄羅斯付出高昂人命代價，很多被派到烏克蘭東部的士兵和自願前往作戰的人都一去不返。為了作戰和資助窮哈哈的克里米亞及兩個備受蹂躪的分離主義共和國，俄羅斯把國內需之孔殷的經濟和物質資源投放到國外。尤有甚者，莫斯科除了因為入侵行動而國際聲望重挫，還得應付國際社會經濟制裁帶來的寒冬。

第一波制裁由美國在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七日啟動，當天普丁下令屬下草擬一份把克里米亞整合進俄羅斯聯邦的條約。這些制裁最初只是針對在俄羅斯和克里米亞協助推翻合法烏克蘭政府和兼併克里米亞的個人，但在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七日，馬航客機被擊落的一天，擴大適用到企業。翌日，制裁措施進一步擴大，加入制裁的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日本、澳洲、紐西蘭和歐盟成員國。制裁措施對蘇聯經濟構成極大殺傷力，讓俄羅斯的人均GDP從二〇一三年的一萬五千五

百五十三美元掉至二〇一五年的九千零五十三美元。無法向國際金融市場融資讓盧布重重貶值，消費品價格飆漲，俄羅斯人民再次大吃苦頭。

我們有很好理由認為俄—烏衝突不僅是俄羅斯與西方關係的一個里程碑，也是現代俄羅斯民族形塑過程的一個里程碑。它對歷久不衰的「俄羅斯問題」至少帶來了一個清楚的啟示：要踩在同一條河流上兩次不僅困難，而且是不可能³⁶⁹。帝俄時代建構的「單一俄羅斯民族」已經一去不返，任何修復工程都不可能讓它起死回生。為了這個保守烏托邦境界投入再多鮮血和財富都是枉然。

³⁶⁰ 這是指前一章最後提到的，普丁在基輔發表講話時聲稱，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是「同一族人民」。

³⁶¹ “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Vladimir Putin,” Prezident Rossii, March 18, 2014,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20603>.

³⁶² Vladimir Putin, interview with Channel One of Russian TV and the Associated Press, Prezident Rossii, September 4, 2013, <http://kremlin.ru/news/19143>.

³⁶³ Oleh S. Ilnytskyj, “Modeling Culture in the Empire: Ukrainian Modernism and the Death of the All-Russian Idea,” in *Culture, Nation, and Identity: The Ukrainian-Russian Encounter (1600-1945)*, eds. Andreas Kappeler, Zenon E. Kohut, Frank E. Sysyn, and Mark von Hagen (Edmonton, 2003), 308.

³⁶⁴ “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Vladimir Putin,” March 18, 2014.

³⁶⁵ 同上。

³⁶⁶ “Russkaia tserkov’ blagosloвила DNR na voinu,” *Vzgliad*, June 12, 2014.

³⁶⁷ 分別稱為頓內茨克共和國和盧干斯克共和國。

³⁶⁸ “Lukashenko: Schitaiushchie, chto Belorussiiia—chast’ russkogo mira—zabud’te,” *Regnum*, January 29, 2015.

³⁶⁹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說過：你無法踩在同一條河流兩次，因為河水已非原來的河水。

跋

俄羅斯邊界何在的問題，以及俄羅斯人民由什麼人構成的問題，幾百年來占據著俄羅斯思想家的心思。蘇聯在一九九一年解體把這些關注轉化為一個影響全世界的巨大「俄羅斯問題」：新的俄羅斯國家和已獨立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還有這些共和國裡講俄羅斯語的飛地，應該是什麼關係？

當前的俄—烏衝突只是俄羅斯菁英階層一貫思考方式的最新一次展現：他們總是把自己和同屬東斯拉夫人的鄰居看成是生活在同一個歷史和文化空間裡，歸根究柢是同一個民族。這場衝突重奏了過去五個世紀以來深深影響地區內政治和文化關係的旋律：俄羅斯是一個強權，勢力範圍超過邊界之外；宗教特別是東正教用來界定俄羅斯人的身分認同，也繼續形塑著俄羅斯的對外政策；語言和文化是在地區內推行國家政策的重要工具。更重要的是，這場衝突提醒了世人，現代俄羅斯民族離締造完成還很遙遠。

蘇聯的解體和俄羅斯無法用軟性手段對後蘇聯空間維持控制，不管是透過獨立國協抑或形式上更靈活的俄羅斯「自由帝國」—通過經濟權力和文化紐帶控制的勢力圈，均解釋了俄羅斯的領導層為什麼決定用武力維持它對這地區的主宰。但為什麼俄羅斯人會決定對一個反覆被普丁稱為和俄羅斯人是「同族人民」的烏克蘭動武呢？

今日的烏克蘭位於新的「俄羅斯問題」的最核心。烏克蘭的面積、位置，還有最重要的是它與俄羅斯的歷史及文化淵源，都不容俄羅斯菁英分子在思考自身的身分認同和命運時，不把它放在思考的核心。俄羅斯可能有朝一日會變為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嗎？抑或它始終會是一個被修剪過的帝國，因為念念不忘失去的領土和往日的榮光而不斷製造新的衝突？俄羅斯會成為一個民族和帝國與烏克蘭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不僅因為烏克蘭是俄羅斯歷史神話的一部分，還因為它是俄羅斯在東歐和中歐擴張領土之所賴，以及俄羅斯人後來重塑自身

民族身分之所賴，這個重塑是根據歐洲思想家在近代早期提出的一批觀念，而這批觀念又是由基輔的文化人傳入莫斯科沙皇國。

自基輔的僧侶在十七世紀提出「斯拉夫－俄羅斯人」的觀念之後，烏克蘭和烏克蘭人在莫斯科／俄羅斯尋找身分認同時一直據有核心地位。後來，無論是十八世紀聖彼得堡知識分子發展帝俄計畫思想之時、十九世紀俄國帝國當局和波蘭革命分子爭奪政治和文化影響力之時，抑或是二十世紀蘇聯締建之時，烏克蘭是蘇聯的關鍵部分，烏克蘭和烏克蘭人繼續具有核心重要性。俄羅斯人的帝國願景、大國地位和民族定位全有賴這個觀念：烏克蘭有別於俄羅斯，但又是俄羅斯一個基本構成部分。所以，克里姆林宮內外都有很多人把烏克蘭脫離俄羅斯勢力範圍的可能性視為對俄羅斯本身的一種攻擊。

烏克蘭的出走注定會讓莫斯科在後蘇聯空間的帝國企圖心無法實現。蘇聯解體幾年後的一九九四年，布里辛斯基在《外交事務》雜誌為文指出：「沒有了烏克蘭，俄羅斯就當不成帝國，但若是烏克蘭被收買然後服從，俄羅斯就會自動成為帝國。」布里辛斯基以下的主張讓俄－烏衝突對西方所代表的意義更顯重大：「俄羅斯要麼只能是個帝國，要麼只能是個民主國家，不可能兩者得兼。」³⁷⁰差不多同一時期，哈佛大學的俄羅斯權威基南主張，如果蘇聯的解體確實標誌著俄羅斯帝國的崩潰，就必然會導致一場俄－烏戰爭。二十年後，基南預言的戰爭發生了，把蘇聯死亡和俄羅斯帝國瓦解的關聯明明白白擺在世人眼前。

烏克蘭的出走還會粉碎俄羅斯人的帝俄模式民族觀，在該民族觀中，烏克蘭人繼續被視為「單一俄羅斯民族」的一部分。我們可以把後蘇聯時代俄羅斯人的身分認同想成是由幾個同心圓構成。同心圓的圓心是族裔意義的俄羅斯人。第一個同心圓是俄羅斯公民意義的俄羅斯人。下一個圓圈是東斯拉夫人意義的俄羅斯人。最外面一個圓圈是所有分享俄羅斯文化的人，即世界上所有的操俄羅斯語人口。「俄羅斯世界」方案的設計師把俄羅斯人定義為俄羅斯語言和文化的承載者，無分族裔或國籍。烏克蘭人是東斯拉夫人同心圓的核心元素，有

了它，可以讓後蘇聯時代俄羅斯人的身分認同顯得是一個跨民族現象。這種身分認同方式因為具有帝國主義性格，威脅到從摩爾多瓦到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的整個東歐地區的穩定。目前，受到莫斯科鼓勵，摩爾多瓦國內的分離主義者業已建立起聶斯特河沿岸共和國，而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雖然是歐盟和北約成員國，但它們國內相當可觀的操俄羅斯語人口，難保不會讓莫斯科有可乘之機。

兼併克里米亞和頓巴斯戰爭讓政府內外的俄羅斯國家主義者和俄羅斯民族主義者聯合了起來。在一個緬懷前蘇聯和東斯拉夫人統一性衰落的時代，這兩群人的士氣受到發生在烏克蘭的事件鼓舞。雖然俄羅斯政府成功動員克里米亞以俄羅斯裔為主的人口支持它的兼併行動，但在大部分以烏克蘭裔為主之說俄羅斯語的烏東和烏南地區，它的政治宣傳效果不彰。武裝民兵把「泛俄羅斯人」的概念帶到烏克蘭，但在傳統上多民族和多文化的東歐接壤地區，這種主張總是銷路不佳。所以，俄羅斯能夠成功兼併或動搖的都是那些居民自視為俄羅斯裔的地區，無法影響那些只有在文化上認同俄羅斯的地區，因它們大部分居民在族裔和政治上都是認同於烏克蘭。

俄—烏衝突的長遠後果和它對地區內的民族工程有何影響，目前尚不明朗。但有違其始作俑者所預期的，這衝突加速了一個本來受俄羅斯主宰的歷史和文化空間的解體，強化了雙方國內以族裔為依歸的民族認同。在把以操俄羅斯語烏克蘭裔為主的烏克蘭東南部轉化為附庸國的計畫失敗後，俄羅斯政府拒絕考慮兼併頓巴斯地區，決定只兼併一個以俄羅斯裔占大宗的克里米亞。因為它發現，它受到一個與俄羅斯本土分隔開的半島的俄羅斯裔歡迎，卻不受接壤的操俄羅斯語者歡迎。

俄羅斯的侵略行為引起烏克蘭人的同仇敵愾。隨著俄羅斯兼併克里米亞（居民以俄羅斯裔占絕大多數）和頓巴斯地區（在頓巴斯的大城市俄羅斯裔占相對多數）一大部分落入叛軍手中，烏克蘭國家的領土固然是縮小了，但烏克蘭裔所占的比例卻快速激增。所以，衝突的一個結果是，俄羅斯變得有更多俄羅斯裔，烏克蘭變得有更多烏克蘭

裔。也有愈來愈多不同族裔的烏克蘭人擁抱烏克蘭文化作為他們身分認同的象徵。

俄羅斯政府和俄羅斯政治與文化菁英有朝一日會接受「失去」烏克蘭的事實嗎？這就是當前的「俄羅斯問題」的本質所在。正如近期發生的事件所顯示，未解決的「俄羅斯問題」是個不定時炸彈，對歐洲乃至全世界的威脅不亞於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早期的「德意志問題」，後者催生用武力把所有德意志土地統一為一個強大德意志帝國的構想。

很多人相信，最根本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源於未能以和平方法解決「德意志問題」，也有些人把希特勒和普丁打民族牌來動搖和兼併鄰國領土的做法相提並論。在東西方關係上，俄—烏衝突業已成了冷戰結束後最嚴重的國際危機。到底兼併克里米亞和頓巴斯戰爭是蘇聯解體的最後一幕，還是標誌著歐洲進入了一個恐怖的新階段，一個人口和土地被重塑的階段，仍有待觀察。

答案將取決於俄羅斯菁英分子是否有能力和意願接受後蘇聯時期的政治現實，按照後帝國世界的要求調整俄羅斯的身分認同。俄羅斯民族想要擁有光明未來和敦睦鄰國，方法不是返回基輔羅斯那樣的東斯拉夫人統一體，而是在俄羅斯聯邦的邊界內打造一個現代的公民民族。這是老牌帝國英國和現代民族國家德國所走過的路道：它們都承認那些不在它們邊界之內的英語國家和德語國家是獨立國家。不此之圖，後果也許是引起一場新的冷戰，甚或更糟。

370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Premature Partnership," *Foreign Affairs* 73 (March-April 1994): 72.

鳴謝

我寫這本書的近因是二〇一四年爆發的俄烏戰爭。但在很多方面，它都是我較早前研究方向即東斯拉夫人身分認同史的延續，該方面的研究成果是二〇〇六年問世的《斯拉夫諸民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Slavic Nations，以下簡稱《起源》）。《起源》出版後，我在大學裡主持一門稱為「東歐人身分認同：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討論課，讓我可以把從《起源》發端的研究推進至十九和二十世紀。俄國兼併克里米亞和入侵烏克蘭東部之後，我把有關俄羅斯歷史和身分認同的當前辯論納入我的研究和寫作核心。近期的事件還促使我把一本原來只是純學術的專著改為兼顧更大的讀者群，讓其處理一些具有直接政治和文化相干性的問題。

雖然這本書的寫作計畫醞釀已久，而且有不少部分是奠基於我較早期的作品或專為本書所進行的研究，但我的解釋和分析很多都是仰賴其他人的優秀著作。他們很多都是我的朋友和同事，讓我受惠良多。

我對莫斯科公國歷史和身分認同的理解來自以下諸位的作品：霍爾珀林（Charles J. Halperin）、基費爾森（Valerie Kivelson）、科爾曼（Nancy Kollman）、奧斯特洛夫斯基（Donald Ostrowski）。對於十八世紀俄羅斯政治，科古特（Zenon E. Kohut）和斯金納（Barbara Skinner）的專論非常有啟發性。比連基（Serhiy Bilensky）、多爾比洛夫（Mikhail Dolbilov）、希利斯（Faith Hillis）、米勒（Alexei Miller）、托洛奇科（Oleksii Tolochko）和佐林（Andrei Zorin）的作品有助我掌握帝俄民族的複雜性和俄羅斯帝國對西部邊區的宗教政策。布蘭登貝格爾（David Brandenberger）、馬丁（Terry Martin）、派普斯（Richard Pipes）、普羅齊克（Ana Procyk）、魯德林（Per Rudling）、斯波爾路克（Roman Szporluk）和葉克爾徹克（Serhy Yekelchuk）為我對俄國在二十世紀的發展提供了理解的基礎。

感謝萊丹（John LeDonne）、普羅齊克（Roman Procyk）和托爾巴科夫（Igor Torbakov）讀過手稿後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糾正和意見。我還要感謝沃特曼（Richard Wortman）邀請我在哥倫比亞大學他的「俄羅斯帝國史」討論課發表演講和感謝該討論課的一位參與者黎特（Nathaniel Knight）與我分享他找到的一些關於博迪安斯基（Osyp Bodiansky）和納傑日金（Nikolai Nadezhdin）的材料。承蒙耶魯大學的斯奈德（Tim Snyder）和「蜂巢地圖公司」的韋斯（Jonathon Wyss）惠允本書使用他們的一些地圖，在此謹申謝忱。我也要出於相同原因感謝劍橋大學出版社和多倫多大學出版社的編輯。拜尤爾克維奇（Myroslav Yurkevich）之賜，我的文字得以更像英文。一如往常，我太太奧萊娜（Olena）是本書很多草稿的最仔細和最挑剔的讀者，是本書更易為讀者親近的功臣。

非常感謝科尼里姆（Jill Kneerim）建議海默特（Lara Heimert）把本書納入培基書店（Basic Books）的著名「歷史著作系列」。是海默特的許多寶貴建議和仔細編輯讓本書得以以現在的樣子問世。能夠再一次和培基書店工作團隊合作讓我倍感愉快，他們包括德耶蘇（Betsy DeJesu）、拉布利（Roger Labrie）、馬蘇德（Alia Massoud）、湯普森（Jennifer Thompson）、斯特克弗斯（Kathy Streckfus）和特雷西（Collin Tracy）。不過，上面提到的諸位無一需要為本書的缺點負責。本書的任何缺點都應該由我本人負責，或說應該由俄羅斯歷史的複雜性本身負責。

參考書目

導論

Tim Baycroft, *France, Inventing the Nation* (London, 2008); Stefan Berger, *Germany, Inventing the Nation* (London, 2004); 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3d ed. (New Haven, CT, 2009);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d ed. (Ithaca, NY, 2009); Geoffrey Hosking, “The Freudian Frontier,”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March 10, 1995; Carsten Humlebaek, *Spain, Inventing the Nation* (London, 2014); Serhii Plokhy, *The Origins of the Slavic Nations: Premodern Identities in Russia, Ukraine, and Belarus* (Cambridge, 2006); Vera Tolz, *Russia, Inventing the Nation* (London, 2001).

第一章 沙皇國誕生

Michael Cherniavsky, “Klan or Basileus?: An Aspect of Russia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in idem, ed., *The Structure of Russian History* (New York, 1970), pp. 75–77. Simon Franklin and Jonathan Shepard, *The Emergence of Rus, 750–1200* (London, 1996); I. Gerasimov, S. Glebov, A. Kaplunovski, M. Mogilner, and A. Semyonov, eds., “Novaia imperskaia istoriia Severnoi Evrazii,” chapter 5, *Ab Imperio*, no. 3 (2014): 363–407; Charles J. Halperin, *The Tatar Yoke: The Image of the Mongols in Medieval Russia* (Bloomington, IN, 2009); Mykhailo Hrushevsky, *History of Ukraine-Rus’, vol. 1* (Edmonton, 1997); Janet Martin, *Medieval Russia, 980–1584*, 2d ed. (Cambridge, 2008); Donald Ostrowski, *Muscovy and the Mongols: Cross-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Steppe Frontier, 1304–1589* (Cambridge, 2002); V. T. Pashuto, B. N. Floria, and A. L. Khoroshkevich, *Drevnerusskoe nasledie i istoricheskie sud’by vostochnogo slaviansstva* (Moscow, 1982); Jaroslaw Pelenski, *The Contest for the Legacy of Kievan*

Rus' (Boulder, 1998); Serhii Plokhy, *The Origins of the Slavic Nations: Premodern Identities in Russia, Ukraine, and Belarus* (Cambridge, 2006); Daniel Stone, *The Polish-Lithuanian State, 1386–1795* (Seattle, 2001).

第二章 第三羅馬

Michael Cherniavsky, *Tsar and People: Studies in Russian Myths*, 2d ed. (New York, 1969); Chester S. L. Dunning, *A Short History of Russia's First Civil War: The Time of Troubles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Romanov Dynasty* (University Park, PA, 2004); Borys A. Gudziak, *Crisis and Reform: The Kyivan Metropolitanate, the Patriarchat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Genesis of the Union of Brest* (Cambridge, MA, 1998); Mykhailo Hrushevsky, *History of Ukraine-Rus'*, vol. 7 (Edmonton, 1999); Tat'iana Oparina, *Ivan Nasedka i polemicheskoe bogoslovie kievskoi mitropolii* (Novosibirsk, 1998); Donald Ostrowski, *Muscovy and the Mongols: Cross-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Steppe Frontier, 1304–1589* (Cambridge, 2002); Maureen Perrie, *Pretenders and Popular Monarchism in Early Modern Russia: The False Tsars of the Time of Troubles* (Cambridge, 2002); S. F. Platonov, *The Time of Troubles* (Lawrence, KS, 1970); Serhii Plokhy, *The Cossacks and Religion in Early Modern Ukraine* (Oxford, 2001).

第三章 帝俄民族

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 1992); M. S. Grinberg and B. A. Uspenskii, *Literaturnaia voina Tred'iakovskogo i Sumarokova v 1740-kh—nachale 1750-kh gg.* (Moscow, 2011); Georg B. Michels, *At War with the Church: Religious Diss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Russia* (Stanford, CA, 2000); Serhii Plokhy, *Ukraine and Russia: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Toronto, 2008); Elena Pogosian, *Petr I—arkhitektors russkoi istorii* (St. Petersburg, 2001); Hans Rogger,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 (Cambridge, MA, 1960); Tatiana Tairova-Yakovleva, "The Role of the Religious Factor and

Patriarch Nikon in the Unification of Ukraine and Muscovy,” *Acta Polonia Historica* 110 (2014): 5–22; Vera Tolz, *Russia, Inventing the Nation* (New York, 2001); Boris Uspenskii, “Foneticheskaia struktura odnogo stikhotvoreniia Lomonosova (istoriko-filologicheskii ètiud),” in *idem, Izbrannye trudy*, 2 vols. (Moscow, 1996–1997), 2:207–241; V. V. Vinogradov, *Ocherki po istorii russkogo literaturnogo iazyka* (Moscow, 1982).

第四章 開明女皇

John T. Alexander, *Catherine the Great* (New York, 1989); 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 1992); Zenon Kohut, *Russian Centralism and Ukrainian Autonomy: Imperial Absorption of the Hetmanate, 1760s–1830s* (Cambridge, MA, 1989); John LeDonne,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ussian Empire, 1650–1831* (Oxford, 2003); Jerzy Lukowski, *The Partitions of Poland, 1772, 1793, 1795* (New York, 1999); Robert K. Massie, *Catherine the Great: Portrait of a Woman* (New York, 2011); Barbara Skinner, *The Western Front of the Eastern Church: Uniate and Orthodox Conflict in Eighteenth-Century Poland, Ukraine, Belarus, and Russia* (DeKalb, IL, 2009); Yuri Slezkine, “Naturalists Versus Nations: Eighteenth-Century Scholars Confront Ethnic Diversity,” *Representations* 47 (Summer 1994): 170–195; Sergei M. Soloviev, *History of Russia*, vol. 46, *The Rule of Catherine the Great: Turkey and Poland, 1768–1770*, trans. Daniel L. Schlafly Jr. (Gulf Breeze, FL, 1994).

第五章 波蘭的挑戰

Serhiy Bilenky, *Romantic Nationalism in Eastern Europe: Russian, Polish, and Ukrainian Political Imaginations* (Stanford, CA, 2012); John LeDonn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the World, 1700–1917: The Geopolitics of Expansion and Containment* (Oxford, 1996); Dominic Lieven, *Russia*

against Napoleon: The True Story of the Campaigns of War and Peace (London, 2009); Alexei Miller, “ ‘Official Nationality’? A Reassessment of Count Sergei Uvarov’s Triad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ism Politics,” in idem, *The Romanov Empire and Nationalism: Essays on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Research* (New York, 2006), 139–160; idem, “Istoriia poniatiia ‘natsiia’ v Rossii,” *Otechestvennye zapiski* 1 (2012); M. Polievktov, *Nikolai I: Biografiia i obzor tsarstvovaniia* (Moscow, 1918); Piotr S. Wandycz, *The Lands of Partitioned Poland, 1795–1918* (Seattle, 1975); Andrei Zorin, “Zavetnaia triada: Memorandum S. S. Uvarova 1832 goda i vzniknovenie doktriny pravoslavie—samoderzhavie—narodnost’,” in idem, *Kormia dvuglavogo orla: Literatura i gosudarstvennaia ideologiia v Rossii v poslednei treti XVIII–pervoi treti XIX veka* (Moscow, 2001), 337–370.

第六章 為邊界戰鬥

Inna Bulkina, “Politika Nikolaia I v Iugo-Zapadnom krae i uchrezhdenie Universiteta Sv. Vladimira,” *Trudy po russkoi i slavianskoi filologii: Literaturovedenie* 7 n.s. (Tartu, 1999); Wasyl Lencyk, *The Eastern Catholic Church and Czar Nicholas I* (New York, 1966); Alexei Miller, “ ‘Official Nationality’? A Reassessment of Count Sergei Uvarov’s Triad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ism Politics,” in idem, *The Romanov Empire and Nationalism: Essays on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Research* (New York, 2006), 139–160; idem, “Istoriia poniatiia ‘natsiia’ v Rossii,” *Otechestvennye zapiski* 1 (2012), www.strana-oz.ru/2012/1/istoriya-ponyatiya-naciya-v-rossii; Marian Radwan, *Carat wobec Kościoła greckokatolickiego w zaborze rosyjskim, 1796–1839* (Lublin, 2004); Aleksei Tolochko, *Kievskaia Rus’ i Malorossia v XIX veke* (Kyiv, 2012); Stephen Velychenko, *National History as Cultural Process: A Survey of the Interpretations of Ukraine’s Past in Polish, Russian, and Ukrainian Historical Writing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914* (Edmonton, 1992).

第七章 烏克蘭的出現

Olga Andriewsky, “The Russian-Ukrainian Discourse and the Failure of the ‘Little Russian Solution,’ 1782–1917,” in *Culture, Nation, and Identity: The Ukrainian-Russian Encounter (1600–1945)*, ed. Andreas Kappeler, Zenon E. Kohut, Frank E. Sysyn, and Mark von Hagen (Edmonton, 2003), 182–214; Alexei Miller, *The Ukrainian Question: The Russian Empire and Nation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2003); Orest Pelech, “The History of the St. Cyril and Methodius Brotherhood Reexamined,” in *Synops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in Honour of Zenon E. Kohut*, ed. Serhii Plokhy and Frank Sysyn (Edmonton, 2005), 335–344; Thomas M. Prymak, *Mykola Kostomarov: A Biography* (Toronto, 1996); David Saunders, “Mykola Kostomarov (1817–1885) and the Creation of a Ukrainian Ethnic Identity,” *Slavonica* 7, no. 1 (2001): 7–24; Andrei Teslia, “‘Slavianskii vopros’ v publitsistike M. P. Pogodina, 1830–1850-kh gg.,” *Sotsiologicheskoe obozrenie* 13, no. 1 (2014): 117–138; Aleksei (Oleksii) Tolochko, *Kievskaiia Rus’ i Malorossia v XIX veke* (Kyiv, 2012); P. A. Zaionchkovskii, *Kirillo-Mefodievskoe obshchestvo (1846–1847)* (Moscow, 1959).

第八章 大、小和白

Mikhail Dolbilov, *Russkii krai, chuzhaia vera: Ėtnokonfessional’naia politika imperii v Litve i Belorussii pri Aleksandre II* (Moscow, 2010); Aleksandr Dulichenko, *Vvedenie v slavianskuiu filologiiu* (Moscow, 2014); Orlando Figes, *The Crimean War: A History* (New York, 2012); Efim Karskii, *Belorussii*, 3 vols. (Moscow, 1955–1956); Alexei Miller, *The Ukrainian Question: The Russian Empire and Nation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2003); V. Petronis, *Constructing Lithuania: Ethnic Mapping in Tsarist Russia, ca. 1800–1914* (Stockholm, 2007); Steven Seegel, *Mapping Europe’s Borderlands: Russian Cartography in the Age of*

Empire (Chicago, 2012); Darius Staliunas, *Making Russians: Meaning and Practice of Russification in Lithuania and Belarus After 1863* (New York, 2007); P. V. Tereshkovich, *Ėtnicheskaia istoriia Belarusi XIX–nachala XX vv. v kontekste Tsentral’no-Vostochnoi Evropy* (Minsk, 2004).

第九章 消滅語言

Andrii Danylenko, “The Ukrainian Bible and the Valuev Circular of July 18, 1863,” *Acta Slavica Iaponica* 28 (2010): 1–21; John-Paul Himka, *Religion and Nationality in Western Ukraine: The Greek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Ruthenian National Movement in Galicia, 1867–1900* (Montreal, 1999); Johannes Remy, “The Valuev Circular and Censorship of Ukrainian Publications in the Russian Empire (1863–1876): Intention and Practice,”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49, nos. 1–2 (2007): 87–110; David Saunders, “Mikhail Katkov and Mykola Kostomarov: A Note on Petr A. Valuev’s Anti-Ukrainian Edict of 1863,”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17, nos. 3–4 (1993): 365–383; idem, “Russia and Ukraine Under Alexander II: The Valuev Edict of 1863,”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7, no. 1 (1995): 23–50; idem, “Pan-Slavism in the Ukrainian National Movement from the 1840s to the 1870s,” *Journal of Ukrainian Studies* 30, no. 2 (Winter 2005): 27–50; Anna Veronika Wendland, *Die Russophilen in Galizien: Ukrainische Konservative zwischen Österreich und Russland, 1848–1915* (Vienna, 2001).

第十章 人民之歌

Faith Hillis, *Children of Rus’: Right-Bank Ukraine and the Invention of a Russian Nation* (Ithaca, NY, 2013); Oleh S. Ilnytskyj, “Modeling Culture in the Empire: Ukrainian Modernism and the Death of the All-Russian Idea,” in *Culture, Nation, and Identity: The Ukrainian-Russian Encounter (1600–1945)*, ed. Andreas Kappeler, Zenon E. Kohut, Frank E. Sysyn, and Mark von Hagen (Edmonton, 2003), 298–324; D. A.

Kotsiubinskii, *Russkii natsionalizm v nachale XX stoletia: Rozhdenie i gibel' ideologii Vserossiiskogo natsional'nogo soiuza* (Moscow, 2001); I. V. Omelianchuk, "Chislennost' Soiuza russkogo naroda v 1907–1914 gg. v pravoberezhnykh ukrainskikh guberniakh," in *Belorussia i Ukraina: Istorii i kul'tura. Ezhegodnik 2005/2006* (Moscow, 2008), 145–164; Richard Pipes, "Peter Struve and Ukrainian Nationalism," special issue of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3/4, Part 2, *Eucharisterion: Essays Presented to Omeljan Pritsak on His Sixtieth Birthday by His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1979–80): 675–683; Serhii Plokhy, *Unmaking Imperial Russia: Mykhailo Hrushevsky and the Writing of Ukrainian History* (Toronto, 2005); George Y. Shevelov, *The Ukrainian Languag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00–1941): Its State and Status* (Cambridge, MA, 1989); Theodore R. Weeks, *Nation and State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Nationalism and Russification on the Western Frontier, 1863–1914* (DeKalb, IL, 1996).

第十一章 君主制的垮台

A. Iu. Bakhturina, *Politika Rossiiskoi imperii v Vostochnoi Galitsii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yny* (Moscow, 2000); Faith Hillis, "Making and Breaking the Russian Empire: The Case of Kiev's Shul'gin Family," in *Imperiale Biographien: Elitekarrieren im Habsburger, Russischen und Osmanischen Vielvölkerreich (1850–1918)*, ed. Malte Rolf and Tim Buchen (Munich, 2015), 178–198; E. Ketola, "Revoliutsiia 1917 goda i obretenie Finliandiei nezavisimosti: Dva vzgliada na problemu," *Otechestvennaia istoriia*, no. 6 (1993); Eric Lohr, *Nationalizing the Russian Empire: The Campaign Against Enemy Aliens During World War I* (Cambridge, MA, 2003); *Otrechenie Nikolaia II: Vospominaniia ochevidtsev* (Moscow, 1990); Alexander Victor Prusin, *Nationalizing a Borderland: War, Ethnicity and Anti-Jewish Violence in East Galicia, 1914–1920* (Tuscaloosa, AL, 2005).

第十二章 俄國革命

Jörg Brechtefeld, *Mitteleuropa and German Politics: 1848 to the Present* (London, 1996); Mykhailo Hrushevs'kyi, *Na porozi novoi Ukrainy: Statti i dzherel'ni materialy* (New York, 1992); Richard Pip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1917–1923*, rev. ed. (Cambridge, MA, 1997); Anna Procyk, *Russian Nationalism and Ukraine: The Nationality Policy of the Volunteer Army During the Civil War* (Edmonton, 1995); Per Anders Rudl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Belarusian Nationalism, 1906–1931* (Pittsburgh, PA, 2015); Timothy Snyder, *The Red Prince: The Secret Lives of a Habsburg Archduke* (New York, 2008); Nicholas P. Vakar, *Beloruss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A Case Study* (Cambridge, MA, 1956).

第十三章 列寧的勝利

Francine Hirsch, *Empire of Nations: Ethnographic Knowledge and 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Union* (Ithaca, NY, 2005); Terry Martin,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 (Ithaca, NY, 2001); idem, “An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as the Highest Form of Imperialism,” in *A State of Nations: Empire and Nation-Making in the Age of Lenin and Stalin*, ed. Ronald Grigor Sunny and Terry Martin (Oxford, 2001), 67–92; Liliana Riga, *The Bolsheviks and the Russian Empire* (New York, 2012); Vasyl Shakhrai and Serhii Mazlak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Ukraine*, ed. Peter J. Potichnyj (Ann Arbor, MI, 1970); Yuri Slezkine, “The USSR as a Communal Apartment, or How a Socialist State Promoted Ethnic Particularism,” *Slavic Review* 53, no. 2 (1994): 414–452; Ronald Suny,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 1993); idem, *The Making of the Georgian Nation* (Bloomington, IN, 1994).

第十四章 民族共產主義

David Brandenberger, *National Bolshevism: Stalinist Mass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1931–1956* (Cambridge, MA, 2002); James E. Mace, *Communism and the Dilemmas of National Liberation: National Communism in Soviet Ukraine, 1918–1933* (Cambridge, MA, 1983); Ronald Grigor Suny and Terry Martin, eds., *A State of Nations: Empire and Nation-Making in the Age of Lenin and Stalin* (Oxford, 2001); Stephen Velychenko, *Painting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Red: The Ukrainian Marxist Critique of Russian Communist Rule in Ukraine, 1918–1925* (Toronto, 2015).

第十五章 俄羅斯的復返

David Brandenberger, “Stalin’s Populism and the Accidental Creation of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Nationalities Papers* 38, no. 5 (2010): 723–739; David Brandenberger and Mikhail V. Zelenov, “Stalin’s Answer to the National Question: A Case Study on the Editing of the 1938 Short Course,” *Slavic Review* 73, no. 4 (2014): 859–880; Viktor B. Dënningkhaus, *V teni “bol’hogo brata”: Zapadnye natsional’nye men’shinstva v SSSR, 1937–38 gg.* (Moscow, 2011); Geoffrey A. Hosking, *Rulers and Victims: The Russians in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MA: 2006); Donald Ostrowski, “Alexander Nevskii’s ‘Battle on the Ice’: The Creation of a Legend,” *Russian History/Histoire russe* 33, nos. 2-3-4 (Summer-Fall-Winter 2006): 309–312; Benedikt Sarnov, *Stalin i pisateli*, vol. 1 (Moscow, 2007).

第十六章 偉大愛國戰爭

Olia Hnatiuk, *Vidvaha i strakh* (Kyiv, 2015); Ianka Kupala, *Zbor tvoraŭ*, 7 vols., vol. 7, *Vershy: Pereklady 1918–1942* (Minsk, 1974); Roger Moorhouse, *The Devil’s Alliance: Hitler’s Pact with Stalin, 1931–1941* (New York, 2014); *Nazi-Soviet Relations, 1939–1941: Documen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ed. Raymond James Sontag and James Stuart Beddie (Washington, DC, 1948); Serhii Plokhyy, “The Call of

Blood: Government Propaganda and Public Response to the Soviet Entry into World War II,” *Cahiers du monde russe* 52, nos. 2–3 (2011): 293–320; Timothy Snyder,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ew York, 2010); Iosif Stalin, *O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Sovetskogo naroda* (Moscow, 1948); Serhy Yekelchuk, *Stalin’s Empire of Memory: Russian-Ukrainian Relations in the Soviet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oronto, 2004).

第十七章 蘇維埃人

Wayne Allensworth, *The Russian Question: Nationalism, Modernization, and Post-Communist Russia* (Lanham, MD, 1998); Aleksandr Baigushev, *Russkaia partiia vnutri KPSS* (Moscow, 2005); Yitzhak M. Brudny, *Reinventing Russia: Russian Nationalism and the Soviet State, 1953–1991* (Cambridge, MA, 2000); Stephen Carter, *Russian Nationalism: Yesterday, Today, Tomorrow* (New York, 1990); Ariel Cohen, *Russian Imperialism: Development and Crisis* (Westport, CT, 1996); Michael Confino, “Solzhenitsyn, the West, and the New Russian Nation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6, nos. 3–4 (1991): 611–636; Simon Cosgrove, *Russian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Soviet Literature: The Case of Nash Sovremennik 1981–1991* (New York, 2004); Nathaniel Davies, *A Long Road to Church: A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Russian Orthodoxy*, 2d ed. (Boulder, 2003); John Dunlop, *The Faces of Contemporary Russian Nationalism* (Princeton, NJ, 1983); Ivan Dzyuba, *Internationalism or Russification? A Study in the Soviet Nationalities Problem*, ed. M. Davies, 2d ed. (London, 1970); Kuchkar Khanazarov, *Reshenie natsional’no-iazykovoi problemy v SSSR* (Moscow, 1982); David Marples, *Belarus: A Denationalised Nation* (Amsterdam, 1999); Tatstsiana Mikulich, *Mova i ètnichnaia samasviadomasts’* (Minsk, 1996); Nikolai Mitrokhin, *Russkaia partiia: Dvizhenie russkikh natsionalistov v SSSR, 1953–1985* (Moscow, 2003); Roman Solchanyk, “Politic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Post-Shelest Period,” in *Ukraine After Shelest*, ed. Bohdan

Krawchenko (Edmonton, 1983), 1–29; Roman Szporluk, *Russia,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 2001); Vladislav Zubok, *Zhivago's Children: The Last Russian Intelligentsia* (Cambridge, MA, 2011).

第十八章 紅旗倒下

Mark R. Beissinger,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 (Cambridge, 2002); George W. Breslauer and Catherine Dale, “Boris Yel'tsin and the Invention of a Russian Nation-State, *Post-Soviet Affairs* 13, no. 4 (1997): 303–332; Timothy Colton, *Yeltsin: A Life* (New York, 2008); E. N. Danilova, “Izmeneniia v sotsial'nykh identifikatsiakh rossiian,” *Sotsiologicheskii zhurnal*, nos. 3–4 (2000); Mark Harrison, “Soviet Economic Growth Since 1928: The Alternative Statistics of G. I. Khanin,” *Europe-Asia Studies* 45, no. 1 (1993): 141–167; David D. Laitin, *Identity in Formation: The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in the New Abroad* (Ithaca, NY, 1998); Marlene Laruelle,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Russia* (New York, 2009); Marlene Laruelle, ed., *Russian Nationalism and the National Reassertion of Russia* (New York, 2009); Emil' Pain, “Imperskii natsionalizm (Vozniknovenie, evoliutsiia i politicheskie perspektivy v Rosii),” *Obshchestvennye nauki i sovremennost'*, no. 2 (2015): 54–71; Petr Panov, “Nation-Building in Post-Soviet Russia: What Kind of Nationalism Is Produced by the Kremlin?”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1, no. 1 (2010): 85–94; Serhii Plokhy, *The Last Empire: The Final Day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2014); Peter Rutland, “The Presence of Absence: Ethnicity Policy in Russia,” in Julia Newton and William Thompson, eds., *Ideas and Leadership in Post-Soviet Russia* (New York, 2010), 116–136; Valery Tishkov,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Conflict in and after the Soviet Union: The Mind Aflame* (London, 1996); Edward W. Walker, *Dissolution: Sovereignty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Lanham, MD, 2003).

第十九章 俄羅斯世界

Ronald D. Asmus, *A Little War That Shook the World: Georgia, Russ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New York, 2010); E. N. Danilova, “Izmeneniia v sotsial’nykh identifikatsiakh rossiian,” *Sotsiologicheskii zhurnal*, nos. 3–4 (2000); M. Golovanova and V. Shergin, *Gosudarstvennye simvoly Rossii* (Moscow, 2003); Vladimir Kabuzan, *Russkie v mire: Dinamika chislennosti i rasseleniia (1719–1989). Formirovanie étnicheskikh i politicheskikh granits russkogo naroda* (St. Petersburg, 1996); Pal Kolsto and Helge Blakkisrud, eds., *The New Russian Nationalism: Imperialism, Ethnicity and Authoritarianism, 2000–2015* (Edinburgh, 2016); Mara Kozelsky, “Religion and the Crisis in Ukra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14, no. 3 (2014): 219–241; Marlene Laruelle, ed., *Eurasianism and the European Far Right: Reshaping the Europe—Russia Relationship* (Lanham, MD, 2015); Marlene Laruelle, *The “Russian World”: Russia’s Soft Power and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Washington, DC, 2015); Aleksei Miller, ed., *Nasledie imperii i budushchee Rossii* (Moscow, 2008); Anastasia Nesvetailova, “Russia and Belarus: The Quest for the Union; or Who Will Pay for Belarus’s Path to Recovery?” in *Contemporary Belarus: Between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ed. Elena A. Korosteleva, Colin W. Lawson, and Rosalind J. Marsh (London, 2003), 152–164; Emil’ Pain and Sergei Prostavkov, “Mnogolikii russkii natsionalizm: Ideino-politicheskie raznovidnosti (2010–2014),” *Polis*, no. 4 (2014): 96–113; Hrihoriy Perepilitsa, “Belarusian-Russian Integrat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Security of Ukraine,” in *Belarus at the Crossroads*, ed. Sherman W. Garnett and Robert Legvold (Washington, DC, 1999), 81–1–3; Igor Torbakov, “Emulating Global Big Brother: The Ideology of American Empire and Its Influence on Russia’s Framing of Its Policies in the Post-Soviet Eurasia,” *Turkish Review of Eurasian Studies*, no. 3 (2003): 41–72; Andrei P. Tsygankov, *Russia’s Foreign Policy: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National Identity* (Lanham, MD,

2006); Andrew Wilson,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New Haven, CT, 2006).

第二十章 俄羅斯戰爭

Paul Goble, “Russian Support for Putin’s View that Russians and Ukrainians Are ‘One People’ Falling, Polls Show,” *Window on Eurasia*, June 26, 2015; Paul Roderick Gregory, “Deconstructing Putin’s Approval Ratings: One Thousand Casualties for Every Point,” *Forbes*, June 8, 2015; Steven Lee Myers, *The New Tsar: The Rise and Reign of Vladimir Putin* (New York, 2015); Roland Oliphant and Tom Parfitt, “Vladimir Putin Praises Russian Patriotism and Claims: Ukrainians and Russians Are One,” *Telegraph*, March 18, 2015; “Rossiisko-ukrainskie otnosheniia v zerkale obshchestvennogo mneniia: sentiabr’ 2015,” *Levada-Tsentr*, May 10, 2015, www.levada.ru/old/05-10-2015/rossiisko-ukrainskie-otnosheniya-v-zerkale-obshchestvennogo-mneniya-sentyabr-2015; Yuri Teper, “Official Russian Identity Discourse in Light of the Annexation of Crimea: National or Imperial,” *Post-Soviet Affairs* 32, no. 4 (2016): 378–396; Igor Torbakov, “A Parting of Ways? The Kremlin Leadership and Russia’s New-Generation National Thinkers,” *Demokratizatsiya: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 23, no. 4 (Fall 2015): 427–457; idem, “Ukraine and Russia: Entangled Histories, Contested Identities, and a War of Narratives,” in *Revolution and War in Contemporary Ukraine: The Challenge of Change*, ed. Olga Bertlsen (Stuttgart, 2016), 89–120; Andreas Umland, “Eurasian Union vs. Fascist Eurasia,” *New Eastern Europe*, November 19, 2015; Andrew Wilson, *Ukraine Crisis: What It Means for the West* (New Haven, CT, 2014), 118–143.

中外文名詞對照及索引

書籍文獻

一畫

〈一個俄羅斯公民的意見〉 “The Opinion of a Russian Citizen”
140

三畫

《大俄羅斯和小俄羅斯的談話》 A Convers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Little Russia 117

《大綱》 Synopsis 99-100, 108, 149

《小俄羅斯史》 History of Little Russia 179

〈不容走回頭路〉 “No Turning Back” 270-271

《上帝的律法，又稱烏克蘭人民的創世記》 The Law of God, or
Books of the Genesis of the Ukrainian People
181

《三個首都》 The Three Capitals 307

四畫

《反共產國際協定》 Anti-Comintern Pact 326, 339

〈支持祖國〉 “For the Motherland” 330

〈天佑沙皇〉 “God Save the Tsar” 229, 250, 260

《文字報》 Slovo / Word 219, 221, 223-224

五畫

- 《布爾什維克》 Bol'shevik 330, 337
- 〈布爾什維克〉 “Hymn of the Bolshevik Party” 354
- 《布達佩斯備忘錄》 Busapest memorandum 425
-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 Treaty of Brest-Litovsk 277, 281-282, 284
- 《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 441
- 《古拉格群島》 Gulag Archipelago 391
- 《尼斯塔德和平條約》 Nystad Peace Treaty 105
- 《北方小蜜蜂》 Severnaia pchela / Northern Bee 178
- 《古與新》 Starina Inovizna / Antiquity and Novelty 120
- 《弗拉基米爾諸大公的故事》 Tale of the Princes of Vladimir 70
- 《市民會議》 Veche 390

六畫

- 《艾涅伊達》 Eneïda 177-178, 179, 197, 202, 221
- 《西方哲學史》 History of Westren Philophy 363
- 《伊凡·蘇薩寧》 Ivan Susanin 334, 359
- 《共青團真理報》 Komsomol's kaia Pravda / Komsomsl Truth 415
- 《共產黨宣言》 The Commmnist Manifesto 330

《米寧與波札爾斯基》 Minin and Pozharsky 334

《米寧與波札爾斯基：把人民從干預主義者手中救出》 Minin (and) Pozharsky: Salvation from the Interventionsts 334

〈各族人民組成一家人〉 “OneFamilyofPeople” 326

《安德魯索沃停戰協定》 Truce of Andrusovo 98, 194

七畫

《沙皇如何欺騙人民》 How the Tsar Deceives the People 258

《吟遊詩人》 Kobar / Minstrel 178

〈告烏克蘭人民書和給中央拉達的最後通牒〉
“ManifestototheUkrainianPeoplewithanUltimatumtotheCentralRada” 273

〈告小俄羅斯居民書〉 “TotheInhabitantsofLittleRussia”

285

《占領華沙》 NavzatieVarshavy / Onthe Taking of Warsaw 142

《里加條約》 Treaty of Riga 315-317

《每個白羅斯人必須知道的事情》 What Every Belarusian Needs to Know 283

八畫

《亞歷山大·涅夫斯基》 Alexander Nevsky 335

《供閱讀的圖書館》 Biblioteka dlia chteniia / Library for Reading 178-179

《青年近衛軍》 Molodaia gvardiia / The Young Guard

376-377

《來自波爾塔瓦的娜塔卡》 Nataalka from Poltava 177

《東部領地》 Ober Ost 280

《彼得一世》 Peter the First 335

《拉帕洛協議》 Rapallo agreement 296

《拉帕洛條約》 Treaty of Rapallo 296

〈波羅底諾戰役紀念日〉 “The Anniversary of Borodino” 142-143

〈兩種羅斯民族性〉 “The Two Rus’ Nationalities” 199-200

《明日報》 Zavtra / Tomorrow 434

九畫

《為沙皇獻身》 A Life for the Tsar 334, 359

〈為戰勝鄧尼金告烏克蘭工農書〉 “Letter to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of Ukrain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Victories over Denikin” 294

《英雄們》 Bogatyri / Heroes 333-334

《皇室宗譜》 Book of Royal Degrees 71

《信條教導扼要全書》 Brief Compendium of Teaching on the Articles of Faith 89

《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史》 History of the Kazakh SSR 357-358

《俄羅斯國家的歷史》 History of the Russian State 140, 156

《俄羅斯歷史筆記》 Notes on Russian History 125-126

〈俄羅斯人民和名稱的由來〉 “Origines gentis et nominis
Russorum/The Origins of the Russian People and Name” 107

《俄羅斯人祖先家庭生活的諺語》 Sayings of the Russian People
About the Family Life of Their Ancestors

195

《俄羅斯雜誌》 Rosiiskii magazine / Russian Magazine

120

〈俄羅斯、大俄羅斯、烏克蘭和加利西亞文學〉

“Russian, Great Russian, Ukrainian, and Galician Literature” 216

《俄羅斯先驅報》 Russian Herald 216

《俄羅斯史》 Russian History 157-158

《俄羅斯思想》 Russkaia mysl' / Russian Thought 239

《俄羅斯戰略：二〇〇〇年總統議程》 Strategy for Russia: Agenda
for the President—2000 410

〈俄羅斯沙皇國的對外政策〉
“The Foreign Policy of Russian Tsardom” 330

《咱們的命運》 Nashadolia / Our Destiny 235

《咱們的田》 Nashaniva / Our Field 235

十畫

《埃涅阿斯紀》 Aeneid 177

- 「埃姆斯敕令」 Edict of Ems 218-219, 220, 223, 225-226, 233, 240
- 《迴聲》 Homan / Echo 280
- 《消息報》 Izvestia / News 331-332
-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 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269
- 《根基》 Osnova / Foundation 199, 210-211
- 《哲學書簡》 Philosophical Letters 175, 195
- 《組織法》 Organic Statute 151
- 《真理報》 Pravda / Truth 220, 223, 294, 325-327, 330, 332, 336,
356
- 〈神聖戰爭〉 “The Sacred War” 351
- 〈致俄羅斯的誹謗者〉 “To the Slanderers of Russia”
142
- 〈烏克蘭〉 Ukraine 199
- 《烏克蘭先驅報》 Ukraïns’kyivisnyk Ukrain Herald
236
- 〈被肢解的俄羅斯向世人提出的保證〉 “What the
Dismemberment of Russia Promises the World” 416
- 十一畫
- 「統一法案」 Act of Union 168
- 《基輔人》報 Kievlianin / The Kyivan 263, 272, 276

《基輔電訊報》 Kyivan Telegraph 219

《莫斯科新聞報》 Moskovskie vedomosti / Moscow News 206

《莫斯科人》 Moskvitiania / The Moscovite 176, 186, 197

〈國際歌〉 “TheInternationale” 354

十二畫

《復活節循環週期探論》 Exposition of the Easter Cycle 80

《斯拉夫民族誌》 Slovanskýnárodopis / Slavic Ethnography 196-198, 220

《萬象》 Vsiakaiavsiachina / Anythingand Everything
120

十三畫

〈愛烏克蘭〉 “Love Ukraine” 364

《新世界》 Novyimi r/ The New World 376

《農民真理》 The Peasant Truth 203

十四畫

《赫梅利尼茨基》 Bohdan Khmelnytsky 348, 359, 364

《領航書》 Kormchaia kniga 93

《論烏克蘭和俄羅斯的重新統一》 These on the Reunification of Ukraine and Russia 365-367

十五畫

《論英語的卓越》 Epistle on the Excellencies of the English Tongue
111

《潘塔德烏什》 Pan Tadeusz 202

十六畫

《歷史月刊》 Historical Journal 337

〈親烏克蘭派和波蘭人的利益湊巧一致〉 “The Coincidence of
Ukrainophile Interests with Polish Interests” 213

十七畫

〈關於民族或「自治化」的問題〉 “On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ties or ‘Autonomization’” 291, 302

十九畫

《羅斯史》 History of the Rus’ 179, 186, 197

二十畫

《蘇聯大百科全書》 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 375

《鐘聲》 Kolokol / The Bell 122, 198-200

《議會》 Rada / Council 257

人名

三畫

大流士 Darius the Great 138

小博布林斯基 Vladimir Bobrinsky 254-255

四畫

日丹諾夫 Andrei Zhdanov 358, 363

巴利茨基 Anton Balitski 322

巴斯斯卡澤斯基 Jan Barszcewski 202

巴托雷 Stephen Báthory 73

戈都諾夫 Boris Godunov 83-84, 86

戈巴契夫 Mikhail Gorbachev 377, 385, 387-388, 392, 395-398,
400, 407, 420

戈爾恰科夫親王 Prince Aleksandr Gorchakov 220-221

戈戈茨基 Sylvestr Gegotsky 194

比比科夫 Dmitrii Bibikov 173-174, 311

什梅廖夫 Ivan Shmelev 416

什皮列夫斯基 Pavel Shpilevsky 203

「市民」米寧 Kuzma Minin 137, 334

尤澤福維奇 Mikhail Yuzefovich 217, 220, 223, 263

尤里大公 Prince Yurii 60

尤申科 Viktor Yushchenko 413-414

丹尼爾親王 Prince Daniil 252

切爾內紹夫 Zakhar Chernyshev 121, 124

五畫

古契科夫 Aleksandr Guchkov 262-264

- 古巴廖夫 Pavel Gubarev 434, 436
- 古辛斯基 Vladimir Gusinsky 411
- 尼凱特恩科 Aleksandr Nikitenko 184
- 尼科諾夫 Viacheslav Nikonov 417
- 丘拜斯 Anatolii Chubais 411
- 丘賓斯基 Pavlo Chubynsky 219
- 布季洛維奇 Anton Budilovich 244
- 布希 George W. Bush 428
- 布爾加克 Iosafat Bulhak 167
- 布爾加科夫 Mikhail Bulgakov 334
- 布留洛夫 Kirill Briullov 178
- 布里茲涅夫 Leonid Brezhnev 324, 368, 374-375, 378-379, 385, 389, 409
- 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441
- 布哈林 Nikolai Bukharin 331-332, 333, 371
- 布圖爾林 Vasili Buturlin 95
- 卡韋達 Barys Kaverda 321
- 卡西米爾四世 Casimir IV 64, 66, 68-69
- 卡利諾斯基 Kastus Kalinoŭski 203, 355
- 卡夫坦 Larisa Kaftan 415-416

- 卡岡諾維奇 Lazar Kaganovich 310, 312-314, 319
- 卡米涅夫 Lev Kamenev 299, 309, 319
- 卡季科夫 Mikhail Katkov 206, 213-214, 216, 218
- 卡拉姆津 Nikolai Karamzin 140-141, 156-158
- 卡利諾斯基 Kastus Kalinoŭski / Konstanty Kalinowski Wincenty Konstanty Kalinowski 203, 355
- 卡魯 Richard Carew 111
- 卡布珊 Vladimir Kabuzan 408
- 卡爾斯基 Yefim Karski 316
- 尼古拉耶維奇大公 Grand Duke Nikolai Nikolaevic 251-252, 255-256, 259-260
- 尼康 Nikon 88-89, 101
- 加邦 Grigorii Gapon 230
- 加利奇的達尼洛親王 Prince Danylo of Halych 355
- 弗蘭科 Ivan Franko 348
- 弗蘭格爾 Petr Wrangel 286, 298, 308
- 弗拉基米爾大公 Prince Vladimir 46-47, 61-62, 65, 162, 333
- 弗拉基米爾·莫諾馬赫 Prince Vladimir Monomachos 70-71
- 弗羅倫斯基 Timofei Florinsky 244

皮得戈爾尼 Mykola Pidhorny 367

皮切塔 Vladimir Picheta 346

札瓦多夫斯基 Petro Zavadovsky 120, 158-159

札通斯基 Volodymyr Zatonsky 274, 321, 322

司徒盧威 Petr Struve 238-239, 240, 244, 246, 257-258, 266, 285,
431-432

瓦盧耶夫 Petr Valuev 209-210, 212-213, 215, 218

瓦爾德馬王子 Prince Valdemar 88

瓦西里二世 Prince VasiliïII 62, 78

瓦西里科 Vasilko 279

瓦迪斯瓦夫四世 Władysław IV 85

丘巴爾 Vlas Chubar 312

六畫

多布里揚斯基 Adolf Dobriansky 221-222, 223

多夫任科 Oleksandr Dovzhenko 356, 364, 378

多爾戈魯基大公 Prince Dolgoruky 46

托爾斯泰 Aleksei Tolstoy 335, 418

托洛茨基 Leon Trotsky 273, 292, 302, 309-310, 319

托馬斯·帕拉奧洛戈斯 Thomas Palaeologus 57

伊麗莎白 Elizabeth 15, 106-107, 109-110, 116, 131

- 伊琳娜 Irina 83, 88
- 伊西多爾 Isidore 77-78
- 伊凡（伊凡四世的兒子） Tsarevich Ivan 76
- 伊凡三世 IvanIII 9, 15, 29, 49, 57-58, 62-69, 78-79, 80, 131, 253
- 伊凡四世／恐怖伊凡／伊凡·瓦西里耶維奇 Ivan Vasilevich 29, 58, 71, 73-74, 76, 81, 83-84, 85, 97, 107, 336, 340, 363
- 伊凡諾夫 Anatolii Ivanov 377
- 伊雷林 Ivan Ilin 416
- 伊赫納圖斯基 Usievalad Ihnatoŭski 317, 322
- 安娜 Anna Ioannovna 18, 105-106, 119
- 安托科利斯基 Antokolsky 336
- 安德魯什基 Heorhii Andruzky 182
- 安年科夫 Nikolai Annenkov 212
- 安東諾維奇 Volodymyr Antonovych 193
- 安德羅波夫 Yurii Andropov 385
- 列別德 Dmytro Lebed 310
- 列寧 Vladimir Lenin 244, 267-270, 273-275, 289-295, 297-305, 307-309, 313, 320, 327, 332, 339, 341, 353, 361-362, 368, 371, 375, 378, 395-396, 409
- 米克洛西奇 Frankvon Miklosich 221
- 米哈伊爾·羅曼諾夫 Mikhail Romanov 85-86, 87, 334

米哈爾科夫 Sergei Mikhalkov 409-410

米留科夫 Pavel Miliukov 239-240, 241, 246-247, 257, 261, 263,
266

吉莉亞·馬爾基佐娃 Gelia Markizova 326

吉爾金 Igor Girkin 433-434

吉澤利 Inokentii Gizel 99

吉洪 Tikhon 48, 416

朱可夫 Georgii Zhukov 365

西蒙諾夫 Konstantin Simonov 361

西吉斯蒙德三世 Sigismund III 85

伏龍芝 Mikhail Frunze 297

伏伊科夫 Petr Voikov 321

伏爾泰 Voltaire 129, 133, 145

七畫

伯德 Aleksandr Bode 352

杜金 Aleksandr Dugin 426

杜寧·馬爾辛基維茲 Wincenty Dunin- Marcinkiewicz

202

希什科夫 Aleksandr Shishkov 137, 149

沙哈洛夫 Ivan Sakharov 390

- 沙赫馬托夫 Aleksei Shakhmatov 234, 258
- 沙發利克 PavolJozef Šafárik 196-197, 220
- 別列佐夫斯基 Boris Berezovsky 406, 411, 413
- 別茲博羅德科 Oleksandr Bezborodko 120, 127, 156
- 別列夫 Vasilii Belov 393
- 別林斯基 Vissarion Belinsky 184-185
- 沃林 Boris Volin 337
- 沃羅滕斯基 Semen Vorotynsky 69
- 沃洛基米爾 Volodymer 47, 125-126
- 君士坦丁九世 Constantine IX Monomachos 60, 70
- 君士坦丁十一世 Constantine XI 57, 78
- 克維特卡·奧斯諾維亞年科 Hryhorii Kvitka- Osnovianenko 177
- 克拉夫丘克 Leonid Kravchuk 400
- 克魯普斯卡婭 Nadezhda Krupskaia 302
- 克薩基 Tadeusz Czacki 160
- 里賓特洛甫 Joachimvon Ribbentrop 341, 344-345, 352
- 里格爾曼 Nikolai Rigelman 216-217, 220
- 貝利亞 Lavrentii Beria 362-364
- 貝科夫 Vasil Bykaŭ 379
- 門捷列夫 Mendeleev 327

車爾尼雪夫斯基 Nikolai Chernyshevsky 211, 327

考納丘克 Oleksandr Korniiichuk 348, 359

佐西馬 Zosima 79-80

八畫

阿合馬 Ahmed 65-66, 68

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 Aleksei Mikhailovich 88

阿爾基爾達斯 Algirdas 68

阿爾謝尼 Arsenii 211

阿達莫維奇 Aliaksandr Adamovich 322

阿瓦庫姆 Avvakum 100-101

阿克薩科夫 Konstantin Aksakov 206

阿列克謝耶夫 Mikhail Alekseev 262-263, 276, 284

亞歷山德拉 Alexandra 262

(作曲家) 亞歷山德羅夫 Aleksandr Aleksandrov 351, 354

格奧爾基·亞歷山德羅夫 Georgii Aleksandrov 357, 358, 363

亞沃爾斯基 Stefan Yavorsky 105

亞坎曼科 Vasilii Yakemenko 413

亞努科維奇 Viktor Yanukovych 412-413, 425-426, 427

亞博廷斯基 Vladimir Jabotinsky 238

波塔波夫 Aleksandr Potapov 217

- 波札爾斯基親王 Dmitrii Pozharsky 334
- 波札爾斯基 Pozharsky 137, 334, 348, 353, 479
- 波萊特卡 Hryhorii Poletyka 112
- 波貝多諾斯采夫 Konstantin Pobedonostsev 233
- 波戈金 Mikhail Pogodin 157, 162, 176, 179, 186-190, 197, 214, 218, 220
- 波列伏依 Nikolai Polevoi 156, 179
- 波波夫 Popov 327
- 波托茨基 Seweryn Potocki 159
- 波洛茨克人西緬 Simeon of Polatsk 96, 98, 104, 112
- 舍列平 Aleksandr Shelepin 378
- 舍普季茨基 Andrei Sheptytsky 254
- 舍列斯特 Petro Shelest 378-379
- 舍維廖夫 Stepan Shevyrev 176
- 舍甫琴科 Taras Shevchenko 173-174, 175, 177-178, 180, 182, 184, 190, 211, 223, 241, 245, 311
- 彼得留拉 Symon Petliura 309
- （詩人）彼得羅夫 Aleksei Petrov 128, 139, 144
- 彼得羅夫 Vasilii Petrov 180
- 彼得·阿列克謝耶維奇 Peter Alekseevich 101

拉祖莫夫斯基 Aleksei Razumovsky 106, 108, 117

拉科夫斯基 Khristian Rakovsky 302, 310

拉夫羅夫 Sergei Lavrov 433

拉斯圖斯基 Vatslaŭ Lastoŭski 283

奇若夫 Fedor Chizhov 185

奇切林 Georgii Chicherin 296-297

季諾維也夫 Grigorii Zinoviev 303, 309, 319

季迪斯基 Nikolai Nadezhdin Didytsky 221, 223

季什科夫 Valerii Tishkov 401-402, 418-419

帕斯克維奇·葉里溫斯基 Ivan Paskevich- Yerivansky
142

帕納吉 Paisios 90-91, 93

帕里琴 Palitsyn 137

果戈里 Mykola Hohol' / Nikolai Gogol 162, 179, 221

奈娜 Naina 397

妮娜·科斯捷里納 Nina Kosterina 336

佩泰爾 Pavel Pestel 154-156, 194, 207

姆迪瓦尼 Polikarp Mdivani 299

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353, 356

尤利婭·季莫申科 Yulia Tymoshenko 425

九畫

- 恰爾托雷斯基 Adam Jerzy Czartoryski 158, 160, 164
- 恰達耶夫 Petr Chaadaev 175, 195
- 柯錫金 Aleksei Kosygin 379
- 威廉大公 Archduke Wilh 277
- 查理曼 Charlemagne 53
- 查理十二世 Charles XII 101, 103, 245
- 科爾什 Fedor Korsh 234
- 科爾尼洛夫 Lavr Kornilov 276, 284
- 科內斯基 Heorhii Konysky 121-122, 186
- 科齊特斯基 Hryhorii Kozytsky 120
- 科特利亞列夫斯基 Ivan Kotliarevsky 177-178, 179, 221
- 科皮塔爾 Jernej Kopitar 196, 221
- 科雅洛維奇 Mikhail Koialovich 204-205, 206
- 科斯托馬羅夫 Mykola Kostomarov 173-177, 179-183, 186, 188, 190, 199-200, 204-206, 210-211, 214, 226
- 科斯丘什科 Tadeusz Kościuszko 123, 127, 130, 132, 135, 356
- 科列什尼琴科 Vadim Kolesnichenko 419
- 科楚賓斯基 Yurii Kotsiubynsky 274
- 約拿 Iona 78

約伯 Iov 82-83, 84

約阿希姆五世 Joachim V 75, 81

約瑟夫二世 Joseph II 126

耶利米二世 Jeremiah II 81

施勒格爾 Karl Wilhelm Friedrich Schlegel 145, 146, 148

洛赫維茨基 Kondratii Lokhvitsky 161

洛里斯·梅利科夫 Mikhail Loris-Melikov 225

契爾年科 Konstantin Chernenko 385

迪沃維奇 Semen Divovych 117

韋什涅夫 Veshnevsky 334

十畫

索忍尼辛 Aleksandr Solzhenitsyn 48, 376-377, 389-392, 416

索布恰克 Anatolii Sobchak 399

索拉里 Pietro Antonio Solari 58

索菲婭 Sophia 57-58, 63, 79

索休拉 Volodymyr Sosiura 364

納瓦爾尼 Aleksei Navalny 424

納傑日金 Nikolai Nadezhdin 195-196, 221, 446

納札爾巴耶夫 Nursultan Nazarbayev 397

納濟莫夫 Vladimir Nazimov 203-204

- 馬爾基佐夫 Ardan Markizov 338
- 馬林科夫 Georgii Malenkov 358, 361-362, 365
- 馬澤帕 Ivan Mazepa 13, 102-103, 104, 245
- 馬祖羅夫 Kiryl Mazuraŭ / Kiryl Mazurov 372-373
- 馬卡里 Makarii 71
- 馬姆拉卡特 Mamlakat 339
- 馬克西米連一世 Maximilian I 67
- 馬克西米連二世 Maximilian II 72
- 馬克西莫維奇 Mykhailo Maksymovych 160-161, 187-189, 197-198, 200, 214
- 馬克維奇 Mykola Markevych 179, 187
- 馬赫洛·科楚賓斯基 Mykhailo Kotsiubynsky 274
- 馬爾琴科 Mykhailo Marchenko 348-349
- 馬舍羅夫 Petr Masheraŭ 379
- 班特什·卡緬斯基 Dmitrii Bantysh-Kamensky 179
- 夏里亞賓 Fedor Shaliapin / Chaliapin 250
- 夏甲 Hagar 82-83
- 特列涅夫 Konstantin Trenev 334
- 特列季亞科夫斯基 Vasilii Trediakovsky 110, 112
- 庫奇馬 Leonid Kuchma 412-413

庫馬奇 Vasilli Lebedev- Kumach 351-352

庫圖佐夫 Mikhail Kutuzov 138, 353, 356

庫里申科 Oleksii Kyrychenko 367

庫帕拉 Yanka Kupala 355

(作曲家) 格林卡 Mikhail Glinka 409

格林卡 Nikolai Glinka 334

格魯舍夫斯基 Mykhailo Hrushevsky 236, 237, 240, 241, 258, 259, 270, 271, 274, 298, 311, 322

娜塔莉婭·娜羅奇尼茨卡亞 Natalia Narochnitskaia 419

烏斯迪亞洛夫 Nikolai Ustrialov 157-158, 190, 214

烏瓦羅夫 Uvarov 144-145, 146-147, 148-149, 153, 155-157, 159-160, 161, 175-176, 179, 181, 184, 187, 207, 242

庫利什 Panteleimon Kulish 182, 185, 211, 223, 417

留里克 Rurik 8, 28, 59-60, 62, 65, 70-71, 74, 84, 86, 107

茹科夫斯基 Vasili Zhukovsky 142, 144, 162, 178, 190

十一畫

密茨凱維奇 Adam Mickiewicz 181, 201-202

基斯佳科夫斯基 Bohdan Kistiakovsky 239

基南 Edward L. Keenan 441

基佐 Guizot 145-146

基里爾 教名Kirill，本名Gundiaev 48, 420, 421

基里爾·拉祖莫夫斯基 Kyrylo Rozumovsky / Kirill Rozumovsky
108, 110, 117-119

梅德維傑夫 Dmitrii Medvedev 48

梅洛拉多維奇·斯多羅帕德斯卡 Yelysaveta Myloradovych-Skoropadska 223

捷爾任斯基 Feliks Dzerzhinsky 300

捷普洛夫 Grigorii Teplov 108

康斯坦丁諾維奇大公 Grand DukeKonstantin Konstantinovich 233,
235

畢蘇斯基 Józef Piłsudski 231, 315, 320, 322-323

莫吉拉 Peter Mohyla 89, 96

莫拉切夫斯基 Pylyp Morachevsky 212

莫洛托夫 Viacheslav Molotov 325, 333, 341, 343, 345, 351, 354,
362, 365, 417

十二畫

雅科夫列夫 Aleksandr YaKovlev 376-377

普丁 Vladimir Putin 5-8, 22-28, 32, 48, 403, 405-406, 409-417,
421, 423-433, 435, 437-438, 440, 443

普羅哈諾夫 Aleksandr Prokhanov 434

普羅科波維奇 Teofan Prokopovych 103-104, 105, 108, 110, 149

普希金 Aleksandr Pushkin 142-143, 144, 147, 155, 159, 162, 221, 254, 327, 329, 418, 437

普濟列夫斯基 Ilia Puzyrevsky 215-216

普魯斯 Prus 70-71

普拉東諾夫 Sergei Platonov 328

普里馬科夫 Yevgenii Primakov 406, 410, 426

博戈柳布斯基 Andrei Bogoliubsky 187-188

博布林斯基 Aleksei Bobrinsky 253-255, 311

博布林斯基伯爵 Count Georgii Bobrinsky 253, 260

博迪安斯基 Osyp Bodiansky 179, 197, 446

斯梅托納 Antanas Smetona 320

斯莫利奇 Arkadz Smolich 283

斯塔克爾伯格 Ernst Shtakelberg 220-221

斯科羅帕德斯基 Ivan Skoropadsky 278-279, 282, 284-285

斯列茲涅夫斯基 Izmail Sreznevsky 177, 179, 186-187, 197-198

斯凱里波尼克 Mykola Skrypnyk 313, 322-323, 378

斯托雷平 Petr Stolypin 244

斯基爾蒙特 Raman Skirmunt 282

斯特列爾科夫 Strelkov 433

斯特斯 Vasyl Stus 378

凱薩琳二世 CatherineII 16, 18, 115-116, 122, 127, 131, 133, 136, 145, 152, 156, 162, 165, 168

馮比倫 Ernst Johannvon Biren 106

黑格爾 G. W. Hegel 175

費多爾·伊凡諾維奇 Fedor Ivanovich 74

菲拉雷特 Filaret 86-87, 420

菲洛費 Filofei 80, 83, 93

腓特烈二世 FrederickII 122

舒姆斯基 Oleksandr Shumsky 312-313, 317, 322-323

舒什克維奇 Stanislau Shushkevich 400

舒伊斯基 Vasili Shuisky 84, 86-87

舒利金 Vasili Shulgin 262-265, 271-273, 275-276, 278-279, 285, 307-308, 311-312, 314, 318

「智者」雅羅斯拉夫 Yaroslav the Wise 59, 158, 161

十三畫

奧古斯都 Augustus 70-71, 72, 107

奧爾洛夫伯爵 Count Aleksei Orlov 173, 180

奧爾加 Olga 260

奧特列比耶夫 Georgii Otrepiev 84

奧勃洛莫夫 Oblomov 327, 332-333

奧列爾科維奇 Prince Mykhailo Olelkovich 64, 68

奧爾忠尼基澤 Sergo Ordzhonikidze 297, 300-301

奧西波夫 Vladimir Osipov 390

葉努基澤 Avel Yenukidze 316

葉爾欽 Boris Yeltsin 22, 396-402, 405-411

葉甫洛吉 Evlogii 233, 254-255, 260

葉夫列莫夫 Serhii Yefremov 322

頓斯科伊 Domitrii Donskoi 353, 416

雷平斯基 Rypiński 201-202

愛森斯坦 Sergei Eisenstein 335, 363

十四畫

赫爾岑 Aleksandr Herzen 198-199

赫爾莫根 Hermogen 85-86

赫梅利尼茨基 Bohdan Khmelnytsky 11-12, 15, 17, 19-20, 29, 90-92, 95, 143, 207, 347-348, 356, 359, 364-365

赫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45

赫維廖維 Mykola Khvylioviy 323

赫魯雪夫 Nikita Khrushchev 22, 32, 356, 362, 364-365, 367-368, 369-370, 371-376, 380, 386, 409

赫伯斯坦 Sigismund Herberstein 71

維亞澤姆斯基 Alexksander Viazemsky 119, 147

維亞澤姆斯基 Petr Viazemsky 119, 147

維吉爾 Virgil 177

維塔利·舒利金 Vitalii Shulgin 263

維涅林 Yurii Venelin 198

蓋爾納 Ernest Gellner 50

蓋達爾 Yegor Gaidar 398-399

圖曼斯基 Fedir Tumansky 120

圖奇納 Pavlo Tychyna 378

瑪爾花·鮑列茨卡亞 Marfa Boretskaia 64, 66

十五畫

潘克拉托娃 Anna Pankratova 357-358

鄧尼金 Anton Denikin 284-285, 286, 292, 294, 307, 309, 415-416

窮人傑米揚 Demian Bedny 328-329

德米特里 Dmitrii 83-84

德拉奇 Ivan Drach 378

德拉加曼諾夫 Mykhailo Drahomanov 216-217, 219, 223, 240

德莫夫斯基 Roman Dmowski 231

德蕾莎 Maria Teresa 124-125

魯登道夫 Erich Ludendorff 277, 280

魯福 Marco Ruffo 58

魯斯基 Nikolai Ruzsky 263-264

魯班 Vasyl Ruban 120

緬希科夫 Mikhail Menshikov 236

熱姆丘日娜 Polina Zhemchuzhina 362

十六畫

霍米雅科夫 Aleksei Khomiakov 175, 185

霍斯金 Geoffrey Hosking 50

霍多爾科夫斯基 Mikhail Khodorkovsky 411-412, 424

盧卡申科 Aliaksandr Lukashenka 407, 412, 436

盧日科夫 Yurii Luzhkov 405

鮑列茨基 Dmitrii Boretsky 64

謝林 Friedrich Schelling 175

謝馬什科 Iosif Semashko 20, 164-168, 193, 204, 213, 224

謝德羅維斯基 Shchedrovitsky 417

謝爾比茨基 Volodymyr Shcherbytsky 379

穆拉維約夫 Mikhail Murviev 274-275

十七畫

繆勒 Friedrich Max Müller 107-108

薛倫堡 Friedrich Wernervonder Schulenburg 343

十八畫

薩文科 Anatolii Savenko 245, 285

薩莫伊諾維奇 Danylo Samoilovich 112

薩卡什維利 Mikheil Saakashvili 414

蕭斯塔高維奇 Dmitrii Shostakovich 361

十九畫

麗娜·柯斯登科 Lina Kostenko 378

羅巴切夫斯基 Lobcichevsky 327

羅蒙諾索夫 Mikhail Lomonosov 108, 110-112, 327

羅祖姆 Oleksii Rozum 106

羅曼親王 Prince Roman 252

二十畫

蘇馬羅科夫 Aleksandr Sumarokov 110-111

蘇沃洛夫 Aleksandr Suvorov 123, 127, 353, 356

蘇菲亞·弗雷德里卡·奧古斯塔 Sophie Friederike Augustevon
Anhalt-Zerbst-Dornburg 115

地名

三畫

下諾夫哥羅德 Nizhnii Novgorod 66

大盧基 Velikie Luki 202

四畫

巴庫 Baku 297

巴拉克拉瓦港 Balaklavaharbor 191

巴倫支海 Barents Sea 63

巴圖林 Baturyn 14, 102

切爾尼戈夫 Chernihiv / Chernigov 12, 16, 60, 67, 69, 98, 119, 140, 155-156, 187, 421

戈梅利 Homel 316

尤格拉 Yugra 58

五畫

布蘭登堡 Brandenburg 122

布列斯特 Brest 11, 21, 87, 124, 201, 277, 281-282, 284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 Brest-Litovsk 277, 281-282, 284

布羅迪 Brody 259

布科維納 Bukovyna 50, 222, 251-255, 257, 374

加利西亞 Galicia 16, 21, 31, 61, 98, 122, 124-126, 140, 182, 189, 196, 202, 204, 216, 219-226, 236, 246, 250-261, 368, 374

加利西亞—沃里尼亞 Galician-Volhynian 61, 125, 253

加利奇 Halych 95, 187, 253, 355

加里寧格勒地區 Kaliningrad 396

古拉格 Gulag 337-338, 365, 378-379, 391-392, 424

卡緬斯科耶 Kamenske 324

平斯克沼澤 Pinskmarshes 202

史達林格勒 Stalingrad 353, 370

外喀爾巴阡 Transcarpathia 50, 196, 222, 251, 253, 344-345, 374

弗拉基米爾 Vladimir 29, 46-47, 58-63, 124, 187, 189

六畫

安提阿 Antioc 75, 81-82, 83

伏爾加河 Volga River 47, 73, 183, 205, 258

伏爾加格勒 Volgograd 370

七畫

別洛韋日 Belavezha 400

貝霍夫 Bykhaŭ 276

克拉科夫 Cracow 126

克列梅涅茨 Kremianets 160

克里姆林宮 Kremlin 7, 46, 57-59, 70, 73, 75-76, 84, 138, 290, 325-326, 332, 336, 341, 343, 358, 363, 413-414, 417-418, 428, 435-436, 440

克森尼索 Chersonesus 7, 48

利沃夫 Lviv 21, 123, 219, 236, 253-254, 258-261, 345, 348-349

辛比爾斯克 Simbirsk 258-259

辛菲洛普 Simferopol 427

沃里尼亞 Volhynia / Volyn 15, 38, 61, 95, 98, 124-125, 126, 130, 136, 140-143, 154-156, 160, 163, 173, 194, 242-243, 253-254, 261, 307, 374

八畫

亞歷山卓 Alexandria 75-76, 82

波羅底諾 Borodino 142, 479

波多利亞 Podolia 16, 98, 136, 140, 142, 154-156, 164, 173, 194, 243

波洛茨克 Polatsk 13, 20, 67, 69, 73-74, 96-98, 101, 104, 112, 121, 136, 168-169, 202

波德拉謝 Podliashie / Podlachia 233

波蘭門 Polish Gate 60

波爾塔瓦 Poltava 14, 31, 101, 103, 122, 155-156, 177, 235, 245

明斯克省 Minsk 154

姆斯齊斯拉夫 Mstsislaŭ 121

佩列亞斯拉夫 Pereiaslav 12-13, 30, 60-61, 92, 95-96, 366

彼爾姆 Perm 58

彼得霍夫 Peterhof 115

拉帕洛 Rapallo 295-296

舍隆河 ShelonRiver 64

九畫

保加爾 Bulgar 58

哈爾科夫 Kharkiv / Kharkov 16, 23, 154-155, 159, 176-177, 179, 186, 198, 219, 234, 270, 273, 275, 296, 409-410

紅場 Red Square 8, 59, 334, 336, 353, 361, 370

施蒂里亞 Styria 252

十畫

庫爾蘭 Courland 105-106, 154

庫斯克 Kursk 155

庫班 Kuban 17, 276, 284, 323

格羅德諾省 Grodno 154, 156

格盧霍夫 Hlukhiv 117

倫貝格 Lemberg 123

納爾瓦 Narva 74, 101

涅米里耶 Nemyrie 164

桑河 SanRiver 254

索契 Sochi 7, 423-424

泰雷津 Terezin 252

特維爾 Tver 58, 62, 65

烏格拉河 UgraRiver 66, 68

海參崴 Vladivostok 396

十一畫

基輔 Kyiv / Kiev 8-10, 12, 14, 16, 19-20, 25, 29-30, 32, 34, 46-50, 52, 58-65, 67-71, 74, 84, 89-90, 92, 96, 98-101, 103, 105, 108-110, 112, 119-120, 124-126, 129, 131, 140, 143, 154-162, 173-174, 180, 184, 186-190, 193, 205, 211-213, 215-217, 219-220, 232, 234-236, 238, 240-242, 244-245, 250, 253, 257-258, 261, 263, 270-277, 279, 281, 283-285, 307-308, 311-312, 314, 333, 347-349, 352, 357, 366-367, 373, 379, 390-391, 399, 413, 416-417, 420-421, 426-427, 433, 440, 443

莫吉廖夫 Mahilioŭ / Mogilev 121-122, 136, 155, 262, 316

梁贊 Riazan 60, 140

第比利斯 Tbilisi 389

十二畫

普熱梅希爾 Peremyshl 253, 259, 261

普里皮亞季河 Prypiat River 197, 202

普斯科夫 Pskov 58-59, 80, 202, 262-263

斯沃博達烏克蘭 Sloboda Ukraine 16, 154

斯摩棱斯克 Smolensk 13, 67, 69, 72, 81, 98, 119, 140, 152, 316

十三畫

道加瓦河 Daugava River 121, 124

頓巴斯地區 Donbas 433-434, 435-436, 437, 442

頓內茨克 Donetsk 434, 436

頓內茨河盆地 Donets River Basin 270

奧卡河 Oka River 65

奧爾沙 Orsha 158

塞瓦斯托波爾港 Sevastopol harbor 22, 191

塔甘羅格 Taganrog 277

塔勒爾霍夫 Talerhof 252

葉里溫 Yerevan 142

十四畫

維亞特加 Viatka 58

維爾紐斯 Vilnius 124, 142, 159, 164, 203, 235, 283, 394

維斯瓦河 Vistula 151

維捷布斯克 Vitsebsk/Vitebsk 121, 136, 155, 168, 187, 202, 316

十五畫

德巴爾切夫 Debaltseve 436

熱那亞 Genoa 295

十六畫

霍登卡野地 Khodynka Field 229

霍爾姆 Kholm / Chelm 224, 232-233, 254

盧布林 Lublin 9, 38, 73, 126, 232, 344-345

盧干斯克 Luhansk 23-25, 435-436

盧茨克 Lutsk 124

諾夫哥羅德 Novgorod 8, 16, 36-37, 49, 58-59, 61-68, 70, 72-73, 120, 140, 156, 196

諾夫哥羅德－謝韋爾斯基 Novgorod- Siverskyi 16, 119

十七畫

謝德爾采 Siedlce 232

十八畫

聶伯河 Dnieper 10, 12, 14, 16, 30, 98, 103, 117, 121, 124, 129, 154, 162-163, 194, 205, 223, 254, 431

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 Dnipropetrovsk 368

龐塔斯 Pontic 138, 196

薩拉托夫 Saratov 183

薩克森 Saxony 102

十九畫

羅茲 Łódź 232

羅斯托夫 Rostov 86

二十畫

蘇茲達爾 Suzdal 188

國家、民族、王朝

三畫

大帳汗國 Great Horde 64

- 巴什基爾 Bashkiria 297, 305
- 比薩拉比亞 Bessarabia 154
- 白羅斯民族共和國 Belarusian National Republic 282
- 白魯塞尼亞人 Weissruthenen / White Ruthenian 280
- 布里亞特人 Buriat 325-326, 327, 332
- 布里亞特－蒙古自治共和國 Buriat-Mongol Autonomous Republic
326, 338
- 加利西亞－洛多梅里亞 Galicia-Lodomeria 125
- 加利西亞－沃里尼亞 Galicia-Volhynia 61, 125, 253
- 立陶宛大公國 Grand Duchy of Lithuania 10, 29, 61, 64, 67-69, 73,
96, 204, 283
- 卡巴爾達－巴爾卡爾 Kabardino-Balkar 368
- 卡爾梅克 Kalmyk 101, 368
- 外高加索聯邦 Transcaucaian Federation 290, 296-297
- 札波羅熱哥薩克人 Zaporozhian Cossacks 177
- 西徐亞人 Scythians 138
- 車臣－印古什 Chechen- Ingush 368
- 克里米亞汗國 Crimean Khanate 12-13, 17, 66, 92
- 克里米亞韃靼 Crimean Tatars 68, 73, 367-368
- 克里維奇人 Krivichian 205

利夫蘭 Livland 154-155

利沃尼亞騎士團 Livonian Order 73

阿布哈茲 Abkhazia 402, 415

阿斯特拉罕汗國 Khanate of Astrakhan 72-73, 140

金帳汗國 Golden Horde 9, 29, 62, 64-65, 66, 68, 71-73, 78-79

波羅的海聯合公國 United Baltic Duchy 277

哈布斯堡王朝 Habsburg Empire 51, 53, 72, 220, 222, 251-252

俄羅斯聯邦 Russian Federation 20, 32, 49-51, 53, 290, 295, 297-299, 301, 316, 323, 367-368, 388, 395-403, 405-406, 408-410, 418, 428, 431-434, 438, 443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Russian Soviet Federative Socialist Republic 396

南奧塞梯 South Ossetia 402, 415

哥薩克人 Cossacks 10, 17, 90-92, 96, 98, 103, 106, 109, 137-138, 177, 179, 182, 186, 188, 197, 276, 282, 284, 286, 298, 355, 366

哥薩克烏克蘭 Cossack Ukraine 102, 207, 222

留里克王朝 Rurikid dynasty 59-60, 62, 65, 74, 84, 86, 107

基輔大公國 Grand Duchy of Kyiv 67

莫斯科大公國 Grand Duchy of Muscovy 49, 63-64, 68

喀山汗國 Khanate of Kazan 72-73, 140

塔什干 Tashkent 375

摩爾達維亞 Moldavian 13, 89, 103, 342, 349, 352

摩爾多瓦 Moldova 46, 402, 419, 421, 441

摩里亞 Morea 57

諾夫哥羅德共和國 Republic of Novgorod 61-63, 140

魯塞尼亞人 Ruthenian 69, 97, 166, 203, 220-223, 280, 390

獨立國協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23, 400, 406-407, 426, 439

霍霍爾人 Khokhols 197

盧森尼亞人 Rusyns 154

薩莫吉希亞 Samogitia 136

聶斯特河沿岸共和國 Transnistrian republic 402, 441

羅辛人 Rusyn 220

蘇維埃白羅斯 Soviet Belarus 317, 321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289

組織機構

二畫

人民代表大會 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 387, 393, 395, 401

人民祕書處 Peoples's Secretariat 275

十月十七日聯盟 Union of October 17 262

三畫

山洞修道院 Cave Monastery 99, 159

中央拉達 Central Rada 270-271, 273-274, 275, 277-278, 285, 292-293, 298

大白羅斯拉達 Great Belarussian Rada 281

工農代表蘇維埃 Soviet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Deputies 275

四畫

中情局 CIA 385

五畫

古文獻委員會 Archeographic Commission 162, 174

白羅斯國立大學 Belarusian State University 373

布爾什維克黨 Bolshevik Party 20, 31, 269, 298, 304, 309

加利西亞慈善協會 Calician Benevolent Society 254

民族院 Chamber of Nationalities 302, 304

立憲民主黨 Constitutional Democrats 238-239, 240-241, 244, 246, 257-258, 261, 266, 270, 273, 278-279, 285, 402

弗蘭科民族大學 Ivan Franko National University 348

卡西米爾大學 Jan Kazimierz University 348

北約 NATO 412, 414-415, 426, 428, 441

六畫

全俄羅斯民族主義聯盟 all-Russian Nationalist Union

263

全俄合作協會 ARCOS 320

共產國際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326, 339, 354

西部省份委員會 Committee on the Western Provinces

152-153

自治聯邦主義者聯盟 Union of Autonomist Federalists

237

七畫

杜馬 Duma 230-233, 236-238, 240-241, 244, 246-247, 254, 256, 261-265, 285-286, 293, 428

八畫

法貝之家 Fabergé 259

彼得格勒蘇維埃 Petrograd Soviet 263-264, 265, 276

波恰耶夫修道院 Pochaiv Monastery 163, 242

波蘭民族民主黨 Polish National Democrats 231

委員會蘇維埃 Soviet of Commissars 281

宗教事務管理總局 Synod 104-105, 166-167, 168, 212, 217, 232-233

九畫

- 帝國美術學院 Imperial Academy of Fine Arts 178
- 軍事革命委員會 Military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275
- 政治局 Politburo 309, 312, 319, 323, 328-330, 333, 354, 358, 364,
378
- 是時候了！ Paro! / It's Time 413
- 俄羅斯東正教會 Russian Orthodoxy Church 19, 30, 201
- 俄羅斯民族統一黨 Russian National Unity 434
- 俄羅斯黨 Russian party 137
- 俄羅斯世界基金會 Russian World foundation 419-420
- 俄羅斯世界 Russkiimir / Russian World 27, 196, 217, 225, 405,
417-418, 419-421, 426, 434-437, 441
- 俄羅斯社會民主黨 Russian Social Democrats 244, 268
- 俄羅斯人民聯盟 Union of the Russian People 242-243, 244, 291
- 特列季亞科夫畫廊 Tretyakov Gallery 336

十畫

- 鬥爭派 Borot'ba / Struggle 294-295, 312
- 烏克蘭赫爾辛基小組 Ukrainian Helsinki Group 390-391, 392
- 烏克蘭革命黨 Ukrainian Revolutionary Party 236
- 烏克蘭人斯拉夫會社 Ukrainian Slavic Society 175, 180
- 烏克蘭解放聯盟 Union for the Liberation of Ukraine 322, 328

十一畫

執政內閣 Directory 292-293

國際俄羅斯同胞議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Russian Compatriots
419

基輔斯拉夫慈善協會 Kyiv Slavic Benevolent Society

216

參政院 Senate 104, 119, 260

十二畫

黑色百人團 Black Hundred 244-245

進步集團 Progressive Bloc 262, 285-286

單一經濟空間 Single EconmicSpace 412

斯拉夫會社 Slavic Society 175, 180

最高樞密院 Supreme PrivyCouncil 105

最高蘇維埃 Supreme Soviet 320-321

十三畫

聖西里爾與聖美多德兄弟會 Brotherhood of Saints Cyril and
Methodius 175-176, 179-180, 188, 198-199, 205, 211, 215, 219, 223, 417

聖巴西勒修會 Order of St. Basil 162-163, 165

聖靈學院 Spiritual College 164-165, 167

頓斯科伊修道院 Donskoi Monastery 416

十四畫

歷史觀點基金 Fund of Historical Perspective 419

團結工聯 Solidarity 386

十五畫

歐亞經濟共同體 Eur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412

歐亞聯盟 Eurasian Union 425-426, 428

歐盟 European Union 8, 412, 414, 426-427, 428, 438, 441

暴動小貓 Russy Riot 424

十七畫

聯邦安全委員會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405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48

聯合教會 Uniates 11, 19-20, 30, 78-79, 87, 104, 128-130, 132, 152, 162-168, 193, 201, 203-204, 224, 232, 254-255, 369-370

十九畫

臨時政府 Provisional Government 20, 263-264, 265-266, 268, 270, 272-273, 274, 276, 292

羅斯理事會 Rus' Council 221

二十畫

蘇維埃烏克蘭 Soviet Ukraine 292, 294, 345

建築

多棱宮 Palace of Facets 58

松林門 Borovitsky Gate 47

救世主基督大教堂 Cathedral of Christ the Savior 424

救世主塔樓 Spasskaia Tower / Savior's Tower 58-59

黃金之門 Golden Gate 161

聖母升天教堂 Church of Dormition 60

聖母升天大教堂 Dormition Cathedral 57, 76, 84

聖巴索大教堂 St.Basil's Cathredral 336

聖喬治廳 St.George's Hall 428

瑪麗劇院 Malyi Theater 348

其他

二畫

十二月黨人起義 Decembrist revolt 141, 154, 175

十一月起義 November Uprising 141-142, 144, 151-152, 192

三畫

大公會議 Ecumenical Council 76-77, 81, 89, 369

大聯盟 Grand Alliance 352-353

大北方戰爭 Great Northern War 13, 30, 101, 104-105

大恐怖時期 Great Terror 337

四畫

公曆 Gregoriancalendar 267

六○年代的一代 sbestydesiatnyky / generation of the sixties 378

五畫

白羅斯方面軍 Belarusian Front 345

白沙皇 White tsar 254

布列斯特會議 Council of Brest 87

民族統一日 Day of National Unity 48

民族共產主義 national communism 307, 317, 345, 377-378

民族陣線 national fronts 394-395

民主俄羅斯 Democratic Russia 396

卡斯塔皮人 katsapy 174

本土化政策 korenizatsiia / takingroot / indigenization 307-311, 314, 317-319, 322, 324, 362, 389

左派反對派 Left Opposition 319

六畫

全俄羅斯人派 all-Russian of party 263

全羅斯的最高主宰和獨裁者 sovereign and outocrat of all Rus' 66-67

血腥星期日 Bloody Sunday 230

七畫

改變地標 Change of the Landmarks 319

利沃尼亞戰爭 Livonian War 73-74

泛俄羅斯民族 pan- Russian nation 51, 144, 390

八畫

牧首 Patriarch 19, 30-31, 48, 57, 72, 75-78, 81-85, 87-91, 93, 101, 105, 354, 420-421

波羅的海之路 Baltic Way 394

波羅底諾戰役 Battle of Borodino 137, 142

波坦金號 Potemkin 230

波蘭親王 Prince of Warsaw 151

東方教會父老 church fathers 90

官方民族性 official nationality 134, 144, 153

玫瑰革命 Rose Revolution 414

奉旨烏克蘭化 Ukrainization by decree 310-311

九畫

後蘇聯空間 post- Sovietspace 403, 406, 410, 412-414, 417-418, 439, 441

紅羅斯 Red Rus' 220, 255

紅色恐怖 Red terror 275

俄羅斯國民 rossiane 401, 406

俄羅斯公民民族 Russian civic nation 401, 419
俄羅斯哥薩克 Russian Cossack 237
俄羅斯法 Russian Justice 154
俄羅斯自由帝國 Russia's liberal empire 411
俄羅斯之春 Russian Spring 434-435
俄國革命 Russian Revolution 50, 53, 246, 266-268, 330
星戰計畫 Star War 386

十畫

庫里科沃戰役 Battle of Kulikovo 377
特倫特大公會議 Council of Trent 89
特轄制 Oprichnina 73
祖國保衛者節 Defender of the Fatherland Day 423
烏克蘭大饑荒 Great Ukrainian Famine 322-323
烏克蘭方面軍 Ukrainian Front 345, 356
烏瓜 khokhly / topknots 185, 236
租借計畫 Lend- Leasaprogrm 353
馬澤帕主義者 Mazepists 245, 257-258
虔誠狂熱派 ZealotsofPiety 88

十一畫

國民大會 Assembly of the Land 84-86

國際陣線 International Front 394

國際運動 International Movements 394

教會斯拉夫語 Church Slavonic 109-112, 156, 188

屠龍者 Dragon-Slayer 428

第一屆全白羅斯代表大會 First All-Belarussian Congress 281

第三羅馬 Third Rome 19, 29, 75, 80-82, 93-94, 99, 448, 465

都主教 Metropolitan 57, 62-63, 66, 71, 75-83, 86, 89-90, 93, 95-96, 159, 165, 167, 193, 211, 254, 275, 420

莫諾馬赫之冠 Monomakh' Cap 71, 74

混亂時期 Time of Troubles 84-87, 93, 127, 129, 137, 168

十二畫

黑海艦隊 Black Sea Fleet 22, 191

喀爾巴阡羅斯 Carpathian Rus' 250-251, 253

斯拉夫國度 Slavdom 144, 250

斯拉夫－俄羅斯人 Slavo-Russian 99, 440

十三畫

奧爾沙之役 Battle of Orsha 69

奧克語 Occitan 214-215

跨區域議員團 Interregional of Deputies 395-396, 401

愛農民者 khlopomany / peasant-lovers 193

意第緒語 Yiddish 235, 317-318

十四畫

歐亞主義 Eurasianism 426

赫魯雪夫解凍 Khrushchev Thaw 365, 376

十六畫

學院案件 Academy Case 328

親白羅斯派 Belarusophile Party 206

親莫斯科派 Muscophile 221

親俄羅斯派 Russophile 220-226, 251-252, 254, 256, 260

親斯拉夫派 Slavophiles 175-177, 179-180, 183-185, 197, 206-207, 218, 221, 250, 417

親烏克蘭派 Ukrainophiles 182, 184-186, 205, 210-211, 213-214, 216-220, 222-226, 233, 238, 240, 245, 252, 254, 257-258

儒略曆 Julian calendar 59, 267-268

十七畫

總祕書處 General Secretariat 272

總督轄區 vicegerency 119-120

十八畫

舊禮儀派信徒 Old Believers 101

龐塔斯斯拉夫語 Pontic Slavic 196

十九畫

羅斯重新統一 reunification of Rus' 20, 190, 366

二十二畫

韃靼枷鎖 Tararyoke 66



Your gateway to knowledge and culture. Accessible for everyone.



z-library.sk

z-lib.gs

z-lib.fm

go-to-library.sk



[Official Telegram channel](#)



[Z-Access](#)



<https://wikipedia.org/wiki/Z-Library>